黑夜中尋找星星

走過戒嚴的資深記者生命史

司馬文武　薛心鎔　黃肇珩　俞國基　南方朔　吳豐山　李旺台　殷允芃　周天瑞　戎撫天　楊憲宏　楊渡　王健壯　李永得　徐璐　黃年　陳銘城

何榮幸◎策畫、導論
台大新聞研究所◎召集、採訪／張錦華主持，林麗雲、洪貞玲協同主持
徐元智先生紀念基金會◎贊助出版

超多精品资源尽在：http://iask.sina.com.cn/u/1623826291/ish

准免费！

阅 读 说 明

首先感谢你下载本书！

本人的资料素来是免费的——为此我已坚持了几年，上传的资料逾千。然而，随着工作的变化，闲暇时光越来越少，倍感一个人“战斗”得太辛苦，因而加设了积分，让大家了解资料的来之不易（其实制作过程真的是很艰辛漫长的！），遂统一上传至 iask.sina.com.cn，当然仍是免费的，你只要拨冗注册一个 iask 账号就能下书了，积分用完再注册一个即可。还有，除供私人收藏的资料（陆续开放）外均无密码。

你下载下书即表示你已承诺将在 24 小时内删除该电子档----作为一个“人”，相信你能做到这一点，对吧？(潜台词是什么，相信你已很清楚)。

目前本人已收集 100 万册左右各类书籍，后续择其中部份制作成 PDF 电子图书。当然，本人无义务提供这些图书，因此不会设上传的时间点和数量，更请勿向本人索取。

另，谢绝转载此书——如果你是一个有尊严的人，相信你也一定能做到这一点。

Good luck!

吴国林　Colin Wu（一位孤独的战士）

MSN / E-mail: colin_21st@hotmail.com

(本人不知 QQ 为何物，又有何用，请勿就此问题发邮件，thanks.)

歷史與現場⑰

黑夜中尋找星星——走過戒嚴的資深記者生命史

策畫導論—何榮幸
召集採訪—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張錦華主持，林麗雲、洪貞玲協同主持）
主　　編—陳俊斌
編　　輯—潘乃慧
美術編輯—張瑜卿
執行企畫—曾秉常

董 事 長
發 行 人—孫思照
總 經 理—莫昭平
總 編 輯—林馨琴
出 版 者—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10803和平西路三段二四〇號三樓
發行專線—（〇二）二三〇六—六八四二
讀者服務專線—〇八〇〇—二三一—七〇五・（〇二）二三〇四—七一〇三
讀者服務傳真—（〇二）二三〇四—六八五八
郵撥—一九三四四七二四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信箱—台北郵政七九～九九信箱

時報悅讀網—http://www.readingtimes.com.tw
電子郵件信箱—history@readingtimes.com.tw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李念祖律師
印　　刷—盈昌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二〇〇八年一月二日
定　　價—四〇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八〇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ISBN 978-957-13-4781-3
Printed in Taiwan

目錄

【推薦序】

追尋烏托邦／鄭瑞城（前任政治大學校長）……006

這是本有意義的好書！／朱立（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009

台灣新聞自由今昔／孫震（徐元智先生紀念基金會董事長）……013

【計畫緣起】走過戒嚴的資深記者生命史

回首來時路　莫忘初衷／張錦華……018

老靈魂與新生命的奇妙交織／何榮幸……023

【導論】—何榮幸

Part 1：他們看見了歷史……028

Part 2：歷史看見了他們……045

本書受訪者歷史年代對照表……058

一、與警總「捉迷藏」的日子：一九七九年黨外雜誌健將／司馬文武 …… 061
只想當「真正的記者」

二、大陸來台的愛國媒體人：一九五〇年大華晚報創辦人／薛心鎔 …… 089
一甲子的信守與體驗

三、第一位女性黨營媒體高層：一九五九年中央社記者／黃肇珩 …… 117
我是「記者」，不是「女記者」！

四、來自中南部的聲音：一九七一年台灣時報總編輯／俞國基 …… 145
凌空看政治的專業新聞人

五、一輩子的評論志業：一九七二年民族晚報記者／南方朔 …… 171
從文藝青年到自由左派

六、連寫二十年個人專欄：一九七五年自立晚報撰述委員／吳豐山 …… 195
記者是永遠的社會改革先鋒

七、美麗島事件見證人：一九七九年台灣時報採訪主任／李旺台 …… 219
對抗威權體制的南部記者

八、國際媒體聲援美麗島：一九八〇年紐約時報駐台記者／殷允芃 …… 243
我自己跳下來幫台灣加分

九、海外華文媒體的宿命：一九八四年美洲中時總編輯／周天瑞 …… 271
永遠在找最大公約數

十、解嚴前夕的主流媒體：一九八四年聯合報政治組召集人／戎撫天 301
曲筆奮進迎向新時代
十一、公害環保風潮：一九八五年聯合報環保記者／楊憲宏 333
科學精神的人文記者
十二、反杜邦運動與社會力：一九八六年時報新聞周刊記者／楊渡 361
以報導文學實踐文人理想
十三、破繭而出的政論雜誌：一九八七年新新聞總編輯／王健壯 393
永遠的自由派
十四、歷史性大陸行之一：一九八七年自立晚報政經研究室主任／李永得 419
絕不妥協的硬骨記者
十五、歷史性大陸行之二：一九八七年自立晚報政經研究室研究員／徐璐 441
不斷追尋自我的女記者
十六、五十八天創辦新報紙：一九八八年聯合晚報總編輯／黃年 465
黑金政治的命名者與批判者
十七、解嚴後政治人權報導：一九九一年自立早報記者／陳銘城 495
為受難人權發聲

〔推薦序〕

鄭瑞城

追尋烏托邦

這是新聞人追尋烏托邦的故事——但就像柏拉圖、摩爾或貝米拉對烏托邦各有一些不同的想像。烏托邦（Utopia）的希臘字源有兩種意義：完全美好之地或烏有之地。縱使眾裡尋它千百度，宇宙人間是烏（沒）有完全美好之地的；這一點，有機會近距離觀察人生百態的新聞人一定更能體會。但是人類似乎從來沒放棄對烏托邦的憧憬，並經常付之行動去追尋——有時甚至是以飛蛾撲火之姿在追尋著；從書裡的新聞人的自述中多少存在著這麼一種精神和意念。就是這種精神和意念使台灣走向：雖非烏托邦——卻是更美好之地。

台灣在威權體制的戒嚴時代，絕對稱不上美好之地；一位在一九七〇年代受牢獄之災的作家甚至

以「看過地獄回來的人」自況並形容那個時候的台灣。台灣在歷經約四十年的戒嚴統治，終於游過了一條又一條湍急、凶險的河流，渡到了民主的對岸；而這群新聞人也歷經身心煎熬，在時代洪流裡載浮載沉地到達彼岸。說「煎熬」可能還低估了些，一起走過來而對媒體略有瞭解的人，大概多少可以感同身受。

在那樣的年代裡，媒體習常是統治者的工具，記者習常是統治者的幫手，由不得新聞專業扮演和作祟。而這群新聞人中的大多數人（在當時，他（她）們其實是少數者）卻堅持新聞專業理念，以強烈的使命感、正義感和理想性，堅持正確地報導事實真相，堅信媒體和記者既是穩定、更是改革社會的重要動力。他（她）們當時都被主流政治勢力冠上「亂源」的封號，但他（她）們是為公為義，為捍衛新聞人的專業尊嚴，和強大的主流勢力抗衡，這和今日媒體人被稱為社會「亂源」，不可同日而語。是什麼力量支撐他（她）們有勇氣在那個時代挑起那樣的重擔？他（她）們的靈魂深處必然埋著這樣珍貴的種子：深信人類可以更美好，台灣可以更烏托邦；居住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應該更相互尊重、更相互寬容、更訴諸理性、更追求正義。

我們要向他（她）們這種珍貴的心靈和實踐新聞專業的勇氣致敬。

我們也要向本書的策畫人及台大新聞所的師生表示敬意。他（她）們在解嚴後二十年的今天，以虔誠之心和專業作為，為值得尊敬的新聞人寫下生命史，給予應有的肯認和歷史地位；並將這些史料作各種方式的紀錄和儲存，為台灣新聞史留下珍貴的史頁，供後來者有機會繼續探索、親炙前輩新聞人的典型和風範。台大新聞所和策畫者做了一件令人感動的事情。

反觀今日台灣媒體整體性的亂象，自然令人興起無限的感慨。我相信，台大新聞所那麼用心地做這件事，不只是要告訴我們：台灣已有新聞人的典型，惟典型皆在夙昔；本書編撰者更想告訴我們的應該是：是的，許多人對現今的媒體和社會亂象都深有感慨，但我們絕不能放棄對烏托邦的追尋及人

類可以更美好、台灣可以更烏托邦的精神和意念。這是本書出版最感人和最有意義之所在。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作者爲前任政治大學校長）

〔推薦序〕

這是本有意義的好書！

朱立

十七位台灣資深記者口述了他們從事新聞工作的歷程，記錄了他們在戒嚴時期爭取言論與新聞自由的點點滴滴以及反躬與自省，既無悔，也無奈，既滿足，又感慨！對二、三十歲的年輕一輩言，這本書所呈現的可能只不過是紙上的歷史，但對上一代的媒體工作者言，每一字、每一句都是活生生的共同記憶！今天我們享有言論與新聞自由，這十七位以及無數位曾經為自由、民主而奮鬥、犧牲的人功不可沒！

這十七位記者，有學法律的、政治的、歷史的、新聞的、外文的，還有學森林與醫學的；有人一開始便立志從事新聞或寫作工作，也有人則誤打誤撞地入了新聞這一行；他們有人在國民黨的傳媒工

作，也有人在當時仍然稱爲黨外的刊物服務。他們的背景、動機、處境不盡相同，但一旦入了行，他們都敬業、盡職，堅持奉獻專業，總設法在可能範圍內，把哪怕只有一點點的自由發揮到極致，並在必要時開拓言論的空間。這些人既有熱情，也有勇氣，熱情令他們鍥而不捨，堅守新聞專業崗位，勇氣令他們敢向上司與監控傳媒的情治單位力爭。熱情與勇氣之外，他們還擁有不斷學習、思考的智慧，使他們在險惡的環境裡避凶趨吉，就這樣，在迂迴、對抗、後退、前進中，台灣的言論與自由空間一步一步地擴張、變大了！

對這十七位記者言，他們很幸運地遇到了賞識、提拔他們的老闆兼良師，老闆們還在必要時支持、包容、保護他們。老闆們固然也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網，但這無礙於他們在關鍵時刻只問「有沒有依據」：有，那就見報、刊登，而壓力與責任便落到了這些報老闆的身上！無論是王惕吾、余紀忠、吳三連或吳基福，他們都具有頗深的人文修養與關懷，有擔當，也有大氣度。他們出身不同，但都擁有傳統知識份子的志氣，一心一意要辦份「不黨、不私、不賣」的報紙！

任何記憶都是選擇性的，有些記憶令人歡欣，有些記憶令人緬懷，有些記憶教人嘆息，也有些記憶教人感傷！有些記憶是愚蠢的，有些記憶則是智慧的！愚蠢的記憶傷身更傷心，教人消沉頹喪，最愚蠢和最惡毒的記憶則是挑起傷痛，並在上面撒鹽！智慧的記憶不然，無論它教我們感傷，還是教我們歡欣，無論它教我們緬懷，還是教我們嘆息，它都會令我們反思，並從中得到鼓舞，然後再衝向前！《黑夜中尋找星星》教我們從過去看現在，也教我們從現在思考未來，它是智慧的記憶！

解嚴、解除黨禁與報禁已經二十年了，也經歷了三次總統直選。從宏觀的角度看，與西方先進民主國家相比，台灣所享受的民主與自由似乎不遑多讓！然而，從微觀的角度看，我們民主與自由的品質實在太差了，差到令人擔憂！我們的選舉頻繁、喧嘩、浪費，操控多過爭辯，口水多過政綱。選舉完後，有人當了官，有人做了議員，喧嘩吵鬧依舊！不是肢體的暴力，就是語言的暴力！沒錯，我們

實施民主與自由的歷史還短，我們還在學習！西方國家也有政爭，然而我們看不見議會裡拳腳交加，也聽不見惡言相向，我們更聽不到領導人或官員們會用粗俗的語言攻擊政敵，然而在我們所居住的台灣都出現了！官員與議員出國觀光、考察的機會絕對不少，不可能不知道這些最基本的民主與議事規則，爲什麼學了這麼久還沒有學會呢？他們太精？我們太蠢？把他們的愚蠢當成了智慧，投了他們的票？對於社會與政壇的亂象，傳媒本應是批判者與監督者，不幸的是我們的傳媒卻成了亂象的始作俑者之一，傳媒「已經在藍綠陣營中就位」（江春男語），傳媒「太政治了」（俞國基語）！黃年的感嘆是：「曾是璞玉的『台灣革命』，已經被惡匠雕成羅剎，而不是觀音。」楊憲宏則說：「媒體變成一個被打開的潘朵拉盒子，各種價值流失了，根本沒有機會生根。」戎撫天更直接了當地說：「這是媒體工作者深沉的悲哀。」

在威權時期，操控言論與媒體的是黨國政治機器赤裸裸的干預和暴力；解嚴後的民主時期，操控言論與媒體的力量已被大、小政客們的迷幻語言與媒體的市場考量所取代。政治機器的介入，我們比較容易察覺，也比較容易激起反抗；但迷幻的語言與市場商業利益的介入，則是對傳媒閱聽人身心的有害按摩，而這種慢性痲痺與窒息卻是一般人不易察覺的。最可怕與更可憂的是，一般人反而可能甘之如飴而上癮，直至致命而不知！如果我們只爲宏觀上所取得的民主沾沾自喜、故步自封，對在微觀層面所見到的亂象不加批判、導正，宏觀的成就也可能會遭到腐蝕而化爲子虛烏有！在威權時期，破壞新聞自由的是政治力量，在威權解體後的民主時期，破壞新聞自由的則既來自政治，也來自市場。於是，回歸專業、呼喚克制便成了這些資深記者的心聲，也成了許多有心人的殷切期望！

在美國首府華盛頓，韓戰紀念碑上刻著「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必有代價」，眞是善哉斯言！我們絕不能因爲見到民主與自由之亂象，而緬懷昔日威權之治，因爲「不自由的代價更大」！我們已經爭取到了自由，便更要保育、充實得之不易的自由；我們要對抗政經機器的干預與破壞，也要

對抗墮落政客與媒體人的干預與破壞。在媒體意識形態的爭霸戰中，有良心的媒體人絕不能鬆懈，要打一場持久戰！今年十月，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舉辦「台灣解嚴二十週年研討會：威權解體與新聞自由的崎嶇路」，並策畫出版《黑夜中尋找星星》，這有助於我們記憶與反思！記憶與反思並進，我們才有跳脫政治與傳媒惡鬥困境的可能！

我過去三十年在香港度過，其間經常返台公幹、探親或訪友，對成我、育我的台灣無一日或忘。因為從事新聞傳播教育工作，我也認識了些台、港兩地的資深新聞媒體人，對他們促進自由、推動民主的奮鬥，我由衷地敬佩！我也有著他們同樣的憂心，但我並不悲觀，我認為哲學家尼采說得好，「受苦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利。」如果我們見到的是政治與傳媒的亂象，那我們就是「受苦的人」；如果我們還希望台灣一天比一天好，那我們也就「沒有悲觀的權利」。我深信，台灣還有許許多多具有同樣想法的人，而這就是我們的希望所在！

謝謝台大新聞所主持計畫的老師，謝謝負責訪談與寫作的研究生。他們為這些資深記者作了口述歷史，才能使已經逐漸褪色的陳年往事呈現在我們眼前。我有幸能為這本書寫序，也以之為榮！願我們的社會與新聞界都能從這本珍貴的生命史中得到啓發與勇氣！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日於淡水河畔瞽未居

（作者為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

〔推薦序〕

孫　震

台灣新聞自由今昔

台灣於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廢除戒嚴令，第二年一月一日開放「報禁」。所謂「報禁」是根據行政院一九五一年六月十日所發布的行政命令，限制新報紙出版和限制報紙張數。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爲紀念解除戒嚴、開放報禁二十年，提出資深記者訪談計畫，以走過戒嚴時期爲核心，記述他(她)們的專業生涯，向徐元智先生紀念基金會申請贊助。我還記得不久前董事會通過台大新聞研究所的申請，轉眼之間，計畫完成，撰成《黑夜中尋找星星——走過戒嚴的資深記者生命史》一書，邀請贊助單位寫序。

徐元智基金會雖然贊助台大新聞所此一訪談計畫，但完全不參與其訪談活動，也不與聞訪談內

容。不過台大新聞研究所是我在台大時所創辦的研究所，張錦華教授是我從政治大學禮聘回台大任教的傑出校友，她繼喻德基教授為新聞所所長，多年後再回任所長，為台大新聞所的發展付出很多心力，有很大的貢獻。我想向張教授及新聞所舊友表示感謝、祝福之意，並藉著這個機會對本書所檢討的新聞自由表達幾點感想。

第一，新聞自由不但是人民受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而且對國家的政治安定有正面、重要的意義。新聞自由最大的功能在於報導事實，反映民意，使與公共利益有關的真相顯現，罪惡無所遁形，問題早獲解決。限制新聞自由，並不能改變事實，反而喪失反省改過的機會，使問題更趨嚴重，為自己製造敵人，終致失去人民的支持。本書對十七位資深政治記者的訪問，充分透露了這樣的訊息。

第二，如今解除戒嚴已經二十年，台灣的新聞媒體真的自由了嗎？公開直接的控制，如過去之經由「警總、調查局、國民黨文工會、軍方政工單位」，的確不存在了。但代之而興的是隱性迂迴的控制方式，例如通過銀行貸款與企業廣告施加壓力，甚至直接以各種方式「收買」媒體；又如所謂「黨政軍退出媒體」也只是換黨做，唯較前更為明目張膽。

我記得前聯合報社長、我的老朋友張作錦兄在他的《試為媒體說短長》一書中，將台灣新聞自由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威權政治之下，新聞自由受到箝制，媒體只有「邊緣性自由」；第二個階段是解嚴後媒體取得形式上的自由，但仍有各種正面和反面的干擾，正面的干擾是獎賞或好處，反面的干擾是懲罰或壞處，而獎賞比懲罰更能殺傷新聞自由；第三個階段是不論媒體寫什麼都不發生作用，一切批評被解釋為不懷好意，因而不予理會。作錦兄的第三個階段，我稱之為恬不知恥、麻木不仁的階段。

今年初，我和于宗先、李瞻合編一本《台灣危機》，作者都是台灣學術界的知名之士，先後送給一家大書局和一家大出版公司，都有所顧慮，婉拒出版。我和宗先兄、李瞻兄諒解他們的處境，但對

台灣在表面上的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下所隱藏的肅殺之氣，感到不寒而慄。

第三，當前的新聞自由一方面受到表面上看不見、實際上存在的政治勢力干擾，另一方面則在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引導下無節制地氾濫。李瞻教授在《台灣危機》第七章〈台灣報業危機〉一文中說：「新聞內容充滿詐欺、綁架、搶劫、凶殺、吸毒、縱火、強暴、亂倫、虐童、誹謗、侵犯隱私、父母牽子女集體自殺等，不忍卒讀與駭人聽聞的社會新聞，甚至有些新聞報導不實，或出於捏造。」為了生存競爭不擇手段，不顧社會後果，將學校時期可能熟知的社會責任、道德規範拋諸腦後。「中華民國群我倫理促進會」從二〇〇一年起，隔年作「社會信任調查」。最近三次調查結果，倒數第一名亦即最不受社會信任的人都是立法委員，倒數第二名都是新聞記者。一向充滿正義感的新聞記者可能感到冤枉，他們是受報老闆之累，而報老闆可能也覺得冤枉，他們要維持報紙生存，不得不順從市場。康德說，當自私進入我們心中，就再也不能辨別善惡是非。

我想台灣很多人對報紙有很高的期待。我們希望報紙，至少一部分有格調、有理想的報紙，不只是一種商品，而是一種教育文化事業，為社會維護價值，提供教育，捍衛正義。我年輕時在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念學位，奧大餐廳牆上寫著奧克拉荷馬州聞人威利·羅傑的名言：「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從報紙學來的。」媒體人能不感到責任重大嗎？

寫於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名譽教授、
徐元智先生紀念基金會董事長）

「走過戒嚴的資深記者生命史」計畫緣起

張錦華

回首來時路　莫忘初衷

二〇〇七年是台灣解嚴二十週年；二〇〇八年是台灣報禁解除二十週年。站在這個當下，卻令人無比感慨。

一方面在國際新聞自由團體的評比中，台灣的新聞自由度表現亮眼。例如，「無疆界記者組織」公布的二〇〇七年全球新聞自由排名，台灣名次從二〇〇六年的第四十三名，躍升至第三十二名，甚至勝過日韓，成爲亞洲排名最高的國家。

但另一方面，自由卻惡質的媒體競爭，卻使新聞品質每況愈下，包括選舉灌票、新聞造假、炒作自殺、緋聞、犯罪、暴力等狀況頻傳，形象日益低落。世界知名的愛德曼公關公司在二〇〇六年公布

一份報告。在亞太地區包含台灣等十個國家的調查中，台灣媒體被信賴的程度卻是敬陪末座，只有一%，比政府、企業、非營利組織的信賴度都低。這份報告得分最高的印度則為五一%。該公司表示，可能是由於台灣媒體競爭過度，偏向「膻色腥」走向，導致台灣媒體形象不受民眾和企業人士信賴。

在戒嚴時期，新聞界的優秀人才想方設法、走出荊棘之路；甚至為了追求百分之百的新聞自由，鄭南榕先生竟以焚身警世。然而，這得來不易的新聞自由，卻在當前遭到輕率的濫用踐踏，甚至發出臭味！這是新聞專業最黑暗的時代，無論是新聞工作者還是教育界都感到無比沉重的壓力。

不過，身處於這個得來不易的自由環境中，當然沒有放棄努力的權利。無論是人權團體、傳播學者，或是媒體界的有心人士，都有人陸續投入了各種推動和提升新聞品質的工作。

新聞應有的品質是什麼呢？國內的新聞傳播學界所討論的多半是美國的新聞報導典範，大家耳熟能詳的是美國新聞界的英雄；而我國的報業報人典範則多半總是停留在抗戰時期的張季鸞和《大公報》。對台灣本土的新聞人物和事蹟，資料不多，所知也有限。

標榜以培養新聞專業者為目標的台大新聞所，顯然責無旁貸地應該辨識台灣記者的「面孔」、瞭解新聞界的「家譜」。這些曾經在無數的日子裡，從早到晚穿梭在事件的現場，然後在無數的夜裡，低頭在字裡行間斟酌如何發揮影響力的記者們，他／她們一路走來的軌跡在哪裡？新聞作為一種志業，它的歷史傳承、角色範式、專業理念和感人風範在哪裡？如果沒有歷史，我們如何立足現在？如何瞻望未來？

因此，報禁解除二十週年的前夕，本所的師生展開了這本厚達二十五萬字的台灣資深記者生命史的大書計畫。

因緣際會促成這個大計畫的主要因素有三項：其一是教育部提供了追求卓越的經費，在台大提升教學的項目下，新聞所藉此設立了「傑出記者駐所計畫講座」，邀請傑出的實務工作記者駐所諮詢及

演講。二〇〇六年的駐所記者是《中國時報》政治組副主任何榮幸先生（目前已升任主任，同時獲聘爲本所的兼任實務教師）。他當時剛獲得三個台灣新聞界最重要的獎項，受到一致肯定，並出版《媒體突圍——二〇〇五台灣新聞獎大滿貫的沉澱反思》（2006）。這一位經歷戒嚴後期氣氛、解嚴初期入行的優秀記者，首先倡議在解嚴和報禁解除二十週年之際，台大新聞所是否能夠深度訪談資深記者，記錄他／她們走過戒嚴以來的心路歷程？

這個饒有深意的構想立刻獲得了新聞所幾位老師的響應。包括專長新聞史的林麗雲老師、長期參與媒體改革並專長法律政策的洪貞玲老師，和致力於傳播批判研究的筆者，均認同這個計畫既可以深掘台灣新聞人物的寶藏，也可以進一步提供解釋台灣新聞研究的資料基礎。這個案子也進一步獲得了全所老師的同意。當然，讓我們相信可以實踐此一計畫的理由，其實是因爲我們有一群優秀的研究生，他／她們多半對投入實務採訪寫作有高度的志趣，也有相當的訓練。這個採訪計畫對他／她們也是一項最好的實務訓練和學習機會。

第三個關鍵力量則是我們獲得了經費的支持。當這個「生命史」採訪規畫完成後，我們幸運地獲得了遠東集團「徐元智先生紀念基金會」對此一計畫的肯定與贊助。在種種條件和機緣的結合之下，終於開啓了這個結合歷史、新聞和生命敘事的大型採訪和出版計畫。

籌畫及選擇受訪者的過程很慎重，我們是從二〇〇六年十月開始召開諮詢會議，邀請學術界和媒體界的專家學者，共同討論寫作宗旨、概念分類和選擇受訪者的原則，確定這次的訪談集中在報業和政治路線記者，較能聚焦在戒嚴時期的新聞歷程。我們除了盡量涵括不同立場和主要媒體的工作者、重要歷史事件的現場見證者（例如美麗島事件和第一次大陸行的採訪記者），也試圖兼顧台北和中、南部的報紙記者，以及當時爲數不多的女性記者。特別值得一記的是，徐元智先生紀念基金會的顧問戎撫天先生，在戒嚴期間曾任《聯合報》政治組召集人、解嚴後轉任《首都早報》第一任總編輯，之

後又在中國時報和東森電視台擔任新聞主管工作多年，是見證走過戒嚴之路的資深記者的重要代表，在我們力邀之下，終於同意成爲受訪者之一。

讓大家都感到很振奮的是，百分之百的受訪者都同意及肯定這個計畫的意義；甚至已有二十九年沒有接受任何專訪的聯合報系的黃年先生，也在慎重考慮後表示同意。除了完全聯絡不上或因事未能參與的人士，最後完成訪談的共有十七位，他／她們都在忙碌的行程中盡量抽空完成二到四次不等的訪談，並協助提供諸多參考資料。不過，我們的分類和選擇都仍有未盡完善和充分之處，遺珠之憾實難避免，也特請各方賢達見諒。

這個大型的生命史採訪計畫，榮幸擬出了訪談大綱，並協助老師們共同完成生命史訪談的多次教育訓練課程。同時，稿件的校修過程也是十分繁複，經由同學打錄逐字稿、找出重點故事寫成初稿，再經由指導老師改正、榮幸整理後完成複審稿，才得以送交受訪者，最後是以第一人稱以及當事人仔細審訂或甚至多所增刪過的完稿面貌呈現。

何榮幸先生提供了精彩的導言和串場引言，顯示本書豐富的生命史故事，可以讓我們對台灣新聞實踐展開更寬廣的研究視野，包括從抗戰到台灣培養的第一代本土優秀記者的成長歷程和專業特質、戒嚴時期記者親身經歷的新聞控制和重大事件（例如美麗島事件和林宅血案等），還有難得一見的記者和主管及老闆之間的精彩互動，交織著與黨國威權管制及媒體經營間的千絲萬縷。最後則是這些資深記者走入當前這個後威權時期，卻面對百無禁忌的自由市場競爭，他／她們多樣的角色面貌和結合著自我及時代的反思與期待。

戒嚴時期的新聞媒體，整體而言是黨國控制結構的一環，常被稱爲「侍從報業」體制。但這是一種化約的結構概念，難以解釋個人的奮鬥和時代變遷的力量。台灣走向民主與自由的過程，並非一條康莊大道，但確實是支流匯集、莫之能禦的長河巨流，許多深具理想與才華的媒體工作者在主流或非

主流及黨外媒體等各種不同位置上，以各種方式實踐、結盟、衝撞或議題操作；審時度勢之際，雖時而沉默、時而妥協，但更伺機奮起、時而躍上浪峰，傲視迎向更寬闊的天際。

這讓我們深刻感受到，推動時代變革實有賴於多層次的抗爭和努力，而每一分個別的努力或許微小，卻都十分珍貴，因爲它彰顯出新聞專業的核心意義與堅持記者價值的高貴和尊嚴。同時，這份努力在今天看來更是具有意義；雖然個人總是受到整體結構的各種限制，但是每一個人仍然可以選擇堅持自我的目標和創造實踐的策略。在侍從報業中如此，在商業競爭中，也應是如此。

在這個新聞亂象充斥、社會對新聞工作信任度低落的時刻，這本資深記者生命史讓我們回首來時路，仍然可以感受到即使歷經時代風霜，一直到現在，他／她們在挫折混沌的局勢中，對報導眞相仍是充滿期盼，對新聞的社會力量仍懷抱憧憬；而無論是年輕的採訪同學還是資深的受訪記者，在探問互動的那一刻，似乎已經交流著一份殷殷相許：莫忘初衷。

最後，本書承兩位知名的傳播學者：鄭瑞城教授和朱立教授，以及原台大校長孫震教授（代表徐元智先生紀念基金會），在百忙中抽空閱讀和撰寫序言，至爲榮幸，特申謝忱。《中華日報》總編輯顏國鉉、攝影記者趙傳安、記者蘇兆安慷慨提供許多珍貴照片，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工作團隊爲本書做出精緻的設計和資料詳實的大事記，均在在爲本書的價值加分，銘感於心，也特誌於此。

寫於二○○七年十二月十日、世界人權日

（作者爲台大新聞所教授）

何榮幸

老靈魂與新生命的奇妙交織

過去一整年，我是在老靈魂與新生命的奇妙交織中度過。

這本書的由來，應該從解嚴前後那幾年談起。當時我還在台大校園搞社團、編刊物，看到顏文門在《自立晚報》勇於報導「機場事件」眞相，司馬文武、王健壯、南方朔、周天瑞創立《新新聞》週刊，李永得、徐璐率先到大陸採訪，楊憲宏去當《人間雜誌》總編輯，在自由主義、理想主義與人道關懷的激盪中，暗暗醞釀「有爲者亦若是」的記者情懷。

一九九一年入行後，我將新聞工作視爲志業，帶著滿腔熱血與理想熱情衝鋒陷陣。這些新聞前輩的身影，仍然令人心嚮往之。但我逐漸發現，每個世代的記者，都有不同的時代命題與挑戰，我們這

一代記者，既不可能、也沒有必要複製上個世代記者的足跡。我們可以學習借鏡或模仿效尤，但最後仍必須走出自己的路。

在這種意念驅動下，我從一九九四年「自立事件」開始投入媒體改革運動，與一群志同道合的同業與戰友相濡以沫，成立台灣第一個自主性新聞團體——台灣新聞記者協會，以此回應我們這個時代的挑戰。由於各種因緣巧合，我也陸續與當初仰之彌高的新聞前輩們產生互動，甚至有幸與其中部分人士成為忘年之交。

報禁開放十週年時，我正擔任記協《目擊者》雙月刊總編輯，一口氣專訪了本書中多位受訪者的老靈魂，以四十頁篇幅回顧報禁時期新聞工作者面貌、體檢報禁十年後媒體發展亂象。在某種程度上而言，一九九八年一月出版的這期目擊者，正是與本書前後十年遙相呼應的前身。

過去十年，我有更多機會近距離觀察這群資深記者的起伏際遇與生命情懷，在此同時，台灣新聞工作者的專業形象與工作尊嚴卻快速沉淪。面臨新聞工作愈來愈深沉的無力感，我希望為本土資深記者留下完整新聞歷程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但始終缺乏足夠的工作團隊奧援，難以啟動這項吃力不討好的龐大工程。

直到二〇〇六年九月我出版《媒體突圍——二〇〇五年新聞獎大滿貫的幕後故事》一書，並於十月獲聘擔任台大新聞研究所「傑出記者駐所講座」，才讓多年心願得以成真：《媒體突圍》中的世代對話，再度激起我勾勒資深記者生命圖像的動力；台大新聞所師生的積極參與，則讓最重要的工作團隊應運而生。

王健壯總編輯在《媒體突圍》的序言中，以「尋找指路的星星」形容戒嚴時期的困頓環境（「星星」是指記者典範），以此對比當前新聞工作者的自由與幸福；我則期待在多元分殊、藍綠撕裂的新時代命題下，新聞工作者能以不同的姿勢努力突圍。由於我們對當前記者處境的看法明顯不同，這項

世代對話再度激起我勾勒資深記者生命圖像的動力，讓我決心以「走過戒嚴的資深記者生命史」作爲台大新聞所講座的主題，最後並成爲本書「黑夜中尋找星星」的書名靈感來源。

台大新聞所張錦華教授的熱情號召、積極促成與高度執行力，林麗雲、洪貞玲兩位媒體改造學社戰友的支持投入，加上參加講座的十七位優秀研究生積極參與，終於形成最重要的工作團隊，讓這項龐大計畫踏出重要的步伐。我們密集討論這批老靈魂的點點滴滴，希望找出支撐他們走到現在的關鍵密碼。

人生眞是奇妙，就在我開始和這批老靈魂深深糾纏之際，一個新生命正準備悄然進入我的世界。二〇〇六年十二月，這項計畫啓動兩個月之後，太座大人宣布了懷孕喜訊，我的生活自此進入另一個嶄新世界。

接下來往返台大新聞所進行講座、深度訪談資深記者的過程中，我的生命同時在老靈魂與新生命之間交錯：一方面對這批老靈魂的過往有愈來愈多的瞭解，一方面對小小新生命的未來有與日俱增的期待。

隨著資深記者訪談的持續累積，老婆的肚子也一天天大了起來。二〇〇七年中旬訪談告一段落時，老婆的預產期已逐漸逼近。到了八月底，我還在爲這批老靈魂的生命史定稿奮鬥時，某一天我走進了產房，欣喜迎接寶貝女兒的來臨。

然而，就如同這批老靈魂的歷程頗多坎坷一樣，新生命的到來也未必平順。老婆自然生產後出現若干後遺症，截至本書出版爲止，已經進過三次急診室、動了一次小手術。這本書的定稿，有部分是在醫院中照料老婆時，等老婆入睡後抱著電腦走到醫院光亮處完成。

因此，這本書的策畫完成，對我個人確實具有深刻意義。在我向這批老靈魂不斷靠近的過程中，我其實是在尋求現實新聞環境充滿無力感的脫困鎖鑰，希望爲包括自己在內的當前新聞工作者找到安

身立命處所。而在小小新生命不斷向我靠近的過程中，我的人生更產生前所未見的根本性變化，從此進入承受甜蜜負擔的另一輩子。這兩者在過去一年奇妙交織，共同譜寫我的記者生涯中極其特殊的交響樂章。

能夠出書了卻多年心願，我要特別感謝這十七位老靈魂的高度配合與前輩風範。儘管部分受訪者在解嚴後出現若干爭議軌跡，但這一點也不影響我藉此書向新聞前輩們（不論是否在此書受訪之列）高度致敬的心意。當前新聞工作者其實是踩在這些老靈魂的腳印中前進，希望這本書能夠稍微彌補過去台灣新聞發展歷程的記憶斷裂。

台大新聞所三位老師、十七位同學的付出與努力，讓我對台灣新聞教育增加很多信心，我很珍惜這段難得的學術、實務界攜手合作的經驗與情誼。張錦華教授整合台大新聞所資源、爭取徐元智先生紀念基金會贊助本計畫，是本書能夠順利出版的關鍵。林麗雲副教授犧牲身體健康以做好訪談的初稿修訂工作，認真負責的態度令人敬佩。本書所有版稅捐贈台大新聞所，希望未來「資深記者生命史」計畫還能延續。

時報文化出版公司總編輯林馨琴的促成，讓此書列入具有傳統的「歷史與現場」書系。人文科學線主編陳俊斌當初編輯的第一本書，正是我所撰寫的《學運世代——眾聲喧嘩的十年》，我們再次合作愉快，是這項計畫的另一項歷史巧合。編輯潘乃慧對於本書的用心，在此一併致謝。本書工程浩大，掛一漏萬與不足之處，尚請讀者包涵指正。

此外，李金銓老師在台大新聞所舉辦解嚴二十週年研討會的發言，對於本書導論亦有若干啟發，我彷彿又重回當年閱讀李老師從傳播社會學角度所寫系列作品時的悸動。

最後，我要特別感謝愛妻淑媛在過去一年的長期支持與包容。我雖已學會新手奶爸的十八般武藝，但很多時間仍有賴淑媛在新聞工作之外全心照顧寶寶，才能讓我沒有後顧之憂，過了四十歲還能

做自己喜歡但非常辛苦的傻事。希望我們的女兒采融健健康康長大後，能跟我們一樣從事自己喜歡的工作，在未來不同情境下老靈魂與新生命的交織中，同樣對生命保持樂觀、熱情與喜悅。

Part 1

〔導論〕——何榮幸

他們看見了歷史

黑夜中尋找星星

在時間的快速流動中，總是有一群奇特的人，比別人更容易看見歷史的容顏。

因爲，任何特殊事件發生的時候，他們總是站在最近的距離——這是這項工作所有榮辱的來源：用他們手中的筆，寫下後人口中的歷史，詮釋新聞的價值與意義。

二十年前，這群人親身見證，台灣這艘希望之船離開戒嚴、報禁港灣，從此航向廣闊無邊、深不可測的民主海洋。他們雖然參與其中、記錄過程，卻也只能載浮載沉，不知道大海的另一邊究竟還有多少風浪。

這群人散佈在最保守到最激進的媒體。他們在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高壓氣氛中匍匐前進，姿態多半扭曲變形，很難保持優雅好看。有的人在主流媒體內兢兢業業，有的人想盡辦法在文章中「埋地

雷」鼓吹民主，有的人努力從中南部發聲，有的人深入觀察民間社會，有的人則與情治單位大玩「捉迷藏」遊戲；後人想像他們堅定勇敢，他們身處其中卻可能狼狽不堪。

他們像是在無盡的黑夜中尋找星星，對外迎向忽明忽暗的民主亮光，對內追尋若有似無的記者典範。

二十年後，這群人當中的十七位，成爲本書深入訪談的主角。他們當年寫下的所有報導與觀察，早已存放在各大圖書館提供公開查閱；他們在新聞界甚或其他領域都扮演重要角色，成爲菜鳥記者仰之彌高的學習對象；他們新聞生涯的成功與失敗，也已到了可以接受公評檢驗的時刻。

但是，他們走過那段歲月的深刻感受、心情故事與生命情懷，現在才正要開始緩緩傾訴而已。

很少人像他們一樣幸運，可以站在每個歷史的浪頭上，第一手體驗時代變遷與社會趨勢，在某種程度上發揮使命感與影響力；但凡事總是一體兩面，很少人像他們一樣倒霉，必須在第一時間承受時代的苦悶與侷限，每天醒來後被迫一切歸零，在別人閱讀舊聞的時候繼續摸索前行。

這本書的出版目的，是希望透過這十七位資深新聞工作者的心路歷程，勾勒二十年前那個時代的模樣與氣息，讓讀者能夠理解媒體、記者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扮演的角色。而這群人曾經各自展現的某些信念、堅持與爭議，如果能對今日台灣新聞界的徬徨與迷失有所啓發，那將是本書最大的喜悅與欣慰。

黨外雜誌的日子

本書時間範圍涵括一九四〇年代迄今，觸及國民政府遷台前後的大陸與台灣媒體氛圍，但主要集中於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府宣布戒嚴、一九五一年宣布報禁後的媒體發展；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至一九八七年宣布解嚴這段從威權走向民主的關鍵時刻，尤爲本書多數篇幅置身的歷史背景。

一九七〇年代初期，台灣戰後出生的第一代記者，陸續展開他們的新聞生涯。由於反對運動逐漸興起、被壓抑已久的社會力蓄勢待發，他們在戒嚴環境中開始感受到時代的變動與撞擊，為他們的生命歷程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記。

故事，可以從司馬文武在黨外雜誌與警總玩「捉迷藏」說起。

那是一九七九年六月，「美麗島事件」發生前半年。黨外大老康寧祥創辦《八十年代》，找來曾經在《中國時報》擔任政治、外交記者的司馬文武當總編輯，希望突破言論封鎖、批判威權體制；同一時間，黃信介領軍的《美麗島雜誌》正在進行全國串連，施明德、許信良、張俊宏、姚嘉文等人磨刀霍霍，準備以組黨行動打倒國民黨政權。

讀者可以從本書中司馬文武的生命歷程得知，當時他對主流媒體完全失望，因此成為第一個有記者經驗的黨外雜誌工作者。他努力把新聞專業、人文思維帶進黨外雜誌，希望藉此提升黨外雜誌的品質與水準。

在那段充滿肅殺氣息的日子，總警每回都拿著蓋好「影響民心士氣」、「違背發行旨趣」的公文來查禁黨外雜誌。司馬文武等人無法理解的是，為什麼雜誌還沒印出來，情治人員就已經「未卜先知」斷定內容會影響民心士氣、違背發行旨趣？

久而久之，司馬文武等人逐漸與情治人員形成「共生關係」，在「捉迷藏」中發展出一套遊戲規則。他們會先印出兩千本黨外雜誌用來「被查禁」，等到印刷廠拿到檢舉獎金、警總也完成查禁任務後，他們才開始印出真正要發行的份數。到最後「皆大歡喜」，情治人員、印刷廠都可以交差，發行達一、兩萬本的黨外雜誌則營運蒸蒸日上。

沒有人想得到，多年之後，康寧祥、司馬文武的第三度搭擋（第二度是曇花一現的《首都早報》），場景竟然已經換成總統府內的國安會。老康出任國安會祕書長，也就是俗稱的「情報頭子」，

江春男（司馬文武的本名）是副祕書長，算是位高權重的「二把手」。當年被他們恨之入骨的情治人員，後來通通歸他們指揮管轄。

當年曾經與司馬文武一起在八十年代與情治人員纏鬥者，或是積極投稿給黨外雜誌者，還包括接受本書訪問的徐璐、李旺台、陳銘城、南方朔、楊渡等人。

徐璐在美麗島事件後創辦另一本黨外雜誌《大地生活》，內容是以社會觀察、人道關懷爲主，楊渡還沒當記者前的報導文學作品「礦工的女兒」，就是放棄交給《時報周刊》而改投大地生活。楊渡還曾用歸國學人陳文成弟弟的名字，在黨外雜誌《深耕》上追憶離奇死亡的陳文成；或許是感性的文學手法奏效，這篇文章竟然逃過一劫而沒有被警總查禁。

大地生活停刊後，徐璐加入八十年代陣營。多年之後，徐璐因爲自立報系大陸行採訪名噪一時，並創辦「台北之音」電台、擔任華視總經理，她的《暗夜倖存者》一書更展現女性莫大勇氣。讀者可以從本書中瞭解，徐璐在政黨輪替時爲民進黨總統候選人陳水扁站台輔選的心情，以及在華視推動改革「難以與大象共舞」的挫敗經驗。

楊渡後來成爲《美洲中國時報》編輯而踏入新聞界，並以一系列社會運動、環保運動報導受到矚目，他在本書中詳述當年「報導」兼「參加」鹿港反杜邦運動的完整心情。在中時報系工作多年後，楊渡在二〇〇七年離開媒體一度擔任國民黨文傳會主任，並成爲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馬英九輔選大將。

美麗島事件目擊

本書受訪者中，李旺台是唯一親身經歷、見證美麗島事件者。在那個驚心動魄、改變歷史的夜晚，他從原本不需要採訪發稿的遊行參與者，轉爲心情激動的歷史記錄者，也讓南台灣的《台灣時報》發出了與台北媒體不同的聲音。

李旺台當時並不知道，他對於美麗島事件「先鎮後暴」的現場目擊報導，日後會成為知名作家陳若曦搶救美麗島事件中受軍法審判者的重要依據。陳若曦向蔣經國總統提出的呼籲，則是透過《紐約時報》駐台記者殷允芃的報導向全世界傳遞。

殷允芃第一次登上紐約時報的獨家報導，是副總統謝東閔被郵包炸彈炸斷手。這項震驚島國的重大新聞，登出來卻只有短短兩、三段。但她鍥而不捨希望為台灣發聲。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她在《自立晚報》總編輯吳豐山安排下與陳若曦見面。這一回，全世界都聽見了陳若曦等海外人士對於美麗島受軍法審判者的同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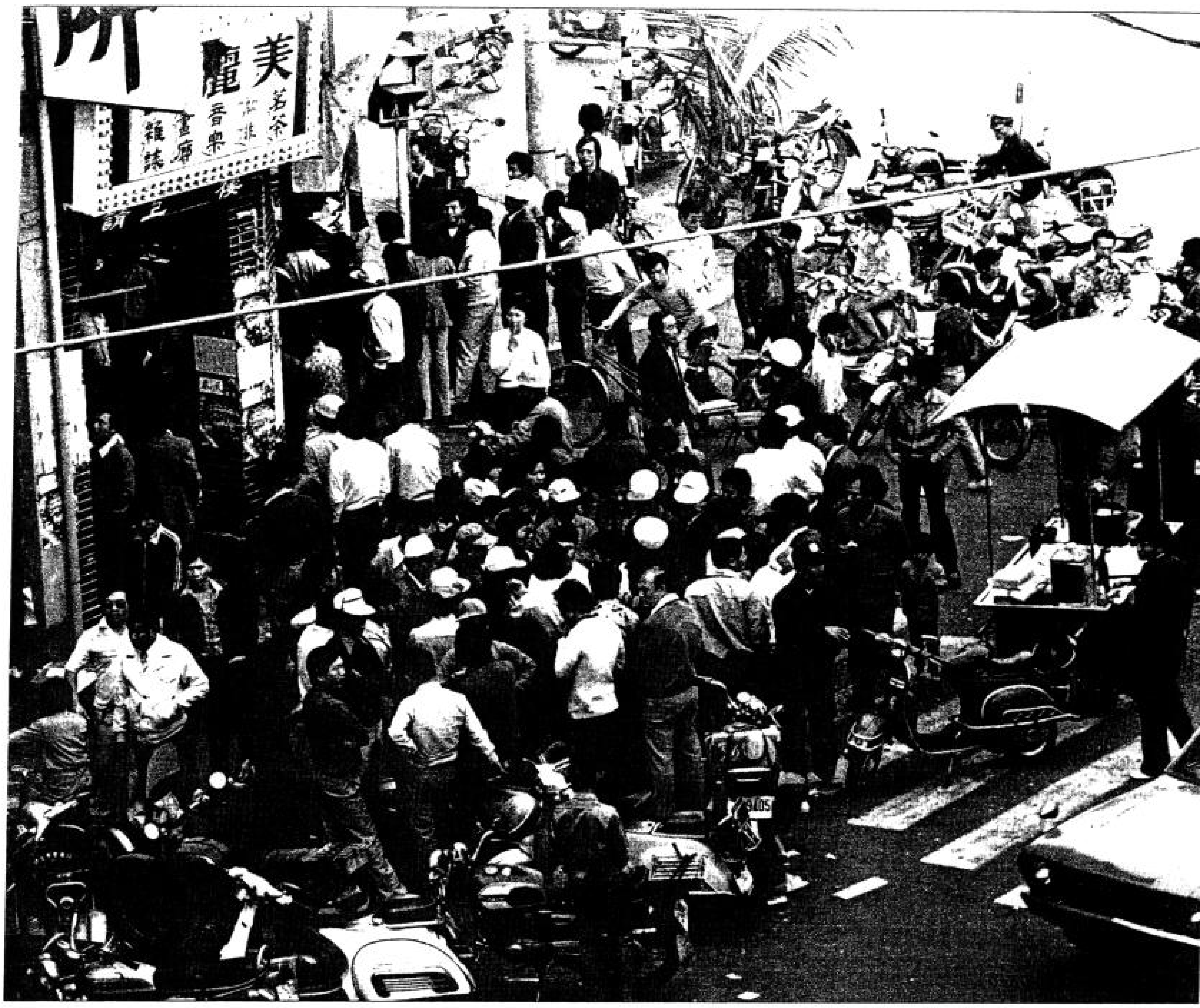
讀者在本書中可以發現，殷允芃在美麗島軍法大審現場採訪時，因為同情呂秀蓮處境而不停落淚，因而招致「同情被告」的批評聲音。殷允芃愈來愈清楚，台灣在國際媒體上的地位有限，她再怎麼寫也沒有用，因此「還不如跳下來為台灣加分」，她在美麗島軍法大審的隔年創辦了《天下雜誌》。

率先報導「先鎮後暴」的李旺台，後來接連擔任八十年代及「南台灣兩大報」台灣時報、《民眾日報》總編輯，因為處理宋楚瑜參選省長新聞與報老闆意見不合，才離開南台灣北上發展，並曾擔任民進黨副祕書長而短暫從政。

李旺台當初會進入新聞界，是因為台灣時報總編輯俞國基的鼓勵。俞國基在北、中、南部及海外歷任媒體要職（包括中部《台灣日報》總編輯、北部中國時報總主筆、海外《遠東時報》總編輯、美洲中時總主筆等），多年來提攜了許多年輕人才。

從美麗島事件到海外「江南案」，俞國基幾乎無役不與，他的身上就是一部中南部媒體發展史的縮影，以及戒嚴時期海外華人媒體的重要見證。俞國基對於台灣報老闆們的第一手、全面性觀察，是本書中相當獨特的一個篇章。他目前擔任《自由時報》副社長享有的「言論免責權」，則讓新聞工作者羨慕不已。

1987年12月10日晚間，高雄美麗島事件現場，鎮暴軍警與民眾爆發衝突。（中華日報檔案照片／趙傳安翻攝）



美麗島事件發生次日，民眾在美麗島雜誌社前圍觀。（中華日報檔案照片／趙傳安翻攝）

至於被李旺台拉進八十年代工作的陳銘城，原本也是台灣時報記者。早在美麗島事件之前，陳銘城就曾親身感受一九七七年的「中壢事件」氛圍。那時他還未當上記者，就已感受到戒嚴體制的壓迫。

解嚴後，陳銘城在《自立早報》展開一系列以二二八受難者、海外「黑名單」人士爲主軸的人權報導。這些突破政治禁忌的報導並非從天而降，而是走過戒嚴、報禁年代之後的破土而出。政黨輪替後陳銘城進入政府部門，目前仍在文建會策畫相關文史展覽。

兩大報時代

司馬文武創辦八十年代的那一年，中國時報、聯合報競爭「百萬份第一大報」的戰爭才剛剛開打。當時黨營媒體逐漸沒落，「兩大報時代」正式來臨。

美麗島事件隔年，二十八歲的王健壯成爲中國時報有史以來最年輕的採訪主任。讀者將會瞭解，這位原本主編「人間副刊」而承受「鄉土文學論戰」莫大壓力的文藝青年，是在中時老闆余紀忠的呵護下轉戰採訪記者，並且一路受到重用。

當初把司馬文武、王健壯拉進中國時報的周天瑞，則是兩度出任中時採訪主任，受到余紀忠賞識自不在話下。周天瑞後來擔任美洲中國時報總編輯，在美洲中時停刊事件中，見證海外華文媒體的宿命，同樣無所逃於戒嚴體制下的新聞箝制壓力。

兩進兩出中國時報的南方朔，則在資料室主任位置上善用中時資源、飽讀國外期刊，讓他的評論生涯功力大增。但他同時也爲黨外雜誌大量寫稿，到最後乾脆實際投入黨外運動，在街頭過了一年衝鋒陷陣的日子。

中時內部文化與余紀忠個人風格，在余紀忠與其培養人才的互動中畢露無遺。而司馬文武、王健

壯、周天瑞、南方朔這四人的最大共同點，則是以「中時退除役官兵」身份，在一九八七年解嚴前夕共同創辦《新新聞》雜誌。在黨外雜誌完成階段性功能後，掀起另一波政論雜誌風潮。

王健壯不會料到，日後新新聞會爆發「嘿嘿嘿」風波，而與呂秀蓮副總統對簿公堂，他自己則在多年後回鍋接掌中時總編輯；周天瑞大概也沒想到，他到中央電台董事長繞了一圈，最後還是回到新新聞協助渡過難關；當年黨外雜誌重要寫手南方朔，則已被國民黨推薦爲下屆監察委員人選。

讀者亦可由黃年、戎撫天、楊憲宏等聯合報系出身的媒體人歷程中，進一步瞭解聯合報內部文化與老闆王惕吾個人風格。

美麗島事件至今，黃年歷任聯合報專欄組主任、採訪主任、《聯合晚報》總編輯、聯合報總編輯、民生報社長、聯合晚報社長，現任聯合晚報發行人兼聯合報總主筆。他和聯合報系密不可分的關係可見一斑，讀者可以一窺黃年長期主導聯合報言論走向的完整理念。

戎撫天擔任聯合報政治記者時，曾以「曲筆」寫作方式著稱。「曲筆」意指記者在戒嚴年代無法暢所欲言，只好在報導與特稿中間接、婉轉鼓吹民主觀點。戎撫天在報禁解除後，應康寧祥之邀擔任首都早報總編輯，則被認爲是極大的跳躍，讀者還可瞭解戎撫天在政黨輪替後轉戰電視台的自認失敗經驗。

至於在美麗島事件前兩個月擔任《民生報》醫藥版編輯的楊憲宏，其於聯合報系進行的一系列公害環保報導，以及《走過傷心地》等著作、擔任《人間雜誌》總編輯，在解嚴前後曾經引發重大迴響。解嚴後楊憲宏轉戰過無數電子媒體，目前則以「媒體名嘴」形象活躍於談話性節目。

黨營媒體與自立晚報

相較於中國時報被認爲傾向自由派，聯合報被認爲傾向保守派，走過戒嚴與報禁時期的重要見證

者，還包括曾經盛極一時的黨營媒體，以及長期自成一格的自立晚報。

一九四六年就已擔任青島《民言報》（國民黨黨報）總編輯的薛心鎔，那時才二十二歲，跟隨政府來台後，一九五〇年創辦《大華晚報》並兼任總編輯，一九七一年則接任《中央日報》總編輯，直到一九九四年才停筆。美麗島事件發生前的台灣媒體發展，薛心鎔是全程參與的重要觀察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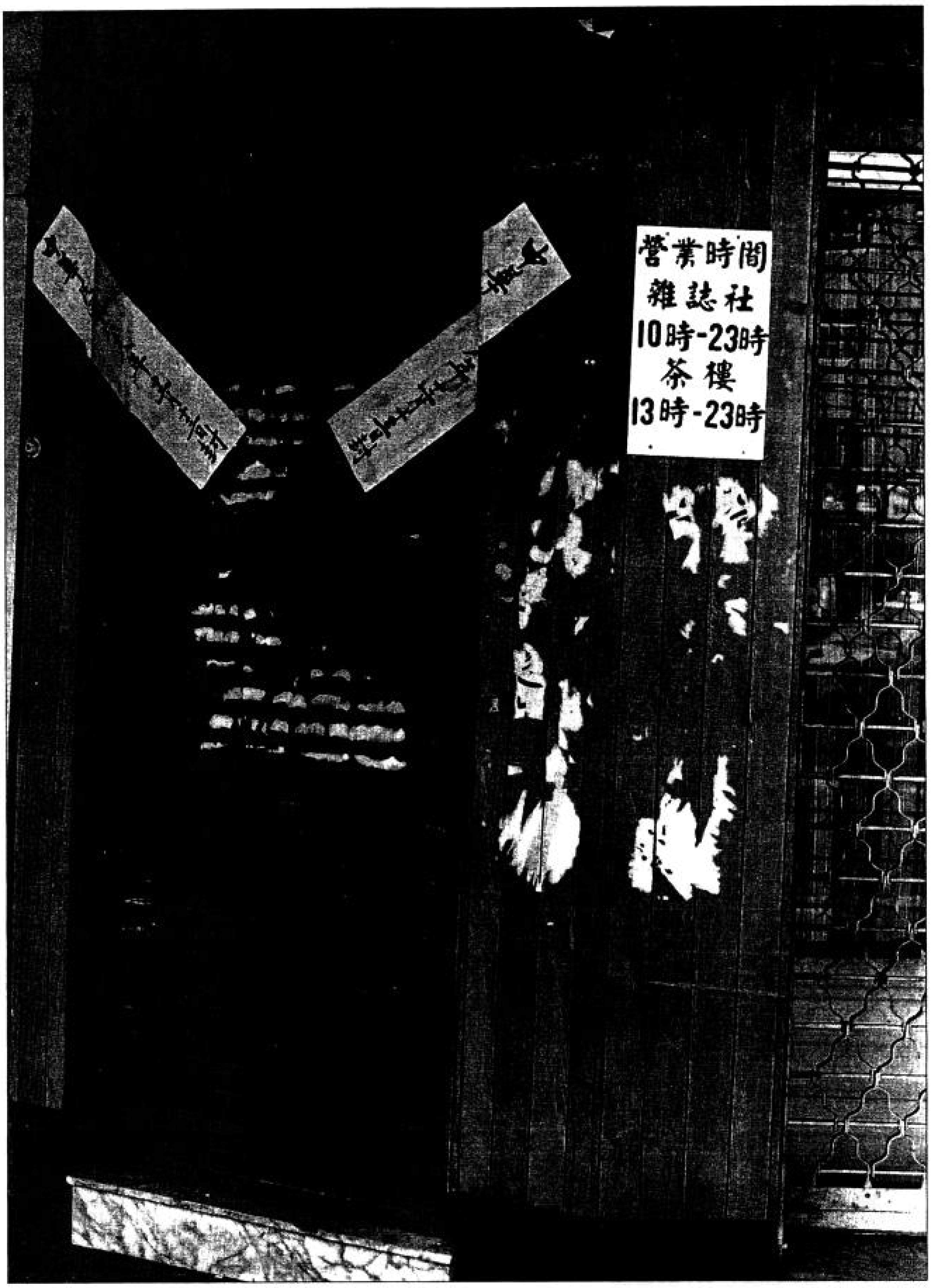
在本書訪談中，讀者可以看見薛心鎔在北伐、抗戰等大時代動盪下養成的愛國信念，以及他眼中黨營媒體的起落興衰。薛心鎔認為台灣經驗不能與大陸時期切割，他對於如何評價戒嚴體制、台灣民主化的看法，顯然與本書其他受訪者相當不同。他在黨營媒體中爭取依專業義理、記者良心進行新聞處理，同樣是以堅持新聞專業接受社會公評檢驗。

台灣第一位黨營／公營媒體女性高層黃肇珩，則詳述其於戒嚴年代採訪蔣中正總統、宋美齡夫人的特殊經驗，以及歷任「中央社」國內新聞部主任、《中華日報》社長、正中書局總經理，乃至於當選監察委員的過程。黃肇珩強調「社會安定」、「社會秩序」的重要性，提醒讀者重視這些在戒嚴時期同樣不容忽視的價值。

不僅如此，黃肇珩更深入剖析女性新聞工作者的處境與難題。從女性角色出發，對於媒體內、外環境進行不同於男性的觀察與檢視，讀者更可瞭解女性新聞工作者的內心掙扎與如何突圍而出。

至於長期標榜無黨無派、獨立辦報的自立晚報，吳豐山無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長期經營「吳豐山專欄」，從採訪主任、總編輯當到社長，領導自立報系在解嚴前後發出不同聲音，並在解嚴那一年促成轟動兩岸的李永得、徐璐大陸行採訪。

吳豐山一直想從政，卻被自晚創辦人吳三連一再拉住，只好以選上較輕鬆的國大代表作為折衷；政黨輪替前他轉戰公視董事長，最後終於入閣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讀者可以在吳豐山的訪談中，看到媒體與政治間的拉鋸與掙扎。



12月13日，美麗島雜誌社被查封。（中華日報檔案照片／趙傳安翻攝）

美麗島事件時還未進入新聞界的李永得，後來一路從自晚政經研究室主任當到總編輯，他跟徐璐當年大陸行的祕辛始末，有助於讀者瞭解一九八七年解嚴前後的社會變化與媒體生態。

「自立事件」爆發後，李永得轉戰電子媒體，並跟隨吳豐山成爲公視總經理，但他比吳豐山更早入閣；出身高雄美濃的李永得，至今仍是行政院客家事務委員會主委，與李旺台同爲接受本書採訪的兩位戒嚴時期客籍新聞工作者。

上述十七位資深新聞工作者走過戒嚴與報禁年代的軌跡，就是台大新聞研究所工作團隊邀請傳播學者、資深記者舉行諮詢會議後，決定將其列入採訪名單的理由。

戒嚴、報禁到底長什麼樣子？

經過了二十年，本書受訪者在談到戒嚴、報禁時期的氛圍時，不少人仍然記憶猶新，部分人士甚至心有餘悸。透過他們的經歷，讀者可以瞭解，戒嚴時期的新聞走向與國家機器控制過程，並且感受當時新聞工作者承受的巨大壓力。台灣從戒嚴走向民主的一部分面貌，在這些受訪者的故事中栩栩如生。

本書受訪者中唯一有過坐牢經驗的大華晚報創辦人兼總編輯薛心鎔，在一九五二年「蔡斯事件」中，因爲大華晚報記者披露美軍援華顧問團物品失竊、並且表揚刑警破案迅速，就被保安司令部問話拘留，並且一肩扛下責任，拘禁十天才因不起訴獲釋。

不過，薛心鎔歷經大陸撤退來台的愛國心，讓他對戒嚴時期的感受是：「政府爲局勢所迫，戒嚴是不得已的事情；如果在執行上謹慎檢點，不要小題大作、輕率從事、過於敏感、株連無辜，當可避免造成民怨。」後來擔任中央日報總編輯的他，對自己這段牢獄之災的總評則是：「有人說新聞記者坐牢，是光榮的歷史。我倒不覺得有何光彩，只覺得是無聊而已。」

同樣身處黨營媒體，一九六〇年代，黃肇珩在中央社如此採訪蔣中正總統、宋美齡夫人的新聞：「寫稿時，才知道中央社寫總統新聞稿，每寫一行就要空一行，留作核稿人增補之用，所有的總統新聞稿和照片，都要送到總統官邸審定……。我想寫自己所見、所感，試著打破公式化寫作，我把當時深刻感受的現場感帶入新聞……。稿子送回來，我發現在空行間，加了好多總統說的話。我很疑惑地問：『主任，總統沒有說這些話啊，實際參加茶會的人也沒這麼多。』我的主任半帶諷刺回答：『妳看，現在看起來不是比較有深度了嗎？有內容了嗎？也顯得總統很有學問！』從那次以後，我發現中央社報導總統新聞，受制於官邸，尤其是總統致詞內容，往往有增刪。」

黨營媒體之外，民營媒體新聞工作者，則普遍感受到強烈的肅殺與恐怖氣氛。

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俞國基在南台灣擔任台灣時報總編輯時，感受到四隻管制新聞的黑手：一是影響力無所不在的警總，其次是調查局，三是國民黨文工會，四是軍方的政工單位。「前兩者是威嚇性的，後兩者是懷柔性的，四管齊下，不怕你能逃出這個天羅地網。」

除了動不動就被指示「不准報導」某項新聞（不需要任何理由）之外，台灣時報多次被警總認爲「有匪諜」，追究報紙爲何出現中共十一國慶（其實是打字工人公報私仇嫁禍給另一個工人）及共匪名字（其實根本沒有人知道那個名字是共匪）。俞國基舉了一個小故事，強調當時新聞工作瀰漫著恐怖氛圍：「我記得有天晚上，幾個同事到我家打麻將，因爲聽到搓牌的聲音，好幾個警察敲門盤問。其實沒有發生什麼事，但一位同事當場竟嚇得暈倒。這是當時普遍的心理壓力，害怕警總來抓人，那樣恐懼的感覺很強烈，強烈到讓人休克。」

一九七七年「鄉土文學論戰」時，擔任中時人間副刊主編的王健壯被扣上紅帽子，他和前任主編高信疆到重慶南路買了國民黨系統出版的中國大陸文學與本土文學相關書籍，想要跟情治單位辯論，結果在會議中根本沒有機會發言。王健壯記得：「總政戰部負責人講了一句話：『對中國時報不是不

辦、只是時候未到。』完全像當年納粹的作風，很恐怖！」

離開中國時報後投入黨外雜誌的司馬文武強調，在戒嚴環境下，「幾乎所有媒體裡，都有很多幫安全單位工作的人。記者如果在立法院跟一些黨外的政治人物講話、見面，得到什麼消息，回去只要寫報告給安全單位，都會有獎金。報社裡的人，若跟黨外人士走得稍微近一點，就會被貼上標籤。」

在這種高壓氣氛下，一九七九年目睹美麗島事件爆發的台灣時報採訪主任李旺台，竟然在事後質疑自己的親眼見聞：「那兩、三個月期間，我感覺好像要被輿論的大潮流所淹沒，一度迷失甚至懷疑自己。我只是寫下當晚目擊的景況，但被兩報三台的扭曲言論與畫面衝擊後，我時常在深夜時分反問自己：『他們真的是暴民嗎？』、『我之前有沒有支持錯人呢？』這種身在新聞界卻被另一股強大的輿論力量不斷撞擊的經驗，是現在許多人難以體會的。」

同樣是處理美麗島事件新聞，自立晚報總編輯吳豐山某個標題沒有用「暴徒」兩字，反而用比較正面、肯定的字句。「民眾就打電話罵我們，說要燒報館。採訪主任去接電話，他一急，就在電話裡跟對方吵架，吵完了跟我說：『對方太沒有道理了，說要燒報館！』當時報社內外情緒會相互影響。」這是吳豐山感受到的氣氛。

直到一九八七年解嚴，在當年接任自立晚報總編輯的李永得，依舊感受到肅殺氣氛。當時他寫了一篇名為「軍人氣概？」的社論，批評參謀總長郝柏村任期過長破壞制度、郝柏村不當發言是軍事統治的前兆。「之後自晚連續兩個禮拜，每天都接到兩個麻袋的明信片，如雪片般飛來。全是國防部發動國軍官兵寄的。每張明信片內容都差不多，說我們是『匪報』、說我們污衊國軍官兵，六十萬大軍絕對不能接受。一麻袋一麻袋地寄過來。」

在這種風聲鶴唳的情勢下，戒嚴時期擔任聯合報政治組召集人、曾經遭遇調查局人員直闖報社比對筆跡以追查「洩密者」風波的戎撫天，是以這樣的心情尋求安身立命：「當時我體會也遵循的原

則，就是『存在才有力量』的原則。記者一定要站在舞台上，才能夠產生作用。這個原則可能不是解嚴後才投身媒體的人能夠體會的。」

資深新聞工作者走過戒嚴與報禁的諸多故事，像是被打散了的拼圖，多年後一塊一塊還原拼圖的複雜樣貌。但我們必須提醒讀者，台灣的戒嚴並非在孤立中進行。本書受訪者當年所處的國際局勢，是從美、蘇兩大強權形成的冷戰結構，逐漸進入一九七〇年代的美、中（共）和解架構。台灣雖歸屬於美國領導的自由世界集團，經濟起飛的腳步卻遠快於自由民主的發展，且深受美國控制與影響。戒嚴與報禁必須放在上述國際情勢變化的架構中理解，讀者才能全盤掌握其時代意義。

由於戒嚴時期國際情勢並非本書訪談焦點，讀者可根據本書受訪者言談，佐以當時國內外情勢變化，分析媒體與各種社會介面的結構性互動，以進一步理解戒嚴時期媒體發展過程及新聞工作者的立體處境。

有興趣的研究者更可持續訪談當年警總、調查局、國民黨文工會、軍方政工單位等各系統人士，瞭解其控制媒體新聞、查禁書報刊物的實際運作，及其與媒體負責人、新聞記者的互動過程，以還原戒嚴時期的更多拼圖，從中瞭解戒嚴時期對於台灣社會及媒體發展的深遠影響。

還原記者真實處境

必須特別說明的是，這項爲了紀念解除戒嚴、開放報禁二十年而進行的「資深記者生命史」訪談計畫，是以廣義政治記者爲主體，並且限於平面媒體記者。本書多位受訪者在一九七〇年前後進入新聞界，在一九八七年解嚴前已歷任媒體要職。本書關切的範圍，是以這些受訪者的解嚴前記者歷程爲主體，解嚴後記者歷程雖亦敘及、但並非探討重點。受訪者之一的戎撫天，雖是贊助本書出版的徐元智先生紀念基金會顧問，但因其獲得台大新聞研究所召集的諮詢會議推薦通過，因此仍在本書採訪名

單之列。

我們深知，這份採訪名單顯然還有很多遺珠之憾，有些是因爲始終聯繫不上，有些則是因爲力有未逮而忍痛割捨，對於未能訪談其他同樣值得留下身影的廣義政治記者，我們深感遺憾。這本書只是努力的開始，我們希望在未來延續此項深度訪談計畫，繼續爲各領域資深新聞工作者的身影留下歷史紀錄，從不同角度重建台灣媒體發展中「人」的角色。

我們對長期堅守崗位的資深新聞工作者心存敬意，但我們並未認定，這十七位受訪者就能代表台灣新聞界走過戒嚴年代的全貌，我們更無意塑造「媒體英雄」或「記者典範」。

我們相信，這十七位受訪者在不同媒體、地域、新聞專業領域所見證的戒嚴時期面貌，以及他們之中部分人士對抗威權體制、爭取言論自由的貢獻與努力，有助於讀者從不同角度理解台灣從威權邁向民主的過程，並足以作爲相關研究的重要起點。

然而，我們也必須指出，任何人物訪談都可能出現「自我美化」或「選擇性記憶」現象，受訪者可能在自覺或不自覺的情況下，合理化過往動作言行。有興趣的讀者與研究者，可以對照本書受訪者當年的報導與作品，進一步檢驗其記憶眞實性與言行是否一致；或接續訪談本書受訪者的周遭關係人看法，藉此比對與受訪者的經驗是否吻合。

此外，在每位受訪者二至四次不等的錄影與錄音深度訪談中，我們盡可能提出各項問題，但受限於出書篇幅字數，無法完整呈現所有面向。在取得所有受訪者同意後，我們計畫將多元、豐富的所有原始訪問內容存放台大總圖書館，作爲台灣新聞史與傳播教育公共財。建議有興趣的讀者與研究者，未來可走進台大總圖書館參閱原始訪問內容，在完整訪談資料上深化相關探討與後續研究。

而爲了尊重受訪者，我們以接近口述歷史的精神，請每位受訪者確認訪問內容無誤，並尊重其增補修改權利，部分受訪者則對最後定稿內容作出較大調整，在此一併說明。

我們認爲，媒體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有些時候被過度高估，更多時候則被嚴重輕忽。至於媒體中的「人」如何走過戒嚴時期的高壓氣氛，如何在解嚴前後試圖發揮影響力，如何在解嚴後尋找安身立命之處，則更是乏人問津，成爲台灣新聞經驗中的一大缺口。

我們不希望解除戒嚴、開放報禁二十年之後，台灣新聞界還是言必稱美國《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的新聞經驗，或是永遠只能追憶《大公報》時期標榜「不黨、不私、不賣、不盲」新聞核心價値的張季鸞。

因此，我們希望塡補台灣民主化歷程與新聞發展史的這段空白，還原新聞工作者在戒嚴、報禁時期的眞實處境，讓當前傳播界與新聞工作者能夠承先啓後，不致於在嚴重失憶與歷史斷裂中前行。

〔導論〕——何榮幸

Part 2

歷史看見了他們

在所有訪談結束後，我們發現，本書十七位受訪者不僅看見了歷史，歷史也看見了他們。

從戒嚴走向民主，歷史看見了這群資深新聞工作者的生命情懷，以及他們背後的媒體結構與社會互動。在初步整理後，我們試圖先從「媒體老闆與資深記者的互動」、「資深記者的使命感與影響力」、「解嚴後資深記者的生涯轉變」等三個面向出發，勾勒歷史情境中的資深新聞工作者面貌，提供讀者多元看待戒嚴時期媒體發展的線索與思考脈絡，並期待更多人士加入後續研究。

戒嚴時期的報老闆們

在本書受訪者眼中，戒嚴時期的報老闆們，一方面是黨國體制打壓言論自由的幫凶，另一方面卻在某種程度上扮演民主化的推手；報老闆的處境有時候比記者還凶險，其角色雖極具爭議，功過卻難

以遂下定論。至於戒嚴時期報老闆們的愛才行徑，及其與子弟兵之間亦師亦父的互動糾葛，如今則早已成為絕響。

戒嚴時期的台灣報紙生態，常被學者批判為「侍從報業」結構，意指報業只是黨國威權體制的文化控制工具，報老闆則是維護政權利益與安定的執行者。例如兩大報老闆余紀忠、王惕吾，長期雙雙擔任國民黨中常委，或多或少必須服膺國民黨以黨領政的意志與操控，戒嚴時期媒體與政治的關係因而常遭嚴厲抨擊。

余紀忠、王惕吾一手打造兩大報家族企業，無疑是戒嚴時期最成功、也最受爭議的媒體巨人。在兩大報新聞工作者眼中，他們的角色遠比外界想像的更加複雜與深刻。

當初因為被打「小報告」而被迫離開中時的司馬文武，對於余紀忠的處境有第一手的觀察：「有一次，余老闆在國民黨中常會，聽到中美關係生變的消息，回來就叫我去追新聞。後來安全單位找上我，問我怎麼知道這個消息，還說這是洩漏國家機密，要我把余老闆供出來。我當然抵死不說，但也因為如此，才知道余老闆面對的是多麼困難的情勢。報社老闆即使是中常委，情治人員也是照查：⋯⋯。」

余紀忠後來在國民黨保守派壓力下，面臨無法匯出五百萬美金給美洲中國時報困境。當時他為了拿掉《時報雜誌》一項敏感的座談會紀錄，氣得拍桌子對負責時報雜誌編務的愛將王健壯說：「你的好朋友連米都沒辦法下鍋，你還在這裡講個人理想，講你的堅持、你的期待，你有沒有替這些好朋友想一想？」王健壯因此辭職，但余紀忠最後仍被迫宣布美洲中時停刊。

即使如此，余紀忠對於在中時「惹過麻煩」的子弟兵仍照顧有加。以王健壯為例，他去美國進修的所有費用都是余紀忠出的，時報還照付他薪水，連編輯部門的夜點費也照發。而俞國基因觸犯言論禁忌被余紀忠拔掉美洲中時總主筆後，余紀忠亦持續「按月給予補貼」長達一年。

類似故事與案例，在王惕吾身上亦處處可見。黃年在受訪時另外告訴我們：「當年我從中國時報回任聯合報的時候，王惕吾有天派了一部三陽喜美的車子給我，還配了駕駛，我可能是全台灣唯一一個三陽喜美有駕駛的人。我跟王惕吾說：『不行啊，採訪主任都沒車子。』王惕吾則告訴我說，過幾年我就會升主任了。我是第一個專欄組主任有配車的人，那時候連採訪主任也只能搭公務車、採訪車。」

黃年認為，王惕吾和余紀忠在那個年代，都有他們的侷限，但也有他們的本事，其實並不容易。「那是一個很關鍵的年代，大家都在揣摩蔣經國的底線在哪裡。余紀忠絕對比王惕吾聰明，余先生跟知識份子在一起談話，很自然，語言也相同；王先生則是非常努力地參與知識份子的對話，幾乎到了攏絡的地步，很能夠禮賢下士。他們兩人可能在方法、風情上不相同，但努力的方向都是一樣的。」他更強調：「王惕吾先生在新聞界也是蠻有爭議性的人物，但他後來說：『總統有任期，報紙沒有任期。』我覺得能夠留下這句話，他的一生就值得了。」

余紀忠、王惕吾在兩大報扮演的「家父長」式角色，是戒嚴時期媒體發展的重要篇章。但在本書受訪者眼中，那個媒體巨人的時代早已一去不復返。

被自立報系員工尊稱為「三老」的精神領袖吳三連，則是戒嚴時期另一位影響深遠的報業領導人。因為吳三連一句話，吳豐山因此放棄參選省議員；因為吳三連一項指示，吳豐山跑了一千三百公里，寫出在自立晚報二版連續刊登一個月的「今天的台灣農村」系列報導；吳豐山多次被「挖角」時，更都因為與吳三連之間「如師如父」的深厚感情而未跳槽。

吳豐山對吳三連的整體觀察則是：「一般人都認為，吳三連先生對台灣人民抗日和政治民主發展都有貢獻。我認為，更重要的是，吳三連先生是『大器』的台灣人。他的胸懷、度量都十分寬闊。一般海島國家，不太容易產生大器的人，他卻例外。」

同樣得到本書受訪者高度肯定的，還有台灣時報老闆、眼科醫生出身的吳基福。李旺台有一次寫特稿批評吳基福的恩人、當時中山大學校長李煥，第二天台時布告欄就貼出「李旺台派調資料室」公文。「後來吳基福對我說，懲罰我是給李煥一個交代。我在資料室待了三個星期，吳基福一直對我說：『你不可以離開，也不可以生氣，一定要忍過這段期間。』在資料室的第三個星期，我被調升台北特派員，我知道這一切都是吳基福對我的愛護。」

與多位報老闆有過長期共事經驗的俞國基，則在本書中對戒嚴時期的報老闆們作出整體評價：「台灣所有報老闆都太政治了！」

俞國基認為：「台灣時報舊老闆吳基福比較天眞、沒有心機，但他辦報還是想影響政治，尤其希望本省人也涉足媒體。台灣日報舊老闆傅朝樞，雖然對黨外幫助不少，但也想藉此獲得與國民黨議價的籌碼。甚至他後來到美國辦報，與中共高層接觸，都是在玩弄政治。而中國時報雖給人比較清新、較有人文性的印象；但余紀忠先生其實也是政治人，雖然他具有人文氣質，但仍免不了想在政治上發揮他的影響力。後來我到自由時報，老闆林榮三先生不願得罪政壇主流，顯示台灣報紙走向都是隨老闆的政治關係而轉變。台灣沒有一個報老闆能擺脫政治的影響。幾年前進入台灣的《蘋果日報》。雖然沒有政治目的，卻完全市場取向，其未來發展有特觀察。」（註：俞國基未曾與王惕吾共事，因此未對王直接評價。）

我們認為，「報老闆學」是還原戒嚴時期媒體風貌的重要面向。讀者可在本書中找到諸多案例與線索，初步瞭解戒嚴時期報老闆們的行事作風，及其在台灣從威權邁向民主過程所處的位置。

至於戒嚴時期報老闆們的個別功過、解嚴前後報老闆們的差異、兩大報第二代「小老闆」與上一代媒體強人的比較、當前報老闆們的新聞控制方式、台灣報老闆們與政治剪不斷理還亂的複雜關係，都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重要課題。

戒嚴時期的「大記者」們

戒嚴時期新聞歷程固然充滿壓抑與苦澀，但對於本書不少受訪者而言，大環境限制下的因緣際會，卻意外形成一個讓「大記者」發光發亮的年代。許多新聞工作者在短時間內歷任要職，不但發揮使命感，更擁有影響力，在某種程度上反令擁有充分自由的當前新聞工作者稱羨不已。

國民黨政府宣布報禁後，台灣報紙數目始終維持在三十一家，其中黨政軍勢力控制者即達半數；但在黨營媒體逐漸沒落、民營報紙強勢興起後，以兩大報為首的民營報業需才孔急，戰後在台灣出生的嬰兒潮世代成為重點栽培對象，這群「台灣戰後第一代政治記者」，開始在報紙只能印行三大張的時代引領風騷。

一九七二年擔任《民族晚報》記者的南方朔，成為當年台大畢業、碩士學歷進入新聞界的先鋒。南方朔還記得，當年他的起薪僅一千五百元，比他當翻譯每月可賺三、四千元少了很多。但是，此後南方朔的一枝健筆，卻在解嚴前後的新聞界發揮了重大影響力。

比南方朔早一年進入新聞界的周天瑞，則因身處兩大報之一的中時，掌握更好的機會結構。他在六年內當上中時採訪主任，年紀輕輕就負責處理「中壢事件」等重大新聞，既有成就感也承受莫大壓力。

周天瑞接受本書訪問時，回憶他當年採訪國民黨十一全大會時的場景：「蔣經國在閉幕典禮致詞時，我愈筆記愈覺得耳熟，都是我寫過的啊，都變成了他的語言講出來了啊……。自己寫的東西被一個國家領導人這樣引述，代表他的心和我的心是同理的、是心意相通的，這是一種很深的感動。我一邊寫一邊眼淚流個不停，還不能把字弄糊掉，還不要讓別人看見，等他講完，馬上止住眼淚……。」充分顯示一個年輕記者發揮影響力時的內心激動。

同樣受到蔣經國總統重視的，還有一九六九年就進入新聞界，沒多久就在自立晚報寫專欄的吳豐山。吳豐山還記得：「有段時間，蔣經國先生很重視我寫的專欄，常派宋楚瑜來告訴我：『你的建議，我們照辦。』或者『你的建議，我們一時做不到，明年再來做……。』我也覺得很有成就感。」

比周天瑞晚進中時的王健壯，則更像是坐直升機一般，三年後就當上採訪主任，負責帶兵與聯合報競爭「一百萬份第一大報」，二十九歲就擔任時報雜誌社長兼總編輯。王健壯形容當時受到重用的情況是：「當時報社調整職務就有聘書，我大約一年收三張聘書，一共有十幾張聘書……。我們就像是戰場上的兵士，報社叫我們到哪就到哪。」

有段時間同時擔任紐約時報及《亞洲華爾街日報》駐台記者的殷允芃，則是用這樣的心情發揮使命感：「中美斷交那段期間，我爲美國媒體工作，但我體會到沒辦法用美方觀點處理新聞。當時我的位置和經歷強迫我把自己的立場想清楚。有時候人家問我：『你爲什麼那麼愛國？你到底是什麼人哪？』我就會說：『我是在台灣的中國人。』」

美麗島事件發生時，剛從醫學院畢業進入民生報的楊憲宏，卻在公害環保領域看到了記者的使命感。當時爆發弱勢者吃錯油的「多氯聯苯事件」，憤怒的楊憲宏認爲：「看來看去，真的只有新聞界是最有反省力的，記者可以很努力地去瞭解這是怎麼回事，然後提出批判；政府系統卻推得一乾二淨，無論是地方或中央，全部都一樣。你可以看到最爛的官員每天講那些你聽不懂的話，完全無力對抗這件事。」

楊憲宏針對多氯聯苯事件寫出的第一篇調查報導「哭泣的教堂」，就是他的第一篇得獎作品。此後楊憲宏在聯合報系的一系列公害環保報導，讓他成爲那個時代最受矚目的公害環保記者。楊憲宏後來出版的《走過傷心地》，以及楊渡在解嚴前後出版的《民間的力量》、《強控制解體》等書，則皆被視爲當年重要報導文學作品。

「林宅血案」震驚台灣社會後，陳銘城決定離開台灣全錄公司的高薪工作，毅然走上記者這條路。他相信「新聞言論的突破，是台灣走上民主國家，以及保障人權的重要方向。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之後，更需要有人站出來，去做這樣子的工作」。陳銘城最後在自立報系找到發揮空間，寫出一系列訪問二二八受難者家屬、海外黑名單人士等突破禁忌的人權報導。

解嚴那一年因爲歷史性大陸行而轟動兩岸的李永得、徐璐，事後則雙雙對於「暴得大名」進行省思。李永得強調，他和徐璐原本不是自立晚報安排的人選，後來因緣際會率先成行，只是歷史的偶然而「浪得虛名」；徐璐也認爲，大陸行的虛名在那幾年對她造成「很大的負擔」。

解嚴之後，這些「大記者」們則頗有失落之感。

解嚴前曾經被戲稱爲「地下新聞局長」、長期以評論影響力著稱的司馬文武認爲：「寫一篇文章能造成很大影響的時代已經過去，我只能期待，累積很多、很久的作品後，自己的風格、價值觀念、基本原則，會被人認爲是可靠的。」

司馬文武對於媒體影響力消退的看法是：「媒體影響力跟新聞自由一樣，不專屬於特定的報紙或記者，而屬於整體新聞環境。現在資訊太多，媒體影響力難免被稀釋。同時，我們也要體認自己沒有比別人高明多少，只是有能力、技巧和機會表達出來而已。」

長期主導聯合報社論走向的黃年自嘲：「國家現在內耗空轉，記者就像是薛西佛斯，每天推石頭上去然後又滾下來，那是一種無力感。我有時候跟朋友開玩笑說，我現在寫社論的成就感，還不如幫我太太洗一次碗，真的有時候會這樣想。」

目前擔任自由時報副社長的俞國基也強調：「現在的政府、政治人物怎麼『刺』都沒有反應。現在當記者，寫什麼都像丟到水裡面一樣，沒有反應，在成就感上還不如戒嚴時代。戒嚴時期，存在威權政府這種明顯的目標，又有警總在背後盯著，身爲新聞從業人員，反而很有使命感、很有理想。」

其實，今昔相較，戒嚴時期因緣際會加上個人努力形成的「大記者」們，單打獨鬥的個人風格強烈，但相對缺乏橫向連結與勞工意識；解嚴後新聞工作者雖然影響力消退，卻多了橫向連結（例如成立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大眾傳播產業工會聯合會、新聞界連署抗議鴻海董事長郭台銘對《工商時報》記者曠文琪財產申請假扣押等）的可能性。

讀者可以在本書中看見部分「大記者」的完整心路歷程，並可進一步瞭解戒嚴時期中南部新聞工作者、女性新聞工作者的不同發展軌跡。有興趣的讀者與研究者，値得繼續探討解嚴前後「大記者」的角色轉變、報紙記者影響力的消退、中南部新聞工作者對於破除「台北觀點」的努力、解嚴前後新聞工作者勞動條件變化等重要課題。

解嚴後他們爲何都從政了？

細心的讀者應該早已發現，本書多數受訪者，或早或晚、或長或短都曾投入政治之路，似乎是這群資深記者從戒嚴走向民主的第一項集體趨勢；此外，多數受訪者在解嚴後紛紛從平面媒體轉戰電子媒體。這種生涯轉變似乎成爲這群資深記者的第二項集體趨勢。至於部分受訪者在解嚴後出現若干爭議，他們在受訪時則坦然接受各界檢驗。

解嚴前後，「政媒兩棲」與「學官兩棲」同樣是社會各界批判焦點。一般認爲，政治與媒體之間有一條看不見的界線。政治與媒體間雖允許轉換跑道，卻不容同時腳踏兩條船而傷害媒體獨立自主。

當初在八十年代標榜不從政的司馬文武，對於政黨輪替後出任國安會副祕書長的解釋是「滿足好奇心」。由於國安會工作不需與媒體接觸，他不認爲自己面臨「政媒兩棲」問題。八十年代另一位與政治保持距離的李旺台，後來則基於「對林義雄（時任民進黨主席）的爲人與理念都很有好感」，因此在林義雄邀請下擔任民進黨副祕書長。

同樣在民進黨政府當官的李永得強調，媒體人轉任政務官違背他的信念，因此一開始沒有答應入閣，但在「身為客家人，應該用專業回饋、服務客家鄉親」的勸進理由下，最後他還是一路坐上客委會主委位置。

早在國民黨執政時期就已擔任監委的黃肇珩認為，「記者跟監委有很多相似點」，記者出身的她適合擔任監委，就任監委後則保持記者的精神。南方朔可能是以相同的觀點，接受國民黨邀請列入國民黨監委推薦名單。

一九九六年就已幫陳履安寫過總統競選文宣的楊渡，其接任國民黨文傳會主委的理由則是：「希望再次政黨輪替，終結單一政黨長期執政，避免台灣走入新獨裁。」不過，他認為到國民黨當黨工只是「階段性任務」而已。

無黨無派，但與政治始終糾葛不清的吳豐山，則對自己的性格進行這樣的分析：「我喜歡跟人家接觸、人脈好，這適合做政治；可是我不喜歡黨紀，不喜歡扭曲良知，這適合做新聞」；他雖已入閣做過行政院政務委員，但在心理上仍不認為這輩子真正從政過。

這是本書受訪者對於走上政治之路的部分理由，讀者可以自行判斷是否合理，並且找到新聞工作者容易轉換跑道從政的部分原因。

弔詭的是，在戒嚴時期看似立場一致的新聞工作者，解嚴後紛紛分道揚鑣投入不同陣營。這種現象更加證明，當年所有進步社會力量（包括進步新聞工作者在內）只是基於對抗威權體制而形成鬆散的「反國民黨大聯盟」，等到威權體制解體後，統獨國家認同、藍綠黨派對立成為主要社會矛盾，資深新聞工作者分別捲入新的社會動員方向，他們的差異也才更加清楚浮現。

本書受訪者在解嚴後紛紛走上電子媒體之路，則是觀察這群資深記者發展軌跡的另一項重要線索。（楊憲宏、吳豐山、李永得、徐璐、周天瑞、戎撫天皆曾擔任電子媒體高層，李旺台、楊渡、陳

銘城也都有製作或主持電視節目經驗。）

讀者可以發現，這群資深記者轉換跑道的過程未必順利，有些人固然自認有所發揮與建樹，但也有些人面臨嚴重挫敗經驗。例如徐璐想要改革「老三台」之一的華視，最後卻黯然坦承失敗；戎撫天想要帶給東森電視台不同思維，最後也是以受挫收場。

新興電子媒體需才孔急、挑戰性高且影響力與日俱增，顯然是解嚴後平面媒體高層「換軌」領導電子媒體的重要背景。不過，這一回他們並沒有像當年進入報業那般駕輕就熟、勝任愉快，成敗經驗也似乎不如他們想像中美好，顯示不同媒體屬性仍可能對資深新聞工作者形成難以跨越的鴻溝。

除此之外，資深新聞工作者在新聞專業領域，也已出現若干爭議，有待社會公評檢驗。

徐璐除了在二○○○年政黨輪替時站台輔選，其後更接受民進黨政府指派為華視副總經理，成為外界眼中的「官派媒體高層」。對於這種轉折，徐璐強調，她曾向民進黨人士強調：「不要再官派了，你們應該建立遴選制度。」但得到的回答是：「現在三台都仍由官股主導，不官派、誰派呢？要進去裡面，才能改革，才能讓黨政軍退出媒體。」其後她接受這項理由進入華視。

但徐璐在本書訪問中也坦率指出，現在回想起來，「急需一個工作來填補離開『台北之音』後，漂泊了近一年的工作空虛感」，可能才是她進入華視最大的驅動力。

王健壯在新新聞社長任內發生的「嘿嘿嘿」事件，則讓他陷入「活在壓力鍋裡最長的一段時間」、「傷痕到現在都還在」。他在本書訪問中強調：「坦白說，事件的來龍去脈，我只比讀者多知道一點點，而且新聞也不是我處理的，但呂秀蓮要提告後，五分鐘不到我就把楊照（新新聞總編輯）找來，我說所有事情我來處理。我明白這件事恐怖的影響，但我要為同事扛下。」

新新聞官司敗訴後，王健壯認為：「可惜台灣的媒體、司法、國會，跟水門案時的美國媒體、司法、國會不一樣，沒有一群人一起去做扒糞者的角色。以後若呂秀蓮、王健壯各自出書，『嘿嘿嘿』

事件一樣是無頭公案。」

同樣是與政治人物打官司，黃年是因撰寫聯合報社論「辦到謝長廷腳前的那一條線爲止?」而遭高雄市長謝長廷控告誹謗。他在法庭辯護時強調，新聞記者的「第四權」是憲法賦予的憲政權利，「戒嚴時期，當局用一種方法扼制新聞自由；解嚴以後，當局則用另一種手法扼制新聞自由。例如，當年的警總、新聞局、文工會針對新聞個案管制，但民進黨的一句『統派媒體』，則是全盤否定及滅殺新聞媒體的民主憲政角色。」與王健壯不同的是，黃年的官司獲得了勝訴。

楊憲宏長期被視爲「呂秀蓮副總統重要策士」，並且大量參加談話性節目、接受媒體訪問，則已被認爲是談話性節目、媒體名嘴亂象的重要參與者。

對於這種定位，楊憲宏在接受本書訪問時另外強調，他並不認爲自己是「呂秀蓮副總統重要策士」，也無法認同談話性節目的作法，因此他決定退出「二一○○全民開講」等談話性節目。不過，在本書出版之前，楊憲宏已在談話性節目再度出現，他向我們表示，他的參與可以「讓談話性節目的討論理性一點」。

楊渡在二○○六年倒扁紅潮期間發表的「倒扁關鍵，在敢不敢動亂」一文，曾引起軒然大波。外界批評楊渡主張動亂，楊渡本人則認爲「這只是一則新聞分析」，他不覺得自己是在鼓動群眾動亂。

無論是否接受上述辯護，讀者都可在本書中看見這些資深新聞工作者不迴避爭議的理念陳述與心情告白。我們認爲，新聞工作者如同筆下監督對象，同樣應該接受社會公評檢驗，相信本書受訪者亦是在相同心情下進行自剖。

有興趣的讀者與研究者，則可繼續觀察台灣新聞工作者從戒嚴走向民主的共同趨勢（並與其他國家進行比較）、新聞工作者在解嚴前後言行是否一致、解嚴前後政媒兩棲現象、解嚴後媒體人投身藍綠兩大陣營、記者從「報導者」成爲「被報導者」的過程，以及當前談話性節目充斥「資深記者」放

言高論等重要課題。

資深記者核心理念與生命情懷

解嚴二十年之後，本書受訪者對於媒體環境今昔對照有許多觀察與感觸，並各自流露出不同的生命情懷。我們除了想探討：戒嚴時期對抗威權體制、爭取新聞自由的核心理念，對當前新聞界還有什麼啓發價值？我們也想瞭解：是什麼原因支撐資深新聞工作者走到現在，依舊充滿熱情與鬥志？

二〇〇七年十月台大新聞研究所舉辦「台灣解嚴二十週年研討會：威權解體與新聞自由的崎嶇路」，長期關切台灣從戒嚴走向民主的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榮譽退休教授、香港城市大學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李金銓，以「自由化，而非全面民主化——台灣的游擊媒介與政治運動」為題強調：

「解嚴不可能解決所有的問題……，自由化把政府控制送進歷史廢堆，媒介從檢查制度的桎梏中解放，這是不可輕易抹煞的成就。可惜台灣未進一步建構全面民主的媒介秩序。市場在戒嚴時期抗衡政府的媒體控制，解嚴後卻逐漸取代政府成為媒介自由的羈絆；市場控制比政府控制較不著痕跡，後果卻一樣不可小覷。目前，任由這許多媒介在扭曲的市場秩序中廝殺，個個都是財務的輸家，但最大的犧牲者莫過於『公共領域』。」

李金銓的結構性觀察與感慨，放在當前藍綠撕裂、兩極對立的社會氛圍與媒體環境中，更加彰顯新聞工作者充滿無力感的真實處境。

在這種巨大的集體困境中，本書部分受訪者主張「戒嚴年代勇氣比智慧重要，解嚴之後智慧比勇氣重要，而且更需要專業」，部分受訪者卻堅持「在藍綠對立中保持中間、拒絕選邊，其實比解嚴年代更需要勇氣」。那一種特質才是當前新聞工作者最需要的條件？

當了這麼久新聞工作者，本書受訪者中，有人相信自己「從來沒有犯過本質的錯，如果犯了，我

一定立刻不幹記者」，有人卻是「每天寫完評論都會後悔，總是會在截稿後，想到怎麼寫會更好，但是來不及，所以只好隔天再寫一篇」。哪一種態度才是資深記者應有的自省？

本書受訪者中，不少人認為自己是自由派，並憑藉自由主義理念走到現在。但自由主義在當前新聞界應該如何實踐？自由派理念就可以抵擋收視率惡性競爭、藍綠對抗邏輯？更重要的是，戒嚴時期據以對抗威權體制的自由派理念，現在要如何對抗媒體老闆的鮮明政治立場，以及置入性行銷對於新聞專業的侵蝕？

讀者可以在本書中追尋這些問題的答案，觀察本書受訪者燃燒熱情的方式，檢驗本書受訪者的理想有無褪色。我們相信，回歸記者這項「志業」的原始初衷，以及記者這種「人」的生命情懷，有助於當前新聞界思索從戒嚴到民主的自我定位與方向感，在新聞崗位上重新注入理想與熱情。

希望本書所見證的歷史記憶，能夠有助於社會各界珍惜得來不易的言論自由。在解除戒嚴、開放報禁二十年的此刻，重新看見新聞工作者努力走過的軌跡，並且重新思考媒體存在的價值與意義。

本書受訪者歷史年代對照表

※人名順序依本書各章順序

人名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美麗島事件	一九八七年七月解除戒嚴	二〇〇七年解嚴二十年
司馬文武	八十年代雜誌總編輯（黨外雜誌）	新新聞發行人（雜誌）	蘋果日報顧問兼專欄作家（報紙）
薛心鎔	中央日報總編輯（黨營媒體）	中央日報特約主筆（黨營媒體）	退休（民間）
黃肇珩	中央社國內新聞部主任（黨營媒體）	正中書局總經理（黨營媒體）	退休（民間）
俞國基	台灣日報總編輯（中南部報紙）	紐約北美日報總編輯（十一月返台接任中國時報總主筆）（海外）	自由時報副社長（報紙）
南方朔	台灣時報政治組副主任兼主筆（中南部報紙）	新新聞總主筆（雜誌）	亞洲週刊總主筆及固定撰寫中國時報專欄（雜誌及報紙）
吳豐山	自立晚報總編輯	自立晚報社長（自立報系）	行政院政務委員卸任（政治部門）
李旺台	台灣時報採訪主任（中南部報紙）	在美國準備申請學校進修（隔年返台接任台灣時報副總編輯）（海外）	退休（民間）

殷允芃	紐約時報、亞洲華爾街日報駐台記者（國際媒體）	天下雜誌發行人（雜誌）	天下雜誌發行人（雜誌）
周天瑞	中國時報副總編輯兼採訪主任（中時報系）	新新聞社長（雜誌）	新新聞董事長（雜誌）
戎撫天	聯合報政治組記者（聯合報系）	聯合報採訪中心副主任（聯合報系）	徐元智先生紀念基金會顧問（民間）
楊憲宏	民生報醫藥版編輯（聯合報系）	聯合報新聞供應中心主任（聯合報系）	媒體名嘴、大愛電視台顧問（電子媒體）
楊　渡	還在輔仁大學中文系念書（民間）	時報新聞週刊記者（中時報系）	國民黨文傳會主委卸任（政治部門）
王健壯	中國時報記者（中時報系）	新新聞總編輯（雜誌）	中國時報副社長兼總編輯（報紙）
李永得	房屋仲介公司企畫（民間）	自立晚報政經研究室主任（自立報系）	行政院客委會主委（政治部門）
徐　璐	還在淡江大學英文系念書（民間）	自立晚報政經研究室研究員（自立報系）	中華電信基金會執行長（民間）
黃　年	聯合報專欄組副主任（聯合報系）	英國牛津大學進修（後返台籌辦隔年二月創刊的聯合晚報）（海外）	聯合晚報發行人兼聯合報總主筆（報紙）
陳銘城	台灣全錄公司業務代表（民間）	自立晚報記者（自立報系）	行政院文建會副主委辦公室主任（政治部門）

司馬文武

司馬文武

〔第一章〕

與警總「捉迷藏」的日子

一九七九年黨外雜誌健將

前頁圖說：
2002年8月5日，司馬文武——江春男。
（中國時報提供／楊人凱攝）

有很長一段時間，他被稱為「地下新聞局長」。在新聞局官方說法之外，國際媒體想要瞭解戒嚴時期台灣民間的真實想法，總是第一個找上他。他就這樣一邊在黨外雜誌跟警總大玩「捉迷藏」遊戲，一邊扮演新聞局長也未必做得到的國際發聲角色。他在一九七九年創辦黨外雜誌的故事，很適合帶領讀者回到那個年代。

訪問過程中，他很誠實強調：「很多人回顧起戒嚴時期，都是一副非常勇敢的樣子。其實，在美麗島事件之後，就已經沒有真正的危機和風險了。」他的說話和他的筆一樣，深入淺出、雅俗共賞，不刻意掉書袋，卻總是一針見血、打到痛處。

我們硬要他談談對於同輩記者的看法，他實在拗不過，只好謙虛表示：「我的能力不如周天瑞、才氣不如王健壯、學問不如南方朔。」那為什麼只有他當過無數媒體的發行人和總編輯？「因為綜合起來我最強。」當場引起爆笑，果然是功力高強的冷面笑匠。

他說每天寫完評論後都會後悔，這種說法，大概會把視他為偶像（至少是模仿對象）的後輩記者氣死。他的記者生涯中沒有什麼前輩典範可以追尋，所以自認頗受外國記者的影響，然而，他與同期的台灣戰後出生第一代政治記者，卻已在各層面影響後輩記者與台灣社會的走向……

司馬文武(江春男)大事記

1944 司馬文武出生

1971 退出聯合國

1971立法院新聞室編審

1972中國時報政治、外交記者

1975自立晚報記者

1978中國時報專欄記者、時報雜誌主編

1979 美麗島事件

1979八十年代總編輯

1987 解除戒嚴

1987新新聞發行人

1989首都早報社長兼總編輯

1996台灣日報發行人

1999英文台北時報發行人

2000 政黨輪替

2000國安會副祕書長

2005蘋果日報顧問兼專欄作家

只想當「真正的記者」

司馬文武筆名由來

我是在台中豐原的深山裡成長，童年非常寂寞孤獨；小時候的我，一心一意想要遠走高飛、環遊世界，對大都市和外面的世界充滿好奇心。

考上台中一中後，終於有機會離開家鄉，卻一下子就被繁華的都市迷惑，曾經混太保，還因爲不想回家種田而離家出走。中學時曾和林懷民一起比賽寫作，在《幼獅青年》、《中央日報》、《新生報》等刊物投稿，藉此賺稿費、練文筆。

年輕的時候當然有很多幻想，想當運動選手，也想當偉大的文學家還是什麼家，只是不好意思講而已啊！不過，那時候因爲家裡很窮，覺得自己不可能做到，只能空幻想。求學時，看到弟弟妹妹在家種田，我覺得好辛苦，那時候光擔心要回家種田都來不及了，更別說要追求什麼偉大的理想了。

因爲喜歡幻想、運動，初中時我就寫過武俠小說，當時就用過「司馬文武」這個筆名。司馬是管馬的人，在古代是國防部長的意思，文武則代表文武雙全。很多書生都認爲運動是愚蠢的事情，但如果是不想當依附權勢的文人，一定要有健康身體和謀生能力，也就是要文武雙全。這是我用這個筆名

的由來。

高中畢業後，念東海大學政治系，接受了多元和自由的教育，對我的價値觀有很大影響。當時受郭榮趙老師影響，決心把國文和英文念好，培養自己的思考和表達能力。還因爲念了傑克．倫敦(Jack London)《野性的呼喚》(*The Call of the Wild*)一書，滿懷冒險精神，想要把圖書館的每一本書看完，想征服全世界，看到《阿拉伯的勞倫斯》(*Lawrence of Arabia*)的電影，更受到衝擊，夢想追求這種生活。

家人不諒解當記者

退伍後，我到政治大學念政治研究所。就讀期間，歷經了釣魚台事件和台灣退出聯合國，我參加各種國是演講，接觸各種政治消息，逐漸使我這個念了滿腦子西洋政治理論的科班生，開始關心時事。

父親對我的高學歷感到很開心，但同時也很擔心，因爲家族裡只有我堂伯念過師範學校，但他後來因爲二二八事件被抓去關了二十七年。當時大學畢業，能當公務員就非常幸福了；我碩士畢業，卻想當記者，後來甚至投身黨外，家裡完全不能諒解。

多年後，我出了一本文集《我愛凱薩》。在書中的自序裡，我回顧我受教育的過程，寫下了這樣的結語：「童年親族對政治的恐懼感，在我受教育的過程中逐漸消退。代之而來的是，我逐漸體會到，這是我們自己的社會、自己的政治、自己的國家，我們沒有恐懼、冷漠的理由；相反地，我們更應該爲它付出心力，因爲我們已經沒有其他可以逃避的地方。」

中時「兩大匪類」

研究所畢業後，我原本在立法院新聞室擔任編譯，當時在《中國時報》當記者的周天瑞，介紹我

進時報當記者，主跑政治和外交路線。當時台灣面臨斷交潮，國內政局也是一團混亂，我有很多意見和新聞想寫，但很多東西都不能登。

當時的黨外人士，也知道主流媒體記者不能碰觸禁忌的苦悶，《台灣政論》因此接獲許多線上記者的投稿。我在立法院跑新聞時，認識了黨外立委康寧祥，所以也開始投稿到台灣政論。這種事情在報社內很容易被打小報告，但我認為自己沒有錯，因為這些都是報紙應該登的文章，它不登，我就投到黨外雜誌去。

不過，在戒嚴環境下，幾乎所有媒體裡，都有很多幫安全單位工作的人。記者如果在立法院跟一些黨外的政治人物講話、見面，得到什麼消息，回去只要寫報告給安全單位，都會有獎金。報社裡的人，若跟黨外人士走得稍微近一點，就會被貼上標籤。

自由心態的記者在當時無法被忍受，束縛不一定源自黨國體制或報社內的壓力，而是當時整個新聞界和政治環境的氣氛如此。記者若抱著挑戰心態挖新聞，往往會產生雙重挫折：挖不到新聞，或是被別人利用。當時中時內部就有「兩大匪類」之稱：統派的共匪是南方朔，獨派的台獨份子就是我；我們被視為「雖然很專業，卻永遠不會紅」的記者。

連余老闆都被調查

除了記者寫稿時，要面臨諸多來自內外的壓力，有時局勢的艱困程度，連報社老闆都難以招架。

有一次，時報老闆余紀忠在國民黨中常會，聽到中美關係生變的消息，回來就叫我去追新聞。後來安全單位找上我，問我怎麼知道這個消息，還說這是洩漏國家機密，要我把余老闆供出來。我當然抵死不說，但也因為如此，才知道余老闆面對的是多麼困難的情勢。報社老闆即使是中常委，情治人員也是照查，報老闆為了應付政戰系統的壓力，特別指派有軍方背景的人擔任主管。

因爲余老闆的關係，使我更加認爲應該支持反對黨。因爲余老闆也是有良心、有見解的人，但連他作爲中常委都那麼害怕的話，那我們還能有什麼作爲呢？後來才漸漸知道，原來那時候我不能算是眞正的記者，應該叫爲「文宣人員」，因爲老闆叫我們寫什麼就寫，叫我們不要寫就不寫。

我在主流報社裡當記者的經歷中，可以看到不少有見解、有良心、憂心國事的君子，但是他們碰到比較敏感問題時那種畏縮，甚至言不由衷、先講求保護自己的態度，使我反省到當時中國的知識份子，能夠做到胡適那種「膽小的君子」，已經難能可貴了。

一個沒有自由、沒有民主、沒有反對黨、沒有議會、沒有司法獨立的社會，就不會有新聞自由；沒有新聞自由，就不可能有眞正的記者。在這種環境下，即使我很想當記者，也當不成；一定要反對黨弄起來，我才能夠做好記者。

我認爲，在新聞界能夠眞正發揮監督力量之前，社會上需要先培養一股建全的政治性制衡力量。否則新聞自由就像沙上築塔，隨時隨地都可能塌陷。當時報社與權勢關係如此緊密，要求報界扮演有效的監督角色，實在是一種奢求。一個有力的巨人，也無法將自己撐起來，因此一個國家一定要有反對黨，才能與執政黨合力把「天花板」撐起來，才會有言論、學術、新聞等自由的空間。

打壓我卻又留給我生路

一九七五年，台灣政論被政府勒令停刊，海外留學生在美示威。當時我正好隨國會記者團訪美，返國後卻被打小報告，說我在美國脫隊去參加抗議台灣政論遭停刊的活動。

我一回國余老闆就把我找去，告訴我有很多跟我有關的傳言；余老闆說他當然不相信那些傳言，不過壓力實在很大。當時中國時報和《聯合報》之間的關係十分競爭，任何一方都很怕自己出問題。所以後來余老闆就以「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肩膀不夠寬」暗示我離開，要我先休息一陣子，

而且「休久一點沒關係」，於是我就離職了。

離開中時的我，不敢讓家人知道我失業了。當時很多人幫我找工作，到處寫稿，拿的稿費還勉強可以維持家計。很多年以後才知道，其中一些工作，原來都是安全單位的外圍人士安排的，希望我落魄時不要走上絕路。

我看東歐、拉丁美洲、南韓等國家的民主轉型，都跟台灣有同樣的一套作法：打壓異議人士的言論自由，可是不會讓他活不下去。

理念不合離開中時

離開中時後，我到處寫稿。直到一九七六年，我申請到獎學金，遠赴德國進修新聞專題課程。課程一結束，我就跑遍了整個歐洲、中東地區，造訪了不少國家。旅遊確實是讓人增廣見聞、累積知識的好方法；環遊世界回來之後，我感覺到自己的膽子變得很大。

回國後，先找到《自立晚報》的工作，過沒多久，中時又找我回去。余紀忠問我：「寫文章寫得不錯，爲什麼可以在自立晚報寫，不能在中國時報寫呢？」但自立在我落難時收留我，我不能說走就走。余老闆就容許我兩邊跑，早上在自立晚報，晚上在中國時報工作。

可能是剛回國，膽子變大了；在記者的工作崗位上，很多時候，會覺得自己跟黨外是「同一國的」。我的報導理念愈來愈不見容於主流媒體，這種衝突逐漸加劇，讓我決心離開。

一九七九年《自由中國》創辦人雷震過世，報紙上只出現約一百字的簡短報導。這麼重要的人物過世，竟然沒有人敢寫文章！我後來寫了一篇雷震的紀念文章，大家反應很好，還被印出來在他的告別式上散發，但報紙也不敢登。

雷震那麼有名，會有很多人想瞭解他，但爲什麼沒有媒體敢寫？連最起碼的，雷震爲什麼被抓？

是因爲哪些文章惹禍？這些事情都沒有人寫，也不敢寫，只敢寫雷震被抓、被判的報導。這件事令我感觸很深，這個社會實在是……連一點點勇氣、一點點良心都不敢表達。

剛好康寧祥要辦雜誌了，找我去幫忙，我就答應加入《八十年代》擔任總編輯，成爲第一個有記者經驗的黨外媒體工作者。

在戒嚴環境下辦黨外雜誌，沒有多少人全心投入，多半是搞政治運動的人兼職。另一方面，也沒有正當職業的記者願意加入，因爲會害怕啊！但是我一面害怕一面做，憨膽憨膽（台語）。自己猜想……反正應該不會被抓，抓也不會被判多久。因爲我沒有做什麼不正當的事情，而且黨外人士常常互相保護，大家都憨膽憨膽。

黨外雜誌才能代表台灣聲音

其實，黨外雜誌並沒有多偉大，只是當時台灣社會剛好需要這個東西。我們得到很多鼓舞，也有很多人捐錢，還有人把我們視爲英雄，但黨外雜誌是大環境的產物，沒有人能稱得上是居功厥偉的人。

當時剛好有那樣的社會經濟條件，例如讀者、市場、通路、印刷廠，可以維持黨外雜誌的運作。剛好中、小企業很多，印刷廠很多，政府很難控制。也剛好有很多知識份子，無處表達自己的意見，黨外雜誌就變成一個很重要的平台。

我們最主要的使命感，並不是來自外界的肯定；而是來自於，我們知道，在報紙上看不到真正發生的新聞。要看真的新聞，就要看我們的雜誌，我們才是台灣真正的聲音。

我信奉民主自由，尊重新聞專業。在黨外陣營，堅持只辦雜誌，不搞政治活動。當初追求新聞自由，只是爲了一個單純的原因：想好好當個真正的記者。以這樣的價值辦黨外雜誌，我們自認爲：比

起國民黨中常委辦的兩大報，當時只有我們，才能眞正代表台灣的聲音。

例如美麗島事件和林宅血案發生時，當時主流媒體都不敢報導，大家都在看我們怎麼寫。那時候不少線上記者和教授，私下幫忙，提供資料及理論基礎。雖然我們的雜誌當時已被查禁，面臨許多掙扎和壓力，但後來還是決定要寫；因爲再不趕快寫，可能就沒人能夠記錄這段歷史。

體制內記者主動投稿

在黨外陣營的日子，到處都有情治人員監控，然而，各地也都有伸張正義和愛好民主自由的人士。黨外雜誌在這麼艱困的環境中，仍能找到支持的力量。

那時候有不少體制內的記者、教授，甚至是國民黨內的人，主動投搞到黨外雜誌，想要說出事實，以伸張正義。他們也想透過黨外雜誌，給他們的政黨或報社更大的改革壓力。我想台灣民主政治轉型的過程，之所以能夠比較和平，這些過程也扮演了重要的因素之一。

多年後我發現，當時有正義感的人，後來都比較有出息；如果連私下都不敢幫忙，沒有道德勇氣的人，後來大多沒出息。所以眞的要有正義感和衝勁支撐，否則心若死了，就不可能當好記者。

不過，當時我已發現，有些國民黨內的人，來投稿黨外雜誌，並不是爲了公平正義，而是利用黨外雜誌放話，進行黨內的內部鬥爭。因此，當時在黨外雜誌工作，必須掌握歷史背景和情境脈絡，才有判斷依據，否則容易受騙。

黨外雜誌生存之道

美麗島事件後，八十年代遭查禁，原班人馬先後改以《暖流》、《亞洲人》等刊物發行，亦遭查禁。我每週的產稿量都很大，所以常用幾個不同的名字來署名，像「蔣良任」、「賴祖義」都是我。

當時我們大肆報導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江南案等敏感話題，很快就被警備總部視為眼中釘；不過，他們查禁，我們照樣寫稿、發行。

辦黨外雜誌是非常特殊的經驗，從採訪祕密消息來源、寫稿，到印刷、發行，都是偷偷摸摸、跑給警備總部追。很多消息來源，看到報社記者都避之唯恐不及，看到黨外人士還得了，敢跟我們見面的人實在不多。每一個約會或計畫，都是祕密單獨，不能讓人知道，因為到處都是線民。

因為當時的環境，我們必須假設：所有辦雜誌的過程都被監視，包括電話竊聽、信件攔截、印刷廠遭監控等。所以我們經常換印刷廠，講電話也都有暗號，假報印刷時間；透過一次又一次的闖關經驗，讓每一個環節和組織慢慢培養出躲避查禁的模式。

每次在高速公路、大街小巷裡追逐，成功躲過查禁，都像打完一場仗，我當時還年輕，好像都不會累。當年，《紐約時報》還曾以斗大標題「Taiwan magazines Play 'Mice' to the Censor's 'Cat'」，報導台灣的戒嚴時期，顯示黨外雜誌在政府嚴密監控下，自行發展出生存之道的歷程。

和警總捉迷藏玩出遊戲規則

警總查禁黨外雜誌，我們跑給警總追；其實這個圈子不大，日子久了，大家也多少有些接觸和認識，後來甚至逐漸衍生「共生關係」，玩出了遊戲規則。

依據當時政府的制度，若能成功查禁黨外雜誌，警備總部的情治人員就能領獎金；印刷廠若能主動檢舉、配合查禁，每查到一本，也可以領十塊錢獎金。於是我們就先印兩千本，這兩千本都是用來「被查禁」的，等印刷廠檢舉好、警總查禁完之後，我們才開始印真正要發行的份量。

所以當時的情況是，查禁人員和印刷廠有獎金拿，黨外雜誌仍照常發行，而且發行量蒸蒸日上。當時黨外雜誌發行量有一、兩萬本，沒有一篇廣告，營運的收入完全靠發行。

不過遊戲規則定下來之後，黨外雜誌愈查禁愈多，情治單位的上層也會察覺有問題，就會換更凶的人來查禁。

新來的情治人員，一來查禁就跟我們搶書，對我們照相存證；不過我們也找幾個立委、市議員，還找記者在旁邊照。他搶照相機，我們也搶他照相機。下一集雜誌出刊時，就把情治人員的照片登在雜誌封面，寫上「抓耙子」。下次他們不是被調走，就是請我們吃飯，說：「拜託別這樣，大家為國家、為政府嘛！」

在這套遊戲規則下，我們與警總情治人員有很多互動；有時跑給他們追，有時候跟他們套交情，還有時候會跟他們辯論，要他們說清楚，我們到底哪一頁、哪一行、哪一句違法了。

印象深刻的是，警總每次來查禁時，公文都已經蓋好章，但內容空著隨他們填，不然就是寫一些含糊籠統的查禁原因，例如「影響民心士氣」、「違背發行旨趣」等。我當時就覺得很奇怪，雜誌都還沒印出來，他們怎麼就知道我們「影響民心士氣」、「違背發行旨趣」？好像變成事前審查了，根本就是亂禁。

堅守新聞原則被批放水

也因為政府查禁沒有標準，創辦《自由時代》、後來自焚的鄭南榕就認為，政府既然亂禁，那麼黨外媒體乾脆就亂寫，主張：「你亂判，我叛亂。」不過我還是認為，媒體還是應該守住最基本的新聞專業，還是應該力求事實，畢竟我們不是在搞政治，只是想當好記者。不過這樣卻也招來其他黨外人士的批評，引發黨外雜誌的路線爭議。

當時黨外雜誌大致可分為兩派：一是行動派，例如《美麗島》與黨外政治活動結合；而我們八十年代主張言論報國，伸張的是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不搞政治活動，算是比較堅守新聞原則派，卻被

說是「放水派」。別人會取笑我們：「現在是戒嚴時期，還有什麼客觀可言？還談什麼新聞專業呢？」

不過，我認為世界上沒有百分之百的新聞自由，很多新聞自由的國家，媒體也有很多事情不能報導，不能把所有新聞禁忌都推給大環境。

我們堅持，辦黨外雜誌的人就好好辦雜誌，搞運動的就專心搞運動，不要混在一起。八十年代當時以繼承自由中國自由主義香火的使命自居，並致力於延續台灣政論的民主運動思想。那時佘紀忠還曾告訴我，他很肯定我們走「體制內」、「溫和改革」的路線。

「台北耳語」小方欄形成風潮

我們雖在黨外陣營中受排擠，但八十年代卻是同期的黨外雜誌中辦得最好的。我們的寫作陣容擴大，囊括黨外作家、學術界、文化界人士；並擴大討論議題的範圍，包括政治、社會、藝文、國際、大陸議題。

八十年代透過學界的協助，介紹法蘭克福學派、新舊馬克思派別等許多思潮辯論，辦得有聲有色。當時警備總部發言人還算坦率熱情，曾經幾度跟我們辯論這些學問，但是他讀的書實在不夠，只知道批評馬列主義，不知道當代思潮。當時總政戰部主任王昇說自由主義、存在主義、實證主義、共產主義是台灣的四大思想毒素，這些人就認為我們介紹的思潮裡暗藏「毒潮」，眞是令人哭笑不得。

除此之外，八十年代也創造了小道消息的政論價值。當時我每天都要在外面喝咖啡，各種奇奇怪怪的人，都會給我一些消息；後來我學習美國的《華盛頓郵報》，用小方欄的形式，把政壇的內幕消息登出來。由我執筆的「台北耳語」，以比較簡潔的筆法、犀利的用語，報導與評論政界的漏網消息。一開始寫兩、三篇，到寫一整版，後來愈寫愈多，欲罷不能，大部分都用這個形式寫文章，後來在新聞界逐漸形成風潮。

司馬文武（右）與康寧祥（左）曾經三度合作。此張照片攝於1986年11月30日。（中國時報提供／中時攝影

我很清楚，我們這種主張言論報國的路線，容易被批評是軟弱、狗吠火車；但我不認為黨外媒體與黨外政治活動的結合，就能讓民主自由水到渠成。畢竟爭取民主不是一蹴可及，而必須在這個社會文化中，一點一滴累積民主的本錢。

主流媒體與新聞學界令人失望

我在辦黨外雜誌時，主流媒體每次報導警總查禁新聞，所表現出的嘴臉和笑容，好像政府已經反攻大陸成功的樣子，令我感到非常不屑。聯合報當時有幾個非常反對台獨的急先鋒，文筆又特別好，整個報社一面倒，對黨外喊打喊殺。中國時報也許比較自由派，也許比較投機，跟黨外人士比較有關係和往來，相較之下寫文章會手下留情一點。

有時候聽到中時或聯合的記者，批評黨外雜誌的報導不客觀，我就很想反問：為什麼黨外雜誌就不能客觀，中常委辦的

報紙就可以客觀？而且我也是時報體系訓練出來的，爲什麼以前我客觀，現在我就不客觀了？

當時傳播學術界更是令人失望，不但沒有一位學者站出來，幫黨外雜誌說句話；更糟的是，有些學者根本就是國民黨文宣系統中的人，完全就是爲國家發展主義喉舌，合理化政府查禁黨外媒體的行爲。當時甚至還有學者，引用美國記者揭發「水門案」的「負面案例」，指出媒體報導「無論是不是事實，都不應該動搖國本」，這些論述眞的是令人瞠目結舌。

政府則經常找新聞學者發表評論，說雖然應保障言論自由，但也應顧及社會風氣。如果那些學者看過我們的雜誌，再來提出批評就算了，偏偏他們連看都沒看過，所以他們的主張很難令我們服氣。

「地下新聞局長」

戒嚴時期因爲政治環境的限制，台灣無法產生眞正的報人，所以我們只好透過黨外雜誌這種小眾傳播媒體，側面衝擊台灣的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回顧八十年代等黨外雜誌的發展歷程，我想，我們成功結合了學術界和新聞界，提升了黨外運動的理論和文化水平，在社會上和政治上建立了一定程度的聲譽。

當時我算是黨外媒體工作者中，少數英文比較好又是記者出身的，因此專門負責接待國外的記者。國外的記者來到台灣，跑完政府單位之後，幾乎都會來找我；我會帶他們認識在地的台灣，並且傳達黨外的消息，當時還有人說我是「地下新聞局長」。

也是那個時候開始，透過與國外記者的接觸和互動，我才學習到西方新聞界的專業概念和寫作方式。我那一輩的人，剛好是在地人裡，第一代受完整教育、會寫文章的人；在我們之前，沒有什麼典範可以參考，只能靠自己摸索。而這些外國朋友，則爲我們帶來許多西方的新聞專業概念。

八十年代雜誌的後期進來很多人，像是李旺台、陳浩、洪健隆、陳銘城、徐璐、廖福順等等，很

多都在台灣媒體界待很久，而且扮演中流砥柱的角色。那時候大家都對新聞充滿熱情，想要做很好的記者。這些人才因爲八十年代因緣際會聚在一起；多年後，要搞政治的都去搞政治，不搞政治的，就留下來變成新聞人。

太太工作受到影響

在黨外陣營時，我還很年輕，追求充滿刺激、理想、使命感的事物；環遊世界回來，又充滿正義感、好奇心，天不怕地不怕，但是窮得要死。自己很過癮，爲追求理想，都沒想到家裡怎麼生活。

那時候我幾乎沒有朋友，東海大學的同學，大部分都是生意人；政大研究所的同學，幾乎全部都在黨部。至於新聞界的朋友，也不喜歡跟我來往；唯一有往來的就是外國人，因爲我需要他們幫我從國外帶資料來台灣，作爲我撰稿和報導的材料。

我在辦黨外雜誌，太太當然提心吊膽，所以有時候有些危險的事情，我都不敢跟她講，怕她擔心。太太一路走來，始終含辛茹苦陪伴。她原本在海員工會工作，因爲我的關係，本來是幹事變成助理幹事，後來變成雇員，再變成臨時雇員，最後就待不下去，因爲當時工會都是由國民黨黨部控制。

後來我仔細觀察，發現很多黨外人士，都是生活過得很好的中產階級。從黨外到民進黨，很多農工階級跟著走；但事實上，領導階層都是中產階級，所以基本上都是保守派、既得利益者，不可能眞正激進。那些領導階級的人，都是心有餘裕才參加。我才開始體認到，自己絕對不能搞政治，人家都是什麼身份、什麼條件才去搞，我根本什麼條件都沒有。

失業陣線創辦新新聞

一九八七年，終於盼到了解嚴。解嚴以後，忽然覺得解放了、大功告成了。原本以爲自己從此可以安居樂業，不需要做黨外雜誌這些辛苦的工作；但是想要轉行爲時已晚，別的工作機會已經不多，只好就一路在新聞工作裡努力，希望能對自己的人生有所交待。

剛解嚴時，內心多少也有點惶恐，擔心將來失去使命感，沒有解嚴當奮鬥的目標，要找別的目標才行。於是開始關心司法獨立、司法改造、議會改革；也曾規畫可以做很多社會運動、監督政府上軌道，或是怎麼處理貪污的議題等。

其實，我認爲在美麗島事件和林宅血案之後，台灣新聞工作者就沒有眞正的危險了。除了鄭南榕自焚以外，沒有幾個人因爲政治而死亡的。戒嚴時期其實是有驚無險，很多人愈講愈可怕、愈講愈勇敢；其實，沒有那麼可怕。也許也是當時不知道害怕，只覺得驚險刺激，要發揮自己的冒險精神和實現理想的使命感。

解嚴後隔年，我與周天瑞、王健壯、王杏慶（南方朔）共同創辦《新新聞》（當時還有胡鴻仁、徐璐、廖福順等人）。我們四個人會湊在一起，因爲剛好都是在中國時報出問題的人。周天瑞離開中時後去了美國，但沒有工作；王健壯那時候想要出國念書，已經不想待在中時；王杏慶那時候也因與黨外走得太近，沒辦法在中時再待下去。我們就是失業陣線聯盟，也算是「時報退除役官兵」，我是主委，因爲是最早離開的。

那時因爲「黨外」已經變民進黨了，黨外雜誌功成身退，所以我們希望，台灣能夠有一個比較專業的新聞雜誌。當時各報的言論還沒完全開放，大部分報導還是綁手綁腳；剛好遇到很多社會運動、遊行、蔣經國過世等重大事件，我們正好充分發揮新聞經驗，新新聞創刊初期，就靠新聞專業打下基

礎。

辦雜誌，是爲了想要辦報；當時我們聲稱：「要爲自由報業做先鋒，第一步辦週刊，第二步辦報紙。」我們自認是台灣最好的新聞人才，媒體界裡，我們應該算是最資深、最有經驗的，認爲既然財團可以辦報，沒道理我們辦不到。當然，後來才發現，辦報不是那麼簡單，有很多營運和通路的問題要處理，不是寫好文章、印出來，就可以辦報了。

首都早報的「幹」字頭版

在創辦新新聞一年之後，康寧祥要辦《首都早報》。他找我去，因爲那時候他還在當立法委員，我認爲政治人物不應該辦報，所以一開始沒有加入。一九八九年他下台之後，我於是答應到首都早報擔任總編輯。

以前我對辦報充滿幻想，認爲只要給我辦報，我一定可以改變很多事情。在首都前後短短一年的時間，我在社長兼總編輯任內，算是落實了自己辦報的理想。例如雖然我同意台灣主體性很重要，仍停掉台獨言論版，因爲大眾媒體應該更加言論多元；此外，我們還推出軍事版和媒體觀察版，實現很多新的想法。

一九九〇年，李登輝總統提名郝柏村任閣揆，反對聲浪四起。好不容易解嚴，結果國民黨政府竟然找軍人組閣，我們完全無法接受。我們在首都早報的編輯會議上，一直在想頭版頭條要怎麼處理：只想要放上一行字，是要用「痛心疾首」好？還是「痛不欲生」好呢？

截稿時間到了，突然有人說：「幹！還有比『幹』更能表達內心的憤怒嗎？」想了一陣子就決定用這個字，完全表達我們心中的憤怒和自然反應。第二天，頭版全黑，只用「反白」寫上一行字：「幹！反對軍人組閣！」後來當然引來很多批評，包括女性團體認爲「幹」污辱女性。我們的回應

是，「幹」是一個感歎詞，不是動詞，所以也沒有受詞；只是憤怒、無奈之下，發出感嘆的聲音。

從首都關門到台日發行人

辦首都時，有個天眞浪漫的想法，不想被財團跟政客所控制，所以沒有大老闆，由六十幾個小股東組成，以爲這樣最獨立，不會被控制。結果碰到問題時，才知道這是最愚蠢的作法，因爲報紙出問題時沒有人願意負責，後來就撐不下去了。我才瞭解辦報的爲什麼都是財團和家族企業，因爲不管賠或賺，要一直投資才辦得下去。

解嚴前後的媒體環境已經大不相同。戒嚴時期，媒體要爭取言論和新聞自由；現在講究的則是企業行銷，面對的問題跟以前完全不一樣。以前有理想、有主張、有才氣，就可以好好發揮；有一些雜誌沒有讀者，原本快辦不下去，一被警總查禁之後，就變成英雄，雜誌大賣。現在沒有人要查禁，媒體自己辦不下去就

1990年5月3日，《首都早報》頭版。

只好關門了。

首都早報在一九九〇年八月緊急停刊，主要是因爲資金和經營問題；諷刺的是，停刊後三個月，我們得到金鼎獎公共服務獎。

後來我回到新新聞，另一方面受《自由時報》社長顏文門之邀，在自由擔任顧問，以「賞邊」爲筆名，寫「觀察站」專欄。顏文門當時主管編務，放手讓我用小方塊的形式寫文章。現在各報的小方塊，就是從當時開始的。不過現在小方塊的政治味太濃，應該多寫文化、歷史、人生的事情，不要總是那麼沉重。

一九九六年前後，顏文門得到王永慶的銀行保證，從軍方手中接下《台灣日報》，我應邀擔任發行人。當時我們把中部的人才都號召過來，自認爲是當時報界最沒有包袱的陣容，想要改變台灣的報紙生態。但辦報還是得視出錢的人的心態，究竟是要讓專業辦報，還是有其他目的？辦報者是否具有經營和專業能力，也都會影響報紙的品質和路線。

英文台北時報投注最多心力

離開台北時報後，我在自由時報老闆林榮三支持下，創立了英文《台北時報》——《Taipei Times》。

我觀察全世界，幾乎每一個國家都有代表性的英文報紙。但在台灣，過去兩家英文報紙的名稱都是「China」，即《China News》與《China Post》；我認爲一定要定位在「Taipei」或「Taiwan」才能爲本地發聲。就是這樣一個盲目的想法和使命感，我準備了六、七年，一心一意想要辦一個可以爲台灣講話的英文媒體！。

《Taipei Times》是我花最多時間、投注最多心力籌備的報紙。我們寫了一大箱的計畫書，還到各

國招兵買馬。一九九九年，終於成功創刊，我擔任發行人。不過，我們創刊不久後，《China News》突然改成《Taiwan News》。令我錯愕的原因是，原本我建議他們改名字，我就不必辦報了，當時他們說不能改；可是我辦了新的英文報，他們就突然改名。

當時《Taipei Times》也做出不錯的品質和成績，國外想瞭解台灣的消息，平面媒體大多透過《Taipei Times》。事實上，不只台灣問題，我們也是全世界研究中國問題的權威，談中國問題，我們應該最具代表性。

不過，花最多心思籌備的報紙，卻也最讓我感到疲倦。當時報社老闆對英文報的概念很薄弱，常要我節省資源，直接把中文稿翻成英文就好；還叫我把英文報辦成語言學習的刊物，看能不能刺激銷售。另外，每天我也得處理國外的稿費，眞的是焦頭爛額。當時又遇到我太太癌症末期，那時候每天內外煎熬，我開始愼重考慮，是否要暫時離開新聞圈。

陳總統就職演說共同起草人

從戒嚴時期一路走來，其實我對國民黨沒有很強烈的不滿，因爲我的同學大部分都在國民黨做官，我知道國民黨沒有那麼壞。只是，那麼多好人在國民黨做官，爲什麼整個黨所表現出的成果那麼差呢？顯然是制度問題，因此我認爲國民黨應該被輪替。

民進黨在兩千年的總統大選中獲勝，當時我還在《Taipei Times》，當然很興奮。後來陳水扁總統找我，協調五二〇就職演說撰寫，我們就把阿扁提到的專家，都請教過一遍，整理後，寫出讓大家對民進黨有信心的就職演說草稿。

其實，我們的草稿中並未提出「四不一沒有」，那是後來阿扁和幕僚加上去的。不過要如何處理兩岸關係，確實是當時較大的挑戰。當時北京問阿扁：「你是不是中國人？你跟中國是什麼關係？」

我們一直在想辦法回答這個問題。

當國安會副祕書長滿足好奇心

一九八六年民進黨成立，我並未如外界所預料加入民進黨，而是留在媒體，成為眞正的「黨外」。但兩千年民進黨取得執政權時，我卻答應進入國安會，擔任副祕書長一職。很多人對於我的決定感到詫異，我之所以會答應，其實只是單純因為自己對外交的興趣。

我長期在國外跑來跑去，關心的都是國際事件、歷史、情報、軍事，但以前都沒有機會深入瞭解。國安會這個工作，剛好可以滿足我的好奇心。以前當記者，時常愈做愈心虛，因為很多國際消息，我總是只看得到表面，老是覺得寫得無關痛癢。經過國安會的經歷，現在看那些外交消息、軍事情報、兩岸關係的發展，終於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2000年，司馬文武擔任國安會副祕書長時發表談話。
（中國時報提供／黃子明攝）

也是在國安會的那段期間，讓我回顧自己在戒嚴時期的來時路，開始理解軍情人員的職業特性和角色。我跟很多

國家的情報安全人員見面，看到冷戰時，很多國家的發展軌跡都跟台灣都一樣。

有些人質疑我從記者轉而從政，可能有角色上的衝突。然而，在國安會期間，我完全不與記者往來；人常在國外，工作內容無關國內政治，不寫文章，也不需要對外發言。我既然在政府部門工作，沒有權力、也沒有立場在媒體上寫文章，批評自己的工作職責。因此那四年在國安局，並不會讓我面臨政媒兩棲的角色衝突。

不過，記者有一種特質，就是路見不平時，會很想要行俠仗義，把真實的一面呈現出來，或想辦法點出問題的癥結。然而，在官場若想升官，講究的是「忠誠至上」。像我這種記者的性格，常常想把真話說出來，難免就會批評到別人；即使我不批評，人家也知道我有不同意見。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就不可能身處核心，核心一定要毫不猶豫地效忠，一旦想客觀就出局了。

只要我敢寫，蘋果就敢登

二〇〇四年，阿扁雖然連任成功，但我並未繼續留任國安會。在我離開媒體的這四年，台灣媒體已經各自在藍綠陣營中就位，政治立場的鮮明程度，讓我感覺好像找不到回家的路。

離開國安會後，《蘋果日報》邀我擔任顧問及專欄作家。我原本就認識蘋果的老闆黎智英，他對知識份子非常尊敬，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也信仰自由經濟、自由市場。阿扁當選以後，他對台灣很有信心，把香港的事業移到台灣，讓我有點感動。

我告訴黎智英，我不要任何頭銜，只要寫文章就好了。他不限我寫什麼，還對我說：「只要你敢寫，敢署名，我就敢登。」不管國內、國際，政治、歷史、文化議題都隨我寫。天下還有比這更好的事情嗎？我想我一輩子的理想終於實現了，於是欣然答應進入蘋果，固定撰寫「司馬觀點」。

當專欄作家最過癮

當專欄作家是天下最過癮的事情，可以主張理想、推銷正義，但自己都不必做。

要寫出好評論，我認爲最重要的是讓讀者易懂。因此寫作時，可以先誇大，然後再簡化，若可以講一個故事就更好了。目的就是要把事情弄清楚，想辦法用有趣的比喻方式，把大家不瞭解的事情講得清楚，英國的《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是很好的寫作範本。

其實，站在媒體角度看政治或社會，多數時候都會採取批判立場，即使是我熟悉的民進黨執政，我寫文章大多仍是批評。不過，我的專欄就比較不會全然批評，而會進一步分析政策有多少選擇，分析哪個選擇會比較好。

另外，我也認爲，批評不代表永遠都要站在對立面。若媒體要當「永遠的反對黨」，應該是所有政黨都要批評，而不是爲了反對執政黨，就同情在野黨。提出批評，必須就事論事，用一個價值觀念一以貫之，否則寫不了好的評論。

新聞寫作要能降低讀者痛苦

我觀察國外的新聞寫作方式，常常一篇文章就能讓讀者瞭解來龍去脈，用一個主軸就能呈現多個觀點。英國作家歐威爾（George Orwell）曾指出，政治評論寫作是一種藝術，廢話少說，簡單扼要；要想辦法減輕讀者的痛苦，等於是賣東西給顧客一樣，要思考：「讀者爲什麼要看你的文章？」「看完會得到什麼？」

反觀國內新聞，時常看七、八篇文章還看不懂發生了什麼事，每篇都是分散的、甚至還有矛盾的。記者好像假設所有人都閒著沒事，每天都會仔細看各家報紙，所以一、兩天沒有看報紙的人，根

本就看不懂。事實上，新聞寫作，必須要讓讀者一目了然，這才是大眾媒體。

國內報紙被賦予很多奇怪的使命，也繼承了莫名其妙的傳統。報紙不太像正常的報紙，好像是學術刊物、文壇、詩壇報紙；很多艱澀、學術性的文章也登，國際問題寫得非常深奧，科技文章也讓讀者看不懂。我們常忽略了，想在報紙上發表文章的人，要有能力寫出大眾看得懂的文章；有學問的人，不一定能寫。

每天截稿之後都會後悔

其實，我每天寫完評論之後都會後悔，總是會在截稿後，想到怎麼寫會更好，但是來不及，所以只好隔天再寫一篇。我不相信光用一篇文章，就可以解決、回答或解釋所有問題，一篇文章能夠有一、兩個觀點，會讓讀者得到衝擊或啓發，就非常足夠了。

那種「寫一篇文章能造成很大影響」的時代已經過去，我只能期待，累積很多、很久的作品後，自己的風格、價值觀念、基本原則，會被人認爲是可靠的。

媒體影響力跟新聞自由一樣，是屬於集體的。新聞自由，向來就不專屬於特定的報紙或記者，而屬於整體新聞環境。影響力也是一樣，是整個媒體環境共同創造、享有、承擔的。現在這個時代，資訊太多，影響力難免被稀釋。同時，我們也要體認自己沒有比別人高明多少，只是有能力、技巧和機會表達出來而已。

記者是個正當行業嗎？

在不同國家，記者往往擁有不同面貌。落後國家的記者都是知識份子，爲了理想和使命感而奮鬥，所以記者被賦予很重大的責任。但在自由民主開放的社會，記者是專業的記者，知識份子就是知

識份子。台灣戒嚴時期記者都是知識份子，沒名沒利，所以後來一有機會，就跑去做官或教書。直到現在，台灣才開始有「專業記者」的空間。

我曾經自問：「這眞的是個正當行業嗎？」這一行每天歸零，幾乎沒有累積；即使我曾寫過很好的文章，如果今天寫爛了，之前好文章就不算數。記者可以批評別人，但是也常被別人罵得要死。所以，很多記者都做不久。

但是，記者做久了，會慢慢培養出特殊的職業個性。好記者可以是好的外交官、溝通者，會知道怎麼找資料、怎麼請教別人。記者很容易打交道，容易適應各種環境，穿衣服不會太正式，講話不囉嗦，而且不會搶著講話。頭腦還要很靈活，每天接觸不同的人，看起來懶懶散散的，交稿時卻很有效率。

全世界都一樣，好記者用聞的就知道。好記者都一定有點正義感，有點作家、藝術家的浪漫個性，爲了觀察人生，瞭解眞理、眞相，可以放棄一切。但記者大部分都是沒有錢，不會變成有錢人；因爲作息不固定，所以腸胃也要很好才行。

記者的價值與意義

記者是「公共服務業」，沒有別的行業，是專門伸張正義、主張理想的。這是這一行最特別之處。一般人關心自己就來不及了，但記者就跟政治家一樣，專門關心別人的事情。

記者專門關心別人的事情，但自己呢？時常是累得要死，充滿挫折感，薪水又低，成就難以累積，影響力也不知道在哪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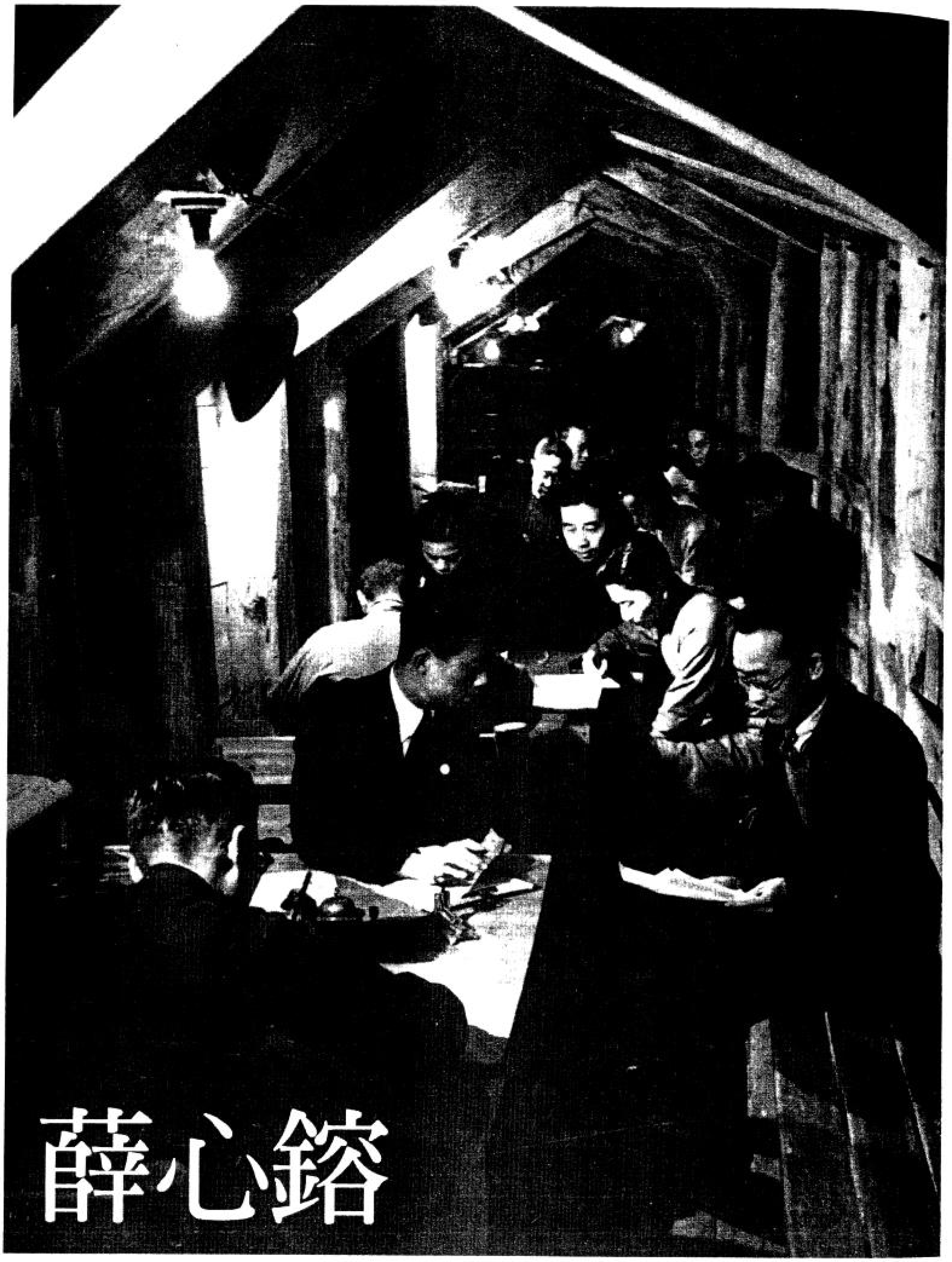
然而，仔細看看我當年的同學：做生意的，現在不是身體健康出狀況，就是家庭有問題；當教授的，幫助年輕人成長，自己卻不見得有成長；跑去當官的，想要出頭煞費苦心，就算當了政務官，但

沒有任期保障，一下子位子就沒有人；當公務員的，一輩子在公文堆中打轉，又能得到什麼成就感？

到這把年紀，要總結算的時候，才知道成就感不是看那些外在的條件，而是自己內心感覺得到，自己曾為這個社會，做了什麼比較有意義的事情。這樣想起來，當記者能夠維持生活的品質，也能夠持續學習，不會輸其他行業多少。

我從一九七二年開始當記者，算一算，如果這不是個正當行業，我也已經當了三十五年的記者，這樣講起來真是嚇人！

◎初稿：陳文信
◎修訂：洪貞玲
◎定稿：何榮幸、司馬文武
◎訪問時間：二〇〇七年五月二日、五月十一日、五月十六日
◎訪問地點：台大新聞所攝影棚



薛心鎔

089　薛心鎔　大陸來台的愛國媒體人

薛心鎔

〔第二章〕

大陸來台的愛國媒體人

一九五〇年大華晚報創辦人

前頁圖說：
民國32年薛心鎔出校後，第一份新聞工作在中央通訊社總社（重慶）任學習編輯，在防空洞內編輯（右側第二人）。（薛心鎔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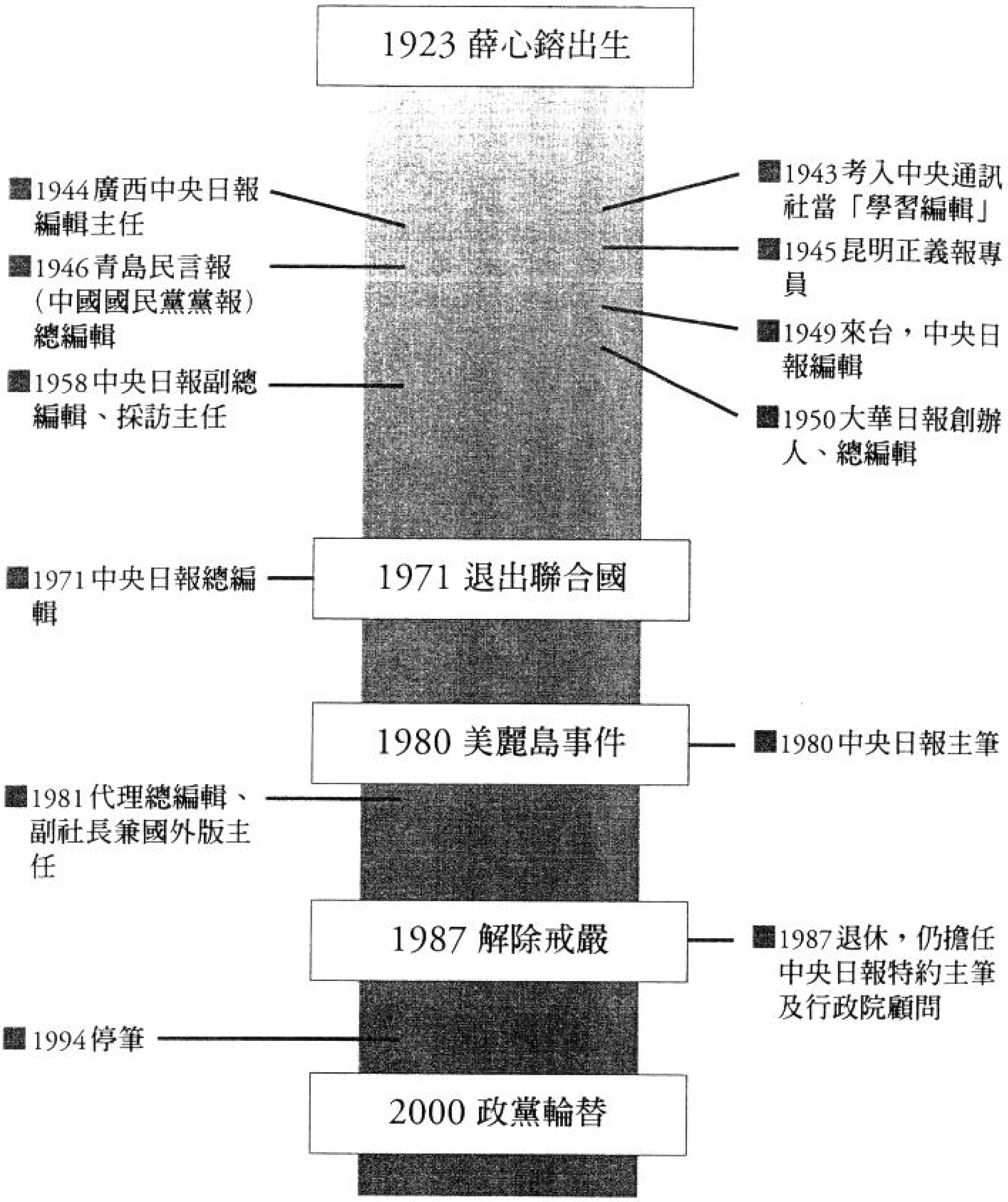
把時間拉回一九四九年實施戒嚴、一九五一年實施報禁年代，跟隨國民政府來台的大陸資深新聞工作者，已在台灣新聞界扮演重要角色。在戒嚴、報禁中間那一年創辦《大華晚報》的薛心鎔，正是戒嚴初期媒體發展的最重要見證者之一。

訪問一開始，薛心鎔就直率、客氣說明，他對我們所列的採訪題綱有不同意見：他認爲台灣新聞經驗不能割掉大陸經驗；不應預設立場使用威權、白色恐怖、高壓等不超然用語。他並強調，他在任何位置上都忠黨愛國，忠黨只是憑藉，愛國才是目標。儘管如此，他仍逐一回應所有問題，我們相當尊重他的看法。

任何新聞工作者都無法自外於時代氛圍，這位被《中央日報》後輩尊稱爲「永久的總編輯」的資深媒體人，始終用一種堅定態度，傳達他那一代新聞前輩在大時代動亂下的愛國心志。不論從那個角度，你都可以讀出他對於新聞工作的看重，以及歷經軍閥割據、北伐、抗戰等鉅變所型塑的濃厚生命情懷。

在黨營媒體當了一輩子編輯的他，看到任何錯字、標點有誤都會覺得刺眼，這種嚴謹人生態度，讓他自嘲「連寫情書都像是在下標題」，當過編輯的人必然對此會心一笑。能爲八十多歲的他留下新聞生涯紀錄，我們感到非常欣慰……

薛心鎔大事記



1923 薛心鎔出生
1943考入中央通訊社當「學習編輯」
1944廣西中央日報編輯主任
1945昆明正義報專員
1946青島民言報（中國國民黨黨報）總編輯
1949來台，中央日報編輯
1950大華日報創辦人、總編輯
1958中央日報副總編輯、採訪主任
1971中央日報總編輯
1971 退出聯合國
1980 美麗島事件
1980中央日報主筆
1981代理總編輯、副社長兼國外版主任
1987 解除戒嚴
1987退休，仍擔任中央日報特約主筆及行政院顧問
1994停筆
2000 政黨輪替

一甲子的信守與體驗

人生目標讀書報國

我出生在北平，小時候連報紙都不普遍，想要看報還得到街上去看貼出來的報紙。打我十歲開始就很喜歡看報紙，當然那時沒有想過要當個記者或是編輯，但是總覺得人生的目標就是讀書報國。

當時我父親參加國民黨，認識一些新聞界的朋友，那些朋友看來都是磊磊落落的，個性很豪爽，滿口正義打抱不平，我看到他們就覺得很羨慕，把新聞工作看得很高，也不敢奢想自己將來能做新聞記者。

在我高中畢業那一年，看到報上有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辦新聞專修科的招生廣告，就去報名了；當時的錄取率是十分之一，進入政校是不容易的。所以我認為自己能踏入新聞這個領域完全是機會，小時候從沒想過會進這一行，也沒想到進了這一行就做了一輩子。

我父親雖然在黨裡工作，可是那時國民黨分成了三派：胡漢民、汪精衛和蔣中正，父親一直都是跟著胡漢民的，一生都在倒蔣。我到政治學校去念新聞，並沒有先徵求他的同意，他曉得以後覺得好笑，父親倒蔣，兒子卻做了蔣的學生。但他也沒有攔著我，他說這個行業很新，也很鼓勵我去念新

聞。

戰時的新聞教育

國民黨政治學校是今天政治大學的前身，當時辦了新聞系，就是要培植人才辦報。校長蔣中正召見從密蘇里大學受新聞教育歸來的黨校（政校前身）學生馬星野，要他來辦新聞教育。我是馬先生的學生，覺得他有兩個特點，第一是他秉承西方新聞自由的精神；第二就是他仍以中國爲根本。「新聞記者責任重，立德立言更立功，微言大義春秋筆，誓爲民族最前鋒。」這是他爲政校新聞系所作系歌中的話，我覺得很能顯示出馬先生的理念。

不過，戰時辦教育其實是很簡陋的。我們那時學的新聞科目大概就是新聞學、編輯、採訪等。新聞學是馬星野先生教的，相當紮實夠份量；但是像採訪課的老師，他是上海《申報》的採訪主任，也是個老報人，上起課來卻慢慢吞吞的，我到現在只記得他說，你們出去採訪，要記得帶個被單，因爲外邊兒的旅館不乾淨，你帶個被單就方便多了。至於編輯也根本沒有講到報社裡編輯的過程，更不要說能摸到報社的鉛字版了。

但是，當時讀書風氣很濃厚，因爲學校在山裡邊，學生放假也沒地方去，就留在學校裡念書、自修。而且因爲戰亂，大家都希望能救國，像我們念新聞的，所想的就是文章報國。我覺得政治學校給我的新聞教育，最大的成就不在新聞學術，而在做一個新聞記者的精神與抱負。

走上編輯之路

我在政治學校讀書時就立定志向，因爲內心對報紙較感興趣，希望自己將來在報社工作。

從小我在國難的氛圍下成長，一心想爲國家做事，就當時報紙的規模而言，我覺得當編輯較能施

展所學。那時因為紙張生產與印刷能力都有困難，報紙的篇幅有限，內容只能注重國內外要聞，稿件多由「中央社」供應，自己採訪的不多；加以交通電信不像現在這樣方便，社會不像現在這樣複雜，外勤記者也就不像現在這樣活躍。內勤編輯則是一個總其大成的構成者，負責為讀者調理每天的精神食糧；看著一份報紙印出來，是自己編的，會有一種難得的成就感。所以那時的新聞學生，最感興趣的是報紙的評論與編輯，看到一個精彩的新聞標題，都會競相傳誦，玩味不已；做主筆不是容易的事，大家的初步理想便是做個新聞編輯了。

因此，政治學校畢業以後，我就到設在重慶的「中央通訊社」總社實習，擔任學習編輯。所謂學習編輯就是練習生的別名，開頭做點登記的工作，給你兩條小新聞，也來標個題、看看稿子，等到能力夠了，就可升任助理編輯。

那時是戰爭時期，國際新聞相當重要，因為要瞭解各國對於當前戰事的態度，而中央社和國際各大通訊社訂約抄收英文電訊，轉譯成中文稿供給國內各報。所以中央社的地位自然而然非常重要，工作份量也相當重，社裡人手不夠，我雖然是學習編輯，卻照樣要頂用。實習三個月之後，經過考試，方才獲得正式任用。

中央社的鍛鍊

在中央社工作的這段經驗，影響到我日後做事很深的就是「仔細」，對正確性的要求很高，校對也很嚴格；另外就是工作負責的精神，在中央社是沒有請假這回事的，你若是不能來，就得自己找人代班。這兩點對我日後在新聞工作中的影響很大。

不過，我在中央社也還是出過一個錯誤。有一次中央社發國父誕辰紀念日的新聞，我卻不小心把標題標成了國父忌辰。隔天見報時，重慶《中央日報》就用了中央社的稿子，也沒把標題改掉，所幸

它這個標題不大。

那時老蔣先生看報看得很仔細，我不曉得他看到沒有，等到事後雖然沒有追究，我自己卻覺得很難為情；因為中央日報的標題會錯誤，是我在中央社把它標錯了。這給我的教訓很大，新聞工作的正確性，是一個字都不能錯的。

我在中央社待了一年，之後就到廣西中央日報去做編輯主任。

說起來也是機會使然，因為馬星野先生知道，我的興趣在報紙而不是通訊社。通訊社是供應新聞原料，而報社是把新聞組合起來，它有採訪、有副刊、有社論、有廣告，它是一個綜合性的新聞體，所以我更想到報紙工作。

那時恰好廣西中央日報需要一個編輯主任，跟馬先生要人。當時我差不多二十歲出頭，也沒編過報，只編了點通訊社的稿子，我就在馬先生推薦下到了社址在廣西梧州的廣西中央日報做編輯主任。

強勢的編輯人

廣西中央日報的編輯部很簡單，只有一個總編輯、一個編輯主任、兩個編輯、兩個記者。我還記得第一天交出標題給總編輯董品禎時，他也沒看我，就把我作的標題撕掉，另外拿一張紙自己作。我那個時候站在他旁邊，就像是學生跟老師學習。我看董品禎編報三天以後，我的標題就管用了，大概不出一個禮拜，我就很熟練了，而董品禎也就不再動我的標題。

以後不出一個月，我跟董品禎成了意氣相投的朋友。如果有人問我，你編輯的功夫是跟誰學的？我一定說是跟著董品禎學的。

董品禎是政校新聞班的學生，原為重慶中央日報的編輯；大陸淪陷後在香港任《星島日報》主筆，兼為《新聞天地》總編輯。他編報很仔細、能力很強、作風也很強勢，就算是社長也管不了他。

當時社長是徐詠平，也是政治學校的學生，對新聞、編報、寫社論都很感興趣，但不是學新聞的。有一回董品禎要出差，晚上社長很高興地拿著墨盒坐到總編輯的位子上去，董品禎看到了，桌子一拍就說：「編輯的事要心鎔來做，你要來做，我不走了！我不走了！」徐先生最大的好處就是很能包容，做一個機關的領導者這是很重要的，董品禎當面給他難看，他也能忍受，拿著墨盒笑嘻嘻地走開。

董品禎的作風，就是編輯部裡的事別人不能插手，身爲總編輯就該有自己的原則。我受他的影響很大，所以像我之後到青島做《民言報》的總編輯，甚至於到了台灣做《大華晚報》的總編輯，我的脾氣都是很爆的，對記者很凶，都是受了董品禎的影響。

二十二歲當總編輯

我在二十二歲那年，也是因爲機會到青島民言報擔任總編輯。民言報原來是日本人依照日本報館的規模所建造的，設備很新，戰後由國民黨市黨部接收，是青島第一位的報紙。

當時我年紀很輕，報社裡很多編輯、記者年歲都比我大很多，就覺得我只是個小孩子，也不太看得起我。

我們社裡有位主筆王仲方，後來他在台北大華晚報用「龍套」的筆名寫「河邊閒話」很受好評。那時他給我出了個難題，說他一週寫六篇社論太多了，叫我想想辦法，但人力緊縮，我也沒辦法再找一個主筆，所以就把這事攬在自己身上，跟他分了三篇來寫。另外並增加了短評，也是各寫三篇。我的文筆不夠老練，有時評論的見解不深，寫社論還差得遠，寫短評還算不錯。

當時民言報的版面沒有本市版和副刊，我把內容作了全盤調整，增加了這兩個版面，但沒有編輯可以來編，我就自己做。我白天寫社論編副刊，晚上編本市新聞寫短評，其他的新聞版面交給編輯主

擔任青島《民言報》總編輯時（中間著中山裝者）與編輯部同仁合影。（攝於民國37年，薛心鎔提供）

任王劍鵬處理，不過最後我要看各版的大樣。

我在民言報做的一大「德政」，就是讓編輯每個人每個月接連休息四天。那個時候一般都是一個禮拜休息一天，但我覺得這一天假毫無用處，頭一天熬夜，早上起來已經是中午了，還剩下半天，什麼事也不能做，於是我就給編輯四天連假。我這個辦法一實行眞是皆大歡喜，只是有個困難，就是一有編輯連休四天，代班的問題就產生了，而我解決的方法就是誰休息，我代誰。問題解決了，我自己卻一個禮拜七天都沒有休假。

所以我認爲，做最年輕的總編輯雖然有社內同仁認同的困擾，但也正因爲我年輕，所以很多事都依照自己的理想去做，這也算是初生之犢不畏虎吧。

那時民言報的出報時間是早上八點鐘，我做總編輯的第一天，六點鐘就出報，工廠的工人早兩小時下班；我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措施，只照著規格行事。所以工人都說這回報社來了個明白人。

之後我和大家相處得都很愉快，雖然一開始因爲我年紀輕受到輕視，但我沒有私心，一週七天都給了報社，人也住在報社裡，很快地就得到大家的信任與合作；儘管時局混亂，生活很苦，晚上大家在一起編報，卻覺得是一件快樂的事情。

電碼的小故事

我在大陸編報階段，新聞一直是用電報明碼來傳訊，政府撤退到台灣時也還在使用電碼，直到傳眞機出來才取代它。

電碼是用電波的長、短音來分，所以很容易出錯。我在政治學校念書時，編輯老師換了好幾個，其中一位是錢滄碩先生，他是中央社的編輯主任，電碼背得滾瓜爛熟。他曾告誡我們，將來做記者最好把電碼背熟，一來使用方便，二來自己也容易發現錯誤所在。

後來我到廣西中央日報做編輯主任時，一天收到中央社的電訊，譯電員譯出來是：張自忠將軍跟日本人打仗被圍自殺，日本人很尊敬他，把他的遺體送回來我們這邊。當時蔣委員長親自到重慶江邊迎靈，並表揚他忠烈千秋，把他的遺體葬在重慶外邊兒叫作北碚的地方，把他殉職的地方「宋埠」改名自忠縣。

這「宋埠」二字是電碼傳來的，我看到時心裡覺得怪怪的，沒聽過這個地名，就去查了資料，一查才發現張自忠將軍殉職的地方是湖北省的「宜城」。電碼錯了一碼，錯在部首相同，所以我就把它改正過來。以後我看各地舊報，發現登的都是宋埠，大家抄收同一電訊，能否發現錯誤，就要看編輯的功夫。

另一個關於電碼的小故事，是抗戰勝利時我在昆明《正義報》做編輯，一天收到中央社的電文，說政府發表接收台灣的中央大員名叫陳典。而我一看就感到疑惑，因爲陳典這名字不見經傳；而且在這之前已經有傳聞說接收台灣的是陳儀，所以我一看就說應該是陳儀，是這個新聞稿的電碼錯譯成陳典。

那個時候昆明有六、七家報紙，只有兩家報社沒有登錯，一家是我做編輯的正義報，另外一家就是中央日報。當時中央日報的社長是錢滄碩先生，正是教我新聞編輯的老師，特別強調要背電碼。

這些小故事告訴我，就算是小的地方也不能馬虎。新聞的要求就是正確，要做到一字不錯，唯有仔細地查證檢驗，一點都不能輕忽的。

「路偷社」與「何大使」

在大陸混亂階段，因爲交通不便，記者的採訪有其困難度，當時就流行偷偷截收京滬大報館的新聞電訊，變成自己的專電，那時就叫這是「路偷社」的消息。

當時南京中央日報的規模很大，編輯、記者可以運用的資訊也比較多，所以他們的電報常常被別的報社截走，本來是個獨家新聞，變得各報皆知。

有一回南京中央日報就出了個主意，那時是抗戰結束後，國共關係很緊張，而美國也想做兩面外交，就有傳說我國駐美大使要換人，南京中央日報故意製造個假電訊，說駐美大使要換成「何錦章博士」。當時我在青島民言報做總編輯，我們報館也截到了這則電訊，問我要不要登，我說不要發好了；因爲駐美大使是很重要的位置，應該是個很有資歷的人去做，卻從未聽說過何錦章博士這號人物，所以別發好了。

隔天見報後，果然很多報社都登了駐美大使要換人的消息，南京中央日報的人看了很得意，說其他報社都上當了。

之後我到台灣來在中央日報工作，才知道何錦章原來是中央日報工廠的工務主任，他們那時拿他的名字來開個玩笑，「何大使」自此也成爲何錦章的綽號。所以從這小的地方可以看出來，新聞對正確性的要求，縱使有實際上查證的困難，也要依新聞判斷眞實與否，而不是人云亦云。

大公報社論開天窗

由於當年大陸長期動亂，從軍閥時期、北伐時期到抗戰階段，全國動盪不安，在那軍高於政之際，新聞自由是難以充分發揮的。抗戰時期政府設置「戰時新聞檢查局」規定新聞要受檢查，這種情況並非是中華民國獨有，各國在戰時都是如此。

除此之外，重要的中外新聞都由中央社供應，而這也都是經中央社過濾後的新聞，換句話說，有點兒檢查的作用，但不是很嚴，還是有照新聞的原則處理，這和新聞檢查局的強制規定是不同的。

那時候民營的報紙是以《大公報》爲主，另外共產黨也在重慶出了自己的報紙——《新華日

報》。新華日報的內容常常是檢查不過的，而他們對於沒通過的稿件也不換稿，就讓它在版面上開天窗，有種挑釁政府的味道，讓大家知道政府在查扣新聞。

有一回，大公報的社論也開了天窗。這是不得了的大事，因為大公報是當時聲望最高的報紙，它的社論為各方所看重。

事情的經過是，有一天大公報寫了一篇社論被新檢局查扣了，文章內容是法國沒有打仗、就把殖民地越南雙手奉送給日軍占領，有一批法國的殖民官員撤退，取道中越交界的鎮南關；我們當時和英、美、法是同盟國，自然接受法國人入境。不過法國殖民官員的氣燄還是趾高氣揚，進到我國境內，和鎮南關的我國官員起了衝突，我方官員氣不過就揍了他們一頓。大公報的社論就是評論這件事，認為打得好，打的就是帝國主義者的腦筋。

這篇社論新聞檢查局看了也很痛快，可是卻覺得不好刊登，因為我們畢竟和法國是同盟，還需要外國的援助，所以不得不壓下這篇社論；但又礙於大公報的聲望高，若是讓它的社論開天窗，一片空白，會引起社會的猜疑，最後就保留了「打得好！」的標題。

這是大公報唯一一次開天窗，但它的社論內容還是流傳出來。那時我在政治學校念書，馬星野老師就請新聞檢查局的局長李中襄來演講，他也說社論內容寫得好，但法國是我們的盟國，所以不宜於刊登，這是迫不得已的決定，但是正義是不容抹煞的，所以內容仍讓它流傳於市。

白手起家辦大華晚報

在我的報業工作中曾待過五家報社，從大陸到台灣，每一次轉換的過程都是機會使然，我自己從來不會特意要去謀求什麼位置。

政府撤退來台後，我繼續在中央日報當編輯，編國際新聞和副刊。有一天，中央日報副總編輯錢

震對我說：「大家想辦一份晚報，想找你做總編輯。」就這樣，我在《大華晚報》做了八年，完全是從白手起家開始做起。

在大華晚報的第一年，我完全沒有支領薪水，一來是當時我在中央日報還有職務，有一份收入；二來大華晚報還沒有基礎，財務困難，我做的事情都不取報酬。直到一年以後，我離開中央日報，正式在大華晚報工作，才開始領薪水。

我在大華做了八年，漸漸地在工作上和社長、董事長有欠融洽。我那個時候自主性很強的，編輯部的事情，別人都管不了我。當時社長是我的學長，也是老記者、老編輯，經驗豐富得很；董事長李荊蓀更是個出名的人物，他們都不能插手我的編輯部，慢慢地我就成了他們的一個障礙。

等到大華基礎愈來愈穩定的時候，就經常不愉快了，有的時候還公開吵架。後來一個中間人與我談，我也二話不說，自請改任主筆，薪水減半。就這樣結束了大華八年創業維艱的階段。

拘留十天的經過

在大華晚報擔任總編輯時曾發生「蔡斯事件」，我遭到軍法機關拘禁十天。

當時大陸失守，美國在民國四十一年派了軍事援華顧問團來台，首任團長是蔡斯少將。他們從美國坐軍機到台北後發現有些物品失竊，雖然不是重要物品，還是報了案。台北的刑警隊立即展開調查，三天內就破了案，是機場的三個小兵做的事。

警方一開始沒有發這條新聞，後來辦這個案子的刑警跟大華晚報的記者談到這件事，記者就寫了新聞表揚刑警破案迅速。當日下午保安司令部就派人找我去問話，我就被拘留了。

拘留的三天我住在保安司令部的官員宿舍裡，可以在一定的範圍內活動。問了一次話，我實話實說：「這條新聞是我發的，與負責這一版的編輯無關。社長也不管編輯上的事情。」問話的人說：

「那麼責任全在你身上囉？」我說：「我也不能推啊！」問話就此結束，就像老朋友聊天一樣，我是坦然處之，沒有自陷於緊張。

後來我才知道，社長錢震和寫這篇稿子的記者王文瑞也都被帶去保安司令部，錢震當天就放回，王文瑞遭到拘留。第四天我與王文瑞被移送軍法局看守所，公文為「奉總長諭」，事由為「妨害軍譽」，關入「檻房」。

我進去的第二天就開庭，同檻的人都說這是從未有過的，進來關個一、兩個月才提審的大有人在，而我一進去就開庭了。問案的是位老檢察官，四川口音很重，問我為什麼要發這個新聞？我簡單地回答：「這是事實。」老檢察官就大聲地說：「這是事實，這是事實！」要坐在旁邊的錄事特別注意這句話，也好像在暗示我：這就是案情的關鍵。

問完這句話，他便叫庭丁搬把椅子讓我坐下，再分別傳錢震、王文瑞進來，問得都很簡單。我最後走出法庭，只聽老檢察官在背後大叫：「冤枉啊！」我一直忘不了這位老檢察官，他代表著同情與公道的無所不在，即使在機關衙門裡。

六天之後，我和王文瑞都放出來了，案子也沒起訴。獲釋之後，同業紛來慰問，有人說：新聞記者坐牢，是光榮的歷史。我倒不覺得有何光彩，只覺得是無聊而已。

我認為，政府為局勢所迫，戒嚴是不得已的事情；如果在執行上謹慎檢點，不要小題大作、輕率從事、過於敏感、株連無辜，當可避免造成民怨。

中央日報的困境

離開大華晚報後，我又回到中央日報，其後一路做到總編輯。因為中央日報是黨報，所以相對地在經營上也有其困難存在。

第一，中央日報的人事沒有彈性，國民黨中央黨部雖然沒有給予固定的經費，但中央日報的員額編制、人事組織，卻必須依照黨的規定。遷台出版的初期，中央日報很賺錢，還要交給中央黨部充裕黨費，後來蔣總裁才告訴社長馬星野說，賺錢就自己留著發展。

之後民營報紙興起，中央日報的廣告也漸漸地被分走了。中央日報的業務慢慢變得困難，加上人事沒有彈性，舊的人不能辭退，新的人就進不來，人才不斷流失，相形之下就不敵民營報紙的競爭了。

第二，在新聞上中央日報自我設限，不濫登犯罪新聞，重大的犯罪新聞要登也會經過嚴格的把關。

中央日報處理犯罪新聞有五個原則：一是對犯罪新聞不透露治安當局的計畫，不妨礙他們的行動；二是不使受害人受困擾，不使無辜者遭受損害；三是儘量不透露犯罪的方法，以免引起同一性質的犯罪；四是對犯罪的情節不作詳細的描述，以免使罪犯自認爲是英雄好漢；五是注重新聞的平衡報導，雙方面的說詞都會刊登，不會有所偏頗。

這是中央日報嚴守的五項規則，都是新聞學上要求的。中央日報守規則，但是民營報紙就不守。守這五個規則固然是新聞道德，但是新聞的可讀性就減低了，這是中央日報在競爭上另一個吃虧的地方。

新聞記者有其自主性

戒嚴時期的新聞自由常有和當局爭執的情況，新聞記者本身也有其自主性。我在黨營媒體中被認爲是個不聽話的人，但我做事都是照我的原則來，並不是說一定要全部都聽黨的。

舉例來說，經國先生擔任國防部長時想整頓治安，那時有搶案捉了些犯人，在一般的情況下，要經過法院審理，也都要半年、一年才能判罪。但經國先生要求速判速決以正民心，所以那時就槍決了

擔任台北《中央日報》總編輯時之編輯台。（攝於民國62年，薛心鎔提供）

三批強盜犯人。警備司令部在執行第一批犯人的槍決時，有發這幾個強盜行刑前的照片及他們的遺書給各報，希望刊登。我當時已是中央日報總編輯，感覺這樣處理不好；這些犯人的確有犯罪，也表示眞心後悔了，但要把槍決前的照片登在報上給社會看看，我覺得不是味道。最後我決定不登照片，遺書也登得不顯著，沒有特別強調。

第二天中央日報沒有照片，其他報紙都有登。隨即社會的反應就來了，民眾覺得看了這些照片感到不忍，認爲不必這樣渲染。結果之後的兩批，警備司令部就沒有再發照片及遺書給各報，只有說明犯人表示後悔，用幾句話帶過了。

這就是當時我沒有照當局的意思把照片登出來，但是後來當局照我的辦法來做的例子。雖說戒嚴時期對新聞事業有限制的壓力，但只要憑藉著專業義理、記者良心，做對了，當局也會尊重。

身爲黨報的總編輯，我在戒嚴時期沒有感到國民黨文工會或是新聞局耳提面命的壓力。但所謂國家機器的控制，我還是有感覺到的。只是他們都不是命令型的，或許是中央日報的地位，所以文工會或新聞局大都是轉達上級的意見，而對於他們的意見，我也不一定要遵守。如果說我沒有遵守，只要他們的長官沒繼續追究，這事也就算了。

在我中央日報總編輯任內發生過幾件大事。第一個是「中壢事件」。民國六十六年台灣舉行地方公職選舉，桃園傳出監票人員作票，許信良率眾抗議，引起一場激烈衝突。

事情發生的當天晚上，文工會主任丁懋時召集各報總編輯來談如何處理這個新聞，當時大家已經意會到無非是不登這個新聞，或是少登一點，都沒開口，我就說新聞照登，事情已經發生了也藏不住，只是可以強調依法處理。最後丁懋時接受我的意見。由此可以看出，雖然戒嚴時期對新聞自由有所限制，但是只要你做得對、做得有道理，他們還是會接受你的意見。

第二個是後來的兩岸情勢。美國和中共接近，我們退出聯合國，中共加入並且大量參加國際活

動。這時與中共有關的新聞暴增，而台灣的報紙只要提到與大陸有關的新聞，必定要加個「匪」字，像是「匪區」、「毛匪澤東」、「周匪恩來」等等，造成整篇新聞稿都有「匪」字。

當時我就覺得已無必要，何況即使是在匪區，也不是所有人都是匪，也有很多人是反共的，也還是有反共的思想。所以我就採取一個辦法，就是一個新聞在開頭用了一個匪字，表明這是誰的新聞，之後的內容就不再用匪字了。

這個辦法一行，隔天就有外國記者發出電訊，報導中央日報的作法，是不是表示國民黨政策改變？其實我這樣做，並沒有誰的指示，也沒有請示過誰，我只是覺得台灣人民已經知道大陸上誰是誰，不必要處處都帶個「匪」字，僅是新聞意理上的考量而已。這樣做了，當局也未反對，各報跟著都這樣做。另外，增加大陸新聞的刊載，也是由中央日報開始，在當時被認爲是一項突破。

第三個是中美斷交時，台灣人民群情激憤，認爲美國出賣了我們。所以當美國代表克里斯多福到台北來談判時，許多學生、青年、社會人士都到松山機場示威，潑油漆、扔雞蛋，場面很激烈。文工會希望各報不要太強調這則新聞，把民眾情緒高漲起來，造成談判的困難。

當時我就沒理文工會的說法，該登頭條就登頭條，該放照片就放照片，隔天文工會的人就打電話給我，要我處理新聞平實一點，不要誇張渲染。我就和他爭論什麼是平實？有一個尺度嗎？我在新聞上登的都是事實，也都有照片，他們也沒有話說。「松山一擊」就是要讓全世界的人瞭解，中國人還有骨頭，不是任憑別人擺佈的。中央日報有海外版，發行普及全球各地，更以美國爲大宗，與僑胞、留學生聯繫密切，這時他們的電話、投書大量湧至，表達對國家的支持，我特別開闢一個專欄，連續刊載，鼓舞海內外國人的愛國情操。

這就是那個年代我做的一些事情，完全出於自主。我是憑著我對政治的認識，對大局的考量，本諸記者良心與編採運作，爲所當爲。這也可以註解我所說的「新聞記者有其自主性」。

美麗島事件的新聞處理

美麗島事件無疑是台灣戒嚴時期規模最大的一次黨外活動，而我對這個事件也有一些看法。首先，美麗島事件發生時已經有電視了，所以在高雄發生的情況，大家都看得到的；以後公開審理、檢察官起訴、開庭時被告的回答，在報上都登得很清楚。再者，要如何處理這則新聞，我沒有受到任何指示，我處理美麗島新聞時所作的依據、所守的原則，都是根據報社記者採訪的稿子，並憑藉著我當編輯的良心、經驗來做。第三點，我覺得大家要瞭解，在戒嚴時期有戒嚴法，縱使戒嚴法是惡法，大家也要遵守這個法律。最後，事件發生時根據我們看到現場的情況，警察出來防制這個活動，他們所接受到的命令是罵不還口打不還手，所以只見警察挨打挨罵，以後證明警察被打傷流血的有一百八十幾個人。有一位太太看到警察挨打挨得太凶了，她就站在警察的前邊跪下來，求對方不要再打了。這些都有照片刊載，電視上也看到的。

當時我還覺得警察面對暴動，奉命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眞是天下奇聞。後來警備總司令汪敬煦說明，知道對方的策略就是要擴大事端，所以作此決定，不是沒有因由的。

所以我認爲，大家在評斷美麗島事件時應客觀公正些，除了要瞭解《美麗島雜誌》的內容，也應知道爲什麼會引起這麼大的風波。其次，事件經過情形大家都看得見的，除了各報社的記者有去採訪，還有許多外國的通訊社都到了，之後開庭審理也是完全公開的，有許多人來旁聽，是非論斷大家可以在多方瞭解之後再作評論。

見證中央日報興衰

我在中央日報做了九年多的總編輯，是中央日報任期最長的總編輯。中央日報有它很風光的階

段，現在是吹了熄燈號，改成網路報的形式發行。從中央日報近八十年的歷史來看，可以說：國人的國家觀念強烈的時候，中央日報是興旺的；國家觀念淡薄的時候，中央日報跟著衰落；國家觀念沒有了，中央日報也沒有了。

中央日報最大的貢獻，是把大陸新聞事業的傳統與風格帶到台灣來，這點在台灣報業史上是很重要的。

政府遷台初期，有些地方上開會，「長官訓話」之後會有「中央日報記者訓話」，從這點可以看出一開始中央日報在台灣報業的地位。這也產生了一個問題，大家都把中央日報看作黨報、官報，所以日後中央日報在地方上一直發展不開，蔣經國先生就曾說在地方上買不到中央日報。報社爲了發展地方報份費了很大的勁，可是大家還是認爲中央日報講的都是中央的事。

再者中央日報的原則是不介入地方上的糾紛，不參與地方上派系的鬥爭，不會強調任何一邊，也不會把地方版編得特別聳動，這些都是中央日報無法打開地方市場的原因。

政黨輪替之後，原先各公家機關都會訂購中央日報，也被上級通知不要訂中央日報。國民黨並沒有按月拿錢出來給中央日報作經費，完全是靠自己賣報、賣廣告的收入來維持。最後不敵民營報紙的競爭，中央日報就蕭條了。

新聞的核心理念：正義

我的新聞生涯中，除了辦大華晚報的八年，一直在黨報工作，從大陸到台灣都是個黨報的編輯。做編輯對我一生行事影響很大，嚴謹務實，字斟句酌；見到錯字就覺刺眼，寫情書都像是在下標題。

我出生的時代是軍閥割據末期，之後就是北伐時期、抗戰時期，可以說少年時光都是在動亂中成長，這也養成了我愛國的信念。念書、工作、編報，我的考量都是以國家爲前提，而不是以黨爲中心。

新聞工作對我而言，最大的意義就是有使命感。因為新聞媒體跟社會的關係太密切，它對這個社會的影響太大，別的職業可以獨善其身，新聞工作必須兼善天下；不管你願不願意，你的工作都有這樣的作用。

我對正義的解釋是把它分為兩個字來看，所謂「正」就是正確公正，「義」就是適宜適當。《紐約時報》有個標語登在報頭上「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這個Fit，就是義的意思；我登的新聞都是適宜刊出的，有新聞價值，並不是八卦小報隨意亂報。所以我覺得正義兩字就是新聞人的核心理念，也期許當代的新聞人都以正義為信念，在新聞界裡奮鬥打拚。

永久的總編輯

我出過三本書。一本是由中央日報出版的《現代新聞編輯學》，是翻譯美國新聞學者著作的 *The Art of Editing*，目的在介紹美國新聞編輯學的內容，而這本書已經進入電子時代。

第二本是由正中書局出版的《變局中的躍進——俞國華的政院五年》。俞先生是兩蔣時代的最後一位行政院長。他自青壯時期即在老蔣先生身邊，深受薰陶，與小蔣先生關係密切，不同尋常；他任行政院長的作為，可以說即是代表兩蔣的作為，在這本書中可以看出兩蔣在政治上是如何作法。

第三本書是聯經出版的《編輯台上——三十年代以來新聞工作剪影》，從抗戰時期寫起，寫我接受的新聞教育，進入新聞界工作，歷經大陸和台灣兩個階段，編新聞，也教新聞編輯。體裁好像是自傳，其實是把理論融入實際，藉生活來寫工作，也許可以稱之為一本生活化的新聞編輯學。

另外，我給《新聞鏡》雜誌寫了一百多篇媒體評論，批判解嚴後新聞媒體的得失；給報紙寫過不少社論與雜文，過眼雲煙，那就不必多說了。文章報國，如是而已。

《編輯台上》一書出版以後，中央日報副總編輯馬西屏看了這本書，寫了篇書評登在中央副刊

上，標題是「永久的總編輯」。

馬西屏在文章裡談到，他雖然沒有在我當總編輯的任內做事，但是看完這本書，送給我兩句話：「寵辱不驚，去留無意。」這是出自《菜根譚》的文字，和我的人生觀頗能作個印證。

我的人生就是如此，在報社裡工作任何職位我都不在意；我曾待過不同的報社，但每一次轉換都是機會使然，並不是我自己謀求爭取來的。我也沒有特定的生涯規畫，只要能爲國家、社會出一點心力，我在任何位置上都可以做事。

工作中的一件憾事

我的一生都已獻給新聞工作，不敢說自己有什麼成功的地方，唯有做事認眞負責而已。但提到失敗之處，我覺得是自己知識不足，能力有限，所以很多事總認爲還可以做得更好些。

我的新聞工作中有一件最大的遺憾，發生在辦大華晚報不久。有位名叫李麗的交際花，在台北住在廈門街，她有一個養女。一天李麗家裡禿頭的廚子侵犯了李麗的養女，李麗告上法院。最後判決廚子槍斃。在走出法庭時，這廚子還得意洋洋地說：「我做了這件事，這輩子也夠本了。」記者把這些話都寫下來，當時我是總編輯，也沒想到二度傷害的問題就把它登出去了，當晚李麗的養女上吊自殺。

被稱爲「永久的總編輯」的薛心鎔。（攝於民國83年，薛心鎔提供）

隔天我知道這個消息心情非常難過，大概就是因爲報紙登了她的新聞讓她覺得以後無臉

見人。這個遺憾我一生都牢記在心。

日後在看新聞稿時，特別是涉及女性的社會新聞，我第一考慮的就是要給當事人留點地步，讓她以後還能做人。每每看到現在新聞，爲了爭獨家，挖人隱私，我就會想到這個遺憾，而它已是無從補救，讓我記一輩子。

兩蔣父子評價

回顧戒嚴時期民主發展歷程，就會觸及兩位蔣總統的評價。現在當政者在搞「去蔣化」，把一切的帳都記在蔣家人的身上，我認爲是不公平的，也抹煞了歷史的重要部分。

我覺得老蔣總統眞正是孫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老蔣先生一生所做的事，就是國父遺囑上所交代的：廢除不平等條約，他在抗戰時期做到了；召開國民會議是他一直在努力的事情，只是因爲內憂外患，直到抗戰結束才在南京召開國民大會，制定中華民國憲法；而共產黨已在進行奪權，中央政府撤守台灣，中共的威脅一直存在，他仍然逐步推行地方自治。由此可知，他是遵照國父所交代的實行民主政治，雖然局勢有變化，未完全落實，但他確是念茲在茲，一生都在努力。

民國五十三年，中央日報社長曹聖芬到陽明山受訓，當時老蔣總統召見他，就問他爲什麼最近中央日報的社論不太有力量？曹先生說現在情形比較複雜，說話顧慮比較多。那時蔣公就說，認淸是非，不必多所顧慮；對政府施政的善意批評，儘管提出。這可以看出蔣公對新聞自由以及黨報運作的原則。

不過做起來當然沒有那麼簡單，有些事情我認爲是的，你認爲非；而你認爲是的，我也未必贊成，所以雙方在認知上也會產生差異。

小蔣總統子承父志，民國七十四年他接受《時代雜誌》香港分社主任哥登的訪問，哥登問將來的

總統是不是繼續由蔣家的人繼承？蔣經國總統回答說，我國是民主國家，民國三十六年行憲以來，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一直依據憲法由國民大會選舉產生，我這個總統是國民大會選出來的，今後亦當如此。到了民國七十五年十月七日他接受《華盛頓郵報》董事長葛蘭姆夫人的訪問，蔣經國總統表示：我們一向以促進民主爲職志，雖然中共沒有放棄侵犯中華民國的野心，但是我們仍然希望盡早解除戒嚴令及准許組織新黨、開放報禁、解除戒嚴以推展民主制度。由這兩段訪問可以看出小蔣總統的觀念和理想。

老蔣總統去世以後，華盛頓舉行了一個追悼會，抗戰時期擔任中國戰區參謀長的魏德邁將軍致詞悼念，就說老蔣總統曾經寫過一封信給他，信上說：「如果在我死的時候，我仍然是一個獨裁者，我當然會與所有的獨裁者一樣被人民遺忘；如果我能夠爲一個民主的政府奠定眞正的穩定基礎，我將永遠活在每一個人的心中。」蔣先生死了三十多年了，爲什麼還要藉政治力量與軍閥手段來搞「去蔣化」？這就表示大家還沒有忘記他呀！

解嚴後媒體的墮落

我認爲：自清末起內憂外患，國家一直處於動亂之中；在軍事高於政治的時候，不論有無宣布戒嚴，事實上都在戒嚴狀態；爭取民主、自由，則是各方面很多人一直都在努力的事情，並不是少數人在做。

台灣宣布戒嚴，持續幾乎達四十年之久，固然有許多限制，但是也不能否認維持了長期的安定，得以從事建設，發展經濟，獲致前所未有的繁榮。解除戒嚴，對台灣媒體是很重要的大事，它象徵完全的開放自由。

我看戒嚴時期的媒體，我覺得正因爲受到約束，所以大家都有戒心，會正經八百地辦報、辦新

聞，努力於正面的表現。所以戒嚴時期顯得大家還有國家觀念，有道德規範，新聞事業大致還能夠保持為文化事業努力，具有教育的性質。

民國七十六年解除戒嚴，束縛完全解除了，新聞自由可以說是百無禁忌。迄今二十年來，只見大家拚命發展自己的業務，競爭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內容品質江河日下、愈趨下流，在業務上進入惡性競爭，以前所不屑的一些東西，現在都去做了。以前還以「誨淫誨盜」為自律的誡條，現在則反其道而行之。

再加上外地媒體看中這塊市場，以資本主義的手段、殖民地的腐化作風衝了進來，酒色財氣，隱私祕聞，以前頂多只屬小報的材料，如今一躍而取代昔日「要聞」的地位，極盡其聳動、刺激之能事。以前還能考量新聞價值，現在只誇「獨家」，不論價值。

在惡性競爭之下，有些規矩的報紙關門了，也助長了走偏鋒的媒體的氣焰。再加上電子網路的擴張一日千里，已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無法」就是沒有一個規律，也沒有網路警察；「無天」就是沒有地與天的界線，傳播速度非常快，好的壞的一下都可以傳到各個國家，所以我認為網路傳播是一個無政府狀態。

我感覺解嚴後的媒體發展是墮落而非上進；以前的新聞媒體還有文教方面的價值，現在已經成為只求賺錢不擇手段的黑心商業了。當然現在的新聞人也有他的困難，第一就是業務競爭得厲害。第二就是容易受利用。以前要舉行一個記者會，一定是有相當的新聞性、重要性；現在隨便誰都可以開記者會，利用媒體作為一種新聞形式的宣傳。第三就是廣告主的強勢，若是媒體在立場上不合廣告主的意，他們就以撤掉廣告威脅。第四就是以行政手段對付異己新聞媒體愈見凌厲，而對地下媒體卻又任其猖獗。

所以說戒嚴時期的新聞自由受到限制，而解嚴後卻出現了更多的因素妨害新聞自由，這實在是很

可怕的事。

到老仍然憂國憂民

我近來重讀中國報業史料，看到許多前輩報人爲國爲民的努力，「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辦報精神，這是張季鸞先生辦大公報所標榜的「四不」。其中的「不盲」，是指不盲從，盲目地跟著人云亦云，尤其值得今日的新聞記者、民意代表、黨政人士，乃至社會大眾，深切思考。仰望前賢，我也深深地感覺到自己的藐小，所作所爲，又何足道哉！眞是慚愧得很。

進入高齡階段，不上班了，在家就是讀書寫字，慨嘆書架上有許多好書，擺在那裡，未曾讀過；讀過的書，再讀一遍，又有不同的感受。因此有了兩點感想：「不讀古人書，不知天地之大。不讀今人文章，不知人上有人。」

讀古人書，感覺到他們的胸襟是何等的開闊，見識是何等的精深。我從不以爲自己的文章好，看看別人的文章，比自己好的眞是太多了。就一個新聞記者而言，眞是學無止境，做也沒有止境的啊！

自己的這一點工作經歷，也就是盡心盡力而已，算不得什麼。到老仍舊憂國憂民，遇到能做的事，還是盡力而爲，如此而已。

◎初稿：董茲芸

◎校訂：張錦華

◎定稿：何榮幸、薛心鎔

◎訪問時間：二〇〇七年四月二十日、二十五日、二十七日

◎地點：台大新聞所攝影棚

黃肇珩

黃肇珩

〔第三章〕

第一位女性黨營媒體高層

一九五九年中央社記者

前頁圖說：
1969年，錢穆向黃肇珩細說《朱子新學案》的撰寫過程。
（黃肇珩提供）

她的新聞生涯，已經在名字就叫作「記者」的自傳中走過一遍。我們難免有些困惑：還能夠問些什麼呢？她不會覺得厭煩嗎？答案很快揭曉：還是有很多角度可以提問與追問，她還是很有耐性與同理心。

一九五九年進入新聞界的她，當年只用「胡適死了」四個字，寫出別開生面、創新風格的新聞導言，顯示她對於寫作品質以及與眾不同的自我要求。本書所有受訪者中，只有她在一九六〇年代採訪過蔣中正總統、宋美齡夫人的新聞，成爲最早的「官邸新聞學」重要見證。

雖然在黨營媒體歷任高層職務，她卻沒有女強人式的咄咄逼人；雖然當過監察委員，她身上也看不到政治人物的習性與架子。真要比喻的話，她就像是苦口婆心、循循善誘的老師，一心希望國家社會安定，不樂見任何激烈動盪。

她在當年女記者稀少的新聞生態中平步青雲，可能被認爲必須犧牲家庭生活，實際情況卻非如此。訪問結束時，她的先生、傳播學者馬驥伸已經到達台大新聞所等候，夫妻倆打算一起去用餐的鶼鰈情深身影，顯示她在職場工作與家庭生活間達到了平衡。

在她的身上，那句名言似乎應該改成：「成功的女人，背後都有一個男人。」想必這對令人稱羨的夫妻不會有太多異議……

黃肇珩大事記

1931 黃肇珩出生

■1959 中央通訊社記者

■1969 中央通訊社國內新聞部副主任

1971 退出聯合國

■1976 中央通訊社國內新聞部主任

1979 美麗島事件

■1981 中華日報副社長

■1983 中華日報社長

■1986 正中書局總經理

1987 解除戒嚴

■1993 當選第二屆監察委員

2000 政黨輪替

我是「記者」，不是「女記者」！

第一批新聞科班出身記者

我從來沒想過要當記者。如果再有一次選擇，我還是會走記者這條路。

當初選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是因爲公費，讓我不用煩惱學費的問題；選擇社會教育系，是因爲不喜歡跟別人一樣念教育系，所以去了才剛成立的社會教育系。我當時根本不曉得新聞是什麼，只因爲很喜歡寫文章，而記者似乎都在寫文章。社教系第二年選組時，我就在圖書館組、社會事業組及新聞組中，選擇了新聞組。

一九五〇年代，台灣新聞教育剛剛起步。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跟師大社教系新聞組，於一九五五年同時設立，我們是台灣第一批大學科班出身的新聞從業人員。可是政大是正統的，我們只是整個系中的一個組，人非常少，一共只有十一個人，其中有四位是僑生，畢業後，都回了僑居地。當時我根本不想做新聞記者，我想去教書。

那時候，新聞組有三位影響我們最深的老師，他們是王洪鈞老師、歐陽醇老師、于衡老師，我們暱稱他們爲「新聞三劍客」。這些老師對我們眞的照顧很多，師生情誼綿延四十多年，直到他們相繼

離世。尤其是當時《聯合報》名記者于衡老師，他第一次教書，帶我們像帶孩子一樣。

由於我們是第一屆，于衡老師認爲，每一位畢業同學都要爲後面的學弟、妹去打天下。我永遠記得謝師宴那天，于衡老師說：「黃肇珩，如果妳認爲去做新聞記者是跳火坑，妳也得跳。」因爲這席話，我開始去中央通訊社實習，也開始對新聞產生興趣，一待就是二十年。

入黨才成爲正式記者

實習期間，我想出兩種方式，試圖跨越新聞理論與實務間的鴻溝。

一、跟著主任指定的記者去跑新聞，回來就寫稿。通常實習記者的稿是不發的，晚上主任發完稿，空下來了，才看我寫的稿，指出錯誤或應該注意加強的地方。我很用心聽，並力求不二過。

二、主動翻閱社稿，細讀帶我採訪的記者怎麼寫。第二天再看報紙的記者怎麼處理，自我評比，進步很快。在這個過程，我學習到如何衡量新聞份量、掌握新聞重點，怎樣觀察場景、運用資料，把新聞寫得完整，跟人家不一樣。

中央通訊社社稿是油印稿，就是把蠟紙放在鋼板上，用鐵筆在蠟紙上面寫，然後拿下蠟紙，透過油墨，一張一張印在紙上。完全手工製作，既繁又慢，回想起來真不可思議。各媒體每一小時到中央社拿一份油印稿，這是中央社提供國內外新聞給國內媒體的主要傳遞通路。

影響我新聞寫作很深的是副主任張任飛先生，他把美國的新聞寫作方式帶回中央社。他要求全部使用白話文，去除八股，用字精確、簡潔、有力，不拖泥帶水。他重視新聞導言寫作，認爲是一則新聞的靈魂。

結束一個月在採訪部實習，總編輯沈宗琳要我到各個單位去實習，從國外部、英文部、編輯部，最後到總編輯室。經過甄試，才成爲試用記者。

一般來說，中央社試用記者的試用期是三個月，剛開始不會分配重要的路線，只是很紮實地訓練寫作、新聞的敏感度等等。

我試用了好長的時間，遠遠超過三個月。爲什麼？因爲我不是黨員。大學時代我沒有入黨，中央社是中國國民黨黨營事業之一，進去的人都要入黨，直到我入了黨，中央社才聘我爲正式記者。

把冷門路線炒熱

當時試用記者，一個月好像才拿新台幣七百塊錢，也沒有分配正式的採訪路線，我曾懷疑自己究竟有沒有做新聞記者的能力。

最初分配到的採訪路線是：中華民國全國人民團體活動中心和考試院，那是許多資深記者看不上眼的「冷」單位。考試院現在看來還算重要，因爲在木柵，當時感覺是很遠的，沒有人願意跑。考試院的主要新聞是每星期四的院會。院方主動送來一份油印稿，內容空洞、八股，類似：今天開第幾次院會、什麼人主持出席委員名單、通過什麼議案等，大概一、兩百字左右，幾乎都一樣的模式。

考試院新聞聯絡人，是層次很高的官員，不懂新聞，但很尊重記者的意見和建議，突破傳統發新聞稿方式，酌發議案內容，果然見報率提高了，占的篇幅也大了。他們有了信心，相對地增加對我的信任，答應要提院會討論的法案草案，先給我。院會當天，如果我不能去，就用電話採訪，得知通過哪些議案、有無條文增刪或文字修訂等，因此我撰寫的新聞，內容充實、完整，見報率很高，有時還上了一版頭條。我用這種方式，把考試院這個「冷」機構炒熱了。更珍貴的是贏得一份友誼，縱使我離開新聞圈，依然持續。

另外一條冷門路線，是沒有專人採訪的醫藥新聞。

有一天，採訪文教新聞的記者曲克寬看我沒有路線可跑，對我說：「爲什麼不去跑跑醫院新聞，

這條路線一直沒有專人採訪。」懷著陌生感，我闖進當時台灣最大的台大醫院，自己找新聞題材和案例，訪問醫生談問題。

我的第一則醫藥新聞，是從社會服務部開始。我獨自闖進台大醫院的「社會服務部」，我很擔心，因爲還不熟悉醫院的環境，很慶幸裡面的工作人員從主任到工友都是女性。她們看到有記者來採訪，非常高興，問我能不能幫忙一個小兒麻痺的孩子。他需要開刀，家裡沒有錢，希望透過報導，讓善心人捐款。中央社發稿後，第二天許多報紙刊登了這則新聞，捐款一筆筆湧進。七歲小弟要進手術室了，我的採訪方向，也隨他轉移到開刀房、病房，持續報導手術的進行、復健的情形，一直到他出院，很完整地獨家追蹤報導。

就這樣，我打開了醫藥路線。在台大醫院建立起信譽，有了一些名氣，後面的路就順暢了。我開始認識一些名醫，從醫院社會服務部走進醫生的研究室，參加他們的討論會，漸漸熟悉醫藥路線，也從中獲得醫藥常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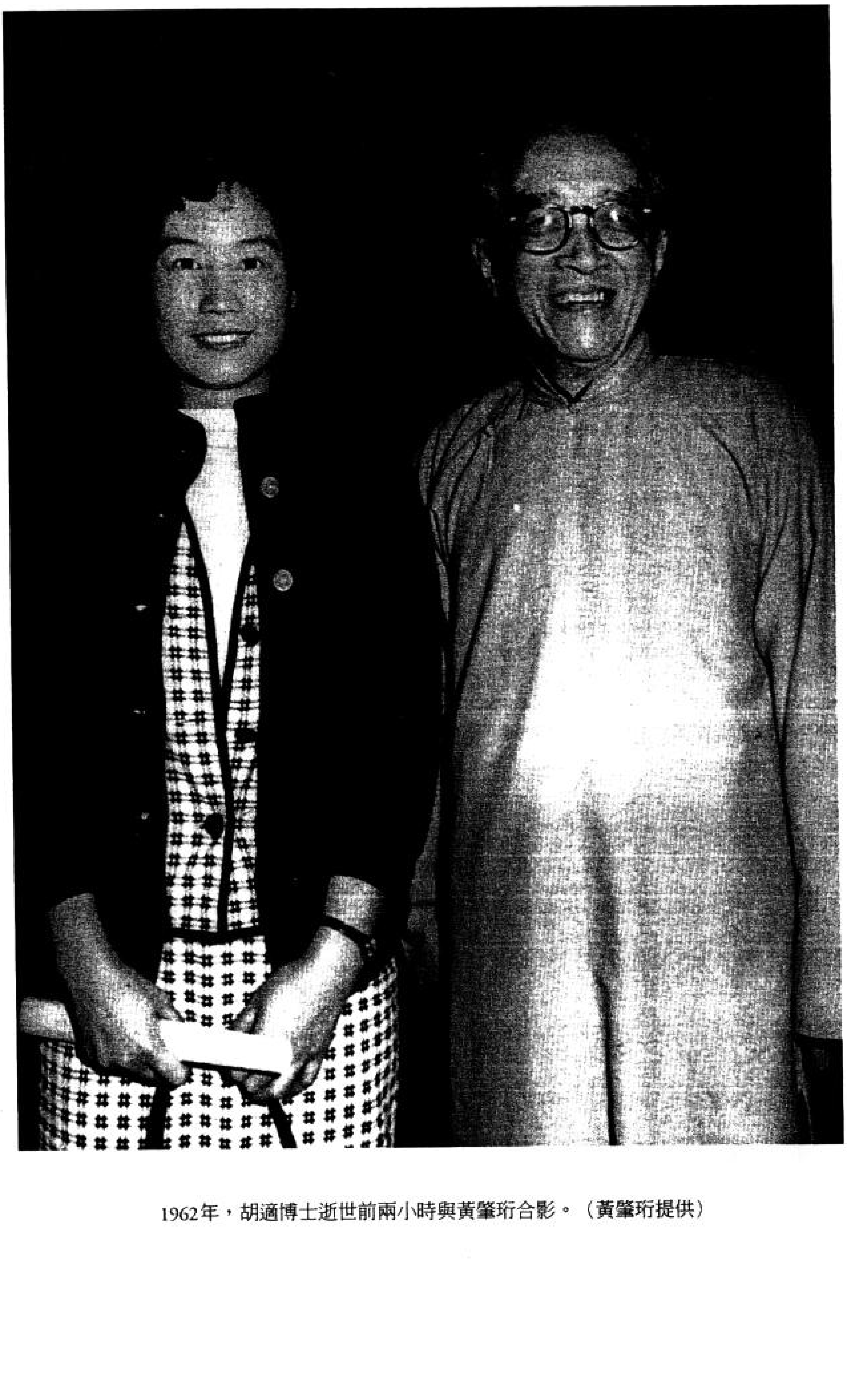
「胡適死了」創新導言

我認爲，當一個記者採訪報導一則突發重大新聞，才是這個記者成熟的時候。

以我自己而言，報導胡適去世，讓我成爲一個成熟的記者，也讓我這個才剛出道一年多的記者受到注意。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博士主持歡迎新院士酒會，散場的時候，突然倒下去，急救後仍宣告不治。

當醫生宣布他已去世的一刹那，全場沒有哭聲、沒有講話聲，我被一片寂靜驚住，立刻環顧周遭人的反應，那時在場的都是院士、海內外著名專家學者，還有從國外回來的科學家吳大猷、袁家騮吳



1962年，胡適博士逝世前兩小時與黃肇珩合影。（黃肇珩提供）

健雄夫婦等。在新聞稿中，我捕捉每一個院士的動作和神態，側寫了這一幕沉寂的哀痛。

那天，是我第一次以中央通訊社記者的身份面見胡適博士。他和我握手表示歡迎，還合拍了張照片。幾個小時後，他躺在冰冷的地上，死了！我心中非常震撼，從南港中研院回台北中央社的途中，腦海一直浮現：「胡適死了！胡適死了！」

強烈的感受，很自然進入新聞導言「胡適死了」，只有四個字。在那個年代，像胡適這麼有聲望、地位的名人，不加頭銜直呼其名，是很不禮貌的，又直直地說死了，更顯不恭敬。但我想，就因爲他名滿天下，不加任何榮銜的胡適，更顯獨特。胡適一生倡導白話文，「死了」是說人死亡最白話的兩個字，很符合胡適的風格，他應該也會同意這樣的寫法。

就這樣，創新的導言，加上將現場感帶入新聞的寫作方式，當時得到不少迴響。那個時候開始有人注意到：「黃肇珩是誰？」

贏得受訪者認同

從「女」記者到「女」主管，甚至「女」強人，我一直想把「女」字拿掉。

在這些名詞前，加了個「女」字，其實就隱含著潛意識的性別歧視。

在採訪時，我常常能感受到來自採訪對象對我的不信任，只因爲我是女性。整個記者生涯中，我都希望能跟男性記者站在同一條線上，一起競爭，一起採訪新聞，被人家認同我是記者，而不是「女」記者。

一九六〇年周書楷先生接任行政院僑務委員會委員長，舉行記者會，全場只有我一個女記者。那時我剛接文教路線，初出茅廬，因爲採訪政治新聞的記者休假，主任派我代跑。這場記者會，讓我深刻感受到採訪對象對我的不信任。

非洲《生活月刊》記者貝拉・西達感受到女記者最大的困擾是：「因爲她是一個女人。」
（1964年，黃肇珩提供）

參加記者會的都是各媒體資深記者，我坐在周委員長的左邊。在他談話的時候，我發現他講沒兩句話就會轉頭看我一下。當時我心裡很不舒服，我在想，他不是看我長得好看不好看，而是觀察我有沒有聽懂。

他的潛意識裡面，應該是懷疑我的能力。面對一個女記者，他擔心我是否聽懂他所講的內容，尤其是與政治相關的主題，似乎認爲女性就不懂政治。

當時，我心裡想，今天回去一定要把這條新聞寫得很好，讓他知道我是懂得這些政策的。寫稿的時候，除了寫他在記者會上所說的話，還補充背景資料，把這一則原本是例行性的官員談話的新聞，寫得生動且深入。第二天好幾家報紙都用了我的新聞稿，而不用本報記者的採訪稿，讓我覺得十分榮幸。

從此以後，周書楷先生開始信賴我，在他任內，每次要去訪問，他一定抽空受訪，甚至他的祕書會讓我直接去他的辦公室找他。就這樣，我用新聞的專業表現，克服採訪對象對我的不信任，我努力查證、補充背景資料，使新聞寫得正確而完整；我喜歡閱讀外國記者寫的新聞稿，學習把導言寫得精簡扼要。終於讓受訪者認同我，相信我是夠格的記者。

待遇、升遷都有性別歧視

當了中央社的正式記者以後，我的薪水是一千兩百元，但我的男性同事除了薪水外，還多拿到幾百元的房屋津貼。

我一直很納悶，爲什麼我沒有房屋津貼啊？我不好意思多問，直到成爲比較資深的記者，跟主管也比較熟了，有一天，在輕鬆的閒談中，我問總編輯：「爲什麼男記者有房租津貼，我卻沒有啊？」他很自然地回答：「咦，妳是女孩子，妳又沒有養家活口。」從他的回答中，可以發現他的觀念是男

上：197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來台參加亞洲作家會議時，接受黃肇珩採訪。
左下：1966年，林語堂回國訪問，中央社社長馬星野派黃肇珩擔任記者兼祕書，他從私人函件到編漢英大辭典都信託了她。
右下：1968年，黃肇珩以友人身份開始訪問張大千。（以上皆由黃肇珩提供）

生才是一家之主，需要比較多的薪水照顧家庭，而女性沒有家庭負擔，工作似乎就不是爲了家庭，因此女性不需要有房屋津貼。

我在中央社內部的升遷過程中，長官考慮的因素，除了能力和工作態度，最重要的就是我的性別。

我是中央社第一個女性主任，也是第一個台灣公營、黨營報紙的女性社長。我當時有種感覺，那個年代，你頭抬起來，上面坐的社長、總編輯、主任等，全部都是男性，當我即將坐上那個位置時，我知道我要打的第一仗，就是克服他們潛意識裡對女性的歧視。

一九六九年，中央社國內新聞部副主任出缺，主任要從我和一位男記者中提升一位。他找我談話，他說，我各方面表現都很優異，但是「妳是女性，應該不會在乎升遷。」因此，他初步決定要先升那位男記者。我跟他說，你可以告訴我哪些條件不夠，或是因爲他比我資深等等原因，但是不要告訴我因爲我是女性。

我很感謝他告訴我他的考量，因爲他可以不用這麼做，而直接升那位男記者。最後，他們還是選我爲副主任。

一九七六年六月一日，當了七年副主任後，我接任國內新聞部主任。

有一天，林徵祁社長告訴我：「妳知道嗎？妳升主任的時候，我們最大的考慮，就是妳是女性，能不能帶領這麼多的副主任和資深記者？」他們都是男性。

工作與家庭間的掙扎

六〇年代在職場上成名的女性不多，大部分女性因爲傳統觀念，仍是以家庭爲主，很少女性當記者或是公務員。職業婦女如何兼顧工作與家庭，就成爲重要的課題。

當時的職業婦女，我想比現在的職業婦女還要辛苦。為什麼呢？因為物質不像現在那麼充裕。就以嬰兒尿布來說，現在是一包包漂亮的紙尿布，用完就丟。那時的尿布是用爸爸的背心、舊的床單洗乾淨後重複使用。沒有洗衣機、更談不上烘乾機，遇到了下雨天，必須要燒煤球，上面蓋個大竹簍，將一塊一塊尿布放在上面烘乾，有一次走開了，竟然燒了起來。一切都必須靠雙手，這不單單是錢的問題，而是根本就沒有紙尿布那些產品。下班回了家，忙家務事，需要花更多時間。

幸運的是，我經歷過工作與家庭間的掙扎，也慢慢瞭解如何在兩者間取得平衡。

我非常感謝我的先生馬驥伸，從我接受記者工作開始，一路相持相助，始終如一。數十年來，不管他在新聞界或教育界，對我從事不同領域工作所承受的壓力，面對的挫折和委屈，他都陪伴我、支持我、鼓勵我，一步步跨越邁過，他也分享了我的成就和快樂。

當我過於自滿、驕傲時，他會在我頭上灑涼水，他是我亦師亦友的特級伴侶。

他很瞭解新聞工作的性質，所以他是完全地支持我。

長年以來，他都是我的「司機」，無怨無悔，不管是多早還是多晚，距離是多遠還是多近，他都會來接我回家；有時候，因為工作，半夜三更才能下班，有時要追重要的新聞，一整天根本不能離開，那就要把家丟給我的婆婆和他來照顧。

記者的名字常常會見報，有點虛名，有些男孩子可能很難接受太太比自己還出名。我的先生則非常不以為意，他曾譬喻自己是教練，我是球員，他的心態是，教練以球員為榮。有了他的體諒，我能很放心地在外面工作。我也非常感謝我的婆婆，我們一直住在一起，她幫忙我帶孩子，教育孩子。

放棄與割捨

我在權衡工作與家庭時，常採取的方式是「放棄一些東西」。因為我的時間一天就只有二十四小

時，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兼顧到，我必須衡量輕重，選擇重要的，捨棄一些比較次重要的。

比如說，我放棄和同事、同業們在下班以後一起擺龍門陣、一起吃宵夜，或是打麻將，所以跟同仁無法建立親密關係，在同業之間變得蠻孤立的；我放棄學生時代很喜歡的跳舞、一天趕幾場電影、整天整夜看小說的樂趣。我放棄一些過去喜歡的，換取時間，做家事、陪家人。

對中央社記者來說，截稿時間，是很大壓力。晚上六點到九點，是中央社對國外各訂戶供應新聞的重要時段，錯過了，新聞就傳不出去。大家都忙著趕寫新聞、趕發稿，有時候連吃晚飯都沒有時間。但晚上常有一些親友應酬，像是長輩生日、親戚結婚，就算我趕去，也只能匆匆握手道賀，揮手道歉，忙忙離開。親友對我像「要人」匆忙來去，很不以爲然，因此引起不少的誤會。我的舅舅曾很不高興地說了句很諷刺的話：「我的外甥女是屬於國家的！」

後來我選擇的作法是，不再趕來趕去地應酬，而是禮到人不到。或是利用休假日，提前去致賀送禮。漸漸地，他們瞭解我的工作特性，也諒解我的苦衷。人生有許多無奈，有些是無法割捨的！

第一次感受新聞禁忌

我第一次感受到中央社的禁忌，是採訪老總統蔣中正伉儷歡迎歸國僑胞茶會新聞。那天的茶會在台北中山堂舉行，只有中央社記者採訪。當時，我只是剛出道的記者，總統府不是我負責的路線，主任接到總統府電話，辦公室裡只有我一個記者，他臨時派我去採訪。

那是我第一次見到老總統及蔣夫人，很興奮，忘記我是記者，跟著大家一起鼓掌。

寫稿時，才知道中央社寫總統新聞稿，每寫一行就要空一行，留作核稿人增補之用，所有的總統新聞稿和照片，都要送到總統官邸審定。

報導總統新聞，傳統的模式，就是四平八穩。有位同事熱心教我，爲了省事免麻煩，到資料室找

去年同一類型新聞剪報套用。我沒有這樣做，我想寫自己所見、所感，試著打破公式化寫作，我把當時深刻感受的現場感帶入新聞。

我發現我的主任對這篇「脫軌」的報導，直皺眉頭。我把他「考」倒了，他一定很後悔找這個「菜鳥」去採訪，給自己找麻煩。時間來不及了，他一臉不悅和不安，把我的新聞稿送進官邸。

稿子送回來，我發現在字行間，加了好多總統說的話。我很疑惑地問：「主任，總統沒有說這些話啊，實際參加茶會的人也沒這麼多。」我的主任半帶諷刺回答：「妳看，現在看起來不是比較有深度了嗎？有內容了嗎？也顯得總統很有學問！」從那次以後，我發現中央社報導總統新聞，受制於官邸，尤其是總統致詞內容往往有增刪。

不過，我寫的這篇帶有現場感的新聞稿，意外得到負責核稿的秦孝儀先生好評，我被指派採訪總統和夫人的新聞。

那時候總統的新聞，是由中央社獨家採訪報導，各報多刊載一版頭條，尤其是黨營、公營的報紙。一版頭條新聞起碼占四、五欄，要怎麼樣把它填滿，撐起頭條新聞？如果總統有講話，問題簡單；要是沒有，或講話內容不發表，那就得動腦筋。

我通常採取的作法，是在現場蒐集一些陪襯的新聞，以備不時之需。記得，有一次美國議員一行來台訪問，總統伉儷在陽明山中山樓接見他們，談話內容不發表，程序新聞不過兩、三百字，我就是利用議員們等候的時間，請他們觀看掛在大廳牆壁上的巨幅名家國畫，談他們對國畫的看法，這段事前的採訪，讓這則新聞上了一版。

處理「兩個蔣總統」新聞

其實，當時中央社記者不會直接感受到政府或黨中央的壓力，承擔壓力的是社長、總編輯和各部

主任。他們對新進記者的第一堂課是：記者的職責是採訪報導新聞，不可自我主觀認定什麼新聞，中央社不必去採訪，或是這則新聞，中央社不可能報導。新聞能不能發，發到什麼程度，那是核稿人的責任。事實上最後結果，才是記者更關心的。往往新聞性愈高的新聞，我們失望愈大。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的「中壢事件」，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的「高雄美麗島事件」，中央社記者都在現場採訪，也作了完整報導，但是不能立刻發稿。這類重大新聞與上級溝通的層次是總編輯、社長，當時我是國內新聞部主任，只能焦急地等待他們協商後的指示。我們最怕聽到「不發」，就像被判了死刑。

我的記憶中，中央社對第一線記者，給予充分的自由和尊重，也勇於為闖禍記者扛責任。我擔任記者、國內新聞部主任時最常接到的指示是：「淡化」處理。簡單兩個字，含有無限技巧、玄機和無奈。

威權時代，處理總統相關的新聞，要非常謹慎小心。我記得報導總統國宴新聞，小到參加國宴的來賓，都要注意他們的職位高低排序，誰在前、誰在後，這可是一門學問。你也必須觀察很細微的事情，核對總統府提供的賓客名單，他們是不是夫婦都到了，如果漏寫夫人，那位官員會來抗議，理由是親友會以為他離婚或夫人去世。多寫了夫人，一樣麻煩。

現在，新聞報導提到總統，可以直呼其名。蔣中正總統時代，國內新聞報導只寫「蔣總統」，很少提到名字，而且在「蔣總統」前面都要空格，以表示尊敬。其實這沒有任何規定，但在當時就是一種不成文的慣例。中央社發到國外的新聞規定，要寫全銜全名，總統也不例外，必須寫：「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

蔣經國就任總統，我們立刻面臨一個問題，新聞中出現兩個蔣總統時，如何區隔，當時似乎忌諱用「故」蔣總統，來指稱蔣中正。

在某些時候，中央社對媒體扮演引導者角色，這並不表示他們完全地贊成，而是他們沒有更好的抉擇，或是不想肩負責任時，採用中央社的處理方式。

我們經過商討，決定用「總統蔣公」代表蔣中正，至於另一個蔣總統，則用「蔣總統經國先生」。總統蔣公的空格還是保留的，空在蔣之前，蔣總統經國先生不再空格。

蔣經國開始不加空格，是我們突破常規的一次試探，試試如果不加空格，有關方面會不會有意見。闖過這一關，處理總統新聞，許多禁忌漸漸消除，我們最高興的是，寫稿不必空一行，新聞稿不要送審，新聞報導尺度放寬了，壓力減少。

我一向認為，新聞自由是爭取來的，不是等人家送上來的。

中央社記者犯大錯

我在中央社時期，還有一件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我們犯了新聞專業錯誤。

一九七〇年代，我國外交遭受到嚴重挫折。美國尼克森總統在一九七二年到中國大陸訪問，發表「上海公報」；第二年互設聯絡辦事處；接著，一九七八年跟中國大陸建交，與我國斷交。當時政治氣氛敏感，處理政治、外交新聞需要非常謹慎小心。儘管我們提高警覺，還是犯了一個很大的錯。

安克志是最後一任美國駐華大使，一九七七年五月三十日，台灣華美協進社舉行酒會，歡迎到台中訪問的安克志大使夫婦。鄭通和社長在會中致詞時，提出「我們的心願」：希望卡特總統及美國政府與中國大陸共黨政權商談邦交問題時，要堅持他所宣布的外交政策三原則（重視人權、尊重國際道義、信守友邦間所訂的條約），不受大陸共黨政權的任何要挾而有所讓步，致使損害到中美兩國多年邦交，更不能背棄中美兩國間所訂立的協防條約……。

安克志當時回應，……他會敦促華府人員注意，並代為轉達……。

我們記者在報導中，引述安克志大使講話，加以推測：他強調，卡特總統將會履行協防條約義務，維護中華民國的安全。事實上，當時，美國已經快要跟我們斷交了。

安克志立刻否認說過這句話，美國駐華大使館向外交部提出質疑，外交部次長錢復打電話給中央社社長魏景蒙，要求說明。當時我是中央社國內新聞部主任，接到社長清早來的電話，就知道出事了！

這則新聞是台中分社發回來的，因爲新聞內容正面，沒有觸犯禁忌，所以也不覺得有什麼問題。負責核發分社新聞的副主任胡黎明，非常資深，經驗豐富，曾懷疑安克志講話的眞實性，打電話向台中分社主任求證，對方的回答是：沒有問題，記者現場採訪。

採訪這則新聞的記者，才剛入行八天，對外交新聞敏感度不夠，不瞭解外交大使所講的每一句話都很重要。他最後還寫了長達五頁的辯駁書，認爲自己沒有錯。

在我們追查、檢討這個錯誤的過程中，發現確實已經作過各種查證，但是基於對記者的尊重和信任，沒有進一步追問來龍去脈。最後，我承認，我們錯在沒有打電話向安克志大使求證。

這場風波，說明了在第一線採訪新聞的記者正確報導的重要性。任意引申、想當然推測、解釋或是斷章取義消息來源的重要談話，很容易造成難以預料的錯失。

離開中央社

大學畢業到中央社，從實習記者、試用記者、記者做到國內新聞部主任，我在這個大家庭學習成長。我一直以爲，我會終老在中央社，不會離開。

一九八一年七月，我的人生有很大轉折。被要求轉任《中華日報》副社長。當時中央黨部文化工作會主任周應龍，在一個颱風天，打電話徵詢我的意願。至今我仍不清楚，當初黨部爲何考量我。

在這通電話之前，我在中央社從副主任到主任，已經做了差不多十一年，面臨長期緊繃工作的倦怠感，有著一股突不破的瓶頸，希望調個工作，有個喘息的機會。

我曾經找總編輯曲克寬，他是我很要好的朋友，請他幫我調個職位，讓我喘口氣，但他婉拒，他承認：「我有點自私吧！」因爲他覺得我在主任職務上，已經掌握得很好，對外也建立良好的關係，他希望我繼續幫他的忙。

在這種情況下，我接到了周應龍的電話，希望找編採專業的人，協助中華日報發展。

當時文工會對黨營事業主管的調動，似乎很流行「考慮三天」，他給我三天考慮的時間，但不能告訴任何人。經過「深思熟慮」和內心的掙扎，最後我接受了這個新的任務。

除了原本就想轉換環境，我決定迎接新挑戰的另一個原因是，二十年來，我接觸的偏重通訊社新聞編採業務，換個媒體，可以接觸新的東西，像是報紙的編輯、廣告、發行和印刷，獲得新的學習機會。

索忍尼辛來台幕後

我擔任中華日報副社長時，新聞報導的禁忌已開始慢慢解除。中壢事件爆發後，政府常常舉行背景說明會，讓媒體瞭解新聞事件的背景，不再完全封鎖消息。它的突破是讓媒體知道訊息，但爲了維護國家的安全、社會的安定，仍希望媒體暫時不要報導。這種缺乏約束力的默契，往往成就某一媒體的獨家新聞。

黨營媒體有以國家安定爲重的使命感，也比較接受上面的指示，但民營媒體則沒有這個枷鎖，可以刊登很多黨營媒體所不能發的新聞。我想，這是爲什麼黨營媒體愈來愈沒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印象很深的一個例子是，俄國著名小說家索忍尼辛於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六日來台灣訪問，引發的

風波。

接待單位在背景說明會中，宣布了這個大新聞，並說明索忍尼辛來台的條件之一，是事前要絕對保密，不能發布新聞，待他觀察五天，確信安全無虞，由他主動舉行記者會公開行程，如果提前報導，他就會立刻離華。

當時十八家媒體代表勉強作了口頭承諾。但是，各媒體都派記者去機場採訪，拍下這位非常顯眼的大鬍子作家鏡頭。那時候，我剛接中華日報社長，面對採訪組送來的新聞稿和照片，發？不發？很是矛盾。打電話給中央日報社長姚朋，探詢他如何處理？我們都很爲難要不要遵守協定？掙扎了很久，我們還是決定信守承諾，依約壓下這則新聞。

第二天，中國時報在「以新聞價值爲前提」的名目下，獨家報導索忍尼辛抵台新聞，還刊登照片，群情譁然。據說索忍尼辛非常生氣，但並沒有拂袖而去。中央日報以社論痛斥中國時報不守承諾，中國時報也以社論還擊。同時，十七家媒體總編輯或採訪負責人發表「我們的共同聲明」。

黨營媒體的困境

黨營報紙遵守承諾，或按照上級指示不發新聞時，往往被視爲漏了新聞，造成很大的傷害。記者開始表達不滿和委屈，希望尋求突破。

舉一實例：桃園國際機場落成時，我已是中央社國內新聞部主任，我們有先見之明，搶先在機場租一間辦公室（唯一有據點的媒體），派了兩位記者和一名職員長駐採訪。並在附近購置一棟小房子，供同仁臨時住宿。

有一天，兩位記者在出境大廳，看到一個阿兵哥拿槍威脅強求出境，跟憲兵發生爭執，大廳一片混亂，他們趕快躲在柱子後面，目擊全部事件過程，並拍下照片。這則獨家新聞，引起中外記者注

意，紛紛探詢中央社何時發稿或商借圖片。我們立刻接到文工會主任電話，要我們暫時不要發稿，聽候指示。最後上級希望不發這則新聞。

我據理力爭，堅持這則新聞一定要發，理由是這件事發生在國際機場，當時有眾多中外旅客，不應該隱瞞，粉飾太平。新聞不發，可能引起更多揣測和謠言，同時，國外訂戶也來電詢問。經過兩個多小時電話來來往往商榷、溝通，他們終於讓步，同意新聞「淡化處理」，但照片不發。我們非常憤慨，又好無力感。當時我想，如果這則新聞發不出去，我如何面對我的記者。因爲他們是在這麼危險的情況下採訪。

我從記者做起，一路當上媒體主管。我很清楚當記者出生入死跑一則新聞時，最大的希望就是爭取見報的機會，當我感受到來自記者、上級的雙重壓力，我總是站在記者立場，用理性、委婉的言詞，說服對方，取得雙方都可以接受的尺度，慢慢地尋求一步步突破。

另一個黨營媒體衰退的原因是：連國民黨都不支持自己的黨報。當時中央黨部中常會是星期三舉行。第二天開行政院院會，政府重要人事案先在中常會通過，提到星期四行政院院會通過後，正式發布新聞。

每次內閣改組，媒體記者就開始大猜人事的變動，很得大眾的重視。但是，對黨營報紙來說，這種「猜謎遊戲」是一種禁忌。

有一次，中常會通過重要人事案，文工會直接提供給聯合報跟中國時報，希望他們不要再亂猜。第二天，兩報都刊登在一版頭條，處理方式像正式公布的人事案，有新聞、有人頭照配合；更權威的是，與當天行政院院會通過的完全一樣。我細讀全文，發現兩家報紙的新聞內容完全相同，相差的只有一個字。

當時我是中華日報副社長，非常地生氣與不服。在一次黨內新聞主管同志會議中（第一次參

加），我提出這件事，並質疑黨都不支持黨報，那黨報該如何繼續經營？獲得共鳴。

對黨營媒體而言，廣告問題更是嚴重。報禁解除前、限三大張的時候，聯合報跟中國時報的廣告「求過於供」，中華日報尤其是北部總社，在群雄環峙的環境中，爭取廣告眞的非常辛苦。《民生報》能異軍突起，應該歸功於聯合報的加持，據說，在聯合報登廣告的條件之一，就是在民生報也登廣告。

當文工會主任宋楚瑜希望中華日報改走民生報路線、成爲「中央日報的第二份報」時，我很明確地回應，我們可以改版，但中華日報不能走民生報路線，因爲中央日報沒有能力帶動中華日報的廣告，而且中華日報南社同仁也不甘淪爲地方報。

被迫離開新聞工作

或許是我的堅持、我的不聽話，使我離開我最愛的新聞工作。

當時文工會主任宋楚瑜告訴我，中華日報台北總社縮編南移，已是黨中央既定政策。他說，正中書局總經理蔣廉儒任期屆滿，將調升董事長，問我是否願意接任正中書局總經理一職。

對我來說，這是一生最大的霹靂，太突然，太意外。我學的是新聞，做了二十多年新聞工作，我的血液裡，流的都是新聞的血。要我去主持出版事業，賣書？那不是我的專長！

那天晚上，我度過了人生最漫長的一夜。經過反覆的思考，經過和家人和師長的討論、分析，他們共同的看法是：如果不接受，可能被猜測是否出了什麼差錯。他們勸勉我，縱使委屈，也要去拚一拚。我不得不結束我最喜愛的新聞專業生涯，進入全然陌生的出版界。

一九八六年七月一日，我接受了正中書局總經理職務，孤獨地踏入出版天地，迎接新的挑戰。

正中書局也是國民黨黨營事業，傳統是總經理制。它從中國大陸播遷台灣，歷史悠久，也是當時

出版界的龍頭，歷任董事長和總經理，都是黨的大老，或是國民黨的資深長輩。

我是正中書局第一位女性總經理，那時還算年輕，局裡同仁很難接受這樣的接棒人，一開始似乎不很歡迎。我從一些蛛絲馬跡發現，對於我這位女性總經理，有些人沒有信心、有些人排斥異性、有些人在旁冷冷觀看……。

打響正中書局第一炮

第一天走進正中書局，當下感覺就是：怎麼這麼破舊？這麼死氣沉沉。我默默地自許，要和「正中人」一起把「正中書局」這塊老招牌重新擦亮！

我到任沒多久，立刻面對一年一度的春季推銷，必須編印適合中、小學生閱讀的課外讀物。編輯部提出四本字體都已模糊的老書，建議換個封面就好了，編印新書時間已來不及。我想今天新聞第二天見報，三、四個月編一本書應該可行。我請曾服務新聞界的副總編輯章益新（筆名梅新，作家、詩人），共同規畫請幾位名記者分別訪問王永慶、李遠哲、杏林子、許倬雲等十位各行各業奮鬥成功的人。這本勵志書取名：《叫太陽起床的人》，趕上春銷時間。

經理部告訴我，傳統促銷方式，由總經理出面，跟中學校長吃頓飯，把新書介紹給他們。我滿懷委屈，自問：「我怎麼淪落到去賣書？」我反覆思考，尋覓答案，最後，我說服自己：我是推銷一本好書，不是販賣毒品。這段心路歷程，增強了校長們對我的信賴。

這本書成了長銷書，讀者遍及各行各業，共賣了六十萬本，這是我到正中書局打響的第一炮。原本不太喜歡我的人，也慢慢接受我了。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底，我突然接到總統府電話告知，李登輝總統提名我為監察委員。

回想我跟李總統的第一次接觸，是我當中華日報社長時，那時他是台北市長，主動邀我商討將中

華日報轉爲「台北市報」的可能性。他認爲改版後的中華日報，是一份乾淨的報紙，適合市民閱讀。因爲中華日報除了黨股，還有百分之三、四的民間股份，最後決定將中華日報二版改爲台北市政版，由台北市政府一年撥新台幣一千萬元，購買報紙，每天分送全市鄰里長。

第二個淵源，是李總統夫人委託正中書局出版李總統言論集，慶祝李總統七十歲生日。這本言論集，李總統原想自行出版，請我提供意見，他瞭解以後，希望由正中書局出版，他們負擔編印費用。總統一家人都熱心參與每一環節，充分顯示他們對這本文集的重視。

意外當選監察委員

我跟李總統沒有深厚的關係，突然間被提名監察委員，很意外，也很遲疑。在李總統個別召見徵詢意願時，我提出了不適合的理由和顧慮。我也向李總統說明，正中書局董事長許新枝有很高的意願。

李總統微笑而堅定說：「這方面我自有分寸。」「你們代表不同的領域，他專長是政治，妳代表的是婦女、文化、傳播媒體。」正中書局董事長許新枝、總經理黃肇珩都被提名了，也成了話題。

提名，是難關的開始。我沒有選舉經驗，又無法適應「拜票」的煎熬。監委不是經由民眾直接選舉，而是必須獲得國民大會代表的同意，「拜票」是必要的。我天天去握手，馬驥伸幫我收名片，他跟我說：「妳握過的手，就算全部都投給妳一票，妳都不會當選。」

當時，某些國代放出風聲，監委只有二十九個名額，正中書局竟然就占兩個，一定要拉下一個，甚至於暗示是我，所以，都猜測我不會當選。

一九九三年一月十六日，投票結果出爐，意外地，我和許董事長都當選了。

媒體認爲我當選的原因，可能是國大代表在審查監委被提名人資格時，我的自我介紹不落俗套，

兼具理性與感性；兩次答辯，有力得體，留給大家很好的印象。

在四天半的審查會中，我們分別向國代作十分鐘的自我介紹，我主要的重點是說明，記者跟監委有很多相似點，而我做過記者，所以做監委是很合適的。我還記得在詢問時，民進黨國代陳菊提了一個問題：「黃肇珩，妳一直在黨營事業工作，妳知道民間的疾苦嗎？有資格做監察委員嗎？」我的答辯是，我當記者時，跑過漁農民等地方新聞。當時我報導的時候，妳還很小。

有一位國代竟然提出非常沒有常識、可笑的問題，他問：正中書局是靠拿佣金生存的，要我說明。但他卻不知道，出版社是拿佣金給人家，才能把書推銷出去，不是人家拿佣金給我們。

或許是我的態度不卑不亢，讓我得到了其他不認識的國代的票。就任監委後，我仍然保持當記者的精神。我也慢慢知道，監委的職責是對社會進行另一種監督與改進。

順其自然的人生

回顧這些歷程，我可以說，每一個職位都不是我去求來的，我總是單獨一個人到新單位，不帶祕書、總務、司機等，因此也受了不少苦和委屈。

我從來不作什麼生涯規畫，一切順其自然。原本我真的以爲我會在中央社跑一輩子的新聞，老了能當報紙副刊編輯，沒想到後來有這麼多轉折、變化。

我是一個樂觀的人，所以我很快樂。我掌握現在，今天的事情今天結束；過去的就讓它過去，未來也不想太遠。有時候我會聽到別人對我的耳語，當下我會很生氣，可是慢慢地，我學習愈看愈淡，耳語進不了我的生活，不愉快情緒也排除在我的夢境外。

我用善意處理任何事情，以鼓勵取代責罵，我不太在眾人面前指責同仁，也不喜歡在很多人面前或背後論人是非。如果有事情，不管是好事或壞事，我比較喜歡單獨告誡或嘉勉，有時候，寫張短箋

放在抽屜裡。

我覺得人心是善良的，曾經對我很不尊敬的人，我會認爲這中間一定有誤會，但我不常去解釋誤會，因爲解釋是沒有意義的，假如他是明理的人，他自會辨識是非對錯。我自認對得起自己的良知，做的是對的，我就這樣做下去。

記者角色：尊嚴、良知、智慧

二十年記者生涯，我只是想做一個有尊嚴的、有智慧的、有責任感的記者，也一直朝著這個方向走，這是我的堅持。今日的記者要守住自己的堅持，都難。

我當記者的年代，是戒嚴時期，新聞自由受到很大箝制。新聞政策是一股壓力，通常是一層層下來的，從黨政高層到社長、總編輯、主任，上面的長官都幫記者扛了，所以我沒有感受到直接的壓力。

今天的記者，享受充分的新聞自由，卻直接承受經營者的壓力。媒體經營者較不重視新聞倫理和專業，大多是從商業的角度思考，做新聞像做業績一般，有好的業績，就給獎金、升遷，業績不好，隨時要你走路。

缺乏新聞理念的媒體老闆，將媒體視爲自己的資源，記者在這樣的媒體做事是很辛苦的，老闆叫你往東，你就不能往西，不然就是選擇離開。今日的記者沒有自主權，還不如我們當年，看到這種情形，我只能感嘆。

除了來自媒體老闆和上級主管的壓力，今日記者所面對的外部壓力，還有來自媒體間的激烈競爭、政治衝擊、社會暴力和環境誘惑。

有些記者，在無法掙脫層層壓力下，失去自我和方向，以至於隨波逐流。他們不知如何把持專業

精神，甚至於漠視新聞倫理，曲解價值觀。

值得欣慰的是，當我擔任一些新聞獎項的評審時，還是會看到有些記者，默默地在新聞園地耕耘，設計專題或深度報導，從不同層面，挖掘社會問題，指出問題癥結，程度也很不錯。固然有些人說，他們是爲了得獎，但是做總比不做好吧。

在失序的媒體機制中，今日的記者需要更高的智慧、更強的堅持、更大的勇氣、更清明的良知，向四面八方的壓力說：「No!」

◎初稿：廖雅琴

◎校訂：張錦華

◎定稿：何榮幸、黃肇珩

◎訪問時間：二〇〇七年三月十八日、十九日

◎地點：台大新聞所「新聞論壇」會議室

俞國基

俞國基

〔第四章〕

來自中南部的聲音

一九七一年台灣時報總編輯

前頁圖說：
2007年故宮大觀展由《自由時報》協辦，俞國基以副社長身份介紹文物特色。
（自由時報提供／沈昭良攝）

每個新聞工作者都希望跟他一樣，能在報老闆面前擁有直言無諱的「言論免責權」。但前提是，你必須先擁有跟他一樣的無數總編輯、總主筆頭銜，你才可能不必看老闆臉色說話。

一九七一年南部眼科醫生吳基福創辦《台灣時報》時，他就已經是總編輯了，本來興趣在於藝術史、寫影評的他，從此與政治要聞長期相伴，一路擔任南台灣、中台灣、海外媒體、北台灣重要媒體高層，只有東部與離島媒體沒有他的足跡。

戒嚴時期的中南部媒體自成一格，與北部黨營媒體、兩大報皆大異其趣，他就是中南部媒體發展的一頁活歷史。他對台灣「報老闆學」的親身體驗與觀察，當代新聞工作者恐怕也無人能出其右。

他在美國左、中、右立場的華文媒體都曾待過。談到當年觸犯禁忌離開媒體、被迫擺地攤維持生計時，雖然有一種心酸，但他的眉宇間早已雲淡風輕，那是飽經滄桑後的釋然與豁達了。

我們很希望，到了他這個年紀時，還能跟他一樣幽默、爽朗、健談、百無禁忌，而且這麼會說故事。從這個角度來看，與報老闆長期相處的「伴君如伴虎」經驗，未必會完全扭曲人性，至少在他身上看來並非如此……

俞國基大事記

1931 俞國基出生

■1960任職於故宮博物院

■1962台南一中數學與國文老師

1971 退出聯合國

■1971台灣時報總編輯

■1977台灣日報總編輯

1979 美麗島事件

■1980舊金山遠東時報總編輯

■1981紐約中報總編輯

■1983美洲中國時報總編輯、總主筆

■1984紐約北美日報總編輯

1987 解除戒嚴

■1987中國時報總主筆

■1996自由時報執行副社長

2000 政黨輪替

■2007自由時報副社長

凌空看政治的專業新聞人

我踏進新聞界，完全是偶然。在台南一中教書時，適逢《中華日報》登報招考編輯。我沒有受過相關訓練，不諳編輯實務，但我自小即對新聞事業有一分憧憬與好奇，加上編輯是晚上工作，可以多一份收入，我便大膽去應試。當時中華日報主任趙效沂認爲我中文很好，就錄取了我。之後三年，我白天教書，晚上編報。

自由中國的啓發

我們這一代人，只要對政治有想法，都受到《自由中國》半月刊的影響。自由中國傳達自由主義的理念，它也是社會的座標，告訴我們知識份子的責任與理想，以及對自由民主的嚮往。關於新聞自由的意義、新聞應該獨立於政府、新聞記者應有良好的人格、新聞對社會有責任等概念，自由中國都給予我很多啓示。

因爲我有自由主義的思想，逐漸和黨營的中華日報格格不入。第一，我不是黨員，我未入黨，甚至服役時，半夜長官叫我起來，要我塡表入國民黨，我仍堅持抗拒。有一次中華日報採訪主任出缺，同僚推薦我。主管們要我先入黨，才會考慮，我還是堅持不入黨，於是也失去了升官的機會。除此之

外，舉凡新聞標題製作、對新聞的觀點等，我的理念也與報社的理念大相逕庭。

後來爲了避免衝突，我轉編影劇新聞並兼寫影評，但麻煩還是上身。

我本來就喜愛藝術，雜學甚多，電影也是我的業餘喜好。我所寫的影評重視深度與公正，很多讀者往往以我的影評作爲是否去看電影的依據，所以我的影評有市場影響力。當時台南有間黨營的「延平戲院」，報社主任私下找我，要我寫影評時多捧黨營事業的場。我不認同他的想法，因爲，我捧了黨營戲院，會失去我的公信力。後來這件事鬧得很不愉快，主任也就不准我再寫影評。此時我已下決心要離開中華日報了。

提升台時水準曲高和寡

一九七一年，高雄地方仕紳吳基福創辦《台灣時報》。他用夏曉華在台中《台灣晚報》的登記證，透過中華日報記者許世兆的黨政關係，將登記證移到高雄。他們找我，希望我能擔任編輯主任。我認爲私人的報社較可發揮理想，便辭去中華日報，來到高雄。

當時台灣時報的薪水，僅夠一家基本開銷。我家租個小房間，連最基本的電話都裝不起。當時我小孩還吵著說：「怎麼家裡沒有電視？」我就在外面裝支天線，假裝家裡有電視，滿足一下小孩的虛榮心。後來我也在屏東師專、高雄師範學院兼課教書，貼補家用。我同事們也多在外面兼差，當時專任新聞人員這條路，日子很苦。三、四個月後，我接任總編輯，讓我有了更多的發揮空間。

我的新聞生涯經歷那麼多報紙，最能讓我發揮的，就是這段時期。我幫台灣時報建立了整套的工作程序、內勤工作制度等。報社創立之初，財務相當困難，但當時的新聞工作者充滿了熱忱與理想，雖然待遇微薄，一份新興的報紙仍充滿了和樂的朝氣。

正式接任總編輯後，我把台灣時報定位爲有理想、有水準的報紙，並進行一些規畫：

第一，我對記者的寫作要求嚴格，設置一個「整理組」。當時有位跑軍事的同事，很會改稿。所以我要求凡是重要的、作頭題的稿子都要經過他潤飾。改完後，我還要求原作者閱讀，理解改稿的理由。

第二，我們的專題很用心。比如說，當時「計程車」剛起步，我們便企畫專題，除訪問司機與他們的家人外，還追溯計程車制度的源流，並且還找出古代（戰國時代）的車子圖片等來配合新聞。我們還整理了高雄市的交通概況與不合理的交通政策。此種有地域性的專題引起讀者很大的迴響。

雖然台灣時報的收入不多、報社規模小、人才也不如大報，但我卻能盡情發揮。而且它地處偏遠，較不易引起中央的注意，受到的政治控制也較弱，所以我們經常「偷渡」一些自由思想。比起台北，我們較有空間。那幾年裡，台灣時報以思想開明、新聞品質著稱，受到菁英階層的肯定與歡迎。但對一般市民來說，台灣時報卻顯得調子太高。我後來反省，辦報也需要考慮市場。我將台灣時報調子拉成曲高和寡，報份銷量差，也使得報社財務困難，算是對環境的誤判。

警總無所不在

在戒嚴時期，警備總司令部的影響力無所不在。那是個風聲鶴唳、動輒得咎的時代。

有一次，一架國軍訓練機因引擎故障，掉落在高雄岡山鄉間，砸壞了幾間民房，造成死傷。這是地方的大新聞。但晚上警總南部值星官撥電話問我：「這則新聞你們有嗎？」我說：「有啊。」他說：「我只告訴你一句話，不能見報！」他說不能做，就不能做。第二天，所有報紙都沒有這則新聞。那時，警總就是新聞的主宰。

台灣時報曾出過一個很大的紕漏（前面那個不算紕漏）。有一年的十月一日，副刊文章有一行字被拿掉，換成「今天是我們的國慶！」（十月一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報社大概在上午五點多

發現，將所有印刷機暫停，但還是有少量的報份送出。這是大事，警總認爲「一定有匪諜」，便派人到報社坐鎮、清查。一個多月後，警總終於找出一名工人（不是匪諜）爲了私仇，利用職務之便，竄改文章，嫁禍給另一個工人。後來他被關三年多，左腿也被打斷了。

還有一次，調查局到我家敲門，質問爲何副刊文章的作者居然是「共匪作者」的名字？但我沒看過共黨報紙，怎麼知道共匪的名字呢？而且副刊作者很可能使用筆名，偶然同名也非意外，居然會因此被質疑。這樣的控制，是現在無法想像的。

警總消息眞靈通，監視無孔不入。中國唐山大地震時，台灣時報有一張「唐山大地震」的照片流傳在外。警總要清查，就抓我到警察局查詢。盤查後發現，原來是報社中管理外電照片的同事，將這些照片拿給唐山老鄉看，照片才流出去。他們也全被警總傳去問話。

當時管制新聞的黑手，大致有四條線，一是警總，其次是調查局，三是國民黨文工會，四是軍方的政工單位。前兩者是威嚇性的，後兩者是懷柔性的，四管齊下，不怕你能逃出這個天羅地網。

新聞工作的使命感

這種言論控制的效果，解嚴前後，感受很深。戒嚴時期，作爲新聞工作者，覺得新聞工作是有使命感的。我們經常用一根針去「刺」它一下，刺當政者或刺政策面，例如我們曾刺過救國團、刺一些不合理的現狀。雖然在戒嚴體制下，新聞界的針砭，有時卻也會得到有效的反應。它會回刺你，甚至一拳把你打倒。但有時也會產生正面的作用。

我們常在寫文章的時候，裡面偷偷暗藏些諷刺的、隱喻的文字，雖然是一些小動作，但也可以窺見我們當時的心理。第二天刊出時，我們便等著反應，看會不會出事、警總會不會上門。「沒事！」就會放心又開心、有一種偷渡成功的樂趣。有時候，他們會有反應，但反應沒有強大到把你打死。反

應過後，就覺得：「喔！又走了一關！」這也算是一種成就感。

當時新聞工作確實瀰漫著恐怖氛圍。我記得有天晚上，幾個同事在我家打麻將，因為聽到搓牌的聲音，好幾個警察敲門盤問。其實沒有發生什麼事，但一位同事當場竟嚇得暈倒。這是當時普遍的心理壓力，害怕警總來抓人，那樣恐懼的感覺，強烈到讓人休克。

在戒嚴時期，新聞圈所期待的以及談的話題都是「如何突破戒嚴」、「如何走向民主」、「怎麼樣讓台灣的社會好起來」、「要如何刺激國民黨接受開放的思想」等。現在已經解嚴了，政治也開放了，新聞也自由了，當然也不再想「突破」什麼了，可是現在的媒體環境，與過去差別很大，現在的政府、政治人物怎麼「刺」都沒有反應。現在當記者，寫什麼都像丟到水裡面一樣，沒有反應，在成就感上還不如戒嚴時代。

戒嚴時期，存在威權政府這種明顯的目標，又有警總在背後盯著，身為新聞從業人員，反而很有使命感、很有理想，會覺得自己有責任，要解放思想、扶正社會。所以最近我常開玩笑說：「拜託，把警總恢復一下好不好？」我覺得，當前媒體界，已經失去拉拔社會向上提升的理想，這是解嚴前後最大的差別。

不願被收買而擋人財路

當時南部報業，記者收賄的風氣很盛，我對此深惡痛絕，所以嚴格把關。但台灣時報同事卻有怨懟，認為我擋人財路。

例如，當時高雄左營加工出口區的某位主管，爭取外派到沙烏地阿拉伯擔任大使，但他有個公開的婚外情對象，擔心事情曝光會失去外派的機會。所以他跟《台灣新聞報》某總編輯談好條件，要用錢壓下新聞，同時也收買了我們報社一名記者。

這位記者收錢後告訴我，希望壓下新聞大家來分這筆賄款，某總編輯也致電跟我說：「如果嫌錢少，這一部分錢全部給你們，我的部分再跟他談。」他居然以爲我嫌錢太少！我當然沒有拿錢，而且也報導了這件新聞，結果這位主管的外派機會就因爲新聞曝光而泡了湯。從此，這位總編就跟我絕交不相來往。

南部很多老一輩的記者，收錢的風氣很盛行。王玉雲做高雄市長時，每年除夕晚上，會找很多記者到家裡打牌，固定輸錢給記者。打牌前，他會先預訂價碼，他說輸三萬，就眞的輸三萬，說輸五萬就是五萬。好幾次他請我吃飯，我都沒有出席。所以在當地，我們是辦了一份很乾淨、聲望很好的報紙。

提升報紙水準是我個人的理想，但社長許世兆先生是社會記者出身，我們對新聞常有不同看法，也常起衝突。加上人才不易網羅，沒有新人刺激進步，幾年下來，我已逐漸厭倦台灣時報的環境。

接下台灣日報總編輯

一九七七年，黨外運動風起雲湧。種種跡象顯示：國民黨的威權控制已漸鬆動。與國民黨政府關係良好的傅朝樞，已在台中接下夏曉華先生的《台灣日報》，派人與我接洽想聘我當總編輯。我認爲，省議會在台中，當時的省議會是政治風暴中心，很多議案都是在省議會中討論，應該是一個可以發揮的地方，就接受了這項工作。

傅朝樞對我相當禮遇，待遇高，又提供宿舍。到任第一天，他舉辦盛大的宴會歡迎我，而且他給我人事權，從採訪主任、編輯到記者，我都可以自由部署。當時我向他建議，將重點放在黨外新聞，他也同意，要我朝此目標發展。

但後來我發現，傅朝樞並不是一位眞正具有理想的報老闆，只是想藉辦報擴大政治影響力。他玩

弄兩手策略，一邊與國民黨關係良好，與蔣彥士、王昇都有交情；另一邊則大做黨外人士的新聞，希望以「養寇自重」來提高身價。

舉例來說，有一次，蔣經國當行政院長時，當時國民黨文工會下令，所有的報紙不准猜測、評論或刊登蔣經國可能接任總統的新聞。因此外界推斷：台灣政治會朝內閣制發展（嚴家淦做虛位總統，蔣經國是有實權的行政院長）。但傅朝樞說，他熟識蔣經國身邊的人，這個人告訴他，高層並不傾向內閣制。

因此傅朝樞便要求寫一篇「天與人歸」爲題的「社論」，恭請蔣經國「競選總統」。

第二天見報後，傅朝樞跟我說，「那個人」告訴他，蔣經國一早看到這篇社論後，只笑了一笑，未作任何反應，證明這篇社論是講到蔣先生的心坎裡了。之後各報跟進，通通「天與人歸」！顯示蔣經國的確想當總統，只是要別人先營造一個氣氛，然後才表態。先前文工會的命令只是假動作，而傅朝樞也很得意，靠著報紙跟層峰套了不少交情。

國民黨的拉攏與刁難

由於傅朝樞也有意靠黨外提高身價，因此我建議他可以聯合黨外力量，不妨將報社分銷單位設在黨外人物的地方服務處，靠著他們的人脈來推廣報份。我們把黨外整批人（包括桃園縣許信良、台南市蘇南成、雲林縣蘇洪月嬌等）都串連進來，於是台灣日報與黨外的關係相當緊密，也靠著黨外將報紙發行量推到一個高潮，不到一年報份漲了三到五倍。

當時省議會中的林義雄，以及其他黨外議員，都與我們建立了很好的關係，我們簡直就變成一份黨外的機關報了。但台灣日報跟黨外力量結合，也自然引起國民黨的緊張。黨外勢力不斷坐大，國民黨也意識到危機，一面拉攏，一面壓制。

有一次，我坐莒光號到台北辦事，省黨部某副主委居然坐我旁邊，跟我攀談。他要我「幫忙」爲他做情報，並願提供我一些「補助」；這「補助」居然是我當時薪水的四倍。我跟他敷衍過去，這件事也就沒下文了。我坐的莒光號是對號車位，副主委就坐在旁邊，這實在太巧了。當時黨部的情資工作實在無孔不入，無法收買的，就加以壓制。

還有一次，媒體從業人員組織一個訪日團；我被選爲團長。但出境證始終沒有核發下來。我發現情況不對，找中華日報的好朋友甘夢龍幫忙。他父親曾在情治單位任高官，有些關係。甘夢龍直接帶我見警察局長，局長將承辦人員訓斥一頓，要他盡速辦妥。後來一直等到訪日團都回來了，我的出境證才下來。當時他們就是故意要刁難我，但卻又在我面前訓斥承辦人員，保住我的面子。這些其實都是演戲，用打混的方式拖延，讓我不能出境。

被迫「流放」海外辦報

一九七八年，美國國務院邀我訪美，由駐台灣大使安格志親自出函邀請。我用他親筆寫的邀請函，好不容易才申請到出境證。訪美四十天後回國，回國的那天，傅朝樞親自告訴我：「報紙要賣了。」他說總政戰部答應他所開出的所有條件（包括財產變現、結匯、負擔稅務等），但要求他、我與吳哲朗三個人一定要離開台灣，不然就準備坐牢。

以我當時對台灣政情的觀察，想要繼續辦一份言論自由、推廣民主的報紙，實在困難，不如到美國找個基地，也許是很好一個機會。所以，待家人都拿到美國的長期簽證後，我就離開了台灣。

當時的台灣，在「中壢事件」後，民主自由的要求已在民間風起雲湧。在這個大環境下，國內有相繼到海外辦報的風氣。除了傅朝樞外，吳基福也想在美國辦報，曾找我協助。他說：「台灣辦報紙壓力太大，美國有個據點，可以幫助我們在台灣生存。」同時，中時董事長余紀忠先生也有意到美國

辦報紙。在當時台灣的政治氣氛下，報老闆都有意到美國去找據點辦報，想藉由海外言論自由的保障來保護自己。後來這些華文報紙在海外（其實就是美國）大幅報導國內不能報導的新聞（如黨外消息），讓訊息「外銷轉內銷」，對台灣的民主運動影響頗大。

到了美國，雖然我持續與傅朝樞聯絡，但吳基福力邀我辦報，我當然選擇吳基福。他是醫生出身，也是一位讀書人，沒什麼心機。而傅朝樞黨政關係比較複雜，不是為理想辦報。所以我選擇到舊金山的《遠東時報》，替吳基福工作。

舊金山遠東時報經驗

我很懷念《遠東時報》那段時期。當時我們延攬了很多人才，像林博文、邱立本與陳秋坤、林馨琴夫婦，這些名記者、名作家，當時都在遠東時報工作。遠時人手雖不多，但理念相近，相處融洽而愉快，是我最值得懷念的一段時光。

在新聞界多年，我最引以為傲的，就是替新聞界引進很多人才。我認為一個報社中，最重要的資產就是人才。一個總編輯，能考慮到的層面有限，好的人才可以幫助思考、豐富想法。像在美國辦報期間，只要幾個真正的人才充分發揮，就可以做出很有深度的報紙。不論到那個媒體，我都很注意人才的引進：看到好文章，會記得作者是誰；看到一個好的版面，會留意美編是誰，進行追蹤。

遠東時報也靠台灣報社供應消息，每天收到傳真後，有專人負責剪報。我們寫作的水準、校對的要求都很正統，送印前，還揀字、排版。所以比起當地其他僑報，我們是很具規模、水準的報紙，一出版就讓僑界耳目一新。而且海外的台灣人，很希望能有制衡國民黨的力量，所以相當支持遠東時報。

但遠東時報營運還是問題重重。它從台灣帶了一批揀字工人過去，人事成本很高。而且總部選在舊金山（而不是洛杉磯）設立，舊金山老僑較多，老僑對台灣的新聞不太感興趣；所以即使報紙品質

佳，還是遇到財務困難。另外，當時的社長是許世兆先生，我們在新聞理念、管理方式上都有不同的看法。在這種情況下，我選擇離開遠時。我的工作由陳若曦小姐接任，但只繼續了幾個月，遠東時報就關門了。

一九八一年，離開遠東時報後，傅朝樞跟我聯絡，提起當初準備要在美國辦報的規畫，希望我幫忙。根據之前的經驗，我要求雙方訂立合約，第一條就是「不受黨派、政治的介入」，他同意。他希望能辦一份涵括大陸與台灣新聞的華文報，我根據遠東時報的經驗，建議他將總部放在紐約。

中報立場左傾選擇離開

傅朝樞之前已經在香港辦了份報紙，取名《中報》，意思是立場不偏不倚。他也把紐約這份稱作中報。當然我也希望報紙的言論能站在中間的位置。

但事與願違。過去傅朝樞不只與國民黨高層關係良好，到美國後也一直跟中共高層有交情。甚至，他還收了「新華社」的財務補助，爲中共作宣傳。開始時尚不敢公然顯露其左傾的態度，直到「王炳章事件」發生，我才恍然大悟。王炳章從中國出來，到加拿大留學獲得博士學位。他是第一位海外的反共異議人士，他邀集了一些同志，在美國建立組織，辦了一份《中國之春》刊物爲中國的民主呼籲，中報也作了相關報導。

有一天，傅老闆要求我，不要刊登太多王炳章的新聞，說他「拋棄元配，私德不好」，又說他們「拿國民黨的錢到美國辦中國之春」。但我認爲，私德不好跟新聞價值是兩回事，站在支持民主自由的立場，報導中國之春的新聞有何錯誤？就拒絕了老闆的要求。

兩、三天後，傅朝樞突然要我幫他去香港處理一些重要公務。到香港後，等了很多天，一直沒接到他任何指示。我很納悶，就撥電話問紐約中報的同事。同事說，我離開這幾天，新華社送了很多不

利王炳章的稿子（包括王炳章元配的聲明、對王炳章的譴責等），報社通通登出來。原來老闆故意把我支開，就是為了方便刊登不利王的新聞，向中共交心。

一個月內，接著又發生「吳榮根事件」。吳榮根是中國的飛行員，駕機逃亡，到韓國降落，再開米格機到台灣來投降。這是很大的一則新聞。但當時人在香港的傅朝樞撥電話給我，要我把這則新聞刊在二版下方，標題盡量做小。這當然不行！這是多麼大的新聞，必然是一版頭條，怎可刻意放在報屁股上呢？這是全世界都會知道的大事件，就連《紐約時報》也會登在一版。我若遵旨照辦，豈不是我這總編輯失職？我甚至還說，除非立即解雇我，只要我還是總編輯，一定做在頭版！

第二天出報，新聞放在頭版，我跟他們的關係也降到冰點。後來，傅朝樞請我到他家吃飯，跟我攤牌。他給我三個選擇：第一，與他充分合作，不要跟他唱反調；第二，他出旅費讓我到中國旅遊。他認為看過中國後，我的想法會改變。但我選擇第三個，雙方一刀兩斷！事情演變到這樣，未來已難合作了。

海外刺激多元思考

儘管我在中報只有一年多，但也很有收穫。紐約的華人，有國民黨、共產黨及其他各種反共的、反國民黨的團體。我也有機會深入獨派聚會，還能接觸到非獨非統、只反國民黨的一些學者及政治人物。接觸面很廣，聽到很多不同的意見，刺激我的多元思考。

此時我重新思考了一些問題。例如，我本來很反左、反共，痛恨文化大革命。但是，到紐約以後，看到街頭竟有很多美國人在盲目地擁護文革。在自由民主的美國，居然有聲音支持集權，我感到震驚。這樣的刺激下，我會想：文革也許會有些正面的意義。

又譬如，我逛過美國人開的左派書店，裡面有中、英文書。居然在店中陳列了許多中文版的左派

1996年與余紀忠先生共餐。（俞國基提供）

詩集、理論等書。自己對這些其實不太懂，但卻覺得很新鮮。

在中報期間，很受左派拉攏，也有很多機會接觸相關人士，像他們的聯合國代表團、中共新華社的幹部等，他們平時都深居簡出，行事低調，若我不是在中報工作，是很難接觸到的人物。我也經常接觸一些國外的華人學者，聽取他們分析台灣問題。因此，我的思考變得比較全面而中性。

必須一提的是，早在我到中報之前，有一回余紀忠先生到過紐約，他透過關係找到我，邀請我吃飯。

我們第一次見面，他第一句話劈頭就問：「俞先生，你覺得民族主義重要，還是民主主義重要？」我脫口回答說：「當然是民主重要啊！」我說，現在談民族主義已經過時，而且很難清楚定義何謂「民族」，但「民主」卻是大家的共識。余先生十分贊同，笑說：

「好！我們繼續談。」

這是余先生問我的第一個問題。後來我才知道，余先生很欣賞當年我在台灣時報及遠東時報的表現，對我印象深刻，希望有機會合作。

余先生說，他很想在美國辦個報紙，問我是否可以幫他。我答稱因與傅先生已經有合約在先，不能夠悔約。最後余先生說：「好吧。以後如果有機會，我請你來，一定來，好不好？」

美洲中時總編輯的挑戰

後來余先生在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創立《中國時報》美洲版，許世兆擔任社長兼總編輯。隔年一月二日我離開中報，余先生得知消息後，撥電話問我：「上次的談話還有效嗎？」他希望我來擔任總編輯。但我認為過去和中時沒有太深的淵源，對余先生也不甚瞭解。而且中時很多老將，像周天瑞、胡鴻仁等，這些人與余老闆關係特殊，而我們之間也缺乏默契，在指揮上也許有困難。所以我採取拒絕的態度。

幾天後，余先生找我談話。我依約到他住的凱悅（Hyatt）飯店。一進去，看見很多中國時報的同仁。許世兆從裡面出來，第一句就對我說：「恭喜！你當總編輯了。」我一頭霧水，根本沒有想到要接任總編輯。因此我是在毫無心理準備、也毫無辦報藍圖下，接下總編輯的重擔。

這份工作有很多挑戰。第一，中時原本就有固定的班底，團隊裡每個人的個性我都不瞭解，過去也沒有交情。第二，這份報紙發展的方向，我與這些同仁之間也沒有什麼共識。所以，一開始，我就先與同事們做朋友。當時美洲中時真是人才濟濟。黃肇松、杜念中、周陽山、卜大中、楊仁凱、詹宏志、趙怡、林博文，還有CoCo等，都是一時之選。

到任後，我作了幾項改革。

第一，把字放大、增張。美洲中時在出刊時即已把字放大，並每日發行七大張，我到任後再將字放大，並增爲十大張。新聞大部分在美國採、編，副刊則由筆名南方朔的王杏慶在台灣編好，製成膠片空運赴美，包括家庭版、婦女版、娛樂版等。

第二，成立台灣新聞小組。我們參考台灣各報內容，加上蒐集的資料，改寫台灣傳來的新聞。所以台灣新聞也增加到兩大版，這也是美洲中時的特色。此外，我們的國際新聞也處理得很好，選材、編譯品質都很高。

美洲中時規模大，編輯部有幾十人，還有一個排字房、印刷工廠。美洲中時的同事們都很優秀，十分有才華，我們相處得相當融洽。當時台灣言論管制嚴格，一些有抱負、有想法的知識份子都轉戰海外。像CoCo在台灣漫畫被禁，就到美國來畫。美洲中時正好提供一塊版圖給這些優秀的人才。後來這一批優秀的人才回到台灣，也帶回很多新觀念、新知識，對台灣的新聞界影響很大。

美洲中時提供海外華文界很好的示範。報社的每一個人才，都放在適當的位子上。不論標題、評論、新聞寫作等都很專業。新聞處理上，平衡、周到，也有批判性。我們採彩色排版、印刷精美，在美國華文報中是一流的報紙，很受到華人知識份子的肯定。

這段期間，余老闆很少干涉我們。我猜想，余老闆應是希望我們的言論有些衝力，給國民黨一些壓力。這也許有其個人和政治兩方面的目的。一方面他個人希望在海外有個支持他的力量；另一方面，他也希望能透過海外言論壓力，迫使台灣更開放、更民主。

轉任總主筆惹禍上身

當時余老闆爲了安撫國民黨，本來安排曾任國民黨文工會主任的陳裕清任總主筆。但陳裕清常以國民黨的觀點看問題。有一次，余老闆私下找我，希望我也參與社論工作，授權我修改主筆的稿子。

這一修，自然得罪了陳裕清，我們的關係也就緊張起來。

後來陳裕清請辭，余老闆和我商量，希望我接總主筆，將總編輯職位讓給周天瑞。接任總主筆兩個月後，正值美國大選，我們刊登了一篇希望雷根不再連任的社論，記得是這篇社論是由主筆群中的孫慶餘所撰，內容是說雷根年紀太大、身體不好，不宜連任。現在來看，這樣的社論極為平常，當時美國也有很多報紙提出同樣的看法。

但中國城有批華人，是美國共和黨的黨員，不同意這個觀點，他們把社論剪下，寄給當時駐美代表錢復。未料錢復當成大事來處理，將報導寄回國內，呈給蔣經國看。當時「八一七公報」已經公布，美方對台灣已施加壓力，台灣的外交處境確實不太好。蔣經國就找余紀忠談話，把社論往桌上一丟，說：「這篇社論破壞中美邦交。惡毒程度，超過共匪！」余老闆很緊張，不久後即飛來紐約，直接要我辭職離開報社。

沒有什麼辯駁的餘地，我能理解台灣內部壓力大、理解他的為難。當時就回到報社打包了。離開時我曾經求見當時的總經理余建新，但余建新也不願跟我見面，連電話都不能接。他們在報紙上宣布把我辭退，整個中時對外表現出已經跟我一刀兩斷、毫無關係。從這可以看出來，來自台灣內部的政治壓力實在很大。在這種處境下，余老闆一定要這樣處理，才能夠向國內交代、才能從惡劣的政治氛圍中脫身。

離開美洲中時後，為了生計，我和太太兩人去擺地攤謀生。剛開始，我很不習慣，總覺得放不下身段，還好我小兒子大力協助，他沒有拉不下臉的問題。他在美國求學，學校鼓勵他們學習獨立、吃苦。他覺得擺地攤很平常，幫我處理了許多事情。

過了兩個月，余建新終於來找我，我們約在公園碰面，他轉達了余先生的關切，並表示願按月給予補貼，以一年為限。雖然離開報社，余先生還能替我想到生活的問題，讓我覺得很安慰、很感激。

沒有多久，美洲中時因爲報導江南案，承受更大的政治壓力，在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停刊了，前後正好營運兩年。

訂約進入左派北美日報

擺地攤一段時間後，資深記者陸鏗問我有沒有興趣到《北美日報》服務。北美日報是一個紐約的華人小報。當年台灣日報出事時，它曾用全版來報導，因爲是海外報導，所以我有點印象。當時的老闆叫吳隆達，他對經營報紙一竅不通。後來我才知道他是中國大陸的華僑，跟共產黨關係良好，他常住香港，在香港經營一所旅行社，專門從事歐美旅客赴大陸觀光的業務。大概這層關係賺了不少錢，中共就命令他赴美（華僑身份可以作掩護），以旅行社賺來的錢經營北美日報。

當時陸鏗建議我，不必理會吳的左派背景，不妨要求與吳隆達訂立合約，這樣在美國法治的環境下才能有個保障，且能

1999年與資深媒體人陸鏗合影。（俞國基提供）

依自己的方向處理新聞。吳隆達答應與我訂約，包括不受黨派色彩干預、擁有人事權，以及我不需負責發行與廣告業務等，約期三年。一九八四年，我進入北美日報當社長兼總編輯。

第一年還算順利。吳隆達曾希望我修正對台灣問題的看法，我予以拒絕，並說明我希望促進台灣民主化的立場。在統獨問題上，我們經常有一些爭執，但他也會讓步，一切相當順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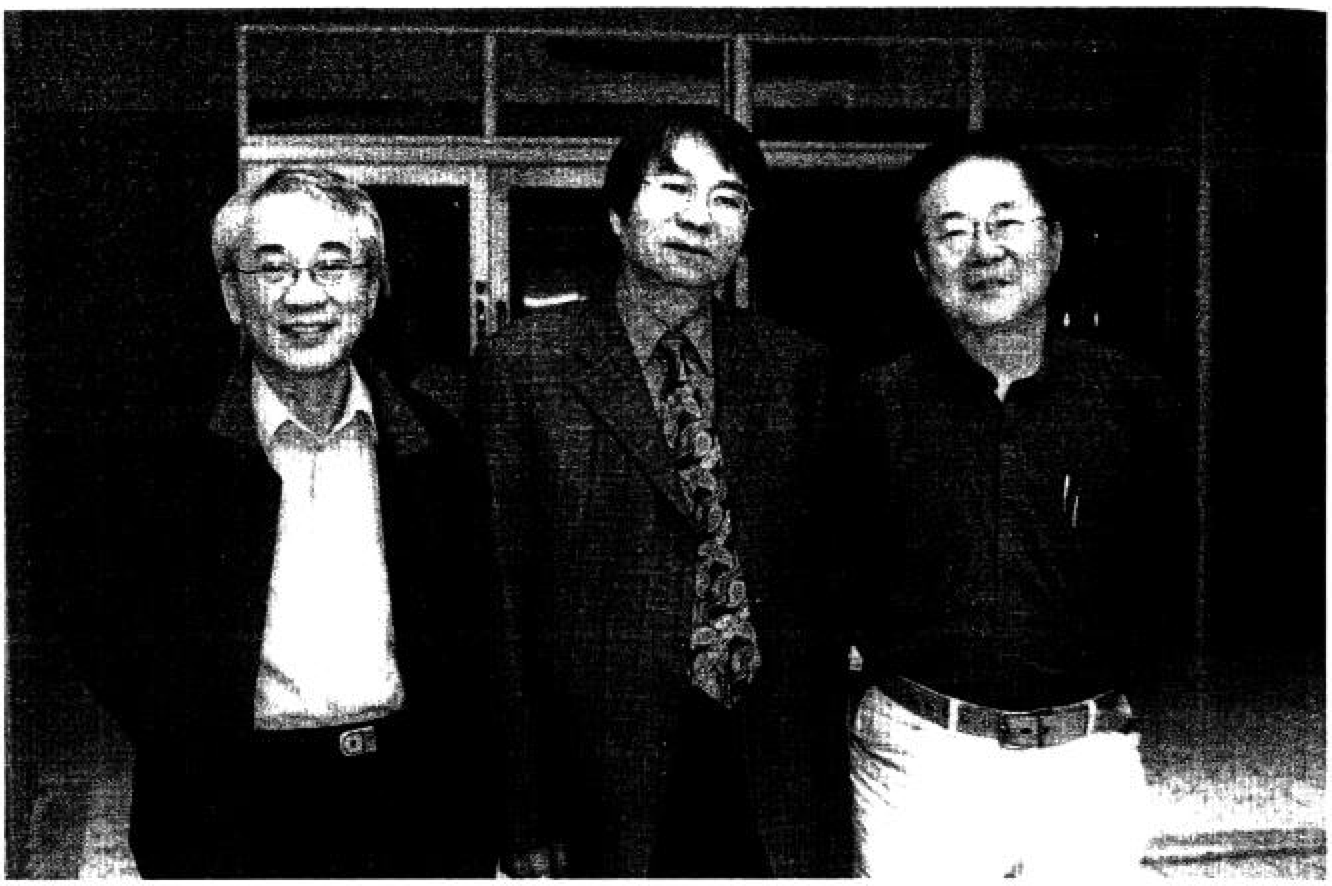
但第二年起，我們開始有了衝突。譬如，我批評中共的人口政策、墮胎政策。吳隆達很不開心，還找了「中新社」的社長諸有軍先生來「遊說」，說明中國官方墮胎政策的合理性。從那時候起，吳老闆開始干預新聞的處理。他會在我們拼版時，巡看當天的新聞。遇到與他意見不合的報導，會找人偷偷改掉，於是我們的關係開始有些緊張。

第二年結束，他跟我商量，要我只當社長，改由嚴昭先生來做總編輯。嚴昭來了後，我盡量不插手編輯部。但嚴昭不夠專業，而且一些觀念很偏左派。終於我就向吳隆達表示，雖然我還沒做滿三年，但未來相處可能很困難，希望他依約給我解職金，讓我離開。吳隆達同意我離職後，很多同事也跟著走人，沒有多久北美日報也就關門了。

解嚴後再任中時總主筆

我離開北美日報時，是一九八七年。那年七月解嚴，余紀忠先生知道我離開北美日報，問我回到中國時報的意願。當時國內的政治氣氛逐漸開放，能有機會回國也好，我便答應返回中時服務。十一月，他們透過政治關係讓我回到台灣。我又回到中國時報當總主筆。

其實，我曾跟余紀忠先生表示，希望不要擔任總主筆而去主持中部或南部新聞中心。因為當時雖然已經解嚴，但政治的寒流仍未完全解凍，言論壓力仍大，任總主筆負擔很重。但他告訴我一句話：「言論多重要！」台灣剛解嚴、正值政治轉型，時代在變化。我想余先生也許需要能接受這個變化的



上：2004年赴佛光大學傳播學系授課，與該系教授李利國（左）及戎撫天（右）合影。
下：2004年8月大陸媒體高峰會，與媒體朋友同樂。（皆由俞國基提供）

人，幫他主持筆陣。我在海外的經驗，或許能提供一些新的思考。

台灣雖已解嚴，但政治壓力還是存在。即使像余老闆這麼開明的報人，也曾擋過幾篇社論。例如我曾寫過一篇稿子，狠批救國團，內容是：救國團不是政黨也不是政府的單位，完全在體制外，但卻有權力發令各級學校做這做那，很不合理，在解嚴之後，也應考慮這個黑機關的存廢。余老闆看後，把稿子往桌上一放，揮揮手說：「啊，書生之見啊！」要我另寫別的主題。所以只要碰到敏感問題，余老闆也不免要迴避。

由於很多議題我們都不能處理。有一天，我口不擇言說：「中國時報現在怎麼搞成這樣！到底寫什麼？台灣李登輝不能批評、民進黨也不願意批評、大陸也不能批評，那我還要寫什麼啊？」當天深夜兩點多鐘，我接到余紀忠夫人的電話：「你講那個話，實在不得體！」她說：「你要想啊！中國時報有兩千人要吃飯，沒那麼簡單啊！」我覺得很不好意思，連忙抱歉。那時期，辦報的確有壓力、要考量政治的現實層面，但對一些抱負理想的新聞從業人而言，畢竟是難以忍受的「現實」。

不是主筆，而是代書

解嚴之後我做中國時報總主筆八年，有些敏感的問題仍然不能暢所欲言。所以我曾經說：「我們不是主筆，是代書嘛！」

中時一般非政治的議題，由我處理。但重要問題，還是由余老闆主導、口述，我只是代書。我個人主觀認為，主筆群應是主導報社言論方向，經營者不應有太多的干涉。報社中有主筆群，可以討論社論議題，不致讓任何人獨裁言論。總主筆只是負責潤飾，把整體意見與老闆溝通，看法不同也能討論。但台灣卻沒有一家報社能夠做到這種基本尊重。

在美國辦報寫社論，是我最得意的一段日子，不管遠東時報、中報，或是美洲中時，由於大環境

2004年5月與外甥林昭亮合影。（俞國基提供）

自由，報社的掣肘亦少，可以寫出很多好文章。談黨外、批評當地時事，都能言所欲言。即使是美洲中時，在台北的余老闆也鞭長莫及，很少過問社論內容。不過，我後來還是因為社論去職，可見「言論賈禍」似乎是華人的宿命！

所幸，政治議題雖然受限，非政治議題則能發揮。我在中時寫過一篇社論，談七號公園觀音像拆除爭議，我強調宗教歸宗教、藝術歸藝術，供人膜拜的宗教建築，不應放在公共空間。刊出後，某些佛教界人士感到不滿要求退報，但退報訂報，本是自由媒體中的常態。這類非政治問題，老闆不干預，我才能發揮，寫得痛快淋漓。

但因敏感問題仍然綁手綁腳，中國時報總主筆八年任內，我自認未寫出擲地有聲的文章。

後來在《自由時報》十年，雖然台灣的政治進入了民主自由期，警總也廢了，國民黨文工會也無力管制言論了，但報業的「靠邊站」，卻把自己的手腳又綑綁起來。新聞自由云云又變成了空中樓閣。黨派色彩濃厚，意識形態強烈，對任何媒體都是很大的傷害。過去，國民黨在控制新聞自由，現在卻是媒體自己在控制新聞自由。

台灣報老闆政治性太強

在報業幾十年，我有個感慨：台灣所有報老闆都太政治了！

台灣時報舊老闆吳基福比較天眞、沒有心機，但他辦報還是想影響政治，尤其希望本省人也涉足媒體。台灣日報舊老闆傅朝樞，雖然對黨外幫助不少，但也想藉此獲得與國民黨議價的籌碼，甚至他後來到美國辦報，與中共高層接觸，都是在玩弄政治。而中國時報雖給人比較清新、較有人文性的印象，但余紀忠先生其實也是政治人。雖然他具有人文氣質，但仍免不了想在政治上發揮他的影響力。

後來我到自由時報，老闆林榮三先生不願得罪政壇主流，顯示台灣報紙走向都是隨老闆的政治關係而

轉變。

台灣沒有一個報老闆能擺脫政治的影響或想影響政治。幾年前進入台灣的《蘋果日報》，雖然沒有政治目的，卻完全市場取向，其未來發展仍有待觀察。

相對於報老闆的政治性格，我自認爲是專業新聞人，希望將報紙帶往專業化、高水準的方向。所以只要有機會讓我發揮，我都會全力以赴。我一直認爲媒體必須要能與政治保持距離，站在制高點看待政治議題。所以我幾十年來都有個原則：做新聞，不介入政治。

戒嚴時期，我從來沒有出席過黨部的飯局，也不參加國民黨的政治聚會。我和黨外人士關係較好，但也都限於私人交情，絕不參加黨外的政治活動，更沒想過加入黨外。新聞工作者，應守著「不涉入政治」的原則。

媒體人應充實人文修養

其次，我認爲，台灣媒體人的政治性格太強，人文修養不足。做新聞，人文的通識教育，包括宗教、文學、藝術都應該稍有涉足。對社會的觀察，包括經濟學、社會學、法律等知識，都應該有些粗淺瞭解。作爲新聞人員，要累積人文知識，成爲一種修養，才有社會關懷與責任感。

新聞內容則應重視文化論述以及專業的觀點。我思考過，台灣影劇版爲什麼老是談影星八卦？我曾想介紹馮光遠進自由時報，主編一個電影藝術與電影理論的版面，編個有深度的電影版。但我和老闆提議時，他說：「這個誰想看？」這樣的答案，眞是令人氣餒。

台灣能在三十年內從一個破落殘敗的國家，一躍而爲世界上的經濟主導國家，最大的功臣有二：一是高品質的大學，一是有相當水準的報紙。國民黨統治期間，對大學插手較少，對留學也未多干預，因此三十年間，台灣的幾所優秀大學培養了不少的人才，再加上他們留學後的成就，自然成爲台

灣社會動力的主流。其次兩大報對台灣社會教育的貢獻，是不容抹煞的。它們在啓迪思想、拓寬視野、介紹新知、推動民主法治等方面，影響既深且遠，雖然在政治上不能突破禁錮，但不時對政治作有限度的針砭，或者假藉其他議題而影射政治，都是累積民主、自由觀念發酵的觸媒。兩大報由於報禁的保護，使他們的財務獲得優惠，雖然賺了大錢，兩位老闆都願意把錢花在提升報紙的品質上，尤其是延攬人才，可以說是「不惜工本」。民國六十年迄九十年，三十年間台灣各大學中人文及社會科系的頂尖人物，幾乎都與兩報沾上些關係。至於社會上的各項演藝或體育活動，兩報不僅以金錢資助，也以新聞版面作有力的支援。據我所知，海外的某些民主人士，也曾獲得中國時報暗中的資助。

這三十年，可說是台灣報業的黃金年華，九十年代以後，台灣媒體的大環境逐漸起了相當程度的變化。解嚴了，報禁廢了，新報紙如雨後春筍，社會結構也有很大的轉變。讀者在政治立場上趨於極端，沒有政治立場的讀者則偏好八卦與休閒娛樂新聞，報紙爲了生存、競爭，就不得不遷就讀者，於是品質下降、見識膚淺、迎俗媚俗，前三十年的榮景已不復見。

我不是戀舊，但報業品質的「向下沉淪」是事實，我們從業人員心有餘而力不足，也只能浩嘆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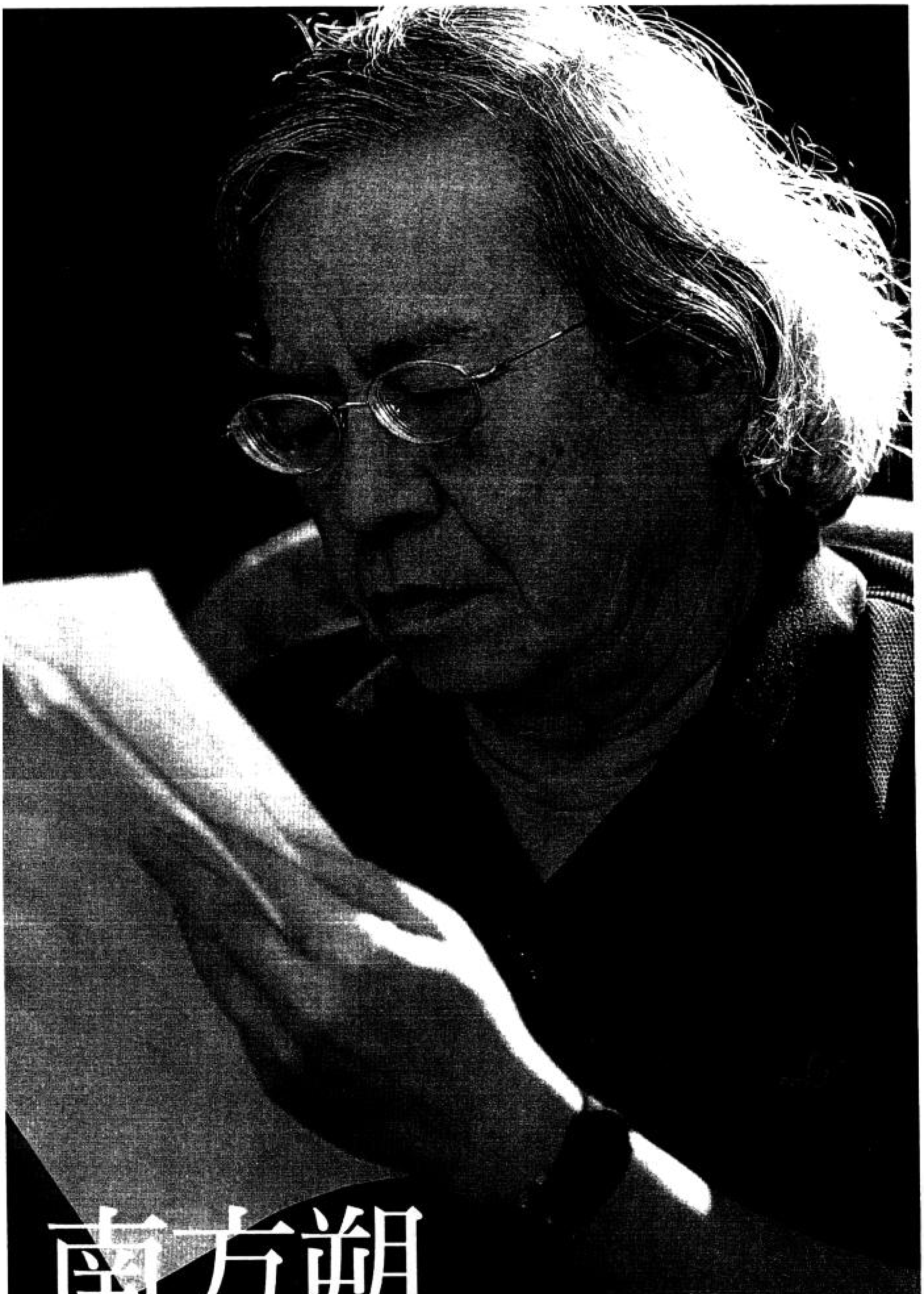
◎初稿：汪倩如

◎校訂：洪貞玲

◎定稿：何榮幸、俞國基

◎訪問時間：二〇〇七年五月十日、十八日、二十二日、二十五日

◎地點：台大新聞所攝影棚二樓


南方朔

南方朔

〔第五章〕

一輩子的評論志業

一九七二年民族晚報記者

前頁圖說：
2007年，南方朔（王杏慶）擔任第三十屆時報文學獎散文組評審委員，審視當年度入選決審的散文作品。（中國時報提供／方濬哲攝）

因爲他的評論太出名了，所以，很多人都忘了（或是不知道）他當過很多年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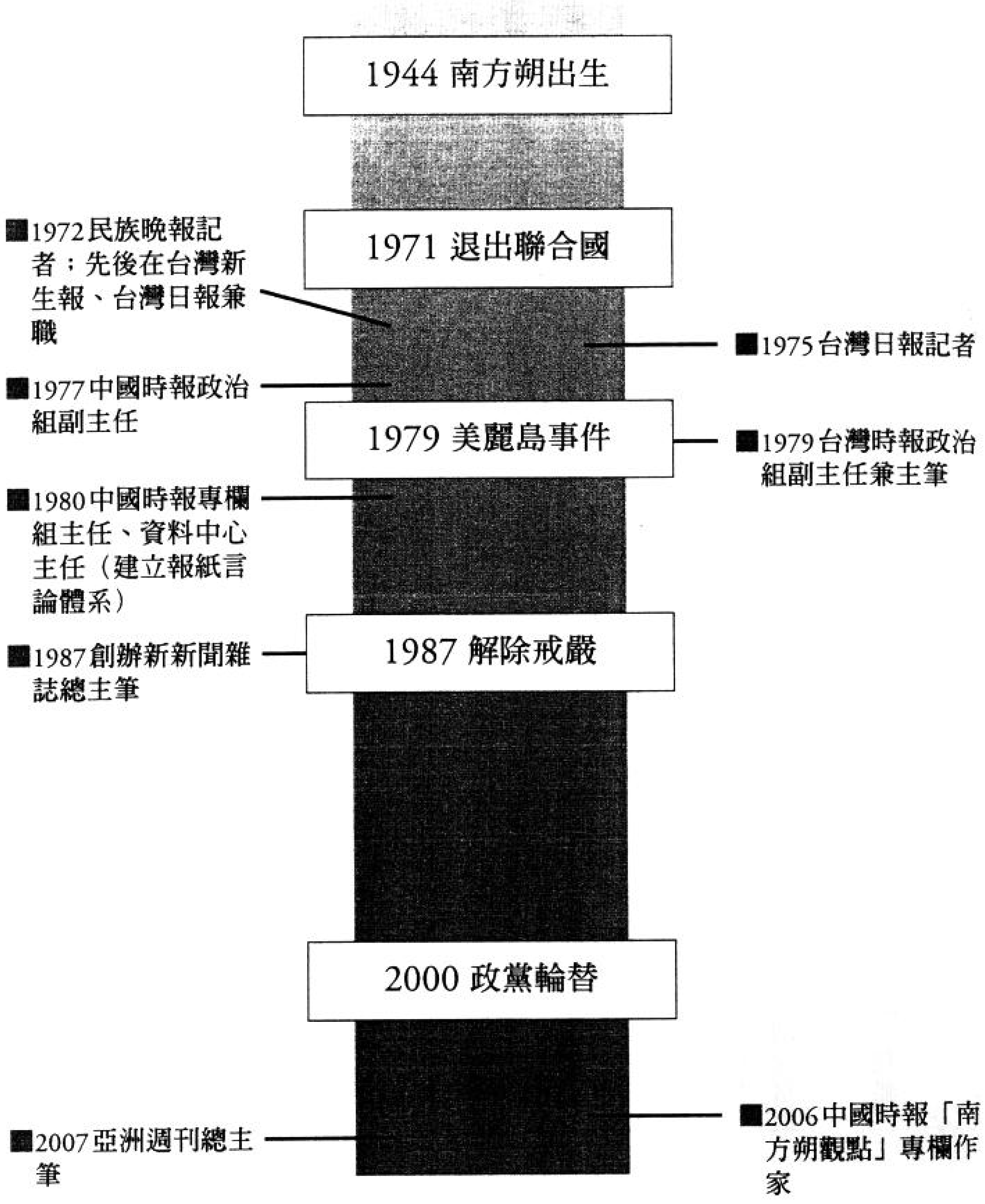
採訪過程中，他對一九七二年到七七年這段記者經歷相當得意。因爲那時候他還沒進《中國時報》，卻能從《民族晚報》這種小報跑到很多獨家、重大新聞，甚至從官員桌上偷走公文，因爲「正常時期要用正當的手法跑新聞，但不正常的時期，不正當的手段也要用！」

也因爲他長期呈現的是「飽讀詩書」的公衆形象，因此，很多人難以把他跟群衆運動中的「街頭悍將」聯想在一起。事實上，他當初整整搞了一年街頭運動，還出主意號召黨外群衆衝向總統府。

在理性與激情長期激盪之下，難怪他會自稱擁有「雙重政治人格」：一方面在主流媒體工作維持生活，另一方面用筆名大量投稿給黨外雜誌實踐理想。就此而言，他可能是全台灣最善用主流媒體資源的評論者，當年中國時報資料室訂閱的一百多份外國書報雜誌，成爲他日後評論事業的活水源頭。

在主流媒體寫了這麼多評論後，我們忍不住追問：「有沒有被拒絕的稿子？」他很坦率回答：「會自動寫氣氛下的東西啦。」看來，每位評論者心中自有一把尺，誠非虛言，連他這樣的評論大師，亦無所逃於主流媒體的時代框架……

南方朔（王杏慶）大事記


1944 南方朔出生
1971 退出聯合國
1972民族晚報記者；先後在台灣新生報、台灣日報兼職
1975台灣日報記者
1977中國時報政治組副主任
1979 美麗島事件
1979台灣時報政治組副主任兼主筆
1980中國時報專欄組主任、資料中心主任（建立報紙言論體系）
1987 解除戒嚴
1987創辦新新聞雜誌總主筆
2000 政黨輪替
2006中國時報「南方朔觀點」專欄作家
2007亞洲週刊總主筆

從文藝青年到自由左派

文藝青年當記者

我從初中開始就是文學青年，初中畢業已經可以寫詩。高中聯考放榜前，我生平的第一篇詩歌就登在《幼獅文藝》上面。大學念台大森林系、研究所，曾經編過台大的《大學論壇》；《大學新聞》上的專欄、影評、文學評論等，我都寫過。大學時，我算是活躍的文學青年。

研究所畢業之後，我曾申請到美國獎學金，但沒出國。原因是那個時候台灣退出聯合國，我們很悲憤；再加上我很窮，飛機票都買不起；我還有一個老媽媽，出國以後老媽媽怎麼養？諸如此類問題全部加在一起，乾脆不出國算了。由於外界把焦點放在我因爲退出聯合國而拒絕赴美進修，這件事報紙還登得很大。

剛進入社會時，我曾經在景美租房子，從事翻譯維生。我早年翻譯過很多書，包括佛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滿》。那時有一個《民族晚報》記者，看我一天到晚在家裡面翻譯很辛苦，就鼓勵我當記者。

老實說，我當翻譯的待遇還可以，但每天就是不停地翻譯，都沒有去外面，人生很扭曲。我雖然

不懂什麼叫新聞，可是自認會寫文章，至少可以當新聞記者試試看。因爲這淵源，我在一九七二年過完陰曆年之後，到民族晚報當新聞記者。就這樣子莫名其妙、偶然地進了新聞界這一途。

那時候當新聞記者，待遇少到不可思議！一個月薪水才一千五百塊，我當翻譯至少可以賺三、四千塊。很多台大的朋友、老師說：「老王當什麼爛記者嘛，去搞個正當職業嘛。」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時新聞記者是沒有志氣、沒有地位的一群人，沒有新聞自由、沒有影響力、錢又少，新聞記者常常被講成「丐幫」，討人厭的程度跟乞丐一樣。

碩士記者從頭學起

那個時候，像我這樣台大畢業，又是碩士學歷，去當記者可說是絕無僅有！上班第一天，總編輯對我說：「你是學科學的，我看你就跑科學新聞好了。」我於是負責接觸「長科會」（行政院長期科學發展委員會），是國科會的前身，就位在羅斯福路上。

因爲我沒有任何記者訓練，也不知道什麼叫作新聞系，我問總編輯怎麼跑新聞？總編輯就說：「你每天去跟他們聊天，回來跟我報告聊了些什麼東西。」然後我就每天去跟官員聊天，一個星期左右，採訪完了回報館，我跟總編輯報告，他就說：「啊！這個某一點，這個就是新聞。」就這樣反覆地磨練，慢慢終於知道什麼叫作新聞。

跑完科學新聞後，我轉跑農業新聞，然後慢慢變成跑政治新聞，後來還跑過國際新聞、影劇新聞、社會新聞……。基本上，我這一輩子，大概所有的新聞路線全部跑過。

小報奠定跑新聞實力

我一直很感念在小報紙的工作階段，無論在民族晚報或後來我待過的小報，我都有很多機會快速

歷練。例如，財經新聞就是一個記者主跑，政治新聞最多兩個記者，其中一個政治記者跑全部的國會，有國民大會、監察院、立法院等，另外一個政治記者跑黨政，包括行政院、國民黨中央黨部、非財金類的所有部會、國防外交全部；這種「包山包海」的採訪範圍，對一個新記者瞭解新聞全貌有很大的幫助。

我後來對整個中華民國的體制有比較多的理解，跟那段期間的學習有密切關係。當你一個人跑全部政府機關的時候，不可能在一個部會花太多時間。你只能今天這裡跑跑、明天那裡跑跑，思考問題的角度比較多元化。當你對政府有比較開闊的認識的時候，對整個政府的運作機制就會有相當的理解！

當時我最得意的事情是：我可以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跑到國防部的新聞、在內政部跑到外交部的新聞！我可以在這個單位跑到另外一個單位的新聞！假設你對整個機制的瞭解多了以後，發生一件事情你就會知道要找哪個單位、找其中的哪個人採訪。以前我跑新聞的時候，很多新聞記者都搞不清楚狀況啊！他們總是問：「老王，你這新聞哪裡跑出來的？」他們只跑一、兩個政府單位，都摸不清楚我的消息來源。

現在的新聞記者，基本上就是每個記者跑一個小單位。尤其是前幾年整個新聞界擴張的時候，光是立法院就有七、八個記者負責。然後每個記者都變得豆豆丁丁的，視野都看得很小。

被設局涉及叛亂案

我在民族晚報待了五、六年之久，因為待遇太少，所以先後在《台灣新生報》、《台灣日報》兼職。我記得很清楚，在台灣新生報，非正式的兼差記者薪水是三千八百元。我兼差長達三年，幹了三年還是兼差，很不爽快嘛！所以就離開新生報去台灣日報。我辭職的時候，從國民黨文工會總幹事調

到台灣新生報當負責人的石永貴才告訴我：「杏慶，我一來就想升你爲正式記者，但是你有案底，所以沒有辦法。」

我會有「案底」，是因爲我曾經涉及一件「叛亂案」。

那是我研究所畢業進入新聞界、仍回學校擔任台大社會服務團顧問的時候，當時社團很多人參與「保釣運動」，這些人後來都成爲顯赫人物，包括律師陳明玉、她先生洪三雄、經濟部部長施顏祥、當醫生的王復蘇，還有馬英九，全部是我們社會服務團的成員！社會服務團一些成員開過兩次會，討論要不要組織學生團體，以及有一天要不要組織政黨。當時有一個台大醫學院的林姓學生，因爲花錢很多，自己又沒有那麼多錢，所以就變成「特務學生」！調查局爲了「設局」設計我們這一群人，就叫這個林姓學生跟王復蘇勾結，然後弄到我們這些人的開會紀錄，想要抓到我們的把柄。

還好，我還蠻聰明的，我去了第一次會議，第二次沒去。他們在那邊講有的沒有的，我就說：「組織政黨？有點危險喔……」我又說：「假設你們變成大人物，情治單位就不會抓你；假設你是小人物，情治單位就會抓你嘛！所以我們大家各自努力，然後出人頭地以後，再搞這個東西。」還好我講了這個話。

由於情治單位拿到開會資料，我們這些曾經參加討論的人，通通被調查局約談過了。報社安全室的人轉達，調查局的文教組組長要我去報到。我在調查局搞了一個上午，「罪名」是非法組織叛亂團體、觸犯刑法「二條一」重罪，我作筆錄、蓋指模後，調查局文教組組長說：「哎呀，王先生呀，我們政府寬大爲懷，年輕人犯了這樣的事情，政府也都包涵、也都不辦了，沒事沒事！只是留個紀錄而已！以後呢……，多多跟我們政府合作！」

我從一九七二年過完年後被那個圈套套住，此後長達十幾年，調查局、警備總部、中央特調室都有專人跟我定期聯絡：「杏慶兄啊，最近有什麼事情呀？跟我們分享一下啊。」一天到晚都在搞這種

東西，就請你喝咖啡、請你吃飯，想要從我口中套出「叛亂消息」，眞是煩都煩死了，我連當記者都因此無法升遷。

一直到解嚴前夕，有一個調查局的文教組副組長又請我喝咖啡。聊到最後，我說：「以前那個戴組長跑哪裡去啦？怎麼好久沒有他的消息啦？」對方說：「戴組長被槍斃了！他是匪諜！」我當場發飆！我說：「媽的！當年竟然是『匪諜』辦我、調查我，這是什麼世界？以後不要再跟我囉囉嗦嗦了啦！」從那次之後，安全單位的人才開始離開我的世界。

最得意的獨家新聞

民族晚報創辦人是總統官邸出身、負責管錢的王永濤，報館第一部機器還是從總統官邸搬來的。因爲和官邸有關係，基本上是國民黨「自己人」！民族晚報有這個淵源，所以言論比較開放自由一點。就像古代的皇帝可以容許身邊太監、親近大臣諷刺他、罵他，當他把你變成是自己人的時候，你可以講一些話；你不是自己人的時候，對不起，你不准批評他，因爲會影響他的權威。

在這種相對開放、自由的言論尺度中，我在民族晚報採訪過很多大新聞！我這輩子最得意的一條獨家新聞是：蔣介石死掉了，治喪會議是全國最高機密，但我採訪到大獨家新聞。當天上午開會、中午散會，晚報截稿前，我已經知道開會結論，包括哪一天出殯、扶厝。這次治喪會議是由嚴家淦副總統主持，像他這種權貴大官不會理我，但有兩個人我可以問。治喪會議爲了表示全國團結，搞了兩個不重要的人參加——青年黨主席跟民社黨主席。他們不會拒絕我的採訪，我是這樣跑出治喪會議的大新聞。

不正常時期偷新聞

儘管如此，早年新聞採訪仍有很多不便，因爲我們面對的威權，是整個官僚體系，官員都不敢隨便亂講話。當威權體制還存在的時候，新聞記者就沒有採訪的空間了！你去找誰，誰就會嚇到。一看到新聞記者，趕快把公文蓋起來、把東西放抽屜，防小偷一樣。新聞記者在這種環境之下要去突破，眞的很難。

我當黨政記者時，新聞眞的是用偷的！我去官員辦公室裡面，只要辦事人員不在，快得很，兩秒、三秒內偷瞄公文；去打字室，去偷打字小姐下面那一張紙；要是部長不在，搶祕書桌子上的月會簿。正常時期要用正當的手法跑新聞，但不正常的時期，不正當的手段也要用！

我後來在《中國時報》長期跑黨政新聞，跟《聯合報》陳祖華、鍾榮吉、顏文門、高惠宇等人做過對手，都沒有漏氣。以前當兩大報的政治記者，每天晚上睡覺都不安穩，第二天上午要趕快起床，看對手報的表現。看完以後確定沒有漏新聞，「呼，沒事！」才回頭睡覺睡到中午。若漏了重大新聞，被對手修理一次以後，那幾天日子都會很難過！

黨報套招發新聞

在不正常的新聞環境下，偷新聞還只是小事，當你挖出一條讓政府不爽的大新聞，政府會威脅你，甚至限制你採訪的權利，就會碰觸到新聞自由、報導自由的問題。

我曾經報導「統一教」的新聞而遭有關單位調查。統一教曾被視爲旁門左道，但卻發展快速，甚至被認爲影響國家安全，所以由國民黨中央黨部直接管控。有一次國民黨要角秦孝儀在中央黨部樓上主持對策會議，與會的內政部長是林懷民的爸爸林金生。我剛好知道這個會，就去問林金生會中討論

狀況。林金生也很大而化之通通告訴我。我把它登出來之後，事情大條了！秦孝儀認爲影響到政府權威，氣得下令調查是誰透露新聞，還派人到民族晚報報館安全室查我，但後來沒有查出什麼。

事實上，當時台灣所有黨報與官報，《中央日報》、新生報、《高雄新聞報》等，這些報紙總編輯每天晚上一定用電話串通，彼此討論當天什麼當頭條新聞？什麼當二題？什麼當三題？全部都講好，不要惹事！

因此，當時寫新聞就有很多限制。我們年輕人跑新聞，自己很得意跑到一個獨家新聞，把新聞送給總編輯看，還註明是獨家。要發稿前，總編輯會問：「這個新聞怎麼回事，政府發布了沒有？」我說：「這是我的獨家，政府還沒有發布。」總編輯就會指示：「那就不要寫啦，不要寫啦！」這是當時很多媒體內部的氣氛。

從台灣日報到中國時報

我後來到台中的台灣日報上班，在台北政壇之外，台灣日報是一個相對有影響力的報紙，對於中、南部各縣市有蠻大的影響力。

台灣日報發行人夏曉華是情報局出身的，他辦的報紙在當時是最有火候的報紙。因爲也是「自己人」，而且是台中的報紙，政府就馬馬虎虎啦。我們寫什麼，就可以登什麼，反正台北人看不到，無所謂。但是夏先生不會經營企業，所以台灣日報是半死不活的報紙，威脅也不是那麼大。假如它欣欣向榮，威脅比較大，我看政府的態度就會不一樣了。

在那種環境之下，記者比較有新聞自由。做一個新聞記者，我採訪到重要的新聞，可以沒有顧忌地登出來，就是所謂新聞自由的第一步！自由就是我做什麼東西都沒有阻力，在台灣日報，我們很幸運享有這種原發性的自由。

之後台灣日報發不出薪水、稿費，那個時候恰好中國時報找我，而我也沒有別的地方去，所以就到中時上班了。

一九七七年「中壢事件」爆發時，我剛進中國時報擔任政治組副主任，因爲先前的「案底」，我還是不能當採訪主任，不能當老大。

儘管進了中時，我還是常跟張俊宏、許信良等黨外領袖互動，因爲我們很早就認識，常常黏在一起。他們開始搞黨外，我是新聞記者又是朋友，總是會來往。

有一天，中時余老闆進報社後叫我過去問話：「聽說最近你又跟許信良、張俊宏搞在一起啦！」我說：「沒有啊。沒有啊。」他話講得很重、很白：「我告訴你……，當新聞記者就當新聞記者，少給我談什麼理想不理想！」我開玩笑講：「余先生，我沒有理想！我沒有理想！」

這輩子唯一對不起的人

余老闆說：「我都有資料！你什麼時候見誰見誰，我都有資料！好好當新聞記者，不要搞東搞西。」余老闆罵完以後，第二天就換我職務，叫我當採訪主任旁邊的改稿副主任，就是改寫記者寫的那個不三不四的稿子。做了幾天，我做不下去了，因爲擺明是叫我走路嘛！

因此，在美麗島事件發生前，我就離開中時了。那個時候風聲鶴唳，中時是被情治單位整肅、盯緊的單位之一，南方朔則是其中被盯緊的人物之一！我一輩子知道，余紀忠認爲我這個人不錯、有材料，而且很用功，可是我很麻煩。所以，余紀忠永遠是帶副有色眼鏡看我。

之後，吳基福找我去《台灣時報》當政治組副主任兼主筆，正好遇上「美麗島事件」。

那個風聲鶴唳的階段，天威不可測，兩大報因爲美麗島事件嚇到不行，新聞記者不敢搞東搞西。台灣時報因爲在高雄，比起其他台北的報紙更自由一點。譬如說，當時警總起訴書送到黨外立委黃信

介手上，我跑到黃信介家裡面，拿了起訴書回去，台灣時報就登出來。這種東西其他報紙是不敢登的。

美麗島事件之後抓了一堆人，還沒有軍法大審前，有一段時間風平浪靜。中國時報社長楊乃藩打電話要我回去。因為兩家報社的待遇真的差蠻多的，我就回去了。

我常說我這輩子真正對不起一個人，就對不起吳基福。我落難的時後他收容我，然後天下太平了，我不落難了，就把這些擺開。我跟吳基福很好，他說他可以理解。他常說：「王杏慶啊，你是外省人中的好人。」

帶頭衝總統府

其實，我跟黨外人士雖然互動密切，但嚴格來說，我真正參加黨外的時間，只有美麗島事件發生後的那一年，也就是第二次回中國時報的那段日子。在黨外的那一年，我的心情是亢奮超過恐懼的！

一九八〇年美麗島大審結束後，周清玉、許榮淑等代夫出征的美麗島受刑人家屬全部選上，台灣整個政治氣氛在變。壓迫已經過去了，鐵腕、抓人、判刑沒什麼用了。坐牢變成資產，每個黨外人士都巴不得坐一年半載的牢，以後就有搞頭了，不坐牢就沒得看！那個時候，對抗黨國體制的啓蒙階段已經結束，進入抗爭階段。

當時每到星期六、星期日下午，台北一定有政治活動，少則七八千、多則兩三萬人在那邊聽演講，氣氛非常熱烈。但事實上，大家心裡還是感到害怕，沒人敢衝出去打警察，最後只能在亢奮的氣氛中散會，下禮拜再來。大家都在等，大家都知道，總有一天這些群眾會走上街頭！

結果，第一次大規模的街頭遊行，是因為黨外市議員林正杰被判有罪、必須坐牢。林正杰的案子宣判時，很多人拿著鐘在司法大樓集結、演講，包括黨外領袖康寧祥、邱義仁都在那邊，舉行「為司

法送鐘（終）」活動。

可是，演講搞了兩個小時，群眾人愈來愈少，因為大家講話都一樣啊。這時候，我跟《前進》雜誌的張富忠咬耳朵：「衝過去，就總統府了嘛！」在警察環伺下，我們假裝要離開，然後趁警察鬆懈時，拔腿就衝。一堆人連追帶扯帶拉，跑到總統府後門，鐘一丟就閃人，沒事了，警察也拿我們沒辦法。

台北第一次街頭運動

之後我們決定再搞一次大規模群眾示威。透過耳語，把人聚集在錦州街、林森北路交口，辦起街頭演講。

當時警備總部對付群眾運動有一招，就是警察全部盯死你，你在任何地方停下來，警察就把你擋住、把你抓走。可是我們先佈署群眾，然後把車子開到路口，自己人馬上把車子圍起來，警察就被我們擋在外面了。安了，我們立刻就演講，帶動群眾情緒後往前衝。那天群眾從錦州街、林森北路、中山南路一直衝衝，最後衝到台北市議會。那是台北第一次真正的街頭運動，最大型的街頭運動。

當時黨外群眾中有很多拿棍棒的人，被說成是國民黨派來的「黑衣人」，可是我懷疑國民黨有這麼厲害。林正杰的群眾運動是我自己在搞，我很清楚知道，像台北縣一群開計程車的人，車子裡面放棍子、放磚頭，每次來就是鬧事，我就點名要他們不要在那邊亂糟糟。黨外這些群眾，神經病似的說打就打、拿了就打的，我認識太多這種人。

我對群眾運動的觀察是，台灣社會有很大一群「羅漢腳」社會底層人士，是流氓無產階級。這些人包括從外地湧進城市的失業人口、退伍軍人，反正無所事事，成天就想要衝突。林正杰的追隨群眾，因為是由我帶頭，他們都對我很好，但每次我都要求、拜託他們不要惹事，這是戒嚴時期街頭運

動的另一個面向。

南方朔筆名由來

我想我有雙重人格，雙重政治人格。我有一個匿名的身份搞自己的東西，同時又有一個身份照顧我的衣食。從一九七〇年代《夏潮》開始，我就一直在黨外雜誌寫文章。以前中國時報長官會說：「文章就好好給我寫，不要埋地雷！」我認爲沒有什麼地雷，他們認爲有，顯示我不被中時高層信任。

過去很多黨外雜誌裡面，只要有一個「南」字的作者，大概就是我。因爲我是台南人，我希望筆名裡有一個「南」字。

有一次交夏潮的文章，想說這次用什麼筆名？好幾個編輯東想西想，從「南公北望」想到了「南方朔」，我用了這個名字以後，好像運氣還不錯，後來在中國時報副刊寫文學評論，就固定用南方朔爲筆名。

黨外早期，我是很重要的匿名作者。若干年以後，我和唐文標在聊當年《美麗島雜誌》。唐文標說：「這個美麗島雜誌沒有我們兩個人還辦不下去！」這些事情國民黨政府都知道，他們知道我們有寫稿，只是不知道哪篇是誰寫的。他們查得很膩了，只是辦不辦你而已。

那時台灣的印刷業還在用撿字排版，警總、調查局都會直接安排人在印刷廠撿字房。黨外雜誌在哪裡印，情治人員就把原稿偷偷拿出來影印後再放回去，所以寫稿者的字跡都認識。爲了避免被情治人員認出字跡，我們後來一律由黨外雜誌的編輯錄稿。我每次交稿以後，就在旁邊看編輯重抄一次，抄完以後，我再帶原稿回去，這樣字跡就不會被認出來了。

我就這樣同時在報社跟黨外雜誌寫稿。基本上，我也能夠摸索在報社要寫什麼，這跟新聞自由無關。在新聞界，好好跑新聞跟自由不自由是兩件事。不談政治那一部分，我認爲當新聞記者可以好好

分析事情，這部分我做得還算稱職。

回到中時建立言論制度

我對台灣新聞界的貢獻之一，是建立了報館完整的言論系統。過去，台灣新聞界的社論都是寄託給學術界，但學術界的人寫社論，不知道在講什麼東西！我覺得那是不對的。我認爲每一個報館應該是自成一個言論體系：新聞記者如果有綜合思維的能力，這種記者應該變成專欄記者；假設這個專欄記者有抽象思維能力，將來應該變成主筆。

我第二度回中國時報時，把這個觀念告訴余老闆，他接受了，讓我當專欄組主任。今天台灣很多很紅的媒體人，都曾經是我的手下，例如《商業周刊》創辦人金惟純等，都是當年的青年才俊。中國時報設了專欄主任以後，聯合報也設專欄主任，由黃年出任。

2002年4月4日，南方朔以資深專欄作家身份參加「中晚茶館」座談會：「第二官方語：閩南語？英語？」（中國時報提供／王英豪攝）

除了當專欄主任，我回中時還主動討了一個職位：資料中心主任。因爲資料中心主任擁有很豐富的資源。那時是中時的黃金時代，每年賺幾十億。爲了增加報紙的水準、增加報紙可看性，報社訂了一百多份外國書報

雜誌，每年資料中心採購費用有一千萬元，我不認為今天台灣有任何一個單位有這種氣魄。

當資料中心主任，對我來講是脫胎換骨的一個生命歷程。以前我跑國內新聞，對國際事務完全沒有概念，可是長期泡在外國資訊堆裡面，慢慢變得國際化了。我開始知道外國事務，可以寫比較有視野的文章。

那個時候，我每天可以看《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華爾街日報》，我全部看！報社也訂《美國外交事務季刊》、《世界政治學報》、《經濟學人》等期刊，還有好幾份德文報紙、法文報紙，還有翻譯。

我在中國時報幹得最久的是資料中心主任。儘管我在中時被換過很多工作，每一次我都說：「你換我別的職務都沒關係，這個不能換我！」直到後來我被再次掃地出門之前為止，余紀忠對我這一點要求一直很尊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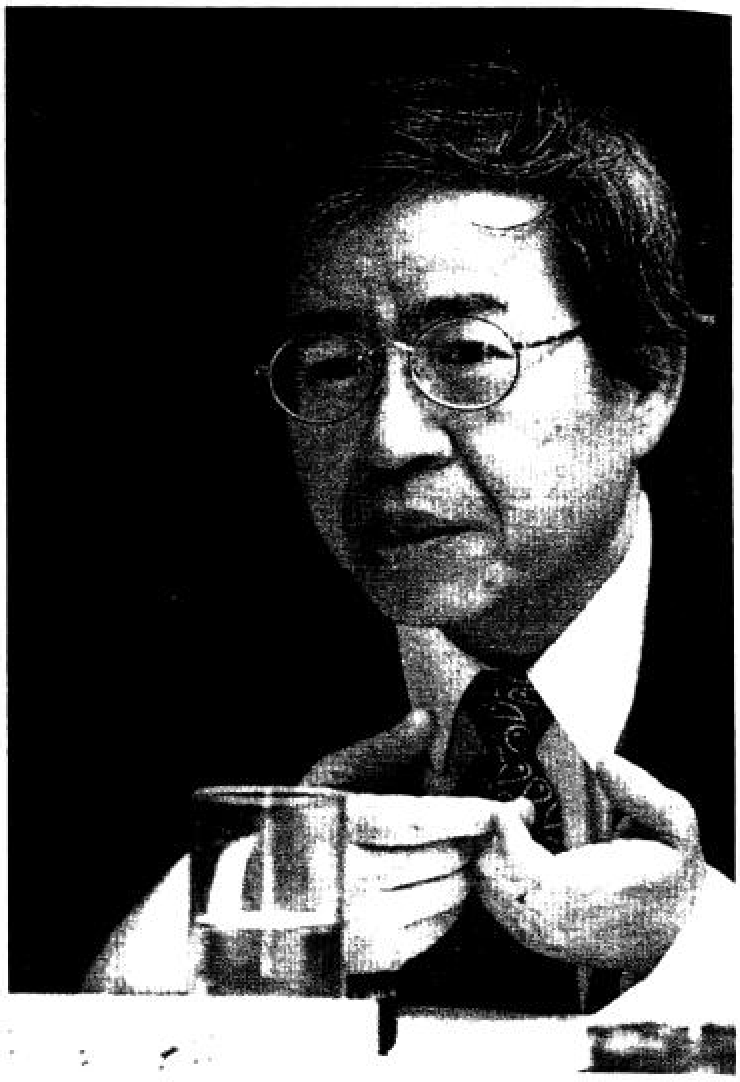
辦自己的雜誌

我投入黨外的一九八〇年，剛好是台灣最騷動的一年！「黨外」這個東西開始變成資產，不再是負債了！

以前你說你是黨外，會很倒楣。但從那一年開始，你是黨外，變得有前途。那一年選舉，黨外贏很多席，我幫蔡式淵、康寧祥助選，雙雙都上，包括前一年落選的謝長廷都選上了。

不過，這些政治人物辦雜誌的目的，是要替政治服務！所以當他們達成政治目的以後，雜誌就不重要了。我們一些人就開會討論，解嚴也解了，組黨也組了，還搞什麼呢？意思就是司馬文武失業！南方朔失業！我們全部都失業！不然怎麼辦？我們辦一個自己的雜誌吧！這就是《新新聞》的緣起。

新新聞的緣起沒有什麼偉大的，就是一堆人失業，辦了雜誌。講偉大一點，就是新聞媒體人、自



1997年，南方朔擔任《新新聞》總主筆時留影。（中國時報提供／陳建仲攝）

由知識份子跟政治人物分道揚鑣。

以前我們是靠他們混，大家混在一起。現在他們有他們的舞台，我們只好辦自己的舞台。

那個時候台灣天天在搞群眾運動，一般媒體報導得不多，新新聞報導得比較詳細。所以也逼迫報紙必須回到新聞本位，重視這些事。我想它在那個時代是有一定程度的作用。到了報禁解除以後，新新聞的先導作用就消失掉了。所以報禁解除、報紙擴張，然後新新聞進入艱苦時期。

終其一生的自由左派

我始終認為，記者是人生最好的觀察位置。芸芸眾生都在演戲，記者是第一排觀眾，不是演員，對於幕後部分並不清楚；但因為記者是第一排，所以門開、門關，那個縫隙開開入入的時候可以瞄到裡面一點點。

記者作為第一排的觀眾，為了要看得最清楚、看得深刻，必須強迫自己去鍛鍊很多觀察的能力。我用了記者生涯整個過程，去培養我的觀察能力。我在當新聞記者期間，讀了很多技術性的書籍：行

政法學、行政法、民法、刑法，讀了很多很瑣碎的東西，這些都有助於我成爲一個務實、有能力的觀察者。

至於我自己思想、評論的價值標準，則應該用西方的Left Liberal（自由左派）來定位。我一輩子都是這個角度，是Liberal的，然後是Left。我不是社會主義者，意識形態沒有那麼強。

我最喜歡英國的左派，他們是有良心的、不極端。英國左派從貴族階級產生，跟很多國家不一樣；很多國家左派是從窮人階級產生，很激烈。窮人左派很可怕。英國的左派全部是貴族階級，像是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E．P．湯普森（E.P. Thompson）都是好人家出身，念好學校、有良心、有文學素養。他們是中間偏左，一輩子很堅持，不會投機。我就比較屬於這一派。那種很極端的，我覺得很可怕！

在台灣，很難出現眞正的左派，因爲台灣處於一個很奇怪的歷史夾縫裡面。我們有國共內戰鬥爭，以工人運動、農人運動爲訴求的運動，在日本時期都搞得很壯觀；可是一九四九年以後就搞不動了，因爲一搞就變成是共產黨，就完了。第一會被抓，第二是長期的教化之下，共產黨就是非法！

台灣在這種歷史過程中，無法形成早年日據時代或是西方的工人運動。台灣後來左翼跟西方的新左掛一起，也是這個道理。因爲台灣已經不可能出現老左派，只能掛成新左派，而新左派就是知識份子左派。

評論與文學密不可分

「在台灣社會寫評論，寫久了會看不起自己！」這句話是自我反諷，好比我二十年前從某個角度看問題，二十年以後這個問題又犯了，我必須再寫一次。在台灣從事評論工作，老是重複這些沒有解決的基本問題、價值。我二十歲寫這個文章，寫到五十歲還在寫，是不是會看不起我自己？

其實，我這個人一輩子往前看，而且不分藍綠，我是永遠的在野黨，我不太管過去的事情，我只往前看。因為新聞界本身就是一個往前看的事業嘛。所以標準在看，問題在變，你不往前看怎麼行？

早年我是就事論事的、行政型的評論者，比較針對民主概念、抗爭進行分析，之後開始有點理論化了，就整理出「民間社會」這些東西。解嚴之前，我的評論內容都是以國家控制及民間社會抗爭為主，時間最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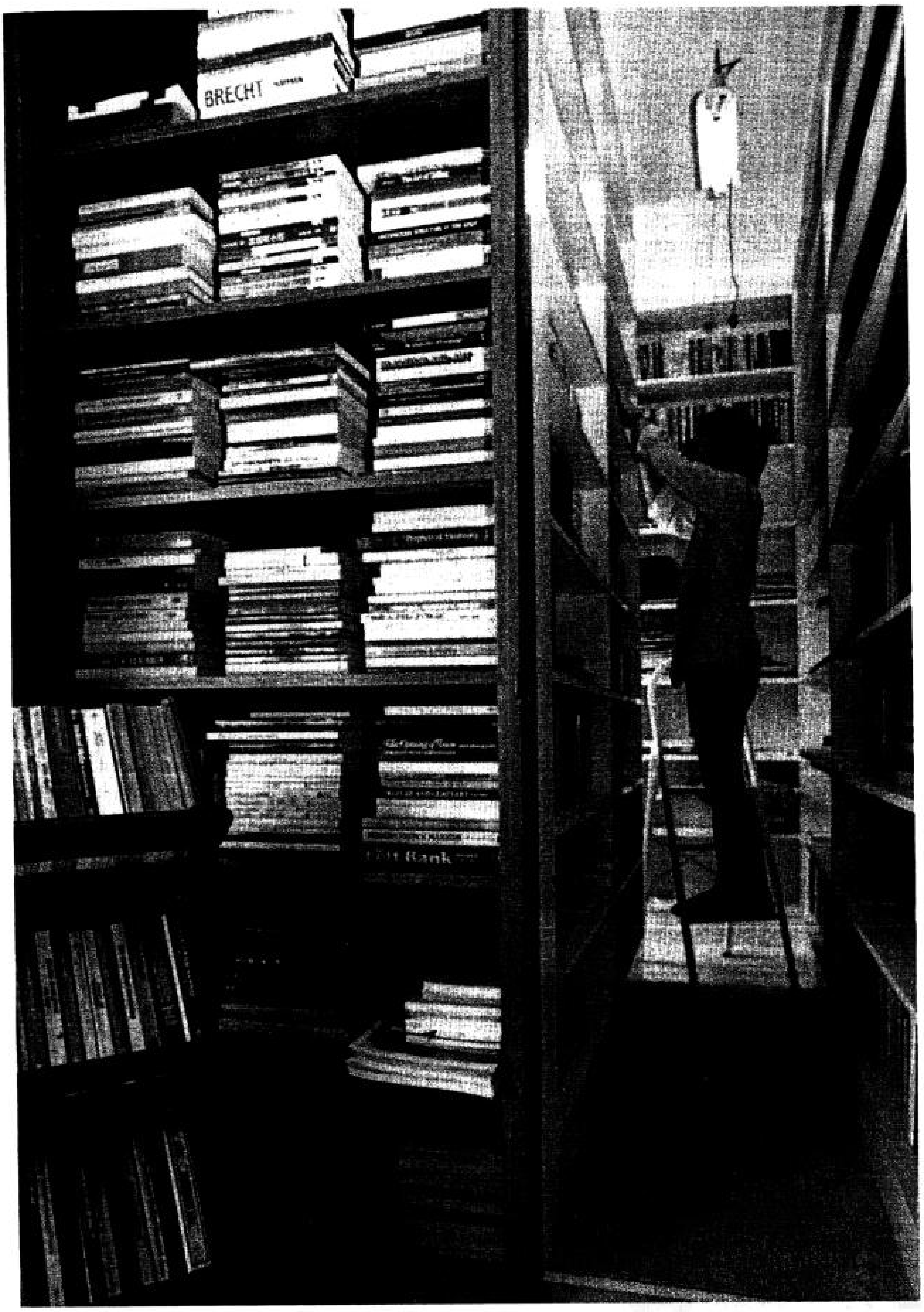
到了新新聞中期以後，我開始以語言、國際為評論重點。每期新新聞，我社論、國際、內政各寫一篇，寫內政常常寫到不愛寫，寫國際我比較高興。到了後期，差不多有六、七年之久，我開始專心寫語言。

我的基本觀念是：古代的東、西方人都一樣，從事評論的人都有很強的文學底子。英國大詩人密爾頓（John Milton）寫《失樂園》，可是我們很少人知道，密爾頓是他那個時代最偉大的政論家。神祕詩人、畫家布雷克（William Blake），還是個社會主義者，他差點被英國人抓去送到澳大利亞。以前的東方，中國唐朝那些偉大的官僚、評論家，都是詩人啊！《古文觀止》裡面有很多政論，〈祭鱷魚文〉是政論，〈賣柑者言〉是預言也是政論。所以寫評論跟文學都是都連在一起的。

寫評論的自我訓練

政黨輪替前後，我的評論重心開始轉向語言。這段時間是台灣七嘴八舌、妖言惑眾、東拉西扯最多的一段時間。我從小就喜歡詩詞歌賦，天生對語言敏感。我認為很多東西扯到後來都是語言問題。西方近代所有的學問也都轉向語言學，例如經濟語言學。語言的形成、語言概念精確不精確、語言的比喻，通通都出現在各學問中。

所以語言問題是很多問題的本質、根本。台灣社會變成扯話扯皮，所以我開始轉到語言。我是傳



南方朔的書庫。（中國時報提供／林國彰攝）

統知識份子，傳統知識份子一定要找到一定的知識基礎，評論才會有立腳點，一定要立足土地之上，然後漂浮於土地之上。

再如省籍問題，我長期觀察、分析後發現，台灣的省籍問題是一種文化階級問題。

在台北這個政經中心，外省官僚以前是有文化優越感的。很多外省人當公務員。這一群外省官僚不會講台灣話，他們知識程度好一點，比較會念書，家裡面重視教育，因此第二代子弟如馬英九、郝龍斌等人的求學、當官生涯也很順利。他們在台北逐漸形成一個文化階級。

很多外省人不承認台灣的省籍問題是文化階級問題，但國民黨第二代官僚仍然充滿這種文化優越感，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

很多人好奇我如何寫那麼多評論，我認為知識基礎很重要。一些表面現象，沒有知識基礎就不知道怎麼去分析。要不斷讀書，才能找到對的切入點。很多人都有描述現象的本領，不過，要從結構上看問題，或是從文化符號看問題，沒有經過一定程度訓練是不行的。

台灣社會絕對不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台灣的很多經驗，在全世界都可以找到不同的佐證，這就是我能夠寫那麼多評論的方法與自我訓練。

媒體處於新社會控制中

在古代靜止的社會下面，社會沒什麼變化，記者能夠堅持社會良心就好。但現在媒體這麼發達，整個新聞價值觀一直在變，記者的角色一直在變化，很快你就會迷失自己。

我認為，堅持不只是道德的堅持，包括知識的堅持都要更多。我對現在台灣媒體超級不滿意，解嚴以後台灣的媒體生態發生最大的變化，就是「公共」不見了，通通變成八卦。台灣媒體界都不好好思考，台灣哪有什麼新聞？通通都是八卦。

我們現在已經沒有嚴肅的課題了。貧富不均，我們根本不注意，每天就注意台灣第一富豪是誰？第一富豪何時嫁女兒、娶媳婦？整個世界、社會事務全部八卦化；但媒體不應該是這樣子，古代的媒體是社會的公器，要談公共事務，打抱不平。

台灣社會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脈絡下，什麼都不談，只談競爭力。離開學校之後叫你充實自己，充實什麼呢？不是充實人文關懷，是充實競爭力。在生產部分，人已經簡化成「競爭力」；另外一部分，人就是「消費」。所以現在消費變成一個很大的價值。大家拚命地消費，最後是媒體也消費、新聞也消費，一切東西都是消費。

最好的消費化就是八卦嘛！整個媒體的演變變成八卦化，很多人的基本價值不見了！

現在台灣的新社會控制，已經不是古代社會威權控制。現在的社會控制，是一種惡劣的流氓控制、群眾控制。誰的群眾比較凶，你就怕誰！另外一種就是八卦控制，任何問題一轉，轉成八卦問題就消失掉了。謠言很多，專門造謠言，也變成另外一種形態的社會控制。台灣媒體處於這些新社會控制中卻無力掙脫，這就是當前媒體的最大問題。

◎初稿：趙士甝

◎修訂：洪貞玲

◎定稿：何榮幸

◎訪問時間：二〇〇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五月七日、二十九日

◎地點：台大新聞所攝影棚

備註：

一、南方朔先生授權本章直接刊出，未對訪談文稿進行過目確認。

二、對於周天瑞先生生命史中敘及「林宅血案」時新聞處理爭議，我們請南方朔先生作出回應，南方朔先生認爲「這件事已經講不清楚了」，因此不予回應。

吳豐山

吳豐山

〔第六章〕

連寫二十年個人專欄

一九七五年自立晚報撰述委員

前頁圖說：
接受台大新聞所「資深記者生命史」計畫訪談。
（台大新聞所提供）

一九六九年就進入新聞界的他，原本一心想要參選，卻被《自立晚報》老闆吳三連一再挽留。「妥協」的結果是：他從一九七五年開始在自晚撰寫「吳豐山專欄」，這一寫就是二十年，他也成爲自晚在這二十年間的看板人物。

儘管留在新聞界發展，他還是以無黨籍當選過國大代表，美麗島事件時則安排《紐約時報》駐台記者殷允芃與著名作家陳若曦見面；解嚴後參加由李遠哲召集的跨黨派兩岸小組、出任中選會委員。換句話說，他的「外務」始終不斷，這也是他「彌補」無法從政遺憾的社會實踐。

訪談過程中談到一九八〇年林宅血案時，他一度哽咽無法繼續，那是戒嚴期間唯一讓他輾轉反側的夜晚；在那個晚上，他擔心當局濫殺無辜將導致二二八事件重演，感懷傷時竟致難以成眠。即使過了這麼多年，這位已經入閣、形象嚴肅的行政院政務委員，心情依舊激動、眼眶仍然泛紅。

他對所有問題的回答，都非常精簡，但他的自信卻一點也沒有打折。讓我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已經爲自己寫好了墓誌銘：「吳豐山，出生於一九四五年，《今天的台灣農村》著作人。」這是他擔任記者時期最重要的採訪報導，他認爲這樣就夠了……

吳豐山大事記

1945 吳豐山出生

■1969自立晚報記者

1971 退出聯合國

■1972自立晚報採訪主任

■1973當選國大代表

■1975自立晚報撰述委員、「吳豐山專欄」

■1977自立晚報總編輯、獲曾虛白新聞獎

1979 美麗島事件

■1981自立晚報社長

1987 解除戒嚴

■1992自立晚報董事長

■1993獲台美基金會「新聞事業特別貢獻獎」

■1994自立晚報發行人

■1997行政院顧問

■1998公視董事長

■2000參加李遠哲召集的跨黨派兩岸小組

2000 政黨輪替

■2006行政院政務委員

■2007行政院政務委員卸任

記者是永遠的社會改革先鋒

從小就想要領導

我出生在台南縣，靠近海邊的一個農村。我家有田地，還開了兩家店，是村莊裡比較有錢的人家，但是生活過得很簡樸。家父希望能增加更多田地，因此他賺一塊錢，只願花一毛，剩下的通通省起來買田。

我讀小學時，六年都拿第一名。由於一直當班長，養成未來領導人群的想法。大學時我讀政大政治系，會選擇政治系是因為當時我認為，「男人就應該做領導的工作」；後來回想，這種想法也不一定對。

我認為做領導者，應該讀政治系。而讀政治哪有去「台大」讀政治？當然應該讀「政治大學」的「政治系」！所以政大政治系是我的第一志願。政大政治系的課程較廣泛，所以我有很多時間讀傳記、歷史。讀書時，心中有些典範人物，對人類的進步也懷抱理想。

我大學還沒畢業就想從政。從政只有三條路可以走：考文官考試當文官、參加選舉或靠高人提拔。我對於考文官沒有興趣，所以這個選項不適用。我那時還年輕，尚未做出成績，也無「背景」，

當然不會有人提拔。剩下的路，就是參加選舉。

當記者原是爲從政作準備

一九六八年，我當完兵進入社會。那時沒有選舉可選，我打算三年後參加省議員選舉。但這三年我不能空等。我想：「什麼工作能幫助選舉呢？」之後我便決定當記者。

我選擇到《自立晚報》。因爲當時自立晚報發行人吳三連先生，是我們台南縣無黨籍大老。我想，若投效他，三年後的選舉也許會比較順利。於是我寫了一封自薦信給吳三連先生。他交代了總編輯羅祖光先生跟我談，羅先生覺得我不錯，就錄取我了。

我原本不是新聞系的，卻開始當起新聞記者。爲了充實專業知識，我想利用最快的速度讀新聞研究所。一九六九年我進入政大新聞研究所，一九七一年拿到碩士學位。

我是整個大家族中，第一個讀完大學、研究所的人。他們對「大學」、「學問」、「記者」沒什麼概念，知道我想要選省議員、從政。所以他們也知道，報社只是過渡的工作。

我在自立晚報的薪水只有一千元。有個朋友才高中畢業，考進海關當稽查員，薪水卻有三千六百元。我家裡的人對我從事新聞工作沒什麼意見，只是覺得奇怪：「怎麼大學畢業了，薪水這麼少？」

媒體與選舉的拉鋸

我剛進自立晚報的時候，報社只有十個記者。我跑市政線，後來採訪立法院和政黨。

選舉跟從事媒體工作，這兩方的拉鋸，我一直感到痛苦。我始終有從政的念頭，但吳三連先生跟我說：「在媒體工作，貢獻更大。」

吳三連先生會這樣對我說，其實是有原因的：

吳豐山先生（左）與吳三連先生合影。（翻攝自《吳三連回憶錄》）

首先，我進去自立晚報後，作了「今天的台灣農村」採訪報導。吳三連先生覺得我是報社裡不可缺少的幹才。台灣人當時把記者看得很低下，在我之前，報社沒有人能夠作出這樣的採訪報導。

第二，我印象很深刻，吳三連先生認爲，當民意代表是「狗吠火車」。他以前當過民代，認爲就算我當了省議員，有再多的想法，別人要是不接納，也沒有用。既然我想對時事發表意見，可以在報紙上發表。

第三是吳三連先生的人生觀察。他選舉時，背後有財團和「台南幫」幫助他，我沒有後盾來幫我。他認爲我走政治這條路，會痛苦一輩子。有句閩南語這麼說：「我吃的鹽比你吃的米還多，我走的橋比你走的路還多。」他比我大五十幾歲，又經歷過這麼多風浪，他認爲這些勸告很正確。

吳三連先生到底對不對，沒辦法驗證。假如沒有吳三連先生的一番話，我不會在媒體繼續工作，會離開媒體直接去選舉。選舉結果會怎麼樣，我不知道。

吳三連先生說：「你眞的要選的話，我只同意你選國大代表，開會少，你還是可以以記者爲主，可以兼顧。」擔任國大代表，跟當記者沒有什麼衝突。因此我放棄了省議員之夢，去選國大代表。這是我折衷的選擇。

選舉時，我把《今天的台灣農村》（後來結集成書）大量印給支持者，跟他們說：「你看，我是

有能力爲民服務的人。」吳三連先生也幫我寫信，推薦給他的朋友。

我因爲家族地域關係，加上後來到自立晚報工作，所以我被歸類爲台南縣的「北門派」，也就是「海派」。選舉時，派系幫我許多。

當時的派系其實都是國民黨的派系，海派較多無黨籍人士。領袖吳三連就是無黨籍，我自己也從未入過任何黨。但國民黨照樣打壓我們無黨籍派系。我第一次選舉結束，我的老師、堂兄和妹妹就因此被開除國民黨黨籍。

我一路待在自立，終究沒有去選省議員，最主要還是吳三連先生告訴我不要「迷信政治」。這些話對我發生了很大的作用。從結果論來看，也沒什麼後悔的，畢竟另一條路我沒有走過，也不知道選另一條路結果會怎樣？

代表作今天的台灣農村

我當第一線採訪記者三年，之後就專心寫「今天的台灣農村」。

台灣從一九五〇年開始實施耕者有其田、三七五減租等政策。過去農村的人只求吃飽就好，但後來輕工業發展起來了，電風扇、電冰箱、還有一九六三年開始的電視，都讓生活內涵開始改變。農村的人因爲無法購買這些產品，與都市生活開始有落差。

一九七〇年左右，我開始採訪台灣農村。吳三連先生曾在台南縣當兩屆省議員、一屆國大代表。那時他退出競選已經十年以上了，但台南的人脈、老朋友都還在。那些老朋友跟他說：「現在農村狀況很差，大家都民不聊生！」講久了之後，吳三連先生覺得問題很嚴重，指派我下鄉去看看。

他的一句話「去看看」，我就跑了一千三百公里、花了三個月作田野調查，把農業細節弄得清清楚楚！種一甲田的稻米，種子要多少錢？人工多少錢？肥料多少錢？種甘蔗的話會怎樣？還有農業與

其他行業的比較，加上訪問專家學者、政府官員，最後我提出「十九個建議」。報社很重視我採訪的結果，在二版連續刊登一個月，最後集結出書。

我寫了「今天的台灣農村」，不只報社高興，我更覺得是三年記者生涯裡，最重要的一件事。我想當政治家，正因為想要改革。我寫「今天的台灣農村」，跟原本的理想很接近。

警備總部立即開始注意我。他們那時認為，毛澤東要造反的第一個文件就是〈湖南農民調查報告〉，吳某某寫「今天的台灣農村」，該不會是要造反了？不然幹嘛要寫這個？

從我發表著作到「美麗島事件」，八年之間，警備總部不斷地請我吃飯、喝咖啡、聊天，說是保持聯繫，想要掌握我的狀態。直到我當選國大代表，加上美國國務院邀請我去訪問，警備總部對我才比較客氣。

一九七二年，蔣經國先生上任行政院長。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徐慶鐘先生和國民黨中央黨部祕書長張寶樹先生都是農業博士。他們較瞭解農村發展情形，讀完後特地找我去問：「有沒有還沒寫上去的內容？」

後來，蔣經國先生宣布一百八十億的「改善農村經濟方案」，緊接著又追加兩百億。我當時遭到鎖定的危機才過去；這算是我的人生機緣。

同一時間，某報某記者跟我是不錯的朋友，特地過來感謝我，因為報館放他一個月的假。原本報館叫他寫「繁榮的台灣農村報導」，但我發表了「今天的台灣農村」，報社叫他不要寫了，休假去。

那時，官方的論調，都認為農村生活非常好。外交部去非洲邦交國家，宣傳我國農村，也不斷地誇耀。但事實上，農村根本不一樣了。農業社會有變遷，但沒人寫。我是全台灣第一個作農村調查報導的人，後來學界才開始注意。有很多台大學者找我拿田野調查、聚落的資料。

我的朋友都曉得一件事——我希望死後我的墓碑能寫著：「吳豐山，出生於一九四五年，《今天

的台灣農村》著作人。」這樣就好。

「吳豐山專欄」呼籲體制內改革

我始終想要從政或當民意代表，與志同道合之士推動改革。但報社一直不希望我去選舉。為了綁住我，一九七二年讓我當自立晚報的採訪主任。我當採訪主任時，記者人數已達三十人。

我當採訪主任只有三年，一九七五年請辭，因為我又想要投入立委選舉。請辭後，開始我最重要的工作——寫「吳豐山專欄」。報社對我非常好，雖然我請辭了，還是給我「撰述委員」的職位。我可以一邊準備選舉，一邊寫吳豐山專欄。

吳豐山專欄的內容大多關於政策改革。頭兩年，每個禮拜寫一篇，後來不定期，前後寫了二十年。一九七七年我得到「曾虛白新聞獎」的評論獎。直到現在仍有許多年輕政治人物跟我說：「我是看你的文章長大的！」

《吳豐山專欄》書影。

吳豐山專欄跟當時黨外人士寫的文章，有兩個不一樣的地方。

首先，我不會主張推翻政府。我覺得很多問題，政府都能解決，只是「不為也，非不能也」。

再來，我不會指著別人鼻子罵。我寫批評的文章都有論證。只有一次，因為國民黨暴力修憲、表決，我真的很生氣，用文言文寫了一篇「橫

柴入灶記」文章，指著當時國民黨幾位國大黨鞭罵，罵他們不學無術、胸無點墨。這是我唯一一篇罵人的文章。

雖然我長期支持、參與黨外運動，但我跟黨外激進派的想法、作法，始終有程度上的差異。

我常公開講，每個黨都有很多理想，但也有狗屁倒灶的事。黨都是人組成的，人多意見就會分歧。但一直以來，我都支持民主運動。

當很多人主張打倒國民黨時，我認爲：「打倒國民黨並沒有好處，只是另一個罪惡的循環。」我們要走向兩黨政治，國民黨不就是現成的黨嗎？

本質永遠是記者

一九七七年，我接下自晚總編輯，因爲選舉又到了。報社說：「你不要去選舉，選舉一點兒意思都沒有！你就好好做這個工作。」現在回頭看，我想報社主要是想留住我才這樣說。畢竟總編輯對社會的影響力、說服力更大，我留下來的意願也更高。因爲編務繁重，吳豐山專欄就無法維持每週一篇的頻率。

一九八一年，我接任自立晚報社長，這是報社的考量。我從主管編務的角色，轉變到掌控整體經營。對我來說，這是很大的轉變，但也有始終不變的想法。很大的轉變是指，我所作的決定、所影響的範圍擴大。不變的是，無論我在哪個位置，我還是繼續寫吳豐山專欄。

我常鼓勵同事：「行政工作是兼任，你的本質，永遠是記者。」所以我當採訪主任時，是記者兼採訪主任；當總編輯時，是記者兼總編輯。我一直都有這個認知，所以我繼續寫吳豐山專欄。

經歷過這麼多角色轉變，我最喜歡的仍是寫吳豐山專欄的角色。

工作時我也遇過困境或矛盾。我一直想參政，這就是一種衝突、掙扎。

我也遇過挖角的矛盾。我剛進報社第三年，有個美國朋友在台灣開公司，他提供兩萬元薪水，也由公司保養我的汽車，要我作公關。我當時在報社的薪水只有一千元，兩萬元是二十倍。我能勝任，也滿喜歡這份工作，所以我心動了。後來我跟吳三連先生請辭，他沒有反對，只說：「條件很好，你可以去。不過，若過了十年、二十年你變成一個大貿易家、富翁，你也僅只於此。倘若你現在不考慮薪水問題，好好地在報社工作，你未來對國家、社會，會有更多貢獻。」

這類的挖角事件太多了。但我對報社有感情，跟吳三連先生，還有另一個老闆——吳尊賢先生，感情愈來愈深，「如師如父」。我始終沒有轉行、跳槽。

辦報不造反、造反不辦報

陰錯陽差，我在自立晚報服務了二十七年。這二十七年恰好是台灣政治發展最重要的階段。我當總編輯後，自立晚報才成爲明顯的批判角色。社會的氣氛慢慢地開始改變。

自立晚報對台灣民主進程非常重要，我躬逢其盛，對此感到欣慰。

那時有一批學者認爲：「民主化」是台灣一定要走的路，也是兩岸競爭中，別於中國大陸的一條路。胡佛、楊國樞、張忠棟、李鴻禧和陶百川開始在自立晚報發表文章，我們有緊密的結合，一起推動了很多政治改革。

黨外的民主運動需要老百姓支持，需要媒體刊登活動、發揚理念。自立晚報在那時幫忙做了這件事情，我們認爲是應該的。不過，在手法上，仍避免被官方趕盡殺絕。

第三，政府常常跟我接觸，希望我同情國民黨主政的困難。他們以爲只要自立晚報不支持民主運動，民主運動就無法發起。我卻藉由國民黨與我接觸的機會，讓政府瞭解我的想法。我認爲：「民主開放才是一個正確的方向。」

其中，我扮演了溝通角色，得到兩方信任。民主化的過程，自立有別於黨外雜誌的地方在於：我們認為民主運動不是造反，「辦報就不造反、造反就不辦報」。我們有個重要的原則——始終在字裡行間表達出一種期待：「這些事情政府都有能力解決，我們並非要把政府推翻，我們只想要改革。」因此，國民黨似乎較能容忍接受我們的想法。

這是一種「體制內的改革」。我們認為，絕對不能消滅國民黨，否則台灣不是又變成另一種一黨政治了嗎？大家這麼努力追求兩黨政治，豈不是又得重新開始了？

美麗島事件唱反調

從一九七五年開始，社會開始醞釀一股對抗的氣氛，一波一波，後浪推前浪。

一九七七年，我當自立晚報總編輯時，開始處理升高的對抗事件。我認為民主不可擋，我在報社擔任編務工作，義無反顧地支持民主運動。

那時對峙氣氛逐漸升高。一九七七年「中壢事件」發生後，我們的社會記者也去當地採訪，做了全版的報導。我們認為這是選舉糾紛產生的「抗暴運動」。

美麗島事件發生前幾個月，有一天，警備總部把各報社長、總編輯、採訪主任找去聽簡報。那時的警備總司令是汪敬煦，文工會主任是楚崧秋。簡報裡講：黃信介、姚嘉文等人都是台獨份子，跟共產黨掛勾。

楚先生那時走到我身邊來跟我講，希望簡報結束後，我能上台發表感想。楚先生希望我呼應一下。我說：「我不講。」他連續來了三次，希望我講講話。我跟他其實有點交情，我說：「楚主任啊，是你要我講的喔！」他面露難色，騎虎難下。

我上台就說：「這些人我都認識，我知道他們的訴求是民主開放，跟共產黨沒有關係！你們現在

這樣白紙黑字、大庭廣眾下說他們是共產黨，若是眞的，你就去抓啊！不抓，是你不負責任！但我看你們也沒去抓，你們只是在利用國家機器製造恐怖氣氛，這樣對嗎？」

我講完後，楚先生下不了台，匆匆結束這場簡報。《聯合報》副總編輯鍾榮吉跟我說：「吳豐山，你很勇敢，但你之後自己要小心。」

我跟楚先生有往來，他是留學美國念政治的人。我記得有一次，美麗島事件發生前，他跑來報館找我說：「有事情跟你商量。」他說：「你在報上談到這些人時，是否能用『極少數分歧份子』這個詞呢？」我說：「楚先生，我不接受。因爲我瞭解這不是『極少數』；再來，『分歧份子』有價值上的判斷。你這樣講『極少數分歧份子』，不是讓我爲難嗎？我自己也是那些『分歧份子』！」我認爲這已違反民主，之後我勉強接受使用「部分異議人士」這個詞。

美麗島事件爆發時，自立晚報有種使命感——絕對要忠實報導這些新聞。有天，我們有個標題沒有用「暴徒」兩字，反而用比較正面、肯定的字句，民眾就打電話罵我們，說要燒報館。採訪主任林倖一去接電話，他一急，就在電話裡跟對方吵架，吵完了跟我說：「對方太沒有道理了，說要燒報館！」當時報館裡外的情緒會互相影響，而我當總編輯，我的態度對報社的走向非常重要。楚崧秋先生後來主張美麗島事件公開審判，讓媒體盡量報導。結果丟官了。

林宅血案，無法成眠

那時自立晚報的壓力來自四面八方。國民黨政府當然會施壓。也有黨外運動的人，認爲黨外的消息報導得太少，覺得我們不夠勇敢。

報社內部有一個哲學，來自吳三連先生的名言：「辦報紙不像放煙火，放煙火燦爛一下就沒有了。報紙必須每天存在。」我們報社要能夠存在，才能發揮眞正的影響力。在不失原則的前提下，我

們有些妥協。在妥協中，大家都很痛苦。

那段期間，我一直被竊聽。其實也不算是「竊」聽，他們根本是「公開」聽。

一開始，國民黨政府透過各種管道，要求我做很多事情。例如透過自晚董事長許金德先生，來要求我。那時各報都有國民黨的黨員小組，自晚也有小組書記。我跟他們還算有互動。有時他們會事先跟我講他們的動作，若是在我容忍範圍內，我會接受。但若跟報社的政策衝突，我會跟他們商量。商量不成，往往他們也不跟我講了，直接下令記者跑線。

自立跟當權者的對立，開始一步一步地升高。我們一一化解接連發生的衝突，社會的氣氛愈來愈緊張，我卻從來沒有害怕、擔心過自己的安危。只有一個晚上，我睡不著覺。就是發生「林宅血案」那晚。那個晚上，我翻來覆去難以成眠

由於林義雄先生在看守所時不屈服，他的老母和稚女被刺身亡。我感覺，台灣的政治又開始走上不好的發展；好像又回到二二八事件，開始濫殺無辜。我覺得台灣的命運，好可憐，因此不禁感懷傷時，無法成眠。

大陸行搶頭籌的幕後策略

戒嚴時期，自晚董事會就一直討論，自立晚報是否可改成早報？這個願望當然達不成，因此確定解嚴後，我們開始籌備。那時充滿勢在必得的心情，興奮地認爲一定會成功。

我們派李永得、徐璐去大陸，其實是爲了準備辦《自立早報》作宣傳。在那個時代，只要認眞參與新聞競爭，都想搶先派記者去大陸採訪，先搶先贏。我那時聽到消息，中時、聯合都要派記者去大陸。原本我們要派一個男攝影記者和一個女記者，但因簽證、護照的問題，改派李永得、徐璐。

我想事情一定會引起軒然大波，因此我作了兩個決定。

首先，我不事先告訴老闆。等兩位記者上飛機，事情已無法挽回，我才告訴老闆。那時我很坦白地跟他們說：「我之前沒有報告，因爲我希望將來打官司時，你不必說謊，你說不知道就好了。」我願意一肩扛起。他們也能理解。

再來，這件事情一定會引起官司。其實打官司反而是最好的結果，我認爲國民黨打不下去。我決定鑽憲政上的矛盾，說我們是採訪「我國國土」，最後我們果然全身而退。

我非常滿意李永得、徐璐的採訪結果。他們替自立早報作了很好的宣傳。

台灣新聞自由的發展歷史，是由各個事件突破而成，大陸行就是突破行動之一。其他的突破事件，像是許信良闖關回台灣的「機場事件」，自立晚報上上下下認爲，這是一個民主運動，因爲是民主運動，我們堅持大幅報導。

我們始終相信新聞事業有兩種功能：一種是鏡子，另一種是評論。報導就是鏡子的功能，有什麼照什麼；評論則要有正確的價值觀。自立晚報能突出，是因爲與其他報比較起來，我們盡力報導事實。其實也沒什麼了不起，本來就是應該做的事。

自晚敗給廣告主害怕政治

一九八一年到八七年間，自立晚報、《民族晚報》、《大華晚報》三家晚報競爭得非常激烈，最後自晚大獲全勝。

我接社長時，三家晚報的發行量大概都三萬多份，廣告大概都一千多萬。最後，自立的發行量到了十三萬份，廣告量達到三千萬，而民族晚報和大華晚報都停刊了，自晚才有基礎開始辦自立早報。

但是，後來報業競爭進入完全不一樣的格局，自晚變成與中晚、聯晚競爭。在這格局內，自立無法像前一波競爭時脫穎而出。報禁時限制報紙只能印三大張，後來變成四大張，有雄厚資金的報社占

盡優勢，可以張數又多又便宜。後來報業公會提議，報禁開放後，四大張賣八元；五大張九到十元；六大張十一、十二元，最多六大張。大概過了幾個月後，協議破裂。報業進入激烈的戰場，我們沒有辦法做這麼多版面。面對之前政治壓力，我們有自己的生存之道。但面對經濟壓力，我們卻無計可施。

自立的股東——台南幫成員，都做賺錢的事業，他們認為報紙無法賺錢。有的股東是國民黨中常委，認為投資報紙很累贅。吳三連先生去世後，增資就變成很困難的事。

員工無權選擇老闆

當時大多數經營事業的人，也不願意在自立登廣告。他們擔憂在自立登廣告，國民黨會算帳。他們認為，自立晚報是反政府的媒體。這種壓力，別人無法感受，但是身為經營者，我的感受非常強烈。面對企業不願意登廣告的壓力，我們一點兒辦法都沒有。

後來自立報系轉賣他人，自立工會抗爭。他們當時抗爭，不願賣報紙給他們不信任的買主。然後開始訂「編輯室公約」、推動編採自主等協議。

我的處境很為難，我必須代表原業主進行交易，也要照顧員工的利益。但我認為工會抗爭過頭，我不認為員工可以選擇老闆，員工沒有權力決定報紙要賣給誰。

回想起來，我不後悔走上經營這條路。我只覺得，那時開辦自立早報，若第一階段發行限於台北縣市而不是全國，也許自立早報會有不一樣的生命，有更多時間作準備。當然，這也只是後見之明。

自立晚報後來經過四手，還是關門了。這就是歷史的發展。人世間很多事情，滄海桑田。

精神堡壘吳三老

回首自立，吳三連先生是精神堡壘。他在日本的大學念經濟，畢業後，在《每日新聞》大阪分社

當經濟記者。那時日本已有相當多的新聞自由。耳濡目染下，他感受到新聞自由的價值。那個年代，留學又有新聞經驗的人少之又少。後來有台灣人要辦報紙，他才回來當「編輯長」，類似現在的總編輯。回國後，他延續為台灣人發聲的反抗精神。在政治表現上，他本身沒有政黨負擔。從一九五〇年代起，他開始參與報紙經營。因為國民黨控制嚴密，所以他的好友——國民黨籍的許金德加入、合作。

一般人都認為，吳三連先生對台灣人民抗日和政治民主發展都有貢獻。我認為，更重要的是，吳三連先生是「大器」的台灣人。他的胸懷、度量都十分寬闊。一般海島國家，不太容易產生大器的人，他卻例外。

我跟吳三連先生，對國家、社會的理念，大部分是一樣的。看到一些政治衝突，我們都覺得沒必要爭得頭破血流。與其蝸角之爭，不如追求卓越，放眼全世界，比較海闊天空。

最不干預新聞的社長

其實，台灣在日據時代就有報業，像《台灣民報》，為台灣人民喉舌。到了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報業重新開始。但台灣人不瞭解媒體的重要性，所以新聞、傳播事業養成的人才非常有限。中國來的新聞人才變成多數，他們承襲著「文以載道」、「言論報國」的思想。

早先自立晚報的老闆是外省人，有「大中國主義」，後來才轉向關懷本土。在我服務的二十幾年，報社核心價值就是「本土關懷」。台灣人民的利益、經濟、稅務負擔、地方建設，到後來鄉土文學論戰，我們都投入心力。自立也首開風氣之先，百萬元徵求本土長篇小說，還舉辦過自立盃棒球賽等。

一九八八、一九八九年左右，許多年輕人基於一股熱誠，到自立工作。報社內有各個省籍、黨派、學校、思想的人。我們相信，如此才能成其大，不會變成「一言堂」。

我覺得驕傲的是，有人調查報社內社長干預新聞的程度。調查中，我被認爲是「最不干預新聞」的社長。我們報社充滿著自由的氣息，個人可以保持自我信仰，信仰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都可。但在報紙的編採內容中，必須無黨無派，必須堅守「公器」理念。

公視草創建立制度

一九九四年，自立報系換了主人，我花了幾個月處理新舊交接，就離開了。

到了一九九八年，蕭萬長先生當行政院長，請我當無給職的行政院顧問。有一天他問我：「提名你當公視的董事，好不好？」我認爲我可以勝任，所以答應他。立法院同意後，我就上任。

後來有些董事建議我參選董事長。我問了蕭先生，確定政府的手沒有伸進公視，我才參選。之後就選上了。

1996年，吳豐山（右）與吳尊賢先生合影。（翻攝自《人生八十——吳尊賢親友合撰祝壽集》）

選董事長前，我請教吳尊賢先生，問他：「董事建議我去選董事長，如何？」他想了一想，說：「那麼一點兒錢，一定做得很辛苦。可是假如你當作積德、修行，好好地當董事長，對社會有很大的奉獻。」我聽進去了，也決心把公視變成台灣媒體界標竿。這是我一貫的想法。

公視有「公共電視法」，一部分的經費來自政府捐贈，一部分要自己募

款。是財團法人，沒有營利、賺錢的壓力。我常說：「公共電視也是電視，還是必須透過螢光幕的各種呈現，才能達到理想。」

不過，我經營公視時也遇到一些困難。

首先，在社會做事，每個人都有上下左右的關係。我在自立時，上面是出錢的老闆。他們雖然會擔心事情有沒有做好，但很支持我的作法，會溫馨地鼓勵我，關係很單純。但公視的主管機關是新聞局。照理講，立法院應該只管預算，卻干涉公視內務。干涉的人根本不懂媒體運作，卻變成無形壓力。

面對壓力，我鼓勵同事：「你們假如不官僚、不舞弊、不貪污，我在外面處理公務，什麼壓力都不怕，可以好好解決這些問題。」後來我們爲落實理念，不管誰來，我們都只提供便當。無論總統、立委、老百姓，都一視同仁。一開始，有一、兩位立委蠻橫霸道，抱怨我們不尊

公共電視台第一、二屆董事長吳豐山。（中國時報提供／王英豪攝）

重。後來久了，知道我們公視特性，跟我們道歉。我們的態度不卑不亢，若要質詢或問細節，都有問必答，不會隱瞞。

第二，公視不是營利單位，但我們要自己想辦法讓收支平衡。這部分的壓力一直很大。國民黨執政時說文化很重要，要發揚台灣文化。但從預算分配比例來看，就知道是胡說八道。民進黨執政後如出一轍。身為公視的決策者，我瞭解到，台灣的公視不可能瞬間具有日本、英國公視的規模。

當初建台前，政府打算每年給六十億營運經費。建台後，卻只剩十二億經費，每年還得遞減百分之十。我們想方設法，請立委修掉「遞減條款」。另一方面，我們也努力自籌經費。後來，一年大概有五、六億的自籌收入，勉強算是有點小成績。這都是我們同仁的心血。我們也運用各種人際關係，與政府單位、企業合作，像是與文建會合作戲劇「寒夜」、「風中緋櫻」等。

我絞盡腦汁，想增加公視收入，提出「隨電表徵收」的構想。台灣大概有一千多萬個電表，若每年隨電費徵收五十元收視費，就有六十億！這對公視發展有很大的幫助。未來公廣集團還可增加「公共政策頻道」。若學界能一起推動，公視會進步得更快速。

公視是一個企業。建立企業文化很重要，會影響之後的行為態度。我是開台元老，堅持地定下典章制度、企業文化後，我才離開。

公視後來也成立工會。我對工會有一貫的態度。我鼓勵工人組成工會，發揮影響力，這是伸張人權。不過我也認為，任何事情做過頭都不好，這是天理。所以我一直跟工會溝通，希望工會與董事會達到雙贏，對大家都有好處。

沒有真正踏入過政治

一九九九年，我開始擔任無給職的中選會委員。二〇〇四年離開公視兩個月後，我被提名當監察

委員。我認爲監察委員角色跟記者很像，自認可以勝任。但立法院一直不審，一直耽擱。一年後，蘇貞昌先生組閣，邀請我擔任政務委員，負責督導新聞、文化業務等。我當行政院政務委員，直到蘇揆下台，我跟著離開。

因緣際會，我跟政治永遠有扯不完的關係。我有很多機會可以參加政黨、進入政治界。但我一直在新聞界，處於在野的角色；加上我生性很討厭黨紀，我認爲黨紀跟良知是對立的。我無法抑制自己，明明對的事情，卻因爲黨紀而故意說「錯」。我無法容忍。

所以人生到現在，我沒有眞正踏入過政治，最多只是客串。

到了六十幾歲，才能客觀地檢視自己。從媒體工作到政治工作，我不敢說我一定適合做哪個工作。我喜歡跟人家接觸，這適合做政治；我人脈好，這也很適合做政治。可是我不喜歡黨紀，不喜歡扭曲良知，這比較適合做新聞。

慢慢地，我的心境也開始不一樣了，覺得政治的價值意義沒有那麼大。若把個人的條件放在大環境裡，我覺得，我還是比較適合做新聞。

人生爲了服務社會

每個人都只是螺絲釘，我也只是大社會中的小角色。回首半生，我一直不認爲自己對社會有多大的貢獻。

轉換這麼多工作職位，經歷過這麼多事件，再回頭去看，感覺日子怎麼過得這麼快？一下子就變成老人了，眞的很感嘆。我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命運。而我天生命定是「服務的人生」，爲了服務社會而來到世上。

年輕時我就開始當主管。管三十個人、三百個人、一千個人，就像在服務他們。無論在報社或公

視，工作本身就是服務社會。擔任政務委員，更是在服務大眾。如同命定般，我過著服務的人生。我也從服務他人中，獲得成就感與快樂。倘若我毅然決然地去從事政治工作，搞不好被抓去關了、死了。命運會變得怎樣，不知道。

在媒體工作這麼久，有不少歡樂的事。小到讀者寫信、打電話告訴我：「你說出我們的心聲了！」我就會高興很久。有段時間，蔣經國先生很重視我寫的專欄，常派宋楚瑜來告訴我：「你的建議，我們照辦。」或者「你的建議，我們一時做不到，明年再來做……。」我也覺得很有成就感。

另外，我跟許多同事相處、切磋，看到他們成長，也很開心。在立法院與各黨派立委接觸時，常有些年輕的立委會說：「我是讀你的文章長大的！」幾十年來，社會肯定了我，我很高興。

其實在媒體工作，痛苦是常態。事情可以做得更好，但卻沒做好，就會感到遺憾。看到社會、政治弊病週而復始地發生，以及我一直追求的民主變了樣，我覺得非常痛心。

記者不能得意忘形

記者應該不偏袒、不隱瞞，絕對根據事實報導。身邊的朋友發生什麼壞事，若與社會公益無關，不會特意報導。但若與社會公益有關，某些程度上可以做小，但仍要報導事實。所以辦報紙、媒體，常會得罪人。

我當總編輯時，有天報紙出來後，我趴在桌上休息。電話響了，有個朋友罵我：「怎麼把我當二版頭條？」那時的二版是社會新聞。我說：「報紙是我編的，怎麼可能？」後來我看二版頭條是張三，他說他就是張三。我怎麼會知道他是張三！當朋友這麼久，我只知道他叫「阿X」。

有時同事不小心在經濟版批評某董事：不識字、不學無術、開董事會都是總經理幫他開的……。我們這個董事找人打電話給我：「我們出錢投資報紙，卻罵我們不學無術？你要我們怎麼投資你們？」

也沒辦法，只好道歉。

我所感佩的人物，古今中外不少。這些人物共同特質是——認眞。認眞地去瞭解他的領域、專長、知識、工作。我認爲，這也是記者的必要條件。

身爲記者一定要知道一點：做新聞工作很了不起，不是因爲你個人，而是因爲工作的形態。影響力是來自傳播，一字之褒、一字之貶，都十分重要。我以前常說，記者的右手拿起筆時，左手要摸著自己的心臟、手要發抖。假如手沒有發抖，沒有資格當記者。手發抖，是「戒愼恐懼」的意思。記者絕對不能得意忘形，不能草率爲之。

天下的所有工作，都有一流、二流、三流之分，記者也是。一流的新聞記者可以影響國家政策，贏得社會尊重。三流的像過街老鼠、人人喊打。要做傳播工作，至少要勉勵自己當一流的記者，這是一種決心、一種自我期許。

我認爲記者應是一個超然中立角色。若說是參與者，是因爲他在事件影響力上，發揮了正確的功能。但現在看到很多媒體，只有立場沒有是非。那種參與，就是三流。

整體來說，認眞、戒愼恐懼、高度自我期許，就是我所欣賞的記者。

記者是永遠的社會改革先鋒

回顧台灣媒體環境的演變，戒嚴時，大部分的人屈從高壓，反而一些小媒體表現較好。解嚴後，大家都很勇敢，但也開始荒腔走板。現在的媒體和政治環境是亂世。媒體倘若繼續混亂下去，只會破壞台灣社會。

戒嚴時什麼都被禁止，這是一個極端。但解嚴後，什麼都被放縱，這更是一個極端。解嚴之後，銀行、媒體、航空、證券公司都隨意開放。小小一個島，市場秩序亂了，開始惡性競爭，不僅造成國

家總體資源喪失，更混亂人心。

什麼都禁止或者什麼都開放，這都是錯誤的極端。但事情已發生，更需要累積有志之士的力量，提出重整秩序的方法。

至於記者的核心價值，我認爲，做人就是要重視「人道」。記者的職業更是如此，要關懷公眾事務，而不只是個人事務。一般人只要關心自己、家庭、公司，記者必須要關心世界各個角落。這就是新聞記者的工作價值。

新聞記者要永遠貢獻社會。不同時代，有不同的改革課題。日據時代，要反抗殖民統治，爲台灣主持公道。戒嚴時期，要反抗專制，爭取民主。現在，要爲民主深化努力，要爲弱勢爭取權益、爲環境爭取永續發展。

社會永遠有黑暗的角落，台灣一直有新的社會議題，但誰會注意、關心？要發掘出來，人們才會知道、改善。若記者願意花時間、精力發掘問題、協助人群，就是非常有理想的好記者。新聞記者不應每天打口水戰，要當一流的記者。協助社會改革，不是件美事嗎？

這就是我一以貫之的理想：記者，永遠的社會改革先鋒。

◎初稿：江碩涵

◎修訂：林麗雲

◎定稿：何榮幸、吳豐山

◎訪問時間：二〇〇七年五月六日，上、下午各一次

◎地點：台大新聞所攝影棚

李旺台

李旺台

〔第七章〕

美麗島事件見證人

一九七九年台灣時報採訪主任

前頁圖說：
擔任《台灣時報》採訪組副主任時的工作身影。
（李旺台提供）

他用了二十多年的時間，在南台灣努力發出與北部媒體不同的聲音，希望打破「從台北看天下」的迷思。有很長一段時間，他是黨外雜誌的南台灣「供稿大戶」。光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美麗島事件」現場目擊的歷史記憶，可能就足以回味終生。

十年前，他接受台灣記協《目擊者》雙月刊訪問，陳述解嚴十週年感觸。當時他就慨嘆，台灣媒體老闆政治立場太過鮮明，而且直接介入新聞編務，身為總編輯的他，只是要求「不要百分之百一面倒」仍不可得，只好毅然離開原媒體。

十年很快過去，他所慨嘆的媒體環境並沒有向上提升，只有繼續向下沉淪。北上發展的他，則在平面媒體、政黨黨工、政府基金會、電子媒體轉過一圈後，完全離開媒體、政治環境，與太太過著悠遊自在的退休生活。

解嚴二十年後，南台灣的聲音雖然還很微弱，卻已逐漸被聽見。對他來說，能夠為原鄉盡力發聲，近三十年記者生涯應該已經無憾了吧。

我們提出各項問題時，他太太就像是最忠實的讀者與粉絲，始終在攝影棚後方靜靜聆聽，成為本書受訪者中唯一另一半全程陪伴者。他所述說的個人心情，其實是兩人年輕時的共同奮鬥歷程，而人生已經走到可以回顧分享的溫暖時刻……

李旺台大事記

- 1948 李旺台出生
- 1971 退出聯合國
- ■1974台灣時報記者、地區特派員、台北採訪主任
- 1979 美麗島事件
- ■1984八十年代總編輯
- 1987 解除戒嚴
- ■1987在美國準備申請學校進修
- ■1988台灣時報副總編輯兼採訪主任
- ■1990台灣時報總編輯
- ■1993民衆日報總編輯
- ■1997自由時報副總編輯
- ■1998民主進步黨副祕書長
- 2000 政黨輪替
- ■2000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執行長
- ■2001總統府國家人權紀念館設置推動委員會委員
- ■2003客家電視台籌備諮詢委員、在客家電視台開播「非常短評」節目

對抗威權體制的南部記者

參加幫派的文藝青年

我從小就愛讀課外讀物，特別是在當時壓抑的氛圍下，這是可以找到出口的方式之一。每天放學後，我都會先繞去租書店看書，看的大多是福爾摩斯偵探小說和武俠小說。由於姐姐奉母命必須搜查我的書包是否夾帶這些「違禁品」，使得我更加珍惜可以閱讀這些精神食糧的時間。

報紙是我在家中唯一可以閱讀的「課外讀物」，但是村裡只有我家和村長家有訂報紙，所以家中的報紙經常給鄰居輪流傳閱。每天我放學回家後，還必須到處去問：「現在報紙輪到哪裡了？」拿到報紙後，我就好像著迷似地反覆閱讀，連廣告都不放過。

從小的閱讀習慣，影響我對寫作的喜愛，同時也埋下我對新聞工作的憧憬。國小作文比賽，老師都會指定我參加，我也在屏東縣作文比賽中得過名。不過，當時的作文形式都很八股，內文加入國父和蔣總統說過的名言，或是寫上「反攻大陸，統一中國」就可以得到高分，是一個扼殺創意的迂腐年代。

不過，從初三開始，我結識了一些混太保的朋友，還參加了幫派。那時候我們叫「十三鷹」，最

好的裝備就是木頭製的假武士刀，拿來嚇對方。當時去撞球、冰果室，或是在降旗前跑去看電影，都會被記過、退學。這些事現在看起來稀鬆平常，但是在當時我們卻因此被冠上「太保」的名號。

全校唯一參加大學聯考的學生

最後我沒考上省立高中，只上一所私立高職：屏榮高商。學生在這所學校學得一技之長，畢業後可以去銀行、合作社或是農會上班。但是我對於這些職業訓練科目並不感興趣，還是繼續看電影、讀課外書、寫文章。

一直到高二下學期，哥哥考上大學，帶給我很大的震撼。這在當時村裡是件大事，親友都趕來放鞭炮祝賀，還包紅包給我哥。當他去成功嶺受訓時，上火車前對我說：「你也去考考看，因爲考大學不難。書我都放在書桌下，你拿去念吧。」我因此受到鼓舞，開始準備大學聯考的指定科目。高三開學時，我跟老師說要考大學，沒想到他居然大笑，並且對其他老師說：「我們有個學生叫李旺台，他說他要考大學！」

我考大學的過程，也是一波三折。一般高中生報考都由學校集體報名，但是我們學校沒人考大學，我的報考還增加了學校的工作。我是屏榮高商第一個報名大學聯考的畢業生。

我認真讀過哥哥留下來的書，一直以爲會考上。記得當時我把政大新聞系和世新編採科塡在志願表的最前面。結果我連三專都沒有考上，一氣之下我就提早入伍。當時，提早當兵是愛國的象徵，也是一件光榮的事。鄉長親自爲我掛上彩帶、大批鄉親歡送我們去車站，場面十分威風。當完三年兵，我才考上大學。

受到家裡的影響，我選擇高雄師範學院英語系。家裡面有好幾位老師，都認爲老師工作較有保障。當時英文系的出路很好，畢業後不僅是老師，還可在外面兼課補習，增加收入。

因緣際會進入台灣時報

我大二時，《台灣時報》創刊。從那時候起，我常投稿至台灣時報副刊，作品也常被刊登出來。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刺激也是鼓勵。

台灣時報是由一位在南部頗負盛名的眼科醫師吳基福創辦，這在當時的高雄是件大事。吳基福被尊稱爲「台灣最後一位仕紳」，出身旗山的望族子弟。他身爲立法委員，推動醫療保健法制化不遺餘力；同時也是一個想法進步、觀念開放的報老闆。他廣邀人才進入台灣時報，像總編輯俞國基學養俱佳，使得台灣時報在創刊初期頗具文化氣息。不僅定期作出高水準的專題，並且提升副刊素質，很多方面不亞於當時的台北報紙。所以當時我以能成爲台灣時報的副刊作者爲榮。

這段期間，我一直在台灣時報副刊投稿，因此逐漸熟識當時的副刊編輯——俞國基的太太，進而結識俞國基。有一次他對我說：「你看起來很適合當記者，我們有個缺是跑社會新聞的，你有沒有興趣來做？」

俞國基的話吸引著我，開啓我進入新聞界的大門。不過，當老師或是做記者對我來說都很難抉擇，因爲當時英文老師兼課外補習，一個月收入有七、八千元，記者卻只有兩千四百元。

當時社會對於記者的評價並不好，尤其在鄉下。我決定不去教書而去跑新聞，父親知道後很生氣。兩、三個月後，報紙上開始出現「本報記者李旺台特稿」時，父親偷偷剪下印有我名字的特稿與圖片。我當了採訪主任後，才無意間在抽屜中發現這個祕密。

吳基福的啓蒙影響

我跑社會線半年後，很快就被調至市府線。因爲某次在星期日記者休假、路線代班時，我主動寫

了一些有關於市政的特稿。當時高雄市長王玉雲與立法委員吳基福對開發公園預定地的意見相左。王玉雲認為公園不用蓋太大，公共設施保留地應該減半徵收。吳基福卻提出「綠地是都市之肺」的概念，堅持公園用地應該全數徵收開發。有一天我寫到這個議題，吳基福看到後，高興地向人說：「我居然不知道我們這裡有這麼好的記者。」於是就將我調至市府線。

當時我聽了吳基福許多進步的觀念與民主的見解。包括都市發展的問題，甚至他在國外的經驗與視野。身為醫生與立法委員，他也關心醫療行政、打擊密醫、公共衛生等議題。除此之外，他的辦報理念包含自由與民主。特別是他早年留學日本與德國，思想非常先進。他經常說：「辦報紙的人怎麼能去當黨中央的中常委。」這個觀念如今看來，仍屬難得的想法，何況是戒嚴時代。具備這些先進的想法，使台灣時報成為南部第一大報，開創出與《中國時報》、《聯合報》不同的風格與視野。

台灣時報遠在高雄，不像中國時報與聯合報是發行全國的報紙，所以當時的國民黨中央對我們的控管似乎比較寬鬆，報紙言論可以遊走邊緣。原則上小事情可以自由發揮，大事情則須支持國民黨。當時全台灣沒有一家報紙敢不是「國民黨的」。國民黨政府如果重視某則新聞，《中央日報》做成頭條，我們也會跟著做頭條，或遵循文工會的「建議」做得更大，以示安全。

得罪李煥改調資料室

我當記者不到幾個月的時候，大約是在一九七〇年代，那是一個國民思想被嚴密監控的年代。有一天半夜，我的一位幼時同伴偷偷地來找我，問我要不要看香港的雜誌。看著他帶來一大袋的書，我嚇一大跳。包括《七十年代》、《南北極》等雜誌，還有《中共的十大元帥》、《毛澤東訪談錄》等禁書。

原來，他在高雄廢紙場當貨車駕駛，當時高雄製紙進口香港廢紙再做成紙。這些廢紙在高雄港機

器堆貨時，警總人員會在一旁監視。紙廠的工作人員也與警總有關係，所以從港口卸貨到紙廠這段路都有人看守，非常嚴密，但擔任駕駛的仍有機會偷拿幾本禁書。我因此廢寢忘食地讀，讀完才拿去燒掉。這個際遇對我當時的視野影響很大。

在初當記者的生涯中，有一次我寫了高雄縣某家化學工廠廢氣外洩的新聞。當地村莊有一、兩百人就醫。這則與政治無關的新聞，國民黨部還是來電「表示意見」，說是「妨礙經濟發展」。第二天採訪主任、編輯主任與我都被罵了一頓。

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寫了一篇特稿，批評中山大學將西子灣海岸填平作爲籃球場。沒想到當時中山大學校長李煥，正是吳基福的恩人。當時吳基福嚴肅地對我說：「我在醫療公共衛生議題上堅持與國民黨相左的意見，一直以來都是李煥在幫我。這條新聞讓他非常不高興，雖然我疼惜你這個人才，但是……。」接著第二天布告欄就貼出「李旺台派調資料室」的公文。

後來，吳基福才說，懲罰我是給李煥一個交代。我在資料室待了三個星期，吳基福一直對我說：「你不可以離開，也不可以生氣，一定要忍過這段期間。」在資料室的第三個星期，我被調升台北特派員，我知道這一切都是吳基福對我的愛護。

那段期間，我有機會進中國時報或聯合報。當時兩報（中時、聯合）三台（台視、中視、華視）不論是薪水、名聲、地位都是南部記者最憧憬的。但每次吳基福都對我說：「不可以過去。」

他不斷說服我：「像你這種性格的記者，你去中常委辦的報紙，他們看過你寫的東西也會埋沒你。你去那邊，要不就出事情，要不就鬱鬱寡歡。留下來才是海闊天空。」他的這些話留住了我，受他的影響，我也逐漸將自己定位爲「以南部在地觀點爲思考的記者」。

台北特派「情報員」

記得一開始當地方記者，我最大的夢想是：「希望有一天稿子可以在二版、三版被登出來。」現在看起來很好笑，但是當時我就是以這個夢想爲目標，逼自己不斷努力。後來，我到台北當特派員，稿子被放在二、三版已經是稀鬆平常的事了。

地方記者做久了很容易習慣環境，變成記者公務員。二、三十年過去了，記者與地方各派人馬的關係愈來愈好。這種關係會讓記者習慣享受各種方便，日久成爲「地方有力人士」，卻因此失去了動力。

在台北當特派員的時候，我必須不斷與國民黨文工會主任聯繫。有時是透過黨政記者，有時是親自出馬。當時很重要的任務就是瞭解哪些是敏感的新聞？國民黨中央黨部的態度爲何？然後回報南部的總編輯：文工會告知我們什麼可以登、什麼不能登。

此外，在台北那段期間，當時黨外領袖黃信介、康寧祥都在台北，有很多東西可以報導。我們那時候與中國時報或聯合報也沒什麼兩樣，只是比台北的兩報三台多寫了一些黨外人士的活動和談話而已。不過如此，卻成爲英雄。每回我們的記者出去採訪，對方都會說：「這個是尙勇的記者。」

有次康寧祥在桃園演講，約兩、三萬人包遊覽車去聽，現場如痴如醉。我回來後寫兩、三百字，再加上一張小小的圖片。這在現在是司空見慣，但是在當時是不得了的大事。不過也因爲這樣，最後我被貼標籤：「寫黨外新聞的記者。」最後連國民黨中央黨部都跑不進去，只好改派其他同事去跑。我因爲這樣就被「封殺」，可見當時台北新聞圈是一個很閉塞的環境。

親身見證美麗島事件

我擔任採訪組副主任時，發生了「美麗島事件」。原本是社會線負責跑這條新聞。當時在高雄的新聞圈裡，美麗島事件並不算政治新聞，所謂的「政治新聞」就是國民黨的新聞。當天，我不是為了採訪新聞，而是因為與黨外人士陳菊、周平德等熟識，聽說他們會來參加遊行，就決定去與他們碰個面、打個招呼。這是出門前的想法。

我和立法委員李慶雄、周平德一開始在旁邊聊天，聊著聊著不知不覺跟著他們走進遊行隊伍中。在隊伍裡固然聽到看到的都是和自己相同的理念，但偶爾心中會浮現這個問句：「記者可以參加政治活動嗎？」這是我記者生涯裡第一次面對這種掙扎，第二次是後來與司馬文武一起編黨外雜誌《八十年代》的時候。

那天原本是世界人權日的遊行活動，沿途不斷喊著口號，每個人手牽著手、情緒高昂。每次大家熱烈喊口號時，我總是在心中有點遲疑。我吃了幾年新聞飯，把記者這一行看得太認真。那時候一邊是李慶雄抓著我，另一邊是周平德，我們手拉著手。我心裡卻不斷自問：「我的身份可以這樣做嗎？」後來我告訴自己：「我今天不是來跑新聞的，是來看朋友的。報社有派攝影記者和文字記者來。」我當時是用這個理由合理化自己的行為。

遊行隊伍一直走，沿途繞成一個四方形，最後又走回警察局分局前，事情就是在那裡發生。當場的確有衝突，但當時遊行的民眾都很驚訝：「為什麼會打起來？」我當時身在遊行隊伍中，很明顯看到有一群圍事的黑衣份子，他們都不是遊行的人。

那些黑衣人突然冒出來，手上拿著鐵槌、木棍，二話不說就開始毆打憲警。那是在憲警開始整隊向群眾進逼之後發生的。一整排的憲兵踢正步「趴趴趴趴」，威嚇效果很大，之後就噴催淚瓦斯，噴

得到處都是，我們退都來不及，瞬間怎麼突然有一群人衝上去！這些人都不是我們遊行的人，當時我看見的問題就在這裡。這就是美麗島事件的眞相。

台時換稿報導眞相

遊行結束後，眼睛仍有催淚瓦斯留下的酸澀感，我大約九點才回到報社。跑警政線的記者已經將稿子寫好放在我桌上了，要等我看過後再交給採訪主任。

看完這篇稿子，我認爲不是這樣的。這篇稿子就像一個兇殺或群毆案現場的寫法，而且是從警方的角度去寫。與當晚發生的事件，本質上完全不同。我瞭解這是政治事件，就向主任說：「這篇稿子不能用，我要自己重寫。」我飛快地寫完稿子，寫稿時不斷壓抑自己內心激動的情緒。

採訪主任看完我的稿子，馬上交給總編輯。沒一會功夫，總編輯便跑去社長室，可見當時他們看見我的稿子是驚訝的。其實我寫得非常克制，是平鋪直述的。過了好一會，社長跑到我的位子，看著我的眼睛說：「你的眼睛怎麼紅成這樣？是瓦斯噴的嗎？」「要不要先去吳老闆的診所洗眼睛？」我那時候只掛心這篇稿子，倒是沒有太在乎眼睛的不適。

最後社長決定暫時將我的稿子擱在一旁，等候黨中央指示。過了一個鐘頭，文工會居然沒有來電，大家都感到奇怪了：平時小至工廠廢氣外洩都會來電，這件天大的事件卻沒有半通電話？

爲了確認「上面」的意思，報社方面決定繼續等下去，並先將那則警政記者寫的新聞排在三版（三版可以晚一點截稿）。過了午夜十二點，「上面」仍然沒有電話打來。最後一刻，報社決定換成我的稿子，並且加上當時對峙的照片。

隔天見報標題是「鎭暴部隊發射催淚瓦斯驅散人群」，這在當時是很不容易的事，因爲其他報紙不敢這麼寫。要送印刷廠之前，大家還在掙扎：「這樣的新聞處理眞的可以嗎？」這則新聞雖然在三

版下方，但位置很明顯。標題不僅大又反白，還附上兩張照片。副總編輯開玩笑地說：「大概沒關係，三版最上方有蔣總統發表的談話全文，算是平衡，所以應該沒事吧。」這才稍微化解了眾人的焦慮。

當天回家後，我其實很害怕，我太太也很擔心。不過第二天報社一切如常，我照樣上班。這時才比較篤定「沒事了」。

國民黨的真正盤算

後來回想起這件事才瞭解到，這是一條可以大做特做的大新聞。因爲國民黨中央打算利用輿論的力量，將所有的黨外精英一網打盡，並且藉此加以醜化。當時卻沒有人猜到國民黨中央的心意，只有我在無意間抓對了它的脾胃。

當我對美麗島事件的報導率先登報後，其他媒體才在國民黨動員下，從第三天開始用極大的篇幅報導美麗島事件與大審。像是中國時報、聯合報、中央日報等全國性的報紙，內容全都引導至「暴徒打人」、「非法集會」的概念上。像是施明德被追緝，報紙標題都是「暴徒施明德」。目的就是爲了將他們抹黑成違法與襲警的暴民。

美麗島事件的爭執點在於，到底是「先鎮後暴」還是「先暴後鎮」？除了我，所有的媒體都傾向「先暴後鎮」。接下來的幾天，台北很多黨外雜誌，像是《美麗島》、《大時代》均打電話來問：「那篇是不是李旺台寫的？」最後大時代全文照登，並且加上對我的訪談。

美麗島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天下午，陳菊打電話找我去周平德家吃晚餐。席間，我們看到當天晚間新聞的方向是台北市長李登輝、省主席、各縣市議長與議員，輪流在媒體上批判這些暴徒。電視畫面盡是警總安排的橋段：新聞局率領很多美麗的歌星、明星，去醫院慰勞那些被打傷的憲警。一面倒的

氣氛已經出現了！

陳菊對我說：「你看會抓人嗎？」我當時心底很篤定地認為一定會，並且跟她說當天晚上報社處理這條新聞的經過。我說：「發生這麼大的事，文工會卻沒有任何指示，這應該代表會有大動作。」

陳菊聽完一發不語、臉色凝重，粗線條的周平德則大聲說：「安啦！沒事啦！」但是客廳裡籠罩著一股無力且憤怒的沉重感。

迷失在輿論迷霧中

當時主流媒體誤導美麗島事件，把所有黨外人士都醜化為暴徒。最不可思議的是，當時的新聞局長宋楚瑜特地邀請國外記者採訪美麗島大審。顯然國民黨中央不僅扭曲事實，還準備在輿論上用力。

在全國媒體都排山倒海地報導美麗島事件時，國民黨政府也將新聞操作成「暴民先暴」，官方不得不「鎮」。每天電視上都是流眼淚、被打的憲兵，他們的母親傷心欲絕，淚訴著兒子被打得不成人形、新聞局發動影歌星去獻花給受傷軍警等等。電視不斷播報「美麗島暴徒」的相關新聞。塑造出來的氛圍，就像真的一樣。

在這種大氣氛的籠罩下，我偶爾會被帶進強大的輿論氣氛裡。那兩、三個月期間，我也感覺好像要被輿論的大潮流所淹沒，一度迷失甚至懷疑自己。遊行當晚，我並沒有使用「先鎮後暴」的字眼，只是寫下所目擊的景況。這段期間，被兩報三台的扭曲言論與畫面衝擊後，我時常在深夜時分反問自己：「他們真的是暴民嗎？」「我之前有沒有支持錯人呢？」這種身在新聞界卻被另一股強大的輿論力量不斷撞擊的經驗，是現在許多人難以體會的。

直到名作家陳若曦在美國引用我的報導，譴責國民黨對於美麗島事件的態度，並且在事後到南部找我，對我說：「你那篇寫得很好，我有跟蔣經國說那是先鎮後暴。」這時候我才真正體會到自己那

時候所做的事情是有力量的。

美麗島事件前後，國民黨欲強壓黨外力量的氣氛已經明顯出現。一方面培養「疾風集團」與黨外對抗，另一方面利用美麗島事件，將黨外菁英抓起來。其中大規模的媒體操作，是當時最成功的策略。

回想起來，這似乎是國民黨政府第一次如此大膽地操作。以前都是暗中抓人，抓了就送審。國民黨大規模地利用媒體作爲政治整肅工具，並邀請外國記者來採訪司法大審與軍法大審。不配合的外國記者，新聞局也毫不留情地驅逐出境。但後來政局發展並不容易控制，包括海外台灣人社團的覺醒與團結、國際社會的關切與同情，使得台灣的政局產生了一連串的化學變化。

黨外雜誌南部第一寫手

因爲美麗島事件，我認識許多黨外人士。加上吳基福給我的觀念，以及早期大量閱讀禁書的機緣，我深刻理解自由民主的重要。一直以來，我抱持著「記者是天生的在野黨」的信念，這種觀念對我來說很強烈、很牢固。

美麗島事件後，黨外雜誌在台北如雨後春筍地發展。當時黃信介的弟弟黃天福、林正杰、鄭南榕都出來辦雜誌。他們需要很大的稿量，也都認識我，我因此成爲黨外雜誌重要的南部供稿人。

當時要寫的稿子真的很多，我太太感到不勝其擾。每天打來的電話都是邀稿、催稿，我除了在台灣時報的工作外，其餘時間都用來寫黨外雜誌的稿子，寫完一家，再寫一家。

那時候許多黨外雜誌都有我的文稿，不過我用不同的筆名。當時的我很單純地認爲台灣社會一定要更民主、更自由、更進步、更開放，很多不敢寫在報紙上的，都可以毫不忌諱地寫在黨外雜誌裡。

我與黨外雜誌愈來愈熟。爲了掌握稿源，他們會親自到南部與我見面。像是黃天福下高雄，都是前一天才打電話來：「我明天會去高雄，住在國賓。大概八點在咖啡廳與你碰個面，一些稿費順便交

給你。」那個時候害怕曝光被抓，所以稿費都不敢用寄的。

吳基福也知道我在幫黨外雜誌寫稿，並不禁止。在他的眼科診療室裡，也有好幾本黨外雜誌。若有某一篇我自認爲是得意之作，我會告訴他那是我寫的。那時他總會深深地看我一眼，我感覺他的眼中有鼓勵之意。

以八十年代辦公室爲家

後來我稿子愈寫愈多，八十年代主持人司馬文武也注意到了。有一天他專程南下約我見面，並且正式邀請我去八十年代。當時我在台灣時報已經十年了，剛升上副總編輯。

決定去八十年代，我心中又是一番掙扎。因爲報社副總編輯的薪水好、已有勞保。如果去八十年代工作，不僅什麼都沒有，還必須獨自一人、拋家棄子到台北工作。接受司馬文武的邀約後，那段期間我每週往返台北與高雄，截稿後坐夜車回高雄度過週末，等到星期一凌晨再坐夜車北上回去工作。

這兩個工作環境完全不一樣，當時台灣時報已走上軌道，我每天開會、上班穿西裝打領帶、手下管很多人，像個機關。但是八十年代倒像是《水滸傳》裡山寨的賊窩，每天穿拖鞋、短褲，截稿後就在辦公室睡覺，什麼都沒有，只要把雜誌編好就好。

但在八十年代的成就感更大，那時候並沒有後悔北上，因爲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各式各樣的人。大家一起開會討論編輯採訪的想法。寫稿時，會逼自己去圖書館找更多的資料，那段日子讓我感到充實。

當時八十年代在艋舺，靠近植物園的莒光路上。我就住在辦公室，一夥人在工作與生活上都互相照應著。通常都由徐璐當主廚，而陳國祥總是在一旁叫著：「辣椒放多一點！」過著也算愉快的生活。

截稿後，我們都會出去吃宵夜，回來再校對是否有誤。累了，大家就躺得東倒西歪。有一次八十年代老闆康寧祥來辦公室，看到我們這副「野蠻人」模樣，忍無可忍，便替我們買了折疊式小床。

我沒有租房子、也沒有住旅館，就住在這辦公室裡。幸好我在八十年代的薪水加上稿費後，與台灣時報副總編輯的薪水差不多，才對我太太有個交代。唯一的缺憾，就是與家人分隔兩地。

黨外活動家VS新聞工作者

我到八十年代當編輯時，記者生涯中的第二次掙扎出現了。那時候我常自問：「到底我是黨外人士，還是媒體工作者?」八十年代的記者跟我對於如何報導黨外新聞，有不同的看法。我秉持報社記者的寫法，把自己與運動稍稍分開一點；他們則用黨外運動者的寫法，將自己置身其中。

我認爲，把自己抽離出來的第三者寫法，是敘述黨外活動比較適當的方式，因爲我們是媒體。不過，稿子交出去後偶爾會被改成黨外運動者的寫法，我曾爲此懊惱。但是司馬對我說過：「其實你才是對的。」

在黨外雜誌時期，編輯人員與工作人員必須參與很多政治活動。有些八十年代與《亞洲人》的同事們，到了現場都很自然地拿著麥克風，順暢地演講、說話、鼓吹。但我比較想要維持記者旁觀者的角色與位置，每次黨外舉辦活動時，我的內心衝突便會出現。這種感覺一直到我後來離開媒體，到民進黨中央黨部工作，還是非常濃厚。在我職業生涯中，一直有這樣的掙扎與衝突。

當時八十年代有幾個備胎名稱：亞洲人、《暖流》。以防隨時被查禁後，隨時可以再上場。後來八十年代逐漸由政論性月刊轉型爲新聞性週刊。當時康寧祥掛發行人、司馬掛社長、徐璐掛執行主編。總編輯掛我的名字，但是工作還是一起做，沒什麼大小之分。

改成週刊後，更具新聞性，我也比較如魚得水，從「活動家」變成「媒體工作者」，八十年代變

得比較注重新聞的思考，當然黨外的思考還是有的。我愈做愈順手，在報社的感覺回來了。不過又比在報社更好、更有發揮的空間。

八十年代改成週刊形式後，我繼續工作了一年十個月。當時警總對黨外雜誌的查禁非常嚴重，十期有七期送進印刷廠後，就出不來了。對我來說打擊很大，倒是康寧祥將其視為常態。

我離開八十年代時，已經出現聯合助選團，很多黨外雜誌的工作同仁獲得認同，投入選舉。如果當時我回到家鄉選舉，也有可能成為縣議員、省議員或立法委員。對黨外雜誌的工作者來說，從政之路已經出現了。但是黨外雜誌的生存空間反而愈來愈小。當時也有人說：「你應該回去啊！」「下屆這個省議員的缺應該是你們六堆。」「客家的缺，你可以做。」但我終究沒有選擇從政之路，後來在雜誌被查禁十分嚴重的時期，我離開了八十年代。

解嚴前後兩樣情

離開八十年代後，當時的台灣時報已經改朝換代。因為吳基福在美國投資經營《遠東時報》失利，台灣時報股權逐漸被「南霸天」王玉雲兄弟拿走。吳基福失去經營權後不久因病逝世，所以我決定去美國找俞國基。

那時候我帶著全家人一起去美國，一邊在俞國基任職的報社當編輯，一邊準備申請學校繼續深造。興頭正大的時候，台灣突然宣布解嚴、民進黨成立、解除報禁與黨禁，當時台灣有朋友打電話來說：「你該回來了！」

這對我來說是很大的誘惑。我心裡躊躇著：「戒嚴時期，我不曉得寫了幾百篇、幾千篇文章要求解嚴、解除報禁。那我現在為什麼還不回去呢？」那時候我太太不想離開美國，我花了很多力氣遊說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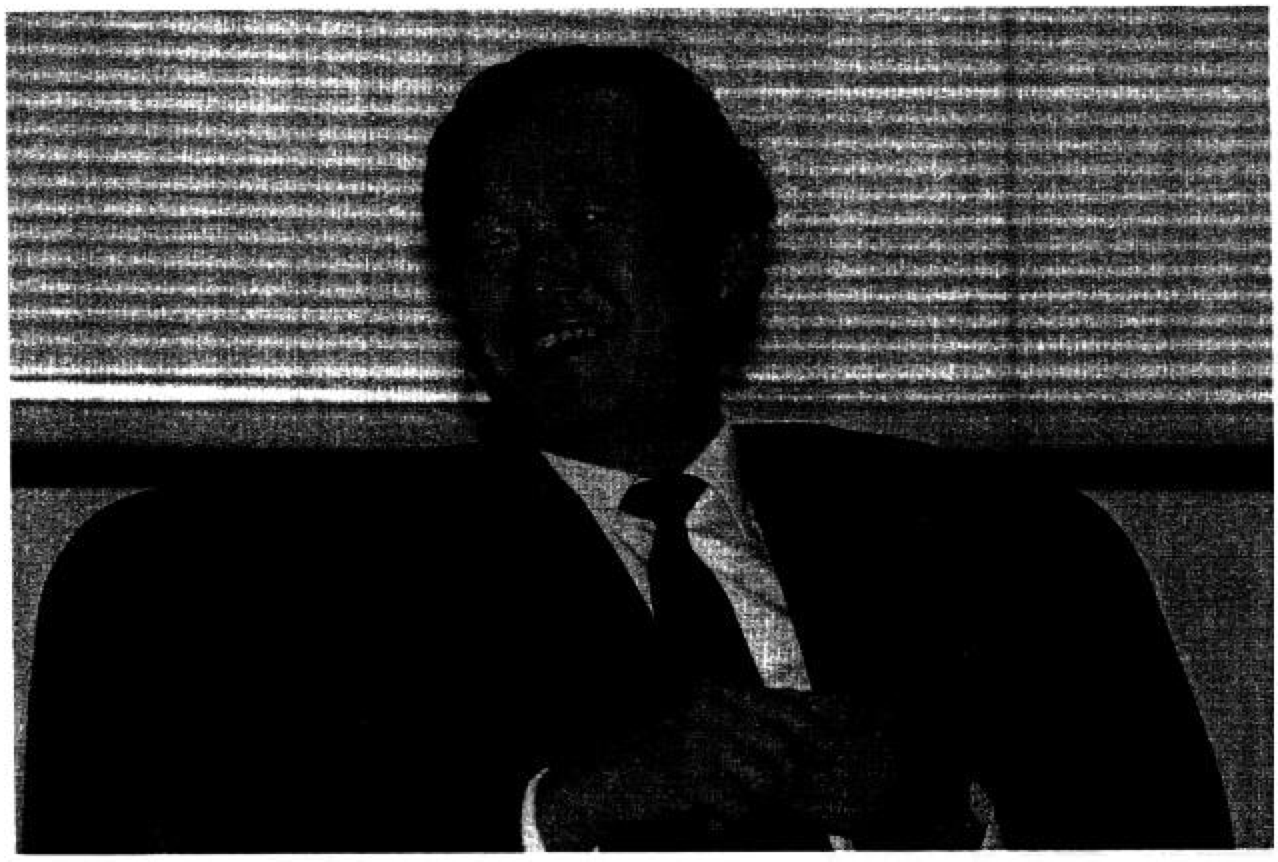
返台後我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台灣時報，王玉發聘我當副總編輯兼編譯室主任。後來調採訪主任，我又走回原來的路。

解嚴前、後，比較深刻的體認是：「解嚴前，我必須要有勇氣、要堅持、要有技巧；解嚴後，我必須克制，避免過度放大與渲染。」坐在相同位置上，心情卻不同。

解嚴前是壓抑的新聞扭曲。社會很穩定、控管很嚴格，必須用很多技巧來突破嚴密的管控；解嚴後卻是過度渲染，專業的淪喪。以「工廠廢氣外洩」新聞爲例，解嚴前，這類新聞會被封鎖，所以要有報導的勇氣。解嚴後，相同的新聞，所有的報紙都會把它做大，規模、外洩幅度、受傷就醫人數被誇張渲染。兩者都對社會產生不良的效果

閃虎遇到獅：從台灣時報到民衆日報

當時《民眾日報》漸漸步上軌道，幾乎與台灣時報匹敵。民眾日報老闆李哲朗挖角我過去當總編輯，在高雄還成爲不小的新聞。



擔任《台灣時報》總編輯時留影。（李旺台提供）

其實，報禁開放後，雖然各家報紙百花齊放、沒有禁忌，但是報老闆仍會控制。無論是台灣時報的王家（王玉發），還是民眾日報的李家（李哲朗）都一樣。記得我曾在日記記下「閃虎遇到獅」（台灣諺語）這句話，描寫我從台灣時報到民眾日報工作的情境。

不過，台時王家過去沒有經營過報社，比較不瞭解報社生態，所以我的自主權比較高；民眾李哲朗就比王家精明，因為李家從日據時代就在基隆地方辦報紙，是老報人家族，更懂得如何控制報紙。後來台灣時報與民眾日報彼此相爭「誰的言論比較激進」，我從不認為這種現象是好的。

我在民眾日報時期，本來大部分的想法與觀念與李哲朗一致，大家也算相敬如賓。一直到宋楚瑜當省長、跟李登輝鬧翻時，我們之間才出現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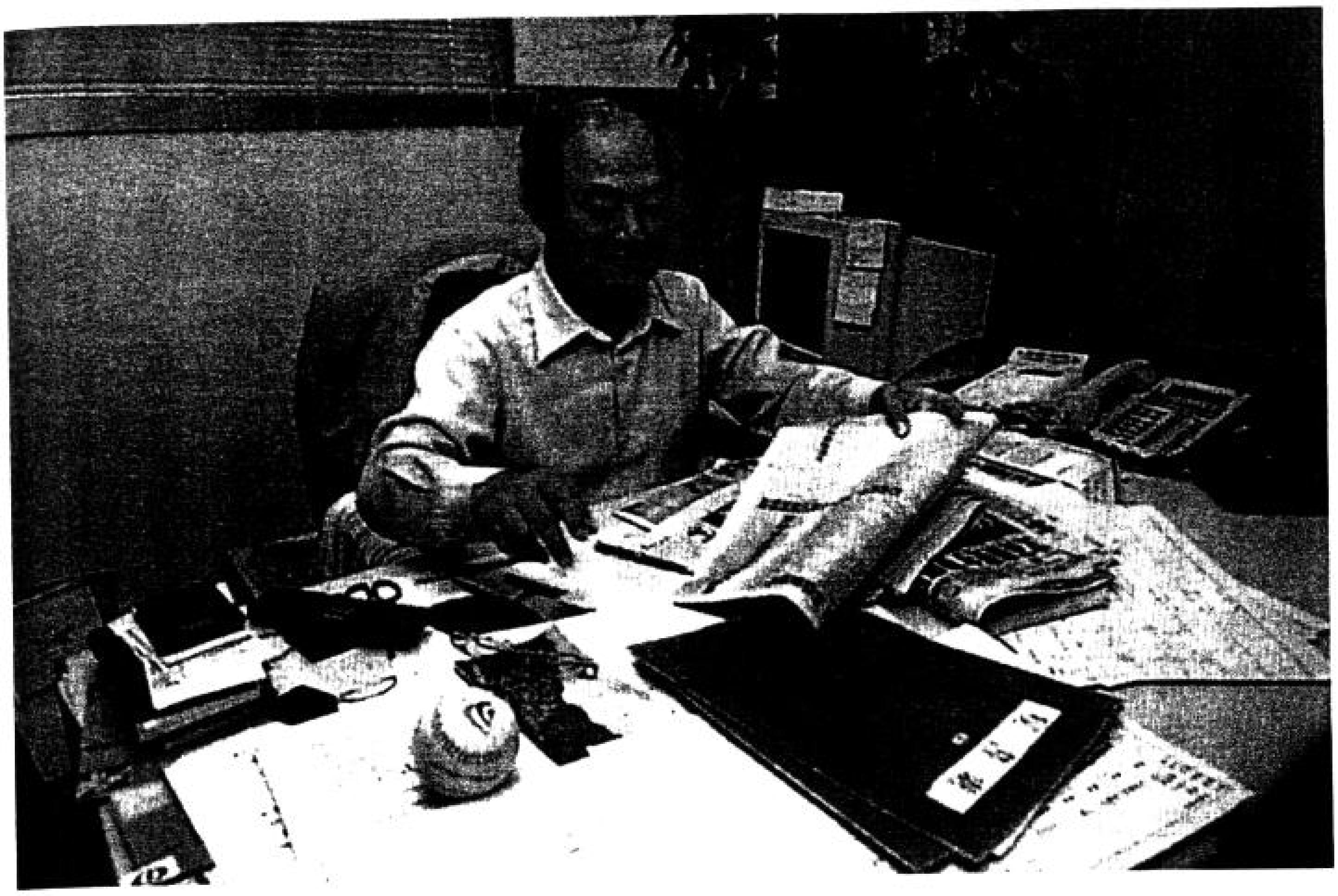
宋楚瑜跟李哲朗有深厚的交情，但南部鄉親民眾大多挺李登輝。在宋楚瑜請辭省長待命的新聞處理上，李哲朗特別交代過不要報導，但我心裡想：「這麼大的事怎麼可以不報導呢！」我與李哲朗討論過後，他最後才說：「那麼做小一點，不要做大。」

這對我來說，簡直是不可思議。因為這應該是「省長請辭／私下跑到台北／無法聯繫」的頭條新聞，卻因此被犧牲。最後我還是做成頭條，當天工作完畢就將辭呈放在他辦公室桌上。當時的《新新聞》還做成封面：「民眾日報總編輯請辭幕後祕辛。」

從政生活難以適應

我辭職的時候大約四十九歲，當時沒有特別懊悔或緊張的感覺。在家中休息幾天後，俞國基打電話來，說他看到新新聞的報導。當時俞國基在《自由時報》，問我要不要過去，但是只有副總編輯的位子，我沒作什麼考慮就去了，再那裡當了一年半的副總編輯。

自由時報是一份非常適合我的媒體，我在那裡印象最深的是，創辦人林榮三多次在開會時強調，



擔任民進黨副祕書長時在辦公室留影。（李旺台提供）

媒體在戒嚴解除後，都拚命報憂不報喜；其實台灣社會沒那麼壞，我們自由時報現在要多報導光明面的新聞。這句話對我這種走過戒嚴的老記者很有感觸，因爲它跟以前國民黨文工會每逢記者節勉勵新聞界的話完全一樣，只是時空已截然不同，兩者的居心也完全不同。

後來民進黨主席改選，林義雄當選，林義雄夫婦和陳菊邀請我擔任中央黨部的副祕書長。這對我來說是重大的抉擇。過去，我在美麗島事件與八十年代期間，都不忘自己是記者，這時卻要決定從政。當時我對林義雄的爲人與理念都很有好感。我在徵詢了許多親友的意見後決定赴任。

突然間，從報社的副總編輯跑去當黨工，這對我來說是很大的衝擊。身爲記者，通常是政治人物作公關的對象，當我成爲黨工後，卻要去公關別人，這

眞的不容易習慣。

我是個角色調整能力很差的人。初至民進黨中央黨部時，有時人家只是尋常地跟我打招呼：「喔！旺台兄，你來這裡啦！」我會感到不太好意思。中央黨部的長官與部屬的關係，跟在報社也很不一樣。那裡是政治人物的大家庭，大家都習慣爭發言權，我則習慣禮讓；那裡的人不掩飾企圖心，我則擔心是否太投入。此外，我還要學習應付新聞記者，有時新聞界出身的黨工在應付記者時，反而更不適應，因爲我經常在記者面前放不下身段。

我在去中央黨部前就覺悟到不可能再回去新聞界。一但當上黨工幹部，就會產生立場問題。就像當初吳基福曾經對我說過「辦報紙的人怎麼能去當黨中央的中常委」，是一樣的道理。所以從政之後，縱然有許多機會回去報社，我也都婉拒，不再回新聞界了。

自我訓練主持政論性節目

等到林義雄卸任黨主席，我擔任副祕書長的工作也告一段落，我選擇去政治色彩比較不濃厚的二二八基金會。

我擔任二二八基金會執行長四年多的時間內，負責處理二二八受難者家屬賠償以及安撫的工作，一直到客家電視台邀我參與籌備工作，我便身兼二職，後來漸漸將重心轉移到客家電視台，並且擔任政論節目主持人。

與我熟悉的報紙工作相較，電視媒體有立即性，影響力更大，在節目中說出來的話，就像倒出去的水無法更改；編報紙和雜誌時，寫的東西要校對，再拿去鉛字房，過程中可以一改再改，因此我必須逐漸調適。

其實，我從自由時報轉換到民進黨中央黨部的時候，就發現到這是讓我「自曝其短」的工作環

境。在報社工作，沒那麼多會議，也不用秀口才。但是在政黨工作，不僅要秀臉孔，還要秀口才、考驗機智反應。

即使我自認已經反覆熟讀隔天開會的資料，並準備要講的話，也花上比別人更多的時間，但是第二天我的表現仍是打折扣。在那裡，我看到許多人準備三分，可以表達六分。我剛好相反，是準備六分，只能表達三分。

感受到自己的不足後，我不斷加強這個部分。我那時候雖然已經五十歲，每天回到家就打開電視，看人家怎麼說話，觀摩說話技巧。在那段期間，我感覺到我的能力與心境有很大的轉變。後來到客家電視台，主持政論節目時已感游刃有餘。我在人生的每一階段都硬著頭皮踏進，踏出時總是感到輕鬆，並且收穫很多。

不曾富貴不曾窮

回顧近三十年的記者生涯，我參與了台灣民主的進程。特別是我在台灣時報與民眾日

擔任客家合唱團顧問，於表演時致詞。（李旺台提供）

報，以「具有南部觀點」的記者角度，傳達在地的聲音。

戒嚴時期，南台灣報業的言論市場更具活力。遠離中央的情況下，我們有機會衝撞不公不義的制度。至今民主的種子已經逐漸在南台灣深耕發芽，我感到很欣慰。

在八十年代那段日子，我持續衝撞威權體制，體會對抗威權體制的各種酸甜苦辣。在南台灣的兩大報擔任總編輯的八年多，我無時無刻不在想撥開、穿透、超越那片籠罩在南部上空的黑雲，那是從台北兩報三台鋪天蓋地而來的黑雲，是極大的媒體界的權威產物，它們甚至是威權體制本身。

陸游有兩句詩「看盡人生興廢事，不曾富貴不曾窮」，很能用來形容我的一生。是的，我沒有很富貴，卻也沒有不得志。我在年輕的時候，沒有作過要榮華富貴或是當大企業家的夢。在自然而然的情境下，我走上記者這條道路。記者是一種在旁邊觀戲，而不是進去參與演戲的人。在我的職場生涯中，曾被拉進舞場，但未能盡興演出，所以進去不久又出場了。一個進了叢林不敢太深入的人，當然捕捉不到什麼大獵物。幸運的是，叢林邊有一大片田野，我也認眞耕耘過了。

回頭看那些在衝突與掙扎中前進的路，我內心充滿感激。很感謝那些幫助過我的人。因爲當記者的機緣，我做了一些事，經歷了一些挫折，也因此有了成長，這樣的生涯比起我預期的還要豐富呢。

◎初稿：蔡蕙如
◎修訂：林麗雲
◎定稿：何榮幸、李旺台
◎訪問時間：二〇〇七年五月五日、六日
◎地點：台大新聞所攝影棚

超多精品资源尽在：http://iask.sina.com.cn/u/1623826291/ish

准免费！

阅 读 说 明

首先感谢你下载下书！

本人的资料素来是免费的——为此我已坚持了几年，上传的资料逾千。然而，随着工作的变化，闲暇时光越来越少，倍感一个人“战斗”得太辛苦，因而加设了积分，让大家了解资料的来之不易（其实制作过程真的是很艰辛漫长的！），遂统一上传至 iask.sina.com.cn，当然仍是免费的，你只要拔冗注册一个 iask 账号就能下书了，积分用完再注册一个即可。还有，除供私人收藏的资料（陆续开放）外均无密码。

你下载下书即表示你已承诺将在 24 小时内删除该电子档----作为一个“人”，相信你能做到这一点，对吧？(潜台词是什么，相信你已很清楚)。

目前本人已收集 **100** 万册左右各类书籍，后续择其中部份制作成 **PDF** 电子图书。当然，本人无义务提供这些图书，因此不会设上传的时间点和数量，更请勿向本人索取。

另，谢绝转载此书——如果你是一个有尊严的人，相信你也一定能做到这一点。

Good luck!

吴国林　Colin Wu（一位孤独的战士）

MSN / E-mail: colin_21st@hotmail.com

(本人不知 QQ 为何物，又有何用，请勿就此问题发邮件，thanks.)

殷允芃

〔第八章〕

國際媒體聲援美麗島

一九八〇年紐約時報駐台記者

殷允芃

前頁圖說：
任美國《費城詢問報》記者時留影。
（殷允芃提供）

美麗島事件是台灣從威權邁向民主的關鍵，她當時的位置則相當奇特，必須把台灣發生的重大事件，轉化為國際媒體上短短兩、三行的報導。但也多虧了這項工作，讓著名作家陳若曦營救美麗島受刑人的消息能在《紐約時報》曝光。

見慣她從容優雅、自信鎮定風格的人，恐怕很難想像，一九八〇年初美麗島軍法大審時，她為了呂秀蓮的處境而當場淚流不止，與新聞教科書強調記者不能放進個人情感背道而馳。但在那個年代，有哪個記者面臨歷史鉅變能夠不帶個人情感？

不過，美麗島事件、解嚴都不是她記者生涯的分水嶺，一九八一年創辦《天下雜誌》，才是她新聞事業的里程碑，而且成就斐然。在此之前，她只能努力在國際媒體上為台灣發聲，在此之後，她決定自己跳下來為台灣加分。

弔詭的是，她多年來大力報導、推動台灣經濟起飛的正面價值，但解嚴二十年之後，她卻深受經濟力造成媒體惡性競爭、廣告主侵蝕新聞專業所苦。儘管媒體市場化、新聞商品化已是潮流，她對「假新聞」、「置入性行銷」依舊深惡痛絕，只能在惡劣的媒體環境中努力延續「天下雜誌式」的理想與堅持……

殷允芃大事記

1941 殷允芃出生

■1967美國費城詢問報記者、皇冠雜誌寫專欄

1971 退出聯合國

■1973美國合衆國際社記者

■1976當選第六屆十大傑出女青年、美國紐約時報駐華記者、亞洲華爾街日報駐華特派員

1979 美麗島事件

■1981創辦天下雜誌

■1982獲傑出主編金鼎獎、成立經濟與生活出版公司

■1984獲美國「傑佛遜獎學金」

1987 解除戒嚴

■1987獲菲律賓「麥格塞塞新聞、文學與創意傳播藝術獎」

■1998康健雜誌創刊

■1999成立天下雜誌出版公司

2000 政黨輪替

■2000 Cheers創刊

■2001 e天下雜誌創刊

■2007天下雜誌發行人

我自己跳下來幫台灣加分

與新聞結緣

我大學就讀成大外文系，接觸的都是文學，不知道新聞是怎麼回事。上了「新聞英文」後，才讓我跟新聞結緣。

這堂課的老師是前《中華日報》副總編輯朱耀龍先生，他教我們最簡單的基礎新聞課程：什麼是5W1H？什麼是倒金字塔寫作？他讓我有系統地瞭解新聞是什麼、新聞跟文學有何不同。這堂課很有趣，我也拿到滿高的分數，快畢業的時候我就想，新聞記者是不是一個可能的選擇。

但是我有一個疑問，我的個性比較害羞內向，適合出國念新聞嗎？可不可以做記者？朱老師跟我說：「沒關係，妳可以啊！記者有好多類，妳可以從事內勤。」這對我是一個很不錯的鼓勵。

一九六四年成大畢業後，我到當時的台南師專（現在的國立台南大學）當英文老師，也在美國新聞處（USIS）的圖書館打工。我們家不是有錢家庭，我下面還有很多弟弟妹妹，幸好媽媽支持我出國念書，我就一邊工作一邊存錢，因爲要申請學校，我就請美新處處長Mr. Georgian幫我寫推薦函。

當時我已收到奧瑞岡兩家美國大學的入學通知。如果不考慮獎學金，我會想去愛荷華，因爲作家

聶華苓筆下的愛荷華非常羅曼蒂克，可以在雪地裡看星星；但奧瑞岡願意給我五百元美金當獎學金，因此我本來傾向去奧瑞岡。

Georgian知道之後，鼓勵我去愛荷華，他願意借五百美金給我，學成後還他。但是有一個條件，我必須跟他簽一個agreement，我念完書一定要回台灣。

這件事對我影響很大，爲什麼是一個外國人要求我必須回台？我想，大概他覺得我是個還不錯的年輕人，留學之後應該要回國幫助回饋自己生長的社會。我跟他說：「我不要簽agreement。我想，我是會回來的，但是我不要放棄我未來的選擇權。」他聽了後，也不勉強我簽約，借我兩百五十元美金（約相當現在一萬元美金），加上媽媽湊錢幫忙，我就在一九六五年順利進入愛荷華攻讀碩士。

出國留學的啓蒙

在愛荷華期間，我跟很多留學生一樣，拚命到圖書館借華文書，像魯迅、沈從文、張愛玲的書，都是那時候看的。

我印象很深刻的一本書，是大陸作家丁玲寫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丁玲是一位很好的作家，雖然她相信共產主義，但是她非常寫實地描述中共土地改革的鬥爭，把人性撕開來看，她描述的人與人之間黑暗的一面非常眞實可怕。我看了之後，覺得比台灣的反共政治宣傳有用多了。從這本小說中，我也開始對政治、權力有了理解。

上課的時候，我們會討論有關越戰的問題，像是：「美國打越戰，你贊成不贊成？」我之前對越戰的印象，大半都是從台灣報紙上或者《時代雜誌》（*Time Magazine*）而來。當時老師是一位神父，他問我的論點從哪裡來，我告訴他是看時代雜誌，我當時覺得消息滿權威的。結果他就說：「喔，那*Time*寫的就等於眞理嗎？」我被他問倒了。我說：「可是他印在*Time*上面啊？」老師就說：「所有

印的東西就是眞的嗎？black on white就是眞的嗎？如果有些人自己花錢印呢？」

我這才被提醒，不是所有印出來的都是眞的。事實眞相不容易找到，凡事也有很多角度，從不同角度看的答案都不一樣，不是只有我看到的那個角度是唯一眞理。在愛荷華讓我學到的第一課是，不見得要相信權威，自己要有研判能力。

畢業論文引發爭議

愛荷華快畢業的時候，我很關心台灣留學生念完書到底會不會回國？所以我把這個主題當成畢業論文，我提出的問題是：「爲什麼大家都不回國？」校報《愛荷華大學日報》（*Daily Iowan*）登得很大，標題也下得很聳動：「They would not go home again.」

我那時候訪問很多人，有人就說：「我不回去。你看我在這邊可以開Mercedes（賓士）的好車，可是我回去就要跟雙方父母的家庭在一起，很煩。」也有人說：「回去幹麼？我學的專長又用不上。」這是最多人講的。還有人說：「我去年回去過，台灣好髒，還有蒼蠅。」

當時台灣的生活水平當然比不上美國，那個gap是很大的。可是，我在文章最後一句話問：「如果這些人都不回去，那個gap會自動減小嗎？」

結果，台灣留學生對這篇文章很生氣，他們覺得家醜怎麼可以外揚？他們很火大，覺得我是叛徒。那是我第一次碰到有人半夜打電話威脅，而且忽然之間被大家排斥。

但是，我報導的是事實眞相，我寫的沒有一個地方錯。我覺得做一個記者，寫出事實眞相是需要勇氣的。

一九六七年我從愛荷華畢業，投履歷給美國三十多家報社，《費城詢問報》（*Philadelphia Inquirer*）和愛荷華當地的報紙《洋杉激流市日報》（*The Cedar Rapids Daily News*）都給我具體回應，前者要給我

三個月的實習機會，後者要給我全職工作。

由於我在愛荷華已待了兩年多，我想換環境，因此決定去費城詢問報實習，展開我第一個正式新聞工作。

毛遂自薦報導傑出華人

不過，從畢業到費城詢問報實習還有半年空檔，我想再嘗試其他報導。

我平常會看《皇冠雜誌》，作家尹雪曼專門描寫留學生的悲慘生活，似乎每個留學生都是住在地下室裡，平常在餐館努力打工，辛酸處每個人都是眼淚直流。我就想，其實也有一些旅美華人是成功的，我打算訪問張愛玲、貝聿銘、夏志清等人，瞭解他們爲什麼可以成功打入美國社會。

但要採訪這些人，總要有地方可以發表。於是我寫信給皇冠雜誌的平鑫濤先生，希望他願意刊登這一系列的華人報導。我們互不認識，他可能覺得滿好玩的，也願意給年輕人機會，所以一口答應會刊登。

接下來，因爲我個性比較害羞，我也不認識這些成功華人，如果要打電話，我會在房間裡面繞來繞去繞好久，才敢拿起電話，所以我決定寫信給他們。

我告訴這些受訪者，我是以皇冠雜誌之名採訪，希望他們留下自己的奮鬥史，給未來年輕華人一個激勵，對年輕人有所啓發。我希望讓他們瞭解，接受這項採訪會有的特殊意義。

我猜，這些傑出華人在美國成就這麼高，但他們的親友及華人圈卻未必瞭解，可能是因爲這個原因，他們願意接受我的採訪，或許這會有種衣錦還鄉的感覺。我自己也在採訪中學到很多，深深發現：這些傑出華人能夠打出一片天，都有自己的一套本領與毅力。

實習期間把握機會

我到費城詢問報實習時，內容包括攝影、編輯台、文字編輯、採訪郊區和市政新聞等訓練。當時實習生是從全美幾百個學生中選出七個，我是唯一的亞洲人，又是碩士身份，其他都是大學生。

我們每天早上九點鐘去city desk報到，看有什麼新聞可以跑。採訪主任就是直屬老闆，每天早上就派人出去跑新聞，他給我們跑的當然都是很輕鬆、出了差錯也沒什麼大問題的人情趣味新聞。

我有時會遲到，但是那時候很認真，沒有遲到。跟我同期有一個美國長春藤大學畢業的實習生Mary，寫作各方面都很好，有好幾次九點鐘到了，老闆想派她出去採訪，可是不知道為什麼她都遲到，我都到了。老闆看了一下就說：「Mary沒有來。喔，那Diane（我的英文名字）妳去看看有沒有人情味的新聞可以寫。」就這樣機會都給了我。

這段經驗讓我覺得紀律是很重要的，「機會」是，你在那邊，他就會給你。否則即使你能力再好，你不在也沒有用。

當時我有一個印象很深刻的採訪，是一個叫作Head Start幫助弱勢的program，它是詹森總統在幾個大城市先推行實施的全國實驗計畫，這項計畫專門到黑人區幫黑人小孩，政府會給一些輔助讓這些貧困家庭的小孩上幼稚園。當時費城這個計畫為學生開了一個畫展，我要去採訪小朋友去豪華的百貨公司頂樓參觀自己的畫展的情形。但館員說時間搞錯，應該是前一天才對。

如果換成別人，也許知道搞錯時間就算了。但是我想繼續追這則新聞。我就打電話，找到那個學校，跑去學校採訪一位畫作讓我印象深刻的小孩。他的畫作叫〈Cigaro〉，畫中他的媽媽、哥哥都在抽菸。我花了半天時間採訪這個小孩，瞭解他家裡的故事，等我回報社已經很晚了。老闆覺得我的故事大綱不錯，符合他想要的人情味新聞，叫我趕快寫。我當時緊張得要命，因截稿時間到，每寫完兩

段，他就把稿紙先撕下交給copy desk，最後終於把新聞稿寫完。

其實，我並不喜歡寫作，但我很喜歡採訪。這個故事再度讓我體會，很多機會是靠自己爭取的。像我爭取寫feature story，長的特寫故事，報社就很肯定，最後我成爲費城詢問報的正式記者，也是美國這家最老報紙兩百年來第一位亞洲人記者。

關心台灣因而返國

在美國工作兩年後，我面臨一項抉擇：我要留下去還是要回台灣？我覺得，回台灣應該可以做一個更有用的記者。

回顧過去，Mr. Georgian曾經要求我簽合約學成歸國，我有被刺激到。我寫畢業論文的時候，也在思考：「如果不回去，那個gap會自動縮小嗎？」加上我在費城詢問報這兩年期間，我在採訪中看到美國社會底層的問題。我認爲，要做一個很好的記者，一定要去寫你關心的人跟事，我最關心的是台灣不是美國。所以，我決定回台灣。

我回台灣的第一個工作，是到我當初打工的美國新聞處，負責編學生英文雜誌，幫他們寫比較長的cover story。我記得我寫比較長的特寫故事時，還是不喜歡寫稿，寫稿會有很大壓力。我也覺得美新處待遇好，但工作有點太平淡。

後來「合眾國際社」（UPI）找我過去當駐台記者，它的工作形態是deadline every minute，隨採隨發，每分鐘都是deadline。我想這不錯，可以逼迫我面對隨時隨刻的截稿時間及不同形式的新聞，所以我就去了合眾國際社。

在合眾國際社期間，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採訪故事，是被日本人抓去當兵的台灣原住民李光輝。李光輝不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一個人躲在印尼叢林獨自生活幾十年，有一天被人家發現了，

他以為還在戰爭時期，其實戰爭早就結束。別人問半天才知道他是台東原住民，這個人有點像魯賓遜，都不知道現代的事情，他變成國際媒體都在追的大新聞。

當時日本《朝日新聞》需要一篇story，就請UPI幫忙，UPI自己也需要一篇feature story，我就說我願意跟著李光輝回家，看他路上發生什麼事情。

李光輝國際頭條新聞

這次經驗讓我上了一堂課，知道新聞是需要競爭的。平常我寫自己的新聞就好，但是這條新聞所有國際媒體都在搶。在這樣情況下我就要想，怎樣寫出跟別人不一樣的新聞？

剛好有UPI一位資深攝影記者姚琢奇先生，他是《中國時報》攝影組長，也在UPI兼差。個子小小的，很厲害。他事先規畫其他同事在機場樓上，只要李光輝一下飛機就用長鏡頭拍攝；他自己則是衝進現場拍，因為人很多，所以他穿大頭軍靴不怕被踩。他說我們要這樣搶、這樣佈置才會贏。

由於李光輝剛新婚就被徵去當兵，他不知道自己有個遺腹子，過了這幾十年，小孩已經長大，太太帶著小孩來見他。他一下飛機，所有的人都在鼓譟，四周鬧哄哄，旁邊擠滿了記者。李光輝跟他太太幾十年來第一次相見，那種又認識又不認識的感覺，姚琢奇在現場用廣角鏡頭「啪！啪！啪！」這樣按，把兩個人眼神都捕捉到了！結果，全世界媒體幾乎都用了姚琢奇為UPI拍的這張照片。

後來李光輝要回台東，陪同的地方長官讓他坐廂型車，想甩掉所有的記者，姚琢奇事先就想好雇用當地計程車司機，才跟得上李光輝的廂型車，果然只有我們一路緊盯。李光輝在比較沒有人的地方換車時，所有記者只有我在場，姚琢奇就說：「上啊！」我就擠進去了李光輝的廂型車。廂型車裡面的人看到我就說：「喔，外國媒體記者。」並沒有趕我下車。

然後我就看到一幕：李光輝的太太都說山地話，後面有山地議員當翻譯。他太太一開始說的某個

橋、某個山洞，李光輝都有印象，因爲他還記得小時候的事情。後來她講得差不多，也快要到他們家，忍不住告訴李光輝：「我要告訴你，我已經結婚了。」李光輝馬上變得非常憤怒，想打開窗子就要跳下去！因爲我全程都在車上，所以我就把這個非常dramatic的故事全都寫出來，也變成日本媒體的封面故事。

這次經驗讓我覺得，新聞也要將心比心。你看到的好像是一個劇本，但他是眞實的人生，我覺得很感動，所以過了這麼多年，我還印象深刻。

轉戰紐約時報、亞洲華爾街日報

其實，合眾國際社的新聞題材偏向社會、災難新聞，我覺得實在沒有興趣。我留在UPI的替代動力，是我自己提的一些feature story，我有很大的發揮空間，大家也覺得我寫得不錯。香港媒體常會刊載我寫的feature story，《紐約時報》駐香港記者包德甫（Fox Butterfield）看了好幾次我的報導，對我留下印象。

當時台灣跟美國隨時可能斷交，包德甫就到台灣找我，問我要不要換工作幫紐約時報？他希望斷交的時候有人可以在台灣報導。但是他強調，紐約時報的新聞需求量不是那麼多，我最好再找另外一個可以維持生活的工作。

同一時間，《亞洲華爾街日報》正在籌備創刊，也問我要不要試試看。我說：「我完全不懂經濟耶，我連經濟的一門課都沒學過，怎麼寫財經新聞？」那位總編輯珀爾斯汀（Norman Pearlstine）說：「沒有關係，只要妳是一個好記者，會一直問問題，會找答案就好。」

於是，我離開合眾國際社後，兩邊兼職，比較主要的工作是亞洲華爾街日報駐台記者，紐約時報則是特約記者。

紐約時報對政治比較有興趣；亞洲華爾街日報則是對經濟比較有興趣。這段期間我學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經濟新聞原來可以寫得很有趣，而且經濟是非常重要的，這也影響到我後來決定創辦《天下雜誌》。

國際媒體與本國媒體的差異

轉戰紐約時報後，我很努力寫一些經濟新聞，我會用一個case反映整體，再把它寫成一個可讀性比較高的人物故事，也會登上紐約時報的Special Issue。

當時我寫過「福昌紡織」，許多紐約第五街有名的商店、名牌都跟這家公司採購。於是我先寫這家公司的工廠場景，廠裡每兩個鐘頭有十五分鐘的休息，會放鄧麗君的歌。然後訪問一個小領班關於工廠裡面不良率、優良獲獎的事情。接著再把老闆帶進來，他說：「做這種外銷，剛開始也學到很多。譬如顏色，什麼是顏色？舉『黃』爲例，你知道『黃』有多少種？有一百四十多種黃色！」

這則報導讓我體會到，我們的教育比較不要求「精準」。什麼叫作sophisticated？譬如你要跟別人講黃色，你要能很準確地掌握它的亮度、彩度，出品才是完美的，不然就是隨便的黃。看看中國古代的汝窯，幾千年的東西怎麼還那麼精美、精細？就是精準！可是現在我們缺少精準，這些國際媒體則非常強調專業、層次，精準要求。

外國媒體跟台灣媒體最大的不同是，外國媒體的事實跟意見是分開的，它的報導就是寫很多事實，不會有記者個人「我」的評論意見。台灣媒體則是夾敘夾議，事實和意見混在一起。當然記者不一定能完全客觀，但起碼要公正、準確。譬如選擇用什麼例子、選擇訪問什麼人，這裡面都有立場，可是整篇新聞起碼要符合公平的標準。我覺得我們台灣媒體常沒有這樣的要求。

紐約時報、亞洲華爾街日報因爲把評論跟報導分開，所以記者都是在作報導。他們的編輯台不會

管記者的ideology，不會有太多干預。只管你寫得準不準確、好不好看，或是你遺漏某個角度要不要去double-check？他們要求精準、完整度、深度，但是不會是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就保留在他們的評論版面。

譬如紐約時報的新聞報導是中立的，評論則是代表大股東的意見。紐約時報是一個自由派、猶太人的媒體，他們很多看法都是liberal的，而且會在社論裡面寫明他要支持哪位總統候選人。如果記者有意見想寫「分析」，紐約時報會標明「Analysis」，代表「我要站出來講話了」。

我在紐約時報、亞洲華爾街日報的時候，他們都沒有告訴我什麼能寫、什麼不能寫，都沒有干預，但希望可以客觀、盡量公平。

報導台灣好的一面

如何評估記者？因爲我工作的媒體是國外優秀的媒體，也是最正派經營的媒體，所以我只能講我的經驗。我覺得他們很尊重記者、強調professionalism。在國外媒體，你絕對不可能接受別人的招待，絕對不可能拿貴重禮物，更不會拿別人的股票或金錢。

除此之外，國際媒體也非常尊重記者。我在亞洲華爾街日報曾有一則新聞，編輯把我後面的段落移到前面，並下了一個我覺得比較簡化的標題，他覺得這樣比較有吸引力。可是他很好，如果他有改，會打電話念給我聽：「妳覺得這樣對嗎？」很尊重記者。

那時美國社會對於媒體記者的觀感還不錯，做一個記者本身是令人驕傲的事。那時候評斷好新聞、好記者，不是用現在的方法。

國外通訊社爲了鼓勵當地記者，會找行政人員、工讀生蒐集我們在世界各地被登出來的新聞剪報，然後送給我們。他倒不見得用這個打績效，也不會刊載多少份就加薪多少，而是用這種方式表達

對我們的重視。如果我們寫的新聞很有趣，見報率會比較高；寫得不錯的話，總編輯還偶爾會寫簡單的幾行字以資鼓勵。

當時有些論述，認為國際媒體仍以美國、歐洲為主，對第三世界報導較少，也比較負面。我覺得有兩個原因：一、可能國際媒體，特別是通訊社記者看到的都是戰爭、屠殺或新興國家的腐敗，所以負面報導比較多。但像我這種當地記者仍有一半機會爭取寫自己喜歡、有興趣的題目；二、以紐約時報為例，他要cover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每天的重大新聞，因此要登上它的國際版面非常困難。

我第一次登上紐約時報的新聞，是謝東閔副總統被郵包炸斷手。這在台灣是天大的新聞，而且是我的獨家，但登出來只有短短兩、三段。

國際媒體要cover全世界，那我們怎麼樣才能得到他的重視？好處是他還有要cover全世界，有的媒體根本沒有。

有的記者根據西方媒體原則，覺得只有批判才符合報導的價值，他的文章就會傾向負面居多。所以我倒不覺得都推說是機構壓力，而是記者怎麼看待新聞價值。我覺得台灣很好啊，我有把台灣好的一面寫出來，國際媒體也覺得不錯，能夠看到另外一個台灣。

中美斷交的衝擊

我是在一九七〇年回到台灣，當時我們快退出聯合國，美國開始跟中國大陸乒乓外交。到了一九七八年中美斷交，民眾群起走上街頭抗議，大家都非常生氣。我認為大家憤怒的是卡特總統的處理斷交方式。

卡特是一個很沒有外交經驗的人，他為了自己國家利益而去擁抱另一個更大的國家，我們可以理解。可是他對待盟友的方式，實在很粗糙。

中美斷交，我是少數在台灣先知道的人。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半夜，電話鈴聲劃破寧靜的夜晚，紐約時報 Foreign Desk 跟我說：「白宮說，等一下再過幾個小時，卡特總統會有一個很重要的記者會。我們猜可能是要承認中共，然後跟台灣斷交。」報社要我去確認消息。

十二月二十七日，美國代表來台灣談判，我跟紐約時報派來的資深記者坐在一起，同車的是美方的談判代表。

在前往圓山飯店的路上，車子四周都被人群包圍，車外很多人手中拿著木棒，也有人拿國旗，紅的、藍的一片旗海飄揚。有些人好像是國民黨文工會的熟面孔，大家都在抗議、丟雞蛋，車子完全開不動。美方代表嚇壞了，可是對我而言，我看到那些人的表情，我知道，大家都很憤怒，但並沒有仇恨，應該不會出什麼大亂子。

中美斷交那段期間，我為美國媒體工作，但我體會到沒辦法用美方觀點處理新聞。當時我的位置和經歷強迫我把自己的立場想清楚。有時候人家問我：「妳為什麼那麼愛國？妳到底是什麼人哪？」我就會說：「我是在台灣的中國人。」這都和親身經歷有關。

流淚報導呂秀蓮被捕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發生「高雄事件」（亦稱美麗島事件），我在接受《新台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的「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採訪時，曾說明當年採訪美麗島事件的經過。

十二日下午黨外人士在美麗島雜誌社召開記者會，記者會開到一半我才趕到，可以看得出來每個人是有點恐慌的，黨外人士有一個共同聲明，大意是說，他們沒有做什麼，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高雄事件）？

記者會完了以後，我就跟呂秀蓮在會場旁邊坐下來，我問她到底發生什麼事。她跟我說，她覺得

一定有一個第三者在；但不知道第三者是誰。她認爲他們本來都好好的，怎麼會有人反應這麼激烈呢？她覺得那暴動太奇怪了。

我跟她談完以後，第二天凌晨六點她就被抓了。那對我而言是一個非常大的震驚：「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因爲我比較理解呂秀蓮，以及剛好她被抓以前我對她有作深入訪談，所以我用她爲主角寫了一篇文章。

我雖然沒有跟她很熟，但還是認識。我記得我在家中餐桌上一面打字，一面流眼淚。文章後來登在亞洲華爾街日報，我覺得這篇文章比較可以讓外國人理解到底發生什麼事，對外界如何看待這件事滿重要的。

陳若曦與紐約時報促成公開審判

當時海外很多人對高雄事件的發展感到很緊張，他們害怕會變成另一次「二二八事件」。許多海外學者，包括余英時在內，也投書給紐約時報，說其實受審判的不是這些人，而是台灣的民主。他們覺得決策權在蔣經國身上，想突圍找人直接去跟蔣經國總統講，大家想到作家陳若曦。

陳若曦與蔣經國總統背景相似，年輕時都充滿社會主義理想色彩。陳若曦寫了《尹縣長》，是剖析共產主義的中篇小說，當時蔣經國推薦每個人都應該要看這本書。所以大家想，最好讓陳若曦拿一封信親自遞給蔣經國，讓他看看海外是怎樣看待高雄事件。

因爲當時我幫紐約時報和亞洲華爾街日報寫稿，一般認爲比較客觀公正，而且我身爲記者也知道一些事情，所以吳豐山（前自立晚報總編輯）就安排我跟陳若曦見面，我把所有知道的事情都告訴她。

我跟她講，高雄事件之前有導火線，不是只有後面的暴動；即使要暴動，前面是有原因的。「鼓

山事件」不是暴力份子預謀打警察局，是因爲「美麗島」的支持者被打，他們才來圍警察局；這個先後次序滿重要的。

在陳若曦和蔣經國第一次與第二次見面之間，蔣經國自己跑去高雄求證，還親自坐了計程車，顯然是陳若曦講的東西有效。他們第二次見面時，蔣經國就告訴陳若曦：「我保證這個審判一定是公開、公平的。」陳若曦結束面談之後，立刻告訴我會談內容，我馬上發稿，就是紐約時報的文章「Taiwan is Planning Open Trials Soon for Dissidents」（台灣當局欲公開審判異議份子，1980.1.24）。

我想，陳若曦與蔣總統的談話，還有紐約時報這篇文章對「美麗島事件」採公開審判，是起了一些作用。（編按：陳若曦在接受「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採訪時也表示：「殷允芃採訪我的報導不久就刊登在《紐約時報》上，那也很有作用。國際都注意到這個事件，政府還是會重視國際輿論的。」）

美麗島軍法大審現場

軍法審判的時候，我就坐在第一排，是很難受的，因爲許多被告是我採訪過、認識的人，怎麼忽然間變成這樣？我在那不停地流淚。所以後來有一些批評的聲音出現，認爲我同情被告。對我而言，軍法大審是非常emotional的一個經驗。

法庭上呂秀蓮說她被心理威脅，偵訊的人拿吳泰安被槍斃後的屍體照片給她看。她很氣，她用比喻式說法，講偵訊人員威脅她的話：「妳小心喔，不然我們要讓妳赤裸（意指像是把人脫光衣服一樣無所隱瞞）。」當時有些外國記者搞不清楚翻譯，就說那些人要把她衣服剝光。

當時看起來最慷慨激昂的是陳菊。陳菊很大器，感覺她有點像電影上上法庭的秋瑾，豁出去了，好像要跟大家告別。當然最羅曼蒂克的就是施明德，他說：「讓我一個人死好了。」

另外，我記得姚嘉文律師很理智，希望讓全世界知道這件事，所以每講一次話，他就有意地看我這邊，他可能是要我幫忙，覺得國外媒體的支持很重要。他出獄後第一次見到我，他跟我說：「妳知道嗎？當時我講那些話是跟妳講的。」

台灣應該先發展經濟

從中美斷交到高雄事件，雖然外交有更大的壓力，可是國內還是有改革的契機，一批新的力量就要出來。當時全國氣氛的焦點，不是政治自由或不自由，而是台灣怎麼辦？台灣怎麼生存、走下去？政治不是那麼優先。舉國上下都想盡量發展經濟，而且當時又是孫運璿先生在做院長，他很務實、臨危不亂、有領導力、又有國際觀。當時企業界的人也都願意支持政府，很團結。

因爲紐約時報跟亞洲華爾街日報記者的身份，我常有機會見到政府官員或者是黨外政治人物。有些人當時會用二分法，覺得國民黨都是高壓的、權謀的，反對黨就是具理想的改革者，事實並不見得如此簡單。到最後我很討厭這些政治人物，因爲有時候改革也是幌子，兩邊政治人物都是爲了權力而爭奪欺騙。我幹嘛爲了一群騙來騙去的人，浪費我的生命？

另一方面，我覺得在外交節節敗退之下，更應該把經濟先拉起來。經濟應該是台灣生存的命脈，而且跟一般人民關係更密切。經濟起碼會有一個 bottom line、會有賺賠的具體數字，比較容易掌握，不像政治有點虛無飄渺，不知道誰才值得相信。

當時我也很清楚，台灣在國際媒體上的地位是有限的，我在國際媒體再怎麼寫也沒有用，因爲台灣是幾分就是幾分，不是我一直寫就會加分，我還不如自己跳下來幫台灣加分。當時的深刻體會是自己要強，否則沒有人會幫助你。台灣可以做一個民主的典範，可是如果你沒有經濟實力，沒有人要理你。這些都是爲什麼我在戒嚴期間創辦天下雜誌，並且以經濟爲主的原因。

創辦天下雜誌甘苦

一九八一年天下雜誌創刊，我心目中的《天下》，是擁有《經濟學人》（*Economist*）的內涵、時代雜誌的寫法，以及《財富》（*Fortune*）的Layout跟照片。

有人認爲天下太強調positive面，這是我們的選擇。我們這樣做有兩個原因：第一，要強烈批判，我們寫不過聯合報，創辦時也沒有像黃年那樣的人才。訓練有素的記者根本不會想加入一個剛要創刊的雜誌，當時雜誌在社會上並不受重視。多虧我在政大新聞系教書多年的學生，願意「邊打邊學」讓天下站起來；二、我覺得天下是一個媒體，是一個探照燈，我們把spotlight打到哪裡，大家就看哪裡。這世界上還有很多事情在發生，可是大家都只注意打打殺殺、吵吵鬧鬧的事，而忽略了默默工作的人。

因爲當時大家對雜誌都不看好，即使我們去拜訪代理商，他也不一定要代理你。我記得我們去找台英社的陳總經理，他問我們後面有沒有金主？我

左：《天下雜誌》創刊於1981年，是第一本專業的財經雜誌。右：創辦天下雜誌初期。（皆由殷允芃提供）

說沒有。他說：「你們有多少錢？」我說：「我們只有三百萬，你有什麼建議嗎？」他就說：「我們現在不需要一個價格低的、品質差的雜誌，這種雜誌已經一堆了，你們既然沒有錢，就把價格定得高一點，但是你們一定要有很好的品質。」所以我們就把雜誌價格定爲九十九元，那時候是天價。

王永慶先生在天下創辦的時候也有幫忙，第一期台塑就買了一千本，我覺得那是很大的肯定。還有，一開始天下的辦公室是在台塑大樓後棟四樓，但沒有收租金。

我們那時候真的沒有business的經驗，不過我們很幸運，第一期就已經再版好幾次，所以我們第一年就已經賺錢了。

「天下式」寫作風格

天下的定位是以財經爲主，給decision maker，決策者看的雜誌。Decision maker是企業家，政府領導人，但也可能是一個人、一個高中生，但是他是企圖要作決策的，即使他對自己的生命作決策，也是在作決策。

我承認天下是菁英的，我們是有意識的菁英的雜誌。既然是菁英，就應該維持理想。對推動美好的社會盡一份力量。「有能力的人，請你把你的光照得更遠一點。」這是作家龍應台的話，我也覺得是這樣。如果你有能力就多做事、多幫助別人。

天下創辦至今，有人認爲已形成特殊的記者寫作風格，其實只不過是深入淺出，吸引人看的特寫方式而已。我認爲，記者應該是追尋事實眞相，可是事實眞相是非常困難找到的，不可能問一個人就問出來，要有很多周邊採訪，並且加上自己的背景知識、研判，才有可能接近事實。這是一個比較繁複的作業系統。

天下要求記者起碼要有「三邊採訪」。你可能採訪二十個人都是一種觀點，那還是只有一個面

1989年初訪新加坡李光耀總理。（殷允芃提供）

向。「三邊採訪」的意思是三個面向，而不是三個人，也許只採訪五個人就有三個面向。記者作所有的準備，就是要反映事實眞相。記者必須代替讀者去看，然後把眞相告訴大眾。

還有，眞相後面的意義是什麼？記者應該再深入分析、給問題一個層次。「這後面代表什麼？後面帶來的影響是什麼？」這是天下的文章想要達到的目標。

讓台灣有「家」的感覺

當年我決定回到台灣，主要是想讓台灣更好。在中美斷交、國際孤立的情況下，我希望讓台灣的經濟更好。現在呢？全球化之下的台灣，應該把每個鄉鎭做好，讓全體生活品質、人民水準一起提高。所以天下雜誌二十週年除了講「二〇二〇願景台灣」外，也推出專題「三一九鄉向前行、信心台灣」專刊。

由於全球化競爭，如果我們要跟大陸比，比市場、比人才、比技術，甚至比資金，都比不過。那我們能比什麼？我們要比的就是兩種制度的比較，我們要比的是我們的生活品質跟人民素質。

在全球化之下，我們應該要Glocalization，就是結合globalization跟localization，國際化與在地化是一體兩面。「先立足台灣，然後放眼世界」，這句話聽起來有點俗，不過重點是我們要有立足點。立足點是從自己的家開始，要從內到外，也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台灣人在世界各國飛來飛去，午夜夢迴醒來的時候，他不知道他在舊金山、東京、上海、北京，還是台北？哪裡是他的家？窗前等候他的燭光在哪裡？他就像風箏一樣，可是牽著他飛翔的那條線是在哪裡呢？那就是家的感覺。

如果我們要讓台灣變成家，讓台灣人在外面四處征戰時，一想到就知道窗前還有燭光在等他回來，知道風箏是有條線的。那我們就不可能只是把都市建好，而是要讓三百一十九個鄉都很好。所以爲什麼推出「三一九鄉向前行、信心台灣」，就是要讓大家以台灣爲榮，進而變成每個人以他的鄉爲榮。這就是我們要推三一九鄉專題的邏輯。

在當前這種媒體環境下，天下發揮的影響力，回歸到自己身上的不一定很多，但是有些影響會被別人拿去，也跟著去做。我覺得其他媒體還是在看天下，從天下得到一些靈感。譬如三一九鄉專題，幾乎每家電視台都在做，這是天下帶動的。天下出的《微笑台灣三一九鄉》，連對岸都在看，最近跟著推「微笑北京」活動。

解嚴後媒體普遍墮落

若比較解嚴前、後的媒體表現，解嚴前許多人有一種過份天眞的想法，認爲所有的禍源就是威權

體制，因此只要打破威權，讓人民有充分的自由，問題就全解決了，就會達到理想世界。解嚴以後沒有威權了，每個人都有很多的自由，但現在的狀況就比戒嚴的時候好嗎？

我覺得，現在的媒體，包括專業能力、態度、眞實性，都比戒嚴時期更糟。

戒嚴時期的媒體，有政治力控制，這個明顯的對象可以反抗。現在雖然沒有一個明顯的壓迫力，但市場化、新聞商品化，卻無所不在，更難對抗。甚至所有記者所處的機構組織，以及記者本身，都是part of the corruption。以前corrupt的對象只有一個，你把他打倒就好，現在不小心自己也可能是腐敗份子。

每位記者捫心自問，很多做的事都不太應該，可是也都做了啊。現在有一大堆的共犯集團，你要反對誰呢？反對自己的老闆嗎？反對第三者很容易寫，反對你自己的老闆卻很難。如果會失去工作，還要反對嗎？大家爲了生存，不知不覺中都成爲共犯，眞假不再那麼重要。

現在有那麼多「假新聞」、那麼多「置入式行銷」。戒嚴時期有工商服務版，可是每個人都知道工商服務是買的，記者也會掛「工商服務」記者證。現在你掛的是記者，卻做工商服務，明明拿了錢，還假裝成是新聞。這是普遍的淪落。

政客與媒體都是亂源

台灣現在有兩個亂源，一個是政客，另外一個就是媒體。

現在，只有壞消息才是新聞。好消息呢？都不是新聞了。我們應該重新思考新聞的定義。更不好的是，現在媒體把很重要，跟很嚴肅的事情，都娛樂化。所有事情一笑置之，哈哈就完了，它不會激起一種focus的情緒或憤怒，感情被消耗掉，無法凝聚，無法變成改革的力量。

所以大家都變成第三者，所有事情都置身事外、冷眼嘲諷。努力做事的人會被澆冷水，立場都會

上：天下二十週年，邀請各界領袖共商「2020願景台灣」於台東知本。
下：天下二十週年，同時推出「2020願景台灣」及「319鄉向前行」，指出國際化與在地化同時兼顧（Glocalization）的重要。（皆由殷允芃提供）

被嘲諷。這樣怎麼做事呢？

我覺得天下現在面對的挑戰很大。二十六年來，一直有一句話在雜誌刊頭下面：「天下取名自國父墨寶，天下為公，代表大家對一個美好社會的嚮往與追求。」天下的英文名字Common Wealth，也是均富的思想，是一種修正的資本主義，或北歐式的。

我們堅持的一些價值，並不是目前台灣一般媒體、社會表面上看到的價值。可是我覺得deep at heart，在每個人的內心深處，天下堅持的價值還是大家的價值。譬如專業的精神、理想、關懷、勇氣，或者是公共利益。我覺得這些是亙古不變的價值。

現在整個台灣社會氣氛強調個人利益，金錢是衡量成功的唯一條件，我不贊成，而且也認為美國式赤裸裸的資本主義是遲早走不下去的。可是這樣就變成天下在逆向操作，我們在堅持那些價值，有時候覺得有點lonely。不過有許多讀者認同我們，國外評審也很肯定我們，在亞洲發行人大獎的得獎評語裡面，國外評審覺得天下時時刻刻提醒了「做媒體還是要扮演提昇社會的力量」。

我很高興，現在很多國際的科學研究，證明微笑是好的、positive thinking是有益身心的，甚至是可以學習的。天下二十多年來一直強調積極的精神，現在，這種重視積極的聲音在全世界已愈來愈大，我很高興這個想法是對的。

記者典範與使命感

回顧記者生涯，我的role model是徐鍾珮（曾任中央日報駐倫敦特派員、知名作家），她的記者生涯短暫而精采，可是她時時刻刻心繫家園、借鏡英國鼓勵家鄉人民勤奮工作。她的文筆跟她對國家人民的關懷，讓我有很大的啓發。至於報人的典範，我認為是張季鸞（《大公報》總編輯），他提出「不黨、不私、不賣、不盲」，是最簡單扼要的媒體準則。

我始終認爲，一個好記者一定要有好奇心，沒有好奇心的支持，過不了多久就會改行。第二個是要有同理心、社會正義感，然後一個好記者也需要勇氣。我希望年輕人還有熱情想從事傳播這個行業，否則很容易就會改行。其實，若沒有興趣和對社會的熱情，新聞工作是滿辛苦的。

就人生價值而言，我覺得會有一些性別差異。許多女性領導者，很能幹，卻沒有去做最高的經營者。我覺得是有些女性不太想付出那麼多代價。女性要爭取的東西、要追求的，不是那樣的權力或位子。對她們而言，或者意義更重要。做一個經營者要負擔很大的業務等等責任，有些女性是自己選擇不要。

我曾聽到台灣高鐵董事長殷琪的用語：「那是一種承擔。」我完全同意跟理解，那是一種承擔，是一種責任。有人說，可以不要挑那個擔子，就不要了。可是當初我不小心地挑上了記者與天下的擔子，也沒辦法。那時候就是有種使命感，不然我可以不要做。

現在有些年輕女性會更勇敢去承擔更多責任，不過自己要先準備好，想清楚。因此可以enjoy很多東西，但也可能要付出很多代價。像前美國第一夫人Hilary，希拉蕊，每個人都拿放大鏡看她，會被講一些有的沒的八卦。要做嗎？要想得很清楚，然後不要抱怨。

有一位我年輕時曾訪問的紐約女銀行家曾經說：「盡量努力去做你能夠做的事，那你不僅能夠得到人們的認可，而更重要的是也能得到一份滿足和心安，因爲你知道你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

我相信只要努力，事情就有可能。主動很重要，機會是你自己去找的，不會天上掉下來。

◎初稿：徐瑞婷
◎校訂：林麗雲
◎定稿：何榮幸、殷允芃
◎訪問時間：二〇〇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五月二十九日
◎地點：天下雜誌社「書香花園」

周天瑞

271　周天瑞　海外華文媒體的宿命

周天瑞

〔第九章〕

海外華文媒體的宿命

一九八四年美洲中時總編輯

前頁圖說：
1974年，行政院長蔣經國與採訪國會新聞的記者，
於立法院議場前台階上合影（蔣經國右側即爲周天瑞）。（周天瑞提供）

他的記者生涯初期，只能用「少年得志」四個字來形容，很快就當上《中國時報》採訪主任，很快就被視爲總編輯接班人。因此，在訪談過程中，他對「菜鳥記者」這個形容詞相當嗤之以鼻，強調所有報社交付的任務都能完成、寫好的稿子從未被丟到垃圾桶。換句話說，他從來沒有「菜」過。

他與報老闆余紀忠亦師亦父的深厚關係，則是剪不斷、理還亂。讓他快速竄升的是余紀忠，要他去美國念書的也是余紀忠；要他接下《美洲中國時報》總編輯的是余紀忠，沒有告訴他就宣布美洲中時停刊的也是余紀忠。其間複雜的互動感受，眞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美洲中時因爲接連報導奧運新聞、「江南案」而觸犯當局禁忌後，在一九八四年被迫劃下句點，象徵海外華文媒體仍深受島內政治干預的宿命。他見證的不只是一間報社關門打烊，更是當年威權高壓氣氛的無孔不入、無遠弗屆。

他就像是唱作俱佳的說書人，以抑揚頓挫的聲調、多元豐富的手勢，帶領我們回到那個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年代。其中的曲折離奇、高潮迭起，應該會讓讀者覺得津津有味。

儘管過去六年轉戰過無數媒體，少年得志卻過盡千帆之後，他還是回到了在解嚴那一年創辦的《新新聞》，老驥伏櫪，似仍志在千里……

周天瑞大事記

1947 周天瑞出生

1971 退出聯合國

- 1971中國時報主跑國會、黨政新聞
- 1972中國時報政治、外交記者
- 1977中國時報採訪主任
- 1978中國時報副總編輯兼專欄主任、採訪主任

1979 美麗島事件

- 1979再度擔任中國時報副總編輯兼採訪主任
- 1983美洲中時副總編輯兼採訪主任
- 1984美洲中時總編輯
- 1985經營自助洗衣店、從事保險經紀人工作

1987 解除戒嚴

- 1987創辦新新聞週刊，任職社長
- 1989新新聞董事長兼社長
- 1997開辦環球電視台，任執行副總經理兼新聞總監
- 1998創天開國際傳播公司
- 1999超級電視台高級副總裁、自立晚報社長、勁報社長

2000 政黨輪替

- 2000中央廣播電台董事長
- 2003新新聞董事長

永遠在找最大公約數

建中校刊奠定文字興趣

我在求學時代作文就不錯，經常參加作文比賽，小學六年級就得過全國兒童作文比賽第一名。我常在校刊寫文章，高二時校刊社同學谷文瑞（筆名誠然谷）來找我一同接辦校刊，我一口答應，把其他社團（我參加過國術社、演講社、合唱團、軍樂隊等）都退掉了，專注加入《建中青年》。

當時建中青年在校園界很有名。多年後我遇到立委洪秀柱，她一看到我就說：「啊？你就是周天瑞啊！你是我的偶像耶！」她說當年念書的時候，極愛看《建青》，對我的印象很深，她認為在當時高中校刊中，建青是最有思想水準的。這其實是很多人的看法，建中青年的經驗，讓我決定走上文史之路。

後來我選擇走上新聞這條路，主要是受到我舅舅的影響。我舅舅劉梅緣是淡江英專（淡江大學前身）畢業，大我十歲，先後擔任《聯合報》駐馬德里、駐羅馬特派員，我和他通信十分頻繁。這對我的啓蒙很有影響，使我決志要當記者，這是我求學時代很清楚的理想。

但考大學時我並沒有塡新聞系，這又受到三民主義老師趙毅的影響。他是北京師大畢業的，很有

人文素養，曾身兼建中訓導主任，很凶，但課講得很好，是我時常接觸的老師。

趙老師知道我想走新聞這條路，但叫我念歷史系而不是新聞系；因為歷史可以看流變，可以培養看事情、看人、看問題的深度。歷史是許多人智慧的結晶，好好壞壞，讓人看得深入。新聞工作者要提供大眾資訊，沒有足夠的文化理念和歷史縱深，如何判斷與解釋事情？

然後我又讀到史學教授吳湘相先生的書，他也提到早年想做的是新聞，也是在一位老師的提醒下先念歷史系，但之後就沒走回來。於是我選擇了歷史系。

毛遂自薦進入中時

一九七一年從金門服完兵役，一心想進報社，卻苦於沒有門路。從高中到大學我都主持校刊，摸索了不少經驗，但並沒有接觸過任何新聞前輩，也沒有在暑假參加過救國團辦的新聞研習營。因為我要打工繳學費，哪有時間去參加這種活動？也因此沒有建立進報社的人脈或關係。

當時報社也沒有招考，於是我就附了一些大學時代的作品，直接寫信給《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先生，表明對中時的朝氣極為嚮往。當時中時首創彩色版，給我的感覺很有生命力，很合我們年輕人的理想。沒想到余先生馬上約見了我，要我去上班。

我剛進時報時，採訪組是三頭馬車，政治、經濟、社會三個組各有一個採訪主任。余先生很厲害，人事上一時擺不平，讓三個資深記者都當主任，各帶一塊。市政、省政新聞併在政治組，體育、影藝新聞歸在社會組，經濟組就是財經新聞了。但那時三個組都沒有缺，再加上政治組主任是張屏峰先生（大家都稱他屏老）。屏老是很有個性的，隨便塞個人給他用，他不見得用的。

於是報社先派我到編輯台見習編輯作業，待了幾個月，約莫十一月初，終於屏老找我談話。他說：「余先生告訴我你是個很優秀的年輕人，我也想過很多次，雖然一直找不出空缺，但是你能不能

告訴我，你希望採訪什麼路線？」我說我只想要當記者，什麼路線都可以，端看報社的需要。他說：「這樣好了，我給你三個題目，找人採訪也好，找資料也好，報導體也好，論述體也好，都隨你，你寫出來之後我們再決定。」

從來不是菜鳥記者

這三個題目第一個是「國民大會第五次會議的歷史任務」；第二個題目是「如何充實中央民意機構」；另外一個是「如何突破台灣的外交困境」。

屏老並不教我怎麼做，用什麼方法做，這當然是個「考試」。因此我自己想辦法做，自己解決問題。寫完兩篇還沒有寫第三篇，他就說：「天瑞，我已經明白了，不用再寫了，都很好，你就來採訪組吧。」

屏老要我先接觸國大，隔年初國大就要開六年一次的大會了。另外還要跑外交部的外圍機構，如世亞盟、僑委會等，這是較次要一點的路線。那時候主線都有老記者在跑，不能把人家搶下來，但不管什麼路線，只要在我手上，就一定要做出成績。我到採訪組第一天就發特稿，之後經常一個禮拜至少出現四、五篇，當時報紙只有三大張，版面是彌足珍貴的啊。

不久，我接跑交通路線，馬上就跟對手記者幹上了。當時聯合報同線記者發了一版頭題：「台北市鐵路（捷運）地下化定案。」這如同當場打了我一巴掌，即使對手跑交通的時間比我長，我也丟不起這個臉，那是我的路線啊。我就直奔當時交通部次長王章清的辦公室，追問：「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王章清強調：「根本還沒有定案啊！」我馬上發出交通部次長的權威說法。這個新聞就上了第二天中國時報的頭題，把對手報的報導打了回去。

國大開議——往往在這種重大新聞採訪中，會孕育出報社未來的主力記者。政治組的記者人人都

渴望跑這個主要新聞；報社到底要宣布誰跑國大，就像考試要放榜一樣地緊張。後來報社決定：一位是郭人傑，本來跑國會的；另一位竟然就是我。

報社賦予人傑一個方塊，叫作「國大索隱」，是國大會議的主要內容；我則是負責「國大側記」，寫各式各樣花絮與側面消息。雖然原先並不是主要欄目，但國大側記在我手上經營得十分好看。我的外公是國大代表，爲了不依賴長輩，我從未向他問過一句。有一次他問我：「你怎麼這麼清楚我們國大的事情？」我說：「有沒有錯？」他說：「都沒有錯！我們國大同事都喜歡看。」我讓國大側記變成了非常有份量的重要欄目，不時擴及到國會改革等憲政問題，三十天的會期當中，一天都沒斷過。國大會期結束，報社就把整個國會新聞路線交給了我。

雖然剛出道，我卻從來不覺得自己曾經做過菜鳥記者，只是對於新聞界的情況比較陌生。那就學嘛，勤採勤訪勤問，很快就瞭解。初出道的我，並沒有發生什麼錯誤，鬧出什麼笑話，或是交代的任務我解決不了。任何任務在我手上，我都能把它從冷的變成熱的，沒有達不到的採訪目標。

推動時報轉型被打小報告

當時余先生升我升得很快，屏老面對一個後輩這麼突出，當然希望還是有個循序漸進的節奏，但余先生哪管這麼多，誰優秀就上來，如果管那麼多就不是余先生了。

余先生要提拔我，可是我上得快，屏老下得就快，他那個世代的人也下得快。加上余先生沒有交代爲他們將來作什麼安排，屏老當然是能擋就擋。這即或沒有他個人的因素，也有群體的因素。

所以屏老一直沒有安排讓我接黨政路線，後來還換了一些不合適的人跑。余先生當然看不下去，就跟屏老說，眼前不就有一個人嗎？天瑞啊，叫天瑞跑啊！第二天我就接下了黨政新聞。我這一跑黨政，表示可能很快要接採訪主任了。

其實，我當時並沒有當採訪主任這個想法，我認為reporter最大，我們可以做一輩子第一線的採訪記者，可能影響國家的走向，那比做報社的任何官職都能發揮作用啊。

從國會路線換到黨政路線並不難，最要緊的是，我首開風氣之先，開始探討國民黨的改造和革新，所以在國民黨十一全大會舉行之前，我寫了很多國民黨應如何審時度勢、求新求變的這類文章，並且邀約學者寫稿。

余老闆很早就要我邀專欄，我前前後後邀了很多自由派學者寫手，成了時報有名的報風，我在當中扮演了不少角色。我自己無黨派意識，希望向時代轉型，呈現多元聲音，所以我連黨外人士康寧祥、蘇貞昌、姚嘉文的專欄都邀，為時報帶來很多轉變。當然這一切都獲得余先生的鼓勵和支持，他的確是位開明的報人。

我也在採訪中遍訪很多人提供不同觀點，總合他們的意見，寫成系列專欄，提出國民黨改革的方向。有人欣賞，有人則氣壞了，黑帽子就扣下來了，把我貼上「黨外同情份子」、「台獨份子」、「中共同路人」等標籤。情治單位整天說周某人妖言惑眾，對我很火大。我們的忠實讀者很多，這些搞思想檢查的人，也是我們真正的「忠實」讀者。

當時情治單位還找上我，要我幫忙打探康寧祥的情資，我說康寧祥是個認真、肯學習的人，他很尊重前輩，不少有見識、有風骨的老委員都很欣賞他，其他則無可奉告。我是一個新聞工作者，我要採訪的是能夠登在報紙上的新聞，我不提供那些登不出去的坑人資料。

改革呼籲獲得蔣經國引述

到了一九七六年國民黨十一全大會開會，我繼續每天一篇大專欄借題發揮，落實要國民黨改革的主軸。這是我們作為年輕人所感受到的時代脈動，我們不願意當乖乖牌，但攻擊我的小報告始終不斷。

沒想到有一天，十一全大會開會休息的時候，余先生把我很神祕地拉到牆腳，輕聲告訴我：「天瑞，就是剛才，經國先生親自走到我座位面前跟我說，你們有個記者叫周天瑞的，請告訴他，他寫的專欄、他寫的東西，就是我心裡想講的。」我當時馬上想到的是，那些打小報告的牛鬼蛇神，整天說我怎樣怎樣，你們的主子卻說我寫出了他心裡想講的話。

蔣經國講話從來不依講稿，十一全閉幕典禮致詞時也是如此，我們做記者的必須以最快的速度筆記，必須要他講完就記完。結果我愈筆記愈覺得耳熟，都是我寫過的啊，都變成了他的語言講出來了啊。我當時是非常激動的，眼淚不自覺就掉下來，怎麼會有這樣的人呢？毫不避諱原字原文講出來，而且講得非常深刻有力，宣示著他改革的決心。

我心中真是百感交集，自己寫的東西被國家領導人這樣引述，代表他的心和我的心是同理的、是心意相通的，這是一種很深的感動。我一邊寫一邊眼淚流個不停，還不能把字弄糊掉，還不要讓別人看見。等他講完，馬上止住眼淚。

之後我沒張揚這件事，倒是余先生很得意地到處跟人家說，經國先生怎麼誇讚周天瑞。我盡量以平常心看待。在我想，他不過也是個讀者嘛，我們習慣尊重讀者，每個讀者的反應我都尊重。如果他看了很滿意，固然好；不滿意，我也沒辦法。但是我如果到處張揚，就變成自我吹噓了。我沒有這個目的，自然用不著去強調，心知肚明就好。我秉持這種心情工作，我知道我沒有做錯，我心安理得，就算哪天會怎樣，大不了慷慨赴義就是了。

國民黨禁止報導中壢事件

後來我接下了時報採訪主任，這其實是我最大的遺憾。當一個主要報社的記者，和國家的領導人有這樣心靈互通的時候，再繼續做下去，會是怎樣的結果？很多的改革很可能因此開始，可以加速地

往前推進，我們可以善加利用這樣的影響力和信任度。

但是當採訪主任就沒辦法了，「周天瑞」三個字從報面上就此消失了，只能透過其他同仁把一些想法寫出去。那當然不一樣，已經不再能用我的名字和國家領導人作互動，或產生實質的改變了。

十一月中旬採訪十一全會完畢，我在接下來的一月一日就接下採訪主任，這是余先生早就有的打算，不盡然受蔣經國那件事所影響，但也可以說因此更加確定。但這當中各種小道消息更多了：「周天瑞帶領時報一些來路不明的年輕人，對著政府唱反調。」隨著愈來愈多的年輕人進到時報，這種帽子愈來愈多。

我接採訪主任那年年底，發生國民黨在縣市長選舉舞弊、導致黨外人士包圍警察局的「中壢事件」。由於是在中壢發生，屬於地方通訊組職權，總社採訪組只能支援，但我們連支援都不可能。因為當天晚上余老闆從外面開完會回來，換了睡衣準備入睡的時候，緊急找了我們去開會，千囑託萬囑託，國民黨黨部交代得清清楚楚，中壢事件奉命不能登大，背後什麼原因，都不要提到。雖然余老闆沒有說一個字都不能登，但實質上就是「腰斬」。

中壢事件當天不能發新聞，結果沒幾天，聯合報全版詳述整個中壢事件的過程。這當然是「偷跑」，余先生當然光火，就召集我們看怎麼面對。隔天我們也用全版處理，由於事件本身已經沒什麼好談，我們就遍訪包括許信良等黨外人士的觀點。

這樣的過程顯示，在戒嚴年代，即使媒體違背黨部禁令「偷跑」，也已經是幾天後的事了。重大新聞當天的處理，還是得看黨部的指示，說不能見報就不能見報。

林宅血案、中時羅生門

幾年後林宅血案發生，那天真的是把大家驚壞了。中時採訪部門一陣忙碌，作各種新聞的佈局。

當時有一種說法傳出，林義雄唯一倖存的女兒林奐均向第一個到達現場的人說：「凶手是來過我家的叔叔。」因為第一個到現場的人是林義雄的祕書田秋堇，我找熟識的人去採訪她求證，但沒有找到田秋堇，也無法證實這個說法。

到了晚上，余先生分別找社內記者談話，他跟王杏慶（南方朔）談了一段後，就叫我：「天瑞天瑞！白天我們聽到凶手是林家認識的人這種話，我本來以為情治單位造謠，但是剛剛杏慶告訴我，是春男（司馬文武）講的。這就不一樣啊！春男一向跟黨外走得近，他不會造謠，他講的應該是事實。杏慶啊！你把它寫下來！」我說：「余先生，不行，我再請同仁求證一下。」他說：「不用求證啦！這就是最大的新聞了，這就是我們表現『道德勇氣』的時候！」

我當時非常不以為然；我負責採訪部門，而余先生一再插手新聞處理方向，我也很不能接受，很想發火。我一方面忍住、硬吞下去；一方面拒絕了杏慶這則稿子的過手，要他直接交給余先生，新聞就發出去了。

隔天一早江春男打電話來抗議，問我們為什麼這樣登？我把當天的狀況大致跟他講了一遍，他說關鍵是他從沒有這樣說。當天就在《自立晚報》寫了一篇專欄，強烈否認中國時報這則報導。沒想到余先生說：「春男當然不能承認。」可能是因為余先生相信王杏慶，並認為春男不便承認，怕他們受到有關人士的騷擾，因此，余先生還特別請總統府祕書長蔣彥士交代治安機構、警察機關保護王杏慶和江春男。

幾天之後的一個禮拜天上午，我接到報社同仁電話，說杏慶的老婆打電話表示，整個晚上都沒有看到杏慶回來。余先生非常著急，擔心出了什麼事，帶著報社同事四處找他。到了中午，終於得知他安全返家了。我跟余先生講：「杏慶剛剛回家了！」余先生立即起身離去，我陪著他下樓，可沒陪著他一起上車，因為杏慶堅持是從春男那裡聽到消息，春男卻從頭到尾都否認，顯示這則報導在專業上

有問題，余先生一定尷尬。

一直到現在，這件事從來沒有澄清過，成了羅生門。以我當時擔任採訪主任的位置，我比較相信春男沒這麼說，因為當時有那麼多記者在場，不太可能只有杏慶聽到春男這樣說，其他記者沒有一個人聽到，更不要說在邏輯上並不合理了。

由於在這件事上我與余先生的意見明顯相左，可能是余先生對我改變看法的一個關鍵。

十信案也遭強烈施壓

我在採訪主任任內，還曾經有機會避免後來的「十信案」金融風暴，但也因為有關單位的強烈施壓，讓十信案還是爆發了。

當時中時財經記者張叔明獲知蔡辰洋的十信會出問題的新聞。他問我能不能發，我說既然是事實就要發，次日編輯台以三版頭題刊出。

但見報後壓力來了，壓力來自軍中政工出身、後來還做了華視董事長的蕭政之先生。他退休下來後，被蔡家找去做他們一家新公司的董事長，所以他已經進入商界，想要代表蔡家找我們溝通。

蕭先生當時盛氣凌人，賣弄他在新聞界的輩份，告訴我們新聞要如何做。我就不客氣了，我說：「蕭先生，在軍中你是我長官，在新聞界你是我前輩，所以我原來對你有很多敬意。但是今天我們在談這個事情的時候，我們處在平等的地位。恕我冒昧說一句，如果我們的報導真的有錯，我負責，我們會改；如果不是，請不用討論！」

他的臉馬上沉了下來，沒想到會碰到我這種人。在軍中、在華視都沒有人敢這樣跟他講話，當然他立即找上余先生。

余先生找我講話。他說當時各方面的人都盯著中時，想找中時麻煩。他也很不想理情治單位的

人，但不能完全不跟他們打交道；有些地方也要靠他們幫忙溝通、擺平，而蕭先生還是一個與他有些交情且願意打交道的對象啊。

在這種狀況下，我們再發稿也不會登了。如果當時我們能持續報導的話，哪有幾年後的十信案風暴？蔡家搞政商關係，造成多少投資人、老百姓的血汗錢血本無歸？可惡嘛，新聞工作就是應該要揭發這些。可惜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我們卻做了一樁「爲德不卒」的事！

余老闆要我出國念書

我跟余先生接連發生了不少歧見。一九八〇年六月有一天，終於余先生跟我說，年底要恢復選舉，他擔心我會出事，因此要我去美國找個學校念書，他負擔所有費用。這在時報是史無前例的事。

許多人說這是「放逐」，報社的年輕同仁頗爲我抱不平。不過，我覺得余先生這項安排不錯啊。我也該充充電去了，見見海外的世面，於是坦然接受，兩天後就出了國。余先生也好心拜託我台大歷史系的老師許倬雲先生，在美國幫我安排入學。他還鄭重強調避開東西兩岸，免得華人多，招惹政治是非，最後我去了匹茲堡大學。

我出國後一年，余先生到舊金山來，特別電召我前去見他，這是我到美國以後與余先生的第一次見面。他說：「天瑞，這段時間你有什麼想法？」我說：「在海外一年，我思考跟您之間的關係，我是跟您有些距離。」我的意思是說，他是老闆，我是採訪主任，中間很多層，因此產生不少職務上的和溝通上的距離，很多事情說不明白。這是我出國後深刻感受的。

余先生說：「對！這就是問題所在，你跟我保持距離！」他解釋成是我故意要跟他不同。我無法再辯什麼，不等他講完，我就搭機飛回匹茲堡。

其實，余先生雖然很重用我，但當時報社內外壓力導致我跟余先生常常發生齟齬。我承認當時有

1995年7月，曾受過余紀忠先生重用的《中時》離職同仁宴請余先生伉儷。（周天瑞提供）

些不懂事、心高氣傲的地方，也有著年輕人的理想性格；但關鍵在於當時的環境，還有跟余先生年齡上、職務上的差異，以至於不時就會有意見衝突。每一次發生後，我都深自檢討，希望下一次能避免，但每一次我都沒做到。

美洲中時海外開辦

到美國後，我因緣際會參與了開辦《美洲中國時報》。

多年之前，蔣經國先生曾請余先生到美國辦報，余先生沒有照辦，只開了「海外版」。後來看聯合報系辦了《世界日報》，心裡不無遺憾。此外，在台灣這個環境裡面，言論尺度確實受到限制，無法發揮文化人的使命感，於是想到是否可以在海外這個環境裡有所施展。

當時余先生以十四字箴言開示《美洲中時》：「開明．理性．求進步；自由．民主．愛國家。」開明理性是要求

進步，自由民主是爲了愛國家，提醒我們不能沒有國家觀念。我們認同這樣的理念，也集結了許多海外人才。這個報紙確實讓余先生容納了左、中、右、獨各派人士，但品類複雜，互相之間矛盾得不得了，我在當中穿梭得很是辛苦。

美洲中時要在美國落地生根，就要善盡美國華人報紙所應該善盡的一切報導責任。所以我打破一定要是國際大消息才登一版頭題的傳統，往往把華人關切及華人本身的重要新聞優先刊登一版頭題。比如說有一個華裔美女Sherry May，在佛羅里達得了環球小姐后冠。我就做一版頭條，以滿版刊出，配上一張大大的加冕照片，還靈機一動幫她取了一個中文名字：梅仙麗。後來全部的華人世界都用上了這個名字。

另外最有名的案例之一是陳果仁案件。底特律是汽車城，美國汽車業受到日本汽車很大的威脅，造成很多人失業。美國汽車工人當陳果仁是日本人，把他活活打死，但法官居然判打死人的無罪。我們就發動華人簽名運動，向美國白宮、國會寫信，務必提出非常上訴；再結合許多社團全力推動，不讓一個中國人受屈辱而枉死。這些都是華人報紙沒有幹過的事。

到後來，很多有名的知識份子，例如劉大任等人，都跟我們變成好朋友，到處幫我們宣傳，讓我們在海外建立了很好的口碑。不只是政治報導、專欄文章，包括整個辦報的思維，都跟美國當地的環境結合，跟華人報紙的屬性結合，因而頗獲肯定。

奧運新聞尺度頗費思量

儘管如此，海外報紙的新聞報導尺度，仍然是一件頗費思量的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奧運新聞。奧運新聞是件大事，既是在美國洛杉磯舉行，又是中國大陸在中共掌政後首次參加；處於反共和戒嚴的年代，中國大陸可望大量獲得的金牌成績，要不要大幅報導呢？而在此情況下，如何讓台灣的體育

表現也有角色呢？

我決定處理奧運新聞的原則是：第一，新聞取向；第二，專業態度；第三，華人立場；第四，超越政治。所有選材都是以華人需要的角度去處理，凡是創造中國人有史以來最好成績的，就給予重視。這個成績可能是金牌、銀牌，也可能什麼牌都沒有，但是只要在中國人有史以來的成績裡面破紀錄的，我們就大幅報導。這樣，台灣的成績表現當然不會被抹滅。

比如說有一天，台灣的蔡溫義得到舉重銅牌，雖然只是銅牌，但是打破了華人紀錄，也超出了大家的預期。那天中國大陸的金銀銅牌也得翻了，但我把大陸的金牌全都放到後頭去了，蔡溫義的銅牌拿來作一版頭題。至於像游泳、柔道等大陸人還沒有怎麼參加的運動項目，只要台灣選手締造華人成績的，都給予顯著報導，更是不乏其例。

我是用這樣的編採政策，取得美洲中時處理新聞的正當性，既可以說服自己，也可以禁得起時間考驗。我們是用這種心情在海外辦報紙，所以報紙銷得光光光，美洲中時眞的風光奠定了它的地位。

批評雷根蒙上陰影

但是，國內外言論尺度的不同，還是隱藏著重重危機。

一九八四年九月底，突然有一天，余先生未經通知來到紐約。余先生從來沒有不告訴我們就來的，這次一個人都不知道。他突然出現在報社，並且馬上召集開會。

余先生面色凝重地說，報社接到國民黨文工會主任宋楚瑜的電話，說我們有篇批評雷根總統的社論，使得美方非常憤怒，恐怕甚至會影響美國對台關係，包括對台軍售，因此他馬上搭機飛來紐約。

余先生接著表示，美洲中時處理奧運新聞雖然也受到國內批評，有人在國民黨中常會大肆撻伐，認爲是「爲匪張目」，但他覺得美洲中時沒有錯。然而雷根這篇社論不是新聞專業的問題，它會傷害

到國家的利益。

當時雷根正在競選連任，美國報紙評論候選人是很平常的事。但在國內的壓力下，余先生要求美洲中時不得再對雷根有任何批評，然後他還要去處理善後，疏通共和黨的有關政要。

散會後，余先生就把總主筆俞國基留下，俞國基當即被解了職。報社的氣氛變得很肅殺，我也感受到余先生對我頗有意見，認爲作爲總編輯的我，沒有幫他照顧好這個攤子。他不再找我談話，也不再讓我知道他的去處，我也悶著沒有主動向他作什麼表示。余先生跟我的關係，就是常常這樣，因爲一些彆扭而出現緊張。

等到余先生離開紐約後，我在十月十五日召集同事餐敘：黃肇松、胡鴻仁、楊人凱、漫畫家CoCo、周陽山、傅崑成、龔選舞、林博文、徐啓明、蔣震等。這些都是一時之選的人才。我請他們把心裡的感覺都說出來。每個人都說，每天編這個報紙心裡七上八下，空氣很凝重，壓得喘不過氣來，不知如何是好啊！

我勸撫大家說：「爲今之計，恐怕在政治新聞這一塊，勢必要有所收縮，這點我們大家心裡要明白；但不代表永遠都如此，等到情勢改變，也許又會豁然開朗。」我又說：「做報紙的可不要以爲只有政治新聞才是新聞。政治新聞固然收縮，可以做的新聞還有很多，我們如何把其他新聞做得精彩，讓報紙依然好看，這是我們可以思考發揮的；我們不要再憂慮茫然了，我們要把力氣用在可以作爲的地方。」

江南案堅持做在一版頭題

然而，造化弄人莫過於此，回到報社就得知一則重要消息：舊金山發生命案，華人作家江南遇刺身亡！

這則新聞一看就知道有玄機，因爲江南之前出版了《蔣經國傳》，在當時言論管制的威權時代，引起軒然大波，據說正在撰寫的《吳國楨傳》，對蔣經國也多所貶抑。這當中一定有政治因素，我才剛說政治新聞要收縮，卻發生這麼一件天大地大的事！

我認爲這是總編輯該擔待的時候，我的處理原則是：回歸本質，我們是華人報紙，今天出事的是華人，這件事情絕對不能完全淡化。我猜對手報世界日報不會做大，如果美洲中時亦復如此，不就是心虛而不打自招？

再從歷史角度來看，如果我們淡化處理這件大事，怎麼對得起歷史？如果未來眞相水落石出，我們現在淡化處理就等於向讀者證明：你美洲中時是個屁報！那以後還談什麼影響力？

於是我定下心來佈局採訪計畫。我想到兩個人：一個是江南的好朋友、著名新聞前輩陸鏗，另一個是阮大方——《加州論壇報》的總編輯，《蔣經國傳》就是在加州論壇報連載發表的。我交代在紐約的採訪主任胡鴻仁訪問陸鏗，在洛杉磯的西岸主編卜大中訪問阮大方，要他們保留原汁原味，供我採擇節選。

兩位的來稿很長，毫不意外地，內容都直指：「這是國民黨幹的政治謀殺！」並且一陣痛批。我在仍不能沒有的政治考量下大事刪減，採取了排除法：「陸鏗、阮大方說不可能死於情殺、財殺。」然後刊在一版頭題！

這就是那個晚上我以總編輯身份所做的事情，跟搞奧運新聞一樣，要想出一個說得通、具有正當性、兼顧新聞專業和政治環境、能對歷史交代的方法，幾方面斟酌拿捏。至於這樣做若仍不能見容於當時，我也只有準備承擔一切了。

第二天早上，余先生在外地看到報紙後，即刻打電話給我。他並沒有指責我在標題上所作的那麼強烈的暗示，只說這個新聞怎麼做一版頭題啊？我正待解釋，他說：「天瑞，不要多講，這個新聞以

後就不要再放一版了。」

事實上，新聞發生的第一天最重要，我已經放在一版頭題並且作了暗示。我以總編輯身份負責的美洲中時，儘管政治的顧慮那麼多，在這件重大事件發生的第一天所作的處理，是可以向歷史交代的。這是一個專業報紙起碼該做的事，我相信余先生在責問我的時候心裡其實是很明白的。

美洲中時無力回天

但是，從奧運新聞到江南案，美洲中時已一再引起國內爭議與情治單位圍剿，余先生從國內匯款到美洲中時也經常被刁難，大家都感到報社前途未卜。

十月下旬，Alberr（余紀忠兒子余建新的英文名字）從西岸余先生住處回到紐約美洲中時辦公室來，經我反覆探詢，在要求我絕對不能告訴任何人（包括我太太）的前提下，透露了「可能關報」的訊息。我跟他反映，大家都感受到肅殺的氣氛，心理壓力很沉重，有需要走到這一步嗎？如果真的很難交代，已經換掉總主筆了，現在把我這個總編輯也換掉可以嗎？總主筆、總編輯都換了，是否跟台北就可以交代了呢？

我強調絕對不可以關報，這樣做對時報、對台灣、對國民黨、對國家等各方面的傷害太大了！從那天晚上起，總共談了三次，前後不下十個小時，反覆分析，請他務必力勸余先生不要關報。

余建新會不會跟余先生講，我沒有一定的把握，於是我在想，要如何把這個message告訴台北，使得局面能有所挽回。我就想到一個人，章孝嚴。我認為他跟蔣經國的關係，或許有傳達的機會。而我跟孝嚴兄弟是親戚，這點很少人知道，章孝嚴是我的表哥。我就擬了一封私信，希望章孝嚴能幫忙在經國先生面前為余先生緩頰。

但是，幾經思量，這封信我並沒有寄出去。我畢竟是余先生的部屬，我不能對東家做逾越的事

情，也不能輸送可能不利於他的訊息，而且也失信於余建新，這麼做我會自責的。何況，假如眞要關報，余先生即使不同我商量也總應該會告訴我吧。到時候不才是表達意見最適當的機會嗎？在私德上、在公義上，我都不能做錯。

十一月十日，Albert跟我說，余先生隔天早上約我到旅館見面，我想這下總是機會了吧。沒想到一見面余先生就說：「天瑞啊！我已經下了重大決定，這個報紙今天結束。」

總編輯不知道關報啓事

事實上，余先生已經在今天出刊的美洲中時的報頭下登出了關報啓事！

前一天晚上編報的時候，報社故意瞞著我，從台北帶了一位汪祖怡先生幫他操作這個編務，並交代印刷廠絕對不要講，關報啓事也是他們事先寫好的，我看報紙大樣的時候沒有看到，完全不知情，早上余先生跟我見面的時候，這則關報啓事已經見報了！我信守承諾不告訴任何人關報的訊息，想不到現在連一點點挽救的機會都沒有了！

當時我的心是滴血的。我爲中國時報賣命奮鬥了十四年青春歲月，幾經起伏，折騰來去，搬家也不知道搬了幾回。但美洲中時關報這麼重要的事，余先生一直瞞著總編輯，我眞的很心痛。

余先生也對我作了安排：「天瑞，以後呢，你就留在美國，當紐約特派員，報社會照付薪水。」說完就叫我到隔壁房間去。另一位從台北來的報社高層主管等在隔壁房間，我知道這是「禁足」的意思，免得對外通報關報消息。我深刻體會到余先生關報的決心下得何等堅決而周密！

余先生在關報這件事情上，當然有很多思考：第一是，當時申請外匯常受到黨政部門的刁難。他老人家常需要親自出面和那些晚輩主管拜託求情，情何以堪哪！

然後奧運新聞出來以後，雖然蔣經國先生沒有視這項報導爲寇讎，但余先生內心不無焦慮，認爲

蔣經國似乎不那麼支持他，或認為那些宵小的影響力太嚴重。他有強烈的危機意識，怕對台北的母報發生影響。何況，江南案新聞的處理，台北又有了新的嚕嗦。那麼他就想，乾脆我關報，自斷一臂，看你們怎麼樣，從此以後你們再也無法告狀了。

再加上余先生發現外人都不能信任，他最後只能相信家人與家臣。因此，我跟他兒子講的那些話，又怎麼會傳到余先生那裡？他兒子可能也有不想辦的心情，怎麼會傳話？

從當初那樣對我極力倚重，到此時變成好像陌路，連個話都無法傳達。而我還顧慮到所謂私德公誼，卻遭到如此下場，我的心情真的像岳飛被陷害一樣。

報紙關了以後，負責善後的人在約談同仁進行安撫的時候，都把箭頭指向我。余家的官方說法就是這樣：時而抱怨政治打壓的輿論環境，時而表示對美洲中時編輯部「鞭長莫及」。因人、因時制宜。

二十多年來我仍不免時常思索著：當時沒有把消息放出去這件事，究竟做得對、還是不對？

被扣紅帽心灰意冷離開中時

遭逢到關報的重大打擊後，我跟內人商量著辭職，但在她的勸說下，當時真不能沒有一些現實考慮，所以我沒有毅然決然地辭。直到後來另一件事情發生，就讓我決心辭了。

有一天，我打電話給我的老師許倬雲，他正從台北回來，講到他見了余先生，也談到關報這件事。許老師聽完余先生必須關報的心情後，就問余先生：「那你怎麼處理天瑞啊！當初你也交代這個學生給我啊，你打算怎麼發落啊？」他說，余先生在言談間說我到了美國「變左」了。

許老師並不覺得這樣，問他何以證明呢？余先生順口講：「天瑞還勸我去大陸辦報啊！」許老師問我：「你有沒有勸余先生去大陸辦報？」這話倒也不是無中生有，但要看當時的情境。在美國艱困辦報的環境下，有一次在一個「盍各言爾志」的情境中，我提到如果美洲中時辦好之後，希望時報能

到處開枝散葉，成爲全球華人的大報系，甚至哪一天到大陸去辦。那表示說我們可以影響得更多，更可以把我們辦報的理念發揚光大。

這完全是一種展望未來、抒發雄心壯志的情境，希望把這一步做好，未來遠景可期。在當時形格勢禁的環境下，這哪裡是所謂「勸他去大陸辦報」？那種同志交心、相濡以沫的氛圍，如今居然變成如此之「莫須有」！實在令人傷心。我當即對許老師說：「許老師啊，我決定辭職了！我不幹了！」回頭就跟我內人說，這回她支持了我的決定。

當下我就寫了一封辭職信，很客氣地感謝余先生，並謝絕了後來他要再助我入學的安排，也保證我不會去他不希望我去的「敵報」，我祝福中國時報未來繼續昌旺。我的態度很堅決、但是用詞很委婉、很客氣，所以余先生無法留我，也沒有張貼我的辭職公告，怕在時報內部引起震盪。

不過，十四年時報生涯的種種切切，早就不在我的計較之中了。此後的歲月，幾經周折，彌合了與余先生的關係，並時相往還，余先生還不時給了我關愛和幫助。齒牙漸長，對余先生、對時報所給予我的提攜與磨練，我終生感念；對當年有負余先生的期望，更有著濃重的負疚之心。所以在余先生二〇〇二年大去之後，我曾以〈負疚與感念——敬悼亦師亦父的余先生〉爲文追念。

在美國轉行投入保險業

辭職後，我放棄了哥大的入學許可，在美國開始拚生活，我婉拒了其他華人報紙的延請，曾打算開計程車，曾動念去《紐約時報》從copy boy做起，也開過洗衣店，最後投入保險業。我發現保險其實是一個有人文精神的工作，它關切每個人的生命，以及關切任何生命的流失所造成對家庭成員的影響。透過life insurance，可以避免任何家庭在發生這樣的意外的時候，造成生活上不堪的改變。

美國的保險業很上軌道，而且很專業，要考執照，要不斷上課。其實，歷史、新聞，以及保險都

有著共通的脈絡，只是做的東西不同，那精神是一貫的。從當中找到這麼一個道理，我能認同，於是投入去做，抱著使命感去做，唯恐別人在我沒有提醒到的情況下、在發生意外後，造成後悔。

當時剛好碰上公司的大型campaign，每個人都要設定一個大目標，這個大目標我一個禮拜就達成了。不到三個月後campaign結束，我是一年級生的第一名，我的manager因為我的業績，成為所有managers的第一名，而我們的agency則是全公司的第一名，以後經常都是如此。

不過，我對媒體的夢並沒有破滅。在我做保險之前，我就跟王杏慶、高信疆提議過我們三個來合作辦雜誌。因此我仍密切觀察時局變化，等待適當時機，希望有朝一日辦一份不會被查禁停刊的雜誌。同時，我們要拿自己的錢辦，才能保有雜誌的獨立性。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民進黨組黨成功，蔣經國沒有採取任何打壓，他接受《華盛頓郵報》採訪時，還說會考慮解除戒嚴。這就是時勢的苗頭。台灣邁向民主已是必然的發展，我強烈關心這事，而且準備為了將來的新雜誌，放棄我在美國已經擁有的事業，我的好朋友們都知道我這樣的心情。

終於王杏慶、江春男、胡鴻仁這些過去共事過的好伙伴都在摩拳擦掌，並迫切希望我回來合辦新雜誌。我說我一定回來，但是我要求：不能有任何財團政客的資金，必須是我們合作夥伴自己出的錢，這樣才不會被人家誤會我們是誰支持的媒體，這是很重要的原則。他們表示認同。這樣一來，我就向保險公司提出辭職。但我的老闆極力勸留，最後懇切希望我不要辭職，同意我以travel的方式來來回回。

返台開辦新新聞

於是，我在一九八七年二月回台北，三月十二日創刊《新新聞》，四月回到美國，六月又回台

北，九月又回美國，十一月又回台北……，那一年就這樣來來回回。我回到美國仍照做保險，同時替新新聞在海外發稿，台北的事就用電話聯繫。

可是，新新聞成立不到一年，我們幾個人湊的兩百萬元很快就花光了。新新聞營運上出現困難，因爲那時還沒有解嚴，而我們雜誌標榜揭祕性、內幕性、批判性，做生意的人不敢登廣告，怕政府查他們稅，也怕被抓小辮子。我們又沒有眞正組成一個team去做行銷工作，所以廣告進來得很少，不久就發生收支不平衡的問題。

我九月多回美後，他們開始減薪，十一月再回來，深感這樣下去不行。我認爲應設法開源而不是節流，於是找人開展業務、衝廣告，之後廣告才成等比級數翻上來。

我也正式辭去保險公司的工作，從此每一年去美國探親一次，四年後家人才搬回台北，穩住了新新聞。我覺得，即使在美國賺了很多錢，大家對我很重視，家裡也很開心，但這畢竟是一個小我、階段性的我，不是我生涯中想要追求的。在當時，政治新聞這一塊，基本上還是個禁地，沒有人敢碰，是需要由媒體耕耘的。如果我不去做它，我會後悔。

我看到時代來了，對於之前中斷了的媒體生涯，如果沒有延續，我會後悔；在台灣民主發展已經走到這個轉捩點的時候，我若裹足不前而沒有貢獻，我也會後悔；當這個路走下去可能爲台灣帶來一個新的言論市場、新的民主環境，而我可以在其中有所發揮，扮演很好的角色時，如果我沒有參與，一定會後悔。

因內部雜音離開新新聞

在我主持新新聞最初的十年當中，對於新新聞的發展，曾作過三個方面的努力。

第一，就雜誌方面而言，不能讓它只是純政治的。希望兼顧政治跟財經，形成政經雙主軸，才能走得長久。爲免在政治上的優勢會被其他媒體跟上來，必須不斷建構新的優勢，以符合廣大消費大眾的長期需求。

第二，我曾經作過兩次結合平面媒體和電子媒體的異業結盟，企圖擴大雜誌的事業版圖，向電子媒體進軍，改變影像媒體的傳播生態，以便在有線電視開放的時代順勢發展。

第三，我在一九九二年就已經洽談好跟大陸合作辦財經週刊。我認爲大陸要走的是台灣過去的路，因此在當地辦財經刊物絕對有遠景。

以上的任何一條路如果走成了，新新聞今天的局面一定大不同。但是，新新聞內部的想法並不一致。也許是我能力不足吧，我沒有辦法說服、影響夥伴們願意走上這幾條路。終於環境漸漸改變，新新聞又開始賠錢。我暗忖，是不是我離開才是對新新聞的幫助？如果我在，編務以外的事都是我在處理，夥伴們不容易明白，也不能體會，更難以改變；如果我離開了，他們必須直接面對，或能有助於理解，有助於改變。在這種情況下，我的離開反而可能是一種貢獻。

六年內轉戰各媒體

離開新新聞的六年半時間，我走了許多地方：前面的三年半，我先是參與環球電視台開台；一年之後離開，之後自己籌辦「天開傳播公司」；接著到《超視》、《自立晚報》、《勁報》等媒體；最後三年則在《中央電台》。在每個地方我都極力追求品質和效益。

這期間也是台灣媒體版圖大變動的年代，創立了許多新媒體，也有許多媒體黯然關門。政黨輪替也撞擊著媒體的內容和經營理念，而我親身參與了其中的一些變動，希望盡力找到最大公約數，將衝擊減到最小，並企圖再創媒體的明天。

2001年3月19日，代表中央廣播電台與美國之音（VOA）台長Standford Ungar簽約。（周天瑞提供）

我的天開傳播公司規模不大，但是經營得很好。馬英九第一次選台北市長的廣告CF就是我做的，沈富雄等「四虎將」的立委選舉CF也是我做的。後來超視總裁力邀我擔任副總裁，一上任就要幫他們解決裁員的問題。從一百三十個人當中要裁撤八十個人，責任很艱鉅，但我盡量考慮同仁的權益，尊重每一個人，並作出公平的選擇，最後沒有一個員工有怨言。

之後自立晚報易主，江道生禮聘我擔任社長。那時超視的股東層無法滿足經營上的需要，於是我便提出辭職，一心想把自立晚報這個老招牌做得更加有聲有色。

但不久自立晚報新的股東關係生變，江道生想另辦新報，於是退出自立，我也就結束了一個月差幾天的自立晚報社長職務。之後，便與江道生等人共創勁報——這名字也是我取的，但我看清很難長久合作共事，於是在二〇〇〇年總統大選後，辭離了勁報。

這幾個媒體在我離開之後，可惜都走上了結束或式微的命運，原因就不一一細說了。

在一個意外的機緣中，我被舉荐接任中央廣播電台董事長，這是我第一次經營廣播電台，國家級的多語言國際廣播電台，也是第一次進入公部門。在央廣的交接典禮上，我揭示了三個方向：第一就是平民化。我們不是貴族，也不是黨政軍特，更不是做官，為了電台好，要結合各方，以國家利益超越政黨利益；第二個是專業化。這個電台必須專業取向，提升專業能力，回歸媒體屬性；第三個，有效化。不是白播，不能浪費國家資源，要減少傳播干擾，達到傳播效果，塑造央廣的最大價值。

永遠在尋找最大公約數

我一邊致力於改革央廣的節目、人事與制度，但另一方面也面對政黨輪替後意識形態的轉變。例如，中央電台過去「自由中國之聲」這個台呼相當不合宜，必然會被迫調整，我不等別人講話，便主

自認始終在尋找最大公約數的周天瑞。（周天瑞提供）

動作了改變。

我的因應之道是用Voice from Taiwan（來自台灣的聲音），而不是Voice of Taiwan（台灣之音），同樣是「台灣的聲音」，但前者不會激起任何對立，又可以滿足各方需要。它強調了主體意識，可是並不會挑起敏感的台灣地位問題，不管政黨如何輪替，應該都能接受，因此可行之長久。

其實，我永遠在尋找最大公約數，在任何地方、辦任何事業、處理任何新聞，我都在找最大公約數。

我擔任一任的董事長後，因爲當局在新一任的董事會組成中，進行了複雜的政治和人事操作，撼動了我對央廣專業化經營的理念，讓我對續任興趣索然，就辭別了央廣。這三年我創立了央廣的嶄新風格，也對節目、人事和許多制度作了大幅調整。同仁都非常捨不得我的離開，時間愈久，愈能認同我當時在央廣的作爲。

其實，我大可以開展其他事業，不必再回新新聞。但新新聞創立的前十年當中我投入太多，不可能不理會新新聞的好好壞壞。因此在夥伴們亟盼我回新新聞的時候，我義無反顧地又回來主持了；二十年來不論什麼原因造成的影響，如今我都一無怨悔地概括承受。

目前的媒體處境雖然艱難，但我希望新新聞能夠好好活下去。新新聞的品牌創造不易，看看還能不能有機會，再次浴火重生。不論這次成不成功，我的新聞生涯一路走來，多元、豐富而精彩。在每一個關鍵時刻，我都自認足以對自己交代、對歷史負責。

◎初稿：陳珍禮
◎修訂：張錦華
◎定稿：何榮幸、周天瑞
◎訪問時間：二〇〇七年五月七日、十四日、二十一日
◎地點：台大新聞所攝影棚

戎撫天

戎撫天

〔第十章〕

解嚴前夕的主流媒體

一九八四年聯合報政治組召集人

前頁圖說：
接受台大新聞所「資深記者生命史」計畫訪談。
（台大新聞所提供）

解嚴前夕的兩大報政治記者，曾經存在一種既競爭又合作的微妙關係。一九八四年起擔任《聯合報》政治組召集人的他，正好見證解嚴前夕主流媒體扮演的某種催化角色。

他強調聯合報雖然立場保守，但並沒有控制他，因此他與《中時》黨政記者在每日新聞競爭關係外，還有一層推動民主改革的默契，「這次他跨一點（新聞尺度），下次我來跨一點……。如果兩報的政治觀點落差太大，跑在前面的人就很容易被攻擊，就會受傷。」在這種氣氛下，他相信「國民黨在民主化問題上的讓步，跟當時兩報的一致立場有非常大的關係」。

不論後代史家是否如此評價，他個人求新求變的特質在解嚴後卻明顯適應不良。他先到《首都早報》擔任總編輯，卻因為編輯理念、省籍問題等多重因素而受挫離開；在中時報系待了將近十年後，轉往電視台希望發揮更大新聞影響力也未能如願。他的坦率自我檢討，讓我們看見資深記者勇於迎接挑戰卻未必能夠突圍而出的真實圖像，也讓我們瞭解解嚴後媒體發展的部分重要面貌。

儘管他已準備充分接受訪談，但仍多次強調：「還有很多故事，我只講了十分之一左右……。」我們希望這本書只是起步，未來能夠挖掘出各領域資深記者的更多歷史見證與生命故事……

戎撫天大事記

1949 戎撫天出生

1971 退出聯合國

■1976聯合報政治組記者

1979 美麗島事件

■1984聯合報政治組召集人

1987 解除戒嚴

■1987聯合報採訪中心副主任

■1989首都早報總編輯

■1991中國時報副總編輯

■1992中國時報政經中心主任

■1994中國時報採訪主任

■1996中國時報執行副總編輯

■1999中時晚報副社長、東森電視台企畫部協理

2000 政黨輪替

■2001東森媒體集團主筆

■2003東森電視媒體集團副執行長

■2006遠東集團資深顧問、徐元智先生紀念基金會顧問

曲筆奮進迎向新時代

閱讀中產生正義感

我是軍人子弟，父親非常重視子女的文字教育。我大概六、七歲就開始閱讀，當時還不識字，是從看漫畫開始，看畫猜字，小學五年級開始投稿《國語日報》、《大華晚報》兒童版及教會刊物。父親鼓勵我寫作，每當拿到稿費就會再給我一倍的獎賞。在這樣的家庭環境長大，對看報紙、閱讀都非常有興趣。

我想可能是看報紙看多了，所以很小的時候就從閱讀中培養出一種社會正義感，覺得這個社會有很多不對的地方，要把它講出來、寫出來，而報紙是最有效的一個通路。

記得在考桃園初中聯考時，主辦學校動了一些手腳，想留一些成績比較好的學生下來。級任老師覺得有問題，果然追查出一些總分登錄的弊端問題。一時之間，群情激憤，可是主辦學校置之不理，大家都不知道該怎麼辦。後來有一天報紙登出來了，主辦學校態度立刻轉變，同意重新分發，讓我瞭解到報紙的力量。我從這個經歷開始，就想藉著報紙去做很多正義的事情；那時候起，我就想做記者了。

非念新聞系不可

大學聯考時，我以新聞系為優先志願，結果只考上文化德文系。我一進入德文系就決定轉新聞系，幾乎全盤放棄德文課程，天天跑到新聞系旁聽，並主動請見系主任鄭貞銘老師。鄭老師很鼓勵我，後來申請轉系時，因德文成績太爛，差點不能轉，還好鄭老師很支持我，跟學校討論後，破例收了我這個爛轉系生。

在新聞系念書的時候，接觸了一些進入媒體工作的學長。耳聞一些傳言，也曾經對新聞界一些風氣不滿。懷疑記者不是一個好行業，所以修了很多外系的課，像是歷史系的中國近代史、現代史等。尤其中國現代史由寫過《民國百人傳》的吳湘相教授執教，對我啓發很多。

畢業後考民族研究所，想博學一點。但在讀研究所的時候，曾去中視工讀，感覺到自己並不喜歡電視台的工作；確定自己還是比較喜歡文字工作，所以就去考《中華日報》當校對。

我持續努力要進報社當記者，我考的第一個工作是《中國時報》，筆試過關，但口試被刷掉了，我很不服氣。後來《聯合報》招考，就再去考，因為有中國時報的經驗，知道怎樣去準備，就順利考取了。由於我對政治、歷史特別有興趣，一進報社就自願當政治記者。

嚴格自我訓練

記者寫稿就像作研究一樣，不容許一絲一毫錯誤，一粒沙會使所有心血泡湯，所以我非常嚴格地自我訓練。基本上我不是天縱英才型的記者，從我進入聯合報第二個禮拜開始，我就常不坐在政治組的座位上，而習慣去資料室寫稿。一個原因是不願別人看出我寫稿時的焦慮樣子，另一個原因是在資料室很容易找到剪報資料，幫我掌握新聞背景。我寫文章一定先有一個架構，再依據架構找資料。讀

過資料以後，依據資料修改架構，然後才開始寫。

在聯合報前幾年，常常寫完文章，桌子前面一堆頭髮，因爲我一邊寫一邊抓頭髮，把頭髮抓掉了都不自覺，是非常耗盡心力地在寫文章。

後來我跑新聞的時候，其實心裡都會先有一個藍圖，預設應該要寫什麼題目。寫這些題目需要什麼材料，哪一些材料我可以在資料室找到，哪一些是我必須去訪問的，還有我要訪問誰等等問題，其實心裡頭都已經有規畫了，開始寫就很快。

我一定作筆記，每天訪問結束，一定立刻把要點記下來。很多採訪素材很零碎，不一定能成爲值得報導的新聞，但略微累積，常常會成爲意想不到的獨家頭條，記得劉國瑞總編輯好幾次在週末缺稿時跑來說今天沒有頭條，我翻筆記，組織整理一下，常常能夠製造出一條頭條新聞給總編輯。資料非常完備的時候，可以再製與整合，就會有好的內容出現。

而且我不斷地閱讀，讓自己不斷有新的思考，我也試著把書裡頭的東西放進自己的人生，得到很多收獲。

我從小就相信，要嚴格地管理自己。律己要非常、非常嚴。律己要從強迫自己開始，強迫自己洗冷水澡、強迫自己慢跑等等，久了以後，人就會變，就會習慣，習慣以後就會很容易做到了。

我的生活模式，受父親影響很深，他對於生活的要求很嚴格。我到現在還是每天早上四點半起床，四點半到五點半是我的閱讀時間，五點半到六點半是我的運動時間，冬天也還是洗冷水澡。

存在才有力量

我處理新聞的核心價值非常簡單，也非常重要。

第一是現場主義。任何報導要深入現場，要在現場觀察、採訪，不能用間接的方式去寫或處理新

聞。

第二個是平衡主義。就是當接受一方資訊的時候，一定要去找相對的意見。這不只是訪問甲，就一定要去訪問乙；還包括要找相對的資訊去閱讀，然後自己要經過思考。比方說要寫一篇主張開放黨禁的文章，必須要從兩個角度去思考：開放黨禁跟不開放黨禁。要做到自我平衡，寫出來的東西才會平衡，單一觀點跟單一角度，我覺得都不可取，不是新聞專業人應該做的。

第三個是我自己堅持的原則，我覺得蠻重要的。這個原則可能不是解嚴後才投身媒體的人能夠體會的，我體會也遵循這個原則，就是「存在才有力量」的原則。記者一定要站在舞台上，才能夠產生作用。

第四個是與人為善。我執筆時從不過度批評事情或人，這跟我的做人風格有關；解嚴後我擔任媒體管理職務，這個原則曾造成我與很多工作夥伴理念上的落差，但我依舊堅持。

在聯合報站穩腳步

我剛進聯合報實習時，跟顏文門跑立法院、監察院和國民大會。後來他叫我專跑監察院，我到監察院很短的時間，就替報紙立了一個大功，就順理成章地留在政治組了。

那次表現，讓我更覺得記者是一個非常有魅力的工作。當初顏文門耳聞監察院一件司法黃牛案，要我去查。據說當時有幾位監察委員去法院關說一個囤積案，在物資管制的時代，囤積特定原料是犯罪行為。一位商人因囤積塑膠原料遭移送法辦，並羈押在看守所。包括當時監察院副院長及幾位監委趁機聯手向法院關說。

我東問西問，被我找到當事人的太太，是一個日本人，會講國語。我查到她的住址，跑去她家按門鈴說我是聯合報記者。那位太太很緊張，找了管區警察，說有人騷擾她。後來警察來了，那位太太

因爲要跟警察講話，也見到我。看到我以後，她大概覺得這個年輕人不是壞人，就願意跟我談，她把這整件事情的前因後果都講清楚，指控這位副院長及監委們形同詐欺。那時候已經晚上十點多了，我把當事人的話全部寫了出來，第二天報紙就做了二版頭條。

那個時候我覺得是在伸張正義，所以也沒有去作平衡報導。我認爲當事人都已經指控了，一定是真的，就報導出來了。當然鬧得天翻地覆，最後司法黃牛案三審定讞了，但由監院職員扛了責任，刑不上委員。那個新聞，聯合報持續報導了一個禮拜，中國時報一直要跟，但跟不上。在戒嚴時代，指控中央民代貪瀆是很重大的新聞，引起社會極大的重視。這一仗也讓我在聯合報從此立足。

調查局來聯合報查原稿

大概一九八三、八四年時，我在聯合報跑黨政新聞，當時的黨就是國民黨，當時政策會祕書長是趙自齊，副祕書長是梁肅戎。趙自齊是座談會派，是保守派；梁肅戎是CC派（國民黨內以陳果夫、陳立夫兄弟爲首的派系）的人，支持民主理念。兩人一正一副分居不同派系，有很多衝突。梁肅戎曾擔任雷震的辯護律師。當時一、二審法院隸屬行政院司法行政部管轄，民主派人士都主張法院應回歸司法院管轄。他主張審檢要分立，使行政系統不能夠干預司法；他也反對嚴重侵犯人權的檢肅流氓條例。該法授權警察得不經審判，逕行將嫌犯交付管訓。座談會派跟行政院、政府的關係比較深，是主流派，是護航派，當然打壓他。

我一直跟梁肅戎比較接近，因爲我比較同情他，也比較支持民主人權理念。有一次，有一個很小的人事新聞，梁肅戎給我獨家。我那天正好有事，未回報社發稿，就打電話請一個同事幫我發這條新聞。第二天趙自齊看了大怒，要追查洩密。趙自齊叫警總查辦，警總就叫調查局查，調查局竟然直接進報社調原稿（當時全部是手寫稿，可憑筆跡追責任）。

筆跡不是我的，趙自齊本來大概想一定會逮到我，如果是我的筆跡就可以逼我透露消息來源，就可以修理梁肅戎。結果筆跡不對，他沒有辦法興風作浪。

這件事讓我很震撼的是，調查局竟然可以直接進入報社調原稿，我非常反感，那完全談不上是國家機密，只是政策會一個小小人事案。我一方面很不服氣，覺得國家怎麼可以容許黨工藉公權力行派系鬥爭？我對報社也非常埋怨，可是在那個時代，這類不滿也沒有申訴之門。

美麗島事件尋求眞相

在聯合報時，歷經「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民進黨成立，這些事件都對我造成非常大的震撼。很多事情到現在還眞相不明。當然每個人都有一些猜測，可是猜測到底是不是眞相，也沒有辦法證實。這不是歷史可不可以原諒或可不可以遺忘的問題，而是眞相是非的問題。

美麗島事件發生時，報社派我去現場採訪。我訪問了現場很多商家，詢問當天的情況。訪問後，發現果然跟政府的說法有很大的差距。不過，那時我還沒有能力去把整個事件組織起來，只能夠片段地訪問，再依據片段的訪問去拼湊。可是那樣一個很簡單、很粗糙的拼湊，都很清楚地證明政府的說法有許多是不對的。

從結果論，國民黨的解釋也不能講完全不對，因爲國民黨要維繫政權，黨外是要推翻政權。爲了維繫政權，它必須做一些事情，而且當時台灣跟大陸之間，還是完全敵對的關係，是一個有你無我的鬥爭，政情安定是重要的價值觀。

那時候顏文門派我去採訪，直接交代只是去瞭解，看看什麼是事實。我也知道是不可能寫出來的，所以我去的時候也沒有打算要寫成新聞。反正在那種氛圍之下，寫了也不會登出來，自己也知

道。所以回來只跟顏文門和採訪主任口述我的現場查訪結果。

報紙登出來都是根據跑國民黨、調查局等單位提供的資訊，報紙只刊登官方發布的訊息；報社的政策非常清楚，那個環境下，這些事情都是非常明確的，沒有人會去挑戰、討論或尋求突破，不認同的人就會離開。

江南案接受黨外觀點

對我衝擊最大的，是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和江南命案。

前兩件命案是個大黑箱，真相不明，我跑國民黨新聞，接觸到的資訊，百分之百都是來自國民黨的資訊，當時黨外雜誌已經很多，我也看黨外雜誌，知道有一些說法和國民黨不一樣。我一直沒有辦法決定應該相信誰的說法。

我自認很專業，所以我盡量要求自己去超脫、不要被資訊來源控制，所以我會努力地去拼湊，想辦法讓自己作獨立的判斷。可是老實講，當時實在沒有辦法判斷。看起來官方講得也有道理，黨外雜誌上的敘述，也有其可能性，我不敢下定論。

但我後來開始全盤接受黨外的說法，是源自江南命案。江南命案是在美國發生的，案件有很明確的調查及審判，事實就沒有辦法被遮蓋了。

江南命案剛發生的時候，國民黨政府與文工會都有很多說法，一開始我也相信，可是後來抓到凶手，真相完全沒有辦法隱瞞。國民黨既不能控制案情發展，更不能控制美國媒體；台灣的媒體大幅引述美國媒體的報導，真相大白。那時候我才真正開始相信，真相絕對不是執政黨一家的說法。

江南案後，我開始全盤接受黨外的觀點，國民黨真的說一套做一套。

拒絕參加政黨活動

當時報社對於同事去參加國民黨革命實踐研究院訓練，不但不禁止，而且還給公假，視爲公務活動，很多記者熱中參加，因爲將來可能有機會進入政府或政黨系統，可是我從來不願意參加。

我把我的角色界定得非常清楚，而且對自己的要求很嚴格，所以刻意不參加任何政黨活動，也刻意讓自己抽離出家庭及個人的政治背景。尤其在處理新聞時，我會很清楚地告訴自己，現在是記者的角色，不是個人的角色。

當時，不參加政黨活動其實也還好，不會有人要求你一定要如何，個人可以自由選擇，不會被強迫。現在的媒體及媒體工作者似乎已失去拒絕表態的自由，這是媒體工作者深沉的悲哀。

不過，在戒嚴時期，身爲政治記者，我的稿子自然是由政治組召集人審查、打考績，編輯大爺決定採用與否，慢慢自然會很清楚知道可以寫與不能寫的界線。報社也常會有傳說，誰是調查局臥底的、誰是國安局臥底的、誰是警總臥底的，可是也沒有任何人能夠證實，那些人看起來也不像有生殺大權。好在我只需對主管負責任，所以這些也不會構成壓力。

曲筆與「埋地雷」

有人說我當時是以「曲筆」方式寫作，其實我從來沒有想到曲筆這兩個字。我只是想，怎樣在那個環境之下讓我的文章出現，能夠產生影響力。所以我會改變用字遣詞，讓文章用一個比較容易被接受的方式呈現，以環境所能接受的方式包裝我的想法。

戒嚴時期，媒體確實受到非常多限制，政治體制需要改造，但我相信「存在才有力量」，必須讓自己存在才有影響力，激烈的對抗或者離開都是錯誤的。所以，我的表達方式，是在限制之內，以對

方能夠接受的方式達到傳播的目的。

記得在聯合報有一年得到模範記者獎，獎杯上的提字是「義正辭柔」。我的曲筆不只是對政治、對當道者是這樣，其實我在處理任何新聞，都是用義正辭柔的方式，也就是曲筆的方式。我覺得這跟我的個性有關。我跟別人談話或溝通時，不太會直接反對，都是用比較間接的方式來表達我的態度與看法，我通常都會用一個對方比較容易接受的方式來溝通與表達我的意見。

比方說，要主張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在國民黨自己還沒有作出決定之前是很敏感的問題，或者是根本不容許碰的題材。有時候我就會換個方式寫，像是指出一個沒有戒嚴令的國家會是怎麼樣，或者我們在寫立法院的亂象時，就分析爲什麼會有亂象？是因爲長期不改選等。這是反過來寫，不直接去寫應該要解除戒嚴、國會全面改選，但是，可以寫戒嚴所造成的問題，或是國會不改選所造成的問題。當時很多記者也都不斷地在做這樣子的努力。

當時這種事情太多了。有時候會跟別的記者開玩笑，問今天有沒有「埋地雷」？總編輯有時也開玩笑說：「今天我很忙，沒時間挖地雷，你千萬不要給我埋地雷啊！」所謂埋地雷，就是用比較隱藏或間接的方式表達敏感的話題或意見，讓主管因未注意而過關。現在回顧當時埋地雷的作法，其實也蠻阿Q的，因爲主管如果都看不出來，要讀者看得出來是更困難的。自己知道這個地雷，可是未必別人看得出來。

與「敵報」合作推動民主化

大概一九八六年，要不要解嚴、開放黨禁、全面改選國會？國民黨立場還在搖擺，蔣經國也還在觀望。那時，我的文章都一直是比較傾向支持民主開放，支持改革派。聯合報立場雖然保守，但並沒有控制我，國民黨也沒有給我什麼壓力。因爲我跑政治新聞，國民黨的人接觸非常多，報社也信任

我。可以寫到什麼程度，我可以掌握，報社也完全信任我。

我會去試探，就像把手伸到溫水裡，看燙到什麼程度才會燙到手。我不斷去找尋那條界線，然後想辦法跨界線。我想，當時很多媒體工作者，都是這樣試探界線。這一次我稍微過一點，看看會有什麼樣後果。如果後果不嚴重，這就是我現在的底線了。下次有機會，再去試探，再想辦法跨一點。不斷試探、不斷跨越，慢慢地跨，但一定有進展，新的領域就衝出來了。當時我採取的策略是這樣。

當時，我跟中國時報黃輝珍有很好的互動和高度默契，我們在很多新聞事件後，都會交換意見。我們有一些基本的共識，這次他跨一點，下次我來跨一點。基本上，當時聯合報跟中國時報政治新聞的立場與觀點不會有太大的落差。如果兩個報紙的政治觀點落差太大，跑在前面的人就很容易被攻擊，就會受傷。我相信國民黨在民主化問題上的讓步，跟當時聯合報和中國時報的一致立場有非常大的關係。

比方說，我是最先知道蔣經國要解除戒嚴、開放黨禁、開放報禁的記者，我有把握時就會率先獨家報導。照當時媒體惡性競爭的作風，對方可能會想：你寫這個我就反向操作，我就講說你寫錯了。可是黃輝珍絕對不會反向操作，他還會再加碼，再加碼以後，情勢就更穩定，反對改革的力量就失去著力點。整個社會氣氛就是非要解除戒嚴不可了。社會情勢又反過頭來給國民黨壓力，讓國民黨必須去落實，要眞的去解除戒嚴。

記者的使命感

當時的政治記者普遍都有一種使命感，就是應該推動民主化，同時，也會跟改革派的政治人物結合。像梁肅戎在立法院要廢除檢肅流氓條例（當時警察機關有權將流氓直接送管訓，不經法院審判），或者審檢分立（審檢部隸屬行政院管轄，指審判系統應與檢察系統分立），他會跟媒體談，希望

媒體支持。我們當然就支持他。媒體支持這個法案，對國民黨會造成壓力，對法案的通過有很大的幫助。

那時社會上已有很強的民主化共識，不同系統的媒體扮演的角色也不同。我在聯合報，黃輝珍在中國時報，我們所扮演的角色，跟自立晚報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樣的。而自立晚報扮演的角色跟黨外雜誌又不一樣；黨外雜誌扮演的角色，跟黨外運動又不一樣。所以它是一層一層的，層層綿密互動，共同鬆動國民黨的威權體系。

從黨外人士推動黨外運動，以群眾力量及選票壓迫國民黨改革，到聯合報、中國時報比較制度內的推動，我認為都是重要的。顯示整個社會已有高度共識，等於社會中百分之九十的力量都是在推動台灣往民主的方向前進。主流媒體提出改革主張，國民黨就更難以拒絕。

事實上，國民黨當時的威權力量，是可以摧毀任何反對團體的。可是他不敢殺黨外，就是整個社會，包括聯合報、中國時報這樣的媒體都有此共識。蔣經國決定解除戒嚴的基本原因，就是因為社會對推動民主化已有共識。

李登輝當副總統獨家新聞

獨家是記者專業生命的源泉，要獲得獨家新聞，除了勤快，還要能夠掌握政治結構。一九八四年，第六任總統任期即將結束。蔣經國續任總統態勢明朗，政壇關注的焦點是副總統人選。謝東閔副總統續任？或是省主席林洋港、台北市長李登輝、司法院副院長戴炎輝？還有一種主張是由外省人擔任副總統，停止蔣經國的「崔台菁」（當時形容提拔吹牛的台籍青年才俊）政策（諷刺蔣經國拔擢台籍才俊）。

在當時環境下，內幕新聞是絕對不能見報的，尤其人事新聞，常會「見光死」。所以，報紙嚴禁

洩漏人事新聞，當然也不一定是政治壓力，主要是因爲對不起當事人，把他的官丟了，所以記者也很節制，除非確定不會見光死的才會登。

當時政情混沌不明，蔣經國將走向更威權？或開放？無人知悉。副總統人選有很重要的指標意義，當然是非常重要的新聞。我很早就開始設定要去「摸」誰是副總統，所以我先作了一個分析，列出蔣經國可能諮詢的人選名單。我記得我列了行政院長孫運璿、國民黨祕書長蔣彥士、立法院長倪文亞及法務部長汪道淵。其中我唯一可以訪問到的是倪文亞院長，他是我唯一有的機會。

可是這個機會太困難了。後來我就從這幾個人週邊去發展關係。比方說，俞國華信任誰、蔣彥士信任誰，終於被我找到一個人。他做過法務部長，且和當時的司法院長汪道淵交情非常好，汪道淵經常諮詢他的意見，就是王任遠。於是我鎖定倪文亞與王任遠兩人。

王任遠不是現任官員，與我接觸較無顧慮，加上他始終希望能夠復出回任部長，他也很好奇誰會做副總統，所以我們經常交換資訊。有一天我去訪問倪文亞，談立法院，天南地北聊，聊到一半他突然插出一句話說：「我看李登輝的前途比林洋港要好。」然後又講回原來話題。訪問後我作筆記時愈想愈納悶。我心裡頭一直想這句前後不連貫的話，是在暗示我什麼嗎？

接著，我去跟王任遠聊天，跟他講這一段。我說倪院長不知道爲什麼突然告訴我李登輝的政治前途比林洋港要好。王任遠聽後思考數秒，突然擊掌說：「對了！副總統一定是李登輝。」他說他聽汪道淵院長講，副總統「結構不變、人要變」。所謂「結構不變、人要變」是指省籍人士當副總統的結構不變，但人選要變，把倪院長和汪院長的話結合在一起，就是李登輝了。

我立刻回頭找倪院長，我說：「我知道副總統是誰了！」他問：「是誰？」我說：「副總統是李登輝。」他神情嚴肅說：「我沒有告訴你喔！」我立刻知道，百分之百確定是李登輝。

上、下：民國七十六年兩次訪問行政院長俞國華（下圖右後方站立者爲當時新聞局長邵玉銘）。
（戎撫天提供）

迂迴呈現人事新聞

我立刻回去跟聯合報董事長王惕吾報告。王惕吾聽了半信半疑，答應幫我打聽，過了一個禮拜，才確定是李登輝。當然那時候不能寫。我在「摸」的過程中也經常去找謝東閔，想從謝東閔探探看。可是謝東閔給我的感覺是，他認爲他還會連任。等到我知道不是他的時候，他還是懷抱希望，我實在不好跟他講，所以就沒有再去找他了。

國民黨中全會要決定人事的前一天，還是不能發表我的獨家新聞。當天，我發了兩個稿子，二版頭條是謝東閔請辭副總統，用間接的方式爲他保留顏面。然後寫一篇李登輝的人物，完全沒有講李登輝要當副總統，可是有人會看得懂。

謝東閔未經諮詢就被蔣經國撤換，他不是沒有情緒，他還提了一些與實踐大學校地有關的下台條件，但我的新聞處理方式，他知道我是好意。後來幾年，他對我始終非常友善。在那時候，跑敏感的人事新聞，其實還要有想像力，並且要運用一些迂迴策略。

當時包括我們報社內部，有的同事都不以爲然。認爲我是在豪賭，覺得我被誤導，很多人眞的不相信以李登輝的資歷會成爲副總統。公布以後，他們才相信我眞的是權威。從此以後，起碼在聯合報政治組沒有人懷疑我的消息了。

之後，我又寫俞國華奉命組閣及內閣名單的獨家新聞。我記得內閣名單中只有蒙藏委員會主任委員的名字錯了，其他都是對的，當時也引起政壇及記者圈的震撼。

處理解嚴新聞

不過，我最大的獨家新聞，其實是報導蔣經國要成立小組規畫解除戒嚴與黨禁。這方面則牽涉到

聯合、中時兩大報的不同文化。

戒嚴時期，很多人講聯合報政治立場比較保守。但我從來不接受這句話。我在聯合報做政治組組長的時候，聯合報對民主運動的呼應跟支持，不比中國時報要少，甚至有時候還超過中國時報。這包括一些長期的觀念的提倡。比方說，我們很早就主張要廢止流氓條例和審檢分立。像這些民主化過程中，必要的政策措施及改革，我們一直是堅決呼應和支持的。

不過，我們當時並未積極主張解除戒嚴和開放黨禁，因爲我們認爲還沒有那樣的環境。可是大家心裡都知道這是遲早的事情，所以我手上也準備很多有關開放黨禁、開放報禁、解除戒嚴的資料。

後來我掌握到訊息，蔣經國決心推動民主化，要解除戒嚴、開放黨禁，我在第一時間就搶登出來。當時，報社還有些猶疑，我說服報社信任我，因爲我相信只要報上登出來，就會促發無法壓制的社會期望，就可以逼迫國民黨眞正解除戒嚴。

不過，不可否認，王惕吾先生的出身、背景和理念，確實對聯合報作了很多限制。他是職業軍人，野戰部隊、警衛部隊的，跟官邸的關係非常深。中國時報的余紀忠先生雖然也是軍人，可是他受過大學正統教育而且到英國留學，基本上他是文人；文人性格使他不喜歡接觸類似王昇等政戰系統人士。跟王惕吾先生是純軍人、比較容易受到政治立場非常保守的政戰系統人士影響，余紀忠先生就比較堅持民主的理念。

兩大報文化差異

聯合報的組織文化，跟中國時報完全不一樣。辦公室座位的分配可以反映辦公室的權力結構，進入聯合報編輯部，第一眼就知道總編輯的位子，因爲一看就知道那是最有權力的座位。中國時報就不一樣，你很難找到總編輯坐哪，因爲是一堆腦袋裡的一個。事實上，中國時報最具權威感的座位，是

余紀忠先生的位子。

我在中國時報時，余紀忠先生每個禮拜最少會進編輯部四天。一進來就坐五、六個鐘頭以上。我在聯合報十三年，王惕吾先生進編輯部不超過十次，也從來未見指揮或指導編輯部任何工作，當然是透過其他方式指導。

可見聯合報是一個組織層級嚴明的單位。所有記者要對他的組長負責，組長對採訪主任負責，採訪主任對總編輯負責，總編輯很少直接找記者，更不要講王惕吾去找記者了。中國時報完全不一樣。

當時中國時報，大概有三分之一的記者是可以直接打電話給余紀忠老闆。余老闆也經常會找記者談，所以中國時報有一些記者，連總編輯都指揮不動，因爲他覺得可以直達天聽。聯合報絕對不會有這種情況。

這樣的文化當然對報紙產生非常重大的影響。聯合報的新聞，有一定水準，你絕對看不到任何一篇爛文章，都能維持一定的素質，可是也很難看到讓人拍案叫絕的好文章。中國時報一般的新聞，品質不如聯合報，但經常會有好文章讓人拍案叫絕，令人非常喜歡。

中國時報的組織文化可以培養出天才型的記者，能不受拘束，自由自在發揮，聯合報就沒有辦法了，因爲組織管理嚴厲，不願受拘束的天才都受不了而離開了。可是中國時報經常會看到一些爛新聞，文句都不通，那是因爲沒有很好的管理制度。聯合報的管理制度很好，基本的品質都能夠維持。這種組織文化的差異一直到現在都沒有太大的改變。

寫書差點被解雇

談到兩大報文化差異，其實，我在聯合報的第三年，曾經差點被王惕吾撤職，因爲我寫了一本禁書。

那時碰到一九七八年立法委員和國大代表選舉，我訪問了幾位新的候選人，很多是黨外人士。書還未出版，警總就查禁了，有關單位並向王惕吾董事長告狀，本來想開除我，但我的直屬主管力保，王董事長才作罷，但對我造成很大的陰影。我後來在處理有關黨外新聞時，會比較謹慎一點，比較顧慮報社的立場。

之後我跑立法院，表現很好，順理成章就做了政治組組長。之後又跑黨政新聞，當時的環境確實是在快速的民主化過程中，所以報社也沒有反對我的理念與寫法。

當然報社內有一些朋友覺得我衝得太快、覺得我不對，有時候聊天時會跟我討論。不過報社在政策上沒有要求我調整，也沒要求我改變，而且還蠻鼓勵的。

戒嚴時期，聯合報面對像國民黨文工會、總警、新聞局、調查局，甚至國安局、憲兵隊，都有一些很複雜的互動。據說宋楚瑜曾經要聯合報撤換總編輯，不過聯合報並沒有接受。新聞局、文工會經常以干預人事的實力要求總編輯或新聞主管，甚至記者合作。

那時候，不管跑什麼路線，記者個人受到高度的禮遇和尊重，但政治上的壓力也十分明顯。像中壢事件一發生，文工會就下令不准媒體報導。還有像戒嚴晚期，民進黨成立，文工會和新聞局也到處打電話交代不准登，所以報社只登「短欄」。

當時有人開報紙玩笑說，要看重要新聞，不要看頭條，要看短欄。因為通常不准登的，報紙會想辦法把它做成短欄。

被情治機關約談

整體而言，戒嚴時期情治機關跟媒體的關係，有三個層面。

第一是政治壓力，為了實現執政黨政府的政策或為控制環境，有些新聞事件不准登。

第二，有時候壓力來自情治機關搜集情報的需要，所以媒體也被當成資訊來源，希望從媒體知道一些政治動態。當時包括調查局、警總，都有人定期找我，目的是希望從我探得一些資訊。

第三種，是透過情治機關達成一些目標，像趙自齊爲鬥爭梁肅戎，找警總、調查局查原稿。情治機關跟媒體的關係是有很多層面的。

當時我自己也曾因政治而受到情治機關的影響，甚至還被約談過。美麗島事件後、立法委員選舉尚未恢復前，就是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〇年間，這兩、三年間，政治氣氛相當緊張，我也曾經被情治機關約談過一個晚上。其實我一點都不在意，也不會緊張。因爲我知道他們需要什麼，我知道怎麼跟他們相處，對我的安全不可能造成威脅。

當時記者有兩種風險：第一是情治機關壓力；另外一個風險也不小，就是反對運動的壓力。我曾經接過恐嚇電話、恐嚇信。還有一次我接到一通電話，自稱是一個游擊隊組織，聲稱要放置炸彈。我爲了瞭解他們的想法，約了他們見面。經過不少波折，見了面，我還想說服他們不要走暴力路線，應該走選舉路線。我們前後見了三次面，聊得還蠻愉快，後來也沒有發生政治炸彈事件。當時是有一些風險，但新聞是我的生命，爲了專業冒一些風險，對我而言是值得的。

離開聯合報

我在報禁解除後，接受康寧祥先生邀請，擔任《首都早報》籌備總編輯，因而離開聯合報。據說有一些長官非常高興，政治新聞版終於不必被我操控了，不必支持台獨派了。他們覺得我比較同情主張民主法治的人，比較支持民主運動。由於我離開聯合報時太過堅持，據說我走了以後，聯合報有一道命令，以後凡是未經允許離開聯合報的人，永遠不得回來。

當時行政院長俞國華、中央黨部祕書長李煥與參謀總長郝柏村等國民黨非主流派，雖然都掌握大

《首都早報》創辦人康寧祥（中）及主要幹部合影。（戎撫天提供）

權，但不可能與李登輝總統對抗。蔣經國驟然病逝，李登輝意外接任，他雖然掌握實權，但政治權力運作已經改變。台灣快速台灣化，我急迫地要作調整。首先，我選了兩位優秀的地方記者，調到多數不會說台灣話的政治組，因爲我擔心兩年後跑政治新聞都要講台灣話，才有機會得到獨家消息。

我自己更是一定要變，才有機會。民進黨大老、我在跑立法院新聞時很熟的康寧祥創辦首都早報，找我去當總編輯。我決定離開聯合報最關鍵的原因，就是我相信要去首都早報，才能延續我政治記者的生命。

當時的潮流趨勢已是本土化、台灣化，從李登輝接任時就已經很明顯了。有人批評我過度支持李登輝，忘了我是誰，我不否認。可是我覺得那是比較容易維持台灣安定的作法。這種大變動我看得非常清楚，我也選擇改變生涯規

畫，配合時代趨勢，而不是抗拒變遷。

首都早報栽培新人有功

首都早報對報業及台灣社會都有貢獻，首都早報曾經領風氣之先，推動幾項改革。

首都早報是第一個大膽用橫排的日報，當時我們有一群很好的編輯，作很多版型的研究，規畫中文橫排的版面邏輯，呈現新聞重點，後來啓發很多媒體改採橫版。

我也爲首都規畫了一套有效的新人訓練制度。以首都早報的物質條件，有經驗的記者不會投靠過來，但我們以「第一份台灣的報紙」爲號召，吸引了一群理想性格、剛從學校畢業的年輕人，藉著工作的實地歷練，訓練出一批非常優秀的記者和編輯。

首都早報是一個完全沒有限制的報紙，不像其他媒體會受到政治環境或組織層級的內部限制。因此，記者在首都早報可以自由發揮並得到專業的歷練；首都早報的年輕記者，比其他媒體的年輕人成熟得更快。

當時在中正堂的學運，別的媒體報導受到很多框框限制，版面、篇幅、照片都必需符合新聞比例原則。首都早報不受任何限制，率先用頭版頭條報導，並深度訪問學運領導人，深入報導了他們的理念，後來才引起其他媒體的重視，接著用愈來愈大的篇幅報導學運領袖。開放的環境培養出來的年輕記者，潛力可以有最大的發揮。許多首都早報培養出來的記者、編輯，現在都有非常好的表現。這是首都早報對台灣媒體最大的貢獻。

省籍問題選擇離開

不過，我接任首都總編輯前，原以爲可以辦一份眞的擺脫國民黨控制、眞實報導眞相的報紙，可

是後來發現其實沒有這個空間，這對我內心衝擊很大。

我過去一直認爲，省籍不是問題，可是到首都早報以後，受到很多這方面的壓力，我也被逼迫作很多調整。市場及股東的壓力迫使我對很多新聞專業堅持不下去，所以首都早報到第二年就完全變成一份非常鮮明的黨外報紙。

我是眷村出身的外省人，幾乎是報社唯一的外省人。很多人堅持對我講台語，對我很多觀點也完全不同意。一開始，我還強勢堅持我的一些觀點。可是後來他們問我，把首都早報辦得像聯合報，能站得起來嗎？於是，我改變了想法，同意首都早報一定要跟聯合報不一樣，才能夠在市場上生存。

當我接受這觀點以後，很多事情就必須讓步。我還滿痛苦的，覺得在辦一份自己都不相信的報紙。雖然我仍然認爲自己的生涯轉變、我的人生大策略是對的，我應該去首都早報接受這樣的歷練。不過，衝擊實在太大，我已無法負荷。

衝擊是來自許多層面。一方面是媒體生態的不同。我原本跑國民黨新聞，面對的是聯合報這個外省企業，幾乎百分之百內化了國民黨的文化，跳到首都早報後，面對一個完全不同的政治生態和背景。譬如，聯合報企業文化追求下對上的服從，同儕相處講究和諧，避免對立與公開的競爭。首都則充滿黨外文化的元素：衝突、對立、競爭。前者暗鬥，後者明鬥。其中並無對錯褒貶，但文化確實不同，適應不易。另一方面，這也是我個人能力的挑戰，我原本是政治組組長，以處理新聞爲主。但是，到首都早報當總編輯，則要處理所有的新聞、言論、業務，也就是要領導編輯部三百多人的團隊，讓我感覺非常吃力。

我感到很大的挫折，最後，我選擇主動離開總編輯的位子。顯然我跟整個首都早報的環境沒有辦法調和，發行跟廣告也一直沒有辦法擴展，對於新聞內容也逐漸喪失專業的堅持。同時，我對一些人際關係也處理得不夠成熟。所以，我真的感覺做不下去，因而掛冠。我在首都早報的經驗真的蠻失敗

的。

首都結束後，老長官張作錦先生推薦我到《遠見雜誌》，但我不能忘情報紙，幾個月後，中國時報爲我打開窗戶。

中時報系轉往電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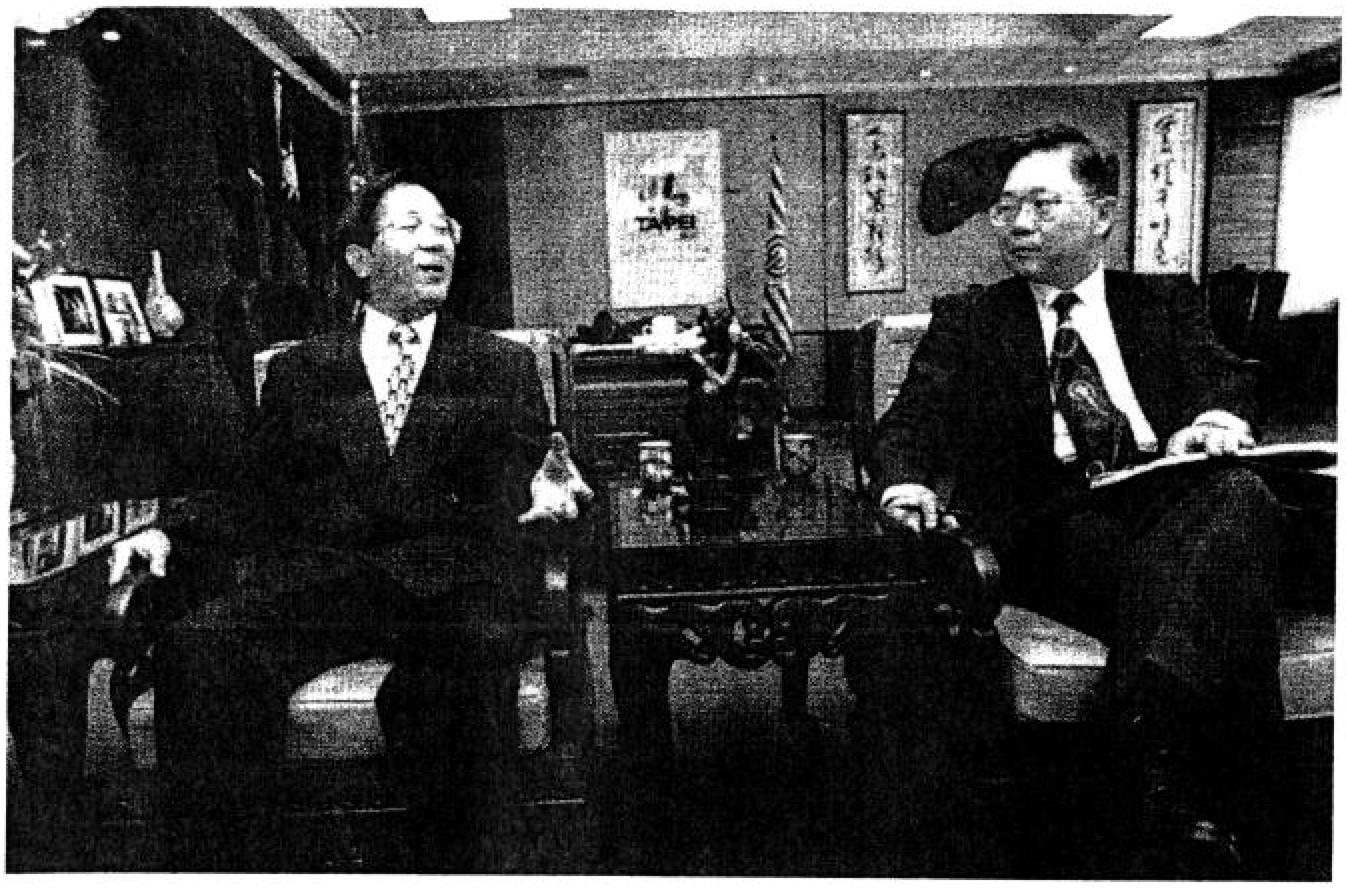
我在中國時報將近十年，歷任採訪主任、執行副總編輯後，轉任《中時晚報》副社長，但從一九九六年開始，就動念想投入電視。那年發生桃園縣長劉邦友命案。

當時有線電視新聞台剛出現。有一天，我打開電視，非常震驚。SNG車就在縣長官邸的命案現場直播，很多檢察官和刑事人員在調查中接受記者訪問，說明已掌握的案情並推論歹徒犯案過程與動機。

我從早上起床，一直看到下午兩點才去報社上班。每天三點鐘開編前會議，各部門的採訪記者會針對今天的採訪內容作提報。接著討論哪些新聞是重點，需不需要配合採訪及版面的大體規畫等。當天我就感覺報紙可能會被有線電視鯨吞蠶食，因爲所有稿單內容，都已經在電視上播出，誰還要看報紙？

因應電視的衝擊，我在報社跟很多同事討論，曾經要求版面大改革，認爲報紙應走向雜誌化，提供整理過、較有深度的訊息，並且需要提供評論與意見。中國時報當時很賺錢，充斥著驕傲自得的氣息，改革很困難，後來也沒有具體成效。

但我還是認爲，電視新聞將替代報紙成爲主流。這個感覺非常強烈，跟當初李登輝繼任總統後，我認爲台灣政治結構會完全改變一樣。我認爲應該迎接挑戰，加上我在中時報系的發展遇到了瓶頸，與余董事長的任用信賴關係也發生動搖，所以再度離開報紙，到電視媒體發展。



上：陳水扁總統於台北市長任內接受訪問。

下：在家中設宴接待時任台北市長的陳水扁總統。除家人外，其餘皆為《中國時報》同事。（皆由戎撫天提供）

東森電視失敗經驗

但很遺憾地，東森電視而言，又是一個失敗的經歷。

我進入電視領域已將近五十歲，進去的職務又太高，所以沒有學習操作層面的機會。譬如我製作專題，新聞部要派攝影，還要派資深記者協助，因爲資淺記者還聽不懂我說些什麼。以我的資歷及職務，新聞主管不便要求我自己剪帶、過音。處理電視新聞，永遠隔了好幾層。當然我可以判斷新聞的好壞，可是沒有辦法準確掌握製作過程。因此，也不容落實管理。

其實，一定要親自操作過、摸過攝影機、製作過帶子、配過音，才會真正瞭解電視這種影像媒體。我蠻遺憾一直沒有去第一線學習這些東西。如果提早十年到電視，年齡較輕，職務較低，情況會完全不一樣。

在東森，我只懂新聞，不懂電視，所以總是用報紙的新聞邏輯來思考電視，但平面新聞不需要畫面。對電視而言，畫面卻是新聞精彩與否的關鍵，甚至可以說「沒有畫面就沒有新聞」。進入東森初期，我對這一點完全不夠理解。我的問題是，我對自己的新聞觀太過自信，未能體會「隔行如隔山」的道理，也不懂得「聆聽」及「請益」的重要，新聞台年輕主管們不知如何與我溝通，慢慢我就變得孤芳自賞了。

另一方面，由於政府開放有線電視並未經過完整的規畫，驟然無限制地開放有線電視頻道，市場突然出現將近一百個頻道，電視頻道生態由壟斷到無限制開放，政府並無循序漸進的策略規畫，造成有線電視生態嚴重的問題，惡果延續至今依然無解。

由壟斷到無限制開放最嚴重的問題是人才不足。當時有經驗的電視新聞人在老三台待遇優渥，除非個人有特殊原因，否則不會跳槽有線台，造成有線新聞台人才難覓的困境，加上東森草創當初，沒

有幾個人對力霸及王令麟辦電視有信心，人才更難尋覓。東森新聞創台主要主管，一個是無線台社會記者，一個是無線台攝影記者，年資都非常淺，使新聞台初期規畫犯了一些戰略性錯誤。

其實，台灣所有的有線新聞台都有類似問題。全世界沒有任何國家的有線新聞台採無線電視新聞時段的模式規畫內容。無論CNN、BBC或NHK的新聞台，每日最多四或六節新聞，其餘時段均播出新聞性談話節目、紀錄片或其他新聞節目。台灣的有線新聞台則全時段播新聞。而新聞全部靠現場連線及新聞播出帶（SOT）等堆積而成，平均每節大致需要播出六十則以上。每日播出十九個小時新聞，就需要約一千則新聞。合理而言，每組記者（文字加攝影每一組兩人）每日宜供應兩則新聞，尚可以符合一定的專業要求。換言之，每個新聞台需要五百組記者，加上編輯、工程、後製、管理，一個新聞部需要兩千人以上，其成本可想而知。各有線新聞台只得因陋就簡，因而新聞重複、SNG車浮濫、新聞製作粗糙、記者工作量過度沉重、新聞零碎化等問題全部湧現。加上過多新聞頻道追逐過少的廣告收入，廣告代理商及廣告主又陷入收視率調查幾個百分點、甚至百分之零點幾差距的迷思，造成當前台灣媒體生態種種亂象。

我深知這種亂象如不導正，將不只是媒體亂，更是國家社會的亂。可能因爲我是政治記者出身，長期以來都以天下蒼生爲己念，我也以「使命感」的角度思考東森新聞的發展，堅持做「純新聞」、做「有新聞價值的新聞」、做「有內涵、有知識的新聞」。

不過，我們的新聞主管把新聞頻道當成娛樂頻道經營。他最常說的是「這個新聞好不好看」，而不是「這個新聞好不好」。後來，我試著妥協，我自己做一些有深度的東西，讓新聞台多少有一些純新聞。

因此我帶記者作很多規畫。那時大陸連續很多年、大規模的發動東山島演習。一九九六年飛彈演習後的第二年，我針對東山島演習製作深入的專輯。我帶領一個文字記者和一個攝影記者總共做了六

集，訪問了軍事專家、戰略專家、國際關係、大陸事務等將近二十位第一流的受訪者，品質非常好。不過播出後，東森主管卻說：「每次播到你這則新聞，收視率就掉下來。」另外一個他沒有說出來的原因是成本太高，他不願意再作這一類型的新聞。我無能為力，就轉跑道做新聞節目製作人。

擔任談話性節目製作人後，又發現我想做的談話性節目跟電視台想要的有很大的落差，成本觀更是不同。於是，我慢慢地變成以幕僚工作為主，最後完全脫離新聞工作。這也是我後來離開電視台的原因。因為既然在電視台工作又不能做新聞工作，那麼到企業做幕僚，有何不同？

我覺得在東森最大的失敗是，當初在跟新聞部主管有不同意見的時候，我應該更堅持，而不是選擇沉默。

不過，如果離開新聞的角度，我在東森七年生涯，可能是我職場三十年成長最快速、心智最成熟的階段。工作雖然忙碌，但我大量閱讀，積極寫作，與學界人士來往密切（終於遠離政界與政客），為我的職涯新階段奠定了紮實的基礎。

接受潮流而非抗拒潮流

回顧人生重要的決定，雖然充滿失敗的經歷，但我還是很高興作了這些選擇，因為基本判斷都是正確的。我接受潮流，並迎接潮流，尤其台灣化的潮流，即使大多數朋友都不同意我的看法，認為人應該改變潮流，創造歷史。可是時間證明，任何人再努力，也沒有辦法抗拒或改變潮流。

我常常跟很多同事討論未來趨勢，像是面對電視化或網路化時代來臨，報紙要採取什麼行動？不過很多人覺得我想太多，到現在還有很多朋友勸我不要想那麼多。可是我覺得，這些思考是有必要的。

人生就是一個階段與一個階段的發展，我不會後悔經歷過任何一個階段的選擇，就算是失敗經驗

也一樣。個性讓我願意面對新潮流並突破挑戰。如果再給我一次機會，我還是會作一樣的選擇。不過，我可能會改善工作技巧，學習管理及溝通的know-how，尤其在首都早報和東森新聞台的階段。

我在聯合報是很成功的記者，到了首都早報仍以記者的眼光處理總編輯的工作。更糟的是，我仍企圖複製成功的經驗，我還是太堅持、主觀、驕傲、自大與唯我獨尊。如果當時能夠很快地轉換態度與行事作風，學習領導技巧，也許可以做得更好。

在東森，我的平面經驗跟電視媒體中間落差太大。我對過去的工作太驕傲。如果當時有機會學習操作與瞭解電子媒體，也許可以更快速地適應電視台的環境。

不怕面對挑戰的人生

我一生奉行的閱讀習慣，使我對媒體的未來累積敏銳的感覺跟判斷。

像看完《長尾經濟》，我就知道WEB2.0將對媒體造成很大的影響，互動式、由閱聽大眾自製新聞（類似維基百科）的新媒體時代已經到了。報紙開始刊登由民眾持手機拍的搶案現場照片，就可以清楚看到未來趨勢。未來業餘的群眾力量是很可怕的，網路上業餘的專家會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所謂「新聞專業」將必須真的非常、非常專業才能生存，一般性的記者及媒體都會被「業餘人士」及業餘人士辦的媒體淘汰。

媒體市場會自然淘汰，社會將M型化，將來會有少數品質非常好的媒體，占有很小的市場。很大的市場，是由業餘人士製作，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娛樂性質。

我認為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四家報紙可能合併成一家，或其中一家存活下來，變成很好的報紙。娛樂型報紙一定會被網路業餘報取代。一家質報可能只有五、六十萬銷量，但閱讀人口教育程度高、影響力高，可以吸收到很好的廣告，應該可以賺錢。有線新聞台也可能

合併成一家很好的有線新聞台，但觀看人數也很少。多數人口會從網路或部落格滿足資訊需求。

我覺得，我跟潮流一直是一起往前走的。我在戒嚴時期創造與堅持的專業方法，是在用自己的方式，配合情勢的需要推動民主化。我一直想當一個有使命感的記者，可惜後來因爲很多現實的壓力不得不低頭，最後選擇離開新聞界。但我仍然不怕面對挑戰，也不怕承認失敗。勇敢嘗試挑戰自我的人生才精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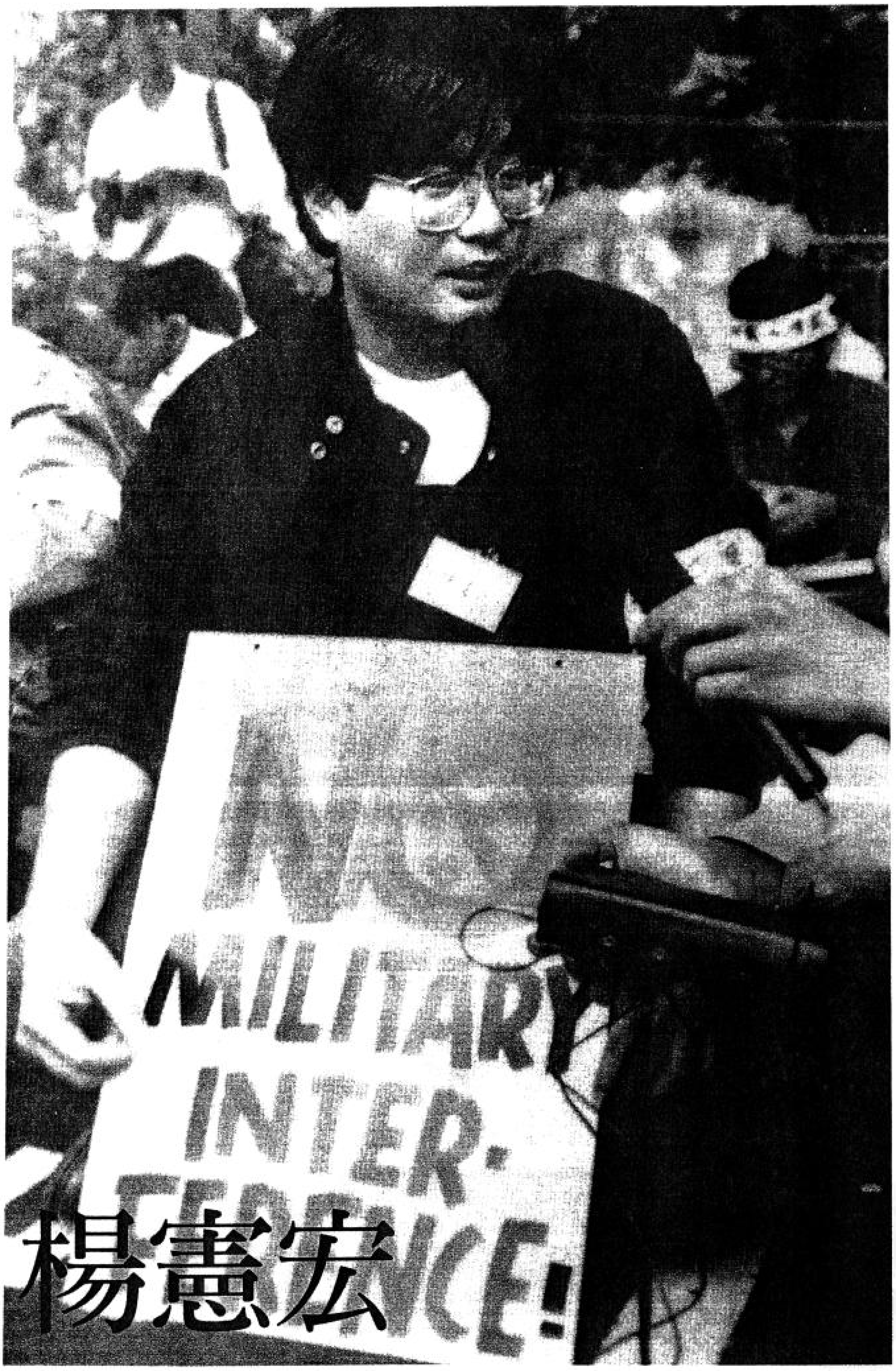
◎初稿：張廣文

◎校訂：張錦華

◎定稿：何榮幸、戎撫天

◎訪問時間：二〇〇七年四月十四日、二十一日

◎地點：台大新聞所攝影棚



楊憲宏

楊憲宏

〔第十一章〕

公害環保風潮

一九八五年聯合報環保記者

前頁圖說：
1990年知識份子靜坐省博館進行「反軍人干政」活動。
當時楊憲宏擔任《首都早報》副總編輯。（出自《羊入狼群：知識份子的原力與本懷》）

解嚴前看過他一系列公害環保報導、解嚴後看過他主編《人間雜誌》的人，一定會對這個人留下深刻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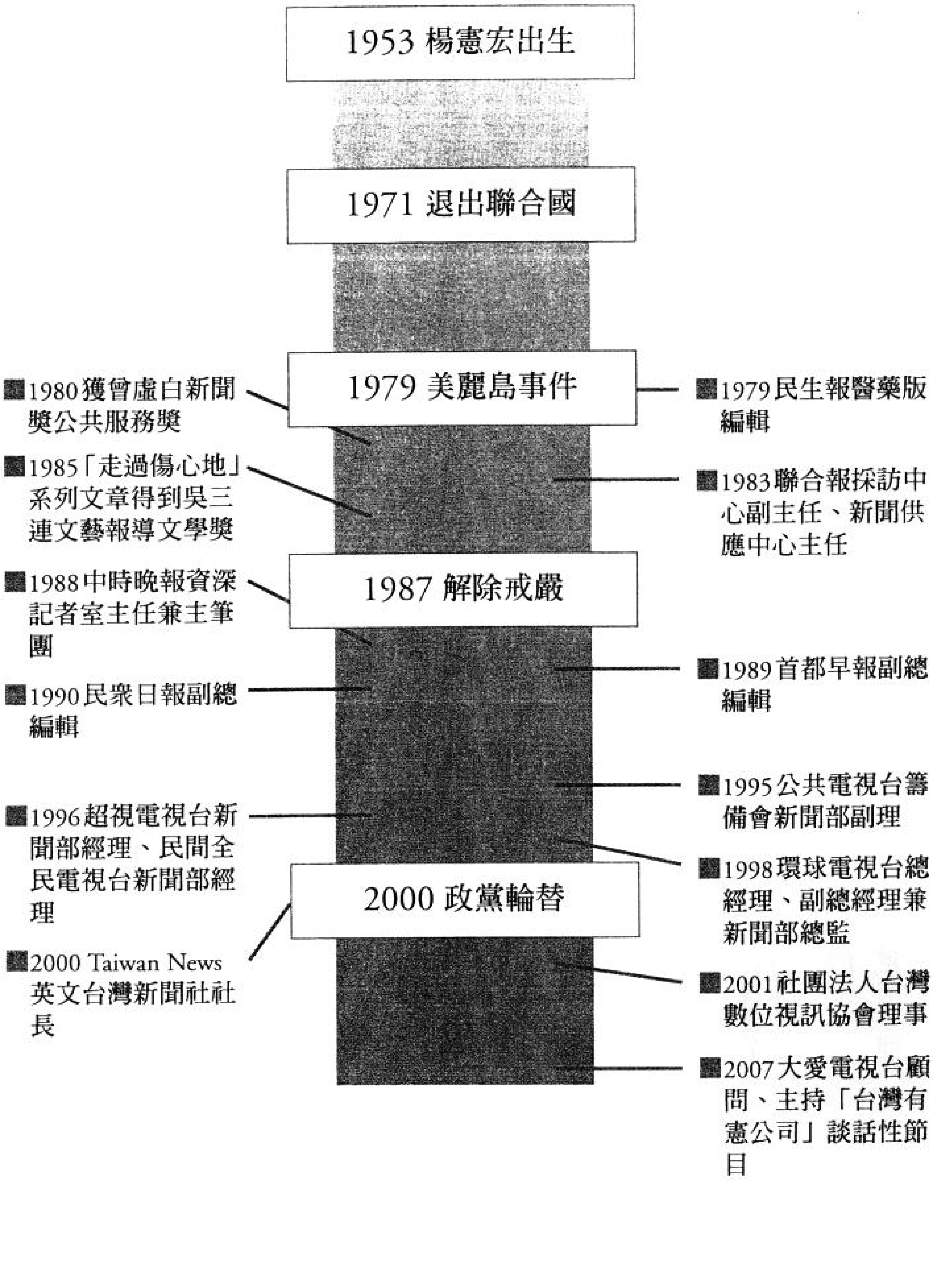
這種印象，是一種媒體記者關切社會弱勢族群、深入各角落呈現社會底層聲音的調查報導印象；更是一種知識份子批判不公不義體制，用手中的筆為弱勢邊緣族群討公道的人道關懷印象。

他從一九八〇年代開始展開一連串公害環保報導，很快就得到曾虛白新聞獎公共服務獎，一九八五年更以「走過傷心地」系列作品獲得吳三連文藝獎報導文學獎。把寫作視為「磨劍」的他，透過報導文學的亮光，感染了許多年輕的心靈，在解嚴前後把記者視為值得追尋的一項志業。

然而，當你近年在「二一〇〇全民開講」等談話性節目上看到他時，已是另一種充滿濃厚政治氣息的印象。他向我們強調，當初就是認為「必須解決上游的問題，下游的問題才可能解決」，他才會先走上新聞記者之路，後來更轉向關切「更上游」的政治問題。

轉戰無數電子媒體後，他現在的身份是「媒體名嘴」，在本書受訪者中擁有最高曝光率與一定的爭議性。他長期以點子多著稱，思考非常靈活，當他強調將成立網站扭轉台灣政治與環境的報導生態時，我們都拭目以待……

楊憲宏大事記


1953 楊憲宏出生
1971 退出聯合國
1979 美麗島事件
1980獲曾虛白新聞獎公共服務獎
1979民生報醫藥版編輯
1985「走過傷心地」系列文章得到吳三連文藝報導文學獎
1983聯合報採訪中心副主任、新聞供應中心主任
1987 解除戒嚴
1988中時晚報資深記者室主任兼主筆團
1989首都早報副總編輯
1990民衆日報副總編輯
1995公共電視台籌備會新聞部副理
1996超視電視台新聞部經理、民間全民電視台新聞部經理
1998環球電視台總經理、副總經理兼新聞部總監
2000 政黨輪替
2000 Taiwan News英文台灣新聞社社長
2001社團法人台灣數位視訊協會理事
2007大愛電視台顧問、主持「台灣有憲公司」談話性節目

科學精神的人文記者

從小超級愛看書

念大學之前，我的性格沒有這麼開放。我從小就很孤僻，只喜歡看書，什麼書都看。以前租書店有一個規定：你拿十塊錢去，就可以看整個月的書，還可以隨便換書。我大概可以用十塊錢就把整個書店的書看完。

我看書的方法，就是從書架最右邊第一本接著往下看，K完整個書架的書，連《籃球情人夢》這種書都看。雖然我看書看了很久，卻沒有寫作的想法，就只是喜歡看。因爲看書可以不要跟別人講話。如果家長見到小孩子在看書，就不會叫你去打掃，所以我小時候都在看書。

我一直都在彰化念小學、初中，高中就念師大附中，因爲在彰化已經沒書可以看，只有台北能提供看更多書的環境。那幾年我不太吃飯，都在買書。我有地毯式搜查東西的習慣，當時《文星雜誌》、水牛出版社、志文出版社的書，我大概都買光了，所以我有好幾個書架。

大二時，我忽然有種想寫東西的強烈欲望。但我有一段很短暫的寫作挫折。比如說，你寫完之後，才發現沒有辦法表達自己；雖然你想得很好、想得很多、覺得很棒，但寫出來又不是那麼一回

事。一個晚上沒睡覺寫下來的東西，睡到中午起來重讀一遍，發現：「啊，誰寫的？」寫得好爛，根本沒有辦法把感受表達出來。我非常駭異，覺得：「欸，怎麼會這樣呢？」「想的我」跟「寫的我」怎麼差這麼多？

那時我重讀《紅樓夢》和《老殘遊記》。這兩本書你完全可以讀到作者的本意與本懷。尤其再重讀一次《紅樓夢》，重讀它的結構，看它怎麼寫，它怎麼起承轉合，怎麼說故事，我獲益良多！《老殘遊記》的筆法我特別喜歡，眞是簡潔有力。讀完之後，我才發現，我們寫文章跟講話有很多贅字，把它拿掉後，文氣就通了。我從閱讀得到經驗之後，寫東西慢慢就順了，這對我後來坐編輯台很有幫助。

不當醫生當記者

我父親是醫生，但他是被我祖父逼去讀醫的，他本來想當音樂家。我想照自己的興趣走，所以跟我爸講，我不想當醫生。

因爲我愛看書，希望念那種要讀很多書的科系，所以當時就想考圖書館系，但是長輩不同意，最後只能考丙組、塡醫學院，其他的都不用塡，就這樣考上了牙醫系。

我之所以想當記者，是因爲大學時代就常跟一些醫藥記者吵架。他們寫錯東西，我會去告訴他們寫錯了。有些記者還蠻好玩的，會跑來學校找我，說：「那不然要寫什麼？」「我們報紙又不是醫院的公報，我們要寫人家看得懂的。」我說：「我也同意你要寫人家看得懂的，可是你就是寫錯了！」因爲我常常反應，所以他們就邀請我寫專欄，我也就不客氣開始寫。我在大學時，常幫剛創刊的《民生報》寫專欄。

除此之外，在醫院實習對我也有很大的衝擊。當時實習醫生最討厭去急診室，因爲在急診室的階

級比護士還低，把你差來差去的，你都得去做就是了。尤其半夜十二點鐘到早上八點鐘這一班，幾乎沒人要值班，因爲風險非常高，什麼狀況都有，責任很重。住院醫師常常忙到沒空理你；一些專科醫師都在裡頭睡覺，我們也不太敢去吵他們。他們會罵：「連這都不會處理！」所以我們都是自力更生。

實習期間我第一次接的case，讓我就此瞭解當醫生的限制。我曾經看到一個媽媽抱著小孩來急診室，大概是小孩跌傷了，在右眼下方有個裂傷，一定要縫。因爲那位媽媽很擔心婆婆會罵她讓小孩「破相」，所以我決定用最細的整型針縫傷口。但在急診室做這樣精細又費時的「手術」，是不被允許的。這對我衝擊很大；病人明明就在你手上，你卻不能幫助他，這是非常奇怪的。

在急診室，你會常常見到各式各樣因爲社會背景因素造成疾病的「病人」，比如說會遇到某個父親爲了兒子不孝，喝了兩瓶硫酸自殘。作爲一個醫生，遇到這種情況，就只能穿上防護衣，一直幫他灌牛奶急救。能不能救回一條生命我不能確定，但是事情已經發生了，就只能這樣做。

經過這種衝擊後，雖然我可以做個不錯的醫師，可是我不願意了。我覺得是因爲在上游有些事情發生，才有下游的各種狀況。就算你很會游泳，每天在那邊救人，左手救一個，右手救一個，上面再來一個，然後看一個飄走啦，你怎麼辦？既然上游有人把人推下水，就要往上游走才能眞正解決問題，我開始希望透過新聞工作解決上游問題。

先當醫藥版編輯

以前我對記者印象很壞，因爲當時彰化地區的記者大部分都是會收錢的流氓，所以當我說想當記者時，我父親嚇壞了，他不曉得記者是什麼樣的工作。

但之前大學聯考塡志願時，我爸曾說：「你二十歲之前喔，要聽我的，二十歲之後你要怎樣都可

以……。」所以我就在醫學院畢業、考上台大生理所後強調：「爸，你說過，二十歲之前聽你的，我現在二十歲以後了，我要去念研究所！」其實我不是要去念研究所，而是要當記者。

我爸當時傻住了，他就問：「那什麼時候要回來做醫生？」我說：「沒有啊，我沒有要回來做醫生，就再見了！」不過我還是把牙醫師執照考到了，那張牙醫師執照現在還在。

由於之前已經替民生報寫過專欄，後來我就進入民生報當醫藥版編輯。當時醫藥版編輯的待遇算不錯了。我記得很清楚，每個月九千九百塊，不包括稿費。我那時還有個「特異功能」，就是專門翻譯《時代雜誌》(*Time*) 跟《新聞週刊》(*Newsweek*) 的醫藥文章；因爲對編譯組來說，翻譯這些專有名詞是很辛苦的，可是我翻譯起來很容易，所以這類工作幾乎都是我在翻譯、改寫。

劉復興當時做民生報生活版的主編，他每天下午就到辦公室，然後開始看時代雜誌跟新聞週刊，看完以後就圈幾篇起來，叫我有空把它改寫一下。他說：「你有空就改寫一下。」意思就是今天晚上他就要用到這篇稿子，所以我下午四點一進辦公室，看到這些文章，就得邊改稿邊翻譯。所以，在我當記者前，其實是編輯兼醫藥新聞編譯。

初生之犢報導多氯聯苯事件

我會很快轉爲記者，是因爲受到當時爆發的多氯聯苯事件很大影響。

多氯聯苯事件發生時，我很憤怒。我覺得，這整個系統怎麼可以讓這樣一群最弱勢、盲眼的這些人，到處去吃錯油，身上長痤瘡？這系統到底哪個地方出問題？我對公共衛生強烈的使命感，就是在那時候形成的。那時候我看來看去，真的只有新聞界是最有反省力的，記者可以很努力地去瞭解這是怎麼回事，然後提出批判；政府系統卻推得一乾二淨，無論是地方或中央，全部都一樣。你可以看到最爛的官員每天講那些你聽不懂的話，完全無力對抗這件事。

我當時雖然只是編輯，但仍告訴劉復興，多氯聯苯的問題沒那麼簡單；他聽完以後就叫我去寫報導。我說我每天要編報紙怎麼寫？他就說了一句話：「你不是有輪休嗎？你利用輪休的時候去報導啊！」

那次輪休日一早，我就搭野雞車去發生多氯聯苯事件的台中惠明盲校。我一進去就聽到他們在唱歌，訪問到下午結束，回台北的時候就大概有一些如何報導的想法了。當天晚上劉復興問我：「那邊怎麼樣？」我就把想法講了一遍。他說今天就要出稿，我說：「啊！你不是說有空才寫嗎？」他說：「今天用！」我就開始寫，然後他走來走去，邊吹口哨，走到我旁邊來，欸！冷不防就把我前面寫的兩張稿紙抽走，我就看他在那邊很認眞地順稿、抽菸。

我繼續寫到第四張、第五張的時候，劉復興又過來。我每寫一張，他就抽一張改起來，那感覺很好。我以前都稱自己叫 printer，印表機啊！因爲我只是把腦子裡頭已經有的故事印出來而已，所以他說：「欸，你怎麼寫那麼快！」我說：「這不用想啊！」我現在寫稿還是很快，一篇五百字的稿子大概十五分鐘寫好，我以前每天寫《民眾日報》的專欄，大概十五分鐘到二十分鐘就可以寫完。

當時那篇文章大概一千多字吧。我很快就寫完，劉復興改完後，就跟隔壁組的陳啓家說：「明天我們有一篇很好的文章要刊出來。」那篇文章就是我第一次得獎的作品「哭泣的教堂」。

被質疑專業憤而出國念書

我後來會出國念書，起因於在民生報當編輯期間，爲了日本腦炎疫苗事件，跟台大公共衛生研究所打了一仗。

當時我發現，很多醫生的小孩都沒打日本腦炎疫苗。我就去問幾個小兒科醫師，你孩子爲什麼不注射？他們說，自己當醫生就不必再注射了。我說：「哪有這種事？蚊子又不會先問你是不是醫生小

孩才叮？」

後來他們向我透露，其實日本腦炎疫苗的效度有問題。我就質疑，效度有問題的東西，我們為什麼一天到晚在推動呢？後來我在榮總發現了一些因為施打日本腦炎疫苗而產生副作用的病人，我就開始質疑衛生單位的疫苗政策。

於是我公布了一個很簡單的調查，就是：「幾大醫院的醫師小孩打不打疫苗？」結果幾乎半數以上是不打疫苗的，搞得台大公共衛生研究所的教授很火大。他們說我雖然是醫學院畢業的，可是不懂公共衛生。

這把我惹火了，公共衛生有這麼難嗎？我就決定去美國柏克萊大學念一個ＭＰＨ學位（公共衛生碩士）回來，這樣你總不能說我不是專業了。

公共衛生學位念完，對我影響當然很大。我開始覺得，政治的問題其實是一個公害問題。政治本身就是公害。我以前在跑這些公害問題的時候發現，公害問題並非你置之不理，你就可以避免，inescapable，你根本逃不掉。它會找你；政治也一樣，如果我們都說「哎呀，我們都不要管政治」，我告訴你，它會找上你，而且是最壞那種。它基本上就是一種公害。

學成返國後，我順利進入聯合報當記者，專門報導公害問題。

創新寫作方式

當時聯合報是陳祖華做採訪主任，他看完我的報導風格後對我說：「我們終於有new journalism！」但是，爭議其實很大，因為聯合報有一些記者覺得，我簡直像在寫小說，文字寫那麼漂亮幹嘛？他們說：「新聞就是要純粹，不能夾帶著那麼多情感……。」

我在聯合報的長期戰友翁台生也覺得，我寫東西像寫小說，我說why not？我說我需要這個技

法、這種文字。我後來提出一套說法，讓翁台生有點心動。我說寫文章要有張力，寫出來的東西就要有影像感，似乎會聽到聲音，這樣文字本身就可以打動人。

例如，有一年我跟翁台生合作報導一個災難事件，我一開始寫：「一踏進那個家，剛貼的春聯還是新的，寫那麼吉利的話，可是貼完以後就發生這麼慘的事情……。」我形容春聯的紅是「殷紅」，我用了「殷紅似血」四個字。這在當時新聞報導中是非常少見的寫法。

我在民生報的老長官劉復興也在同時間進入聯合報。我們一天到晚在談寫作，但劉復興重視的是一種很純粹的新聞寫作，而翁台生比較喜歡浪漫的那種。

翁台生很喜歡跟我一起出去採訪，我們兩個常邊採訪邊交談。後來我們就養成一種習慣；我認為「新聞啊，說不出來就寫不出來，你要先說才能寫」，他同意我的想法。於是，我們兩個常坐在野雞車裡，討論文章如何開頭、如何結尾。

我們彼此約定，每說一個情節大概可寫兩百字，超過兩百字，就有兩個情節在裡面了。因為不斷討論、形成默契，所以我們兩個合作寫文章的字數很準，三千七百字就三千七百字，一字不多。

訓練自己有很多「抽屜」

我們每次採訪回去就會寫一個清單，告訴劉復興我們總共有二十個重點，就是四千字的意思，如何開始、如何結尾。我們寫完，劉復興總是有意見。他有時非常同意我們的想法，但有時也會把我們的稿子壓掉說：「不行，你們這稿子我明天要來改一個下午！」我說：「你何必這樣呢？你就把它發了就是了啊！」他說：「不行！這稿子很棒，我要把它改好，可是我現在還不曉得怎麼改，我明天來改！」他是主管，我們也沒辦法。

我運氣很好，一進入新聞界就碰到兩個對寫作非常講究的人，而且，是對互相改稿、彼此漏氣都

不遺餘力的這種坦率同事。

當然，劉復興也不是什麼東西都讓我寫，他其實對我管制很嚴。每個禮拜我們有個題目會議，對我來說，這是壓力最大、也是最愉快的時間。大家開會報題目時，我常常報很多題目，直到劉復興說：「好了！已經可以寫書了……。」我手上隨時有二十幾個題目，而且我是同時進行；因爲我知道我運氣不太好：比如我今天決定去採訪這個人，這個人就剛剛好不在，所以一定會變明天。後來發現差不多要同時發展超過十個以上的想法，我的採訪行程才不會突然有一天突然閒到去喝咖啡、去看雲、去坐草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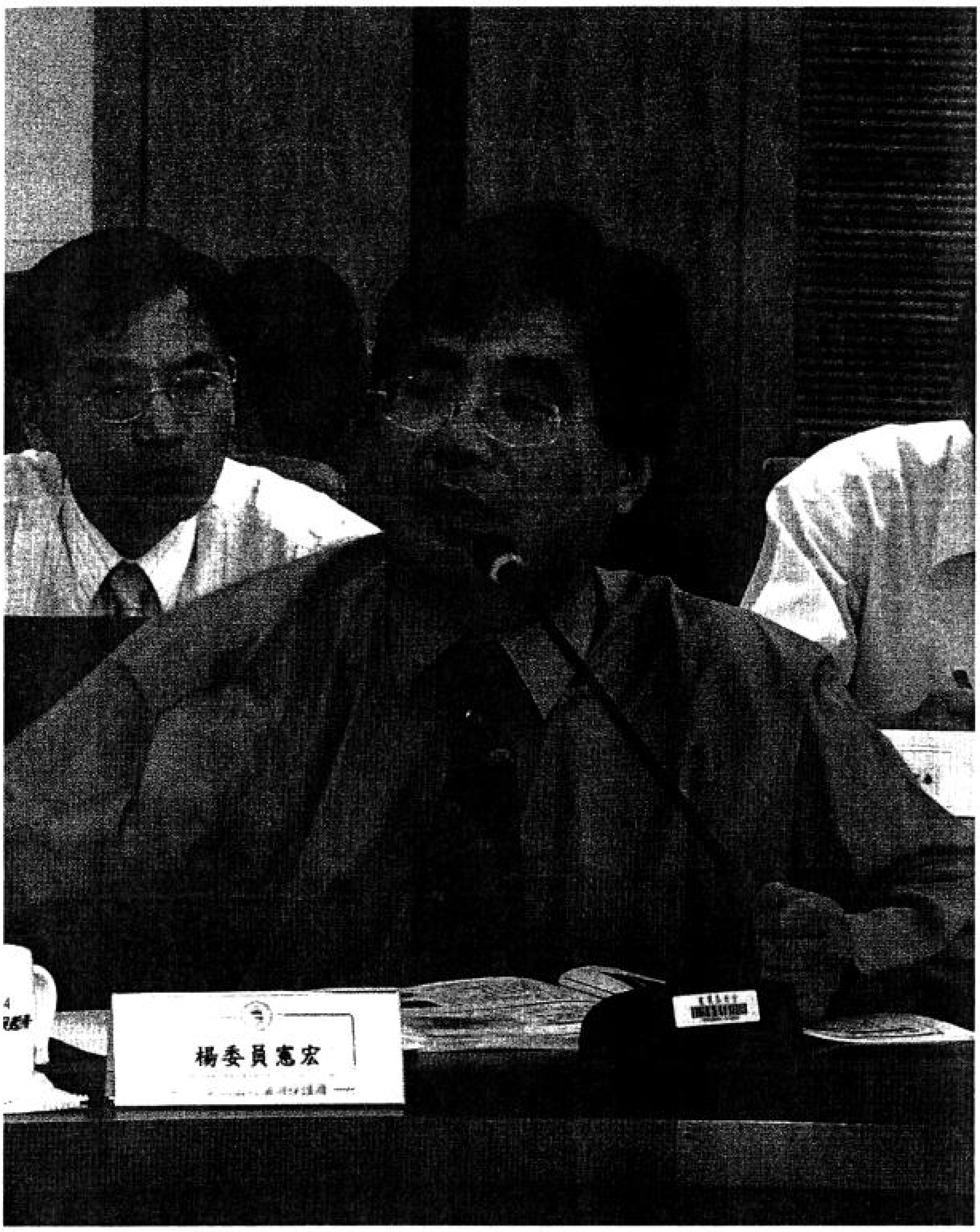
我訓練自己有很多個「抽屜」，而我的筆記有一頁專門塡題目。有時候題目太多，每天都在增加，多到自己都快忘記在做哪些題目，所以必須要有很多個「抽屜」收納題目。然後訪問到某一天就會發現，欸，這題目做得差不多啦，應該收網了。那幾天就全力收網，然後就把可以寫出來的題目交給劉復興。

翡翠水庫事件得罪國民黨中常委

戒嚴時代，公害問題其實都是政經權勢勾結的問題，也攸關報社的利益，我每次都因爲報導公害問題，搞到總編輯進退兩難。

一九八三年，我跟翁台生兩個人追蹤報導的翡翠水庫水源地遭受污染事件，稿子被壓了一個月，報社不准出稿，因爲我們踩到了「地雷」。

當時文化、實踐兩所學校提出翡翠水庫邊坡開發計畫，希望在翡翠水庫大壩下游、直潭壩上游、北勢溪水源地南岸建造校舍。但經建會實地勘察發現，文山坡地上兩校建校舍對水源可能造成污染，影響飲水水質，許多環保團體也警告有關單位，兩校開發計畫的潛在危機，但政府單位卻未正面回



2006年7月10日，受聘爲桃園縣永續發展委員的楊憲宏。（中國時報提供／黃文杰攝）

應。

聯合報認為這項報導「很敏感」，因為這兩所大學的老闆分別是副總統謝東閔、國民黨中常委張其昀，這兩個人每星期三都跟聯合報王老闆坐在國民黨中常會開會，不能得罪這兩位國民黨中常委。

但我強調，我不必知道這種政治關係，我只知道「Even the president has to drink the water」，我說：「總統會有自己的水庫嗎？這兩個學校污染的水庫，他們去撒一泡尿，蔣經國總統也喝得到啊！」

聯合報以前規定記者要寫工作日記，老闆指定了幾個人要寫日記，包括我在內。當時有關翡翠水庫事件的日記，現在不知還在不在。如果聯合報有把它保存下來，那絕對是非常重要的紀錄。

那一次的工作日記就是由劉復興撰寫。我記得他用鋼筆寫了四頁，精工細刻，一個字一個字寫得清清楚楚，讓王老闆很好讀。日記中詳述我跟翁台生在翡翠水庫這個案子上面作了多少調查與努力，發現了什麼事情，但因事涉敏感，牽涉到實踐跟文化兩所大學，兩家的主持者都是國民黨重要人士，所以是否可以發表？請董事長裁示。後來，王惕吾在上面寫：「有證據就寫，惕吾。」

我們拿到「尚方寶劍」後，就直接砍殺，不管他了！報導出來的隔天，行政院長孫運璿就馬上說要調查。一年後，蔣經國才把它停掉；一九八四年二月，內政部才發布實施「台北水源北勢溪部分特定區計畫」，明列對實踐、文化兩校開發案的使用限制。

味全奶粉事件得罪最大廣告主

另一件讓我記憶深刻的事件，是味全AGU嬰兒奶粉事件。

當時，我發現台灣地區各地醫院小兒科，陸續發生突發性抽筋的幼嬰病例，甚至在北部的一家大醫院發現一個抽筋導致意識不清的例子；醫生判定這個小孩會有腦性麻痺的後遺症。醫院檢查這些嬰

兒的血鈣含量後，發現都遠低於正常水準。而這些病嬰的共同特徵是：他們都曾食用同一牌子的嬰兒奶粉，就是味全AGU。我深入調查，發現它的鈣磷比例有問題。

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可是當我調查清楚、寫好報導之後，總編輯卻說：「你這個文章……，可不可以這樣。你先去跟衛生署講問題在哪，衛生署把它報告出來了，我們再來登？」我說：「那你聯合報獨家榮譽在哪裡？」他就愣住了，看到我很倒楣就是了，這個惹禍的又來了。

結果連翁台生也加入勸說的行列，但他吞吞吐吐的、不敢說，到最後才跟我講明：「味全是我們聯合報最大的廣告客戶啦！你哪個不好惹，你惹他？你寫了以後，我們聯合報每個月最高廣告客戶……。」喔，我說我不知道，可是即使知道了，對我來說也沒意義啊！他是最大廣告客戶，這是你業務部的事啊，我編輯部不管這個事。

後來劉復興也遊說我去跟衛生署先談一談。我記得當時衛生署的食品衛生處長叫劉廷因，他是很專業的人。因為我怕其他記者知道我在作這調查，所以起了個大早，八點就去他辦公室門口等他。他九點不到就進辦公室了。我進去後把門鎖起來，將嬰兒奶粉的事告訴他，我說已經全部調查清楚了。

衛生署、聯合報互踢皮球

其實，這項調查剛開始時，包括醫院、小兒科、最有名的馬偕醫院醫師都跟我講謊話，都說沒有這回事。後來我找到很多資料後，拿著資料去請教董大成教授；那時他是台北醫學院的院長。我去他的辦公室把所有資料攤出來，問他是否有這種事情。

他是我的老師，知道我是誰，也知道我多會亂搞，而且他看到我已經追到這種程度了——就是從美國進來的奶粉，其中磷的比例過高。所以他看完資料只得承認：「是有這回事。」

在這期間，味全公司兩度派人跟我溝通，表示：「絕對沒有這個事情！」從味全公司到醫學界全

都否認，因此我在處長辦公室內向劉廷因強調，事情危急，大家卻默不作聲，我要他抽檢市面上的嬰兒奶粉。我的建議是全部都抽檢，不要只針對味全，查出鈣磷比例是否符合標準，然後快點公布。

可是他卻告訴我，他希望聯合報先登，他再來查。他說：「味全這麼大的公司我們惹不起，你不要以為我衛生署食品衛生處處長有多大！」那時候還是戒嚴時代，所以他這麼說我完全可以理解。不過，據我後來瞭解，他好像偷偷打了電話給當時台灣衛生署實驗所的主任，要他快點去抽檢。後來抽檢出來的結果證實，味全AGU奶粉的鈣磷比例遠遠低於衛生署的標準。

那時候衛生署在長庚醫院隔壁的台塑大樓，中間有一層是衛生署。我從那兒走回聯合報，覺得非常洩氣。因為聯合報不敢登，要我先找衛生署，可是，衛生署也不願得罪味全，堅持要聯合報先登，那要怎麼做？我走了好久，走了大概一、兩個鐘頭，才回到聯合報。回去的時候邊走邊想，不曉得怎麼辦，後來我決定不管了，就寫吧！

寫完以後，聯合報高層看這稿子頭痛死了，不能登啊！當時的總編輯是黃年，黃年看了我的稿子後，提了一個很餿很餿的主意，可是也只有那個餿主意才能奏效。他說：「你可不可以不提AGU，就寫某嬰兒奶粉？」我說：「好啊，只要能登都可以。」

味全老闆坦然面對錯誤

隔天一早，大概八、九點的時候，我就接到黃年的呼叫器，他說：「憲宏啊，現在怎麼辦呢，聯合報電話被打爆掉了，大家都來問是哪個牌子的嬰兒奶粉！」黃年問我是否可以說出奶粉廠牌，我說：「昨天就可以講了，你這個笨蛋啊！」黃年說：「有把握？」我說：「有！」都登出去了，還問有沒有把握，很好笑。之後他就發動所有的記者，開始追蹤這個案件。

後來，王惕吾告訴我，味全公司的董事長黃烈火當天早上十點鐘，就帶著報紙和幾個味全公司主

管，到聯合報十二樓王惕吾的辦公室，問：「這怎麼回事？」

王惕吾問他：「我們這個記者有沒有寫錯？」那黃烈火也不錯，說：「每個字都說對了，我們的確是這個問題，沒有錯。」王惕吾後來對我說，他覺得那一次，那一瞬間，他做聯合報老闆很有面子；因爲黃烈火告訴他，他的記者寫得都對，查證非常完整。

後來味全公司也派人問我該怎麼做，我跟他們說有三件事情要立刻做：第一個，道歉，這是重大的疏失，味全公司一定要登報道歉；第二個，回收問題產品，所有的問題才可以解決；第三，賠償受害的家屬。

因爲那時我也是消基會環境委員會的委員之一，跟消基會的關係很好，所以後續的事情就由消基會接手來做，包括，市面商品回收、道歉、賠償受害家屬等等。不過後來我還是不停地聽到味全公司有人放出謠言，說我跟味全公司勒索不成才會這樣報導，不過我覺得這個是可以理解的。

雖然被中傷，但我覺得還好，因爲至少味全公司的老闆不是這樣想；黃烈火第一時間是承認錯誤的，他很通情達理，我和烈火與他的兒子黃南圖後來也變成很好的朋友，他們常常會聽我對食品衛生的意見。

幫派人物也可講道理

經過這次事件，我覺得，作爲一個專業記者的那份熱情，不管是責任感或判斷力，以及在報導細節與證據上的堅持，別人是可以感受到的，我相信黃烈火也感受到了，所以他願意馬上改正錯誤。

除了廣告主的壓力，環保議題有時候也會牽涉到地方幫派利益。所以，偶爾也會有人打電話來威脅我說：你就是楊憲宏喔，如何如何的。可是我也不怕，我會跟他們見面講道理。

我覺得即使是幫派人物，有些人還是蠻講道理的。只要你不是爲了拿某一方的錢而修理另一方，

而是爲了公共利益才報導的話，他們也不會對你怎麼樣。他們反而會稱讚你是有理想的記者。

記得有一次，我處理跟垃圾回收有關的案子，牽涉到當地幫派的利益問題，後來他們來聯合報樓下找我，我就下去跟他們談；談了之後，他們就覺得自己理虧，不了了之。

所以，我認爲在面對流氓或是幫派不滿報導內容時，只要你沒有進入他們幫派的利益鬥爭，沒有收了某一方的錢，只是就事論事，我認爲台灣的這些幫派、黑道，基本上沒有這麼可怕，他們是願意聽你講道理的。

科學訓練有助報導眞相

總結在戒嚴時期處理公害問題、消費者保護問題的經驗，我覺得，過程中的那種SOP（標準作業程序）非常有用，這是我當醫生的那段日子裡學到的。醫師的邏輯並不是去證明你有病，而是希望你沒有病，這是醫師本業裡頭應該有的精神。這種基本精神對我做記者，其實很有幫助。

我念醫學系時，有個會議叫CPC（臨床病理討論會），那是非常殘酷的會議，是非對錯，一目了然。在每個病人離世後，都會舉行這項會議。當天同一組臨床醫師從頭到尾把病人的背景、病史、治療、最後死亡的全部過程報告一遍，然後從臨床數據判斷是什麼原因造成死亡。

事實上，臨床判斷死因錯誤的機率高達五成。所以做醫師必須非常警惕，即便你覺得已經有這麼多數據支撐你的論點，但是一旦病理科醫師解剖完，證明死因不是你說的這個樣子，答案一翻兩瞪眼，你根本無從反駁。

我們這些菜鳥醫師從四年級學完病理學後，就不時參加這種CPC會議，見到太多那些平常了不起的醫師，在台上被病理科的醫師大刀砍得灰頭土臉；左邊一刀、右邊一刀，殺得這樣狗血淋頭。所以，在醫師這個專業裡，哪有什麼權威？錯就是錯。但是，醫師的訓練中卻有一個很好的文化：錯

了，承認！當然，你也不得不承認，因爲解剖結果證明一切。

我在醫學院學會這套鉅細靡遺、非常嚴格、有定理、有公式，然後有具體說法的科學思維方法，是非之間，沒有模糊空間。我當記者後更深刻體會，記者應該用這樣的嚴謹思考進行報導。作調查報導的記者，一定要有這種訓練，想辦法去證明自己的假設是錯的，而不是只閱讀、採訪那些可以支撐你假設的內容。

所以，雖然我的學歷完全都在醫學院，而經歷全部在新聞界，但我並不認爲我的學歷、經歷是完全斷裂的。

民進黨成立新聞登不登？

當然，戒嚴時期最敏感的還是政治新聞。我因爲擔任聯合報採訪組副主任，也有機會瞭解聯合報對於若干敏感新聞的處理。我報導公害問題雖然經常讓報社頭痛，但報社其他同事也經常以各種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對抗黨國控制。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當天聯合報採訪主任高惠宇在晚上九點鐘報稿之前，我看到一則兩百字的稿子：「民進黨在圓山飯店創黨。」高惠宇報稿之後，長官們的反應是：看國民黨文工會怎麼說。

當時文工會主任是朱宗軻，朱宗軻電話打來說，希望我們別登這條稿子。我記得那時候高惠宇的動作是，把那則稿子揉一揉，然後丟進垃圾筒。但高惠宇還是有問朱宗軻：《中國時報》登不登？朱宗軻也還不錯，有做到這個服務，他說：「我去問問看。」

大概十點多左右，朱宗軻電話打回來說：「中國時報要登，余老闆說一定要登，所以我們也擋不了啦。我就告訴你他們要登，那你們就看著辦吧。」高惠宇就從垃圾桶裡，把那則稿子拿回來，撫

平，拿到編輯台說：「發稿！」

所以現在再去查，九月二十九日，聯合報二版有個郵票大小的一塊新聞，報導民進黨成立。

當年，我們可以因爲登了那一塊小新聞而很快樂。那時候做記者、編輯，可以爲了那麼一點突破，在下午開編輯會議時，你看我我看你，比一下，說：「登出來了，登出來了。」

所以，要說聯合報或中國時報是不是保守的報紙？其實不能用一個嚴厲的標準切割；因爲登這個小方塊出來，是聯合報、中國時報許多員工對於新聞價值判斷，一種很柔性、對於黨國體制的對抗，這就是我們當時的生活方式。

在那個時代，我們常常有這種「偷渡成功」的快樂經驗。文工會也沒什麼話說，即使有，也是說：「欸，你們不要這樣啦！」我們就故意裝蒜笑說：「欸，有哪裡不對嗎？」

在那個時代，新聞工作者會很珍惜那種偶爾有的、呼吸一大口氣的感覺。解嚴之後，我們反而很難找到那種共同的、大家心有戚戚焉的會心一笑了。

因「機場事件」離開聯合報

我會離開聯合報，關鍵是前桃園縣長、當時海外黑名單人士許信良闖關回台的機場事件。

由於這是大新聞，採訪主任當天分配了相當的人力，政治組、社會組記者好多人都參與了，交給我在現場調度指揮。我特別帶了一個陸軍軍官退伍的記者到現場，要他先把當天憲警部署重兵的佈陣圖畫給我看。

他畫好後就告訴我，這個佈局有問題，今天要出事，因爲憲警佈的這個局就是「誘敵深入」。我一聽，怎麼可以？我就去找憲兵司令算帳，我說：「你今天到底是打算出事還是不出事？我們看這個佈局，你是希望出事喔！」

當時聯合報每星期一都有一個「中常會」，王惕吾親自主持，都是總經理、總編輯、採訪主任等高層參加，但每次王惕吾都特別點名我一定要出席。當天，王惕吾點名我說話。因爲我太憤怒了，我就把我在現場看到的事情都講了。王惕吾聽了臉色鐵青。你知道他的裁決是什麼嗎？他說：「你是聯合報的副主任，以後這種這麼危險的場所，不可以去！」我當場不高興地說：「爲什麼不能？我們放記者去，我們自己做主管不去，這像話嗎？」他說：「你不知道你有多重要嗎？如果你出事我怎麼辦？」

我對他的話很介意，後來我就跟他溝通；他說：「你不能老是這樣啊，你要團隊合作！」我說這跟團隊合作有什麼關係？說到最後，他說：「嘿！道不同不相爲謀！」我心裡想：「剛好！我就要走，怎麼樣？」我就走了。

因「工會事件」離開中時晚報

後來我進入《中時晚報》，因爲當時中晚成立「資深記者室」，我希望台灣可以建立資深記者制度，於是就進去了，擔任資深記者室主任。

在此之前，我曾經和張繼高先生在《自立晚報》合寫了一篇文章，談台灣的資深記者制度；我們希望仿效學校教授的永久制，你不需要做任何行政職，做記者就是一生到底。

但我後來卻感到很挫折；我離開中時晚報的一個理由，就是因爲中時晚報的資深記者室只有名卻沒有實。基本上，資深記者室在報社整體運作上變成了主筆團。俞國基先生當時做總主筆，但他的人手也不夠，所以我幾乎一天到晚都在幫他寫社論，無法好好採訪。中時晚報的第一篇社論是我寫的，第一年的好多社論也都是我寫的。

離開中時晚報的另一個原因，是在「中時工會事件」上和余老闆理念不同。

1988年，《中時晚報》編輯部，右爲楊憲宏，左爲張大春。（中國時報提供／林國彰攝）

當時我是資深記者室主任，被認爲代表資方，不可以加入中時報系工會，不過工會很多會議我還是參加。我覺得工會在言語上比較激進，但行動上還是蠻保守的。可是那時候余先生並不能接受，他認爲這是群「共產黨」。那時候都是流行這個說法啦。就是只要有人搞工會，就是共產黨滲透。我覺得這個說法太荒謬了，所以我就兩邊穿梭，希望中國時報可以有一點進步的作法，讓工會可以成立。

但當時候余先生已經很生氣了，要開除帶頭組工會的鄭村棋等三個人。我認爲這事很嚴重，會對中國時報留下很大的陰影。余先生當時就請他女兒余範英跟我說：「你很重要，你不要牽涉這樣的事情，你要不要去日本走一走，先出國，等這事情平息再回來？」但我隔天就丟了辭呈走人了。

我的態度是，如果我在這種時候出國，等於是出賣這些工會朋友。余家要我出國，我如果接受了，我以後在這個報紙也不能做事了。

從「摸壁鬼」到「籠中鳥」

其實，中時晚報創刊時集合眾多人才，這是非常不容易的；可是以工會事件來看，中時報系要在當時轉型，走向更民主、更具自由主義色彩的報紙，我覺得條件還不夠。

當時不管在聯合報或中國時報，比我更自由派或更激進的大有人在，我還算是普通的自由派。但兩大報裡更多的是保守派的人，連中時余老闆也很顧忌這些人。

我要離開兩大報，當然有蠻多人勸我不要衝動，但我不能跟著認同這些保守的作法。就像我要離開聯合報之前，我和王惕吾的對話一樣。他對我說：「十年後你就是總編輯，你不能忍一忍嗎？」我說：「我十個月都不能忍了，我忍你十年？」

在我看來，雖然一九八七年解除戒嚴，但戒嚴已深入新聞界的骨髓。在戒嚴時代做記者的人，台灣話叫「摸壁鬼」，是摸著牆壁走，沒有牆壁他不會走路。解除戒嚴以後，記者從小巷子裡走出來，

走到百米寬的仁愛路上，卻還是得摸著牆壁走；如果沒牆壁摸就趴在地上，用爬的，還是需要一個依靠；如果沒了依靠反而不會走路，記者仍然把自己變成「籠中鳥」。

解嚴後把鳥放出來，牠的飛行距離還是不會太遠，因爲牠還是設了一個隱形的籠子侷限自己，這就更可怕了。

轉戰電視要求細節與品質

離開中時晚報後，我轉赴《民眾日報》工作，接下來有一陣子我沒有固定工作，只是每天在《自由時報》跟自立晚報寫專欄或是評論。直到有一天，張繼高找我去他家吃飯，問我要不要去公共電視。

他認爲我應該去公共電視，說我不能只是每天寫寫評論就過一生。我說我對電視沒興趣，我認爲以當時台灣電視圈的環境，電視沒有辦法做出人類最深層的想法。

但是他三番兩次勸說，我發現他以前跟我講事情，就是講兩、三句，我不做，他也就算了。可是這次他不是，他就不停不停地打電話、FAX，然後叫我去他家吃飯，跟我苦口婆心講個不停。

他還寫了一首詩給我。他說：「欲窮靈潛計，先求扶蠟隻。」意思是說，如果你想每天過這種靈潛的日子的話，就要先儲備好。我說我三餐吃饅頭過日子也可以。他就說，一定要我去公視的理由，是希望我可以幫台灣的電視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就進入了公共電視籌備委員會，跟當時的夥伴並肩作戰，讓公視法通過，因爲當時簽了「落日條款」，就是公共電視法通過後，籌委會所有的一級主管都要請辭，所以當我確認公視法可以通過後，就先遞辭呈離開了。後來我又陸續在超視、民視、三立等電視台工作，對於電視生態更加熟悉。

我覺得做電視是嘔心瀝血的事業。我現在最主要的工作在大愛電視台，協助他們拍攝工作與製作所有紀錄片腳本。沒有那種要拍攝紀錄片、腳本卻沒寫好的事情，所有的細節與事前資料研究都要做到完全徹底才可以。

我認爲最注重細節的是大愛電視台。大愛電視的工作人員，只要跟我一起工作的，都知道規格與要求：四十八分鐘，四十八張 PowerPoint，一張一分鐘，每一張要寫清楚，從開頭到結尾。可是大部分的商業電視台，對於細節要求的耐力，大概只能只做出三分鐘的短片。

事實上，只要是堅持細節與品質，就不可能有所謂低成本的節目，但每次我想要改變商業電視台那種粗製濫造、爲黨喉舌的節目製作形態時，電視台內部就會反制我的作法，最後大家鬧得不愉快。像我離開民視，就是因爲民視的董事對我說：「民視就是民進黨的電視台啊！其他有什麼好討論的？」

我記得民進黨董事長蔡同榮委員有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他告訴我，現在國民黨有三台電視台，民進黨只有一台，如果我又做公平的新聞與節目，那我們只剩下半台。但我對他說：「錯，我們做公平的，就可以逼其他電視台也公平，這樣我們就有四台。」

我之所以如此堅持，是因爲我認爲所謂的 journalism，就是要處理公共事務，不應該從黨派考量來做新聞。

政黨輪替後拒絕做官

政黨輪替後，有些朋友去做官，其實我是很不安心的。我不是沒有機會，可是我在第一時間都拒絕，我很清楚告訴他們：「請尊重我的專業！」我就是要留在媒體這一塊。

對方也不是沒勸過我，他們都說：「如果你有很多理想，你掌握了行政資源以後，你就可以做你

要做的事。」我說：「我沒有那麼天眞欸！」我認爲我做不到，我自己斤兩我秤得清清楚楚，我知道是怎麼回事。

很多當年戰友去當官後，到現在，檢查一下我們的「戰況」，就發現四下無人了。

以前，我們有一種樂趣，大家時常會跑到我家來，或跑到誰家去。我們也沒什麼事情做，就像一首詩說的：「秋高氣爽，好友來訪，齊聚一堂，罵國民黨。」現在呢？「秋高氣爽，好友來訪，齊聚一堂，也沒有罵民進黨。」怎麼會這樣？我覺得少了那種「咖啡廳情懷」。以前我們常在新生南路的「老樹咖啡」坐下來，一桌變兩桌，大家論政，談談未來我們該怎麼辦：現在我看沒有人在講未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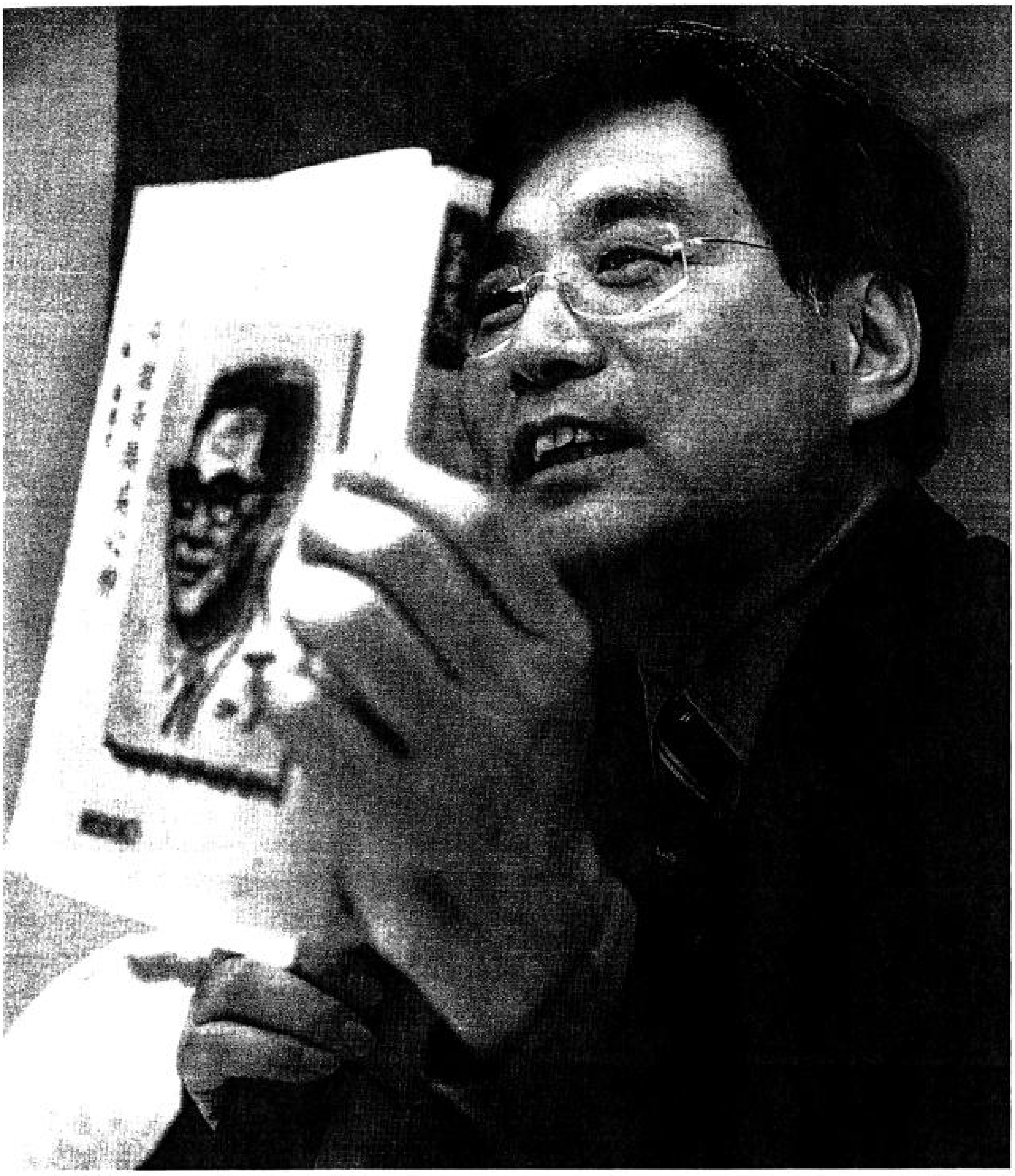
以前我們會在晚上下班後，跑到《新新聞》雜誌社去，胡鬧、攪和，搞到半夜，才各自不甘願地回家，但我們現在沒地方可去了，不曉得要去那裡。

上一代報人的使命感

此刻回頭看戒嚴時期的報人，我覺得他們都有文人的氣質，文采也很好，而且他們一輩子生活過得很清苦。他們做這個行業自己有光榮感，他們對於後輩、具有很好文采的人，眞是惜才如金。

像王惕吾、余紀忠，他們原來並不是這個領域裡的人，卻半路出家去做，我覺得他們有一種信仰，有很強的使命感，因此很堅持，非常虔誠，可以看得出來。

王惕吾、余紀忠從來沒有因爲我的想法不同而不用我，所以我是很感激他們的，沒有當時他們的寬容，也許沒有今天的我們。雖然我到最後還是離開他們，可是，我覺得我的基礎是在他們的媒體打下來的。即便我後來做的是電視，跟他們一點關係都沒有，可是對於journalism的堅持，在兩大報還是有很深刻的感受。



2004年10月4日，楊憲宏加入ETFM播音陣容，在該聯播網開了一個名爲「台灣極弱音pianissimo」的節目。
（中國時報提供／李威德攝）

但我覺得那個時代過去了，不只這些人已經凋萎，連他們所共有的文人特質都沒有了。這種journalism的精神是無法拷貝的，是人類文明在特定時代的特殊表現，現在全都消失了。

我認爲我們現在面對的是一個全新的傳播時代，同時也是個新舊交接、最混亂的時代。

對於新一代記者，我覺得有點可惜，因爲我看到很多很優秀的年輕人，他們卻沒有好的機會與好的環境。現在媒體的用人理念都是非常速食的，少掉了很多專業上的要求。戒嚴體制除掉後，媒體變成一個被打開的潘朵拉盒子，各種價值流失了，professionalism根本沒有機會生根。在這過程中，反而很容易讓商業化的東西滋長起來。

當然，我已經開始思考媒體未來的出路在哪裡？就是網路，Web 2.0！我認爲網路將來一定會取代電視，是一個非常有發展空間的領域，所以我目前正在籌畫一個網站，結合各項網路資源，以我自己關心政治、重視環保，以及累積多年的影像、文字和科技能力，希望未來能扭轉台灣政治和環境報導生態！

◎初稿：管婺媛

◎修訂：張錦華

◎定稿：何榮幸、楊憲宏

◎訪問時間：二〇〇七年四月十四日、二十一日

◎地點：台大新聞所攝影棚

楊渡

〔第十二章〕

反杜邦運動與社會力

一九八六年時報新聞周刊記者

渡

前頁圖說：
1991年3月27日，楊渡——楊炤濃。
(中國時報提供／中時攝影組攝)

他是解嚴前後與楊憲宏同樣受到矚目的報導文學作者，楊憲宏長期在聯合報系，他在中時報系，後來兩人在《中時晚報》一度成為同事，兩人的差別之一則是：他比楊憲宏更介入環保運動。

解嚴前夕台灣社會力風起雲湧，一九八〇年代更被稱為「社運黃金十年」。這段台灣社會地殼劇烈變動時期，他是重要的媒體見證者之一。詩人出身、得過文學獎的他，因而留下《強控制解體》、《民間的力量》兩本社運觀察紀錄。

他在訪談中向我們述說，堪稱環保運動里程碑的一九八六年鹿港反杜邦事件，他是如何「採訪兼參與」涉入其中，不但幫忙想策略、寫聲明，還與運動領導者成為結拜兄弟。在解嚴前夕的時空環境，這種「鼓吹者」新聞歷程所在多有，他已提供了完整的研究素材。

然而，他在解嚴二十年後的身份，卻已變成國民黨文傳會主任，最重要的任務是協助馬英九與國民黨贏得總統大選。從記者到黨工、從採訪者到受訪者，他強調自己「自由主義偏左」的文人性格不變，我們都很好奇，在國民黨明顯右傾的保守氛圍中，他要如何維持「自由主義偏左」的方向……

楊渡（楊炤濃）大事記

1958 楊　渡出生

1971 退出聯合國

1979 美麗島事件

■1980大四獲「時報文學獎新詩獎」

■1981開始在黨外雜誌深耕寫稿、大地生活編輯

■1983現代文學執行編輯、春風詩刊編輯；踏入新聞界，美洲中國時報編輯

■1985時報雜誌副刊編輯

■1986時報新聞周刊記者，採訪反杜邦運動、機場事件

1987 解除戒嚴

■1988出版《強控制解體》、中時晚報「社會運動採訪小組」採訪組長

■1989登「陸」採訪六四天安門事件

■1990中時晚報撰述委員

■1995中時晚報副總主筆、總主筆

■1997中國時報副總主筆、1998兼任主持TVBS「台灣思想起」、公視「與世界共舞」

2000 政黨輪替

■2006成立「大衆時代」網站

■2007一月任國民黨文傳會主委；十月辭職

以報導文學實踐文人理想

兒時「貧民」烏托邦

小時候，家裡住在台中烏日的鄉下，我祖父是傳統的佃農。

我爸爸不甘心當農民，做過各種行業，陸續賠光家產。我國二的時候，家裡僅剩的一個工廠倒閉，父母也因違反票據法被通緝，到處躲債，母親後來還入獄。家裡只剩下讀國小的弟弟妹妹，還有我和祖母，住在偌大的一個工廠裡面。

那時候開始，我慢慢看清人性的一些殘酷面。

從前跟我爸爸很熟的那些商場朋友來家裡討債，大呼小叫，把父母罵得豬狗不如。當時還小的我開始困惑：不久前還在我家跟爸爸喝酒，兩人稱兄道弟，現在爲了錢，轉瞬間卻翻臉不認人。

我常常想：如果房子被查封了，以後誰來養家？作爲長子的自己，是不是要輟學去工作？如果有一天沒有地方去了，我的祖母能夠去哪裡？我的弟弟妹妹能夠去哪裡？

不能免的，我的腦中出現烏托邦圖像：設想有一個貧民的醫院、一個貧民的學校，小朋友可以去那裡，而我，則可以去某一個貧民的學校半工半讀……。這是一個貧窮孩子僅有的想像。

這些圖像留在我心中，一直到踏入新聞工作後都忘不了……。

台中一中的叛逆傳統

國三那年冬天，有一次，我從烏日走到台中監獄去看母親、幫她送東西；然後一個人從監獄走路回烏日。當下的我覺得心裡很苦悶，我告訴自己：一定要好好讀書，不然，未來可能連讀書的機會都沒有了。

因此，我開始大量閱讀課外書，希望能夠改變這種處境。閱讀就像是一種逃避，讓我覺得有一個美好的世界在那裡。

高中考上台中一中後，認識幾個好朋友，我們後來一起搞起文學社團。包括翁志宗、鍾喬、林安梧、路寒袖、黃勝豊等人。現代文學作家中，陳映眞對我影響最大，他的小說《我的弟弟康雄》所描述家道中落的、蒼白的、略帶理想主義的虛無青年，在夢中建構起社會主義的烏托邦——貧民醫院、貧民收容所等，與我所遭遇到的家庭變故與人情冷暖，竟是如此相似，彷彿說出了我所有的絕望與希望。

而台中一中有個很有趣的傳統，就是「叛逆」。記得進入台中一中的第一天，校長上台致詞不到一分鐘，就被台下高二、高三的學生噓下台了。班會時間很自由，老師也不太管，所以學長們就在班上模擬了文化論戰。我常常跟這些高我一屆的學長混在一起，去圖書館找書讀，也把當年舊的《現代文學》、《筆匯》都找出來看。

當時還有一種閱讀的樂趣，那就是到小書店找禁書。李敖是台中一中畢業的，那時還在坐牢，是大家的偶像，只要是他寫的書或是他借過的書（台中一中圖書館登記）都成爲我們的書單。當年《文星雜誌》曾經掀起「東西文化論戰」，因此我們把《胡適文存》、殷海光寫的邏輯實證論、自由主義的

書，還有韋政通、徐復觀等等，拿出來半生不熟吞讀一通，而且還模擬著論戰，互相批判。想想，當時才高一、高二的學生，卻超出年齡地閱讀著這種大學生才可能讀的書，用自己有限的知識，如饑似渴地看，半生不熟地讀，也沒人指導。這種閱讀經驗，也實在是少有的吧。但我們就是這樣走入知識的領域。後來回想，可能是這時候種下自由主義的火種吧。

高中的我，就浸濡在台中一中這樣叛逆的學習氛圍中。大量閱讀文學作品，開始寫詩，寫散文，也深深影響著後來我的採訪寫作方式。

社會主義與新左初體驗

眞正接觸到社會主義，是在我上大學以後。

當時「社會主義」四個字還是禁忌，而眞正帶我走進社會主義思想的是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 1842-1921，著名俄國無政府主義者）的《我的自傳》。這本書描述了一個少尉軍官，爲了理想，流放到西伯利亞大雪原。

對於初接觸相關思想的我來說，這本書眞是太迷人了；有文學的細緻文筆，有北國流浪的荒涼，有理想主義的熱情，有崇高的精神信念……，讓人深深著迷。我就這樣從克魯泡特金開始，走向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

讀大學時，許多台中一中的同學也都到台北來了，我們延續著在高中看禁書、找禁書的興趣，找一些像盧卡奇（Georg. Lukács）等新左派的禁書。

這應該是當時年輕學生之間的一種流行吧！大家習慣去重慶南路某一家地下書城裡面，到櫃子的後面去，翻開綠色書皮的盧卡奇、馬庫色、阿圖塞等，半生不熟地自己閱讀，開始討論，有的讀得通、有的讀不通。

年輕學生雖然猛讀一些新思潮的書、共同討論，但都還沒有想要採取什麼行動。一直到一九七八年中美斷交時，大家才開始感受到政治的苦悶。

寫長詩獲得時報文學獎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當年立委、國代選舉因為中美斷交而暫停。那幾天我和朋友們常常聚會，討論未來的時局該怎麼辦，也開始注意社會上的一些現實問題。後來發生了美麗島事件，我們注視著大審的不公正，卻無能為力。

那時候的我有一種很深的政治虛無感，因此在大三升大四那一年的夏天，寫了一首長詩，叫作〈刺客吟〉。

「既然改革無望，人乾脆當刺客好了。」詩的內容主要是用無政府主義的思想，來詮釋荊軻這個人物的內心：我想描述一個絕望者，最後能採取的唯一行動，是成為刺客。

後來這篇作品得了時報文學獎的優等獎。《時報周刊》因此找上我，寫了生平第一篇報導，報導內容是介紹一個收藏很多古劍的人。他們還要我畢業之後直接進入時報周刊工作。但我決定繼續念書，畢業後考取了文化大學的藝術研究所。

「礦坑裡的黑靈魂」顛覆刻板印象

考上研究所的那一年正好流行一部電影，叫作《礦工的女兒》。同年暑假，時報周刊邀我寫一篇「礦工的女兒」，報導傳聞中瑞芳礦工把女兒賣入紅燈戶的故事。

但我實地觀察後，發現那裡跟想像的完全不一樣。因為，沒有一個人會在自己的家鄉賣淫，賣淫基本上都要到遠方去。於是我找了朋友，帶我去九份的一個小礦坑，在地底坑道裡陪著礦工爬行，待

了一天，真正體驗礦工在幹什麼、過什麼樣的生活。後來我把在礦坑的見聞寫成一篇報導文學，叫作「礦坑裡的黑靈魂」。

由於「礦工的女兒」根本是外界的誤解，於是我按照自己的觀察、採訪去寫。我知道時報一定不會用，所以我另外投稿給當時的一個黨外雜誌《大地生活》。

黨外雜誌的日子

念研究所時，我開始投入黨外雜誌大地生活擔任主編，也幫黨外人士助選，半夜還曾接過恐嚇電話。我曾用陳文成弟弟的署名，寫對哥哥的回憶錄，寫到陳文成案的一些內幕，登在《深耕》雜誌。可能這篇文章是用文學的手法回憶陳文成，比較感性一點，所以最後沒有被查禁，逃過一劫。

回想起來，黨外雜誌那段日子還挺有趣的。當時有三個互動密切的黨外雜誌，一個是《八十年代》，司馬文武是總編輯；許榮淑、林世昱則在深耕；徐璐和我在大地生活雜誌。常常三家黨外雜誌一起去聯誼喝啤酒。

那時候「敢出來」參與黨外的人並不多，也還沒有統獨論戰，所以基本上不會區分誰是統、誰是獨，大家常常在一起討論內容，互相幫忙。

印象最深的是大地生活最後一期，要作一個「三十年政治犯」的專題。當時，立委蘇秋鎮在立法院質詢問：「為什麼還有三十年的政治犯被關在監獄裡？」雖然官方的口徑一致：「沒有這件事情。」但後來透過線索，我認識一個關了二十四年的老政治犯，拿到三十年政治犯的名單。又採訪到被關了三十年的政治犯謝秋臨的母親。我用報導文學的筆法寫成一篇文章，還把政治犯的名單全部列出來。

當時我已知道這期「穩死的」（台語），不被查禁才怪。於是我就決定把版型做好之後，另外再留一份給司馬文武。萬一我們徹底被查禁、被「幹掉了」，就讓八十年代之後再重印一次。

結果那一期果然被查禁了。但是警備總部沒有去印刷廠沒收，所以雜誌還是可以印出來，私下在市面上流通。

黨外雜誌年代，面對龐大的政治壓力，每出一期雜誌就像在打仗一樣。現在回想起來，它仍有另一種「貓鼠之間」、你抓我閃的樂趣。

「政治犯」帶我進報社

我們報導政治犯的名單出來之後，就有立委拿去質詢。那一年的冬天，過農曆年前，蔣經國放了第一批政治犯。後來陸續放了第二批。坦白說，作一個寫文章的人，可以幫助關了三十年的政治犯放出來，這是我此生中最大的光榮。

大地生活最後一期做完之後，我曾在林正杰的《前進》雜誌幫忙寫稿。當時想好好把研究所念完，對進去雜誌社工作沒什麼意願。可是機緣卻來得那麼突然。

因爲寫政治犯的故事，我認識了更多先後被釋放的政治犯。他們其中一個人問我說：「你現在在做什麼？要不要來報社工作？」我問：「哪一家報社？」他回答：「中國時報！」就這樣，我正式踏入新聞界，成爲《美洲中國時報》的編輯。

這位政治犯的名字叫李明儒，後來擔任《中時晚報》的副社長跟總編輯。介紹我進時報時，他在美洲中國時報當副總編輯。

在我還沒進報社前，曾有同事對我說：「你的身份蠻敏感的。」聽說當時還有一些我參與黨外活動的黑資料，一起被送到中國時報。但李明儒先生和其他人爲我「扛」下來了。我想，報社的背後，應該有一套情治系統在暗中運作，檢查記者背景。

李明儒是個很有經驗的前輩，聽說他後來幫我承擔了很多，也教導我許多觀察與判斷新聞的原

則，受益不少。

率先使用「原住民」

因爲我實在太愛文學了，所以在美洲中時當編輯的那段時間，除了報社工作外，我仍然投身文學創作。

一九八三年左右，因爲尉天驄與陳映眞等文學界朋友籌畫讓《文季》復刊，開始向老朋友與年輕朋友約稿。我投了一篇小說。後來他們說，既然要做，文季只是文學創作，何不來一本詩刊？當時由我和施善繼、李疾等一起籌畫，開始約稿。我們邀集了蔣勳、吳晟、林華洲、廖莫白（本名廖永來）、王浩威（當時是高醫學生）、何金山、莫那能等人，一起來寫詩，編詩刊。我們命名爲《春風詩刊》。每一期取一個書名，共出了四期。這是爲了逃避出版法對雜誌的限制，而採取以書爲名、實爲不定期詩刊的作法。

詩刊的第一集是《獄中詩專輯》，內容有南非詩人、南美洲作家、艾青、戴望舒等人寫的獄中詩。還有一些政治詩，當時還在文壇上引起爭論。第一集，就被查禁了。

那陣子我很關心原住民議題，春風詩刊曾寫一篇排灣族工人莫那能的故事，後來還把他創作的幾首詩整理後，以《山地人詩抄》爲題收錄在一起，成爲春風詩刊第二集。爲什麼叫「山地人」？因爲當時還沒開始使用「原住民」的稱呼。

美洲中國時報停刊前後，我認識了一群關心原住民議題的朋友，包括胡德夫、夷將・拔路兒、黨外雜誌的美編王智章、人間副刊的王志明（後來加入「新潮流」），還有范巽綠和張富忠等等，想要組織一個原住民團體，編一本原住民的通訊雜誌。

我們知道「山地人」、「高山族」、「高砂族」等，都是歧視性的名詞，因此爲了組織、會訊的名

字，特別由王志明去找出兩個民族學上的名稱：一個叫原住民，一個叫先住民。當時我們一起討論，我認爲用「原住民權利促進會」比較適合，這樣一來會訊就叫作「原權會」會訊，而「原權」就像是代表一股源源不絕的力量。這比「先住民權利促進會」好多了。大家討論之後，最後確定就叫「原住民」。

會訊編完了，我們面對第二個問題，如何寄出去？寄給誰？當時胡德夫的構想是寄給山地部落的村里長、牧師，還有各小學。但我們擔心如果統一寄出去一定完蛋，信件在半途就會被攔截。於是我們決定用最普通的信封貼上一般的郵票，然後分頭送到各個地方。

當時快過年了，同志們一起聚在我家貼郵票，搞得像祕密結社，非常興奮。我們都覺得自己很像情報員，郵票貼了一整晚，然後騎摩托車去找不同的郵筒分散投寄。

然而這些通訊最後都沒幾個人收到。胡德夫去山上一查，才知道我們自以爲很聰明地分頭投郵筒，但所有郵筒內的信件，最後還是會到達同一個山地部落，他們只要在部落裡進行攔截，就完了。我們眞白忙一場。這就是第一期的原權會會訊。

我眞的瞭解台灣社會嗎？

一九八四年我從研究所畢業後，曾在文化大學兼課，隔年秋天決定回到時報上班。胡鴻仁則推薦我去《時報雜誌》編副刊。

那時候，胡鴻仁問我一個問題，後來我一直放在心上。

過去讀過一些書，自以爲可以做一些叛逆的事情，帶著浪漫的情懷，把「社會革命」當成理想的志業。但胡鴻仁問我：「你有沒有去瞭解整個社會性質與社會的變遷？要先瞭解，它有沒有革命的條件，這樣才能有清楚的判斷。如果沒有革命的條件，就得走改革的路。要改革，就得慢慢來，一步一

步地來。那是和革命完全不同的。我們就要有不同的人生規畫。」

當下，我不禁自問：我真的瞭解這個社會嗎？我浪漫地想像著革命，激烈地反抗國民黨的戒嚴統治，但它的社會條件在哪裡？台灣有革命的社會基礎嗎？對我來講，這是最基本的問題，而我卻還沒做好這個「功課」。我於是開始找相關的社會分析的書來看，用比較冷靜的社會科學的態度，分析台灣，自己尋找答案。

一九八六年，時報雜誌決定改版成《時報新聞周刊》，王健壯、陳浩、吳戈卿、張叔明等人，還有金恆煒都參與其中。那時候我在心中默默列一個計畫：要自己到處去採訪，好好瞭解台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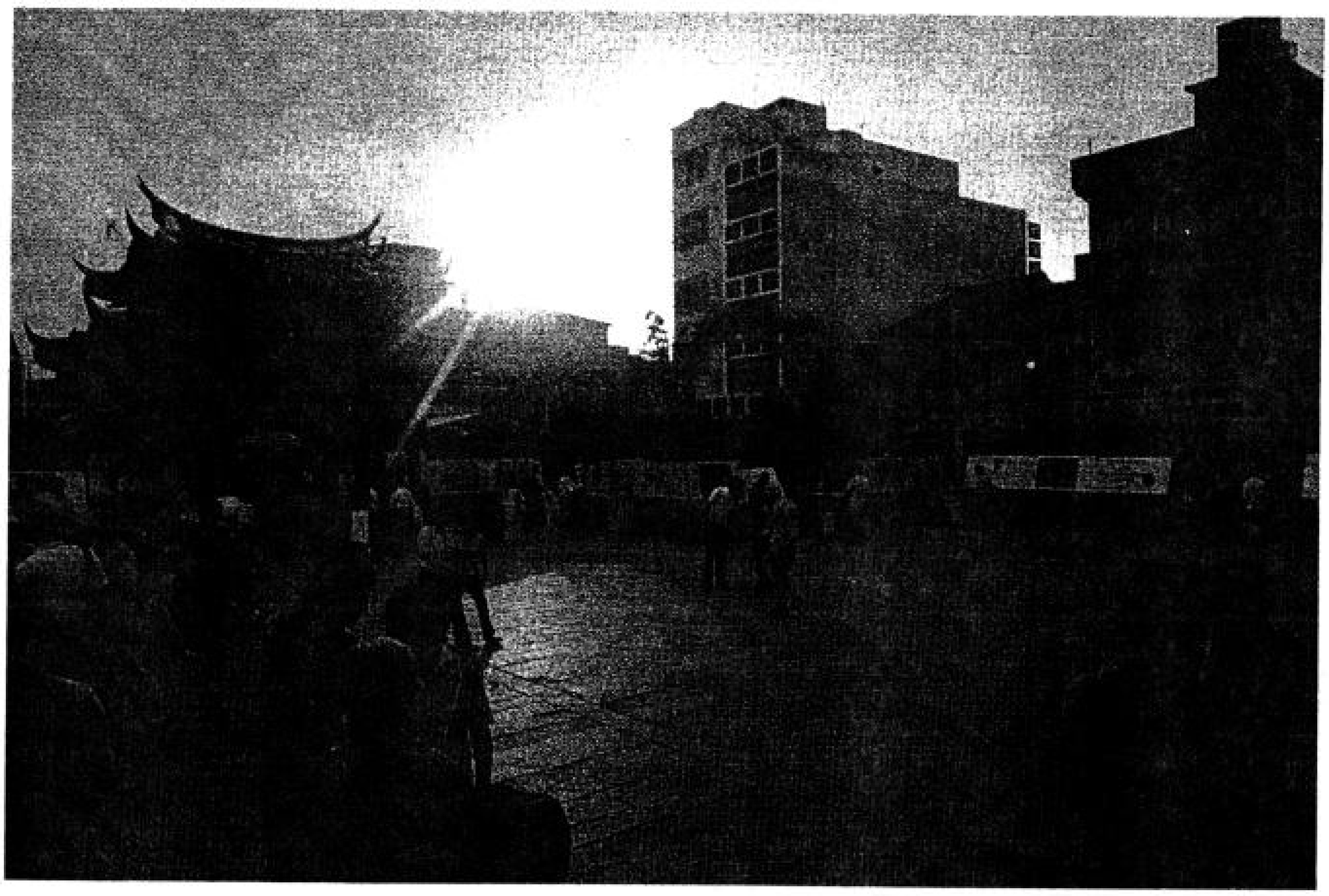
在此之前，我曾經讀過張俊宏等人寫的《台灣社會力分析》，內容比較是大架構式的分析，而不是真實的社會現況，爲解答心中疑惑，我決定到台灣各個現場採訪、跑一趟。

當時我給自己列了很多題目，包括農業的、漁民的、勞工的，還有環保的。採訪背後必須有分析的基礎，必須在舊文獻裡找到分析的大架構，再從架構裡尋找具代表性的採訪個案及model，而不是隨便到現場找一個農民就說代表全體農民。這樣前前後後採訪，花了兩年多的時間。

「我要鹿港，不要杜邦」

在戒嚴時代，鹿港反杜邦運動是美麗島事件後，第一次可以把標語公開貼出來、甚至公然走上街頭的社會運動；那種情況是在台北未曾想像到的。而我是在參與社會運動的朋友——盧思岳、范振國、鍾喬的邀約下，到現場採訪——說是「參與」會更貼切一點。那年代，是《人間雜誌》剛剛開始的時刻。它的社會關懷與人文理想，帶領我們走上社會運動的現場，參與而且帶起社會運動。

採訪過程中，我曾跑到廟裡跟老人聊天，才知道老人真正擔心的是，如果海被污染，等到沿海的



上：「跨國公司的入侵，是鹿港古蹟的黃昏？」
下：「只要肚兜，不要杜邦」——鹿港人參與反杜邦運動的標語。（皆出自《民間的力量》／楊渡攝）

1986年12月13日，反杜邦的鹿港人到總統府前抗議。（出自《民間的力量》／楊渡攝）

魚全部掛了之後，漁民就無法生存了。所以，老阿伯才會加入反抗。還記得第一次的採訪，我在那裡待了一個多禮拜，到基層瞭解現場群眾的眞正想法。這跟從報紙知道的情形是不太一樣的。

由於兄弟都已經在鹿港參與了環境運動，我也實際參與反杜邦運動，甚至幫忙想策略、寫聲明，包括李棟樑成立彰化縣公害防治協會的演講稿，也是我幫忙的。機緣下，我還與李棟樑結拜成兄弟；他也是我生平唯一一個結拜兄弟，感情很好。

記得我拍過一張照片，場景是在鹿港龍山寺的古蹟上，黃昏的夕陽照射之下，黃色的光、古老的廟，前面貼著一張標語：「我要鹿港，不要杜邦。」那張照片眞的很震撼，因爲當時沒有任何反對經濟發展的環保運動，那是開始的第一聲。這張照片後來成爲中時報系年度重要攝影。

採訪反杜邦運動之後，我的社運關懷愈來愈強烈，雖然在時報有工作，但我同時加入了馬以工的《新環境雜誌》，當了好幾期的主編。

舉辦台灣第一場反核運動

一九八六年蘇聯車諾堡事件發生。我不相信台灣的核電廠這麼安全，所以我決定跑去恆春作調查採訪。由於涉及核三廠敏感的死亡人數，所以在採訪過程中，我一直覺得有人在跟蹤我。

我曾採訪一位因罹患腦癌而死亡的核電廠工人，還寫成長篇報導，控訴核電廠造成的職業災害。文章寫完，有一次，核三廠舉行核能災害演習，他們通知了所有記者，卻不通知我。其他的記者告訴我這件事，我決定自己去採訪。記得舉行演習是在恆春，所有媒體記者都提前去恆春住宿了，只有我獨自住高雄，當天早晨再到恆春飯店會合。當我到達的時候，就聽到核電廠的人竊竊私語說：「啊！那個人來了！他怎麼來了！」顯然，他們很緊張，而我早就被他們盯上了。

寫完核三廠的報導後，我心底想，當地的人活在核能的陰影下，怎麼沒有任何反核行動呢？於是

我透過一個搞攝影的朋友關曉榮，請他在恆春國中教書的老婆幫忙借場地，決定開始辦反核演講。這是台灣第一場反核運動。因爲還是戒嚴時代，警備總部顯得非常緊張。

那時還沒有手機，我們把聯絡中心設在關曉榮的家，就在恆春國中的宿舍裡。沒想到，南區警備總部的人居然一通電話就找到我，直言：「我們知道事情是你策畫的。」還要派車子接我去南警部談談。但運動現場需要有人指揮，於是我拜託當時新環境雜誌主編李疾代我去。

演講當天，竟來了三、四百人。禮堂外面則佈滿了南警部的鎮暴警察，沿路戒備。學者柴松林、陳映眞、張國龍、鹿港的李棟樑等朋友都特地來恆春聲援，參加演講。後來我們還在街道上挑釁警察，造成了一陣騷動，幸好沒發生意外。

就這樣，我們幹了第一場反核運動，也是我參與過最敏感、最激烈的一次社運。

社運新聞的寫作策略

當時我參與過很多社運，有時採訪、有時策畫。奇妙的是，報社卻從來沒有吭聲過。不管是蘭嶼反核、反杜邦等等，我都不曾被報社高層直接「關注」過這些事。當然他們或許有耳聞一些我參與的消息，覺得我的稿子特別敏感，作了比較詳細的「檢查」，改動一些敏感的字眼。但因爲無實際參與證據，也就睜隻眼閉隻眼，大家相安無事。

最初報社內部編輯有人覺得，我的報導文學筆調怪怪的，筆鋒常帶感情，與一般新聞寫作完全不一樣，有點擔心。但後來的雜誌閱讀率調查發現，我文章的閱讀率很高，他們就不在意了。而我也尊重他們，盡量找跟新聞性相關的議題採訪。

我報導社運新聞時，寫作方式跟一般新聞寫作不同。一般新聞報導強調新聞單一事件本身，但報導文學看重「人」，希望透過人的故事，刻畫事件幕後的「眞實」（reality），而不只是眞相（facts）。

此外，報導文學強調「觀點」。一般新聞會要求你最好不要有個人觀點，但報導文學則會選擇觀點切入事件。因爲有觀點，才有深度。

例如，反杜邦要從哪一個角度來切入？我可以直接敘述當地有一群人在抗爭、杜邦將要進駐，也可以換個方式探討形成社會運動背後的眞正原因。爲什麼是這一群人出來，代表的是誰，利益在哪裡，他們的觀點、成長背景，以及故事。

又好比採訪核三廠，我想探討輻射傷害背後的問題，先列出幾年來的死者名單，再去採訪一位丈夫死於輻射傷害的婦人，聽她敘述她的老公、講她自己的故事。我把這段故事放在整個報導的開頭，當讀者看完以她爲主要敘述者的故事後，再進入核三廠事件，就會很有感覺。否則，報導中只看到數目字，是無法引起共鳴的。

不過，當時想在時報寫評論或分析災害背後的政治經濟因素，是不太可能的，因爲批判性太強了。以核能爲例，我只能夠寫到死傷多少人、核電的安全必須怎樣注意等等；核能背後的政治經濟學，既然不能登在時報，我就不管如何寫出來，把它登在前進等黨外雜誌。

在那個年代，雖然無法期待所有的文章都能在報紙出現，但如果想要讓眞相呈現，還是可以尋找很多管道發聲。

那兩年走透透的採訪經驗，讓我把原來想作的調查報導一一完成，也讓我把台灣社會分析的課程好好補完。在社會的底層眞實地走一遭，走到原住民的部落，走到漁村，走到勞工工運的現場等等。後來我出的兩本書《民間的力量》和《強控制解體》，就是我對台灣社會認知的總結。

機場事件歷史見證

我在《強控制解體》中曾寫道：「歷史不是握在誰的手裡，眼睛也並非全然蒙蔽，見證者遲早會

寫入紀錄裡。」我在「機場事件」的採訪經驗便可驗證這句話。

一九八六年年底，許信良闖關回台的機場事件發生，我從台中被調去桃園中正機場支援。當時碰到的壓力在於：面對的眞相不一定能寫出來。

機場事件「打」得太凶了。那時我面對一個抉擇：當某些人說群眾是暴徒的時候，如何讓眞相被呈現出來？我採取的便是報導文學的寫作策略。

若說是「暴徒」，應會預先準備好石頭。可是那些人什麼都沒有準備，反倒飢寒受凍。看到一個香腸攤子從遙遠的地方過來時，大家都拍手鼓掌說：「爽啊！終於有吃的了！」所以，我試著描述那些人在機場安靜等食物、等水、飢寒受凍的景象，試著去描寫他們的對話。

那天回到報社之後，我把現場的狀況寫進報導、傳到美國，《時報新聞周刊》美國版也順利刊出。然而隔天，高層的壓力就來了，台灣版無法刊登。雖然稿子被壓下來，我依然把事件發生的始末、幾點幾分發生什麼事都留下紀錄，後來在《強控制解體》中一併曝光。

「我就是要留給你看，不要以爲大家都記不住。」我一直覺得，壓力並沒有什麼好恐懼，任何一個政權，都試圖用遺忘擊垮集體記憶。但我認爲，記者必須要有心理準備：你的報導今天不被刊登；留下來，未來的歷史會跟當權者對抗，眞相並不會被當下的遺忘所擊垮。

新聞客觀是「僞善」

我認爲，作爲一名新聞工作者，一方面可以從比較遠的距離去觀察社會運動，一方面則可以幫他們發聲。若你問我，在社運事件中參與得那麼深，如何保持記者的客觀中立？我會說，新聞客觀那一套是「僞善」！

譬如，杜邦有一個很強的公關公司，能爲杜邦發聲，但社運團體能做什麼？從何發聲？在不對等

的新聞關係下，假裝自己客觀，客觀何在？事實上，背後卻隱含了權力關係。因此，我不認爲自己可以假裝客觀地做一個僞善者。

我認爲，從哲學的觀點看，新聞報導其實是由無數「生命主體的認知」所堆積起來的。這些生命主體包括：被採訪者（他選擇講什麼，不講什麼）、記者（他選擇用什麼文字記錄）、編輯（他選擇要用那一段稿子，或者不用）、總編輯（他決定稿子的最後取向和標題等），以及媒體老闆的觀點與取向。這個過程，是由無數「生命的主觀主體」所構成。每一個人都會選擇以自己的認知來描述事件經過；一場大事件，尤其很難有全面的觀照。所以，記者的「客觀」本身是不存在的，是一種虛構。

對我來講，每一個人的記憶都是自我的主觀認知，新聞是一個眞實的「再現」過程，而「再現」的過程，就不可能眞正看見原來的面貌。

在機場事件的採訪中，我就發現，群眾運動現場是不可能客觀的。

當時記者都碰到一個弔詭現象：所在地點與所獲資訊的侷限性。站在警察後方的人覺得民眾是暴徒；站在群眾這邊的，也覺得是警察先丟石頭的。回到報社之後，兩邊說：「是你們那邊先對我丟石頭的，還把我們打到那麼慘！」每個人都以爲自己是客觀、全知的。

記者在那一次受到很大教訓。同樣一個現場，位置不同，觀點就不同。

因此當時採訪社運新聞、參與社運，我並不覺得這是一個新聞道德的問題，而是「justice」的問題。如果新聞最後不能維護justice，我就眞不知自己在做什麼了。包括採訪機場事件、核三廠事件、反核運動等，我都抱著同樣的心態與信念面對新聞現場。

過度同情「五二〇農運」

一九八八年二、三月間中時晚報創報，獨創了「社會運動採訪小組」，而我是採訪組長。當時由

於「社會運動採訪小組」名稱太敏感，所以我們都稱作「新環境小組」。路線分為勞工、教育、環境、農民及人權問題。

進入中時晚報不久，五二〇農運就發生了。

五二〇農運本質上是農民領導權的鬥爭。當時各地的農民尚未成立組織。五二〇前夕，新潮流系眼看農運獲得社會支持，於是扶持林國華、蕭裕珍的「雲林農權會」，和美麗島系的林豐喜爭領導權，之後便爆發五二〇事件。

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日，雲林農權會北上遊行抗議，隊伍行經立法院時即與警方爆發衝突。群眾開始丟石頭，警察也丟石頭，群眾因此流血受傷送醫院，之後憲兵開始鎮暴。

外傳這些石頭是從中山南路撿到的，但其實是預先設計好的，群眾將石頭藏在蔬菜、水果下面，成為攻擊的武器。

在長期黨國威權統治底下，農民團體、工人團體發聲的機會並不多，當時的社會運動，基本上不是要起來革命、推翻政權，而是弱勢團體回復到社會應有位置的一個過程。因此當時媒體對五二〇的詮釋都是比較同情農民的，也都盡量幫農民辯護，因為當時農運、社運基本上都還沒有發展起來。

事後回想起來，我覺得媒體似乎「矯枉過正」、過度同情了，包括我自己在內，都如此。當它開始發聲時，縱容它發出各種聲音，都必須加以分析，或是更深入地批判。這是我對五二〇事件的省思。

對「中時工運」的不同看法

一九八七年解嚴那年，中時發生工運事件。對於中時工運，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而這必須從蔣經國的媒體策略與中時的角色定位談起。

蔣經國總統過去以兩手策略控制報紙，他將黨內及媒體分為兩條路線：一是保守派，包括警總、政戰系統，以及王昇，再加上《聯合報》；另一條則是開明派，像是李煥、黨務系統，媒體則是中國時報。當蔣經國需要改革時，就會用中國時報鼓吹，再請自由派的學術團體發表言論、寫專欄。如果過頭了，就讓保守派透過聯合報出來批判。當年中時與聯合的矛盾，固然有市場因素，但當政者的操弄，也是原因。

在我的觀察中，解嚴前後社運、工運的蓬勃發展，關鍵性的因素便是媒體從中扮演「同情者」的角色；而中國時報作為自由派媒體，常常是帶頭的那一個。中時的余紀忠老先生，就是典型的自由派代表。

記得一九九〇年「野百合學運」的時候，中時有好幾個記者花錢買廣告表達支持學運，政戰系統還很緊張地跑來問余紀忠：「你是不是支持？為什麼記者都自己刊廣告？」當時余紀忠覺得好笑，把記者找來問：「你們怎麼刊這種廣告？」之後笑一笑，沒有反對，也沒有批評。

余紀忠先生曾和我談起，從前他在中國大陸念南京中央大學的時候，參加學運，衝進外交部長官邸。部長躲起來了，他去警衛室把他找出來，憤怒地把墨水瓶子丟過去，丟得部長滿身都是。余先生去世後，我為他寫紀念文章，編紀念文集，發現了一張照片。那是他在英國留學時，於湖上划船時所拍攝。他戴著帽子，穿著格子襯衫，嘴巴叼一支菸斗，頗為叛逆的樣子，一副「費邊社」自由主義的嘴臉。這時我才真正瞭解余先生的思想根源。

我認為，老先生很清楚自己在國民黨的媒體策略中所扮演的位置與角色，所以中國時報一貫對於弱勢者還保有基本的同情。否則像吳永毅、鄭村棋這些記者的文章，如何能夠持續出現在重要版面？當時的報紙只有三張而已，老先生必定很賞識他們，要不然這樣的觀點是不會出現的。

中時工運初期，我曾建議鄭村棋「最好不要在時報搞下去」，因為我認為，就社會運動來講，如

果可以保留像中時這樣的媒體外援，無疑對壯大整個社會運動有益。但當時鄭村棋還認爲這種觀點是「屬於資方的」。

我很認同唯物辯證法「局部眞理不等於全局眞理」的道理。表面上，勞資糾紛應該保護勞工權益，進而抗爭以爭取新聞自由；但若以全體工運作考量，卻發現工運可能會因此失去媒體外援。沒有社會同情，整個工運、社運將走向沒落。

兩岸探親開始登「陸」採訪

總結之前「全台走透透」的經驗，我一面參與社會運動，一面採訪各類型社會運動，試圖把台灣社會的本質與問題弄清楚。我得到一個結論：台灣的社運並非是要推翻整個社會體制，也不像西方法國大革命或蘇聯革命一般激進，而是要恢復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原有的權利。

譬如農民運動推動農地自由買賣，就是要把土地商品化、資本主義化；另一方面，台灣在威權體制底下，經濟上雖已經資本主義化，但政治生活卻還未跟上腳步，沒有完整的議會政治，也缺乏民主法治的運作。因此我認爲，這一段期間社運蓬勃發展的現象，應稱之爲「資本主義的補課」，而非一種革命。

在我大致瞭解台灣社會整體的發展趨勢之後，我發現影響台灣未來命運的，不只有內部因素，還有外來因素。正逢兩岸開放探親之際，我開始關注影響台灣的外來因素——中國大陸。

一九八八年，我陪著李明儒先生返鄉探親，走訪北京、安徽、西安、廣州等地，讓自己認識眞實的大陸。

一九八九年三月，我則是代表中晚正式登「陸」採訪兩會（中共人大、政協大會）。當時最強烈的印象，是中共總理李鵬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其中寫到歐洲、非洲、中南美洲諸國，還有東南亞小

國，一一報告外交關係。那些我們未曾注意的國家，竟是他們必須打交道的對象。這讓我從頭觀察大陸的政策思維，瞭解這是「大國外交」與大國經營。

當時爲了採訪，《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的作者嚴家其介紹我認識大陸比較知名的幾個記者，而他們大多是反對派。我就跟著他們在街頭啖小吃、聊天。我也接觸了不少反對派的異議人士，如陳軍、詩人老木等，他們後來都參與了六四天安門事件，最後流亡異鄉。像嚴家其、蘇曉康，我們都還曾在台灣見過，而且眞正的深談對美國與西方民主的認識。

採訪「六四」感受槍林彈雨

談起登「陸」最難忘的新聞，莫過於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

六四前夕，北京交通癱瘓、社會動亂，許多人還四處呼籲小偷「罷工」，因爲害怕政府會胡亂栽贓，甚至羅織罪名藉以鎭壓。我與同事徐宗懋前往採訪最新情況。但也有某電視台的記者跑到蒙古旅遊，不在事件現場，卻還能做成新聞。

當時記者都聚集在長安大街的北京飯店。爲了避免新聞檢查，我和徐宗懋住進另一邊的東方飯店。後來我們才知道，發出去的每張稿子，官方的傳眞機其實都收得到。

六四正式爆發當夜，我東躲西閃，由一個計程車司機帶著，穿過各處胡同，進行採訪。看見的盡是兩造衝突的現場，死傷者人民比較多，但也有一個解放軍死在街道上。街道非常危險，冷不防還有呼嘯而過的掃射子彈。隔天清晨，學生從天安門廣場開始撤退，我準備回飯店打稿，但徐宗懋卻堅持要留下。由於他前一晚待在廣場，沒有感受到槍林彈雨的威力，我很替他擔心。

回飯店不久，電話響了：「很嚴重，你過來看一看好了！」徐宗懋受傷了，人在同仁醫院。

但一夜戰亂，路被封、車子橫在路面，還有燒過的輪胎，就像戰場一樣，這時哪裡去叫車子？幸運的是，一位北京老先生此時居然踩了一台板車悠悠晃晃過來，就這樣一路顛簸地載我到醫院去。當時解放軍正在移防，列隊從我們身旁而過，老先生邊騎邊罵：「他媽的劊子手！操他媽的劊子手！」老先生的話讓我心驚膽跳，深怕驚動解放軍，引來殺機。

一到醫院急診室，就看到徐宗懋趴在血泊中，喉嚨還不斷湧出鮮血，看樣子是中彈了。原來，在天安門廣場開始清場時，徐宗懋被槍掃射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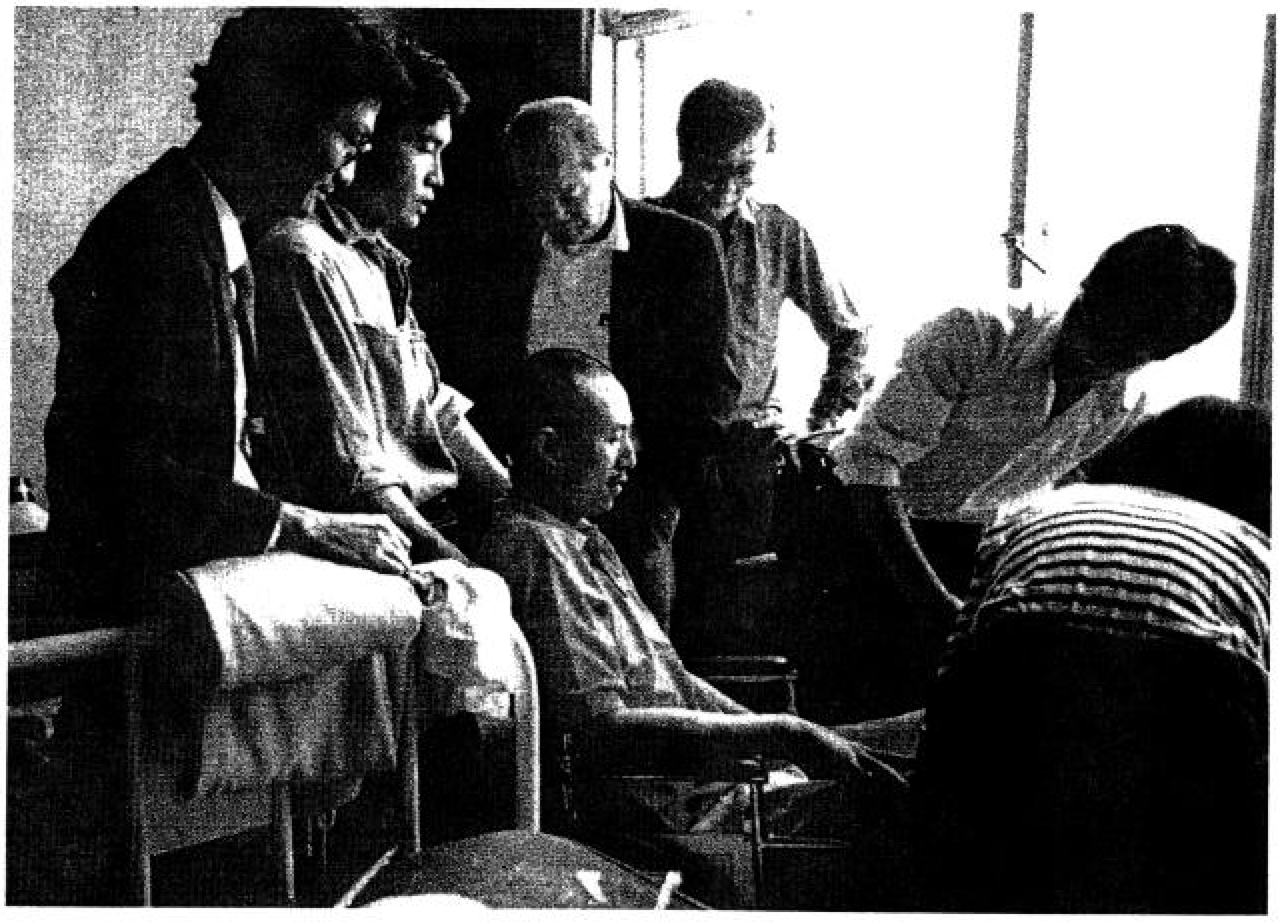
悲從中來放聲大哭

當時北京傷亡累累，調血袋很困難。好不容易找到跟他血型一樣的護士，緊急輸血後才稍微穩定下來。我向護士道謝，她卻帶我環顧醫院，看了醫院傷亡的情形，還把他們拍攝的照片、底片都拿給我說：「不要你任何感謝，請幫我們把訊息傳出去。」

徐宗懋中彈，醫生建議徐宗懋作超音波檢查，於是我們驅車前往另一家腦科醫院天壇醫院。救護車一開動，車外的民眾就用擴音器廣播：「裡面是一位台灣記者，他受傷了，請大家讓開！」還配合開路、搬石頭，讓我們順利抵達。我想大概是他們認爲海外的記者可以幫忙把真相傳播出去，所以一聽到是台灣記者就特別友善。

處理完徐宗懋受傷的事，返回飯店，我打回台中報平安，聽到我女兒的聲音「爸爸你有沒有怎樣」，掛完電話後我悲從中來，就一人趴在旅館大哭一場。這是我自十四歲長大之後，第一次放聲大哭。

當時我把徐宗懋受傷的經過，用報導文學的筆調寫成報導。因爲是突發事件，來不及一天寫完，於是我寫成上、下兩篇，每篇約五千多字，連續兩天刊登，晚報刊完換日報登。聽說大家邊看邊哭，



上：(左起) 郭承啓、楊渡、黃順興、趙慕嵩在北京病房陪受槍傷的徐宗懋。(中國時報提供／中時攝影組攝)
下：《中國時報》特派前往北京採訪「六四」的記者趙慕嵩（左）、楊渡（右）返台，《工商時報》、《中時晚報》發行人余範英（中）前往機場迎接。（中國時報提供／包承平攝）

許多讀者還打到報社問：「到底人是活著，還是死了？」

報導文學強調場景的描述，以及對人、事、物的透視能力。我認爲在大事件的現場，眞正動人的力量，是人的生命與感情。況且社會運動背後的結構性因素，不是一則新聞就能夠解釋清楚的，所以我寫六四，寧可把故事講清楚，至於判斷則留給讀者。

在台灣參與過那麼多不同形式的社會運動，六四事件的採訪經驗卻依然讓我震驚，感觸很深。後來結集爲《天安門紀事》一書。我在大陸前後採訪了七年，後來寫了《大逆轉——世紀末透視中國》。

寫社論向余紀忠學習

一九九一年我曾在中時晚報做過撰述委員，到了一九九五年開始擔任中時晚報的副總主筆、總主筆。直到一九九七年，我調到中國時報當副總主筆，才正式結束大陸的採訪任務。

寫評論又是另一件事了。我覺得寫評論，文字不一定要硬梆梆的，不一定要談政治。我在中國時報寫評論的這段時間，就希望能夠帶入文化、教育、環境、原住民、弱勢者等議題，讓面向多元一點。

有一次汪其楣老師親自詮釋「蔡瑞月」這個角色，我就在社論中寫蔡瑞月過去的故事。我也寫過林懷民的演出。社論本身是可以有人文內涵的。

在中時寫社論，印象裡，現在的「老闆」余建新除了跟大家開主管會議，基本上不太管言論；但「老先生」就不同了。對重大事件的評論，有時候余紀忠還會拿來一字字地改。好比李登輝發表「兩國論」時的社論就是一例。

當時林聖芬是總主筆，我則是執行副總主筆。以老先生那個年代在媒體界的影響力，動見觀瞻，因此他很慎重看待這次的社論。他認爲，如果因爲兩國論引起兩岸衝突，中共會動用武力，因此他想

藉由社論傳達：台灣不是只有李登輝這種聲音，還有其他的聲音。

寫社論，他先與大家溝通觀點，再由我們執筆；寫完後，他再看細部的面向，繼續討論，接著就一字字地修改。當晚十二點多，眼看截稿時間在即，我還預先準備了另一篇稿子，好隨時應變。

那時候老先生已九十高齡，卻意志力驚人，稿子來來回回修改，大家都瘋掉了。所有的記者站在編輯台，他則一個人慢慢地修改。最後發稿時間已經是凌晨四點多了，當天也因此拖報。

我在寫社論的這幾年，從老先生身上學到許多看事情的方法，還有工作的態度。若說老先生是個令我佩服的人，一點也不爲過。

當「文人」讓我最自在

一九九八年那段時間，我除了在中時寫社論，也曾經到TVBS兼任主持「台灣思想起」，節目內容談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故事。到公視主持「與世界共舞」，則是探討生態、建築、環境、文化等議題。後來腳骨髓發炎，主持工作就停止了。這也算是我生涯中「唯二的」電視媒體經驗，時間並不長。

說起來，我還是最喜歡過一個「文人」的生活：寫作、閱讀。我想可能是老式文人的思維還在，總覺得文字才能永久留存。

過去曾有人找我主持談話性節目、政論節目，但我都婉拒。記得有朋友開玩笑說，電視的特性就是「有電的時候就閃一下，無電就散去」（台語）；電視生態比較短暫，所以我沒想過要長期參與。

現在所謂「名嘴」都在電視開講，但對我來說，重要的是做什麼事情能讓自己最安心、快樂，無關評價的好壞，這是一種生涯的「選擇」。我最初並不想當一名記者，而是作家，因爲我在家裡寫故事所得到的快樂，遠超出在電視主持節目的快樂。

至於我一直留在中時而沒有「跳槽」，一是基於對老先生的敬佩與喜愛，二是中時的自由派風格，自己愛怎麼幹就怎麼幹。加上熟識的朋友、生活圈也都在這，就決定一直待在中時。

倒扁紅潮並未鼓吹動亂

對於我過往的文章或言論，外界不乏一些批評或看法。有人說我是「左派」，有人在倒扁紅潮時，認為我鼓吹「動亂」。這些看法都不盡正確。

我一點都不覺得自己像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或是左派。思想上，我頂多只是「自由主義左派」罷了。我認為，台灣社會太「右」了！稍微「左」一點，人家就說：啊！社會主義者。

當年我採訪六四事件時，認識的大陸異議人士像蘇曉康，才算有點社會主義者的味道。但他在大陸被視為「自由派」。但台灣只要稍微自由主義左派，就變成社會主義者。

二〇〇六年六月，因為自己喜歡嘗試新鮮事物，便與朋友共同創辦《大眾時代》網站，並成為駐站寫手。沒想到九月，我在大眾時代網站發表「倒扁關鍵，在敢不敢動亂」一文，引起軒然大波。當時外界批評我主張動亂，但我從頭到尾都認為它是一則新聞分析。

我認為，倒扁成功的關鍵在於美國是否願意聲援。但除非是台灣社會失序、群眾動亂，美國才會插手。倒扁到十月中，總指揮施明德聽到美國在台協會處長楊甦棣支持陳水扁。一聽完當天就睡不著了，因為陳水扁會不會垮，關鍵在美國！

我也並非支持施明德。我在文章中分析，如果倒扁不成，施明德會把中產階級的熱情耗光，反而是幫群眾洩憤、暗助了陳水扁。事後證明，我的分析還算正確。所以我從不覺得我在鼓動群眾動亂。

文傳會主委是階段性任務

對於人生哲學，我一直很喜歡謝雪紅在《我的半生記》說過的一句話：「人生是不斷探求眞理的旅行。」對我來說，採訪不同的主題與領域，就是一次探求眞理的旅程。每一次的生涯轉折，也是這樣。

二〇〇七年一月，我第一次離開媒體到國民黨擔任文傳會主委一職，也是生命的一次意外。過去唯一一次直接參與政治，就是一九九六年幫陳履安寫總統競選文宣。

二〇〇〇年政黨輪替，當時我還在中時寫社論，對實際參與政治沒什麼興趣。二〇〇四年總統大選時，我開始覺得台獨法西斯的意識形態來愈濃，搞種族主義；到了二〇〇八，如果政黨再不輪替，民進黨恐會淪爲萬年執政。就像阿圖塞所講的，「國家意識形態的控制」已經出現，包括司法、教育、文化等等。因此我才決定加入馬團隊，幫馬英九打這一仗。

若說接任文傳會主委是在支持馬英九或是支持某一政黨，我倒覺得是在支持某一種民主的價值觀：希望再次政黨輪替，終結單一政黨長期執政，避免台灣走入新獨裁。

我不可能長期待在國民黨或任何一個政黨當黨工，也不會永遠待在政治圈。我只想完成自己的階段性任務，然後回到我文人的身份，做一個文人，寫作，自由自在，無比快活。最好去聖彼得堡好好度一個暑假。

每個時代都有存在的價值

回顧戒嚴時期至今，我認爲，每個時代的記者、文人，都有其值得奮鬥的事。

六四天安門事件結束後，我以爲不會再有大事情、大運動，直到二〇〇二年「一一二三」的農民

大遊行，我又參與其中幫忙寫文宣、擬說帖。後來，美國攻打伊拉克，我也與楊祖珺、陳昇、汪其楣在台大前面辦了一場反戰晚會；乃至後來的SARS風暴等等，社會上仍然有許多值得關注的議題。

從自身經驗出發，我建議年輕記者每隔一段時間，比方工作五年後，空出時間讓自己沉澱，把先前的採訪作一完整的回顧，寫成文章作紀錄。

記者每天的採訪就像個跳躍者，從一個新聞點跳到另一個新聞點；沉澱下來，才能夠連成一條線、串成一個有意義的構圖，讓你把社會看得更清楚。

我選擇過文人的生活

對我來說，我喜歡過文人的生活，寫作，思考。這是我的選擇。

參與社會運動、投入政治，大概都是因爲自己有種文人的天真與理想吧！我始終覺得自己只是個文人，是個觀察者，是個熱心的參與者。然後出出意見，寫寫聲明、幫忙作文宣。頂多就是這樣，基本上都是文人可以做的事。

我很清楚自己的性格，不可能成爲那種精明算計的政客，我就只能是一個文人罷了。我從不猶豫自己以後會停留在政治，從沒有猶豫過！以前沒有猶豫，以後也不會猶豫。不久的未來，我還是會回歸當一個文人。

寫詩也好，採訪也好，參與社運也好，投入政治也好……，對我來說都是實踐某種理想的過程而已。這就是我選擇的文人生活。

附記：我於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辭去國民黨文傳會主委職務，回歸自由寫作身份。這是「結束旅程，百劫回歸。」當時我非常快樂地寫下一首詩：

秋天了，該去流浪寫詩了。
薄荷色的月光，洗去我的憂傷。
我的靈魂如鏡，透明，冰涼。
讓我張開雙手如翼，在月下飛翔。

我將輕盈，如一絲蘆葦的白花，
我將激情，如聶魯達的一行詩，
漂浮，在宇宙最透明的液體中，
漂泊，到沒有邊界的天空。

◎初稿：黃驛淵
◎修訂：洪貞玲
◎定稿：何榮幸、楊渡
◎訪問時間：二〇〇七年四月十九日、二十七日、五月三十一日、六月十五日
◎地點：台大新聞所攝影棚

王健壯

〔第十三章〕

破繭而出的政論雜誌

一九八七年新新聞總編輯

前頁圖說：
擔任《中國時報》「開卷版」對談「台灣出版進入八卦時代」主講人。
（中國時報提供／陳建仲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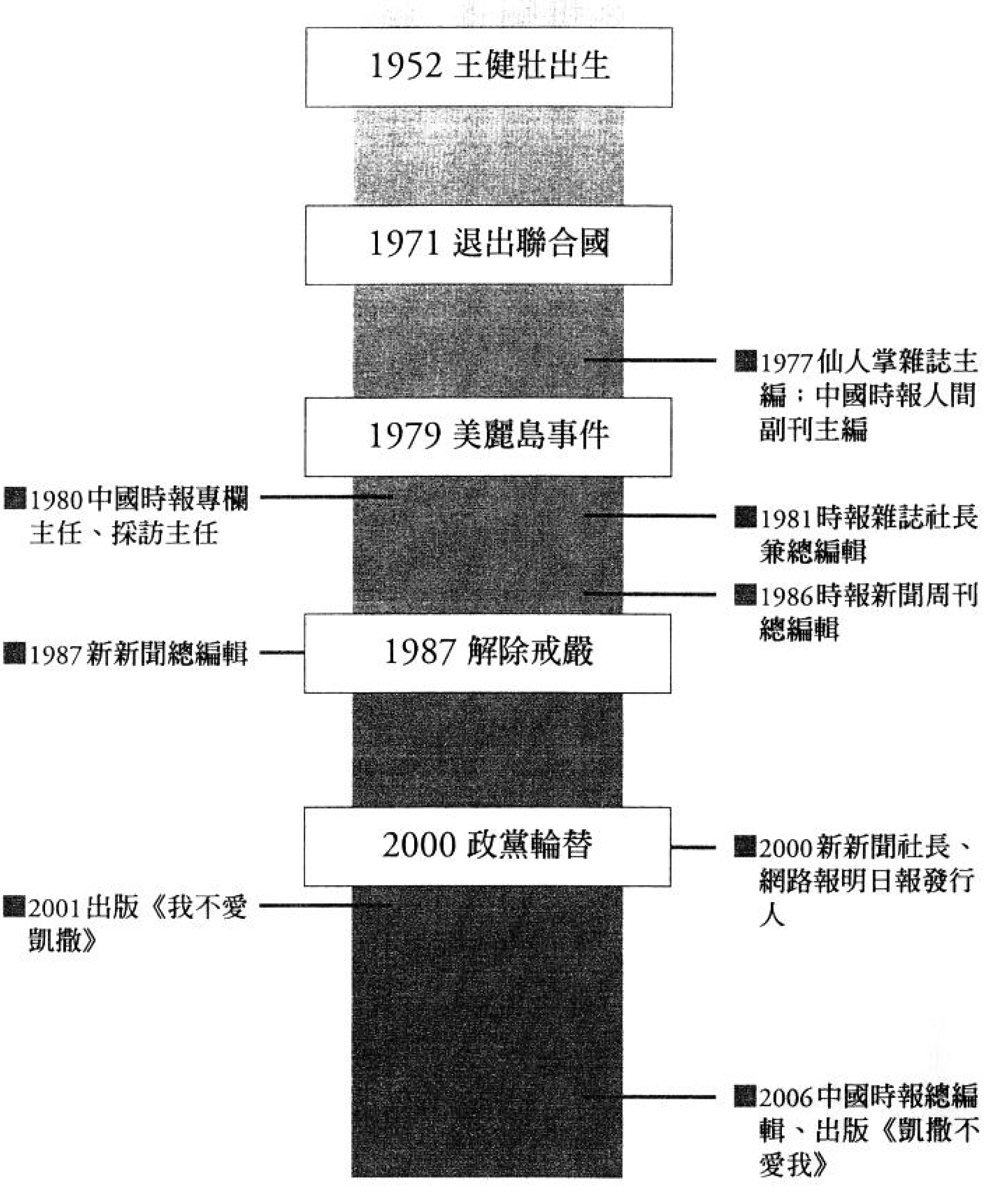
一九八七年三月，解嚴前四個月，他跟司馬文武、周天瑞、南方朔等「中時退除役官兵」共同創辦《新新聞》雜誌。他的名字，從此跟新新聞連上等號，多年後才又回鍋《中時》擔任總編輯。

在民進黨已經成立、報禁即將解除的時代氛圍中，以未經證實小道消息取勝的黨外雜誌退位，標榜新聞專業自由派風格的新新聞乘勢而起，立即掀起一股政論雜誌風潮。沒想到，多年之後，新新聞成為第一家被副總統控告的媒體。

歷經新新聞「嘿嘿嘿」事件、「執政黨主席點名抨擊」等風波後，他可能是台灣新聞史上知名度與爭議性最高的平面媒體總編輯。但他依然以「尋找張季鸞」的精神，透過《凱撒不愛我》書中介紹的外國記者故事，傳達他不向權力者妥協的意志。經過這麼多大風大浪，他對新聞工作的狂熱，仍然只能用「恐怖」兩個字來形容。

文藝青年出身的他，在訪談中非常善於比喻。談到戒嚴時期是「在黑夜中尋找星星」、回到中時是「把一身功夫還給少林」，並坦承自己的角色「已經不是最高的高音；但對新聞比年輕時還熱情」。讓我們意外的是，像他這樣看似打死不退的樂觀主義者，記者生涯竟也曾經面臨嚴重灰心與倦動……

王健壯大事記



1952 王健壯出生
1971 退出聯合國
■1977仙人掌雜誌主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
1979 美麗島事件
■1980中國時報專欄主任、採訪主任
■1981時報雜誌社長兼總編輯
■1986時報新聞周刊總編輯
■1987新新聞總編輯
1987 解除戒嚴
2000 政黨輪替
■2000新新聞社長、網路報明日報發行人
■2001出版《我不愛凱撒》
■2006中國時報總編輯、出版《凱撒不愛我》

永遠的自由派

澄清湖畔的文藝青年

我出生在左營海軍眷村，父親是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時期莫名其妙被人誣陷的海軍受害者，一生鬱鬱不得志，但他的木訥寡言和人格深深影響我。

我對文字的興趣，跟我爸爸的部下沈叔叔有關。我一直跟著他而不是跟同齡的小孩玩。他愛看唐詩宋詞、古文，要不然就是武俠小說，我也跟著看。小學時又碰到很喜歡我的國文老師，帶我像帶兒子，看《古文觀止》，也看了很多成語故事。當時雖然看不懂，但卻開始熟悉文字。

小學四年級起，我開始征戰各作文比賽，到初一開始創作。初一參加了《高青文粹》首次舉辦的全高雄市散文比賽，在澄清湖畔爲賦新詞強說愁，結果得了第二名。幸運的是，以後我一路參加比賽都有得名。

其實，我本來想念物理系，但高雄中學的國文老師一句話「你得獎那麼多，應該讀外文系」騙了我，我就在高三轉到文組，就這樣注定與文字爲伍。

台灣當時文藝氣氛很盛、文藝青年很多，我在高三時就跟幾位從未謀面的「詩友」全省串連組成

「主流詩社」，成員有吳德亮、羊子喬、阮義忠等人。我們寫詩、寫散文，寫小說則是高山仰止，像劉大任、白先勇、陳映眞都是我們望塵莫及的心儀對象。

不過，我的小說創作之路，好幾次沒寫完就放棄了，這讓我清楚自己的文字極限在哪裡。我的創意不夠，才華差很多，因此考上台大歷史系後，大三就決定放棄文學創作這條路，開始專寫文學評論。

從仙人掌到人間副刊

一九七六年當完兵，我不太清楚要幹什麼，就看報紙分類廣告找工作，也寫了兩封信給《中國時報》余老闆、《聯合報》王老闆，但回應都是「遺珠之憾」。

由於我曾經跟著林懷民去聽俞大綱先生的課，非常尊敬俞先生的學識淵博。在無法進入兩大報的情況下，我就報考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傻傻地想要學李叔同當年那樣的「戲劇報國」。但讀了一學期，俞大綱過世了，我心裡感到沮喪，也沒有辦休學就離開。

我的媒體生涯是從《仙人掌雜誌》開始。爲了這本雜誌，我把大學同學金惟純、林國卿、趙永茂找來，四個人組成編輯部。我們編仙人掌雜誌時已經不是文藝少年了，但殘餘的痕跡還在。那時理想很大，想辦一本上追胡適之的《新青年》，中追李敖的《文星》，前追《大學雜誌》的知識份子刊物，眞的非常拚命。其實，我們幾個剛退伍都呆呆的，只是單純認爲，知識的斷層必須要由仙人掌去銜接。

那時政治立場左中右獨的人，我們都去找。林國卿他們幾個人騎個破摩托車，全台北市大街小巷跑，去找那些教授、作家、學者寫稿子。由於當時電話仍不普遍，這些作者雖然不認識我們，我們也只能硬著頭皮去敲門，仙人掌就是這樣弄出來的。

一九七七年仙人掌雜誌創刊時，用塑膠紙包起來不准翻閱，出版形式非常先進。當時很轟動，連

刷了四版。我只編了三期雜誌，第一期封面人物是傅斯年、第二期蔡元培、第三期梁啓超，我學李敖寫了三期封面人物的故事。余紀忠先生看到第二期雜誌，就找我當中時「人間副刊」主編。我才二十四歲，要我做主編，嚇死人了！

其實，離開那麼浪漫、那麼理想的仙人掌雜誌，我有很多掙扎，因爲之前我已在「北歐建設」公司找到很好的工作，薪水是一萬兩千元，仙人掌主編才三千元。放棄高薪進入新聞界，眞的是理想作祟！但不到十個月後，我還是去了時報，此後一生都沒有太大的轉彎。

鄉土文學論戰風暴

從比較的觀點來看，當時台灣的自由主義寫手都集中在人間副刊，形成批判聲音的基地，也變成警備總部、總政戰部外圍系統所關心、打擊的重點，前任主編高信疆先生就是在這種壓力下離開。

我不知道余先生要我這二十多歲的年輕人扮演什麼角色，但我十七歲就認識高信疆，「人間」是我們那輩愛看的重要版面。可以想見我當主編後一定會跟高信疆走同樣的路線，照樣大幅刊登鄉土文學；國民黨也持續把鄉土文學視爲洪水猛獸，千方百計打壓，亂扣帽子。

高信疆在主編任內還刊登大陸文學，像陳若曦等人的作品。現在好像不足道也，那時卻是打破禁忌、天大地大的事情。高信疆開始介紹洪通的藝術成就，我開始把黃春明、王拓的小說放進人間。國民黨一定想，好不容易走了一個恨之入骨的主編，來了個毛頭小子怎麼也一個德性？

其實，高信疆跟國民黨鬥爭經驗豐富，但我那時是亂搞一通的 nobody。警備總部請我吃飯，一定會有我的老師逯耀東、王曾才或高信疆在座，當面溝通、洗腦或者恐嚇我；高先生跟情治單位這些人亦敵亦友，關係既緊張又有談判空間。我當時卻一點恐懼都沒有，可以說是天眞無知。

那時我刊登稿子從沒被報社壓過，但國民黨有個系統專門搞文宣心戰工作，還是有壓力從外部進

來。他們最會寫黑函，內容很可笑，說甚麼掌握來自香港的中共中央辦公室公文，說中共已經有人滲透進人間副刊，然後把黑函寄給余老闆或中國時報相關人等，說得跟眞的一樣。現在看起來很荒謬，但國民黨那時候就幹這種事。

國民黨那時根本不分左中右獨，只要挑戰、反對國民黨的就是壞人。所以主張統一的陳映眞是壞人、寫本土的黃春明也是壞人，國民黨稱爲「三合一敵人」。中國時報也變成國民黨情治系統最想淨化的一個據點。

當時國民黨策動的第二次「文藝會談」，主題就是聲討中國時報，重點就在人間副刊。我記得很清楚，高信疆、我、還有已經過世的中時社長楊乃藩，我們去劍潭青年活動中心開會。那簡直是恐怖！會議兩天，從第一天開始到最後一天閉幕致詞，都在聲討中國時報、批鬥鄉土文學。

爲了反制，第一天晚上會議結束後，我跟高信疆去重慶南路把所有國民黨系統，像黎明出版社關於中國大陸的文學，包括評論、文學創作、跟本土文學有關的書，全部都買！隔天兩人左手右手各提一捆書，想要去跟他們辯說：「你們自己做了那麼多跟大陸文學、本土文學相關的事！」結果根本沒有機會，我們無法發言。總政戰部負責人講了一句話：「對中國時報不是不辦、只是時候未到。」完全像當年納粹的作風，很恐怖！

擔任《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
（1978年2月2日，中國時報提供／朱立熙攝）

我那時眞的一點都不怕，但這項會談結束後，中國時報的處境很危

險，余先生就要我換個工作。他說：「你年輕，鬥不過他們。」所以，我做了不到十個月的副刊主編，就轉去政治組當國會記者了。

一點點哲學

我這個人不做則已，做了就要比別人好一點，我的記者採訪信念，就是這種「一點點哲學」：跑新聞就要比別人多採訪一個人，寫稿就要比別人多寫一條好新聞。

跑國會新聞時，我跟聯合報顏文閂兩個人「諜對諜」。他跑到一個獨家，我明天就還他一個獨家。我們那時跑新聞很可憐，敲門常常遭到採訪對象的閉門羹，我跟顏文閂常常在門外不期而遇，彼此搖個頭，然後再繼續「諜對諜」競爭獨家新聞。

我的記者生涯初期，就是靠這種「一點點哲學」支撐，即使我的專業能力不夠，只要多努力一點，長期下來就會不一樣；即使我的個性跟記者這一行不是那麼契合，但我還是很有自信，自己不會比別人差。

一九七七年底，第六屆省議會時，黨外勢力第一次集體在議會出現，之前黨外在立法院只有康寧祥、黃信介兩個人。當時黨外省議員林義雄用台語宣誓，聯合報寫了專欄批判。林義雄就控告聯合報，顯示省議會已經成為台灣政治中心。為了因應新情勢，余先生要我去跑省議會新聞。當時我太太已懷孕，但我隔天就一個人下去台中霧峰報到了。

對我來說，省議會採訪是民主政治的啓蒙，跟跑立法院完全不同。

立法院是殿堂式的民主政治，即使是黃信介和康寧祥，面對行政院長蔣經國也是非常gentleman。康寧祥當時是我們的偶像，也是國民黨優秀老立委最欣賞的「小朋友」。老康非常努力，所有的法案預算一個字、一個字讀，非常深入研究，我們覺得他棒得不得了。老康每次跟蔣經國的總

質詢對話，也很精彩。我們每天跑新聞，尤其是機密預算，一定跑到他的研究室。因爲他的紅皮書裡面都是眉批，我們只要把他寫的眉批抄下來就是重要新聞了。

相較之下，省議會則是充滿草根性質。我第一次看到所謂的草根民主，卻不乏殿堂政治的內涵。當時林義雄、張俊宏都很有深度，張俊宏從《大學雜誌》延續下來的內涵、他跟林義雄的質詢內容、跟台灣省主席的對話，到現在都還是經典；每一項質詢都直接觸及到民生政治的基本核心，我當然很震撼！

從第六屆省議會起，台灣的民主政治不一樣了。對我來講，課本裡沒有的、之前未曾看過的民主實況，在省議會全都大開眼界。這段時間是我的記者生涯最重要的轉捩點。我雖然是歷史系畢業的，讀過台灣史，卻是從採訪省議會新聞開始，才對台灣史、台灣文化產生自覺性的接觸。

政治記者的第一堂課

不過，在省議會一年多，我也看到台灣政治最荒謬、最黑暗的一面，像是政治學上講的「肉桶政治」。省議員會當面拿一疊現鈔給記者，所有人都知道這件事。省議員不認爲這是錯誤的，絕大多數記者也認爲收錢理所當然。

當時不見得每一個記者都會收到錢，還要大報記者才有，美其名爲「潤筆費」。而且，不是你寫省議員的正面新聞才送錢給你，只要可以見報、有曝光率，就算你寫負面新聞也會送錢給你。

你會看到記者、新聞界文化最脆弱的一面。跑新聞時如何面對利益誘惑？這些是在立法院看不到的景象。

我在省議會的另一項重要學習，則是跑遍全國各縣市報導公共政策。當時不像現在流行揭發政商勾結，政治新聞不是那麼colorful，都以議會答詢爲主、預算爲輔，公共政策新聞的見報率比較高。

我全台灣跑了兩趟，走過每一個縣市，第一次是巡迴採訪選情、第二次是檢視公共政策預算，例如跑去宜蘭看排水溝工程。我們寫公共建設新聞的比重，比現在的議會記者多太多了。這是今昔非常大的差異。

在霧峰這段時間，我找到做一個記者的初階段位子，學會怎樣當一個政治記者、怎樣處理政治新聞、怎樣看政治人物的言行。立法院新聞不是那麼眞實，所以很難找到一個位子；省議會則是政治人物硬碰硬，新聞記者和採訪對象硬碰硬，另外最大的衝擊是知道「在野」是什麼、「在野」可以做到什麼。

比我資深的政治記者，沒有機會體驗這一段台灣政治的關鍵轉型期。我就像是正式進了社會大學，這可以說是我當政治記者正式的第一堂課。

二十八歲當採訪主任

我進報館的時代，記者大多是外省來台背景，但時報刻意培植台灣出生、嬰兒潮世代的人。江春男（司馬文武）大概是台灣第一代，我們算一點五代，我們在報社安排下，很短時間內歷練很多職務。

講一句好玩的話。當時調整職務就有聘書，我大約一年收三張聘書，一共有十幾張聘書，大概是同輩中調動最頻繁的。我們就像是戰場上的兵士，報社叫我們到哪就到哪，我們很少說ＮＯ。

我被任命爲中時採訪主任時，才二十八歲。當時中時、聯合兩大報在爭「一百萬份第一大報」，政治局勢也不太平靜。採訪主任是第一線指揮官，我沒有足夠的閱歷經驗，只能用最笨的辦法，跟記者一道跑新聞。

我當採訪主任的時候，每一個副主任資歷都比我深、年齡都比我大。我一開始就強調，很多東西我不懂，但我今天做這個工作，大家就一道努力去做。我一直是把所有同事當成朋友，自己則當一個

好的 listener，再作判斷。那時我常講「天下沒有翻不過的山」，我用笨功夫去做，困而學之：不懂財經新聞，我就從個體、總體經濟學讀起；不懂社會新聞，我就每天下班請社會組同事帶我去各警察分局拜會喝酒。中國時報採訪主任任期都很短，但我做了一年半，已打破當時的歷史紀錄。

其實，當採訪主任壓力很大，有關單位不斷打電話給你，常常面對面開會。美麗島軍法大審後，台灣政治結構在轉變，警備總部、情治單位的角色慢慢在退，但國民黨文工會很厲害，姿態很低、要求很高。

我接過很多來自新聞局和文工會的電話，他們會很客氣地拜託你、要求你。我會說「好，我瞭解」，但不會給任何人一句承諾。這些人累積很多對中時的不滿後，終於在《美洲中國時報》事件爆發。儘管余老闆那時候承受很多政治壓力，但從來沒有以市場壓力作爲主要考量。余先生主持開會時，從來沒有指示說：「你這新聞不能賣，你這頭版沒有人看。」現在回顧，這種擔當眞是可貴！

理念不合，首度離開中時

歷練完採訪主任後，老先生（余紀忠）認爲，在台灣民主轉變期，他想透過《時報雜誌》積極跟自由派學者聯繫，於是調我去時報雜誌接社長兼總編輯。

當時我積極舉辦座談會，一方面可以動態處理新聞，結合知識份子，另一方面可以讓讀者參與，因爲座談會紀錄比起學者的長篇大論，可讀性要高一點。不過，現在媒體座談會的功能已經不同，大多是「置入性行銷」了。

後來碰到俞國華要組閣，我找了陶百川、康寧祥，還有兩個學界的朋友參加座談會。陶先生寫文章最能夠代表知識份子和自由派，批判性很強、影響力很大；康寧祥則是黨外最受矚目與期待的政治人物。他們兩位在座談會中有很多批評，例如俞國華出身總統官邸，侍從性格強一點，會影響內閣的

發展方向等等。

沒想到座談會結束後，老先生對陶、康的發言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他最早建議把這兩人的發言紀錄拿掉，保留另外兩位學者的發言，但我拒絕；後來他想要大幅修改座談紀錄，我也拒絕。現在聽起來很荒謬，但因為還是戒嚴時代，雖然國民黨右翼勢力夕陽西下，卻仍具有強大的反撲力量。一再刁難老先生把錢匯給美洲中國時報（當時匯錢出國仍須經過特許），老先生才會擔憂這項座談會紀錄會讓美洲中國時報處境更為艱難。

那期時報雜誌出刊前兩天，老先生找我去他家裡談，我記得那天台北下雨，半夜一點多鐘，他提了非常多考量，主要就是美洲中時的問題。但我那時年少氣盛、哪裡聽得下去？過去他從來沒有直呼過我的名字，但那天在他家裡，他卻氣得拍桌子說：「王健壯，你的好朋友連米都沒辦法下鍋，你還在這裡講個人理想，講你的堅持、你的期待，你有沒有替這些好朋友想一想？」

那時候環境確實很壞，五百萬美金匯不出去，牽涉到美洲中國時報能否生存。但我是一個雜誌的負責人，我必須對受邀參加座談會的來賓負責，不能因為任何理由讓他們的發言消失。所以談到最後一老一少「不歡而散」，我決定辭職，隔天就遞出辭呈。

這是選擇的問題。即使這十幾年來我對媒體的存亡感受多一點，也瞭解老先生當時的掙扎心情，但如果重來一次，我還是不會改變處理方法。後來老先生要我出國進修，中國時報那時候的用人風格，像是羅馬時代的「貝殼放逐法」。在我之前，惹過麻煩的高信疆、周天瑞都出國了。我雖已結婚生子，但仍然答應出國進修，就此離開台灣。

亞洲第二位訪問菲律賓政變領袖

坦白說，老人家真的很照顧我們這些後輩！我出國費用都是老先生出的，不但時報雜誌的薪水照

付，連編輯部門的夜點費也照發。我在美國維吉尼亞大學（Virginia University）讀書時非常有錢，一年時報給我兩萬美金。我拚命買書，每天最少讀書十六個小時，眞的是很快樂。

一年兩個月後，菲律賓政變。老先生不停發電報，要我去跑新聞，我還沒拿到學位，什麼都沒帶就離開美國，在台北停留一天後到馬尼拉，一待就是六十四天。

那是我第一次採訪類似革命的國際新聞，人生地不熟，從總統到侍衛都搞不清楚。還好之前有修過亞洲政治文化，略懂一點菲律賓政局。出發前，我把圖書館裡關於菲律賓的重要期刊文章複印了一大堆，在飛機上拚命看，第二天就開始採訪了。

幸運的是，我在美國的老師，有位很有影響力的菲律賓友人。透過這位友人的介紹，我見到了菲律賓最重要的《論壇報》總編輯、外交部長。就像串珍珠一樣，見一個再請他介紹一個，最後只差被推翻的總統馬可仕沒有採訪到而已。但我採訪到馬可仕的老婆伊美黛，那也是我這輩子聞到最濃的香水味的一次經驗。

我最後也採訪到反對黨領袖艾奎諾夫人柯拉蓉，但那是我第一次跑新聞落敗，聯合報記者周玉蔻比我早十七小時訪問到艾奎諾。我以前跑新聞都不會輸人。哈哈，雖然第一次落敗，但我比周玉蔻訪問到更多人啦！我是亞洲第二個專訪到政變領袖安瑞利的記者；第一個是日本《讀賣新聞》記者。

那段時間，我每天早上六點多就起來，在很短的時間內採訪非常多人。這六十四天對一個在台灣本島、偶爾出國的記者來說，眞的是一場洗禮。我第一次看到百萬無邊無界的群眾，第一次看到革命。我那時採訪國防部長安瑞利、參謀總長羅慕斯時，軍營裡機關槍擺得到處都是，充滿戰地氣氛；我也第一次瞭解，政治文化可以有趣及恐怖到這地步，因爲菲律賓政壇利益掛鉤一蹋糊塗。我雖是你小孩的教父，但我們明天卻可能兵戎相向；馬可仕和安瑞利、柯拉蓉就是這樣。

我第一次看到美國式民主可以在一個國家實踐得那麼徹底，但又有西班牙式的浪漫。菲律賓這批

軍人和政治人物都是美式教育出來的。像安瑞利是哈佛碩士，政變時穿牛仔褲，哇，之酷的！我去訪問他時，旁邊站著兩個配著烏茲衝鋒槍的保鏢，畫面非常不協調。菲律賓選舉時一定有暗殺，街頭爆炸也時有所聞。這對台灣記者眞的是很大的衝擊，所以我被菲律賓政局迷惑了很長一段時間。

蔣家父子不能碰

從菲律賓回來後，我被調去籌辦《時報新聞周刊》，一本台灣觀點的國際新聞刊物。籌備期間我廣派駐外記者，總共派了六組人，其中利比亞和波蘭連入境都有困難，但我們都克服了。那時想把雜誌規模拉大，我們把最好的記者都放在時報新聞周刊，還買了《紐約時報》所有幻燈片資料圖片，雜誌還沒出刊就花了上千萬元。到後來老先生說：「你確定我們要辦這本雜誌嗎？」

但是，時報新聞周刊只辦到第三期，我第二次離開中國時報的時間點就出現了。這次比第一次離開的情形更荒謬。

當時我們翻譯了德國《明鏡周刊》的一篇短文章，裡面寫蔣氏家族在台灣推行法西斯政治。老先生看到了，質問我：「你爲什麼要提法西斯政治？我跟你們講過多少次，蔣家父子沒有過世之前，你要尊重他們。」

那時候我已感受到台灣政治局勢即將開放的浪潮，但是老先生對蔣家父子非常尊重，就像張季鸞當年對老蔣一樣。《大公報》那時誰都可以罵，就是罵老蔣不行；即使罵，也是小罵大幫忙。那個時代的報老闆、報人都一樣，蔣氏父子都不能碰！

我瞭解老先生的想法，但我不以爲然，因爲這只是一篇翻譯文章，根本沒有那麼嚴重。於是我寫了一封長信給老先生，我說我之所以回來辦這份雜誌，就是希望沒有禁忌、自由發揮，如果連五百字文章中「瑣細餖飣」的一、兩句話都不能刊登，那就證明你不需要我，任何人都可以扮演我這角色，

我還是出去念個書，回來也許會更成熟一點吧。就這樣，我第二度離開中時。

由於我申請到哈佛政治系，所以把房子、車子都賣了，小孩學校也辦休學了，準備全家走。當時我只差買好飛機票就可以出國，沒想到時報老同事司馬文武、南方朔、周天瑞全力留我下來，要我幫忙《新新聞》。

新新聞記錄街頭運動

一九八七年解嚴，同年三月十二日新新聞創刊。以前台灣媒體只有兩種：一種是以報紙為主的大眾媒體，但受限於三大張、政治禁忌等限制，無法像黨外雜誌那樣大鳴大放；另一種就是以黨外雜誌為主的小眾媒體，但在民進黨成立後也走到歷史任務的末期，只能扮演主流媒體的補充性角色。

新新聞在發刊辭中強調「自由報業第一聲」，代表辦報才是我們的理想，辦雜誌是過渡。但坦白說，我們只有從中國時報出身的訓練背景是一樣的，新新聞一直揣摩到二、三十期之後，我們都還抓不住既非中國時報、也不是黨外雜誌的那個方向到底該怎麼走。

新新聞第一期封面故事是「亞洲五個政治強人的政治考卷」，包括鄧小平、蔣經國、李光耀、金日成、中曾根，但這種封面故事只是「作文比賽」，我們其實不清楚應該走什麼方向。我們雖然常常看 *Time*，《時代雜誌》，但不知道那些範本能不能在台灣落實，可以說是「有想法、沒辦法」。

直到一九八八年蔣經國過世，我們動員所有資深記者投入採訪，把國民黨宮廷鬥爭等政治禁忌全部打破。那幾期出刊時，到了半夜一、兩點鐘，還有許多讀者跑到安和路新新聞辦公室買雜誌，因為書攤上都賣光了，我們還加印了兩次。那時候我們才比較能夠抓住方向與定位。

我們是第一個翻譯美國國務院解密資料，帶頭做張學良、孫立人的解禁資料的媒體。台灣政治雖然已經解嚴，但戒嚴餘緒還未消失，新新聞在當時有前導性的歷史意義。我們沒有金主，因為新新聞

是每個人借三萬、五萬湊出來的，所以每個人都是老闆；新新聞也沒有政黨包袱，因爲誰也不是哪個政黨的中常委。所以雖然成立初期大家常常是「有想法、沒辦法」、「有意見、沒主張」，但一群人共同尋找定位的過程也蠻快樂的。

我們這批老記者知道台灣的歷史即將改變，想在改變初期站上這個浪頭，做一些新的東西。當時任何一個打得頭破血流的街頭運動，兩大報新聞最多還是五、六欄高，因此我們希望有個專業的發聲管道，讓台灣民眾可以完整瞭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那時候新新聞常常用全本雜誌去做民進黨街頭運動新聞，沒有一個媒體笨到這個地步。但是，主流媒體應該做而沒有做的事情，對不起，新新聞要做。其實就新聞專業而言，這未必符合新聞比例原則，但我們必須要讓這些重要的街頭運動留下完整的歷史紀錄。不然二十年後回頭看，怎麼可能還原眞相？

當時各情治單位都會來施壓，但我們並未屈服於壓力。新新聞沒做好是我們能力不夠，而不是向壓力低頭。其實，新新聞唯一的壓力只有經營壓力。十九年來經濟拮据，可能是我們不懂經營吧。新新聞的規模沒有膨脹過，到現在編輯部、經理部加起來才五十個人左右，反觀《商業周刊》已擴充到近兩百人。但新新聞的自主性非常高。

一度考慮去蘋果日報

解嚴二十年，台灣社會變了，但我離開新新聞一年多之後，新新聞還是延續創刊時留下來的那個傳統：堅持民主、正義、多元、包容。這些可以說是資產，也可以說是負債。因爲社會不斷在變動，媒體不動就落伍了。台灣社會出現反政治傾向時，新新聞卻還以政治爲主，就愈來愈無法跟《商業周刊》的輕型故事競爭。

但新新聞不是沒有能力去「與時俱進」，只是選擇不同。我們想要改變台灣的政治文化，改變殘餘的封建、威權文化。這是我們從創刊時就自許的蛋頭使命感。

如果我現在還是新新聞總編輯，我會走同樣的路，但會先建立一個財務管理系統，並且更重視調查採訪。新新聞作了很多調查報導，但沒有一以貫之。美國有份自由派的《國家》（*The Nation*）雜誌，辦一百多年就虧了一百多年，但它一百年來都堅持muckraker的扒糞精神，這也是新新聞最應該扮演的角色。

不過，這幾年雜誌社最大的問題是人才流失。有一年殷允芃請我去《天下雜誌》演講。她很好奇新新聞流動性爲何這麼低，我的解釋是「革命理想」等種種原因。但現在媒體大環境變了，《商業周刊》的成功、中國時報、聯合報競爭換血、《壹週刊》與《蘋果日報》來台後大量挖角，都讓新新聞人才大量流失。兩個十年過去了，新新聞變成媒體人才養成所，文化無法累積，傳統也無法延續，確實很讓人傷感。

其實，我一度考慮去蘋果日報。我對蘋果日報的評價是正面的，但我自己能不能適應是另一個問題。當時我希望蘋果日報老闆黎智英能把我和新新聞用一個package考慮，但談了好幾次卻沒能如願，黎只邀我個人過去，不願同時接手新新聞。

我考慮也掙扎了很久，後來我兒子說：「我從小聽你講，跑新聞沒有一次回家睡不著覺，但你去蘋果之後，以後睡不睡得著覺？」他知道我的致命傷，提醒我可能無法適應蘋果的風格。這的確是很可能發生的情況，所以我最後就沒去蘋果。

我一直認爲，新新聞的媒體文化會讓你尊敬自己，晚上睡覺不會輾轉反側，爲什麼？因爲你沒有愧對你的專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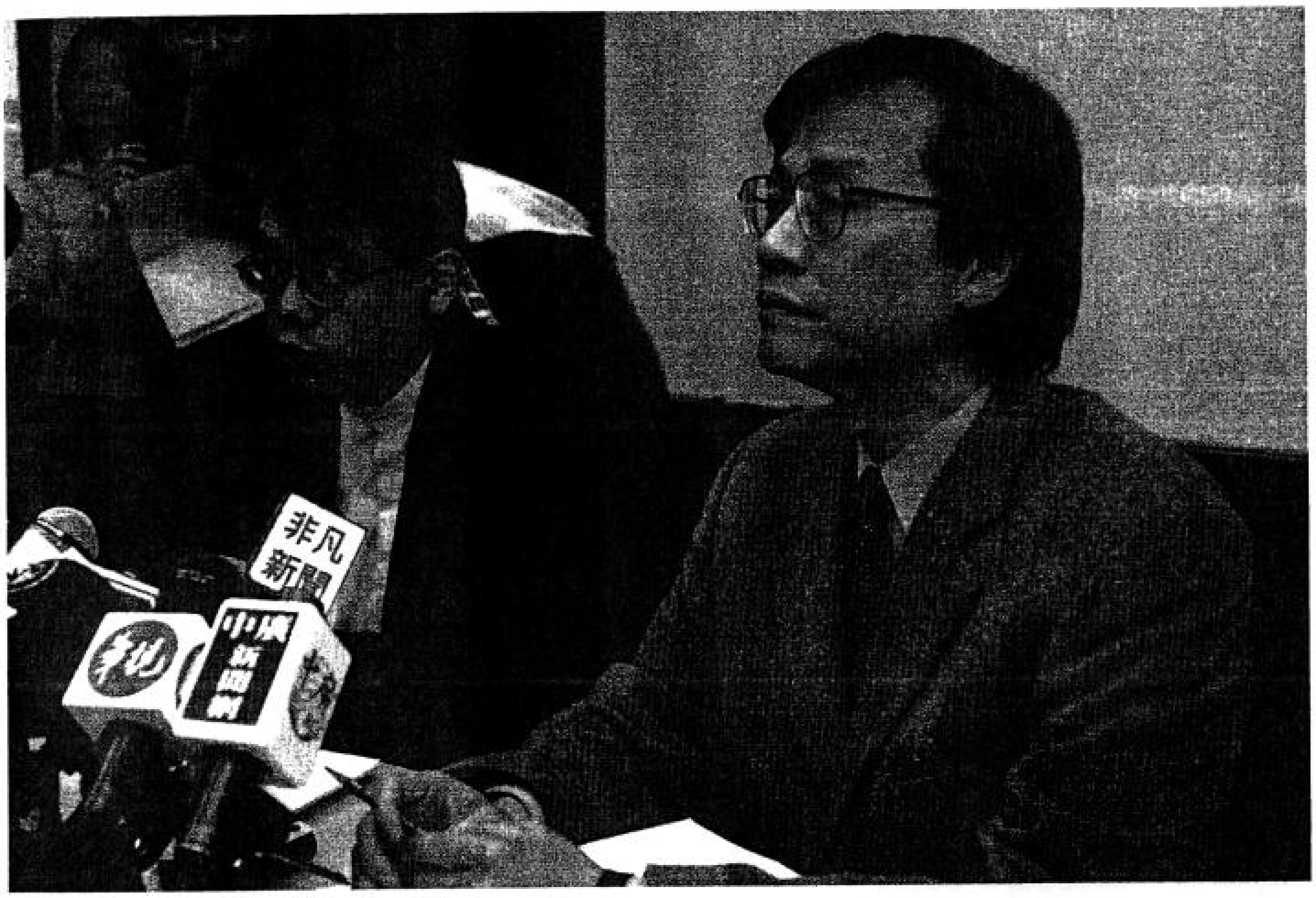
「嘿嘿嘿」事件活在壓力鍋裡

回顧新新聞歷程，不能不提到呂秀蓮副總統控告新新聞的「嘿嘿嘿」事件。

「嘿嘿嘿」事件發生時，我不只相信總編輯楊照，我也有自己的管道確知是有這通電話。但新新聞最後沒辦法打贏這場戰爭，第一是證據不足，第二是法律不適用，我們想用大法官五〇九號解釋的「眞實惡意」原則，但各級法院都不採用。

坦白說，「嘿嘿嘿」事件的來龍去脈，我只比讀者多知道一點點，而且新聞也不是我處理的。但呂秀蓮要提告後，五分鐘不到我就把楊照找來。我說所有事情我來處理。我明白這件事恐怖的影響，但我要爲同事扛下。

我當記者從沒碰過這麼大的官司，那也是我活在壓力鍋裡最長的一段時間。爲了要讓很多人瞭解新聞媒體、新聞記者的堅持，我們腰桿不能軟！這案子的傷痕到



2000年12月「嘿嘿嘿」事件發生時，王健壯與《新新聞》總編輯楊照（左）舉行記者會。
（中國時報提供／王遠茂攝）

現在都還在。我們這些老頭子沒問題，小朋友們出去採訪會被人家奚落，但回來聊聊後，他們又腰桿挺直出去。那段時間的確走得很苦。

我跟呂秀蓮雖有這段「深仇大恨」，但我回中國時報當總編輯，她的新聞沒少過，這就是新聞專業。我痛心的不是新新聞敗訴，是她開創了副總統控告媒體的先例，起了「寒蟬效應」。政治人物有發言的舞台；如果媒體有錯可以澄清。國家機器與媒體的關係應該是「但可不告就不告」，而不是「但可告則告」。這就是我想要改變的政治文化。

這件事發生後，陳水扁總統一次都沒有公開批評過新新聞。他每年都會帶總編輯下鄉，但新新聞非常自傲，一向不去。那年我則特別要楊照去跟陳水扁下鄉，去表現新新聞的風格，否則不去一定被認爲是縮頭。當時陳水扁看到楊照就開他玩笑說：「今天是副總統生日，你送束花給她就沒事了嘛！」事實上，陳水扁對新新聞一向很感冒，因爲執政的人一向是我們批判的對象。如果我們錯了，他怎會不趁機倒扒一把呢？

台灣其他媒體雖然支持我們，卻把我們當作新聞對象而已，沒有人去挖真相。事實上，只有其他媒體一起去挖內幕，眞相才會出現。可惜台灣的媒體、司法、國會，跟水門案時的美國媒體、司法、國會不一樣，沒有一群人一起去做扒糞者的角色。以後若呂秀蓮、王健壯各自出書，「嘿嘿嘿」事件一樣是無頭公案。

明日報發行人的挑戰

二〇〇〇年，網路報《明日報》創刊，詹宏志找新新聞合夥；他當董事長，我當發行人。詹宏志想做不只台灣第一、可能是全世界第一個原生型的網路報紙。不像其他電子報用的是平面媒體的內容，明日報每一條新聞都是自己的記者跑出來的。這是聞所未聞的挑戰。我那時對Internet並不是很

熟，但我最喜歡打仗，很快就投入了這個新的戰場。

明日報那時候做得很棒，我第一次感受到網路媒體的立即影響力；沒想到網路規模這麼大，速度這麼快。我在報紙、雜誌待了二、三十年，沒想到一條新聞竟可以跨國引起那麼大的反應，搞不好連尼加拉瓜都在看。明日報是跟全世界所有媒體競爭，做不好、做得好當下就知道，反應是立即的。

那時我們從各平面媒體挖來兩百多個記者，對明日報有很高的期望。工作氣氛是我幾十年看過最好的，整個辦公室都是此起彼落的朝氣。不但記者非常優秀，平面媒體也大量引用明日報新聞。明日報也是台灣部落格的起始。那時我們還做my paper的個人化網站，讓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報老闆、做記者。

遺憾的是，四個月後美國NASDAQ（納斯達克）股市崩盤，網路媒體尋找資金非常困難，明日報做完一年整後結束。那一年讓我瞭解到，新媒介不是沒有成功的可能，明日報當初做的是對的，只是時間早了點。

事隔多年，很多朋友跟我說，再搞一次明日報，規模稍微小一點。我說規模小一點，就不是明日報；如果不是規模這麼大，就做不出原生型網路報紙，最多就是中時電子報的形態。明日報絕對是網路原生報的樣板，一直到今天我仍然相信網路媒體的明日始終會出現。

回鍋中時當總編輯

二〇〇六年，我第三度回到中國時報，這次是當總編輯。我回去中時當然是有把握我可以做好這個角色的，因為我三十年來從來不是一個只懂編採技術的新聞匠。我有理念，我是一個一直靠自由主義理念驅動的人。我認為我這個特點也許可以補實時報現在缺乏的這塊。

當然，台灣報業跟我當記者的時候已截然不同。我在新新聞雖然很累很苦，但工作環境卻是百分

之百自主。回到時報後卻不得不考慮市場、報館組織結構，甚至是政治、社會的大環境。年紀一大把還要考慮、甚至受制於那麼多牽牽絆絆的東西。這個時候回去接總編很奇怪，或許一直留在新新聞走到終點更好。但有時候想到自己跟時報的淵源，還有最重要的是，我相信時報還有可能性。當它在谷底的時候回去，比在它興盛的時候回去更有意義。

我天生樂觀，始終相信只要有一個人願意拚命去做，就會有兩個人、三個人去響應。但出乎我意料的是，台灣社會價值崩解的量變引起質變的規模太大、速度也太快。就好像在一個交響樂團裡面，那些從小在茱麗亞音樂學院接受正規訓練、規規矩矩學小提琴怎麼拉的人，沒人理、被人噓；那些不照樂理樂譜胡亂敲鑼打鼓的人，反而受到觀眾的注意，喝采、掌聲最多。專業淪落至此，是非顛倒至此，你會不會挫折？我現在常有那種後現代的荒謬感，年輕時堅持的、依賴的理念，現在都不見了。

台灣這幾年媒體環境很不健康。最不健康最病態的現象是，有幾個沒讀過幾本書的電視台主持人，天天大放厥辭，竟然可以也敢於扮演最後仲裁者的角色，而且竟然還有那麼多人信他們。我回時報最痛苦也是最憤怒的部分，就是時報被這些人定位爲「泛藍媒體」。民進黨主席游錫堃說，王健壯當總編輯後，中國時報就變了！當然我有變。我不鄉愿，甚至比七〇年代更自由派！我們這種戒嚴時代的老記者，碰到是非對錯當然會把政治人物罵到骨頭裡，不必再像戒嚴時期一樣吞吐其詞、迂迴婉轉。

紅衫軍新聞爭議

我接任中時總編後，一年半內發生了許多歷史性事件。歷史浪潮這麼大，任何一個自由主義驅動的媒體，一定想找最高的浪去衝，雖然滅頂的可能性也最大。但我希望時報可以在歷史轉折的時刻盡一份媒體的力量，不鄉愿、不和稀泥、有是非、有歷史感。沒想到結果卻是讓「王健壯」成爲台灣報

業史上最多次被指名道姓臭罵的總編輯。

二〇〇六年這一年，外界批評中國時報最多的，就是報導紅衫軍的篇幅為何這麼大？對我這個五十多歲的老記者來說，我跑遍半個世界，從來沒有看過這麼大規模的群眾，聚集在街上這麼多天，目標針對著國家元首，但結果卻沒有帶來更大的街頭暴動、流血衝突。在任何一個國家，有這種內涵的社會運動都必然是重大新聞！

面對台灣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這場社會運動，我不可能因為這事件可能會帶來什麼負面問題就冷處理。何況，中國時報也是最早對紅衫軍提出不同角度批判的媒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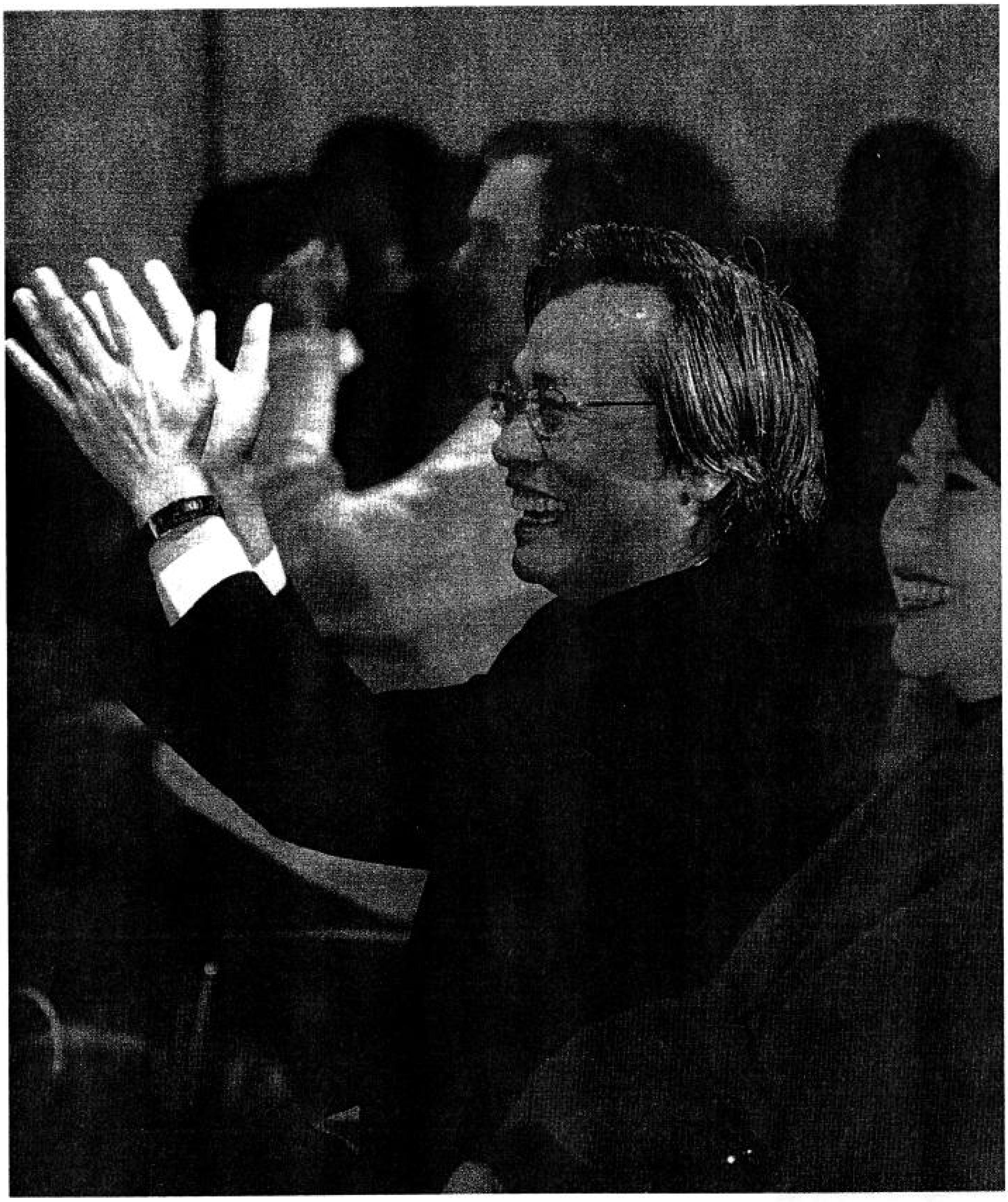
紅衫軍抗爭的起源，是時報有個獨家新聞。我用頭版刊登施明德寫給陳水扁的一封信，結果就被綠營批評我和施明德串謀倒扁。但作為一個記者，用盡全力搶到獨家，這難道不是新聞？我們後來刊登國民黨修改黨章的新聞，就被說成是國民黨黨報。但如果我今天發警政署查戶口的新聞，難不成我是「警報」？今天台灣變成這樣，我只覺得荒謬！

台灣發展到現在，記者常常追求表面，卻忽略掉了真正重要的價值。民進黨執政後，台灣批判文化消失，批判精神扭曲。這些東西失去後，是非價值像骨牌一樣倒下來，媒體又何嘗不是如此。

克服記者灰色時期

三十年來，我從當記者第一天就是透明人。嘴巴講的、文章寫的就是腦子想的，對權勢無所畏懼。這是從戒嚴時期就訓練出來的。政治人物批評我，我會元神出竅檢查自己。但該做什麼就什麼，我從來不會受到影響。

當然我也有累過。在新新聞最嚴重的一次，我疲倦到不只想放棄記者角色，疲倦到想重新一個人生活。明日報結束後，我對大環境失望、對人失望，對自己也困惑，有很長幾個月處在那樣的灰色時



2007年1月參加《中時》「開卷好書獎」頒獎典禮。（中國時報提供／劉宗龍攝）

期。不過我這個人有個好處，下一刻上班的時候，這情緒又不見了。因爲我當記者這麼久，從來沒有犯過本質的錯；如果犯了，我一定立刻不幹記者。

最近有位同事拿了一篇文章給我看，是中時社刊登老先生最後一次在報館的公開講話。他說，現在辦報的環境、政治的環境變了，變得更困難、更險惡，但時報還是要繼續走自由主義辦報的傳統。我心想，這老頭子如果此時此刻還在，還會不會講這句話？我相信會！甚至比我更強硬。

其實，新聞給我最大樂趣就在影響力，這也是讓我堅持理念至今的最大原因。過去三十年記者生涯有那麼多快樂、那麼多挫折，我不是沒機會做其他發展，但我練劍三十年，不可能再去打拳嘛！到今天爲止，我還是覺得，愈做媒體愈覺得可能性更大。

外界常常批評我，說我幾月就會下台。坦白說，我不會下台。我回來中時的任務就是一年半替時報重新找到位子，再一年半找回時報的影響力。這三年我會像打點滴一樣，一點一滴對時報滲透我的堅持；點滴打完了，我的任務當然也就結束了。

我現在的年齡已是退休的年齡，不過我始終維持積極。有些朋友到七十歲還在寫文章，也許我不認同他們文章的內容，但我佩服他們的熱情；如果我到七十歲還能這樣寫，寫不錯的文章，那眞是了不起！

從未帶家人出國旅遊

回顧記者生涯，我這人工作第一，朋友第二，家庭從來沒擺第一過。當記者時喜歡到處跑，只要可以出國採訪沒有不去的，平常新聞對象又互動頻繁，下了班還意猶未盡通宵講自己的理想，做了主管後，更常待在辦公室裡。

我太太跟我是同班同學，一道長大，好好壞壞。她在中學教書，以前常常要跟著我調動跑來跑

去，但老師工作其實不是那麼好找的。我常常開玩笑，當記者的老婆，就像是當 newspaper widow。

以前我只有星期天會帶太太、小孩去打籃球、踢球。我不像現代父母會主導性地希望孩子接觸什麼，我的孩子只能主動地尋找。最近一、兩年孩子大了睡得比較晚，父子兩個人才可以抱抱打打，胡說八道一下，談談體育新聞、罵罵中國時報、聊聊他的社會學。

最近我才突然想起來，我竟然沒有休假帶太太小孩出國旅遊！眞是罪過！只有那年我在美國念書，他們來看我。我去機場先看到我太太，看不到我兒子。我兒子那時才小學一年級，原來是他在推車，推不動，所以走得慢。

如果人生從頭再來，我還是會當記者，但應該會工作時間少一點，跟朋友在一起的時間少一點。唉，回首來時路眞是恐怖！

理念驅動的一生

總結來看，我的一生都是受自由主義理念所驅動。

我這個年代進入時報的記者，跟余紀忠先生的關係非常微妙。當年跟他最親的是高信疆、周天瑞。那時包括聯合報王老闆都是親自找人，記者之間也會分親疏。後來周天瑞、高信疆出國了，變成我走在前面，余先生當然要培植我。但我很孤僻，不會跟長輩互動。我把余先生當成入門師父，到現在還在用他教的武功；他是少林寺的老和尚，我是少林寺的小和尚。

余先生影響我最深的，就是知識份子辦報、文人辦報的精神。現在看來雖然違反市場法則，但這就是我們的達摩神功，就是我們的易筋經，我們的內功心法就是這個。我去年在香港《明報》寫過文章，就曾很感慨地指出，余先生過世之後，台灣的文人辦報也到此結束。

余紀忠雖然是軍旅出身，但他讀過中央大學，還有倫敦政經學院的留學經驗。他有三樣東西讓我

訝異。第一，這位老先生平常不請政客吃飯，請的都是學者、藝術家、文人，像林文月、楊牧、林懷民等人；從請客就可以看出一個人交友的圈子。第二是他對中國古詩詞的興趣。有時候他念一句，我就接下一句。我覺得奇怪，軍人怎麼也有這種興趣；他也奇怪，你年輕人怎麼也懂這些。第三，最重要的是，台灣所有自由派，都曾在時報扮演過重要角色。雖然他有些政治上的妥協，也有許多弱點，但我從他身上學到的東西，到現在還受用不盡。即使現在領導江湖的不是這套武功路數，但我也不可能再去學別的了。

我雖是自由主義理念驅動的人，但我也知道市場。我跟自己對話當中產生的最大痛苦是，大眾媒體到底能做到怎樣的幅度與深度？黎智英常常笑我，王健壯的肩膀上是一個台灣，肩膀就被壓下去了；當然獨派可能會說我的肩膀上是一個中國吧，哈。

我這人沒有辦法，我們從小就有一個小小使命。但今天台灣的媒體負責人少了文人性格，少了知識份子的自我警覺。這些東西像恐龍一樣絕跡了，但你要我「與時俱進」也把這些東西丟掉，那還不如乾脆讓我從新聞界就此絕跡算了。

◎初稿：江宜靜
◎校訂：洪貞玲
◎定稿：何榮幸、王健壯
◎訪問時間：二〇〇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五月七日、二十五日、三十一日
◎地點：台大新聞所攝影棚

李永得

李永得

〔第十四章〕

歷史性大陸行之一

一九八七年自立晚報政經研究室主任

前頁圖說：
1994年擔任《自立晚報》總編輯時碰到「自立事件」。
（中國時報提供／中時攝影組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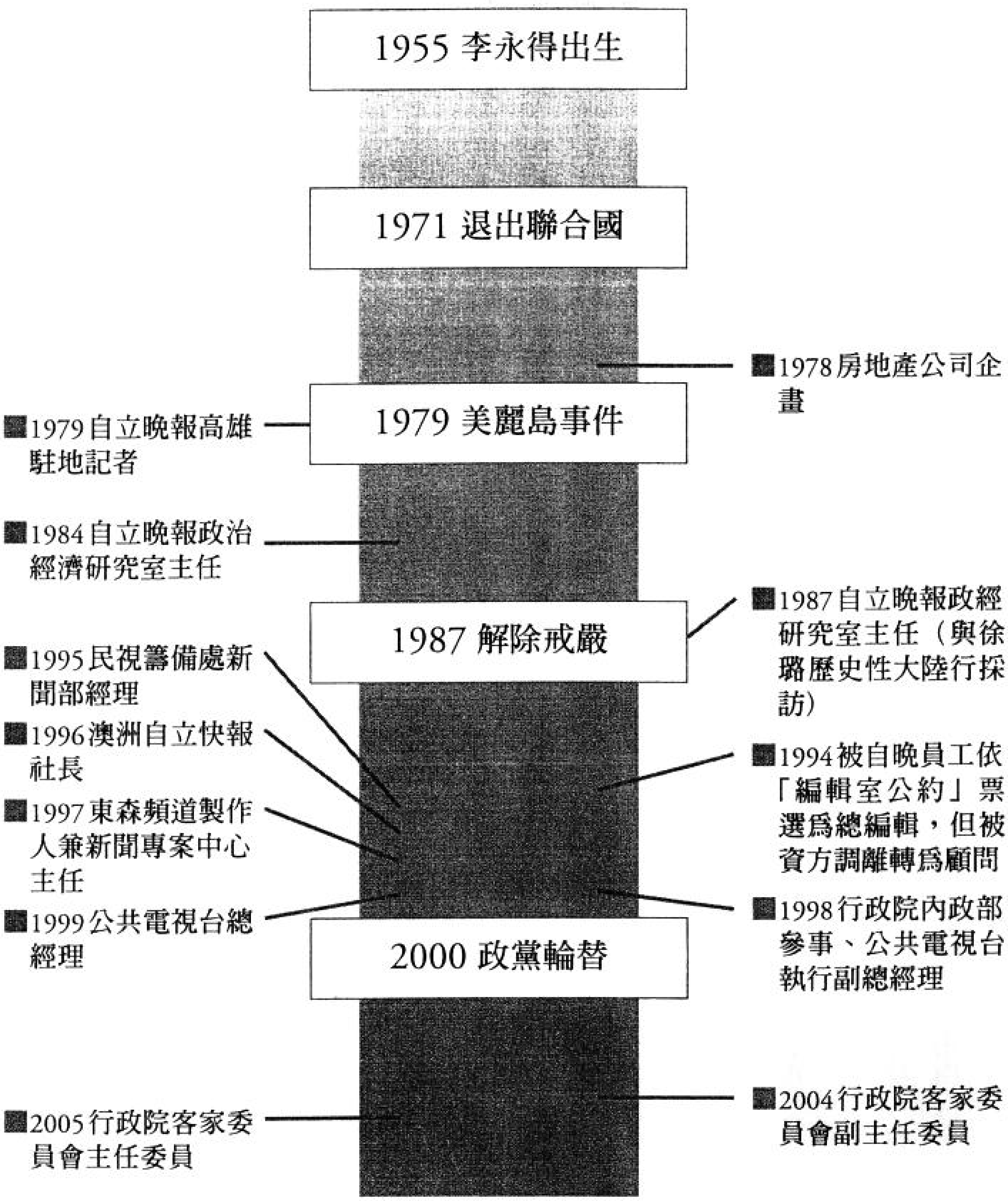
他雖然在「美麗島事件」之後才進入新聞界，卻在解嚴那一年成爲兩岸與國際媒體採訪焦點。那一年台灣社會發生了很多事，有些事情會被記得、有些事情會被遺忘，他和徐璐的歷史性大陸行，在台灣新聞史上則鐵定不會被遺漏。

然而，很多不會被遺忘的事情，其實只是歷史的偶然。他在訪談中誠實以告當年狀況，讓我們瞭解爲何他對大陸行的感受是「暴得大名」與「浪得虛名」。但新聞工作有實有虛，一九八七年九月大陸行之後，他從政經研究室主任竄升總編輯，沒有實力其實也做不來。

很少人知道他最早做過房地產公司企畫，這項工作還對他的記者生涯有所幫助。跟他相處過的記者，則會對他的嫉惡如仇印象深刻。我們並不確定，這跟客家人的硬頸精神有無直接關係，但可以確定的是，他的性情、脾氣都非常剛硬。難怪當年黑道份子打電話威脅他時，他二話不說立刻跟對方說：「你過來！我在門口等你們！」即使內心害怕，外表上仍絕不妥協。

他在一九九四年「自立事件」中成爲台灣新聞史上第一位「票選總編輯」。其後轉戰電子媒體，接受我們訪問時則已是行政院客委會主委。入閣當官是他生命中的偶然還是必然，則勾起了我們另一層好奇……

李永得大事記


1955 李永得出生
1971 退出聯合國
1978房地產公司企畫
1979自立晚報高雄駐地記者
1979 美麗島事件
1984自立晚報政治經濟研究室主任
1987自立晚報政經研究室主任（與徐璐歷史性大陸行採訪）
1987 解除戒嚴
1994被自晚員工依「編輯室公約」票選爲總編輯，但被資方調離轉爲顧問
1995民視籌備處新聞部經理
1996澳洲自立快報社長
1997東森頻道製作人兼新聞專案中心主任
1998行政院內政部參事、公共電視台執行副總經理
1999公共電視台總經理
2000 政黨輪替
2004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2005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

絕不妥協的硬骨記者

房地產企畫的影響

我出於高雄縣美濃鎮，一個純樸的客家農村。我直到十六歲考上高雄中學，才離開美濃。高中畢業後，考上政治大學。開學那天，我生平第一次坐火車上台北。

政大政治系畢業後，我曾到房屋仲介公司做企畫，讓我有市場、經營的觀念。那時我負責規畫銷售。比如說要把這塊地規畫成什麼產品，爲什麼這裡要規畫成大樓，爲什麼那裡要蓋三十五坪到四十坪房子。這個個都是學問，需要蒐集資訊、研究分析。

規畫要有所根據。因爲這種訓練，我還自創「座標理論」：我們做任何事情都有座標；座標要放對，事情才會做得對。座標的位置是根據完整、客觀的資訊；正確的解讀，才能作正確的定位。

現在回過頭看發覺，如果當初沒有做過房地產企畫，我可能就不太會經營報社、公共電視。甚至，這經歷也影響了我後來的記者工作。

其實我對房地產工作不是很有興趣。我喜歡寫作，高中時就在報紙上寫文章。後來朋友介紹我去《自立晚報》。剛開始我一邊做房地產，一邊兼高雄自立晚報的通訊記者。後來自晚想要開拓南部市

場，我就不做房地產，變成全職記者。接著碰到自晚台北缺記者，朋友告訴我：「眞要做記者，就要到台北去。」所以我就北上。

兩度感受肅殺氣氛

我是在高雄事件發生之後才進入自立晚報。我第一次感受到戒嚴肅殺的氣氛，是美麗島事件之後的第一次選舉。當時美麗島軍法大審的辯護律師張俊雄宣布參選高雄立法委員，我去專訪他。那是他的第一次選舉，也是我第一次訪問政治人物。

我寫了一千五百字的報導。刊出後，第二天警總就來找我了。我那時候涉世未深，不知道害怕。我只覺得奇怪，這些東西有什麼好問的，這跟警總有什麼關係。

自稱警總的人約我喝咖啡，一直問我爲何要訪問張俊雄？有哪些訪談內容沒寫出來？我後來才知道，這些人只是探聽情報，警總必須有報紙沒有登出來、但對他們是有價値的情報。也就是說，警總也要有自己的「獨家」，也要交差。

我另一次感受到肅殺氣氛，已經是當自晚總編輯的時候了。那時我寫了一篇社論，標題是：「軍人氣概？」我批評參謀總長郝柏村兩件事情：第一個是郝柏村參謀總長任期過長破壞制度，培養郝家軍；另一個是，他常常說要憲兵介入社會治安的事務。我認爲這是軍事統治的前兆，跟民主發展不相容，所以我就寫了六百字的社論。

當天晚上，國防部長鄭爲元在新聞局裡開記者會，那也是我印象中有史以來，國防部長第一次開記者會。國防部大肆抨擊自立晚報這篇社論，說六十萬官兵絕對無法接受，說自立晚報污衊國軍。

我記得非常清楚，那天晚上吳樹民（前自立報系發行人）剛從美國回來，準備接任自立晚報發行人。我跟吳豐山（時任社長）在兄弟飯店幫他接風。吃到一半知道國防部在開記者會，我們當場就討

論該如何回應。當時吳樹民說：「幹回去啊！」我們當場就擬了三點聲明，反擊國防部。

之後自晚連續兩個禮拜，每天都接到兩個麻袋的明信片，如雪片般飛來，全是國防部發動國軍官兵寄的。每張明信片內容都差不多，說我們是「匪報」，說我們污衊國軍官兵，六十萬大軍絕對不能接受，一麻袋一麻袋地寄過來。

對此，我印象深刻。我才寫了六百字，就引起國防部這麼大的反應。

跟蹤監控無所不在

戒嚴時期跑新聞的最大收穫，就是學會擺脫竊聽和跟蹤。

當時和情治人員玩的遊戲是：用盡方法讓情治人員無功而返。我們都打公共電話，因為報社電話一定有人監聽；甚至在國民黨中央黨部採訪，被採訪對象也不許我打他桌上電話，因為他的電話一定也被監控了。

大陸六四事件之後，黃德北（曾任自立晚報政經研究室研究員，現為世新大學社發所所長）為什麼在大陸被抓？因為他沒有當過戒嚴時期的記者。他用旅館的電話跟民運領袖王丹通電話，這一定會被監控的。

後來我和徐璐大陸行的時候，我用飯店電話跟香港記者通電話。我一聽就知道有人在錄音，錄音有時候是沙沙聲，有時候是喀擦一聲。當時我聽到喀擦一聲，就開玩笑跟那個記者說：「我們暫停一下，因為他們正在換錄音帶。」我故意讓他知道，我知道有人在錄音。結果電話立刻恢復清晰，直到訪談結束。

當時情治單位甚至直接安排人在報社裡監控新聞。每家報紙都知道，有些是「明樁」，有些是「暗樁」。各報國際組會有一位新聞編譯當明樁，代替警總監控國際新聞。早期，這個編譯拿的薪水還

是警總付的。

警總爲什麼最擔心國際新聞？因爲所有國內資訊都被控制，國際資訊則無法控制，所以外電進來時要經過這些人把關。報社堅持要登什麼外電，他們就會通報警總。直到解嚴之後，國際新聞的監控才解除。

暗樁則會在印刷廠或排字房。很多稿子落版之後，我們都要仔細去盯，因爲稿子可能會在最後關頭被換掉。我們常常發現，怎麼報紙還沒印出來，警總的電話就來了。雖然不知道是什麼人，但是知道一定有人通報。

有時候還會被搞鬼。比如「中央」政府變成「中共」政府。有可能是排版工人失誤，因爲撿字時「央」、「共」這兩字很接近；也有可能是暗樁故意整我們，偷偷搞的鬼，給我們搞麻煩。雖然不能確定，但是有可能。雖然警總盯得很厲害，不過我們也有一套防衛機制。例如敏感的文章都要再看一次，確認有沒有文章被搞鬼，再送上印刷機。

用電話寫新聞

戒嚴時期通訊配備不發達，連傳眞機都沒有。我剛當記者時，只好靠電話「寫新聞稿」。當時報社有專人接電話，我一拿起電話就開始「念」新聞，沒有重組，念出來就是一篇新聞稿。所以在打電話之前，就要想好導言是什麼、第二段是什麼、第三段是什麼。那時候的訓練是，電話一抓起來就是一則新聞了，報社的人就照字記錄。

我原本在自晚跑國會新聞。後來自晚要往前衝，就找了很多人才進來，包括陳清喜、胡元輝、陳國祥。他們從《中國時報》或《聯合報》過來，專長都在國會，所以自晚國會記者爆滿，我最資淺，就主動調到別的路線。

一般人認爲，跑國會的記者被調其他路線，好像被貶，我卻不這樣想。我那時跑監察院、跑內政部，跑了很長一段時間。我吸收到很多知識，認識很多人，有時候到國家公園走走。我發現這個國家有很多東西可以報導，很多東西很有趣。所以我常告訴記者，多跑不同的路線，多點不同的歷練，對自己的累積很有幫助。

我在自晚待了兩、三年後，有一天晚上十一點多，中時董事長余紀忠找陳國祥、胡鴻仁到我家，邀我到余老闆家喝茶到半夜一點鐘。余老先生力邀我加入中國時報，我說我會認真考慮。結果第二天，中時已經貼出公告，說我同意過去。也許因爲我傳達的訊息讓他們覺得我同意了，但是我只是同意考慮。我覺得沒有受到尊重，決定不去中時。

那時候黨外雜誌還報導，說我拿余紀忠多少錢，所以馬上答應過去。後來我不去了，黨外雜誌又寫我拿了吳豐山多少錢，所以不過去。之後我沒有到其他報紙去，就一直待在自晚。

「機場事件」難忘經驗

一九八六年發生機場事件。當時我是自晚政治組記者，總編輯是顏文門。許多人事前就知道許信良要闖關回台，大家都在現場等待。當時中正機場的外圍群眾聚集，也有很多警備跟鎮暴車。

碰到這種大事的時候，自晚幾乎所有記者，不要人指派，都會到現場。現場範圍很廣，資訊不流通。所以我們都會分工，人員不能太集中；有人負責在車上互相聯繫。到了傍晚就出事了，很多警方噴水車朝群眾噴有顏色的水，讓群眾誤以爲是刺激性的東西，引起一陣騷動。

記者最有力量的是客觀的報導，而不是評論。當時一篇「現場目擊」，冷靜客觀地描述現場畫面：是鎮暴部隊先激怒群眾，才暴發機場事件衝突。這跟所有其他報紙報導「暴民攻擊警察」的角度是不同。

那天傍晚的機場，風很大，海風冷冷地吹，有秋天的肅殺之氣。很多群眾走來走去，有的坐著，有的等著。警察來回穿梭，鎮暴部隊停在某個角落。那種畫面讓我印象非常深刻。對一個記者來說，能夠看到這些畫面，眞的很難得，也覺得有一點點幸運。

機場事件確立了自立晚報客觀公正的地位，不只在晚報領域，也有政治上的影響力。因爲所有報紙中，只有自晚敢報導警察先激怒群眾。報紙出來後，我們有很大壓力，但是自晚影響了那一次立委選舉的結果。

當時所有黨外候選人大量複印自晚發送。原本自晚的發行量只有十三萬份，但是因爲機場事件，加上複印的發行量達到一百多萬份，有非常關鍵的影響力，讓選舉結果和預期的不同。那年黨外大勝，很多人都是第一次選上立委。

歷史性大陸行的偶然

在自晚政治組待了四、五年後，我擔任政治組召集人；後來顏文門離職到《自由時報》，陳國祥接任自晚總編輯，我則接任陳國祥的政經研究室主任。

到了一九八七年七月解嚴，政府準備開放大陸探親。我們認同這樣的政策，也認爲這是突破性的報導題材。當時所有報紙都蓄勢待發，想拔得頭籌進入大陸採訪。在報業競爭和政策趨勢下，我們以最快的速度決定派記者到大陸採訪。

不過，當時報社只有我和徐璐剛好有簽證，可以隨時出境，所以吳豐山就派我們去。有人說，自晚怎麼選了一對金童玉女去大陸，其實只是歷史的偶然。

當年九月九日，我接到報社指示到大陸採訪，十一日就搭飛機前往日本轉機。怕走漏消息、官方阻撓，所以整個過程完全保密。直到我們上飛機，報社才發布消息。國民黨立即發布通緝令，要在日

本攔截我們，把我們抓回來。瞬間，震驚全世界媒體。

我們先到日本，向中國大使館申請中國大陸簽證。中國大使館的人也不敢立即給我們簽證。後來我聽中國方面知情人士說，當時東京大使館與北京總共來回打了十七通電報請示後，北京才拍板定案，同意我們的採訪簽證。

我們瞭解，這趟歷史性的大陸採訪，步步危機，必須小心謹慎，包括退路，也就是進入中國之後，要從那裡回到「自由世界」的路徑，也必須預作安排。否則，一旦發生危險，又無退路，將會任人宰割；若被抓、被關，全世界將沒有人知道我們的下落。

從中國出來有日本、新加坡、香港三條路徑。我們分析評估最安全的路，是從日本原路回來，因此要離開日本之前，要向日本申請「再入國」簽證。沒想到，日本政府不知是受到中國還是台灣的壓力，竟然對我們的申請再三刁難，一副不想給的樣子，氣得我們撤回申請。換言之，我們沒有退路，就要進入中國採訪了，一切就阿彌陀佛保平安了。

飛往大陸時，心情有點矛盾。小時候，我們被教育成大陸是神州，是故鄉，我覺得好像要回到非常熟悉的地方。可是再認眞想想，大陸其實是很陌生的。我驚覺教育的可怕就在這裡。到了北京，現場大概有一百位記者，全世界的媒體，台灣的、香港的、日本的、歐洲的，所有駐北京記者都在。我第一次見過這麼大陣仗的記者會。當時嚇死了，我才三十幾歲，而且我本來就內向害羞，不擅於面對那種公共場合。

大陸採訪三不原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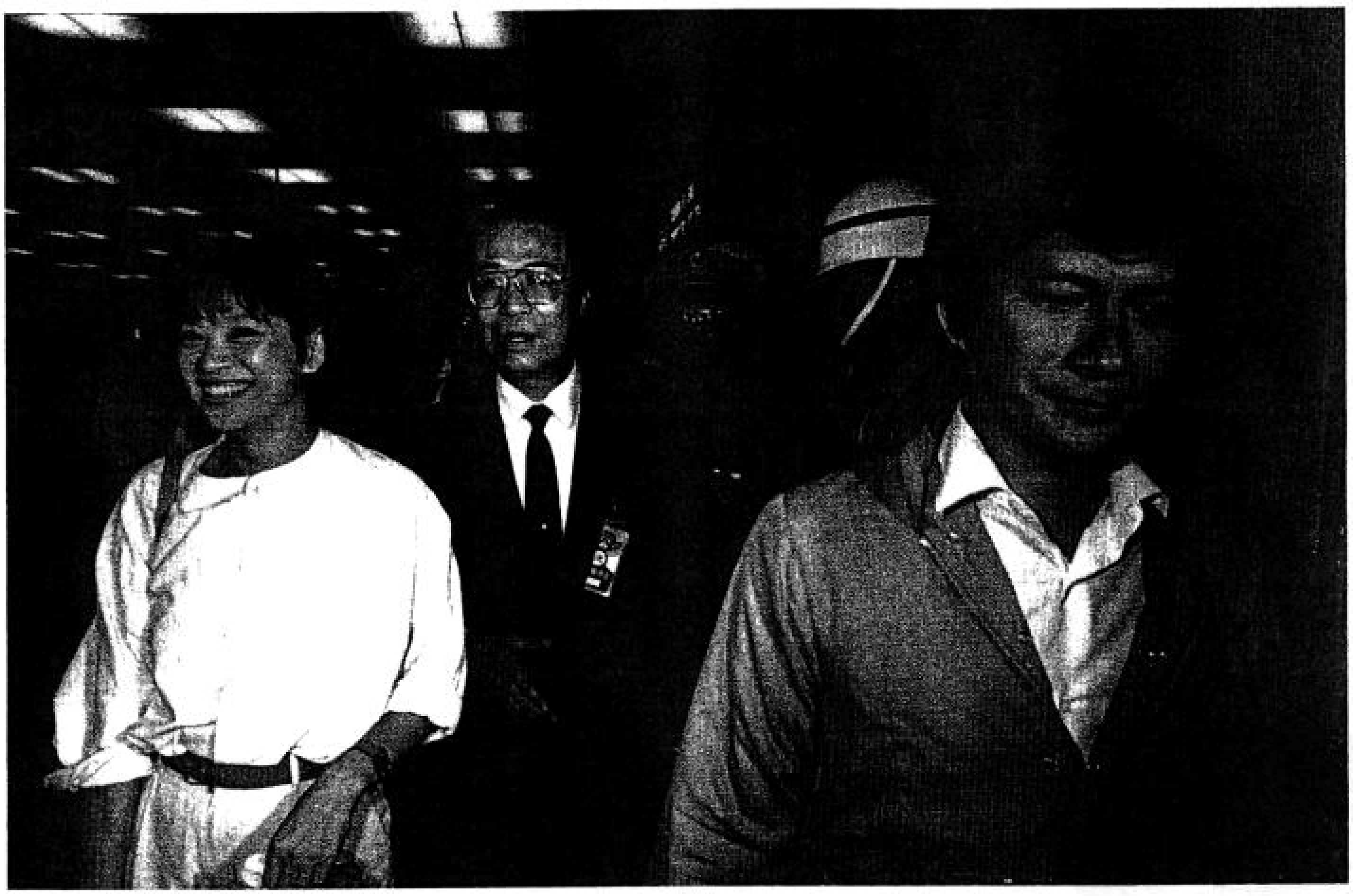
進大陸採訪時，我和徐璐思考：我們代表在台灣成長的一代，要展現出什麼姿態來表現台灣和中國的不同。

我們的採訪原則就是三不。第一，不接受招待。如果非不得已要接受，一定要接受我們回請。第二，不採訪官方。因爲我們定位非常清楚，就是要讓台灣讀者瞭解大陸社會的狀況。最好的採訪地方就是馬路、市集、人民大食堂，所以我們絕不採訪官方。第三，官方不得干涉我們的採訪對象。

另一個很重要的原則是，爲了表現在自由環境下長大的骨氣，在中國，我絕對不批評台灣，也不批評國民黨。如果要批評，一定是批評共產黨，這才能顯示台灣人不一樣的地方，這就是骨氣。

在大陸採訪，隨時要提防中共官方的跟蹤和監視。我們在國民黨時代跑新聞已練就了這一套。第一，我絕對不搭在門口排隊的計程車，一定到一百公尺以外的路上攔計程車。第二，到了旅館大廳要特別警覺。

有一天我們去採訪方勵之（當時中國民主運動領袖）。當天早上我一到大廳就感覺有問題。大廳上有些人站著，有些人坐著，



首批赴大陸採訪的《自立晚報》記者徐璐（左）與李永得（右）返國。（中國時報提供／蘇俊郎攝）

李永得與徐璐合著《歷史性・大陸行——中國大陸採訪記實》一書。

有個共通點就是，很多人都在看報紙、看雜誌。當時我只感覺有點問題，但也不確定，所以就與起好玩之心來測試看看。

我們走到另外一條街攔計程車。我們很警覺，一直注意後面有沒有人跟。後來司機跟我說：「方勵之的家在前面十字路口右轉就到了。」我一聽就說：「司機你先不要彎，你直走，然後煞車。」結果後頭的車子果然一直跟著我們往前走，後來我們一煞車它就衝過去了。然後我們回頭，看到那輛車子緊急煞車又回頭，我們百分之百確定那台車是跟監著我們的。可是他們比我們更強的是，我們一到方勵之家門口，那台車子早已經在門口等著了。

在大陸採訪時，我已經不怕被抓了，因為全世界媒體都在看著我們。我們在東京開記者會就是要吸引更多注意，我如果被抓，全世界會來找我們。

其實國民黨幫了大忙，因為我們一出發，國民黨就發出通緝令，全世界媒體興趣就大了，都派記者過來了。當自晚發布新聞、各國媒體都在找我們的時候，我們還故意躲在東京不露面，讓大家以為我們兩個人不敢出來。等到突然露面的時候，全世界的媒體都來了。有了全世界的關注，我就不怕到大陸去會忽然消失了。

自晚走向黃昏

大陸行之後，自立晚報發行量衝高，在晚報市場獨占鼇頭。所以我們信心滿滿，要搶報禁開放後的第一份日報。一九八八年辦了早報，沒想到卻讓晚報受到內外夾擊。

在外，《自立早報》搶走了自立晚報的讀者，《中時晚報》和《聯合晚報》又有強大的日報力量支持，壓縮自晚的市場。在內，晚報的「一軍」調到早報，被留在晚報的人自認是「二軍」，內部士氣低落。自晚的報份一年內就掉了一半多，掉到六萬七千份；我記得非常清楚，六萬七千份。這是當時我接了晚報總編輯的情況，連股東都覺得自晚沒希望了。

當時自晚的設備根本比不過中晚、聯晚。自晚的機器一次只能印三萬份報紙，而且還是人工排版，中晚、聯晚則可以印十二萬份。我們花了約一年的時間重新整頓，重新設計版型，加強股市報導。當時全民瘋股票，晚報主要的競爭就是股票新聞。我們找人寫程式，跟別的單位合作，讓收盤的資訊立刻用專線傳到報社。所以我們出來的股票行情表，比中晚、聯晚還要好。

自晚的情勢就這樣回升，有了起色，但早報卻愈陷愈深。這兩報互有消長，最後負擔愈來愈重，財務虧損到連董事會不能接受，必須轉賣，開始找新的買主。

最後殺出台北市議員、三重幫的陳政忠，大家都傻眼了。其他買主也沒多好，都是財團，只是陳政忠的名聲不好，讓大家更不放心，編輯部的人群起譁然，草擬了「編輯室公約」，要求他一定要簽下，以維護自立晚報專業自主的風格。但陳政忠接手的第一天，發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解除我總編輯的職務，引起很多員工的反彈。工會發動票選總編輯運動，結果我當選民選總編輯。

不願被利用選擇離開

最讓我驚心動魄的是，有一天工會告訴我，陳政忠已經放話，若工會不妥協，下個月薪水兩千四百萬他不願意付。工會負責人很憂心，一旦真的發生，對抗爭運動是很大的打擊，希望我能幫忙想辦法。我去哪裡找兩千四百萬？後來我想，陳政忠現在要用這個逼工會妥協，我必須先站穩腳步。

陳政忠的錢不進來沒關係，工會自己來。我要保證下個月薪水沒問題，大家才能安心。要不然大部分的人會想說，工會在搞什麼啊，搞到現在大家都沒薪水領，反過來會責怪工會。這件事逼得我在所有同事面前大聲保證：「誰的薪水有問題？我來負責。」我一邊找幾位有錢的朋友當後援，一邊也嗆陳政忠，如果新資方薪水不進來，就由工會從此接管報社。最後，陳政忠的錢還是進來了。

自晚內、外聲援力量發起「九〇一爲新聞自主而走」大遊行後，陳政忠還是不願意簽編輯室公約。當時有兩、三百個人離開自晚，陳政忠想利用我安撫工會的抗爭，提條件要我當社長。

但是，之前因爲我被解除職務，引起編輯部很多同仁的反抗，以及之後更大的抗爭；如果我留下來，還升官，等於是我利用工會當籌碼跟資方談判當社長，資方也利用我來擺平抗爭。在這種情勢下，我決定離開自晚。

我離開這件事，也有人批評是跟資方談好條件，領了退休金就落跑。但我仍覺得我的決定是對的。走的人不代表有多清高，留下來也不代表是爲了生活而失去理想。留下來的、要走的，都值得尊敬，因爲我們一起奮鬥過，只是每個人有不同的考量。

雖然經過那麼久，我到現在都還很懷念自晚。那是一個給每個人發揮熱誠跟專業的環境。雖然薪水不高，但是大家都很年輕，理想高、熱誠夠。我很懷念那段日子，覺得非常值得。

理念不合離開民視

陳政忠接管自立報系後，關掉出版社。自立晚報出版社是當時少數專出本土歷史文化叢書的出版社，聲譽卓著，對本土文化有很大的貢獻，關掉實在可惜。於是我和一些朋友共同籌資一千二百萬，成立「玉山社」出版社，繼續本土歷史文化書籍的出版，我被推爲首任董事長。這時民視正籌備開始，董事長蔡同榮找我擔任新聞部籌備處經理。同時，辜寬敏也找我接《黑白新聞周刊》的社長。這段時間，我同時兼玉山社董事長、黑白新聞周刊社長、民視籌備處新聞部經理，離開自晚後反而更忙。

那時候，也許因爲太忙，疏於關懷，發生婚變。不完整的家庭令我意志非常消沉，有整整一年的時間無法工作，我辭掉玉山社董事長、黑白新聞周刊社長、民視新聞部經理。一九九五年底，我回到澳洲，因爲我曾經在澳洲創辦澳洲《自立快報》。

一九九一年，我獲得美國史丹福大學大眾傳播學院的奈特里德獎學金（Knight Ridder Fellowship），帶職停薪到史丹佛進修。這個進修對我影響很大，開拓我的視野，也給我很多觀念上的衝擊。我認識到很多不同國家、文化背景、領域的記者，分享很多經驗。

在公視鼓吹多元化

二〇〇〇年，我擔任公共電視總經理後，非常重視各種不同族群的聲音。我要求每年要有一部客家連續劇、一部原住民連續劇，而且這些連續劇一定要大成本製作。所以全台灣第一個「客家新聞雜誌」、第一部八點檔大製作的客家連續劇「寒夜三部曲」、客家紀錄片、原住民新聞雜誌等，都是我在公視製作的。

我非常反對過去一元化的同化政策，所以鼓吹多元化。我們的社會是一元化社會，我們只用收入作為衡量他人的標準，只認為有權、有錢、有高學歷才是社會的菁英份子。

如果社會可以肯定公車司機的專業，因為他的專業而給他一個月十萬塊，他會覺得這個職業是很值得做的。他的小孩也會引以為傲，不會覺得我爸爸當司機，很難啓齒，但是我們並不會這樣看待公車司機。這就是一元化的社會，媒體的觀點很單一。

媒體應該為弱勢族群發聲。在資本主義過度發達的社會，很多弱勢的聲音被犧牲。媒體人是文化人，必須顧及到弱勢族群，要反映各種不同聲音，而不是只反映強勢的、有市場價值的聲音。

報導弱勢的時候要以他們為主體。這就是多元文化所強調的主體性。如果自己站在主流立場，用同情的眼光看他們，就是消費弱勢（像是大肆宣傳原住民的豐年祭，藉此吸引觀光客）。應該由他們自己決定，尊重他們的主體性。

我很自豪，公視是全世界使用最多語言的電視台。我鼓勵每個人說自己的語言。採訪越籍配偶的時候鼓勵她說越南話，我們找人幫她翻譯，用中文字幕打出來。用受訪者語言採訪他們，鼓勵他們說自己的語言，不要強迫他們說國語。

公視新聞要耐得住寂寞

我在公視時，公視新聞的定位非常清楚。在商業環境中，需要不一樣的新聞。我們不做譁眾取寵的東西。公視新聞的定位是環保、教育、文化和人權。這些議題和每個人息息相關，卻很少在媒體上看到。商業新聞台沒興趣，因為他們認為這些議題無法拉抬收視率。公視不應跟隨商業台的腳步，而是要走出自己的思考。

另外，我不要記者攔路採訪、不要只有單一新聞來源的新聞，例如記者會新聞。我認為新聞大致

分成二類，一類是「意見」（Opinion），另一類是「事實」（Fact）。意見性新聞要尊重多元及平衡，而事實新聞，則要盡到「查證」的義務，才可播出。事實新聞是不能引用平衡原則的。

這是公視必須走的路，一開始會非常寂寞，但一定要耐得住。如果跟隨商業台一窩蜂起舞，公視就失去它的公共價值。

我希望公視能夠眞正壯大。公視壯大可以帶動商業媒體良性競爭。但是只有公視壯大也沒有用，還需要政府對媒體環境重新建立一套遊戲規則，讓媒體有機會健康發展。政府要做的事情只有兩個，就是建構一個讓媒體可以自然壯大、公平競爭的環境。第二個，保護消費者有充分「選擇的自由」，不被業者壟斷、宰割。

政治與媒體的分際

公視總經理每三年一任，我已擔任兩任，這是我人生中非常有意義的六年。但

2004年2月14日，台灣有史以來第一場總統大選電視辯論會在公共電視舉行，公視總經理李永得在當天上午特別察看場地等各項措施。（中國時報提供／王遠茂攝）

我認為，一個組織要不停地注入新的文化，才能保持創新，才能永續發展，而要有新的文化，就要換新的經理人。所以我應該到了要離開的時候了！在那個時候，行政院內閣改組，羅文嘉接任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他打電話邀我擔任副主任委員。我很訝異，也很猶豫。

我一向認為，政治和媒體要保持一定的距離與分際。從媒體人直接轉任政務官，在國內、外不是沒有前例，但終究違背我的信念，因此我沒有答應。

不過文嘉兄不放棄，繼續遊說我。他一直強調，「傳播」是振興客家文化非常重要的一環，身為客家人的我，應該用我的專業來回饋、服務客家鄉親。我被他說動了，就這樣來到客家委員會擔任副主任委員。十個月後，文嘉兄辭職參選台北縣長，當時行政院長任命我接任主委迄今。

在客委會期間，也學習很多，是我生命中另一段既豐富又有意義的旅程。

媒體不能用來交朋友

我認為，今天媒體亂象很大的原因是，媒體講道義、不講道理。黎智英在台灣創辦《蘋果日報》前半年左右，曾找我在他陽明山的家聊辦報的事。我當時問他三個問題，為什麼要辦報？為什麼在台灣辦報？為什麼認為在台灣辦報會贏？黎先生是一位徹底的自由經濟的信奉者，他認為能經得起市場考驗的，才是公義，才有存在的價值。我不完全同意這個觀點。不過我很認同他講的其中一點。他說，他在台灣辦報一定會贏，因為他辦報不是拿來交朋友的，不會拿報紙去跟任何政黨或政治人物套交情。相對台灣的報紙，幾乎都清清楚楚地各擁其主。這是台灣媒體非常大的問題。台灣不管大報小報都是交朋友的。作為一個報社老闆，不交朋友有點絕情、違反常情，卻對媒體作為社會公器造成很大傷害。

電視的影響力遠大於平面媒體，可是台灣電子媒體卻很亂。這需要從觀念、環境、制度徹底改

革。媒體亂象的根本原因在於，每家媒體規模太小，都在生存邊緣。這樣還能要求它什麼道德？人在溺水的時候是不會講究姿勢的，他一定拚命地抓救生器材，沒有所謂的優雅。這就是台灣的媒體，每一家都像溺水的人，水都淹到鼻子裡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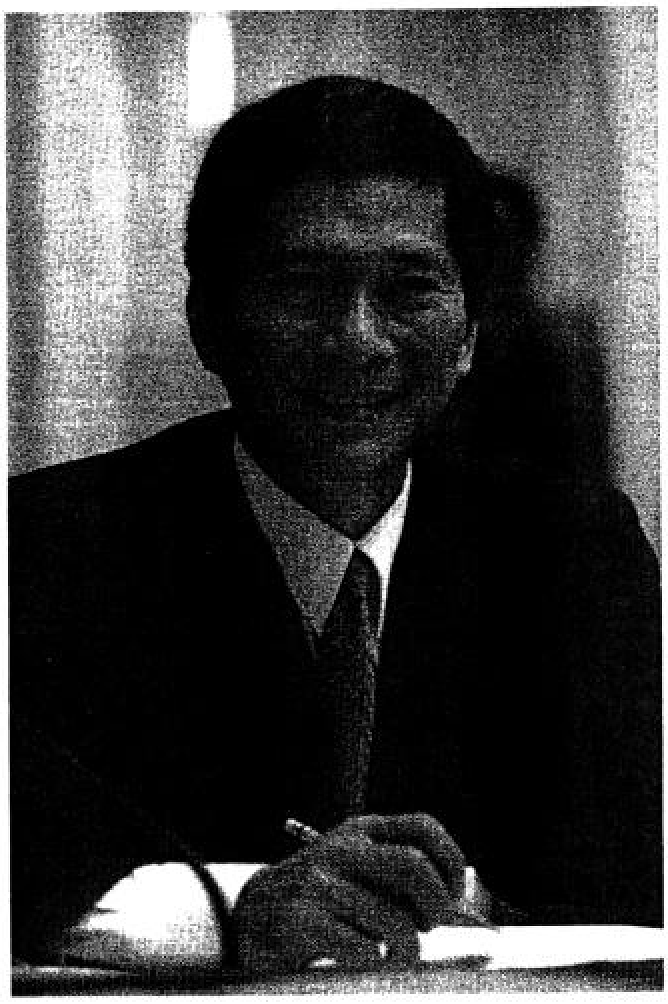
因爲台灣怕媒體被少數人壟斷，所以塑造媒體過多的環境。這個觀念是對的，但是用錯方法，反而造成今日亂象。台灣要允許媒體規模大，如此媒體才有利可圖；能生存，它才會講究身段和社會責任。所以應該設立規範，鼓勵媒體購併。

以前靠勇氣，現在靠專業

回首記者生涯，我認爲戒嚴時期記者需要專業，但是更需要勇氣。因爲有些事不報導，記者日子照過，但是一報導可能就有身家性命、被抓坐牢的危險，所以勇氣顯得特別珍貴。

戒嚴時的考量是敢不敢報導？報導後能不能保護自己？保護報社？報導的東西要經過很詳盡的查證。而且要有一種信念：只要是眞實正義的，社會公道自會與你同在。

解嚴後，新聞工作者最重要的是提升專業，專業重於勇氣。除了前面講到媒體環境結構問題外，媒體工作者要用謙卑的心，努力充實



2005年擔任客委會主委。（中國時報提供／劉子正攝）

自己，提升專業品質。

戒嚴時期勇氣重於專業，因爲有了專業之後，可能不敢寫，或者寫了之後報社不敢登。解嚴時期專業重於勇氣，因爲社會更開放、更複雜，也更需要專業。

自評：勇氣不足，但懂內省、會思考、能成長

如何評價自己在戒嚴時期當記者的表現？坦白講，我也沒有百分之百的勇氣。終究有些事情還是不敢做。做了可能會有很嚴重的後果，甚至報紙會被抄。包括我們去大陸這件事情，如果戒嚴法還沒解除，我們就不敢做。也許我們認爲應該要做，可是我們不敢做。

不敢做不是個人考量，不是怕被抓去關或消失無蹤，而是報紙可能會被關，關掉以後很多人的生計就有問題，那就茲事體大。敢不敢做，就要看決策者的勇氣，但決策者要負責任。

我在記者這個角色上，還蠻能夠根據事實，找出正義或公道的事情報導。我下筆非常謹慎，如果遇到同音同名，我一定問清楚每個字怎麼寫。如果心中沒有把握，就一定要查證。過去常常鬧很多笑話，明明死了還寫成活的。我不會判斷他們是故意，可能是作業草率或整個作業流程有問題。

我很強調專業，但記者的專業永遠不足。所以我會不停地思考、內省，要求自己成長。

記者的信念

我當記者時的基本信念，就是「竭盡所能報導完整的事實」，滿足閱聽大眾知的權利。

我把新聞專業分成四個層次：技術、知識、倫理、理念。記者的專業技術是新聞寫作。所謂專業就是「別人不會這麼寫，只有記者才這麼寫」。記者的寫作專業就是能公正客觀地讓人瞭解事實。專業知識是採訪新聞所需要的基本知識，比如採訪政治新聞，就需要充足的政治相關理論和知識。專業

倫理不是指職場倫理，而是指責任，採訪時要能站在別人的角度想，對採訪的關係人負責任。而最上層的就是理念，也就是爲什麼從事記者這個行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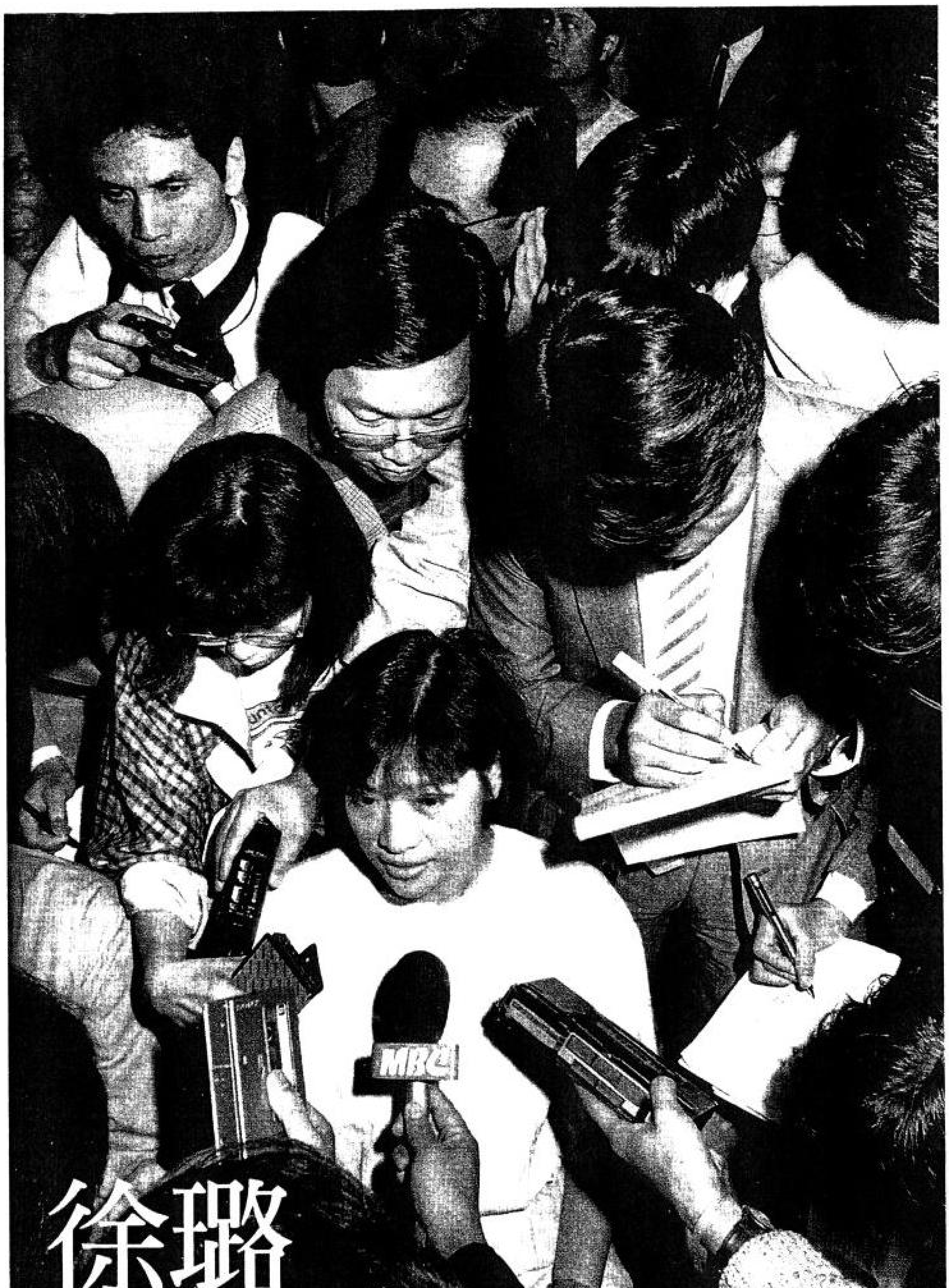
絕不妥協的人生觀

我的人生理念很簡單，希望我的生命內容更豐富，就這樣而已。記者生涯接觸面廣，經歷很多難得的經驗，令我很感念，因爲這豐富了我生命的旅程。在我媒體工作這條路上，最感恩吳豐山。一路走來，他一直給我機會和舞台，讓我成長。

我當自立晚報總編輯時，我們記者寫了一篇著名黑道幫派老大要選立法委員的報導，惹火了他們。「老大」打電話來報社恐嚇我，說他們有幾百位兄弟遊行要前往報社，兄弟們很火大，他無法控制。我則大聲回說：「你過來！我在門口等你們！」講完就掛掉電話。其實我心裡怕怕的！下班要開車前，先檢查車子有無異樣，回到家先全屋檢查一遍，並打電話聯絡家人，確定平安後才安心。雖然有恐懼的威脅，但絕不跟他們妥協……。

因爲我就事論事，罵得理直氣壯，所有工作人員都被我罵過。不過，我現在反省到要愛人，人的價值是高過事情的。我時時提醒自己要愛人，希望在就事論事、絕不妥協的剛硬性格裡，能夠多一點柔軟。

◎初稿：陳怡璇
◎校訂：林麗雲
◎定稿：何榮幸、李永得
◎訪問時間：二〇〇七年三月十九日、五月八日、十日
◎地點：客委會主委辦公室、台大新聞所攝影棚


MBC
徐璐

徐璐

〔第十五章〕

歷史性大陸行之二

一九八七年自立晚報政經研究室研究員

前頁圖說：
大陸行回到桃園機場後，徐璐陷入新聞記者的包圍圈。
（翻攝自《人間雜誌》／陳憕巨攝）

同樣因爲一九八七年九月歷史性大陸行享有盛名，李永得當時已是資深記者，她卻是剛進新聞界一個多月的菜鳥，難怪她再三強調「虛名是很大的負擔」。但就像她人生中無數次勇於嘗試一樣，大陸行也只是她追尋自我的過程而已。

本書所有受訪者中，她是唯一希望從解嚴後回溯生命歷程者，而且是從作爲媒體人的句點——華視總經理改革失敗經驗談起，然後才拉回戒嚴時期投入黨外雜誌的光景。

當年《新新聞》雜誌創刊時，她在新新聞「四巨頭」陰影下找不到自己，毅然跑去《自晚》面試當記者；大陸行結束後，她自覺新聞專業淺薄不足，毅然出國念書強化國際視野。透過她的反省，讀者可以看到新聞工作者自我突破的艱辛歷程。

對我們來說，從早年在困頓環境中創辦黨外雜誌《大地生活》關懷社會底層，到一九九八年出版《暗夜倖存者》一書的深刻告白，她更展現了女性新聞工作者令人敬佩的堅強與勇氣。她勇敢面對人生災難與個人傷口的方式，都讓我們深深動容。

很多人認爲她兼具美麗與智慧，但是，當年那個靠借錢辦黨外雜誌、幾乎面臨精神崩潰的二十四歲女生，卻是靠著外人難以想像的無比韌性與毅力，才可能一路走到現在……

徐璐大事記

1958 徐　璐出生

1971 退出聯合國

1979 美麗島事件

■1981大地生活月刊發行人

■1982八十年代雜誌執行主編

■1987新新聞總經理；自立晚報記者、副總編輯（與李永得歷史性大陸行採訪）

1987 解除戒嚴

■1995台北之音電台創辦人、總經理

■2000中華電視公司副總經理

2000 政黨輪替

■2002中華電視公司總經理

■2006中華電信基金會執行長

不斷追尋自我的女記者

台大新聞所這次所做的「資深記者生命史」是從成長的過程開始，到新聞生涯一路講下去。我的部分，卻想從一個反的方向開始。

我想從我作爲媒體人的「句點」——華視開始講起。

從我二十一歲開始寫了第一篇關於陳達的報導文章，到後來辦雜誌、當記者、當媒體主管，一路走了近三十年。當我決定離開華視時，我已選擇離開媒體，所以我說它是我作爲媒體人的一個句點。

華視——媒體生涯的句點（2000-2004）

二〇〇〇年三月十八日，台灣的政治出現了震撼性的轉變，執政五十年的國民黨在大選中輸給了在野的民進黨。

雖然，當時社會上是有一種氛圍，一些長期支持社會改革或民主改革的人，對這次大選都顯露出了一點期待。因爲繼「總統直選」之後，「政黨輪替」的理想竟然好像也往前邁出步伐了。不過，多數人，包括我，其實根本沒有預期國民黨會落敗，第二天開票之後，心情上還是很訝異。國民黨下台了嗎？眞的下台了嗎？好像作夢一樣，感覺很不眞實，很難想像這麼龐大的政黨居然沒有經過流血革

命，就這樣輸給了民進黨。而民進黨是否已準備好去治理這個國家呢？

選後，剛贏得大選的民進黨顯示出對改革的一些熱誠。民進黨內有人和我談到媒體改革。當時台灣媒體的禁忌，就只剩老三台（台視、中視、華視），因爲其他媒體幾乎都已經開放了。

當時，由軍方掌握的華視在新政府的壓力下，同意釋放一個副總經理的位子；在某一個場合上，我被問到願不願意去當副總經理。我第一個反應是：「軍方？嚇死人了！」「能做事嗎？」考慮了三天，問了一些媒體圈朋友的意見，還有我之前的主管吳豐山先生，他們的態度都是支持的，大家大多覺得還是有些改革的理想是可以做的。但是，當初接受這個職務，到底是爲了「媒體改革的理想」或是「頭銜」的虛榮感？或是我亟需一個工作來塡補我離開「台北之音」後，「漂泊」了近一年的「工作空虛感」呢？現在回想起來，最後兩者的原因可能才是眞正的驅動力吧！

在我正式就任之前，我曾分別向陳水扁總統和時任辦公室主任的馬永成直接表達我希望他們能給我一個專業的空間，讓我當一名專業的媒體經營者，讓我們在媒體改革一路上堅持的一些理念，如政治不干預媒體能得以實踐。當時，我得到了他們的應允。

後來，在華視的四年，我的確從來沒有接到過來自總統府、行政院或新聞局的任何一通電話，要求我做什麼。因爲沒有政治干預，我也從未向新聞部干預過任何一則新聞，華視的新聞部也因而能有四年的時間擁有一個完全不受干擾的專業環境。

與大象共舞，改革失敗

然而，我在華視的經營和改革卻舉步維艱。進華視時，老三台的業績已經大幅下滑，完全沒有優勢，因爲有線電視已經有了一定的氣候和市場。當大家開始往新的方向走，老舊的東西很難生存，除非它可以迅速翻新。可是大象很難跳舞，特別是在軍方的控制下更難。

最初兩年，我還曾試圖作組織改造。現在想想，眞是有點天眞，事後也證明我是失敗的。改革是漫長的工程。威爾許（Jack Welsh）在奇異公司作組織改造，歷經十年才成功。他還擁有董事會全力的支持，有整體、長期的考量都還要十年。而且，軍方又有強大的利益。要改革如此老舊的體制，又只有兩年總經理的任期，失敗似乎是註定的。

當我在二〇〇二年由副總經理升任總經理時，當時由湯曜明將軍主導的軍方仍非常強勢，他派任了兩位陸軍副總司令來擔任華視的副總經理。華視的董事會有二十三名董事、三名監察人，軍方的代表占約四分之三。其中有三個單位的代表比較有決定權：黎明基金會、總政戰部、國防部，近四分之三都是軍方代表。但是，卻沒有人能在董事會上對任何重大提議、決策說「Yes」。軍方的這些董事，人其實都很好，對我也相當包容。當時擔任總經理、後來擔任董事長的周蓉生先生也很支持我。但是，卻沒有人能對任何較大刀闊斧的計畫，給予明確的肯定。黎明基金會需要華視的營收分紅或是發放股利來維持生存，因此，原來可以提供協助投資在節目或挖掘人才的特別公積，都無法投資在華視節目或體質改造上。

值得一提的是，接任華視總經理期間，公共化議題出現了。對於爲什麼需要公共媒體，這點在理想上，大家都不會反對的。但是對於「HOW？」就有些不同的意見出現。那時，有些學者提出，台視或華視公共化之後，要兼具公共媒體的本質，但又要能商業經營、自給自足。我當時認爲這個方向，務實來看，不太可行，也不符合公共媒體的特性。在我的理解中，公共媒體就是應該由政府編列預算補助。但事後回想起來，我當時應該更沉澱地思考這個問題，站在國家需要公共媒體的立場，和公共化學者一起更有耐心地來看問題。譬如說，大家可以一起來討論，有沒有務實一點推動公共化的辦法？有沒有可能動員更大的輿論力量、社會力量，說服朝野政黨編列公共媒體的預算？但我未能站在制高點，從社會長遠的發展來看公共媒體。我忽視了過多有線電視對台灣社會長期的惡性影響；在

擔任華視總經理時留影。（華視提供／蔡森棋攝）

這樣一種畸型的環境中，公共媒體的確可以發揮一點點作用。總之，在處理公共化的議題上，回想起來我的反應或處理的方式的確有點短視。

接下華視總經理的位子，我的任期是兩年，大概做了一年後，我就發現自己是不會有所作爲的。除了董事會的結構使得公司決策緩慢而僵化、無法做中、長期規畫；公司內部有些員工對於求新求變充滿抗拒也是原因。另外，台灣既有的收視率調查機制，也是使我及許多媒體人對媒體環境充滿挫折的主因。在鄭淑敏剛擔任中視董事長不久，在一九九九年一月，她就曾買下好幾個半版廣告痛批AC尼爾森收視率對台灣電視所帶來的惡性影響。此外，我在八點檔這條最重要的產品線上，並沒有成功走出一條路，沒有太好的表現。我一方面覺得自己並沒有足夠的能力來經營電視台；另一方面，「不能施展抱負」的無力感也很耗損人的意志與熱情。當時，作爲一個媒體的經營管理者，每日要面對的（至少以我的情況）已不是政治干預。在這部分，媒體經營者已多少擁有一些自主權，譬如在某個新聞局長任內開始以「置入性行銷」的商業方式介入媒體時，經營管理者可以說「不」，只要能忍痛犧牲一年約一千萬到四千萬不等的收入的話。但是，收視率、廣告主、利潤……，卻是經營管理者每日要面對的巨獸。我當時的思考是，如果選擇作爲一個商業媒體的經營管理者，就不能不對利潤負責，向巨獸低頭，這一點和我自己作爲媒體人長期仍保有的「浪漫情懷」頗爲抵觸。所以，在二〇〇三年底，我便向當時的周董事長、董事會代表表明了我將卸任的堅決意願。本來是要提前，但後來爲顧全大局，仍做到任期屆滿。

在我決定離開華視的消息披露後，當時擔任華視董事的金恆煒約我見面。他表示，「他們」希望我不要離開。不過，如果我改變心意，不走了，「他們」也希望我作一點調整。「調整？調整什麼呢？」我問。「譬如在新聞部增加一位副理。」我不知道他口中所說的「他們」是誰，不過這卻是一個頗令人難忘的小插曲。

二〇〇四年六月二十四日，當我走出華視大樓的刹那，我還記得，當我離開大廳和員工握手告別時，我一方面對自己的失敗有點感傷，但另一方面，當我瞄了一眼新聞部的入口處時，心裡想著，至少我沒有辜負我的新聞「專業」。

已逝的摯友羅曼菲知道在交接典禮後，我將是一個人「形影孤單」地走出華視時，就向學校請了假，開了車在大門口等我。我在華視大門口跳上車，她看了我一眼。「感覺如何？」「如釋重負！」我說。

在肥沃的土壤中長大

我的家庭對我影響很大。我從小就有些特質，譬如喜歡嘗試新事物，個性自由開朗，可以自主思考……，都跟家庭教育有關。

我的家境很窮，但是父母對孩子均給予絕對的尊重、自由和信任。父母不打罵小孩，而把小孩當成朋友，對小孩充滿了溫暖的愛。這樣一個環境，使我在日後比較有能力去面對挑戰、面對挫折。假設家庭是土壤，我是在非常肥沃的土壤中長大的。

因為母親是小學教師，我小時候住學校宿舍，左鄰右舍加起來有十幾戶，小孩們鎮日玩在一起，所以我的童年是非常快樂的。

在淡江大學求學時，王津平、李元貞老師，及李雙澤「唱自己的歌」的事件深深影響我。淡大的氛圍在當時算是相當自由。我上了王津平的課，也選修他跟李元貞、梁景峰合開類似批判文學的課。後來我跟他們變成好朋友，經常到他們家去。在那裡，我認識了黃春明、陳映真、蔣勳、胡德夫、王禎和、尉天聰……等人，還有其他大學的學生，也聽到很多未曾聽說的事，便開始對社會議題感興趣。

大四時，王津平舉辦全國巡迴的書展，我也跟著去。辦書展的目的是當時鄉土文學中很重要的一個理念——關懷這片土地和人民。這中間其實夾雜我的老師王津平的「左派」理想。我完全不懂，但仍跟著跑，就這樣全國走了一遭。之後，又間接結識《八十年代》的司馬文武、康寧祥及「黨外雜誌編輯聯誼會」的林正杰、林世煜等人。

我去新公園聽康寧祥的演講，現場周圍都是便衣警衛。那時光聽演講就有一點風聲鶴唳的氛圍，但對我們這些叛逆青年來說，卻反而覺得是一種有意思的事。康寧祥的演講對我的衝擊也很大，因爲我從來沒有接觸過草根性的政治人物，談論台灣的公平正義和民主改革。我聽了老康的演講，才開始逐漸模糊地瞭解到「黨外」這樣一個本土的政治運動。

這段過程，改變了我原來所規畫的人生。我原來的計畫是念完大學後，如同多數同學一樣出國念書。當時，我連想進修的科目都規畫好了——「文化研究」或是「比較文學」。但是，人生往往就是由一連串的意外，而自行走出了它自己的路。

初生之犢辦雜誌（1981-1983）

大學畢業時，由於我身邊有些朋友也受到影響。一位是我的同班張同學，另一位是何碧珍。我們三個聚在一起，談論著，是不是應該做一點事情？那時候也快畢業了，想了半天，想到辦雜誌。因爲那個年代，發聲的管道便是雜誌。

有人說：「如果你要害一個人，就讓他辦一份雜誌。」可是我們實在太年輕，天不怕地不怕。當時我自己有一小筆出國的錢；張同學家境很好，也可以拿出一點錢。我們都很樂觀，非常浪漫，就決定創辦《大地生活》雜誌，深入關懷、報導文化及社會議題。

創刊時，蠻多文化界人士幫助我們的。像是《漢聲雜誌》的奚淞先生在創刊號的封面和內容給了

很多協助，還有素描畫家吳耀忠，把畫作免費送給我們當封面。也有許多令人景仰的知識份子免費供稿給我們。我們感到訝異，受到很大的鼓勵。

當時台灣社會充滿理想性。在那樣的社會氛圍中，林懷民創立了雲門舞集、黃順興辦勞工雜誌、報導文學興起……。另外《深耕》雜誌也組了「黨外編聯會」，常常華山論劍，喝酒辯論。雖然我偏重關心文化、社會議題，但也會參與他們的聚會。

大地生活有一期報導老鼠會，最令我印象深刻。老鼠會現在看來是經濟議題，在當時卻是社會議題。日本研究老鼠會的專家到台灣來，揭露背後的權利剝削，我們便大幅報導這項議題。

但好景不長，理想不能帶來發行量，於是錢一直流出去。大地生活只出了十期，一開始先苦撐半年，後來沒錢只好停刊。勉強湊到錢再復刊，斷斷續續兩年辦完十期。我那時已是窮困不堪，還負了一大筆債，有時幾乎三餐不繼。特別是因我完全不懂負債的財務處理，淪落到終日在借錢、幾乎精神崩潰的狀況。我那時是二十四歲吧！人生一片慘灰，沒有未來、沒有希望，開朗的個性消失了。還是陽光的年紀、作夢歡笑的年紀，我的人生卻一下子沉到了地平線下。

進入八十年代，見證黨外運動（1983-1987）

大地生活倒了，我也面臨失業。八十年代的總編輯司馬文武先生大概覺得我有點可憐，問我願不願意到黨外雜誌八十年代。我答應了，因爲我急需一份收入。

八十年代受到很多政治壓力。有警總、調查局……等等的監控，警總經常到印刷廠查扣雜誌。有幾次，我被派去在工廠門口跟警總撒嬌，拖延時間，好讓其他人偷偷把雜誌從後面的窗口搬出去。有趣的是，一旦雜誌被查禁，銷售量反而更好。重慶南路一帶的書販都有他們自己賣禁書的暗號。

雖有政治上的壓力，但是私下來自資深新聞記者、學者、文化工作者的支持卻非常強大。許多新

聞記者偷偷幫我們寫稿，有少數記者白天在報社，晚上卻來八十年代寫稿，不過，多數約稿的過程都相當小心翼翼。譬如在電話中要用暗語「我要向你借一本書」、「有一罐茶葉要送給你」……，交稿的地方也都很隱密。經歷過白色恐怖的《自由中國》的傅正先生，每次都以請我去他家喝個茶或吃個飯的理由，由我在他家一個字一個字地把稿子抄下來，帶回雜誌社。

一開始我在八十年代的定位是編輯，負責文字邀稿。康寧祥選立委時，我們還是會去現場聽。有一次演講人趕不及，不知是誰說：「那妳上去講好了。」我一上去就開使用國語講。那時，在黨外的場子用國語演講的，大概不會超過三個人，我便是其中之一。

我在台上講自己的故事，我父母是外省人，小的時候母親常提起大陸的親人。我說：「為什麼我們的父母不能回到他們自己的家鄉，去和失散四十年的親人相聚？」沒想到，我的演講引起很大的迴響。之後每一場，我都被推上台，成了康寧祥的助講人。

那時，完全沒有「凍蒜、凍蒜」這類口號。台下的觀眾大多是真正關心社會，希望台灣更好、更民主。只要講到跟台灣有關的議題，台下的共鳴很強，大家靜靜地聽，聽完後用最大的掌聲來回應。跟現在演講台上的激昂、嘶吼、罵人……，非常不一樣。

美麗島事件後，姚嘉文的太太周清玉參加選舉，我也去幫忙發傳單。有一次在林森北路，有數千個民眾圍在路口、騎樓下，等著聽演講，鎮暴警察把所有路口用人牆和盾牌圍起來，不讓候選人上台，也不准發傳單，氣氛很緊張。我們有四個女生衝過鎮暴警察的防線，把傳單發給民眾，民眾把我們四個女生當成英雄，發出如雷的掌聲！那現場真的很有趣。

新新聞媒體經營者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民進黨在圓山飯店正式宣布組黨，黨外雜誌風潮告一段落。如果我繼

續待下去，意味著會變成黨員，然後從政。但是我們八十年代這群人，除了康寧祥先生是政治人物，其他沒有人想從政，沒有人想搞政治。於是，接下來要做什麼呢？

當時，王健壯、胡鴻仁、周天瑞、南方朔等人加入。他們都是當時台灣新聞界極傑出的新聞記者。由於民進黨成立了，剩下最大的問題是報禁。大家的想法是，先辦雜誌，再辦報紙。新新聞便是為了打破報禁而創立。新新聞登的第一個報紙廣告標題，就是「自由報業第一聲」。

我為什麼當上新新聞的創刊總經理呢？因為大部分文人在行政、企畫上都比較不在意。他們所學的科目大概都是政治系、社會系這類，很少是經營管理。這些文人要辦雜誌的時候，管理部分就顯得脆弱。

也許是從小的訓練，我在行政上比較有效率。所以在籌辦新新聞的過程中，這些文人專心扮演所謂知識份子的角色，至於發行、財務、計算雜誌的成本、行政等就由我負責了。

在大地生活時，我完全沒有數字概念；在新新聞，我就下了點功夫從頭學，買書、讀書，瞭解錢怎麼流入流出，也學著寫經營企畫書，學著看懂資產負債表。我在新新聞的第一份企畫書還保留著，現在看起來倒也滿像樣的。

但是，新新聞籌備半年、在第三期雜誌出刊時，我便離開了。我離開的原因是，那段時間，我完全沒有成就感。雖然我負責他們四位較弱的經營管理，但他們的事業太龐大了，就像四棵大樹，讓我覺得自己快不見了。

那時我二十九、三十歲了，想瞭解自己這輩子到底要做什麼？我發現我最想要寫作，但在新新聞我沒法做到。因為行政事務很繁瑣，根本沒有時間寫。另外我覺得，當記者一方面可以訓練文筆，一方面也可回到我本來關心的文化或社會議題。所以我透過當時擔任《自立晚報》研究室主任陳國祥的引薦，到自立晚報試試看。

我還記得後來我去面試，自立晚報的社長吳豐山先生一坐下來就問：「妳在新新聞總經理做得好好的，幹嘛來當記者？」我回答：「我想尋找自我。」那是一九八七年七月。

突破禁忌首訪大陸（1987-1993）

當我進入自立晚報時，蔣經國先生健康已開始惡化，威權政治已逐步在瓦解，國民黨內出現一批「改革派」、「開明派」的中生代政治人物。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蔣經國先生在接受《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葛蘭姆女士（Mrs. Katherine Graham）的訪談中，宣布解除戒嚴。台灣進入解嚴的時期，進入了一個政治上可以大鳴大放，自由改革也加速腳步的新時代。當時，兩岸開放探親的政策將在適當時機宣布的消息也獲得證實，所有的媒體都在等著這個歷史性的時刻。

自立晚報的吳豐山社長決定提前行動，當時曾被媒體批為「偷跑」。不過，這個「偷跑」對自立晚報而言，仍要承擔很大的風險的。報社本來要派另外兩個人到大陸採訪，但他們的護照來不及辦。正好我有護照，李永得的護照也很快可以下來，於是報社臨時改派我們兩個去。所以，我到自立報系才一個多月，就因緣際會參與了這次歷史性的採訪。在決定行動前，社長吳豐山先生曾很慎重地把採訪行動及對參與採訪的記者可能遭遇的風險都作了詳細說明。同時，也多次要求我們慎重考慮。

大陸的歷史行採訪，就行動層面的確是一次「破冰之旅」。當我們從東京飛抵北京之後，國民黨中常會上曾有中常委要求關掉自立晚報，但是反對關掉報社的改革派力量和聲音（包括當時《中國時報》的余紀忠先生也都反對關閉報社）仍壓過了極少數的保守派聲音。報社沒事，而社長吳豐山和李永得和我則被以「偽造文書」的罪名起訴。有趣的是，在起訴過程，我們和一些國民黨改革派的官員吃飯，他們都對這個起訴毫不當眞。當時任司法院長的林洋港先生在一次飯局中說：「好吧！如果你們眞的被關，我就天天送啤酒進去給你們喝。」

採訪的行動是邁進一大步，但是就採訪的內容而言，並不是具有深度的報導。因為當時有關大陸的所有相關資料都被列為「匪情資料」，一般人很難有管道接觸。我們只是在四十年的隔絕後，用我們好奇的眼睛和盡量不帶偏見的心態，去報導我們所看到的一切。採訪到方勵之先生，聽到他侃侃而談中國知識份子對於改革的期待與心聲，是一個可貴的收獲。

在大陸採訪時，我們走了很多地方，強烈感受到在歷史文化面上，台灣與中國的淵源是不可否認的。但我們也看到中國政權的霸道和獨裁，因此對於兩岸在政治上的關係，則持較保留的態度。

去了大陸之後，國際媒體對於這次的歷史性採訪也報導很多，李永得和我突然成了被採訪的對象。李永得從事新聞工作多年，有一定的資歷和專業，而我還只是「菜鳥」，所以很心虛，虛名變成很大的負擔。兩年之後，一九八九年六月「天安門事件」發生，我在事件發生後第三天就去了北京採訪。後來，我的同事黃德北來支援，但他因聯繫民運領袖王丹而被逮捕，遭到大陸公安單位的拘留。我留在北京聯繫國際媒體，與公安單位交涉要人。在黃德北遭拘禁了十一天後，我們兩人都被驅離出境。黃德北與王丹碰面這件事，在新聞圈內引起了一些爭議，而我也在背負了兩年的「虛名」和內在的心虛之後，覺得自己在新聞專業上太淺薄了。我還記得當時南方朔看到我寫的一些報導，就曾和我說：「不怎麼樣嘛！」

國際採訪大開眼界

我的新聞專業明顯不足，而我在寫作上也陷入極大的瓶頸。我希望有所突破，後來得到報社支持，哥大也以訪問學人的名義邀請我。於是我就以留職半薪的方式去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九個月，完成我出國遊學的心願。

在哥大的九個月，我在思想、寫作上有很大的轉變。雖然不是第一次出國，卻第一次在國外待這

1991年採訪柬埔寨總理韓森（右）。（徐璐提供）

麼久。我一直都是所謂的「土」派，從沒有出國留學，這次我眞的開了眼界。不但在哥大的新聞學院和國際政治的課程上旁聽了半學期的課，也開始受到美國新聞媒體的薰陶；他們對專業的堅持，令我心生「有爲者亦若是」的嚮往。

哥大遊學回來後，我開始在自晚作國際巡迴採訪，總算作出比較讓自己滿意的報導。我去了許多蘇聯解體後的共產主義國家，像蘇聯、東歐的捷克、匈牙利、波蘭、波羅的海的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還有東南亞的菲律賓、高棉（柬埔寨）、新加坡、南韓……等國家，也訪問到一些國家的領導人。蘇聯解體後，一些東歐國家以不流血的革命方式，推翻舊政權，建立新政府。立陶宛的音樂家藍茲柏吉斯（Vytautas Landsbergis）、捷克的詩人哈維爾（Vaclav Havel）等知識份子都當上了總統，但是政績都不好，後來又輸給原來的政黨。這些國家的政治轉型，似乎都有類似的命運。

我能在自立晚報工作是一件很幸運的事。當時，台灣還在戒嚴時期，言論自由還不算是百分之百。但由於吳三連先生的社會聲望和地位，加上吳豐山社長的折衝協調，自立晚報雖然一直扮演了較具「批判性」的角色，但是都還能生存下來。很多讀者的習慣是買一份中時或聯合報加上一份自晚，「這兜起來就可以得到比較完整的資訊了。」不過，雖然說具「批判性」，但那時報社從社長到總編輯，對於新聞寫作的專業還是有一些基本要求的。譬如說，新聞採訪和帶有個人主觀的特稿要分開寫，一些專業上的評論要盡量訪問學者和專家的話。「記者不是專家。」這是我當時常聽到的話。另外，要擔任黨政記者一定要先經過各部會及國會記者至少兩、三年的磨練等。

台北之音開創多元價值（1993-1999）

我很幸運，年輕時沒有經歷最危險的白色恐怖時期，卻有機會目睹蓬勃的文化運動、黨外運動，和參與解嚴前後蓬勃發展的新聞行業。

我的性格中有喜歡小小冒險一下、嘗試新事物的因子，至少五十幾歲以前是如此。在自立晚報待了七年之後，我又想去衝撞一下電子媒體的禁忌。胡志強先生任新聞局長時，釋出第一波廣播執照，我和幾個媒體界的朋友（王健壯、王偉忠、陳浩、張繼高、陳怡真等人）合作，以「台北之音」爲名申請執照。當時的競爭非常激烈，我們是以第一名的成績，得到了由中廣釋出的FM107.7的頻道。

台北之音一開始就得到企業界與文化界的支持。它的股份組合，是目前我認爲文化媒體產業中最理想的一個資本結構。六大企業擁有六成股份，各占一成。文化界與新聞界、電視界認購另外的四成。這個結構非常均衡，也兼顧現實。企業主提供穩定的資金，但只各占一成，無法主導這個媒體。事後也證明，這些企業主完全授權，讓媒體人有很大的發揮空間。我們成功地結合企業界、知識界、新聞界、文化界的資源。

台北之音開播不到三個月，就由一群「完全不懂廣播的人」在廣播界站穩了腳步，引領風潮。王偉忠是這樣引領風潮中最關鍵的人。

台北之音也挖掘、吸引了很多人才。那年代若非字正腔圓或北京腔，便無法當廣播員。我們打破了這個迷思，邀請了像葉樹姍、蔡康永、李文媛、蠟筆小嵐、黎明柔、陶曉清、張月麗、高怡平，甚至一些ABC等各具風格的主持人開節目。葉樹姍早上的「台北塞車族」，在廣播開台的第一天早上，就創下了台北之音的高收聽率。她平實地報導新聞，邀請新聞人物接受訪問，態度中立，不卑不亢，問題深入。王偉忠除了主導台北之音的創意，他自己主持的「台北什麼都有」也成爲同時段收聽率最高的節目。黎明柔的「非常DJ」很紅，也引起不少爭議。當時，台灣不只在政治上有禁忌，生活教育的觀念也很狹隘，她談到一夜情、保險套等問題，很多衛道人士就覺得不行。當新聞局有意見，我們就去說明。

台北之音創辦第三個月時，當月就損益兩平，那也是時任董事長張繼高先生癌症復發，健康惡

徐璐在台大演講「大陸來去」。（翻攝自《人間雜誌》／謝三泰攝）

化，病臥在醫院之時。我去看他，告訴他這個消息，他很高興，還在病床上吃力地寫下了幾個策略給我——如聯播、併購……等。台北之音第一年就賺回五千萬的資本額，營業額是八千多萬；第二年營業額就到近兩億，稅後盈餘近八千萬。當時接任張繼高擔任董事長的殷琪和董事蔡明忠還曾開完笑說，這生意眞好賺！出乎他們意料之外。不過他們都沒將紅利放到自己口袋，全部都用在台北之音。

創立台北之音時，我很有使命感，十分投入工作。在還沒有拿到執照、只是在籌備時，大約有八、九個月，甚至更久的時間，我都沒有領薪水。我的好友侯文詠看到我賣命工作的情況，開玩笑說，其實我應該要付薪水給台北之音。他的意思是，我需要理想或是工作來麻痺自己，而台北之音給我這樣的環境。他的觀察很深入，我的確是埋入工作，再度成爲一個工作狂。

一九九九年五月，我離開台北之音，去倫敦遊學了半年。這是一個突然的決定。人生，又一次不是經由規畫，而是經由意外引領了我的腳步。

人生走向轉折（2004-2007）

當我離開華視時，我的人生價值觀正在醞釀著一種改變。起初點引這個改變的元素之一是，我看著我的摯友羅曼菲在近五十歲的美麗壯年，因癌症正逐漸走向衰弱，死亡的陰影無日不在（編按：羅曼菲逝世於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在「生命的無常與脆弱」的唏噓之後，是對自己渺小的更深層體會。那時，有些雜誌報導一些都市人歸隱山林、過著很簡居的生活，居然令我開始嚮往。我也曾到宜蘭去買地，去了七、八次，看中過幾塊農地，但是每次要付訂金時，都被地主臨時叫停，連續發生了三次。我心想：「沒有緣份，不要強求了。」但是，「小而美」的情境常在我心中浮起。另外，在華視的不快樂，也經由內在的聲音提醒我，「媒體的經營管理者」或是太過商業化的職場其實並不適合我。在台北之音，雖然我也是「經營管理者」，而且做得非常愉快，那是因爲董事會不但完全授

權，而且沒有給我們商業、財務數字的壓力，並讓我們一些文化的想法有空間生存。所以，我記得我離開華視之後不到四天，有一位梅鐸集團的女性經理人打電話給我，邀我去擔任梅鐸集團上海辦公室的主管。我未經考慮就推掉了，對方嚇了一跳說：「妳連見面都不和我們見面，談談看嗎？」後來有兩個和媒體相關的工作找上我，我也都婉拒了。

雖然我已確定商業化的職場並不適合我，也時常在心中浮起「小而美」的憧憬，但是「小而美」，多小的美呢？在確定不要做什麼之後，對於自己究竟想做什麼？當我將自己從事了近三十多年的媒體工作畫上句點後，我的「專業能力」似乎也會隨之而逝。那我還有什麼「專業」呢？我的人生進入一個轉折。我很迷惘，找不到答案。我讓自己休息沉澱了一年半的時間。其中，有半年多的時間都在旅行。我的旅行是漫無目的的，從葡萄牙、義大利、土耳其、西班牙……，就是一路地走，走了近三十個城市和小鎮。「旅行，隱隱約約代表著探索人生，掙脫工作的束縛，努力活下去。」這是艾倫．狄波頓（Alain de Bottom）對旅行的一個註解。在我職場生涯中，每次的停頓、遊學、旅行，的確都帶著一種探索自己的心境。旅行，給人一種遨翔的自由，好像有了這樣的自由，你才能從空中俯看到迷惘的自己，看到心中的問號。

從我離開華視後，中華電信的董事長賀陳旦就和我談了多次MOD（Multimedia on Demand，多媒體隨選視訊），他想邀請我去協助MOD，一開始我沒有完全拒絕。但心中的「Yes」模模糊糊，很不篤定。有一天中午，我們又約了談MOD，但話題卻大多在一些文化的議題上打轉。我突然眼睛一亮，向賀陳旦董事長說：「中華電信已經民營化，我不要做MOD。既然你心中有人文的理想想要實踐，我幫你辦基金會，做文化的東西，好不好？」賀陳旦楞了一下，我們又談了近半個鐘頭之後，他點頭，當場作了「成立基金會」的決定。

那天，我心裡的yes也出來了。賀陳董事長希望有個基金會能協助文化產業、社區生活及數位落

差等。接下中華電信基金會執行長後，我心裡很清楚，中華電信基金會還不會是我真正安身立命的地方，但基金會可以提供我一個轉軌過程中需要沉澱、觀察與學習的地方。而且，基金會所從事的文化產業和社區生活又是我很感興趣、工作起來覺得很有熱情的事。

生命回到原點（二〇〇六年一月迄今）

決定要去中華電信基金會的時候，我跟一些老朋友說，嘿，我又回到原點了！

大學時代，報導文學興起。我受了影響，常在台灣各鄉鎮揹著一只照相機、帶一枝筆、一本簿子到處跑。例如在鹽田住兩週，在東港待十天，在鹿港待幾天……。有一次在屏東的大榕樹下碰到作家孟東籬跟他太太，三個人就在路邊吃起農夫自己摘的樹瓜。大地生活雜誌有很大的一部分，關心的也是文化議題。

三十年前的社區和現在的社區當然已相當地不一樣，經濟發展帶來了一些好壞皆俱的痕跡。但是過去十幾年的社區總體營造在部分社區生了根，甚至開花結果。十幾年來，很多年輕人、詩人、文人、藝術家移居到鄉下，在他們的影響及當地居民的努力之下，部分社區開始累積了自主的社區意識和豐厚的能量。

從一九七七到二〇〇七年，三十年來，我見證參與了文化、政治改革運動，並投身媒體，我的生命因這些經歷而豐富、多采多姿。我認識了形形色色、各種領域的人。當然，除了三十年大環境的工作經歷之外，我個人的生命歷程也經歷了幾次波濤，破產、負債，以及一九九二年發生在我身上的性侵害事件，還有陪伴我摯愛的哥哥和親如家人的曼菲在癌症病房，看著他們走向死亡。這些經歷，都曾在我成長的過程烙下痕跡。被性侵害的陰影，糾纏了我六年，直到我在一九九九年出版《暗夜倖存者》一書，才脫離了它的糾纏。而我也在那六年不斷自責、痛苦煎熬的過程，透過大量的閱讀，開始

更從女性的角度重新瞭解自己、傾聽自己內在的聲音。

有了這些經歷，我喜歡現在的、熟齡的、五十歲的自己。我開始能接受所有一切不完整、不完美的事物，包括生命、社會與所有的一切。當然，也更包括非常不完美的自己。不完美和渺小的感覺接近，而渺小，則是當你飛翔在空中、在旅行漂泊時最眞實的感覺。

人生是不可能重來的，也不可能事先安排。不過假設所有一切都重來一次，我相信我還是會作一樣的選擇。

你問我會不會後悔？絕不會。這些是我人生中最精彩的篇章。

◎初稿：張瑋欣

◎修訂：林麗雲

◎定稿：何榮幸、徐璐

◎訪問時間：二〇〇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五月十一日

◎地點：台大新聞所「新聞論壇」會議室

黃年

黃年

〔第十六章〕

五十八天創辦新報紙

一九八八年聯合晚報總編輯

前頁圖說：
《聯合報》採訪組下班後在「小蜜房」唱歌，時約在民國七十四年。
左起林念平、黃年、高惠宇、李漢昌、吳添福、江聰明、趙元良。（黃年提供）

他從一九七五年進入《聯合報》至今，歷任聯合報系所有重要職務，並於一九八八年二月一手創立《聯合晚報》，被認爲是聯合報系最具代表性人物之一。他跟其他資深記者的最大差別是：大多數時間他都隱身幕後，很少在外拋頭露面，但這一點也不影響他在聯合報系的地位與份量。

聯合晚報是台灣仍存在的唯一一家晚報，他目前更擔任發行人，是台灣晚報發展史的重要見證者。此外，過去十五年，聯合報超過四千篇社論、「黑白集」出自他的筆下，代表作首推一九九七年的五十八篇「修憲，不可毀憲」系列社論（其中四十二篇是他的作品）；朋友因而替他寫好了墓誌銘：「這是黑金政治的命名者與批判者。」

在他的主導下，聯合報系與當權者關係緊張，引起社會兩極評價。他的基本態度則是「毀譽由人，寸心自知，不必解釋，時間會提供答案」。也因爲如此，這只是他生平第二次接受人物專訪，上一次已經是二十九年前的事了。

他認爲，此項計畫是在辨識台灣記者的「面孔」，爲新聞界編纂「家譜」，因此他硬著頭皮加入。或許因爲長期站在幕後、甘於寂寞，他堅持不作任何錄影，也不太願意多談個人，大部分時間都在陳述新聞理念及對時局的看法。

或許，他把此次訪問也當成一篇人生社論在寫作……

黃年大事記

1946 黃　年出生

1971 退出聯合國

- 1975聯合報採訪組記者
- 1978綜合月刊總編輯、中國時報海外版總編輯、中國時報專欄組主任

1979 美麗島事件

- 1979聯合報專欄組副主任
- 1980聯合報專欄組主任
- 1982聯合報採訪組主任

1987 解除戒嚴

- 1988聯合晚報總編輯、聯合報總編輯
- 1990聯合報副社長兼專案新聞中心主任
- 1991民生報社長
- 1992退報運動，主持撰寫「聯合報敬致讀者書」
- 1993聯合晚報社長兼聯合報總主筆
- 1997獲曾虛白公共服務獎新聞評論獎
- 1998獲金鼎獎新聞評論獎、第12屆吳舜文新聞獎新聞評論獎、曾虛白公共服務獎新聞評論獎

2000 政黨輪替

- 2007聯合晚報發行人兼聯合報總主筆

黑金政治的命名者與批判者

澎湖金龍頭海邊

我比大學同班同學大六歲。高中未畢業，十七歲進入陸軍官校專修班；施明德見到我，常說他是我的「學長」。民國六十年退伍考上政大新聞系，那年我二十四歲。

部隊一度駐守澎湖，我參加了設在馬公中學的國軍隨營補習班，記得第一堂課英文課上的是「蓋茲堡宣言」。放假日，我常一個人到金龍頭海邊看書、吹海風，買兩個包子，打發一個上午或下午。我常把書撕成一頁一頁放在口袋，沒事就拿出來看；軍中歲月確實看了很多書，後來也很有用。

以高中同等學力考進第一志願政大新聞系，我比同班同學大，被選為班代表。民國六十年十月二十五日，退出聯合國，次日正值期中考，進四維堂考場前，有幾位僑生說，要不要「表示表示」；我走到考場座位向全場說：「外交部長周書楷先生已經帶領我國代表團退出聯合國，為了支持我們的國家，讓我們一起起立唱國歌，表達我們的義憤。」我起音，整個考場就跟著唱起來。

除了主修新聞，我輔修政治課程。當年新聞系強調的是新聞責任與新聞倫理，而政治系則是以民主憲政為主流。我比較喜歡政治學門的課程。朱堅章老師的西洋政治思想史，溫馨精緻；荊知仁老師

教中華民國憲法，尖銳犀利；易君博老師的政治學方法論，引導學生進入新穎多元的政治學思潮。這些老師的基本信仰，皆是民主憲政，在戒嚴時代極具啓蒙色彩。

當時，政治學的結構功能學派、行爲學派正在風行，而我也慢慢覺得，人的行爲才是觀察主體，所以後來我也不只看法制及論述，而喜歡注意行爲層面的實際操作。

我曾是兩屆政大新聞系辯論隊的教練，也贏得了兩屆全校新生盃辯論賽冠軍。偶爾，我也參與校刊《政大青年》的活動。有一年校外餐廳一碗白飯從一元漲至一元五角，主編約我寫了一篇抗議文字，那是我此生寫的第一篇「社論」。

文章被拒離開中時

民國六十四年畢業，學校分發我到《聯合報》當實習記者。實習結束後即被報社留用。幾個月後，我考上政大政研所碩士班。由於考了第一名，覺得自己好像還能念點書，就辭去聯合報的工作。

民國六十七年初，我在研究所的學科修畢，將論文暫擱，到《綜合月刊》任總編輯，開始處理一些大型的時政題材；曾採訪高俊明牧師談「新而獨立的國家」，採訪許信良談「中壢事件」始末，皆是當時在報紙上不能出現的禁忌題材。

綜合月刊在報導文學方面頗有口碑，但畢竟不是當時媒體的主戰場。數月後，我離開綜合月刊，同事金惟純到了《中國時報》，也把我找去。我在中國時報的第一個職務是《時報周刊》海外版總編輯，還記得曾爲林清玄的文章下過一個標題：「左手葫蘆右手劍——與古龍扶醉論武！」

兩個月後，我調爲中國時報專欄組主任。六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台美斷交，中央民代增補選戛然停辦；選季，社會充滿山雨欲來的氛圍。某日，周天瑞、司馬文武、南方朔、王健壯、金惟純、卜大中、毛鑄倫、李利國等大概十來人，商議發表一篇共同宣言，不知怎地推由我執筆。文章題名：〈一

個災禍的中國，必無苟免的台灣〉，筆名爲「童舟」。原本欲將此文交中國時報發表，但余紀忠先生不同意刊登。後來，我把稿子投到聯合報，也因此離開了中國時報。前後只在中國時報待了幾個月。

我在中國時報是專欄組主任，回到聯合報是專欄組副主任，薪水少了一萬多元。從此，我就一直留在聯合報系。

骨牌效應與破窗效應

我們這一輩的記者，從戒嚴走到解嚴。若將我的記者生涯據此分作兩段，在戒嚴期間，扣掉兩段就學時間，我大約在崗位上幹了八年新聞工作，任至聯合報採訪主任告一段落，出國進修；解嚴後，自英國返來，至今已二十年，主要職務是總編輯及總主筆。

我在聯合報系的大概履歷是：記者、專欄組主任、採訪組主任、聯合晚報總編輯、聯合報總編輯、民生報社長、兼民生報總主筆、聯合晚報社長、兼聯合報總主筆，現任聯合晚報發行人兼聯合報總主筆。

民國六十年我進大學那年，退出聯合國；顯示台灣國際處境急遽惡化，隨後出現「骨牌效應」；民國六十六年，我讀研究所二年級，發生中壢事件，反映台灣內部政潮濫觴，隨後出現「破窗效應」。

當時的台灣，就像是一直向前走的大隊人馬，突然發現走到了大河的邊緣。第一個問題是：不能不向前走，一定要過河。但是，第二個問題是：過了河，該在何處上岸？

回頭看戒嚴末期，有點像是「小五四」。當時國事辯論非常激烈，社會動員和參與的層次也相當普遍化，知識份子、中產階級，甚至農村都受感染。

現在談戒嚴末期的政治反對運動，好像只有所謂的「黨外」一系。這不是實情，當年的反對運動

其實是相當多源又多元的。例如，《夏潮》即是重要的一支。夏潮可視爲「白色恐怖」受害者的最後反撲，是左傾的社會主義，強烈反對帝國主義，且傾向主張中國民族主義。夏潮一度曾是反對運動的精神論述主脈，至稍後鄉土文學成爲政治議題，其代表人物陳映眞仍是台灣反對運動的標竿。但是，後來台獨成爲反對運動的脊柱，就不再反帝、也不再反資了；夏潮遂成式微的統派。

大學校園當年亦是暗潮洶湧。如李雙澤的民歌運動也有反權威意味，但在國家認同方面卻是「中台並陳」。李雙澤作有〈美麗島〉，卻也有〈少年中國〉。自保釣運動後，打著藍旗反藍旗即是校園運動的主脈之一。

許信良、蘇南成、張俊宏等，則標榜爲國民黨的「改革派」。他們之所以能夠發動風潮，選民之所以對他們有回應，其實也是因爲他們以國民黨內的改造者自詡，而非整個體制的顚覆者。此外，自由主義學者陶百川、胡佛、楊國樞、沈君山、李鴻禧、張忠棟、黃光國等，更是民主喉舌；其中有「台灣人」，也有更多的「外省人」，主要的言論平台是聯合報的《中國論壇》雜誌，以「回歸憲政」爲政治改革的訴求主軸。

還有基督教長老教會，在民間已經孕蓄很久，伺機而動。相對而言，黃信介、林義雄、游錫堃等，當時反而未必站在社會焦點的第一線；直至一九七八、七九年，才往政團方向發展。

過河後當在何處上岸

總之，當時的政治反對運動是多源又多元的。例如胡佛與李鴻禧，當年均主張回歸憲政。李鴻禧後來走向台獨，與胡佛如今仍然持守憲政主義，究竟誰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又如，王拓如今成爲民進黨台獨同路人，陳映眞則維持「中國」及「左傾」的立場，究竟誰又是鄉土文學的嫡系？事隔二十餘年後的今日，原本多元多源的台灣民主運動卻遭狹化及單一化；台獨等於民主，民主等於台獨；不是

台獨就不是台灣人，不是台獨就是中共同路人。這絕非戒嚴末期民主運動多源又多元的原貌，也絕非當年姿彩繽紛的政治光譜。當時的新生代記者也在政治光譜中尋找自己的角色，其中大多數雖未投身與政治當局針鋒相對的反對團體，但無疑皆在心智上參與了這場「過河」運動。

總之，「一定要過河」是當時流派紛紜中的主流見解，但過河後應在何處上岸，卻似各有憧憬。

這也是我說戒嚴末期像「小五四」的原因；一定要過河了，先過了河再說！

歷史觀與新聞視覺

在混沌擺盪的當時，我與多數的新聞工作者一樣，不免自問：我該如何解讀這場正在發生的歷史巨變？

如果有「歷史觀」這一回事，影響我的歷史觀最重大的心智事件，應是我在十七、八歲時讀五四運動。五四運動噴發的社會理想與熱情都是高純度的；但是，最後總結五四的是當年的社會主義，且在政治現實上由共產黨收割了五四的成果。五四的花是美的，但五四的果是苦的。德先生變成了無產階級專政及文化大革命，賽先生變成了土高爐及大躍進。倘若這也算是歷史觀，它對我後來的新聞視覺及政治觀察影響甚大。

這類事件史不絕書。英國一五四八年的革命，把查理一世送上了斷頭台，換來克倫威爾共和的恐怖統治；法國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銜接的是雅各賓俱樂部，拿砍頭來解決爭議；德國的威瑪共和，讓希特勒以民主機制贏得政權，一上台就背叛了民主價值；一九一一年中國的辛亥革命，被袁世凱背叛；一九四九年的共產革命，被毛澤東背叛。歷史不斷重演：革命接下來竟是反動，民主接下來卻是背叛。

民國六十七年，宋國誠與黃宗文合著《新生代的吶喊》一書，訪問了當時的十六名「新生代」，

包括呂秀蓮、陳菊、蘇慶黎、陳婉眞、朱雲漢、金惟純等。寫我的篇名是：〈積極的第三者——黃年〉。訪問中我就提及關於五四運動的這種歷史警覺與弔詭；至於「積極的第三者」，則是表達我希望能找到一個超越國民黨及「黨外」之上及之外的角色。有趣的是，該書的兩位作者，當時在序文中將受訪的十六人分作七類，而將我與呂秀蓮及陳婉眞歸爲「(國民黨)獨立黨員路線」的同一類型。這是二十九年前的事了。

《新生代的吶喊》是我第一次接受人物專訪，此次《黑夜中尋找星星》則是二十九年來的第二次。我的想法是：毀譽由人，寸心自知，不必解釋，時間會提供解答。

童舟指出台灣革命的宿命

在戒嚴末期的「小五四」中，幾乎從一開始，我就將「過河」與「上岸」區別看待。

我主張「過河」，因此主張以壓力催迫國民黨改革。我不認爲國民黨有迴避此一議題的可能性，後來蔣經國宣示蔣家人不得再任總統，又將王昇及蔣孝武外放，亦皆顯示了大勢已定。所以，我一直認爲，「過河」不是問題。

我對黨外力量的提升有殷切的期許，但也一直提醒要走正確的道路，主要是勸告勿走向族群鬥爭及台獨鬥爭。過了河，不可上錯岸。

其實，面對台灣的民主大潮，我一開始就不像有些人抱持太過浪漫的想法。在當時我就覺得已經看到了這場「台灣革命」未來必然走向的宿命；雖然那種感覺不是那麼眞確，但我當時就覺得似乎走下去就會像今天這個樣子。我也不斷地將這種預感在我寫的評論中表達，但在二十餘年後，呈現在如今眼前的實際情況，其實比我當時想像的更加嚴重。

這種憂思，可以見諸「童舟」的「一個災禍的中國，必無苟免的台灣——給「黨外人士」的諍

言」；六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聯合報發表。字裡行間我表達了幾個主要的觀點：一、對政治反對運動的不公平處境深寄同情；二、對反對運動抱持肯定的立場，也給予明顯的支持和期許；三、但提醒不要走上歧路，不要走偏了；四、當時我就指出，族群動員及台獨訴求是台灣民主政治一個最大的危機；五、台灣問題必須在中國問題裡面找尋解決的方法。

數日後，聯合報總編輯張作錦先生，以筆名「龔濟」在同版位發表了一篇「對中國國民黨的諍言」，當時併稱「童舟龔濟」，頗掀起了一陣議論風潮。後來，張作老一直使用「龔濟」的筆名迄今，我則未再用過「童舟」。

「童舟」表達了對政治人物的保留。佛法僧是謂三寶，在政治領域，可謂也有佛法僧三個層面。「佛」是政治所追求的眞善美之境，亦即「法後之法」；「法」是典章體制或論述及策略；「僧」則是政治人物。在民主政治的價值體系中，我是「崇佛」的，也是「護法」的，卻對政治人物的「僧」持疑。法若違佛，則批法；僧若逆佛悖法，則批僧。對於當年的民主盛會，我對佛有憧憬，但對現世的策略論述有疑慮，更對許多僧伽不寄逾度的期望。因爲那些僧所禮供的佛不對，法也不對，將來必變質爲惡僧僞僧，幾是必然，也是宿命。

正如在前面說的，觀察政治運動，人格行爲層次比論述與體制層次重要。

將工作視爲活化人心的使命

回頭對戒嚴時期的記者經歷略作交代。進入聯合報，我做過醫藥記者、社會記者，有一陣子幾乎是各線代班的機動記者，但我實際做線上採訪記者的時間不長，待在專欄組的時間比較久。

戒嚴時期，專欄較新聞的空間大許多。當年報紙的篇幅雖只有三大張，但常常刊登全版的座談會紀錄或數千字的專欄；因爲，新聞受文網限制難以施展，專欄則可「借題發揮」。不論請專家學者議

論時政或舉行座談會，報社皆可爭取較大的言論尺度。張作錦先生任聯合報總編輯期間，尤爲專欄全盛時代；在距報社不遠光復南路巷內的大陸餐廳，幾乎日日皆有座談或專訪進行，聯合報報史稱之爲「大陸餐廳時代」。專欄組的主要工作就是爲訪談或座談作紀錄。

我也常發表評論，通常不用本名。當年我有十幾個筆名，比較常用的如「何思偉」、「軒轅歲」。軒轅歲就是黃年的意思。

在戒嚴末期，報紙的專欄發揮了啓蒙及溝通的功能。我們當時工作的心情，就是希望爲正在發生的社會巨變，在民眾心智上預作準備；有些欄目的名稱，即能反映這樣的用心。例如，「話題與觀念」，一看即知是頭腦體操；另如「見仁見智」，把一個題目分成正反意見來對照，協助讀者作相對思考。總之，要讓讀者知道，時代在變，觀念和思考也應逐漸調整。我將工作視爲活化人心的使命，所以做起來還蠻有滋味。

專欄組也推動一些社會運動。例如，中壢事件後，選務改革的呼聲高漲，於是我們在選季舉辦「選舉金言佳句競賽」，向社會廣徵佳句金言，而以反賄選爲主要目標，用意在壓迫國民黨改革；來件如雪片飛來，幾十萬張明信片堆得像座小山。我們隨到隨選，將佳作配上漫畫刊在報上。不但意在改善選風，當然更期望爲民主深植根基。

接聯合報採訪主任被稱鬥魚

後來，我轉任聯合報採訪主任。在專欄組，大多處理高層次的政經題材；雖然談的題目較大，但其實際社會效應卻比較緩慢。當上採訪主任後，我的想法是：「以邊緣帶動中心，以社會帶動政治。」

在戒嚴威權體制中，社會各個層面的議題最後都會觸及政治核心；重要的社會議題幾乎都會對政

治的核心發生影響。所以，邊緣能帶動中心，社會能帶動政治。

採訪主任任內，日子過得相當紮實。白天拚命工作，半夜下班與戰友赴「閣再來」喝酒，或到「小蜜房」唱歌。當時沒有行動電話，記者在線上發生重要新聞時，需用呼叫器聯絡；有些熱門新聞線上的記者，一天可能要接我四、五次叩機，也就是他們要找四、五次公共電話回覆。我給自己一個目標，一年打三百六十五天新聞仗，聯合報至少要打贏三百四十天。那段日子，《天下雜誌》說我是「口袋裡的錐子」，黨外雜誌說我是「新聞界的鬥魚」。

當時最大的工作挑戰，是聯合報第三版的「議題革命」。

戒嚴時代的政治新聞受到約制，當局者給報紙經營上的生路就是社會新聞，所以每天社會新聞都炒得很凶，第三版幾乎都是犯罪新聞，幾十年來皆是如此。忽然有一天，聯合報董事長王惕吾說：「我們不要搞這個，我們換個東西。」他主張將三版題材轉往環保、教育、科技、人權、新觀念或是消費者權利等方向。當時無人知道這些議題該如何下手，且多數人都不看好轉型後的前景；但王惕吾堅持轉型，不願見第三版的黃金版面繼續刊登那些社會新聞。

聯合報第三版「議題革命」

後來發現，三版的議題革命可以爲社會提供多元表達、多元思考，確實可以發生很多「邊緣帶動中心，社會帶動政治」的力量。例如，民國七十三年，我們報導「電視機應當降價」的議題，到今日這仍是台灣最成功的一次消費者運動。當時，電視價格比國外貴，又不允許進口；政策拿內銷補貼外銷，讓廠商在國內高價銷售，但賤賣到國外。政府的保護政策造成聯合壟斷，因此導致不合理的價格。

我們開始砲轟，持續了一個多月，消費者由漸存觀望，到拒購電視機；廠商發現電視機賣不出

去，於是就以撤刊廣告來要脅報社。在報社的政策會議上，王惕吾問我的意見，我說：「董事長，再給我一個星期的時間，相信事情會有變化。」我們又轟了三天，廠商決定全面大幅度降價。

這類題材雖是探討物價問題，卻也是對統治體制的挑戰、爲人權呼籲、替人民發言，也就能發生「邊緣帶動中心，社會帶動政治」的作用。

當時，媒體數量很少，節奏也比較慢，新聞議題有很長的高原期，我們在三版可以炒一個多月的「電視機降價」，不降價砲火就不停。相對而言，現在的新聞議題每天都在變，一晃即逝，很難集中社會視聽來針對一個議題，不解決問題不罷休；就此而言，如今媒體的影響力有時反而不如戒嚴時期。

此外，那時候的政府相對比較有反應，一則小小的報導也會發生很大的漣漪效應。比如說，報導一個區公所未善待洽公的民眾，一大早消息見報，從市政府到內政部、行政院都可能震動起來。當時的新聞記者不太能夠觸碰政治核心的議題，但是在其他社會議題上仍有發揮空間，而且常有立竿見影的回饋。

當然，在戒嚴時期，政治核心議題的新聞作業沒有自由。有些禁制是有形的，報社高層常接到有關當局對新聞處理提示的意見；有些禁制則是無形的，心裡知道已面對禁區，所以設法打出「擦邊球」。那些常常在媒體上出現的「擦邊球」，像從石縫擠出的小花，在戒嚴氛圍中，往往別有一番風姿。

民國七十三年，中英簽定「香港回歸」協定，新聞局指示冷調處理。在編採會議中，我站在主張完整呈現的一邊，第二天聯合報以一至四版全方位處理這個消息，並刊出中英協議全文。在新聞局的壓力下，總編輯趙玉明先生辭職。其實，愈是曾經走過戒嚴時代的新聞工作者，愈知沒有新聞自由的痛苦與恥辱，點點滴滴皆是刻骨銘心。

別說只有在戒嚴時期才有這類事情。在陳水扁總統任內，直屬總統府的國安局，也曾下令沒收揭

黃年（中）卸任採訪主任，半夜下班，同事聚會，孟玄（右）砸蛋糕，左為高惠宇。
是夜主題曲是〈金大班的最後一夜〉。（黃年提供）

露政府弊案的雜誌及搜索報館；並時有因線上記者批判性較強，當局施壓報社撤換記者之事。不過，解嚴後政治當局對新聞自由的迫害，畢竟有另一種手段，也有另一種效果。

五十八天打造聯合晚報

卸下採訪主任後，報社送我到英國牛津大學進修。兩年後，民國七十七年解嚴，報社將我召回；返抵台北，始示知我籌辦《聯合晚報》，出任總編輯。聯合晚報自發想至創刊僅五十八天，是解嚴後第一份新辦的報紙，也是台灣第一份橫排的報紙；當時賣得相當好，午後常有人在超商排隊買報，可說是一砲打響。楊仁烽是聯合晚報開報總經理。

當時我向王惕吾先生說：報紙橫排，只是在形式上「橫過來」；進一步我們須在心理和思維上，也把這報紙「橫過來」。這意思是說，過去政治當局和新聞媒體是「垂直的關係」。政治是主，媒體是從；政治是上，媒體是下。如今解嚴，報紙與政治的關係應當「橫過來」，變成「平行的關係」，也就是將「主從關係」變為「制衡關係」。既然從戒嚴到了解嚴，遊戲規則變了，就當照新的遊戲規則來扮演報紙的角色。

李登輝要將台灣帶往何處？

解嚴後的台灣，已經「過河」；解嚴了，現在是何處「上岸」的問題。李登輝要帶領整個國家在何處上岸？甫滿周歲的民進黨該在何處上岸？當然，新聞記者也有何處上岸的問題；我以這樣心情面對解嚴後的新聞工作，面對聯合晚報。

我們這一輩的新聞記者，走過戒嚴時代，深感沒有新聞自由的屈辱，亦深知沒有新聞自由即不會有真正的民主政治。解嚴時代到臨，我的心念是：有了「新聞自由」，就應當有「自由的新聞」。

但是，很快就發現，我們其實沒有對李登輝表達不同觀點的自由。

我起初對李登輝頗抱期望，聯合報系亦持此態度。王惕吾在李登輝是否兼任黨主席的爭議中，是支持李登輝的。當時的想像是：台灣若要走向民主憲政，李登輝自是左右逢源，應可點石成金。

有一天，李登輝的女婿賴國洲約我見面，詢問我對當時「主流／非主流」之爭的看法。我告訴他：一、「非主流」只是在露天燒起的一口火鍋，整個社會的「大氣候」不會受火鍋的「小氣候」影響，因此不足爲慮；二、「民主化」一定會走向「本土化」，但「本土化」卻未必能走向「民主化」，應以爲戒。後來，李登輝戰勝了所謂「非主流」，卻敗在自己的黑金毀憲之下。

我們心中是「水平關係」，李登輝心中卻是「垂直關係」。摩擦日日累積，關係漸漸變化。

白菜理論與鑽石理論

新的聯合晚報，有些新的作法。例如，現在台灣報紙一律採行的「新聞署名制度」就是從聯合晚報開始的。以前，新聞的訊頭是「台北訊」、「台中訊」，記者在新聞報導中不署名。聯晚採行新聞署名制度後，新聞界普遍跟進，現在已通用「本報記者○○○報導」的訊頭。

採行新聞署名制度的原因之一是，新聞界長期的陳規，記者寫特稿才掛名，且寫特稿始有稿費；於是，記者寫作時常留一手，一般素材寫在「新聞」中，另將特別的角度寫一篇特稿，有「名」又有「利」；這卻使編輯台的作業加重負荷，要併、要刪，都很花時間。一律掛名後，整個流程就變得暢快很多。另一較深層的原因是，解嚴以後媒體增加，記者不易在讀者心中留下印象；如今在報導前面署名，比較容易讓記者的名字建立品牌；這也是增加記者的責任感與榮譽心的方法，有助提升報導品質。報導署名的利弊迄今見仁見智，但能在報界維持二十年於茲，當有其道理。開個玩笑，記者們見到自己的名字在條條報導皆見報，可以想到黃年。

此外，聯合晚報對白話標題的倡導也頗用心力。戒嚴時期，文言標題很多，我自任採訪主任起到當總編輯，常跟編輯一起作白話標題；聯合晚報更將白話標題視爲編務改革的首務之一，遂能帶動風氣。

那時候我們的「議題設定」也頗有表現，例如第二版、第三版的「話題新聞」，其實就是「議題設定」的意思。我們並想出一些「議題設定」的作業方法，像是「白菜理論」。白菜有很多層，可以一層一層剝下去；這指的是，新聞也有很多層面可以發展。還有「鑽石理論」，鑽石的切面很多，你做這一面，我做那一面，但看哪一面的光芒比較奪目。聯合晚報成功大賣的原因，除了即時新聞外，得力在「議題設定」；有些時候，日報做過的新聞，晚報還能開發新的角度，做出新的切面。

聯合晚報的整體新聞結構是「蝴蝶理論」。蝴蝶的一雙大翅膀，一邊翅膀是重大的政經新聞或是國際消息，另外一邊翅膀則是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民生消息；至於機場新聞、會議新聞，則只占蝴蝶小小的身體。蝴蝶雙翅，一邊是「大的新聞」，一邊是「你（讀者）的新聞」；聯合晚報各類新聞的分布和結構比例大抵如此。

失去公平正常的工作環境

聯合晚報二月創刊，當年九月，我被調到聯合報任總編輯。幾乎一就任，就感覺與李登輝政權的關係繃得很緊。

聯合報的記者常跑不到黨政要聞。有次，一位在總統府工作的學姐約我吃飯，我試探地問學姐說：「我覺得總統府常把新聞給別的報紙，而不給聯合報？」學姐回答說：「黃年，這不是你的『想像』，事實正是這樣！」

當時，學姐還舉出四個新聞作業的例子，認爲聯合報對「府裡面」的態度有偏差。結果，出乎我

與學姐的共同意料之外，她所舉的四個例子中，竟然有三個不是聯合報的作品，而是誤將另幾家報紙的作品算在聯合報的帳上。我知道，我已經被貼上了政治標籤；而我的同事也失去了公平正常的工作環境。

衝突不斷發生。總統府不是漏你的新聞，就是要你更正；那時候整個聯合報黨政部門的記者，到外面採訪都遭遇很多麻煩，跑不到新消息，甚至是被公然抵制。身爲總編輯，寒天飲冰水，點滴在心頭。

不顧同事受累辭去總編輯

我覺得不必讓我的同事承擔這種壓力，以健康爲理由，向報社請辭；於是我成爲聯合報史上任期最短的總編輯，只當了兩年。民國七十三年，趙玉明因中英協議新聞離職，如今我則在總統府鋪天蓋地的新聞窒息戰中去職。趙玉老的下台，比我響亮豪壯。

我卸任聯合報總編輯後，李登輝與聯合報的關係並未改善，最後暴發了一場由李登輝與台獨團體發動的「退報運動」。

民國八十一年十月三十日，台北各主要媒體皆刊出一篇來自北京的報導稱：中共政治局常委李瑞環發表談話指出，台灣若搞台獨，大陸絕不允許，「即使犧牲流血，前仆後繼，也在所不惜。」過了幾天，國民黨發布新聞指出，李登輝主席在中常會上指責：「有一家報紙寫了一篇可怕的報導，恫嚇了我們的老百姓。」又過了幾天，李登輝接見訪客時，座中有人提到聯合報，李登輝怒稱：「你還看那個報紙？那個報紙我都不看了！」

台獨團體隨之發動鋪天蓋地的「退報運動」。其實，幾乎所有的主要媒體當天皆報導了那則消息，且聯合報又豈曾同意李瑞環的談話？但是，唯獨聯合報成爲李登輝及台獨的鬥爭對象，指聯合報

為「賣台集團」、「中共的傳聲筒」及「中共同路人」。

這就是李登輝在權勢顛峰時期給台灣新聞界的「新聞自由」，聯合報則失去了報導「自由的新聞」的權利。

意外接任聯合報總主筆

離開了編輯台，我以為就此退出了新聞戰場的第一線。不料，兩年後，王惕吾要我接任聯合報總主筆，從此投入更加熾烈的戰地。

接任總主筆，完全是意外。我的文字還可以，一直有人說我可擔任主筆；但我自知性情銳利，不宜擔當這個角色，甚至心中引為禁忌。

民國八十一年底，擔任聯合報總主筆數十年的楊選堂先生，因身體不適請退，報社要我接替；一時間，我竟面臨了無法推辭的局面，我當時的回話是：「我真的是『勉為其難』。只有一個要求，在任何時刻，報社認為我不適任，請立即命我去職；但若覺得我尚能承當，請給我多一些空間。」

我喜歡「我手寫我口」，但總主筆應也能「我手寫人口」。就總主筆的角色言，我不是理想人選，至今我仍持此看法。

開始寫社論，與國民黨李登輝的摩擦也日增日深。我很慶幸來到聯合報系，否則不能想像如何度過這十五年的主筆歲月。我的人際能力相當低拙，由於交往單純，使我在工作上更不受人情羈絆，亦幾乎無人找我關說新聞；甚至後來陳水扁官員與報社高層談及聯合報社論立場，我這總主筆亦不在場。若非聯合報，恐怕無處容我。

有句話我一定要說：向聯合報系指導我、容納我，及並肩作戰的新聞夥伴們致敬致謝；尤其是言論部的戰友們。

王惕吾先生於1994年3月21日邀戈巴契夫伉儷來訪，黃年（左）參與接待。（黃年提供）

鳥瞰或蟻視，觀音或羅刹

正如我預見黨外及民進黨會出現今日難題，我也幾乎在一開始就預見李登輝的今日下場。曾有兩位研究生因以有關憲政改革的社論為論文題目來晤，他們問我：「你們為什麼在那麼早的時候，就會發現憲改的問題有這麼嚴重，又怎會發現李登輝是這樣一個人？」

我說，原因有三。一、若自一二一五年英國的「大憲章」起算，民主憲政的演變發展已有近九百年歷史，其中的大經大緯皆告確立，已是顛撲不破；李登輝幾乎違逆了民主憲政的一切基本準則，無論在統治操作上，或修憲工程上，皆是倒行逆施。因此，必無生理。二、史上以撕裂社會為統治手段者必敗；希特勒的「亞利安血統主義」以反猶分裂社會，毛澤

東的文化大革命陷社會於仇恨，均是著例。三、由於歷史、文化、血緣、地緣及綜合國力的因素，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只能「和而解之」，不能逆勢而爲。我說，我對李登輝的總評是：黑金教主，毀憲元凶。

基於同樣的理由，我對陳水扁及民進黨的未來亦有相同的預見。

我對一位研究生說，新聞記者的新聞視覺與政治觀察力，往往有一成長過程。所有的記者皆會經歷同樣的成長過程，期望自己的專業視覺，能從青稚淺短的「蟻視」，慢慢變成高度漸升的「鳥瞰」。螞蟻也許分不清眼前的一汪水，究竟是一小窪積雨，或是煙波浩渺的大湖；如果是飛鳥，便有了雨窪與大湖的分辨。我的記者生涯與所有的記者一樣，也是努力嘗試從「蟻視」變成「鳥瞰」的過程。

革命像一塊璞玉；可能雕成觀音，也可能雕成羅剎。在我看來，曾是璞玉的「台灣革命」，已被惡匠雕成羅剎，而不是觀音。

革命事件史不絕書。有些革命的玉石，雕成了一尊觀音；有些玉石，雕成一個羅剎；另一些革命，就從一個羅剎雕成另一個羅剎，菲律賓就是這樣。而二十年來的這一場「台灣革命」，亦由李登輝雕的羅剎，轉到陳水扁雕的羅剎。

前面曾說，在歷史上，革命接下來常是反動，民主接下來常是背叛。英國的克倫威爾、法國的雅各賓黨、德國的希特勒及中國的袁世凱、毛澤東皆爲顯例。我在過去三十年的台灣的政治變遷中，彷彿看到了歷史重演；看到了革命變成反動，民主變成背叛；看到了小幾號的袁世凱，也看到了小幾號的希特勒。

問題是：災禍規模雖有大小之別，但災難的類型卻是異曲同工。毛澤東、希特勒造成的災禍儘管大，那是由中國人及德國人承受；但李登輝和陳水扁造成的災禍儘管相對較小，卻已足夠嚴重，則是全由台灣人承受。

上：向證嚴上人請益。下左：與妻李旭芬在日本嵐山。下右：黃年獨照。（皆由黃年提供）

何況，像英國、法國、德國，雖然一度把玉石雕成了羅刹，但他們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來作修補改造，將羅刹改回觀音，最後終於實現了接近理想的民主憲政。但台灣卻恐怕沒有那麼長的時間和那麼大的空間，供作迴旋轉圜；我們有沒有機會再把這座羅刹重新雕回觀音，實在不易樂觀。解嚴以來，台灣就像《聖經》裡面那名走過麥田的人，希望能夠找到最高的麥子；但愈走，麥子愈短，一再錯失了機會。

五十八篇修憲不可毀憲系列社論

我主持聯合報社論迄今約十五年，自己寫了逾四千篇社論或黑白集。自任採訪主任後，二十五年來，我只寫過一、兩篇署名的文章；且也幾乎不「外搶」，只在聯合報系以外的刊物用筆名發過一、兩篇稿。我寫社論的主要題材，大概有憲法、憲政、國家認同、兩岸、政治、司法、政風等。我拿過八個新聞評論獎，其中有四個獎與同仁合得，也許是台灣得新聞評論獎最多的主筆。後來，隨著政治變遷，我就成了新聞評論獎的「入圍」常客，不再獲獎。此外，我也出過四本社論選集。

民國八十六年，國民大會進行第四次修憲。聯合報發表「修憲，不可毀憲」系列社論，共五十八篇，自五月五日至七月二十六日，平均每三天刊出兩篇；一方面是社會公眾的憲政教室，另一方面更以憲政改革的守門人自命；可謂憲政史上之盛事，亦爲新聞史上空前之作。五十八篇社論中，有四十二篇出自我的筆下。

「修憲，不可毀憲」這個系列標題，已呈現了我們的基本立場：主張修憲（必須過河），但反對毀憲（勿上錯岸）。

李登輝是修憲主導者。我對他的看法是：解嚴後修憲非修不可的部分，或若非李登輝換了別人也一定要修、能修的部分，如萬年國會，李登輝畢竟也是修了（一定能過河）；但是，除此以外，關於

修憲者必須精準操持修憲方向的義務，及不可因修憲而導致毀憲之應負責任，李登輝卻是國家的罪人（上錯了岸）。

李登輝根本沒有憲政精神，只是將修憲視爲自己的權力工程。例如，他先修憲通過總統直選，而未同時規範總統之權責；其政治計算是欲藉直選總統的聲勢，於後續修憲將自己炮製成「超級總統」。不料，直選過關，超級總統卻未得逞，整個憲政體制遂告破碎；至於後續的幾次修憲，更淪爲政爭工具及分贓籌碼，愈發不堪聞問。

「修憲，不可毀憲」，這是聯合報社論在十幾年前的一家之見，當時曾被指爲異端；如今則已成國人之共識，而修憲變成毀憲所造成的國家創傷，亦已不能彌補。這正是那位研究生在十幾年後問的問題：「你們爲什麼在那麼早的時候，就會發現憲改的問題有這麼嚴重，又怎會發現李登輝是這樣一個人？」

「修憲，不可毀憲」這類的社論，當然使聯合報與李登輝的關係更加惡化，而聯合報社論則因李登輝的陷溺日深更爲國家前途憂。這也使得聯合報社論的工作處境更加複雜。雖然在幾年後眾人都覺得聯合報社論早先的見解無誤，但在每一個當下的政治現實中，我與主筆群卻有如在剃刀邊緣作業。

這個總主筆不好當，這個總主筆的報老闆恐怕更不好當。面對歷史巨潮，我們只能察看大波大浪的曲線，不可能太過在乎亂噴亂濺的水花。於是，我建議停開每週報社經營高層依例列席的主筆會議；報老闆不必參與每日逐篇的社論，總主筆則承當起完全的責任。平日作業由總主筆與主筆們聯繫，報社經營階層操持大經大緯，不再參與社論個案。

回想那段日子，我畢生都會記得王惕老的一句話：「總統有任期，報紙無任期！」

「黑金政治」與「統一公投」

「黑金政治」是我在社論中首先採用的概念。有位朋友跟我開玩笑說，我的墓誌銘可寫：「這是黑金政治的命名者與批判者。」

「黑金政治」一詞大概是台灣新聞史上影響最大的新聞詞彙。李登輝主政期間，錢權交易盛行，我認為日本人的「金權政治」還不足以形容台灣的情況，於是使用「黑金政治」一詞。有些人把「黑金政治」窄化成「黑道與金錢」的關係，但我的本意是泛指「以金錢換權力，又以權力換金錢」的惡質政治操作。

「統一公投」一詞亦是我創用。「台獨公投」是攻擊性的公投，「統一公投」相對則是防禦性的公投。統一公投是指台灣與大陸之交流互動，若進展至建立政治關係的階段，就交由憲法公投。後來，李遠哲主持兩岸小組，曾嘗試要將這個概念帶入；民進黨內部會議也好幾次想討論，但皆未成功。這是一個逆向思考，至謝長廷競選總統還曾提及。

關於海峽情勢，我採用的「筷子理論」也曾引起兩岸的興趣。兩岸關係有如一雙筷子，不能將兩隻筷子綁在一起（統一），綁在一起筷子就沒用了；也不能將兩隻筷子分開兩處（獨立），筷子分開了也一樣沒用了。筷子要有用，有些地方要合，有些地方要分，在有分有合之間，才能施展筷子的功能。

輿論常見的「政策賄選」，及修憲時間的「量身裁製」，也都是我提出的概念。還有陳水扁、謝長廷、蘇貞昌等人常掛在嘴邊的「內耗空轉」，也是聯合報社論首先採用。

第一個以「民粹」來形容台灣政治的也是我。民粹政治是從popularism譯過來的，原指訴諸「基層、農民」。我則認為，民粹在台灣的新聞語彙中也是指「流行的民間觀念，卻可能是一個錯誤觀

念」，拿破崙和希特勒因此受民意擁戴而崛起，而台灣的政治也存在著這類景象。

謝長廷自訴聯合報社論誹謗

民國九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高雄地方法院判決：高雄市長謝長廷自訴聯合報諸人誹謗案，王效蘭、王文杉、黃素娟、黃年等四名被告無罪。

事因聯合報的兩篇社論。一篇是我寫的「辦到謝長廷腳前的那一條線爲止？」，另一篇是徐履冰寫的「有污點的證人與無污點的檢察官——對高雄院檢查賄表示高度肯定與殷切期待」。

高雄市議會正副議長改選發生地毯式的賄選案。民政局長王文正在局長辦公室進行賄賂。幾乎所有的偵查線索皆指出謝長廷涉案，且有祕密證人出面作證舉發，但在十餘萬字的起訴書中，竟然連「謝長廷」三個字都未出現。這個案子的黑暗骯髒一言難盡，聯合報社論當然要問：難道竟只辦到謝長廷腳前的那一條線爲止？

於是，謝長廷控告聯合報社論加重誹謗罪。其目的是在製造寒蟬效應，使輿論不敢再追究案情。這不是政治迫害？這不是新聞屠夫？

我在法庭辯護時說，新聞記者的「第四權」是憲法賦予的憲政權利，亦是憲法賦予的憲政責任。我不可放棄，不能放棄，亦不敢放棄。

我說，新聞工作是第四權，其他三權都是政府的權力。政府的三權是行政、立法、司法，皆是憲法規定的權力；因此，新聞記者應當也將第四權視爲憲法層次的權力或權利，這也是唯一不屬於政府而屬於民間的權力或權利。記者對「第四權」要有角色的忠誠，不可背叛「第四權」。必須站到民主憲政的高度，始知何謂第四權？何謂新聞記者？

戒嚴時期，當局用一種方法扼制新聞自由；解嚴以後，當局則用另一種手法扼制新聞自由。例

如，當年的警總、新聞局、文工會針對新聞個案管制，但民進黨的一句「統派媒體」，則是全盤否定及滅殺新聞媒體的民主憲政角色。

解嚴了，有了「新聞自由」，卻容不下「自由的新聞」。

解嚴後智慧比勇氣更重要

從戒嚴走到解嚴。戒嚴當然不好，解嚴當然好。但是，就新聞記者來說，戒嚴固然沒有新聞自由，但解嚴亦未必就有新聞自由。

其實，新聞自由並不是存在於法律條文之中，甚至也不是必然存在於民主制度之中；它是存在於記者的心靈與意志之中。

在戒嚴時代，新聞記者的勇氣比智慧重要；解嚴以後，智慧比勇氣重要。因爲，戒嚴時期的是非黑白十分清楚，誰會支持萬年國會？誰會主張一黨專政？所以，戒嚴時期不必大智慧即可分辨是非，所需要的是對抗威權的勇氣。但是，解嚴後有了意見自由，發言已不需勇氣；倒是解嚴後的是非黑白反而曖昧不明，似是而非，似眞而僞，需要分辨是非眞僞的智慧。羅剎還是觀音，要有辨識的能力。

戒嚴年代，最大的趣味是追尋自由。在夾縫裡面，鑽來鑽去，找尋自我、找尋方向，但在解嚴後的自由時代沒有這個滋味。戒嚴時代無新聞自由，也能產生適格勝任的新聞記者；解嚴後有新聞自由，卻未必皆能成爲適格勝任的新聞記者。戒嚴時代需要的是追求新聞自由的勇氣，但解嚴後需要的是使用新聞自由的能力。

戒嚴時代，沒有充分的表達自由，但大部分的記者至少都還保有「不想說就不要說」的自由，拒絕諂媚當權者；不過，解嚴以後，很多記者竟然「自由地」淪爲當權者的打手，這是背叛了「第四權」。

戒嚴當然不好，解嚴當然好。但在戒嚴末期整個社會有很明確的方向感，也有很明確的進行感；解嚴後的共同感覺則是「內耗空轉」。我常覺得今日的我有如薛西佛斯，每天好不容易把石頭推到山頂，第二天它就滾下來了；過一天，只好又把石頭推上去，但它又滾下來。反正，天一亮，就閉著眼睛往上推；而且，眼睛不用張開，也就知道它已經滾下來了。對照解嚴前後，確實頗多感觸。過河是對的，但是否上錯了岸？

「不顧面對的眞相」

不是嗎？二十年來的「台灣革命」，由李登輝的羅刹，變到陳水扁的另一個羅刹。

「世界是平的」，但二十年來，由於主政者的因應策略錯誤，導致了「台灣海峽是斜的」；資源向中國大陸傾斜，情勢向中國大陸傾斜，時間也漸漸不站在台灣的這一邊。

試問：國家認同更分裂，憲政體制更破毀，經濟前景堪慮，社會仇怨升高，國際處境惡化，民主變質，政風貪腐，司法敗壞，教改失靈……。這究竟是觀音顏貌，還是羅刹嘴臉？

面對這個四分五裂、內耗空轉的國家，每一位新聞記者皆應自問：是否上錯岸了？革命是否出現反動？民主是否遭到背叛？

難道這一代記者也有「不顧面對的眞相」！

記者在做，天在看

朋友說我「默默無聞，轟轟烈烈」；我非有意如此，但如此亦悉合我意（原爲「沒沒」，但「默默」似亦無妨）。入行時我曾是略有名聲的新生代記者，如今則幾乎隱姓埋名；其實記者不需他人記得名字，唯求努力使自己的關懷在社會留下痕跡。

讀者的迴響，常常令我感動。有位東海大學的馮老師，與我不相識，看我的社論，寫了一幅字給我：「處處雷鳴皆瓦釜，人間不解重黃鐘；百年樹得無窮木，恨少千尋鐵骨桐。」

又如，抗日名將薛岳先生，亦與我素昧平生，他一百多歲的時候，還看聯合報社論；有一天，薛公與我一位父執輩談到聯合報社論，並有誇讚。我的那位長輩跟他講，黃年不太應酬，但工作頗有熱情。時年一〇三歲的薛公於是寫了一副對子給我：「靜觀天下事，遙隔世間人。」我覺得，他寫到了我的內心深處。兩個月後，薛公就過世了，這副對聯成了他的謝世作品。我從來沒見過薛公，他過世時我在國外，連他的喪禮都不知道。

這類讀者反應，使我愧不敢當。我覺得這些皆是社會良知對於新聞工作者的眞摯期勉，除了感激，更生敬畏。

珍惜第四權。記者在做，天在看。

◎初稿：黃孝怡

◎修訂：張錦華

◎定稿：何榮幸、黃年

◎訪問時間：二〇〇七年五月七日、二十二日

◎地點：聯合報大樓黃年辦公室

陳銘城

〔第十七章〕

解嚴後政治人權報導

一九九一年自立早報記者

陳銘城

前頁圖說：
1999年於台北二二八紀念館擔任民權運動展導覽。
（陳銘城提供）

一九八〇年林宅血案，是他放棄外商公司職務、投入新聞工作的轉捩點。從《台灣時報》、黨外雜誌《八十年代》到《自立早報》，他一直在兩大報之外的民營與異議性媒體突破言論禁忌，致力於二二八事件受難者、海外「黑名單」人士等人權報導。

爲了取得政治受難者家屬的信任，他比別人付出更多耐心與努力，終於建立與受難者家屬的互信關係。因爲長期在政治人權領域付出，他在一九九一年獲得台灣人權促進會頒發的「人權報導獎」。這筆獎金，他用來飛到日本繼續報導黑名單人士。

他的記者生涯都在爭取別人免於恐懼的權利，但沒想到，有一天他必須爲了挽救自己的報社而戰，爲了維護自立報系新聞自主風格而走上街頭。「自立事件」後他離開媒體，轉戰政府部門，在文建會待了很久時間，至今仍在舉辦他最有興趣的政治人權相關展覽，自立報系則已走入歷史。

經過這樣的歷程，當他感性強調自己的新聞理念是：「記者寫獨家沒有什麼了不起，更重要的是能夠感動更多人，來跟你做同樣的事，這才是了不起。」坦白說，我們一點都不意外……

陳銘城大事記

- 1952 陳銘城出生
- 1971 退出聯合國
- 1978進全錄公司當業務代表
- 1979 美麗島事件
- 1980台灣時報桃園地方記者
- 1985黨外雜誌八十年代編輯
- 1987 解除戒嚴
- 1987自立晚報記者
- 1988自立早報記者
- 1991台權會首屆「台灣人權報導獎」
- 1996製作超視「魚夫漫畫show」節目
- 1998桃園縣長呂秀蓮新聞及文宣祕書
- 2000 政黨輪替
- 2000文建會主委陳郁秀機要祕書
- 2003台視「謝志偉嗆聲」節目企畫統籌
- 2004台視八點檔戲劇「台灣百合」總策畫、華視專案經理
- 2005華視「台灣史望春風」製作人、「詩人部落格」製作人
- 2007文建會副主委吳錦發辦公室主任

為受難人權發聲

小時候充滿好奇心

我的記者生涯中對「人」的關懷，可能和我小時候愛聽故事、喜歡跟大人聊天，又愛打破沙鍋問到底的個性有關。

比起同年齡的小孩，我對週遭的親戚認識比較多。記得每次家族聚會時，都會看到有位長輩；他的手怪怪的，不太講話。我想知道他的故事，但他都不講，大人也叫我不要亂問。包括這些事情在內，我如果再問，就會被罵「囝仔人有耳無嘴」。

但是，那種好奇就像顆種子，埋在我心裡慢慢發芽。長大後有機會，我就想去瞭解、挖掘那些不能說或是被視爲「禁忌」的話題。加上好打抱不平的個性，對於社會不公義的事情，我特別有反應。

在戒嚴時期，許多言論、思想無法公開流傳、討論。讀大學時，我就像海綿，想多瞭解不同的思想。我開始看各類型黨外雜誌，如《台灣政論》、《中華雜誌》、《夏潮》。後來當兵時也照看。爲了不被發現，我每次都偷偷把雜誌塞到床鋪的軍毯底下。

林宅血案後決定當記者

一九七七年發生「中壢事件」，我正在當兵，回桃園投票選縣長。跟我一起在預官受訓的朋友、政大政治研究所博士鄭金倉跑來找我，說：「中壢出事了！」我說：「好！我們去看。」由於我具有軍人身份，其實要很小心。我們先跑到投開票所現場，一路上街道都是暗的，警車翻倒、中壢分局著火，很多電線走火，非常混亂。

不久，有人叫：「趕快回家！」還聽說「現場有人被打死」。後來傳出開票所負責人爲國民黨作票，有一位牙醫師邱奕彬出來，證明有作票。然後又傳來有警察開槍打死學生，聽說是中央大學的學生。

結果，蔣經國親自下來坐鎮，實施宵禁，選舉結果則由脫黨參選的許信良當選縣長。我和朋友事後討論很久。這次因爲國民黨選舉舞弊而引發的暴動，對我的衝擊很大。我親眼目睹這個事件，看到體制的不義和民間的激憤，比起以前只是聽說，更震撼人心。

到了一九八〇年，美麗島軍法大審期間發生「林宅血案」，對我衝擊更大。

那時候我剛結婚，準備生小孩。我本來在台灣全錄公司當業務代表，有穩定的工作。但是，當我看到新聞報導這個慘劇時，我的感受只能用心痛來形容。政治怎麼可以傷害無辜的老母親和小孩！這讓我決定要投身民主運動。如果我不關心政治，政治會繼續扭曲下去，甚至殘害無辜。也還會有像林宅血案的悲劇繼續發生。

我參與的方式，不是投身選舉，而是致力於言論的突破。因爲我自己對從政沒有興趣，也沒有那種本錢。

在戒嚴、黨禁的台灣社會，新聞言論的突破，是台灣走上民主國家，以及保障人權的重要方向。

何況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之後，我更覺得需要有人站出來，去做這樣子的工作。我曾經跟幾個朋友討論過，基本上不參與政治、不搞組織，投入新聞和言論的突破，可以試著去做。所以我後來決定投身記者工作。

新聞生態惡劣失望離開

由於我在全錄公司的收入是記者的兩倍多，轉行當記者是個重大的決定。我太太雖然很擔心，卻始終支持我。

那時剛好《台灣時報》招考，我考上後，擔任桃園地方記者。台灣時報的老闆吳基福，是台灣南部報界最後一個仕紳。他是眼科醫師，也是省醫師公會理事長，曾留學英國。他黌是非分明，堅持說真話。美麗島大審時，台灣時報報導最深入公正。我很佩服他的報紙，認爲這樣子的報紙值得我投入。

吳基福每天早上起床，就先看報紙。他要求很嚴格。譬如報導縣市議會，或者民間團體時，一定要附上相關人士的照片。只要記者沒有做到就慘了，會接到他的電話，他一大早就把你叫起來。我寫過《台灣文藝》快停刊，以及抗日古戰場等報導，都接到吳基福的電話鼓勵。

不過在台灣時報待不到一年，我就選擇離開，而且是失望地離開。因爲當時地方新聞路線的生態惡劣，素質參差不齊。有些記者的「主業」是賺外快跟拉廣告，甚至有記者在幫理容院、色情邊緣行業護航，或是幫忙關說。我也常看到某個校長請記者吃飯，希望記者不要寫對他不利的新聞。

我對工作環境感到很挫折，加上記者工作也與家庭生活衝突。最後寫了辭職信，當記者不到一年，我就失望地離開新聞界，重回企業圈。

八十年代與警總過招

辭職後，我回全錄當業務，後來又到半導體公司上班。我接觸許多企業人士，討論台灣經濟問題。當時發生許多經濟犯罪，背後大部分是黨政要員、權貴子弟的涉入，以及政黨轉投資、特權特許所引發的弊端。

事實上，企業界不滿政黨特權特許，但敢怒不敢言。一九八四年發生「十信風暴」，蔡辰洲一倒，影響很多人。加上一九八五年又發生「江南命案」，我實在看不過去了，覺得自己應該做點事，決定重回記者行業。

以前在台灣時報的採訪主任李旺台，當時在黨外雜誌《八十年代》雜誌工作。我跑去找他討論。他說：「欸！你都說說而已，為什麼不寫？」所以我就進入八十年代，寫黨營事業弊端，也幫《財訊》雜誌寫過稿。

我寫經濟犯罪與特權問題，想讓一般民眾有粗略瞭解，也可以讓政府部門檢討改進。我認為，除了政治與言論自由，金融秩序也是社會正義的重要指標。

那時候警總為了掌握黨外雜誌的言論，會使出很多招數。電話監聽是少不了的。警總也派人透過關係混進雜誌社臥底，把重要的東西帶走。事後過了好幾年，這些人才告訴你，他當初是如何進去雜誌社。

當時雜誌排版還是用照相打字，在外面請人打字，警總就可以掌握到備份。若警總覺得內容很敏感，不願意讓你登，就直接在裝訂廠抄書。一知道消息，我們趕快跑去搬書，跟他玩躲迷藏，有時候還可以逃過幾劫。後來我們發現，警總這樣做卻造成反效果。只要外面的人知道這期是查禁過的，後來加印的，都會賣得特別好。

向司馬文武學功夫

當時黨外雜誌的參與者多會投身選舉，但八十年代多是專業記者，投入選舉的人較少。創辦人康寧祥雖然要參選，但不會干涉雜誌言論。

我之前在台灣時報待過，有一點新聞基本功，但常把情緒、價值判斷的字眼都帶進文章裡。八十年代總編輯司馬文武（江春男）會耐心教導，告訴我如何衡量尺度。我覺得八十年代的優點，第一個是有點底子，第二個是文字不會很尖酸刻薄、帶有辛辣情緒。記者有所根據才會寫。所以，連國民黨的人也會看八十年代。

我從司馬文武身上學到，寫文章不要掉書袋，愈淺白愈好。功力到了一定程度，就好比白開水一樣，誰都看得懂、覺得有意思。

還有一些大報社的記者，常常跑來找司馬文武聊天、寫稿子。他們把在外面看到奇奇怪怪的東西、在《中國時報》、《聯合報》登不出來的稿子投到這裡。陳國祥就常在八十年代寫政論。

我在八十年代待到一九八六年。之後我蠻想去報社，因爲報紙影響力比較大。戒嚴時代，台灣報紙只有三大張，言論受到控制，因此需要黨外雜誌。但是解嚴後，基本上許多話題都可以討論了，所以黨外雜誌階段性目標已經達成，漸漸消失。

剛好《自立早報》要成立，總編輯陳國祥跟我在電話聊天，問我要不要來。我跟陳國祥在八十年代就蠻熟的，而且當時的自立報系有言論發揮的空間，所以我就去了。

報導「黑名單」險些被捕

我在自立早報延續之前的關懷，持續寫政治受難者的故事，包括海外「黑名單」人士、海外台獨

運動人士這一塊。

戒嚴時期政府漠視人權、壓迫異議者，造成許多人犧牲。尤其是台獨、組黨等政治主張，更被視為「禁忌」。參與者的信念、付出的代價，無人知道。報禁年代的歷史缺頁下，我想挖掘這些人的故事，為他們發聲，反映時代的荒謬與無奈。

政治犯黃華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因為台獨主張，總共坐牢二十幾年。出獄後，他跟康寧祥等人辦《台灣政論》，大家常聚在姚嘉文家討論。討論到一半，黃華下去買包子。大家等了快一個小時沒看到人，從窗戶一看，竟然看到黃華抱著包子，傻傻站在對面馬路口。原來他在獄中生活太久，不知道台北市的房子，已經從透天厝變成公寓，要按電鈴才有人開門。結果他就一直站著，等到熱騰騰的包子全冷掉了。

這個故事聽起來好笑，但想想又讓人感到心酸。許多政治犯坐牢太久，已經跟社會現實脫節。

我當記者的起源就是來自好奇心。這些海外黑名單、台獨運動政治犯的故事，在台灣的媒體很難出現，所以我花很多時間採訪政治受難者與黑名單人士。這些報導寫了不一定馬上登，但如果假日需要備用稿，或是他們發生闖關回台、在台被捕等事情，我之前寫的文章就會登出來。

一九九一年，我獲頒「人權報導獎」。我拿這筆獎金帶攝影記者潘小俠，去日本採訪台獨聯盟要角黃昭堂、「獨台會」創辦人史明等海外黑名單人士，翻拍他們的照片。後來爆發「獨台會案」，政府逮捕清大歷史研究所的學生廖偉程，還有陳正然和王秀惠等人，懷疑他們跟史明有接觸。

當時史明常叫人送資料給我，例如他自己寫的宣傳品《台灣革命的綱領》（《台灣社會主義革命黨綱領草案》），還是油印的。我後來聽自立的同事說，調查局因此認為我也是「獨台會」一員，抓了陳正然等人後，就說還有一個「漏網之魚」。

直到獨台會爆發之後，我才寫出史明的故事。我一口氣寫六千到八千字，後來分成上、下兩篇。

照片也是我拍的。場景在東京池袋一家他自己開的中華料理店，本來旁邊還有一盤吃剩下的魚，挪開來再拍照，印象都很清楚。當時電視台都用我的照片。

沒有見報的遺珠之憾

不過，也有幾個故事沒有完整寫出，我覺得對受訪者很不好意思。

我在《海外台獨運動史》書中稍微提到，一九七七年，陳明財跟他兒子逃亡的故事，非常精采。

陳明財是電機材料的買賣商，跟黃昭堂都反對國民黨，支持黨外不遺餘力。後來陳明財和楊金海為黨外人士顏明聖助選，但顏明聖因國民黨作票而落選。楊金海率領群眾去抗議，後來被抓了。調查局也約談陳明財，他決定要逃亡。陳明財、他兒子、以前的學徒，買了馬達裝在木箱船上。三個人從基隆八斗子摸黑，開著船砰砰砰出去，要到宜蘭外海的與那國島（編按：琉球列島八重山群島最西的島嶼，也是日本最西端的島嶼，距台灣約一一一公里）。

那時他們得到消息，與那國島屬於日本國土，只要到那裡，就可以打電話向黃昭堂求援。但他們砰砰砰開著船，竟然跑到釣魚台。後來被日本漁船搭救，馬上被逮捕，因為那時發生釣魚台事件，時機很敏感。日本認為他們一定是國民黨的特務人員，就以入侵日本國土名義逮捕他們。結果，當初一起逃亡的學徒，後來被國民黨策反決定回國，陳明財這對父子則堅決不再回到台灣。

這麼曲折的故事，可惜報社沒有足夠版面可以登出來，到現在我都還放在心上，希望有天能寫成完整的書。

與政治受難者建立互信

其實，採訪政治受難者難度很高，因為他們曾被迫害，很難信任陌生人。我會耐心地慢慢跟他們

建立關係，把我寫的報導給他們看，讓他們對我產生信任。

我印象比較深刻的受訪者，是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律師吳鴻麒的太太楊毛治。當初吳鴻麒遇難之後，他的好朋友每次看到她，都裝作沒看到。那時候只要有人在二二八出事，親朋好友幾乎都不敢來往。這個刺激，讓楊毛治變得相當獨立，她絕對不去拜託別人，也不看別人臉色，她更不看報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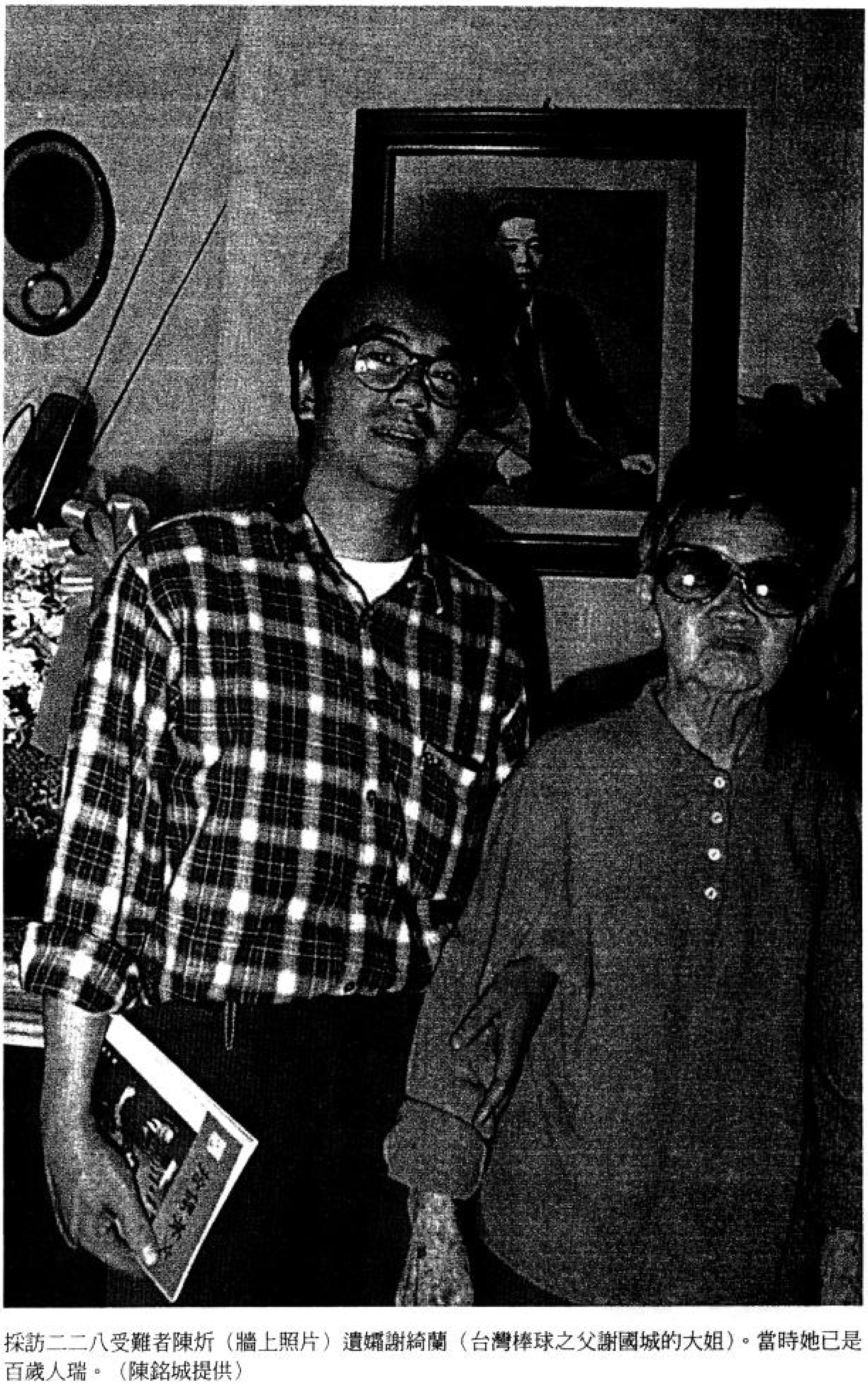
我從認識她，到她後來願意接受採訪，花了兩年的時間。我常把我寫的二二八相關報導寄給她看。後來有一天，楊毛治主動打電話給我：「來我家，我說給你聽。」

她不講則已，一講就從早上十點講到晚上十二點鐘。把他先生的故事全部說出來，連遺體照片都拿出來。目前二二八只有兩張遺體照片：一張由二二八受難者、前輩畫家陳澄波的太太保留，一張由吳鴻麒的太太保留。她也拿吳鴻麒所寫的日記給我看，從一九四七年一月一號他去電台講中華民國憲法開始實施，一直記到三月十三號最後一天。三月十六日，他屍體被人發現，則是由她補上。我和楊毛治溝通很久，她才讓我影印這些珍貴歷史文獻。

由於我曾經在全錄公司當sales，公司有一套完整的sales training，教你怎麼樣跟人家溝通。我覺得這些訓練對我後來當記者很有幫助，因爲當記者要有能力跟受訪者溝通，要會聽、也要會問，還要判斷眞實性。

這套訓練幫助我採訪政治人物時，隨時提高警覺。政客一天到晚都在接近媒體，甚至利用媒體。他們常常對自己講過的話反悔，通常我不讓他塗改、否認他講過的話。對我而言，他們講的話絕對是用鋼筆寫的，要修改就得用修正液，留下痕跡。

但我對政治受難者的態度就不一樣，他們一輩子很難有機會面對媒體、說出心裡的話，而且心裡的陰影是一輩子的。如果採訪後他有顧慮，要修改講過的話，我絕對同意。像楊毛治講吳鴻麒的故事，她女兒覺得有一句話不要登。爲了這句話，我甚至改掉已經做好的版面。



採訪二二八受難者陳炘（牆上照片）遺孀謝綺蘭（台灣棒球之父謝國城的大姐）。當時她已是百歲人瑞。（陳銘城提供）

筆下人物立體化

我當記者，就是希望打破言論禁忌。因爲這些主題含有價值判斷，所以在報導當中，我會減低自己的情緒投射，描寫事實或現場敘述。

很多記者只透過麥克風記錄誰講什麼話，埋著頭一直寫，旁邊人打起來了他也不知道。這些群眾的衝撞，或是誰有某些小動作、附近場景，才是關鍵，記者就要像攝影機一樣去拍。

我常提醒自己，寫人物要寫得立體，不要寫得扁平。雖然不容易，卻可以吸引讀者注意。我想這跟我之前受過的sales訓練，以及在八十年代待過有關吧。我寫作不要寫給內行人看，常問自己說：太太看得懂嗎？女兒看得懂嗎？不要賣弄文字，繞了半天，好像在擺脫跟監一樣。

受訪者講的生活瑣事也很重要。從日常生活瞭解他們的個性、情感、價值觀等，幫助我把人物寫得生動深刻。

舉個例子，陳澄波的兒子曾轉述他母親談的一個故事：陳澄波出國到日本念東京美術大學，後來去蘇州畫畫。他太太留在家幫人洗衣服、縫衣服，寄錢給他。之後好不容易盼到他回家，她看到先生行李裡，有個用紙巾包起來的東西。趁陳澄波不在的時候，她打開來看，結果是石頭。她想：「這麼寶貝，說不定裡面有金子！」就拿鐵鎚敲一敲，結果還是一樣。

後來陳澄波回來，問太太是誰把石頭敲破。他太太無辜地說：「沒有啦，我想說你去蘇州拿回來，一定很寶貝。想看看裡面是不是有金子。」她先生罵她：「不准妳給我亂動！這是我在蘇州寫生的時候，坐的一個石頭。這個石頭，是舊城牆掉下來的，是古蹟一部分。以後不准亂動我的東西！」

後來陳澄波的太太保存丈夫最多的遺物，包括二二八血衣、遺體照及素描。

從這個故事就可以瞭解，這對夫妻間價值觀的衝突。陳澄波不管現實，只追求藝術世界，一心一

意想當畫家，騙太太、岳父說去念日本醫科，結果跑去念美術。他的岳父後來乾脆斷絕他的經濟，但他太太聽說陳澄波生病，不忍心就偷偷寄錢給他。他太太本來期待陳澄波拿回來的石頭是金子，結果敲了好幾個洞都沒有，還被先生罵。兩人的生活態度、價值觀的衝突，可以在這樣的小故事中發現。

我想寫的，就是從微小處看出真實情感的故事。

對自立早報總編輯拍桌抗議

我在自立早報待了七、八年，寫的新聞大部分都在挑戰禁忌。報社的老闆跟社長，接到不少電話。但他們很少對我施壓。例如社長吳豐山，頂多開玩笑叫我不要害他。

很多報社老闆或總編輯會干涉新聞方向，但是自立早報尊重記者的專業判斷。他們頂多告訴你新聞訊息和線索，由你自己查證、判斷與採訪，評估新聞的重要性。

編輯會議上，記者和主管一同討論、決定新聞內容。我在討論的氛圍中，學到很多新聞判斷、倫理原則等。我們也常和《自立晚報》同事，像李瓊月、彭琳淞一起分享自己跑線的心得。

不過，我曾經因爲一則街頭運動的報導，對總編輯拍桌子抗議，差點不幹了。

一九九三年，民進黨「四一九總統直選」街頭遊行，民眾在台北火車站前面靜坐五天。警政記者的報導中暗示抗議人群準備一百顆汽油彈，要在爆發衝突時丟汽油彈。

但是，許多跑警政的記者，根本沒有看到他們在街頭，只待在警察局裡面看 monitor（監視器）、採訪警方，然後寫新聞。這樣的新聞只有警方的觀點卻沒有群眾的觀點，更缺乏求證。我那時整天守在現場，知道實際情況並不是這樣。

我跟編輯主任和總編輯說，讓我們實際在街頭採訪的記者，跟警政記者那邊的訊息互相平衡。但是之後的新聞還是沒有改變。有一天我受不了就拍桌子啦！我跟總編輯說：「如果這新聞繼續被扭

1992年4月19日總統直選遊行，在台北火車站忠孝西路抗爭現場。（陳銘城提供）

曲，我就不幹了！」

那晚截稿之後，總編輯胡元輝馬上跟我們到現場瞭解狀況。我們的攝影記者劉振祥站到陸橋上面，用長鏡頭拍到警方在人牆後方打人。結果自立早報獨家拍到四一九學生、黨工、社運人士被打的照片，後來才讓警察的街頭暴力稍微收斂。

我想，當年也只有自立報系才有這樣的空間，能讓記者勇於爲新聞眞相去fight，去argue。

全力搶救自立

一九九四年，自立報系要賣給市議員陳政忠時，我認爲這絕對會傷害獨立公正的言論品質。那時報社內部的凝聚力很高，大家有共識要搶救自立。自立長時間關心各種社會運動與弱勢團體，讓微小卻重要的聲音能夠發出，這樣的媒體卻可能要消失。我當時只有一個念

頭：不能讓自立賣掉！

我們採取雙線方向展開搶救運動。內部透過工會來爭取員工權益。我負責串聯外部力量，包括媒體同業、學界與社運團體。後來我們提出「編輯室公約」，希望資方能夠承諾，不干預新聞專業。

那年九月一日記者節的「九〇一為新聞自主而走」遊行非常精采。那是颱風天，人都快被吹倒了，大家還是勇敢走完全程。雖然最後自立被賣掉、「編輯室公約」沒有簽訂。不過搶救自立運動，展現出記者的串聯力量，更催生出台灣第一個自主性專業組織——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我認為這場搶救自立運動是台灣新聞界的典範。

新資方入主自立後，整個言論品質受到影響，我決定離開。本來考慮去別的媒體，不過我聽說有的報社把參與自立抗爭的這些記者列入「黑名單」。我想一想，台灣已沒有第二個自立。如果當記者無法為弱勢者發聲，報社自主空間又小，那不如歸去吧。

一人電台玩得過癮

離開自立早報後，有一段時間如同流浪。我跑去打零工、作文史調查。沒有正式工作、沒有頭銜，有空就幫太太、小孩送便當。不過我滿開心的，因為可以盡情花時間深入作二二八、白色恐怖時期的文史調查，採訪當年的受難者。

後來在省議員彭添富的支持下，我創立「中壢之聲」地下電台。雖然只有我一人，卻玩得很過癮。我常住在電台裡，也會請彭紹瑾、鄭文燦代班，我就可以休息一下。有時我會向其他電台借有關台灣歷史的演講帶和音樂帶輪流播放；半夜它會自動播放，我就回家睡覺，等到早上六點再來換帶子。我也用電話call-out訪問名嘴或專家，有次還現場轉播省長選舉的公辦政見會。這段時間累積不少「死忠」的粉絲。不過後來政府開放電台申設，我申請執照沒過，只好結束這段玩電台的日子。

上：1994年《自立》抗爭，在票選總編輯以88：0留任李永得、趕走新資方陳政忠派任的林森鴻後，晚報政治組同仁合影留念。（陳銘城提供）

下：自立老同事定期聚餐。常約在報社附近「阿才的店」。右起爲吳樹民、劉美玲、徐璐、蘇正平、黃旭初、陳銘城夫婦、胡元輝。（陳銘城提供／謝三泰攝）

我辭掉記者之後，回到企業，寫稿、出書，也曾去政府部門。雖然不當記者了，還是想要去挖掘更多不爲人知的歷史，讓弱勢者發聲。

一九九六年，我和四、五位平面媒體記者出身的同事，到超視製作魚夫主持的「魚夫漫畫show」，這是第一個電視名人訪談節目。一九九七年，到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辦解嚴的街頭運動展覽。一九九八年，當桃園縣長呂秀蓮的祕書。二〇〇〇年陳郁秀當文建會主委時，我當了她四年的機要祕書。之後我到台視「謝志偉嗆聲」節目策畫專題。我跟主持人謝志偉建議，這個節目不要只是討論時事，每一台都差不多。我覺得應該讓弱勢族群來「嗆聲」，才有意義。

像阿里山鄒族「蜂蜜事件」發生後，很少人認眞討論。但這次事件，突顯原住民和漢人的生活習慣、文化衝突，以及原住民長期被漠視的權益。所以我們找了當事人、原民會官員，還有相關學者上節目討論，或許關心這類議題的人不多，節目收視率也很差。不過我覺得若有機會，還是應該擺脫收視率迷思，多製作這樣的專題。

穿針引線協促重逢

記者生涯所寫的故事、採訪的人物，我都清楚記在腦海中。離開新聞界，延續同樣的情感投入台灣的文史工作，沒想到陸續促成許多失散的人重聚。

在自立報社時，我寫過一個二二八受難者徐征的故事，因此和他大女兒徐光成爲好朋友。後來知道她的老師李錦文先生，白色恐怖時代被抓去保安司令部關。那時候他和一個叫黃守禮的人，一個關樓上，一個關樓下。他們從沒見過面，常常唱歌互相鼓勵，希望有一天能夠出獄，但後來失去聯絡。

李錦文很懷念這個朋友。於是我就幫他找人，竟然找到了，就安排他們一起上地下電台。兩個人重逢，合唱那時候坐牢唱的歌。一首一首唱呀唱，唱到後來兩個六、七十歲的老先生，淚流滿面。

還有一次，我在「謝志偉嗆聲」節目當企畫時，節目訪問歐陽文先生。他以前在台南永福國小教書的學生，打電話拜託我們找另一個老師葉石濤。兩位老師是同事，先後因爲清鄉白色恐怖事件被抓，就再也沒見過面。我想促成他們重逢，後來就去找葉石濤，安排他們兩人見面。還有很多類似的故事，我覺得媒體不就是應該有這樣的功能嗎？

跳脫悲情策畫林宅雙胞胎生日會

由於林宅血案影響我太深，現在想起林宅血案，我還會掉眼淚。

二〇〇〇年正好是林家雙胞胎遇害二十週年，我想幫她們辦追思活動。但是考慮到各媒體在每年二二八的新聞篇幅都會集中在二二八事件，掩蓋林宅血案追思活動，所以我跟林義雄的太太方素敏建議，不要把活動辦在二月二十八日。我問雙胞胎的生日是幾號，她說二月二號。我說：「那就選二月二號吧。我們換個方式跳脫悲情，辦個溫馨感人的生日會。」

我和田秋堇、姚雨靜等人開會討論，決定要找回當年失去聯絡的人。雙胞胎各有一個奶媽，還有她們衛理幼稚園的楊老師，我們都不知道在哪裡。後來就開記者會，公布他們的照片，希望大家幫忙尋人。

很感動，我們竟然找到了。還有她們幼稚園的同班同學、當年替林奐均急救的仁愛醫院院長、外科手術醫生，以及一位護士；這位護士當時每天在林奐均床邊，跟她講了三百多個故事。這些人都現身會場，氣氛很感人溫馨。

我雖然已經不是記者，卻是延續當記者的使命感，辦了這場活動。每年林宅血案的追思活動，媒體報導只有一小篇幅，了不起一張照片。我覺得對台灣社會、對林義雄夫妻、對他們存活下來的女兒也好，大家需要去理解他們的心情、瞭解這個事件的意義。我辦生日會的意義就在這裡，希望讓更多

人瞭解這段史實，對他們才公平。

進入政府持續關懷人權

我在電視台製作節目、到二二八紀念館策畫展覽時，還要負責籌錢，每次完成一個節目或展覽，都累壞了。後來有機會到文建會工作，我並沒有掙扎就答應。因爲我覺得辦這些活動需要行政資源，而且公部門影響力大，能夠讓這些長期沒有聲音的人被聽見。

二〇〇五年，我們在台北火車站辦戒嚴時期政治檔案展。火車站是當年白色恐怖張貼槍斃名單的地方，於是在那邊公布所有戒嚴時期的政治檔案、所有被槍決人犯的名單。

有一個七十幾歲的歐里桑來看展覽，拜託志工幫忙找他父親的名字。白色恐怖時期，老先生的父親被槍斃。那時他還小，被送給父親的好朋友當養子。後來全家搬到台北，也不敢跟生父家這邊聯絡，怕被牽連，從此不相往來。

直到他來看這個展覽，從槍決名單中找到生父的名字。志工告訴他去檔案管理局申請父親的檔案，以及槍斃前的照片。再進一步打聽，知道他有一個哥哥在高雄。就協助老先生下去高雄和他哥哥相聚，然後一起去他生父的墳墓祭拜。

二〇〇五年五月十七日，我們辦綠島人權音樂祭。有一百個政治受難者跟家屬重返綠島。其中一半以上，出獄之後從來沒有回去。這次重返綠島，他們情緒都很激動。我請到國立台灣交響樂團演奏蕭泰然的曲子。指揮歐陽慧剛和彈鋼琴的歐陽慧儒兩兄弟，爸爸媽媽都是綠島政治犯。

這個日子對受難者是很有意義的，一九五一年的五月十七日，就是政府送第一批政治犯去綠島的日子。當天總共有五十個國內、外媒體採訪，外國媒體對綠島和政治犯很有興趣。

我要負責整個活動流程，包括記者的住宿交通、出公函、借船運樂器。辦完後累得都快得高血壓

上：1997年8月15日，在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策畫「台灣人的戰爭展」，與台籍老兵蕭錦文（左一）、台籍看護陳媽媽（右三）、海外鄉親合影。

下：2002年在文建會擔任陳郁秀主委的機要祕書，到美濃鍾理和文學館訪視。與館長鍾鐵民（右）、第二處處長黃武忠（右三）合影。（皆由陳銘城提供）

了。不過心裡覺得很開心，國家正式對這些受難者平反和告慰，是人權的一大進展。

感動人心比獨家更重要

從記者生涯退下後，我當過電台台長、節目企畫、策展人、政府部門的官員等。這麼多的角色，對我都有不同的意義。戒嚴時代，媒體和言論突破的工作很重要，所以我選擇當記者。不當記者後，我把之前寫戒嚴時期的人物故事出版，或是透過電視節目、展覽等活動讓更多人知道這段歷史。

我的媒體經驗讓我知道記者要什麼，如何吸引他們來採訪。這些年也開始有一些記者對這類議題有興趣，持續在耕耘。不管是什麼形式，文字也好，電視、展覽也好，我覺得重要的是，能讓歷史真相公諸於世、被世人記住。

當記者時，如果跑到獨家，好像很了不起。不過。我寫的是生命故事。別人親身經歷的喜怒哀樂，我不過是把它寫出來而已。我覺得，當記者寫獨家，沒有什麼了不起。更重要的是能夠感動更多人，來跟你做同樣的事。這才是了不起。

起初當記者的理念，一直延續到現在。不管身份轉換成什麼，政治人權和歷史平反，一直都是我努力的目標。

政黨輪替後，政治亂象仍在。撇開無意義的口水，我認爲重要的轉型期正義，就是持續讓大眾認識過去的歷史、記住歷史。我想趁這些受難者身體還健康、可以接受訪問的時候，留下他們生命的紀錄。直到現在，我們陸續完成一、兩百人的口述歷史，但也有人來不及留下紀錄就走了。

我是隨性的水瓶座，這輩子從不作計畫。順著自己的理念走，全力以赴。不管在哪個環境，合則留，不合則去。回顧我的半百人生，名利或頭銜不足掛齒。只希望自己的努力，能讓大家正視歷史、謙卑反省，並增添悲憫之心。希望我的書寫報導、舉辦過的展覽，能爲台灣社會留下一點出土的記

超多精品资源尽在：http://iask.sina.com.cn/u/1623826291/ish

准免费！

阅 读 说 明

首先感谢你下载本书！

本人的资料素来是免费的——为此我已坚持了几年，上传的资料逾千。然而，随着工作的变化，闲暇时光越来越少，倍感一个人“战斗”得太辛苦，因而加设了积分，让大家了解资料的来之不易（其实制作过程真的是很艰辛漫长的！），遂统一上传至 iask.sina.com.cn，当然仍是免费的，你只要拨冗注册一个 iask 账号就能下书了，积分用完再注册一个即可。还有，除供私人收藏的资料（陆续开放）外均无密码。

你下载下书即表示你已承诺将在 24 小时内删除该电子档----作为一个“人”，相信你能做到这一点，对吧？(潜台词是什么，相信你已很清楚)。

目前本人已收集 100 万册左右各类书籍，后续择其中部份制作成 PDF 电子图书。当然，本人无义务提供这些图书，因此不会设上传的时间点和数量，更请勿向本人索取。

另，谢绝转载此书——如果你是一个有尊严的人，相信你也一定能做到这一点。

Good luck!

吴国林　Colin Wu（一位孤独的战士）

MSN / E-mail: colin_21st@hotmail.com

(本人不知 QQ 为何物，又有何用，请勿就此问题发邮件，thanks.)

憶，填補人權歷史的缺頁。

◎初稿：蔡士敏
◎修訂：林麗雲
◎定稿：何榮幸、陳銘城
◎訪問時間：二〇〇七年四月二十三日、五月三日、十日
◎地點：台大新聞所攝影棚